中国军事通史 第十卷

唐代军事史

目　录

第十卷　唐代军事史（上册）

书末附图：

6、唐灭西突厥曳咥河之战示意图
7、唐军攻克平壤灭高丽作战示意图
8、武则天平定徐敬业叛乱作战示意图
9、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作战示意图
10、开元末年唐军出击突骑施收复碎叶镇作战示意图
11、天宝六载（747年）唐军讨小勃律国作战示意图

目　录

第十卷　唐代军事史（下册）

书末附图：

绪　论

在中国军事史上，唐代是一个军事体制变革深刻、各类战争发生频繁、军事理论日趋完善的重要时期。其间既有极度辉煌，亦有黯然之色。在唐朝建立（618年）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李渊等领导的军事力量从小到大，由弱渐强，取得了攻占长安、建立帝业的胜利；接着，又相继剪灭割据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此后的唐朝统治者们又在巩固和拓展疆域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融合，从而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从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失去了昔日的威武强盛，逐渐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开始了由盛转衰、由衰而亡的演变过程。藩镇割据的战火绵延不断，周边地区的动乱此起彼伏，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唐王朝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频频失误，国家遂如江河日下，直到公元907年最后灭亡。在唐朝立国289年的时间里，军事以其特殊的力量和方式影响甚至决定过当时社会的进程，其自身的发展也同时受到了当时社会条件的推动和制约，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有的特色。

一、唐代军事制度的变革

唐代军事制度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中央禁军的演变、监军制度和军事区划体制的蜕变等几个方面。这些变革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同时，又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变革相适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从府兵制到募兵制

府兵制是唐朝前期最重要的也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最具特色

的军事制度。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就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着手恢复并组建了府兵制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各级组织，并制订了关于府兵的简点、征集、训练和自备衣粮等规定，使府兵制继续保持了兵农结合的基本性质。唐太宗即位以后，面对日趋严峻的边防形势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又大力改进府兵制度，完善府兵最高领导机构——十六卫，选择有实际作战能力的将领担任各卫大将军、将军和长史等职。军队的调动权控制在皇帝手中，遇有战事，皇帝通过兵部命将出征，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与此同时，唐太宗把武德年间府兵的基层组织军府改为折冲府，并按每个折冲府所占地团范围的大小和所领府兵数量的多少分别定为上、中、下三等。折冲府下置团、旅、队、火等编制，从而使府兵具备了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组织编制体制。另外，唐太宗还健全了府兵的兵役和训练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府兵的征集、简点、服役期间的具体任务等规定，如凡年满 21～59 岁的均田农民都可简点入军，60 岁退役；其简点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①；被简点入军的府兵战士在服役期间要完成宿卫和征战两大任务。为了提高府兵战士的作战能力，唐太宗不但详细制订了府兵丁壮在军府期间定期进行冬季训练的具体内容，而且还亲自在殿廷教习骑射，使之在“数年之间，悉为精锐”②。于是，唐朝的府兵制度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并与以三省六部制为主的政治制度和以均田制为主的经济制度相互配合，相互渗透，构成了唐王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体。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唐太宗还组织边防部队在沿边地区大力屯田积谷；恢复并完善边疆和内地的烽燧报警制度；大兴马政，发展监牧养马事业；组建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进一步改进军队的兵种结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所有这些，都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提供了有力保证。

---

①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

府兵制在贞观时期发展到鼎盛后即走向衰落。高宗时，府兵已不能按期番上，番上者逃跑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至玄宗朝，府兵制出现了瓦解之势。到开元十一年（723年），府兵丁壮已逃亡殆尽。唐玄宗不得不下令停止府兵番上，用募兵制征集宿卫部队，募得12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不久又改称彍骑。戍边兵士也由募兵充任，称为长征健儿。到天宝八载（749年），“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①。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征兵制，成为唐后期主要的兵役制度。

府兵制衰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均田制一旦遭到破坏，府兵制就成了无皮之毛。唐中后期，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不可遏制，府兵得不到应有的土地，家庭生活无法保障，当然也就不能自备资粮和武器到军中服役。另外，均田令规定的给予士兵的优待也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卫士授勋者不能按规定授田，府兵对广大农民失去了吸引力，造成兵源枯竭。二是从府兵制本身看，它虽有兵民结合、可防将帅专擅等特点，但也有自身的弊端。如番上过于繁扰，人力、物力都造成很大的浪费；士兵经济负担过重，富户率先规避，广大贫苦农民不得不以逃亡等方式反抗，造成番上和回归都不能按时；军队编组复杂，军府分散，致使将不知兵、指挥不灵、反应迟钝等。三是府兵社会地位降低，有的实际上成了达官贵人家的奴仆，人以做卫士为耻。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府兵制不可避免地逐渐衰败下去。

（二）禁军的演变

唐代中央军队除府兵外，还有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这就是禁军。禁军在唐代经历了由小渐大，由宿卫皇宫到兼宿卫、征战于一身，由皇帝亲兵到成为宦官专权工具的演变过程，对唐王朝的存亡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渊在长安称帝后，把太原起兵时的3万人留作宿卫，号

---

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元从禁军"，这是唐朝最早的禁军。元从禁军实行世兵制，所享待遇高于一般卫士。贞观初年，太宗选善射者组成"百骑"，分二番在北门宿卫。后又选材力骁壮者组成北衙七营。贞观十二年(638年)，在北门置左右屯营，至高宗时发展成为左右羽林军。武后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又改"千骑"为"万骑"，名称的变化反映了禁军不断扩大的轨迹。李隆基以"万骑"击败韦后，将其改为左右龙武军。禁军在唐前期的主要任务是宿卫皇宫，与十六卫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以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和京师的安全。由于禁军是皇帝最接近的亲兵，所以对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的胜负往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谁掌握了禁军，谁就会在斗争中赢得主动。武则天废唐中宗，张柬之灭武氏集团，李隆基除韦后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禁军在安史之乱时跌入低谷。玄宗西逃时跟随禁军只有千人。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置左右神武军，制度如羽林，又称"神武天骑"，与左右羽林、左右龙武总称为"北衙六军"。后又增加了左右神策和左右神威，禁军扩展成为10军，其势渐盛。其中最有力量、影响最大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原是天宝十三载(754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防遏吐蕃在临洮（今甘肃岷县）西设置的一支戍边部队，后屯驻陕州(今河南陕县)。代宗逃难到此，观军容使鱼朝恩举在陕之兵和神策军迎扈，因统称其军为神策军。代宗返京，神策军始入京都正式成为禁军。天宝以后，"彍骑之法又稍变废"①，神策军遂成为中央直接控制的主力部队。为适应与叛军斗争的需要，神策军于大历、贞元年间曾大规模扩编，到贞元后期，兵力已达15万之多，同时担负着宿卫和征战双重任务，在抵御吐蕃侵扰、讨伐国内叛乱、镇压农民起义等军事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史称"是时神策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②。唐王朝在安

---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玉海》卷一三八《左右神策军》。

史之乱后又得以维持100多年之久，神策军是其军事上的主要支撑者。但神策军受宦官控制，其在人事升迁、经济待遇等方面享有远远高于其他军队的特权，军将后来日益骄惰腐化，逐步演变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战斗力损失殆尽，因而导致了自身和唐王朝的最终灭亡。

（三）监军和军事区划制度的蜕变

唐王朝的监军制度和军事区划制度曾为维护朝廷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却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弱化乃至分裂国家的因素。这种变化给了后人以深刻的教训。

监军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但在唐以前无常设之官。《通典》中说，隋末有时以御史监军，唐初沿用此法。“开元二十年（732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①，监军始有专职官员并形成制度。监军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军队服从朝廷的指挥，沟通中央与藩镇的联系。其次，考察节度使的政绩和军纪情况，并向朝廷报告。再次，协助军将治理军队，消除兵乱。唐朝廷在藩镇常设的监军机关称监军院或监军使院，院置监军使，下有副使、判官、小使等僚属。监军使任期一般为3年。监军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朝廷对藩镇控制的需要，对维护唐中央政权的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监军“权过节度”的现象，由于宦官多不懂军事，因而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某些宦官借监军之职专权自恣，打击异己，激化了朝廷与藩镇的矛盾，起了相反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宦官由掌握军权进而控制朝廷大权，为患极大。大致从唐肃宗开始，除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哀帝李柷以外，其余皇帝大都由宦官拥立，宪宗、敬宗等均死于宦官之手，僖宗甚至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唐昭宗也一度被宦官囚禁。被唐朝后期诸帝亲自扶立起来的家奴宦官竟成了侵夺和倾覆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唐代沿袭隋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的方法，以达到“治

① 《通典》卷二十九《监军》。

众如治寡"的目的。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将天下划分为10道，朝廷分道置兵，各道中既有道管辖的地方军和戍边部队，又有中央直属的折冲府。部署兵力的基本原则是，以京畿和敌情严重地区为重点，分区置兵，形成"内重外轻"、中央军与地方军交叉配置、中央与地方共同防卫的国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设立的折冲府有600多个，总兵力约60万人，分布在全国10道7府77州之中。其中唐都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就有280多府，兵力约20万人，约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其后，又将国内调整为12道，从兵力部署上看，防备吐蕃的河西、陇右、剑南三道和防备突厥、奚、契丹的河东、范阳、平卢等道的兵力明显加强，边防任务较轻的江南、河南等道兵力较少（详见《新唐书·兵志》）。这种布局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军政的管理，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开始，唐廷在边境地区陆续建立了6个都护府。都护府的主要职责是"抚慰诸蕃，缉宁外寇"，叙功罚过，总判辖区内军政之事。大都护一般由亲王亲领，府中日常政事由副大都护主持。这是唐前期一种重要的戍边体制，对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到了后期，形势发生了逆转，军事区划的职能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玄宗晚年，骄奢滋事，喜好边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次进行战争。边境局势的紧张，迫使他不得不强化边境的武装力量。当时的边兵多达49万人，光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组建的彍骑总共才只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多职，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且节度使可以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于是，渐成"王纲解纽，主权外分"① 之势，为一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制造动乱准备了条件。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安史之乱后，唐境内逐步演化为"列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镇相望”、“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的局面，并一直延续了100多年之久。

唐朝有些军事制度前后变化如此之大，作用如此不同，乃至截然相反，《新唐书》的作者认为，是“措置之势使然”①。这无疑是不错的。但它又不完全是个人行为的过错，而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造成的。封建专制制度必然产生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统治者们的“措置”不失之于此，则必失之于彼；不失之于眼前，则必失之于长远；不失之于局部，则必失之于全局，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向反面。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原因盖在于此。

二、唐代战争及指挥艺术

（一）唐代战争

在唐王朝立国将近3个世纪的时间内，各类战争频繁发生。其中有平定天下的统一战争，安边拓境的民族战争，为维护国家统一进行的平叛和削藩战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为反对唐王朝统治而进行的农民起义战争等。这一时期各类战争多达数百次，有的战争规模巨大，动用兵力多达百万之众，延续时间长达数年、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前的100多年时间内，唐王朝首先进行的是起兵反隋和削平军阀割据的统一战争。这一战争大致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晋阳起兵开始，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基本结束。唐王朝在这大约8年的时间内，相继夺取了隋都长安，歼灭了割据金城（今甘肃兰州）的军阀薛举、薛仁杲父子，凉州（今甘肃武威）军阀李轨，马邑（今山西朔州）军阀刘武周，两湖军阀萧铣，中原军阀王世充以及窦建德、刘黑闼和辅公祏等农民起义军，结束了自隋末以来天下大乱的局面，实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现了秦汉以来的又一次大统一，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唐王朝经过一段休养生息和积极备战以后，又开始了一系列旨在安边拓土的民族战争。这类战争先后延续了近百年之久。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止，唐王朝灭亡了东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吐谷浑汗国和渤海国，并多次击败了吐蕃、契丹、奚族等少数族上层首领发动的武装袭扰和叛乱活动，赢得了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唐王朝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地区，向西扩至今天的咸海东岸一带，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的对高丽国的作战，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对外战争。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为止，唐王朝最终取得了灭亡高丽和百济的重大胜利，从而结束了从隋朝以来对高丽进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行动，不仅收复了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丧失的辽河以东的大片领土，而且还把疆域扩至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后来由于新罗人民的反抗，唐军才退出朝鲜半岛，新罗逐渐统一了高丽和百济故地，并同唐朝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从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唐灭亡，是唐朝历史上战争更加频繁的时期。唐王朝先是用了8年时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为止，才终于平定了这场叛乱。接着，唐王朝为了消除割据藩镇的武装叛乱，又相继进行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削藩战争，先后取得了平定西川、镇海、成德、淮西等镇割据叛乱的重大胜利，并多次击败了吐蕃、南诏等少数族政权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唐朝的统一局面和边境安全。但由于朝廷对军事力量的失控和战略决策的失误等原因，唐王朝在削藩战争、民族战争中也遭受过重大失败，致使国力日削，乃至一蹶不振。特别是从唐宣宗大中年间开始的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最后终于发展为以黄巢为首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给了唐王朝以沉重打击，使其名存实亡，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二）唐代战争指导艺术

战争指导艺术大体可分为战略指导和作战指导两个层次。从唐代战争情况看，其前期的战略指导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后期则得失相参，失大于得。唐统一天下战略、建国后的国防战略、平安史之乱战略、削藩战略、农民起义战略的制定、实施及其结果证明，只有从自身力量及当时形势出发制定出高瞻远瞩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否则，必然失败。

唐统一天下战略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战略之一，大致可分作两步。第一步为夺占关中。早在隋炀帝大业初年，李渊就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产生了起兵反隋之心，但一直韬光养晦，隐忍未露。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当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隋朝灭亡已成定势时，他接受了次子李世民等人拟定的起兵计划，确立了“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战略目标，其基本策略是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即因天下大乱之势，借突厥和农民起义军之力，打着拥隋旗号反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并对招募兵士、筹集粮饷、联络突厥、清除隐患、结好李密等有关全局性的战略性部署都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于同年七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并先后取得了攻占霍邑（今山西霍州）、包围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进军关中和定鼎长安等重大胜利，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第二步为统一全国。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又对全国的复杂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正确估量，制订了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确保关中的前提下，先急后缓，先北后南，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群雄。由于战略正确，实施策略得当，因而，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这里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唐统一天下的战略主要是由李渊做出决断并付诸实施的。有些史书把唐高祖李渊说成是一个“优柔失断，浸润得行”，“不有圣子，王业殆哉”① 的昏庸之君，是不符合实际的。

唐朝前期，基本上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并取得巨大

---

①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成功。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侵扰，一改过去某些中原王朝单靠修障筑塞进行消极防御的方法，采取了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以战止战、求得边境长治久安的积极防御战略，先后进行了征东突厥之战、灭吐谷浑之战、败薛延陀之战等重大作战，不但较为彻底地解除了边患，而且使唐朝声威远播，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宗时期的讨西突厥之战，武后时的用兵突厥和吐蕃等，也基本上都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只是唐玄宗到了后期，把这一战略思想推向极端，变成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才使自己走向了反面。

唐后期，由于内乱不断，国家的战略重点集中于国内，其在当时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下降。国家统治者们为处理国内问题而制定的战略，总的看，其水平远逊于前期。

唐平安史之乱战略的主要失误是轻敌冒进，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反而延长了平叛战争的时间。玄宗、肃宗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但其间也不乏高明的筹划。如在安禄山攻克两京之后，李泌从“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的战略思想出发，提出了立足长远，以迂求直，以逸待劳，歼敌有生力量，疲惫敌军兵力，然后一举克复范阳，全歼叛军的建议。此建议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大大缩短平叛时间，取得平叛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惜的是，唐肃宗因为急于求成，拒绝采纳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最终使平叛战争陷入了如李泌指出的“贼必再强，我必又困”①的境地。

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唐王朝并没有汲取教训，及时调整军事布局，加强中央的防卫力量，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彻底改变“内轻外重”的军事结构，而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不惜饮鸩止渴，又将3个安史降将李宝臣、李怀仙和田承嗣分别封为成德、幽州和魏博节度使，史称“河北三镇”，遂使藩镇割据之势在国内蔓延开来。在削藩过程中，唐王朝又错误地采取“以方镇制方镇”的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

方略，相继在内地遍设藩镇。到唐德宗时为止，全国藩镇竟达 40 多个。每当割据战争开始以后，唐王朝便不惜滥赏“出界钱粮”，企图用经济收买的方法，借助藩镇兵力消弭割据叛乱。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些增设的藩镇大多相互效尤，拥兵自重，日益坐大。唐王朝却因为经常开支巨额的“出界钱粮”而国力更衰，财政支绌。有时因为赏不及时，或赏赐薄少，还会激起新的兵变。爆发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 年）的泾原兵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唐宪宗即位以后，任用贤能，聚敛财富，壮大国力，坚持削藩，基本上采取的是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的战略，先削平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的叛乱，后取淮西、淄青、河北，取得了削藩战争的一系列重大胜利，造就了“元和中兴”的局面。但是，由于他对严重失控的军事体制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改革，藩镇割据存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并未触动，节帅自领军务、自擅财赋和自置官吏的弊政依然如故。唐王朝因为实行优赏政策，经济实力更加削弱，藩镇势力却更为增强。因此，在“元和中兴”的外表下所隐藏的内部危机正日益加深。

唐穆宗即位后，采纳了宰相萧俛和段文昌等人的建议，不合时宜地实行“销兵”之策，诏令天下有兵处，每年于百人之中，限 8 人“逃死”。即每年以 8%的速度裁减兵员，企图以此达到销兵省费、“偃武休兵”的目的。但因为募兵制行之既久，从军兵士仰赖“百战千功之劳，坐食租赋”，养家糊口，一旦销兵失业，就会断绝生路，由此反而酿成兵变。于是，割据藩镇趁机再起，叛乱战争又频繁发生，使唐王朝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隋末和唐末农民起义在战略运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较大不同。其相似之处，一是都善于利用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求得生存、壮大和发展。如隋末农民起义军利用隋炀帝进攻高丽造成社会危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之机逐步壮大。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利用藩镇割据、朝廷内部朋党之争等矛盾，在统

治力量薄弱的缝隙之地和无暇顾及之时迅速发展。二是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李密为瓦岗军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黄巢在北伐前就确定了“北还以图大事”、“洗涤朝廷”，即夺取两京、推翻唐朝统治的战略目标。三是都善于发动群众。利用起义军与人民群众存在着的天然血肉联系，采取开仓济贫、严格军纪、惩处贪官等措施，进一步取得人民的拥戴，建立起义军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

两代起义军在战略运用上最大的不同点是隋末农民起义军注重建立和保卫自己的根据地，但缺乏在战略上打运动战的意识。黄巢起义军则走到了另一极端，长于流动作战而忽视根据地建设。这两种倾向都是缺乏远大战略眼光的表现。如，李密只知仓米能争取人心，不考虑粮尽后怎么办，更不肯离开这些粮仓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故李世民说他“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李密长期围困洛阳，屯兵坚城，最终为李渊所用，也证明了这一点。黄巢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原则，创造了于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的大规模流动作战方式。在义军力量较弱时，他率军向唐力量薄弱的广南进军；在力量壮大后，他不失时机地率军北伐，攻得下就攻，攻不下就走，使敌疲于奔命，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但他们只注重流动作战，忽略建立可靠的根据地，遂成为其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战指挥艺术的变化与兵种、军事装备及军事技术的变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唐代轻骑兵逐渐代替了重甲骑兵，对唐代战法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唐代兵器向多样、锋利、重型、杀伤性能强等方向发展。如当时已出现闷钢法，并将这种方法炼出的优质钢材（镔铁）铸于兵器的刃部，大大提高了兵器的质量；弩的种类增多，射程和杀伤能力都有较大提高；唐太宗的第四代孙李皋制作出车船，提高了舰船的航行速度和机动能力。最迟在公元808年，唐代还发明了火药，并在10世纪初开始应用于军事。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变化对唐代战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到了唐代，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当时无论是野战，还是城市攻防作战、水上作战等，都表现出很高的指挥艺术。尤其是李世民和李靖，他们在作战指挥上，善于利用当时已有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成功地指挥了许多重大作战，其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综观唐代战法，较突出的如：李世民在唐初一些重大作战中使用的“持久弊之”，待衰而击；“冲其阵后”，“表里奋击”；乘胜追歼，穷追猛打；围城打援，“一举两克”。李靖在唐初一些重大作战中采取的长途奔袭，奇兵取胜；“用兵任势”，“临时制变”等，都具有很高的指挥艺术水平。唐代自李靖始，就非常重视阵法。李靖所创六花阵、行军法、撤退法、行引法、安营法、旗法等，在当时都多有新意而切实可行。唐人重视阵法，但反对拘泥，体现了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另外，唐平萧铣、灭百济和高丽所采取的大规模水陆协同作战；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沙漠、山地、高原等条件下的长途奔袭作战；李光弼、张巡等进行的城守作战；李晟等人的攻坚作战以及他们在诸役中采取的运动战、伏击战、地道战、袭扰战、心理战、反间战等战法，都给中国古代作战指挥艺术之锦增添了绚丽的新花。

三、唐代军事思想

这里所说的唐代军事思想，主要是指唐代占主导地位的、较前人有所发展的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是唐人将前代的军事理论与自己的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当时军事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主要载体是唐人的或后人整理反映唐人军事思想的兵学著述。从唐人兵学著述情况看，基本呈“兴——衰——兴”马鞍形。唐朝初期，兵学兴盛，出现了一批兵书。究其原因，一是经过战争实践，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二是建国后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为总结这些经验提供了条件；三是当时的统治者及整个社会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军事的重要，较重视武备。

唐太宗之后至安史之乱，为史籍著录的兵书极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承平日久的情况下，对军事问题的轻视和忽略。后来战乱频仍，谈兵者又多起来，兵学又趋兴盛。从这些载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军事思想在继承前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某些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在战争观上，唐人主张“天下一家”，兼取诸子理论之长；在战争指导理论上，对某些军事范畴的阐释多有创新；在建军治军上，重视军制、任将和练卒 3 个环节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源于前人而又高于前人的唐代自己的军事思想。

（一）在战争观上，主张“天下一家”，兼取诸子理论之长

唐朝统治者在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上，有强烈的“天下一家”的意识，表现出较为雄大宽阔的胸怀。唐高祖李渊就提出，处理问题要有“天下一家”、“胡越一家”① 的气度；太宗李世民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对不同民族应“爱之如一”②；王者应“以天下为家”③。这一思想几乎影响了整个唐代，成为其制定国内外重大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如唐廷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因而实现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民族大联合，这是唐朝国防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唐廷还积极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友好关系，据《唐六典》载，与唐交往的“异国藩邦”盛时达 300 余，即使在开元时，也还有 70 多个④。对于袭扰唐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唐廷基本实行的是抚顺伐叛的政策。对未归附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反对轻率用兵，迫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一旦降服，唐廷仍以“天下一家”的胸怀对待之，如唐太宗对东突厥首领颉利及迁入内地的突厥人的优容政策即体现了这一点。

---

① 分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六月；《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③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④ 《唐六典》卷四《主客郎中》。

唐廷在对国家、军队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上，兼取儒、道、法、兵等家之长，亦较少褊狭之见。如唐太宗李世民赞成老子的说法，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①；但并不因此笼统地反对战争，相反，在必要时，坚决采取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主张采取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② 的办法对待；但同时强调国家要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安不忘危，治不忘乱”③。赞成儒家“足食、足兵”和法家富国强兵的思想，在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但同时反对穷兵黩武，认为“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卒亡天下”④。取兵家“兵者诡道”的思想，但同时强调“增修仁义”，提出国家政权或可“逆得”，但“守之不可不顺”，主张取得政权后，治国不应再“尚诈力”⑤，但军队作战仍须以诈谋取胜。这种儒、道、法、兵诸家思想兼取的战争观基本影响了整个唐代。后来的兵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理论归纳和总结，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在强调“主有道德”的前提下，提出“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⑥ 的观点；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主张治国理军要“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⑦ 等，也体现了诸家兼融的思想。

（二）在战争指导理论上，对某些军事范畴的阐释多有创新

唐人在战争指导理论方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兵学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对久速、奇正、虚实、攻守、形神等重要军事范畴的阐发上。

关于久速。前人多见战争持久对己之害，未见持久对敌同样

---

①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七年六月。

③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五月。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贞观元年六月。

⑥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

⑦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三《上德不德章》。

有害，更未见当这种对敌之害大于对己之害时，持久便是对己之利，因而在论述久速时，往往片面地主张贵速而贱久。李靖在总结唐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肯定“兵之情主速”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如果碰到敌将多谋，士卒团结，纪律严明，兵利甲坚，士气高昂，难以速胜的情况时，就应“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锐，与其持久”①，从而从理论上纠正了只讲速战、反对持久的片面观点，强调应根据情况灵活决策，当速则速，当久则久，对久速这一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作出了较全面辩证的论述。

关于奇正。自《孙子兵法》提出“奇正”这一重要的兵学范畴后，兵学家们不断对之进行探讨。但唐前的注释家们只注意孤立地解释奇正概念，如“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② 等，对奇与正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刻认识。李靖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认为“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阅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只有“临时制变”。善用兵者，必须根据情势运用奇正相变规律，做到正亦胜，奇亦胜，其关键在于“使敌莫测”③。这一认识纠正了前人对奇正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对于后人正确运用这一原理指导战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虚实。虚实是孙子在《势篇》中提出的一个军事范畴，并认为“避实击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对虚实与奇正的关系，唐人之前，无深刻揭示者。唐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结论：一是认为奇正是致敌虚实的手段，只有知奇正，才能真正做到避实击虚，“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二是只有知虚实，才能正确使用奇正，做到“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如此，则可使

---

① 《通典》卷一五四《兵机务速》。

② 《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

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敌势常虚，我势常实"①，做到致敌而不为敌所致。可见，奇正与虚实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二者不可偏废的致胜原则。

关于攻守。攻守是战争双方对抗的基本方式。对此，唐人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② 的著名论断，即认为进攻是防守的机括，防守是进攻的手段，二者虽是矛盾的，但在"同归乎胜"上达成了统一。为此，要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既反对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又反对被动的消极防守。唐人的这一见解对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准确的阐释，成为古今中外克敌制胜的铁则。

关于形神。形指军队物质力量，神指精神。李筌认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③，阐明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强调既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又要有高明的谋划，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为用，而不可将其割裂开来，从而发展了《孙子兵法》关于"形"的理论。另外，唐人对顺倾（用顺其心志之法达倾其社稷之目的，见《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心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见《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沉谋篇》）、诚诈（"抚士贵诚，制敌贵诈"，裴行俭语，见《资治通鉴》高宗永隆元年三月）等范畴，也都有高于前人的见解。

（三）在军队建设上，高度重视军制、任将和练卒 3 个环节

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军事制度建设。李渊在称帝后第二年时就指出，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④，并因此置 12 军。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⑤，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唐代后期的人们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教训中也认识到，军队建设

---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②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③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兵形》。

④⑤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

"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①，强调军事制度对国家安危的重要。唐人主张，军制应因势而定，对前人所创军制既要继承，又须发展，着眼于保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战斗力的提高，唐高祖和唐太宗对府兵制度的沿用、整顿和完善就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后期的统治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杜佑、陆贽等人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强调实现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统一，反对顾此而失彼。李靖、李筌等认为，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必须严明军队内部的法令法规，在其有关著述中对此作了详备的条令性规定，体现了以法统兵治军的思想。另外，唐人还十分重视军事法律的建设，完善唐律中有关军事问题的规定，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用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对于强制军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统一军队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统治者自李渊起，就十分重视对将才的罗致、培养和使用。尤其是李世民，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才能，在将帅病伤时，他或详问其起居，或剪自己胡须为其治病，或亲为之针灸等；他主张对将领要舍短用长，"弃怨用才"，知而后任，用而不疑，反对"将从中御"，因此，他能驱驾英才，将乐为用，有些曾反对过他的人，后来也都成了他得力的将领。他既重视培养新人，又重视发挥老将的作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开国皇帝之一，而且还能"任以吏事"，使之为国家再作出新的贡献。对待少数民族将领方面，唐太宗也有迴出古人、深益后世的见解和建树，唐代少数民族将领数量之多，发挥作用之大，在中国历代汉族政权中是绝无仅有的。唐人不但强调将帅个人素质的完备，而且注意到其整体结构的合理，认为"智均则不能相使，力均则不能相胜，权均则不能相悬"，因此，要根据"情异则理，情同则乱"②的原理合理配置大将和裨将。

---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②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阼将篇》。

强调将不可久任一方，不可集财、政、军等大权于一身，防止出现尾大不掉之势。

唐朝的统治者和兵学家们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李世民亲自用讲武、狩猎等方式训练部队，并定期进行校阅，规定根据训练成绩赏罚负责官员；强调对军队“教得其道”，如赞成根据蕃、汉特点，因材施教等。李靖强调按照实战要求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规定了“教旗法”、“教阵法”等训练内容和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同时重视攻守战具的制作、配备和练习。强调严明赏罚，反对行姑息之政，认为姑息只会“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①。

唐代军事内容十分丰富，除我们以上讲的军事制度、战争及指挥艺术、军事思想内容外，还包括军事经济、军事外交、军事人物，以及军事地理、后勤、交通、通信等内容；不但包括唐朝的军事，还包括这一时期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唐代军事上承魏晋南北朝之传统，兼融诸家，博采众长，既有批判继承，又有创新发展，从而将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后世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其光辉的一页。

---

① 《樊川文集·守论》。

第一章　李渊晋阳起兵与唐朝建立

（参见附图 1）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的隋太原留守李渊在其次子李世民、晋阳（今太原）县令刘文静及晋阳宫副监裴寂等人的协助下，于晋阳起兵。同年七月，李渊等率众南下，经霍邑之战、围攻河东等重大作战，挺进关中，于十一月攻占长安。隋义宁二年（618 年）五月，隋炀帝被弑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遂自立为帝，建国号大唐。

第一节　李渊起兵准备及其战略策略

一、隋末农民起义形势与李渊酝酿起兵

隋朝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炀帝生活奢侈，好大喜功，使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他大兴土木，营建东都，修筑长城，开通运河，徭役不息，且政苛刑暴；他南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北幸突厥，西至张掖（今属甘肃），游乐不止，浪费和挥霍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大业七年（611 年），隋炀帝又下诏拟征高丽，大肆征发民伕，“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①。同年十二月，不堪忍受残暴统治和压迫的山东百姓在邹平（今属山东）人王薄的领导下，聚集在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淄博、章丘边境）揭竿造反，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号召，揭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接着，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

---

① 《隋书》卷三《炀帝纪》。

孙安祖在同乡窦建德的协助下，也在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众起义。山东地区很快便成为农民起义的发源地。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这年六月，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起兵反隋，众至10万。这次起兵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农民起义却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由山东地区迅速向中原、三辅（今陕西中部）和江淮等地发展。特别是在河南瓦岗寨（今河南滑县东南）起义的翟让部和在淮南地区的杜伏威部以及在河北的王须拔（自称漫天王）、魏刀儿（自称历山飞）等部的人数不断扩大，势力更加强盛。

大业十年，隋炀帝第三次攻打高丽，为此在全国大批征发士兵和农夫，再度引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隋炀帝不得不抽调兵力进行镇压。为坚壁清野和防止农民参加起义军，他于大业十一年强令民众迁入城市。但这些人入城后无以为生，反而被迫出逃或参加起义军。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迅猛发展，后来逐渐汇成3支主力队伍：河南瓦岗军在李密和翟让的领导下，经大海寺（今河南荥阳东北）之战，歼灭了隋军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并击毙了主帅张须陀。不久，又攻占了洛口仓（今河南巩义东北）和回洛仓（今河南洛阳隋唐洛阳故城北10里），对东都洛阳形成围攻态势；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转战河北中部，人数发展到10多万，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初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江淮起义军在杜伏威和辅公祏的领导下，打败了隋军8000人的进攻，乘胜攻占高邮（今属江苏）、历阳（今安徽和县）。隋朝的一些地方将吏也趁机拥兵割据，称霸一方：隋朔方（郡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鹰扬郎将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据郡造反，自称大丞相；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自称太守，北连突厥，自称定杨可汗，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州）；金城（今甘肃兰州）府校尉薛举与其子薛仁杲①挟持金城县令郝瑗叛

---

① 新旧《唐书·薛举传》均作“薛仁杲”；《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义宁元年三月据《太宗实录》及礼泉昭陵前六匹石马之一的铭文作“仁果”。今从新旧《唐书》。

乱，自称西秦霸王，尽有陇西（即陇山以西）之地，众至13万。隋炀帝被围困江都，不能西返，隋朝的垮台已成定局。在这样的形势下，早有反隋之心的太原留守李渊决定起兵夺取天下。

李渊字叔德，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生于北周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他是十六国时期北凉武昭王李暠的第七代孙，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①。李渊的第六代祖李歆被北凉主、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所灭；五代祖李重耳降于北魏，曾任弘农太守；第四代祖李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曾祖父李天锡，曾任北魏幢主；祖父李虎，随北魏孝武帝由洛阳西入关中，并与李弼、独孤信等协助宇文泰翦除侯莫陈悦集团，"以功参佐命"，被任府兵柱国大将军，时称"八柱国家"，赐姓大野氏。北周甫建，"追录其功，封唐国公"；父亲李昞，官至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②。李渊七岁时袭爵唐国公。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以千牛备身入仕。李渊的生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为同胞姊妹。隋朝建立后，他以皇亲国戚历任谯（州治今安徽亳州）、陇（州治今陕西陇县）、岐（州治今陕西凤翔）3州刺史。隋炀帝大业初年，迁荥阳（郡治今河南郑州）、楼烦（郡治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李渊娶北周上柱国窦毅与宇文泰第五女襄阳公主所生第二女窦氏为妻，生四子：即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和李元吉。

隋炀帝在大业九年（613年）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时，李渊被派往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督运粮草。杨玄感起兵反隋后，他又奉诏令急驰弘化镇（今甘肃庆阳），担任留守，兼领关西诸军事，防御玄感。此时李渊已看到"隋政荒，天下大乱"，遂"结纳豪杰，众多款附"③。又同隋大臣宇文士及"尝夜中密论时

---

① 关于李渊的籍贯众说纷纭，颇多歧异。今从《新唐书》卷一《高祖纪》。

②③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事”①。这说明李渊此时已对隋朝产生离心之意。

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从辽东前线返回洛阳后，对臣下“多所猜忌”，因而“人怀疑惧”。他曾下诏要把李渊由弘化征至东都，加以控制。正值李渊患病，未能成行。炀帝便向后宫侍奉的李渊外甥女王氏问道：“汝舅何迟？”王氏以李渊患病相对，炀帝恼恨地说：“可得死否？”后来，王氏把炀帝的话如实转告李渊，李渊“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②。李渊同隋朝之间的裂痕正在不断加深。

大业十一年（615年）四月，隋炀帝从洛阳北上，经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幸汾阳宫（今山西阳曲东）避暑。诏令李渊为山西（今太行山以西）、河东（黄河以东）抚慰大使，率部镇压山西和河东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李渊率部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即遭到毋端儿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的攻击。李渊带兵出城迎战，连发70余箭，箭无虚发，农民军被迫逃散。接着，李渊又向绛郡（治今山西新绛）的农民起义军发动进攻，收降数万之众。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同时下诏以李渊为太原留守③，王威和高君雅为副留守，与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州）太守王仁恭“北备边朔”④，阻止突厥南侵。

---

① 据《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载，武德二年（619年）宇文士及降唐时，李渊曾对裴寂等人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武德二年的“六、七年”前，当在大业八、九年（612～613年）李渊任弘化留守前后。“尝夜中密论时事”为该《传》中宇文士及语。

②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③ 关于李渊任太原留守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新旧唐书《高祖纪》和《大唐创业起居注》等书均置此事于大业十三年，未注月、日。《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据《隋书》卷三《炀帝纪》载系于大业十二年年底。另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巡幸江都时，“以帝（即李渊）地居外戚，赴难应机，乃诏帝率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太守王仁恭北备边朔。”李渊这时既能“率太原部兵马”，当为太原留守无疑。故据以系此。

④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大业十三年（617 年）四月，精于“玄象”而又善于“相人”的隋大理司直夏侯端对太原留守李渊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指隋炀帝）晓察，情多猜忌，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李渊“深然其言”①。此后，被李渊引为行军司铠的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士彟看到“盗贼蜂起”，也暗中劝李渊“举兵”，并送去“兵书及符瑞”。李渊对士彟说：“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② 由此可知，李渊在大业十二年担任太原留守以后，就已萌生了“举兵”而追求“富贵”之“计”。就是说，他要在农民起义已将隋王朝的封建统治彻底打垮的有利形势下，酝酿起兵，抢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了。

二、李渊起兵的组织准备及其战略策略

大业十二年（616 年）七月，就在李渊担任太原留守不久，晋阳地区的形势已趋严峻。塞北的突厥族正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大举南侵；南面由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正在迅猛发展，愈战愈强，大有和突厥相连之势。老谋深算而又才兼文武的李渊深知，要想“举兵”起事，必须首先解除突厥骑兵和农民起义军的南北威胁，保持晋阳地区的社会稳定，才能伺机而动。否则，就会在

---

①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上《忠义传上·夏侯端传》。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大业十二年二月载：“会有方士安伽陁言‘李氏当天子’，劝帝（即隋炀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李）浑（字金才）从子、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帝疑其名应谶，当面告之，冀其引决。敏大惧，数与浑及（兄子李）善衡屏人私语”，不久，李浑妻兄、左卫率宇文述挟私愤唆使李敏之妻诬告李浑与李敏等谋反，故炀帝“杀浑、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由此可知，上引夏侯端语中“金才既死”，当指隋炀帝听信方士之言，诛杀李浑等人之事。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八《武士彟传》。

突厥族和农民起义军的南北夹击下，坐以待毙，失掉安身立命之地，“举兵”之事就会成为泡影。正如他对其次子李世民所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① 这就是说，李渊在担任太原留守以后不久，就把北和突厥、南击农民起义军，稳固太原，作为他起兵前的一条重要战略方针。

突厥是公元6世纪中兴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曾一度统一漠北。隋初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留居蒙古草原，西突厥远徙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启民可汗在位期间曾和隋保持友好关系。大业十一年(615年)，启民可汗死，其子始毕可汗继立，对隋始取敌对态度。同年八月，当炀帝第三次北巡突厥时，被始毕率兵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达40多天。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始毕可汗又率数万骑兵南下侵扰。太原留守李渊奉诏北上，与马邑(今山西朔州东)郡守王仁恭合兵抵抗。李渊改变战术，完全按照突厥骑兵的作战方式，组建了一支2000多名善于骑射的骑兵部队，装扮成突厥模样，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演练驰骋，终于将突厥击败。从此，突厥丧胆，“不敢南入”。李渊深知，突厥的这次南侵虽被暂时遏止，但仅依靠当时隋朝派驻北边的军队想要彻底征服突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在以后便转而采取联合突厥的策略，用金帛钱物满足其贪婪欲望，甚至不惜向其屈辱称臣，以达到消除后顾之忧的目的。

就在李渊击败了突厥南侵，率众回到太原以后，历山飞（即魏刀儿）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已向南打败了隋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治）守将慕容和罗侯部，向北又击败了隋将潘长文部，太原告急。李渊闻讯，立即与副留守王威等率河东和太原兵马南下征讨。

①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

行至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的雀鼠谷① 时，正与历山飞的部将甄翟儿率领的 2 万多农民起义军遭遇。当时李渊所率官军仅有四五千人，而农民起义军的人数却超过了官军的四五倍之多。对此，王威及诸将都面有惧色。但李渊却抓住了农民起义军自恃兵多和骄傲麻痹的弱点，采取了“多张幡帜”，设置疑兵的策略，又诱以“辎驮”财物，致使农民军“舍鞍争取”。李渊乘机麾军“纵击”。结果，农民军伤亡惨重，“老幼男女数万并来降附”②。此后，“郡境无虞，年谷丰稔”，为李渊即将发动的晋阳起兵创造了一个适宜的基地。

宦海阅历丰富、沉稳持重的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③。担任太原留守以后，他更加重视收罗人才，积极进行组织准备。而且还指使远在河东的长子李建成等“潜结英俊”，近在身边的次子李世民“密接豪友”。在任职大约半年时间内，总计李渊父子结纳的关陇士族和英俊豪友约有以下 10 多人：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西）人。时任晋阳宫副监之职。在李渊的“时加亲礼”下，二人“情忘厌倦”④。

刘文静，字肇仁。世居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隋末任晋阳县令。李渊任太原留守后，文静看到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后又与李世民结为密友⑤。

刘世龙，晋阳人。大业末年，任晋阳县晋阳乡乡长。在裴寂

---

① 雀鼠谷：又名冠爵津。位于今山西介休西南 20 里。据《水经注》卷六《汾水》条载，冠爵津“在界（介）休县之西南，俗谓之雀鼠谷。数十里间道险隘。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累石就路，萦带岩侧，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临绝涧，俗谓之鲁般桥。盖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险也。”

②③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④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⑤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的多次引荐下，李渊对之“甚见接待”①。

赵文恪，太原人。隋末任鹰扬府司马。晋阳起兵后，被授右三统军之职②。

张平高，绥州肤施（今陕西延安）人。隋末任鹰扬府校尉，被征调戍守太原，为李渊“所识，因参谋议”③。

李思行，赵州（治今河北赵县）人。曾因避罪潜居太原。晋阳起兵后，被授左三统军之职。④

李高迁，岐州岐山（今属陕西）人。隋末客居太原，被李渊引为心腹⑤。

许世绪，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人。隋末任鹰扬府司马。当他看到隋朝将亡后，曾对李渊说：“天道辅德，人事与能，蹈机不发，必贻后悔。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箓，名应歌谣⑥，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若遂无他计，当败不旋踵。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之业也。”李渊听后很觉惊奇，由是“亲顾日厚”⑦。

钱九陇，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其父原为陈朝边将，被隋俘获，九陇遂被没入为官奴隶。后投靠李渊，深得“信爱”⑧。

唐俭，字茂约，晋阳人。其父曾任戎州（治今四川宜宾）刺史，与李渊有旧。唐俭投奔太原后，曾劝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创“（商）汤、（周）武（王）之业”，受到李渊器重。晋阳起兵后，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刘世龙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赵文恪传》。

③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张平高传》。

④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李思行传》。

⑤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李高迁传》。

⑥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载：“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意为李氏当为天子。此处“名应歌谣”当指此。

⑦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许世绪传》。

⑧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钱九陇传》。

任记室参军①。

长孙顺德，李世民之妻长孙氏族叔。仕隋为右勋卫，为避辽东之役，逃匿太原，为李渊和李世民父子所“亲委”②。

刘弘基，雍州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人。隋时以父荫入为右勋卫。大业末年，为避辽东之役，亡命太原，受到李渊父子的“亲礼”③。

殷峤，字开山，雍州鄠县（今陕西户县）人。隋末任太谷（今属山西）县长，后归附李渊④。

刘政会，滑州胙城（今河南延津东北）人。隋末任太原鹰扬府司马。后率众投于李渊麾下⑤。

上列诸人中既有关陇、山东的门阀士族和隋朝的地方军政官员，又有亡命太原的“背征三卫”和皇家隶人。这些人在后来的晋阳起兵和定鼎关中的战斗中，大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建立了赫赫战功。唐朝建立后，均被称为“元从功臣”。

这些人物对李渊诚心拥戴，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李渊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众望所归的德行。

第二节　晋阳起兵与定鼎关中

李渊晋阳起兵后，经过攻占霍邑、围攻河东等重大作战，终于在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攻克长安，取得了定鼎关中的巨大胜利。义宁二年（618年）五月，唐朝建立。

---

①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八《长孙顺德传》。

③ 《旧唐书》卷五十八《刘弘基传》。

④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八《殷峤传》。

⑤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八《刘政会传》。

一、晋阳起兵与建军誓师

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河南瓦岗军在李密的率领下，在大海寺设伏，一举击毙了隋军将领张须陀，接连攻占了河南地区的许多郡县，成了这一地区唯一强大的武装力量；河北起义军也在窦建德的领导下，袭杀了隋涿郡（治今北京市西南）太守郭绚，“声势日盛，胜兵至十余万人”①；江淮起义军在杜伏威、辅公祏的率领下，重创隋右御卫将军陈稜部，所向无敌，迅猛发展。隋炀帝坐困江都，不能西返。隋朝的垮台已成定局。李世民和刘文静酝酿的晋阳起兵计划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台的。

李世民是李渊次子，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武功别馆②。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围困炀帝于雁门时，李世民应募参加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率领的勤王兵，为云定兴出谋献策，显示了善于出奇制胜的机智与才能。此后，当他看到“隋祚已终”，遂“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③。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前，晋阳县令刘文静因为和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有“姻属”关系而被捕入狱。李世民平时和文静志趣相投，便私下入狱探视，二人遂在狱中拟定了招募兵士，“鼓而入关”，定鼎长安，以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二月。

② 据《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载，李世民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崩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享“年五十二”；《新唐书》卷二《太宗纪》所载崩年与旧《纪》同，唯享年作“五十三”，以此推算世民当生于开皇十七年（597年）。但据《贞观政要》卷十《灾祥》等所载李世民回顾自己生平所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云云，以此推得世民当生于开皇十九年。当以世民自己所云为是，故从《政要》诸书。

③ 《旧唐书》卷二《太宗纪》。

成“王业”[1]的起兵计划。但他们都深深知道：这个起兵计划如果不被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接受，是决然不会实施的。为了能使李渊尽快接受和实施这个计划，刘文静又向李世民推荐了和李渊关系密切的晋阳宫副监裴寂。李世民当即拿出了自己的“私钱数百万”，让他的密友龙山县（今山西太原西南）令高斌廉与裴寂赌博为戏，并“渐以输之”。裴寂因此与世民结识，且日加密切。在两相无猜时，世民便把与刘文静商议的起兵计划告知裴寂，裴寂心领神会，当即答应转达李渊。第二天，裴寂照例邀李渊至晋阳宫饮酒，当李渊喝得酩酊大醉后，裴寂便让陪酒的宫女“侍寝”。酒醒以后，李渊大惧。这时，裴寂便把李世民的起兵计划转告李渊，并说这是“二郎”指示他“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最后还郑重其事地试探说：“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2] 李渊对起兵之事，早有筹思，当即欣然赞同。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突厥始毕可汗再次率兵进犯马邑，隋炀帝立即诏令李渊和王仁恭率兵阻击。李渊派副留守高君雅率太原部兵北征。由于王仁恭等人违背了李渊的“指纵”，为突厥所败。消息传到江都，炀帝以“不时讨捕，纵为边患”为名，派使者驰驿晋阳，囚捕李渊，诛杀仁恭。这时，李世民便当面向其父李渊陈述了自己计划已久的起兵方案，并劝说：“代王（指隋炀帝之孙、隋长安留守杨侑）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单使之囚，坐取夷灭乎？”[3] 李渊回答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4] 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④ 羑里：古城名。在今河南汤阴北。相传商纣王曾囚西伯姬昌（即周文王）于此。

同受孥戮，家破身灭，为英雄所笑。”但时隔不久，炀帝又赦免了李渊和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①。于是，起兵之事便暂时中止。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八日，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并连结突厥，打败了隋雁门郡丞陈孝意和虎贲郎将王智辩，据郡造反。不久，又率众南下，攻破楼烦郡，进据汾阳宫，大有攻击晋阳之势。就在这时，李渊决定实施李世民拟定的起兵计划，并精心安排了具体措施和行动方案。

首先，李渊命令刘文静假借隋炀帝的名义，草拟了一道诏书：征发太原、西河（郡治在今山西汾阳）、雁门、马邑等郡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当兵，定于大业十三年年底全集涿郡（治今北京城西南），准备开赴辽东前线。“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②这就为李渊的招募军队和扩充兵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其次，李渊知道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是隋炀帝安插在晋阳的两个心腹耳目，要想顺利地举兵起事，必须要对王、高二人严加防范。所以他就对王、高二人假意询问说，刘武周已占据汾阳宫，如我们不能遏制，将要招来族灭之祸，你们看应怎么办？现在朝廷用兵，动止都要禀报，接受指挥。如今敌寇就在数百里以内，而江都却在3000里外，加之道路险阻，其间又有众多敌寇。以困守孤城的弱小兵力，要想抵挡势如洪水猛兽般的敌寇，必无保全之理。进退维谷，究竟如何为好？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王、高二人也觉无计可施，便顺水推舟地对李渊说：您是朝廷的外戚、亲贤，若一味接受朝廷的指挥，岂不要坐失良机？现在重要的是讨平敌寇，请您立即采取果断措施！③李渊看到王、高二人已经就范，便下令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张贴露布，招募军队。结果，10天之内，就有1万多人应募而至。加上原来太原

---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③ 参看《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部的“数万”兵士，李渊麾下的兵士至少有3万之众。于是，李渊命令刘弘基和长孙顺德统领新募之兵；副留守王威任太原郡丞，与裴寂等负责管理仓库粮饷，供应军需；副留守高君雅巡视城内，保卫兵器库藏。至于兵马武器的分配、军事战略的决策以及赏功罚罪和调遣部队等，均由李渊统管，并把最高指挥部的地址移至晋阳城内的兴国寺。

最后，李渊又秘密派人急驰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西）和长安（今陕西西安），召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绍携眷属齐集晋阳。

正当李渊在紧锣密鼓地施行起兵计划时，引起了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猜忌和怀疑。他们看到李渊指示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背征三卫”统领募兵，便想将长孙、刘二人拘捕，企图从他们口中侦知李渊的“异志”。王、高把他们的这个想法告诉了晋阳乡长刘世龙，企图争得世龙的协助。但刘世龙有感于李渊对他的知遇之恩，便把他们的密谋向李渊告发。李渊遂决心除掉这两个心腹之患。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十四日晚，李渊命令李世民带兵埋伏在晋阳宫城外。第二天一早，又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兴国寺议事。不久，刘文静和刘政会进入议事庭中，声称有“密状”奏报。李渊假装示意王威接看“密状”，文静等不肯交出，说此状所告就是副留守的事，只有“唐公（即李渊）”才能阅视，状上写的是“（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入寇”。高君雅立即气急败坏地喊道：“此乃反者欲杀我耳！”刘文静等人不由分说，立即将王、高二人逮捕入狱。

五月十七日，突厥数万兵马果然南侵晋阳，其先遣部队先由外郭城北门冲入，又从东门撤出。李渊当即命令裴寂率领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又派人将晋阳四周的所有城门全部打开。突厥兵马不知虚实，皆勒兵城外，不敢贸然入城。晋阳城中军民都认为突厥的这次南侵，是王威和高君雅的勾引所致，李渊便把他们斩首以徇。接着，李渊又派部将王康达等率所募千余兵士出城进攻，遭到突厥骑兵的前后夹击，伤亡惨重。城中将士闻之大惊。李渊看

到用武力相攻不能取胜，便派城内兵士于夜晚潜出城外，第二天黎明，假扮援军，大张旗鼓地进入城中。突厥果然信以为真，便在晋阳城外停留两日，抢夺了些许财物，匆忙北撤。

为了彻底消除起兵后的北顾之忧，李渊派人向突厥始毕可汗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函，其中写道："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指隋炀帝）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指隋文帝）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①李渊又在信函封题上书写"某启"字样。有人根据"启"为"下之所以达上"的行文格式，劝说"改启为书"，但李渊坚持不改。

始毕可汗接到书信后，立即答应出兵相助，"以求宝物"。但却在回信中表示对李渊的"欲迎隋主，共我和好"不能相从。并说如果李渊"自作天子"，那就"从行"出兵，"觅大勋赏，不避时热"。使者往返7日，回到晋阳。李渊看过始毕的回信后，沉吟良久，面有难色。裴寂和刘文静得知始毕之意后，都来劝李渊接受突厥意见。但李渊却坚持要"尽"臣"节"，不作"阶乱之人"，宁可"绝好蕃夷"，决不"从其所劝"。李渊决定不"从突厥所请"之意很快被聚集在兴国寺内的兵众得知，这些兵士便纷纷表示：唐公若不从突厥，我等亦不能从公。裴寂和刘文静等人把兵士们的"偶语"转告李渊，李渊仍生气地说，你们都是隋朝臣下，对我如此劝说，臣节安在！就这样起兵之事又被搁置起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三十日②，李建成、李元吉及柴绍

---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均载李建成到达晋阳的时间是大业十三年六月己卯。但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一书，是年六月无己卯。又据《通鉴》载，突厥于大业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进犯太原，留城下二日而去，李渊所遣使者往返七日。以此推算，建成到达晋阳当为大业十三年五月己卯（三十日）。

携眷属到达晋阳。李渊十分高兴。这时，裴寂经过和李建成、李世民等人的反复斟酌后，向李渊提出了这样一个策略："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① 意思是废除隋炀帝杨广，立代王杨侑为帝；改换隋炀帝时的旗帜，向突厥作出代隋的表示。这样既可以师出有名，又能够得到突厥和华夏兵民的支持和拥护。其实，这个策略完全符合李渊既想起兵反隋，又要保持臣节的思想。因此，很快便得到了李渊的认可，并立即派人驰报突厥。始毕可汗闻讯后，当即遣部将康鞘利等送马千匹，前来太原交易，并答应出兵相助，助兵数量由李渊决定。这个被李渊称为"掩耳盗钟"的策略，果然奏效。据说，此后每天前来应募的兵士就有 1000 多人，20 天左右，得众数万，进一步壮大了起兵的军事力量。

大业十三年六月五日，西河郡丞高德儒表示不从。李渊立即派李建成和李世民率兵征讨。行军途中，建成和世民不但同兵士同甘共苦，又严肃军纪，规定："果菜以上，非买不食。"这样，既鼓舞了士气，使随行兵士"人百其勇"，而且也获得了沿途百姓的"感悦"爱戴。所以，他们很快便攻占了西河郡城。除拒不从命的高德儒被斩首外，"自外不戮一人，秋毫无犯"。总计从出兵到凯旋，"往返九日，西河遂定"。李渊曾情不自禁地说："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六月十四日，李渊创建大将军府，自号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县尉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刘政会为户曹，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分任左、右统军。又以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其余文武，随才授任。

六月十七日，突厥部将康鞘利等驱赶千匹战马来到晋阳，并转达了始毕可汗愿意出兵相助之意。李渊选购了 500 匹战马，又派刘文静随康鞘利一起返回突厥，请求突厥发兵 500 相助。并告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诫文静说：突厥愿意出兵相助，这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出兵过多，内地百姓就会遭殃。因此，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我军最为提防的应是刘武周和突厥勾结，贻为边患。现在突厥既已答应和我军联合，我们只是假其声势，怀柔远人而已。最后，又一再叮嘱："公宜体之，不须多也。"①

七月四日，李渊以第四子李元吉为镇北大将军、太原郡守，驻守晋阳宫。凡留后事宜均委以处理。

七月五日，李渊亲率3万大军，齐集军门，庄严誓师。接着，遂浩浩荡荡从晋阳南下。第二天，又派通议大夫张纶率部西征，经略离石（郡治今属山西）、龙泉（郡治在今山西隰县）和文城（郡治今山西吉县）诸郡。于是，李渊晋阳起兵就这样正式拉开了帷幕。

二、霍邑之战与进取河东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五日李渊率军从晋阳南下后，行军数日，到达西河郡治所隰城（今山西汾阳），慰问吏民，赈济贫困，稳定社会秩序。七月十四日进入雀鼠谷，经灵石县（今属山西），抵达贾胡堡，南距霍邑（今山西霍州）50余里。霍邑在汾水东岸，位于雀鼠谷南端谷口。西邻汾水，东据霍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晋阳大军南下的必经之地。当李渊起兵南下的消息传到首都长安后，隋西京留守、代王杨侑遂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2万屯驻于此，和防卫河东郡的隋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构成犄角之势，阻击李渊。这时，突然乌云密布，天降霖雨，道路泥泞。李渊只得下令兵士在贾胡堡休整，又派人带领老弱之兵北返太原，增运一月粮饷。

七月十七日，张纶率兵攻占离石，击杀拒城抵抗的太守杨子崇。

---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七月十八日，始毕可汗所派突厥先头部队抵达贾胡堡。后续数百骑兵也已上道，不日即可抵达。

七月二十日，河南瓦岗军领袖李密遣使送来书信，请求与李渊联合。这时，李密已被翟让推举为主，建魏公旗号，拥众数十万，黄河以南，江淮以北，无不归附。李渊为了使李密专意中原，牵制东都隋军，使其不能顾及关中，而使晋阳之兵“专意西征”，便在回函中“卑辞推奖以骄其志”。李密得书大喜，“于是不虞义师而专意于世充”①。李渊麻痹李密之计，收到了鹬蚌相争，渔父得利的效果。

秋天的霖雨仍淅沥不止，北使突厥的刘文静迟迟未归，突厥的援助部队也不见踪影。军中又有流言说：突厥欲与刘武周联兵南下，将要偷袭太原。因此，有人建言：宋老生与屈突通犄角据险，短期内难于猝拔。刘武周与突厥相互勾结，将对太原构成严重威胁。而南下兵士的家属多在太原，一旦太原有失，则军心摇动。因而主张“还救根本，更图后举”②。李渊听到这个建议后，未加熟虑，便下令左军兵士先行北返。当部分左军已经起程以后，他又心存疑虑，便问计于建成和世民二人。建成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后，已踌躇满志，无心扩张；突厥贪图财货，他们虽与武周联合，但却相互猜忌，决不会轻意进犯太原；宋老生轻浮急躁，缺少谋略，必败无疑。现在秋粮遍野，军饷筹集毫无困难。既已大兴义兵，理应奋不顾身，挺进关中，占据长安，号令天下。当前遇到小小敌寇，就立即班师，南下的兵士势必会一朝解体。那时，“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旦夕之间，就会败不旋踵。因此，他们果断地说：“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李渊听后恍然大悟，当即下令追回已经北返的部分左军，并兴奋地说：“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

---

①《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籍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①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二十七日，返回太原增运粮饷的车队抵达贾胡堡。八月一日，云收雨霁。第二天，李渊命令兵士晾晒行装铠仗。八月三日，大军沿霍山西麓向霍邑挺进。正午之后，李渊所率数百轻骑已达霍邑城东五六里处。为了引诱宋老生所率隋军离城出击，李渊派建成和世民各领数十骑察看地形。又将所余骑兵分为十多队，由霍邑东南向西南移动。所到之处，李渊都要指划一番，假装将要安排营垒，攻打城池。与此同时，又派殷开山催促大军加速前进。宋老生在霍邑城头看到李渊在城周部署军队，后续大军又快速向霍邑逼进，果然以为李渊要逼城置营，全力攻城，便亲率2万多守城兵士从南门和东门分两路冲出城外。李渊为了进一步引诱宋老生远离城池决战，遂将数百先头骑兵分为左右两队，分别在城东和城南排列军阵，摆出将要迎战的架势。但未及接触，李渊与建成所率左军即向后撤退。宋老生以为李渊胆怯畏惧，引兵紧追。李渊后撤一里许，与后续大军会合，立即发起进攻。这时，李世民所率右翼部队从南原直冲而下，向宋老生阵后发起攻击，隋军前后受敌。晋阳之兵前呼后应，击鼓和喊杀之声，“响若山崩，城楼皆振（震）”②。双方在激战中，李渊派人在阵前大喊：“已斩宋老生！”隋军将士闻讯，阵脚大乱，纷纷向后逃跑，争先恐后地向霍邑奔去。但霍邑的东、南两个城门早已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条载，当李世民和李建成提出了南攻霍邑的建议后，“（李）渊不听，促令（左军）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奈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按：此段文字显然受到贞观时期史臣所修《太宗实录》的影响，溢美世民，贬低李渊，隐没建成之功，故不取。今从《起居注》。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为李世民部所占。宋老生进退失据，被晋阳军头卢君谔斩首。3万霍邑守军也作鸟兽散。李渊率众顺利占领霍邑。这次战斗前后仅用了一个时辰。霍邑之战的胜利，为李渊后来挺进关中和定鼎长安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奠基礼。

李渊所率晋阳之兵在霍邑城内只作了一天的短暂休整，第二天，又沿汾水河谷南下。

大业十三年（617年）八月八日，临汾郡（治今山西临汾）不战而下；八月十三日，轻取绛郡（治今山西新绛）；八月十五日，抵达龙门（今山西河津）。刘文静和突厥部将康鞘利率领前来助战的500骑兵和战马2000匹，也同时到达。李渊对此时突厥助兵的到达，很感满意。因为在霍邑之战直至攻取临汾、绛郡等地的战斗中，均无突厥相助，可避免突厥的邀功责赏。另外，又消除了突厥和刘武周连兵进攻太原的威胁。因此，李渊兴奋地对文静说："（此）皆君将命之功也。"① 接着，李渊即欲率军渡河，挺进关中。当时，可供渡河的津梁有三：一为黄河东岸的龙门和西岸韩城（今属陕西）间的龙门山和梁山；一为河东城西的蒲津桥；一为风陵渡口。由于蒲津桥为隋将屈突通所控，风陵渡又在蒲津桥南。所以，此时仅有龙门山和梁山间的渡口可供利用。不久，前来归附的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薛大鼎和河东县户曹任瓌也劝李渊迅速渡河，占据永丰仓②，然后"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③。任瓌还主动请求说降隋冯翊（郡治在今陕西大荔）太守萧造和关中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孙华。李渊当即接受了薛、任二人的建议，八月十八日，率部抵达汾阴，派任瓌携带他的亲笔书信，渡河招降孙华。与此同时，又派兵沿河北上，搜寻渡河舟船。八月二十一日，晋阳之兵到达壶口山（今山西吉县西南），河东水滨百

①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

② 永丰仓：隋代粮仓。原名广通仓。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置，位于华阴东北渭水南岸广通渠口。大业初改名。后世渭水南移，仓址隔在渭北，今在陕西大荔境内。

姓每天争献舟船的有数百之多。李渊遂开始组建水军，准备渡河。

大业十三年(617年)八月二十四日，孙华接到李渊的信函后，率心腹数十骑从郃阳（今陕西合阳）渡河来到汾阴，面见李渊，“殷勤诚款，请先立效”。李渊当即拜孙华为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加冯翊太守。并命其率先渡河，作为前导。接着，又令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陈演寿等随孙华次第渡河，占领黄河西岸，等待大军，并告诫弘基等人说：屈突通驻守河东，精兵不少，相距仅五十余里，如不敢率兵来攻，足以说明其不得军心。但此人久经战阵，惧怕获罪，必然出击。如果一旦屈突通向你们发起进攻，那我就率领大军，南下进攻河东，必胜无疑。如果他全军守城，那么，你们渡河以后，就迅速占据蒲津桥西岸，封锁桥梁。这样，河东城就会陷入被扼喉、拊背的境地，屈突通如不逃走，就必为我擒。

九月七日，屈突通得知孙华导引晋阳兵将刘弘基等渡过河西后，立即派遣虎牙郎将桑显和率精兵数千连夜渡过蒲津桥西，偷袭王长谐部军营。因晋阳兵将早有防备，设伏迎击，隋军大败。桑显和率残部逃回河东城中，并派兵封锁了蒲津桥梁。这一天，西征军张纶率部连克龙泉和文城二郡。

九月十日，李渊率大军围攻河东。由于河东城池坚固，屈突通所率隋军拼死守卫，故久攻不克。这时，冯翊太守萧造、华阴（今属陕西）县令李孝常及京兆万年（治今陕西西安）、礼泉（今陕西礼泉北）等隋朝官吏和地方武装都相继派人前来归附，每天约有千人。他们都一致请求李渊早定关中。对此，李渊犹豫不决，遂召集幕僚商议。裴寂认为，屈突通手握精兵，盘踞坚城，如果舍此入关，一旦长安也久攻不克，我军退路将被堵截。那时，腹背受敌，实为冒险之举。因此，他主张先克河东，然后入关。长安凭借河东援助，屈突通失败，长安必破无疑。李世民的见解正相反。他认为兵贵神速，应乘士气旺盛之机，率领归顺的将士，西入关中，长安的隋军必定震骇恐惧，等不到他们施展智谋和勇力，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长安唾手可得。如果久攻河东，顿兵坚

城，就会使长安的隋军得到喘息和防备之机。那时，就要坐费时日，一旦将士离心，宏图大业就会化为泡影。况且，关中地区接踵起事的将士，不知归属，应尽快招抚怀柔。屈突通只不过是一个“自守虏”而已，不足为虑①。李渊听取了两种意见后，决定留少数兵力继续围攻河东，自己亲率主力渡河，挺进关中。

三、攻克长安与建立唐朝

大业十三年（617年）九月十二日，李渊下令主力部队从梁山渡河。九月十六日，李渊将起兵的大将军府安置在朝邑（今陕西大荔东）的长春宫。关中士民闻讯前来归附者络绎不绝。其中有隋朝邑法曹靳孝谟，以蒲津桥西的蒲津、中潬二城归降；华阴县令李孝常以永丰仓归降。其余京兆府诸县派人请降的不计其数。九月十八日，李渊派长子李建成和刘文静率王长谐等部数万人屯驻永丰仓，防卫潼关和河东的隋军；又派次子李世民率刘弘基、殷开山诸部数万人沿渭北向长安挺进。

隋河东守将屈突通听说李渊率领主力已西入关中，遂以鹰扬郎将尧君素代领河东通守，守卫蒲津渡口，自率部分精兵由风陵渡东岸渡河，援助长安。由于受到李渊所遣刘文静部的阻击，屈突通不得西进，只得率部东撤，企图与驻守潼关南城的隋将刘纲会合。但刘纲已被刘文静部将王长谐击杀，南城失守。屈突通只得守保潼关北城。李渊乘河东空虚之际，派将军吕绍宗进攻，但不克而还。

这时，先后在鄠县（今陕西户县）起兵的李渊堂兄弟李神通、小女李氏及在盩厔（今陕西周至）起兵的西域商胡何潘仁等，听说李渊渡河的消息后，都纷纷派人来到朝邑迎接。

晋阳起兵前夕，李神通和李渊的小女李氏、女婿柴绍均留居长安。当李渊派人接柴绍夫妇北上晋阳时，李氏遂回到鄠县庄园，

---

① 参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疏散家产，聚众起事，准备迎接其父李渊。这时，西域商胡何潘仁也在盩厔司竹园起兵造反，自称总管。李氏派家僮马三宝说降了潘仁，并率众东进，攻占了鄠县县城。马三宝又相继说降了农民起义军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各率数千人齐集鄠县，一时声势大振。长安留守、代王杨侑多次派兵征讨，均被击败。李氏乘胜攻占盩厔、武功、始平（今陕西兴平），兵士迅速发展到七万多人。李氏遂派人告知李渊，李渊大悦，渡过河西以后，当即派柴绍率数百骑兵经华阴，沿秦岭北麓西进，迎接其妻李氏。李渊的堂兄弟李神通听说李渊晋阳起兵之事后，也怕受到株连，从长安逃入鄠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聚众起事。此外，李渊的长女女婿段纶也在蓝田（今属陕西）起兵，聚众一万余人。李渊以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均受李世民统领。

李世民所率刘弘基、殷开山部在西行途中，隋朝地方官吏及小股农民起义军"归之如流"。九月二十七日到达泾阳（今属陕西）时，兵众增至9万余人，并与柴绍及李氏夫妇会合，世民令其"各置幕府"。因为李氏幕府之内多为女兵，故军中称其为"娘子军"①。攻克长安后，李氏以功受封为平阳公主。

李世民与柴绍和平阳公主泾阳会师以后，李渊即令刘弘基、殷开山率众6万经略扶风（郡治在今陕西凤翔），然后，南渡渭水，东进屯驻汉长安故城（今陕西西安西北10公里处），对隋都长安取迂回包围态势。据守长安的隋军将领阴世师和骨仪等当即派兵出击，被弘基、开山部打败，退回城中。李世民在柴绍夫妇的导引下，也从泾阳南渡渭水，进抵盩厔司竹园。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等皆率众相从。世民派人急驰冯翊，请求李渊约期会攻长安。接着，又率众进抵阿城（今陕西咸阳南）。李渊获悉世民会攻长安的请示后，认为屈突通孤守潼关北城，既不能东逃，又不能西归，只有静观我军成败，才能决定去向，"不可为虞"②。遂令李建成率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八《柴绍附平阳公主传》。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领屯驻永丰仓的部分精兵，沿新丰（今陕西临潼）西趋汉长乐离宫（在今陕西西安东）；又令李世民率部由阿城北趋长安故城，与刘弘基、殷开山部会合，对长安城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一天，隋延安（郡治在今陕西延安西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富县）、雕阴（郡治在今陕西绥德）三郡官吏相继派人向李渊表示归降。

大业十三年（617年）九月二十八日，李渊亲率大军从冯翊西行。十月四日，到达隋都长安城东春明门外西北。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各自率部到达指定地点，总兵力共有20多万，长安城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这时，李渊派人多次来到长安城外，向守城的隋将卫文昇表示了“尊隋夹辅”① 之意，劝其开城纳降，免动干戈。但均告无效，城内“拒守愈固，信使不通”。

十月十四日，李渊下令诸路兵马向前推进，冲入长安外城，隋军被迫收缩在皇城和宫城守卫。十月十七日，李渊将大将军府由春明门外移至外郭城内安兴坊中，指挥诸路兵马加紧制作攻城器械。长安城内及其周围的竹木等物，被用之殆尽。

十月二十七日，经过10天的战前准备以后，李渊下令诸军同时攻城。于是，士气旺盛的攻城兵士纷纷沿云梯、楼橦，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垣。这时，守城的隋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昇年事已高，听说李渊要攻打长安，早已忧惧成疾，不能理事。只有隋将阴世师和骨仪等指挥守城隋军拼死抵抗。关中最大的一支农民军首领孙华在第一天的攻城战斗中，捷足先登，但却因中流矢身亡。故攻城将士被迫退却，未能得手。十一月九日，李渊又移大将军府于皇城东面的景风城外，亲自指挥攻城战斗。他命令兵士当晚发起进攻，第二天黎明，军头雷永吉首先率部登上皇城城楼，杀退了守城隋军。其余诸军相继登城，守城隋军全都缴械投降。十一月十一日，李渊命令李建成、李世民率部分兵士入城搜捕阴世师和骨仪等，将其斩于朱雀街衢，其余隋朝官吏、将士，全部赦免释放，一无所问。又查封了宫内府库、图籍，并颁布了严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禁抢夺公私财物的命令。因而，长安城内军民安堵，社会稳定，“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①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五日，李渊选择良辰吉日，备好羽仪法驾，把年仅13岁的代王杨侑由东宫迎至宫城的大兴殿，立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并约法12条，废除了隋炀帝时的全部残酷律令。十一月十七日，李渊从汉长安城长乐宫移居长安宫城内的武德殿，自称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并设置了丞相府大小官员。李渊每天在大兴殿东南虔化门处理军国政务。

十二月二十一日，隋将屈突通和刘文静部在潼关南、北二城相持一个多月后，又派部将桑显和率众夜袭文静军营，企图攻占潼关南城。文静与部将段志玄率部奋力苦战，击败隋军，桑显和只身逃回，余众全部被俘。屈突通自知兵力单薄，无力西进，又听说长安已经陷落，便留桑显和镇守潼关北城，自率部分兵士东行，企图逃奔东都洛阳。屈突通东行不久，桑显和当即举城投降。刘文静速派窦琮等率轻骑与桑显和追赶屈突通。行至稠桑（今河南灵宝北），屈突通布阵自卫，但所率隋军全部临阵倒戈，将屈突通执送长安。李渊不但赦而不罪，且任屈突通为兵部尚书兼李世民元帅府长史，派其到河东城下招降守将尧君素。但尧君素却严词拒绝，屈突通只得率部返回长安。河东此时孤立无援，已成强弩之末，对长安不能构成严重威胁，故至武德三年（620年）才被收复。

收降屈突通后，李渊又派刘文静带兵继续东进，攻取了弘农郡（治今河南灵宝），收复了新安（今属河南）以西的大部郡县。此后不久，李渊又派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县令詹俊和武功县正李仲衮率兵南巡巴、蜀。到次年年初，东自商洛（今陕西丹凤），南到巴、蜀地区的隋朝地方官吏、农民起义军首领以及氐、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羌等少数族首领，都争相派人来到长安，请求归降，接待机构每天抄写的回复信函就有 100 多封。

义宁二年（618 年）五月二十日，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弑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遂废掉杨侑，在太极殿登基，建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又改隋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以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拜尚书令，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其余官员均设置齐备。唐王朝宣告正式成立。

第三节　李渊集团起兵夺权成功的原因

一、主 观 原 因

李渊集团于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酝酿并发动晋阳起兵，同年十一月攻克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仅历时一年。究其迅速取胜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抓住了起兵的有利时机

如上所述，在大业十二年（616 年）年底到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这段时间内，由于农民起义军的迅猛发展，以隋炀帝为首的残暴统治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但隋政权仍死而不僵，它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对农民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企图作垂死挣扎，死灰复燃。如中原地区的隋将张须陀虽被击毙，但隋炀帝又诏令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代领其众，徙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继续与河南瓦岗军为敌；隋涿郡通守郭绚虽被高士达、窦建德率领的河北起义军袭杀，但隋太仆卿杨义臣所率隋军却乘高士达兵疲将骄之机，阵斩士达，使河北起义军受到重创。不久，窦建德势力复振，但仍须与河北的隋军势力进行周旋，无暇他顾；江淮起义军虽击败了隋军陈稜部，但隋炀帝统御的关中劲旅仍盘踞江都，使其不能北上以争天下。李渊集团选择在这个时期酝酿并发动晋阳起兵，既使隋王朝感到鞭长莫及，无力增派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也使农民起义军只能与援而不

能为敌。

（二）制订了正确的战略策略

当李渊集团在酝酿和发动起兵之时，晋阳地区的形势仍很严峻：不但内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作梗，而且北有突厥的威胁，南有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东有李密窥视关中。如果对于这些敌对势力不能正确处理，变不利为有利，起兵之事就会成为泡影，功败垂成。对此，李渊精心安排了兴国寺议事之计，顺利地诛杀了王、高二将，清除了心腹之患；接着，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利用奉送金帛财物的方法，甚至不惜屈辱称臣，终于取得了突厥的支持，解除了后顾之忧；南下途中，又卑词推奖李密，打消了李密西入关中的欲望，化不利为有利。在这些正确策略的实施下，终于使晋阳起兵取得成功。后来，在霍邑之战、围攻河东以及攻占长安等一系列重大作战中，李渊都相继采取或接纳正确的作战方略，终于取得了定鼎关中的最后胜利。因此，可以说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李渊集团采取的所有战略策略都正确无误，这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三）争取人才、安定民心工作完备周密

早在晋阳起兵以前，李渊就利用自己显赫的家世、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智若愚的性格，广纳豪杰，结交英雄，因此，很快就在他的身边形成一个文武兼备的坚强集团。起兵以后，他又把这些人封官晋爵，使其担任文臣武将。这些人由于受到知遇之恩，故能作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李渊所能依靠的骨干力量。

行军途中，李渊又非常注意结纳人心。除对于坚决抵抗的隋军将领给予武力征讨和严刑处罚外，对于自愿归附的隋朝将吏则一律赦而不问，有的还分封官职，继续留任。这种分化瓦解政策的相继施行，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不但减少了进军途中的阻力，而且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李渊还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整顿军纪的号令，不许兵士骚扰百姓。因此，所过之地，民众安堵，秩序井然。不但使沿途百姓衷心拥戴，而且也使农民起义军接踵归附。这种争取人才、分化敌人、安定民心、最大限度地团

结一切反隋力量的政策，是李渊集团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二、客观原因

李渊集团的胜利除去以上主观原因外，尚有以下客观原因：

（一）晋阳地理位置优越

李渊任职留守的太原，古时亦称晋阳。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故城，最早为春秋时晋国大夫赵简子家臣董安主持修筑。北齐时又在汾水东岸增筑一城，于旧城内增置龙山县，东城仍名晋阳。隋文帝又改龙山为晋阳，作为并州治所，太原为并州属县。隋炀帝改州为郡时，仍以晋阳作为郡治。晋阳为太行山以西至黄河间的腹心地带，北与蒙古草原接壤，南与秦、晋相连，历来就为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隋炀帝为了防卫突厥南侵，不仅以此为北都，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晋阳宫，供随时巡幸，而且还在此贮备了大量军饷物资，“食支十年”①。这就为李渊的起兵反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这里地处中国北部，不但隋王朝鞭长莫及，而且距离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也有千里之遥，不易受到敌对势力的直接打击。这就为李渊集团的发动起兵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

（二）镇守河东、关中隋军力量相对虚弱

中原、河北和江淮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直接威胁到了隋王朝的东都和运河航道等腹心地带的生存安全，因此，隋王朝便把大量军队集结在这3个地区，全力对付农民起义军。加之隋炀帝三巡江都时，又带去了所有的关中卫队，因而防守河东、关中的隋军力量大为削弱，这也为李渊的顺利起兵和定鼎关中提供了可乘之机。

总之，李渊集团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取得起兵晋阳、挺进关中、攻占长安、建立唐朝等一系列重大胜利的。

---

① 《旧唐书》卷六十四《巢王元吉传》。

第二章　唐初统一战争

唐朝建立之初，面对割据金城（今甘肃兰州）的军阀薛举、薛仁杲父子对秦、陇地区的大举入侵，当即派李世民率部西征，终于在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将其剪灭；次年五月，又用分化瓦解之策，平定了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李轨，从而解除了首都长安及关中地区的西面威胁；武德三年（620年），李渊又派李世民率领唐军进入河东地区，于同年四月一举歼灭了盘踞马邑的军阀刘武周，从而保证了首都长安的北部安全；武德四年，李世民再率唐军主力东出潼关，与隋朝残存的主力部队王世充等展开中原决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使王世充部受到重创，龟缩在洛阳城内坐以待毙。在窦建德部援助洛阳，唐军两面受敌的紧急时刻，李世民果断采取围城打援的方法，生擒建德，10多万夏军一朝瓦解，王世充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被迫开城投降。唐军终于在统一战争中赢得了最为重大的一次军事胜利，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坚实基础；接着，唐军又相继出兵江南，先后进行了平定割据江陵（今属湖北荆州）的军阀萧铣，击败江西的林士弘，镇压江淮辅公祏和河北刘黑闼等农民起义军的反唐斗争，从而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

第一节　唐朝初年的国内形势及统一战争的战略决策

一、群雄割据的形势特点

唐朝建立之初，虽然关中的大部地区和巴蜀一带很快平定，李

密率领的河南瓦岗军也在以后不久被隋将王世充击灭，但全国总的形势仍很复杂严峻：军阀薛举、薛仁杲父子割据金城，窥视秦陇，不断东侵；凉州的军阀李轨自称天子，拥兵自重，势力渐盛；马邑刘武周和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梁师都等连结突厥，割据北方，虎视眈眈；隋将王世充盘踞洛阳，时刻梦想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军阀萧铣拥有两湖地区，企图火中取栗，抢夺帝位。此外，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和辅公祏、江西的林士弘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在不断扩大地盘，日益强盛。总计唐朝所能控制的地域尚不及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所以统一战争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繁重。但是，综观全国的割据形势，仍有以下几点对唐朝较为有利：

1、这些割据军阀虽然各自拥有一定兵力，控制部分地区，但他们由于各怀鬼胎，图谋称王称霸，因此，这些割据军阀之间充满矛盾斗争，企图相互吞并，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统一力量，更不可能保持步调一致，相互为援。即使某个军阀受到另一势力的严重威胁时，其他军阀也只会袖手旁观，决不会拼死援救，消耗自己的军事力量。另外，这些割据军阀为了扩充实力，不仅对百姓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其内部也尔虞我诈，充满了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

2、农民起义军虽在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打击隋王朝腐朽统治的主力部队，但农民起义军之间也缺乏统一号令和统一领导，始终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坚强的统一力量。有些农民起义军的领导者为了扩充力量，扩大地盘，甚至不惜相互兼并，自相残杀，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农民起义军的总体力量。有的领导者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为了保存自己，甚至不惜认敌为友，与隋朝的残余势力沆瀣一气。这就使当时的割据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3、无论是在军阀割据还是在农民起义军活动的广大地区，由于战火不熄，干戈屡动，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不但广大百姓流离颠沛，迁徙不定，农桑失时，饱受战乱之苦，而且这些割据

者也都普遍乏粮，只能依靠抢掠和压榨维持军计。因此，他们大多缺乏雄厚的物资积存，没有长期割据的经济实力，有的甚至只能自生自灭，倏忽存亡。

二、统一战争的基本战略

根据唐初全国割据形势的上述特点，以唐高祖李渊为首的统治集团在统一战争中先后制订了下列基本战略：

1、首先对距离关中最近、威胁最大而势力最强的军阀薛举、薛仁杲父子发起进攻，确保首都长安的安全。采取分化瓦解之策，使凉州李轨保持中立，孤立薛氏父子，最后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2、对刘武周等割据势力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实行坚壁清野、断绝粮道等策略，以瓦解敌人军心，达到迅速歼灭之目的。

3、对割据势力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实行政治分化，招抚胁从，对主动归降者飨以高官厚禄，以弱其势，达到不战而降之目的。

由于上述战略决策的正确运用，终于使唐朝统治者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

第二节　平定陇右与朔方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统治集团决定采取对西北的陇右地区首先用兵的战略决策，平定陇右与朔方，消灭金城的薛举父子和凉州的李轨集团，这对巩固关中，稳定长安，确保新政权的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平定西秦

薛举原为河东汾阳人，后随父迁居金城，拥有“家产巨万”，成为当地富豪。隋炀帝时曾为金城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

四月，即李渊父子正在酝酿晋阳起兵之时，薛举也与同党挟持金城县令郝瑗据城叛乱，自称西秦霸王。并连结岷山一带的羌族豪帅钟利俗等，先后攻占枹罕（郡治在今甘肃临夏东）、西平（郡治在今青海乐都）和浇河（郡治在今青海贵德）等郡，完全控制了陇西（即陇山以西）之地，兵众达到13万。同年七月，薛举自称秦帝，迁都天水（郡治今属甘肃）。这年年底，当李渊攻占长安后，薛举派其子仁杲率众进犯扶风，并兼并了汧源（今陕西陇县）的农民军唐弼部，兵众达到30万，对长安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薛举的西面威胁，唐高祖李渊曾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有人建言，应该偃武休兵，劝农耕稼，安人和众，关中地区自然安宁。等到"秦川将卒，贾勇有余，三年之后，一举便定。今虽欲速，臣恐未可。"① 此说貌似稳妥，实则消极被动。因为拖延3年，不但割据军阀会日益坐大，而且农民军也会愈战愈强，这将会给统一战争带来无穷后患。因此，李渊未予采纳。最后，李渊父子和众多大臣经过认真分析，决定施行首先用兵西北的战略方针。这是因为位于西北的陇右地区"土旷人稀，非用武之国"②，而关中地区却是土地富饶的"天府之国"。以"秦川将卒"驰骋陇右，可稳操胜券；其次，陇右地区牧场辽阔，"多畜牧"③，占领西北，可获得大批战马，为以后的扩充军备提供物质条件；薛举、薛仁杲父子以及李轨等人野心勃勃，虎视关陇，已对长安构成直接威胁。特别是薛举父子，不但势力强大，而且又极端残忍，成为李渊集团最危险的敌人。总之，首先用兵西北，歼灭薛举父子和李轨诸部，可解除唐都长安的西顾之忧，为以后统一战争的次第展开奠定牢固的基础。因此，李渊当即派李世民率兵西征，双方在扶风遭遇。结果，仁杲大败，世民乘胜追至陇坻（今陕西陇县以西的陇山东麓），距天水仅有一二百里，吓得薛举急忙同僚属商议"降

---

① 《旧唐书》卷七十五《韦云起传》。

② 《隋书》卷四十《王世积传》。

③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事”①。但李渊此时为了确保关中安全，下令世民鸣金收兵。义宁二年（618年）初，薛举曾乘李渊派兵东出潼关、进攻洛阳，关中空虚之机，企图连结朔方梁师都和突厥莫贺咄设部，进犯长安。后来虽因李渊派人离间突厥，薛举孤立，此举未行。但说明薛举对长安的垂涎之心，从未止息。

武德元年（618年）六月，即唐朝建立之后月余，薛举又率兵进犯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西北），唐高祖李渊遂决定派李世民为元帅，率8总管之兵，全力攻击薛举。于是，唐朝平定薛举父子的决战至此正式拉开。

1、第一次浅水原之战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四日，李世民所率唐军与薛举部在高墌（今陕西长武东北）遭遇。李世民认为薛举远离本土，运粮不便，军饷缺乏，急于速战。故下令唐军占据高墌，深沟高垒，“以老其师”②。两军相持期间，世民突患疟疾，只得卧床静养，便把军务交给元帅府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处理，并告诫他们说：“（薛）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待吾（疾）差，当为君等取之。”③ 但二人走出元帅府后，殷开山却对刘文静说：秦王染疾，恐心力不济，故发此言。我们应乘机破敌，何以要把劲敌留给秦王呢？因此，他提议主动出击。在殷开山多次挑动下，刘文静遂改变了李世民的策略，将唐军调出高墌，列阵城外西南，并自恃兵强马壮，不加设防。薛举看到唐军调离高墌，便率军秘密迂回于唐军侧后，出其不意，偷袭唐军。于是双方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北）展开激战。由于唐军腹背受敌，军心动摇，故被击败，兵士损失大半，唐将慕容罗睺、李安远战死，刘弘基被俘。李世民被迫率兵撤回，薛举乘机占领高墌。

武德元年（618年）八月，薛举派其子仁杲率兵进围宁州（治

①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传》。

③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今甘肃宁县），被刺史胡演击退。这时，原金城县令郝瑗对薛举建言：今唐军新破，将帅被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薛举当即答应。正当整军待发之际，薛举突患疾病，不久死去。其子仁杲继领其众。郝瑗也因痛惜过度，一病不起。仁杲只得率兵退居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暂停东进。唐军同薛举部的第一次浅水原之战至此结束。

2、第二次浅水原之战（参见附图 2）

李世民率兵撤回长安以后，唐高祖李渊更加认识到薛仁杲部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敌。他立即派人潜趋凉州，利用李轨和薛仁杲父子的前嫌芥蒂，使其在薛秦后部骚扰，借以对其进行牵制。为了取得李轨的配合支持，李渊在给他的书信中以“从弟”①相称。李轨得书大喜，当即派他的弟弟李懋前来入贡。李渊晋封李懋为大将军，并派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爵凉王。

武德元年（618 年）八月十七日，唐军经过短暂休整以后，李渊又派李世民为元帅，率兵讨伐薛仁杲。刘文静与殷开山带罪随军效力。

李世民率领的唐军抵达高墌后，下令兵士严密防守。薛仁杲派部将宗罗睺率兵阻击。宗罗睺多次派兵在城下挑战，企图引诱唐军离城出击。李世民下令坚壁不出。唐军将士激愤难忍，纷纷请缨，世民对他们劝谕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并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② 于是，双方在城下呈对峙态势。

九月十二日，当唐军主力与薛仁杲宗罗睺部在高墌相持之时，李渊又派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总管窦轨率部东进，从西面向薛仁杲盘踞的折墌城发起进攻，但被仁杲击败。仁杲乘胜追击，顺势包围了泾州。泾州“城中粮尽”，唐骠骑将军刘感及守城将士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八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附子仁杲传》。

“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在此危急时刻，长平王李叔良奉命率兵援救。薛仁杲看到泾州一时难于得手，便扬言军粮不继，引兵南去。第二天，仁杲又派折墌① 人前来泾州城下诈降。李叔良信以为真，遂派刘感率兵迎接。当唐军抵达折墌城下时，才知中计，急忙撤退。薛仁杲伏兵于百里细川，突然出击，唐兵大败，刘感被俘。仁杲又麾军包围泾州，李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②。九月二十二日，李渊又派陇州刺史常达在宜禄川（位于今陕西长武西北）出击薛仁杲部，歼敌1000多人。仁杲率兵同常达部交战多次，不能取胜。不久，又用诈降之计，劫执常达，占据陇州。唐军虽在秦州、泾州和陇州方面的战事未取得进展，但却牵制了薛仁杲部的大量兵力，减轻了高墌方面唐军的压力。

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七日，唐军和薛秦部在高墌相持60多天。薛军粮饷用尽，军心动摇。其部将梁胡郎及内史令翟长孙相继率部投降，仁杲妹夫钟俱仇也以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归唐。李世民利用薛军离散之际，下令行军总管梁实率部分唐军移至浅水原，用以引诱薛军。宗罗睺看到唐军离城布阵，遂率全部精兵向浅水原的唐军阵地发起进攻。梁实凭借有利地形，指挥唐军拼死抵抗。宗罗睺久攻不克，遂派兵断绝了唐军水源。梁实部兵马断水数日，仍守险不出，而薛军的进攻却有增无已。这时，李世民看到薛军兵士已经疲惫，便对诸将说：“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③ 第二天黎明，世民又派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率部列阵于浅水原西。宗罗睺“自恃骁悍”，指挥全军向右翼猛攻。庞玉率部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难以相持。这时，李世民率唐军主力，

---

① 折墌，《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武德元年九月作“高墌”。按：此时李世民所率唐军正与仁杲宗罗睺部在高墌相持，李叔良不会不知。疑此“高墌”当为折墌之误，故据改。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③ 《通典》卷一五五《兵典八·坚壁挫锐》。

从浅水原之北，出其不意，攻击薛军阵后。宗罗睺回师相拒，但已首尾不能相顾。唐军“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奋勇冲杀。薛军抵挡不住，军阵崩溃，士卒四散逃遁，死伤数千，投涧谷而亡者不可胜计。李世民挑选精骑2000，打算尾随追击。窦轨叩马阻挡，请求“按兵以观之”。但世民坚持要以“破竹之势”，彻底歼灭薛军。遂不顾窦轨劝阻，率众紧追。追至折墌城南，薛仁杲率部已列阵抵抗，双方隔泾水相持。薛军骁将浑干等临阵倒戈，向唐军投降。仁杲恐惧，遂引兵入城据守。傍晚，唐军主力相继赶到，遂将折墌城团团包围。夜半，城内薛军纷纷越城逃亡。十一月八日，薛仁杲自知计穷，出城投降，后被送斩长安，薛秦灭亡。

唐军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其所以能够取得全歼薛秦的重大胜利，首先是由于主帅李世民吸取了唐军在第一次浅水原之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抓住薛秦军队运输不便、急于速战的弱点，始则深沟高垒，拒不交战；在敌军粮尽疲惫之际，又出动小股部队，诱其出击。在敌军气衰力尽之时，突然以主力发起进攻，使其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敌军退却以后，他又以轻骑紧紧追击，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从而迫其投降。正如李世民在战后所云：“（宗）罗睺恃往年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虽击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蹑，还走投城，仁杲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折墌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谓成算，诸君尽不见耶？”① 其次，薛举父子残酷暴虐，不善抚众，故兵力虽众，但其内部军心涣散。史载薛举每次战后，都要把俘虏全部杀光，且“多断足、割鼻，或碓捣之”；其妻“好鞭挞其下。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薛仁杲比其父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经常把战俘“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每攻一地，都要把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这样，不但“人心不附”，而

①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且在兵败以后，必然导致“无恩众叛”①。因此，薛秦的迅速灭亡，自有其必然原因。

二、削平凉州李轨

李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隋末任鹰扬府司马。大业十三年（617年）八月，李轨在同郡人曹珍、梁硕、安修仁等的支持下，囚捕了隋虎贲郎将谢统帅和武威郡丞韦士政等，自称河西大凉王，建立了割据政权。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之弟阙度设也率众2000，从会宁川（今甘肃靖远一带）前来归附，势力渐强。不久，薛举派部将常仲兴率部渡过黄河，北攻李轨。李轨派部将李赟率兵迎战，双方在昌松（今甘肃古浪西北）激战。结果，薛部全军覆没，常仲兴被俘。李轨乘胜派兵攻占张掖（郡治今属甘肃）、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西平（郡治在今青海乐都）、枹罕（郡治在今甘肃临夏东北），尽有河西五郡之地。

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四日，在唐军与薛仁杲部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开始前夕，李轨在凉州即皇帝位，改元安乐。同年底，李轨听信其子李仲琰和心腹安修仁的谗言，鸩杀了“甚有智略”的吏部尚书梁硕，其余心腹“从此稍离”。这一年，河西地区又遭受荒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李轨不但不予赈济，反而听信巫者之言，征发百姓修筑台阁楼榭，“由是士庶怨愤，多欲叛之。”②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二十八日，李轨派部属邓晓东入长安，向李渊致意自己已称大凉皇帝，拒绝接受李渊所赐凉州总管和凉王封爵。李渊大怒，当即囚捕邓晓，“始议兴师讨之”③。李轨的心腹安修仁之兄安兴贵正在长安，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愿往凉州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传》、《薛举附子仁杲传》及《传论》。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二月。

说降李轨，如李轨拒绝，则“候隙图之”①。

武德二年（619年）五月，安兴贵到达武威（凉州治所，今属甘肃）后，被任为右卫大将军。兴贵趁机劝李轨效法东汉初年的河西太守窦融，归顺唐朝。李轨严词拒绝。兴贵看到李轨毫无降唐之意，遂说服其弟安修仁，暗中聚集居住在凉州一带的各少数族胡人，进攻凉州。李轨出城迎战，被打得大败，只得婴城自守。安兴贵单骑驰至城下喊道：大唐派我前来诛杀李轨，敢相助者夷三族！兴贵累世居住凉州，深受当地士庶信赖，故守城兵士纷纷出降。李轨看到大势已去，只得开城出降。于是，“河西悉平”②。

平定薛举父子和李轨政权，收复河西和陇右之地，是唐朝统一战争的最初胜利。这不仅解除了唐王朝的后顾之忧，也为唐军的挺进中原乃至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三、平定朔方梁师都

梁师都为朔方豪姓，曾任隋鹰扬府郎将。炀帝大业末年，罢归乡里，趁天下大乱之际，结纳心腹党徒数十人，杀郡丞唐世宗，据郡造反，自称大丞相。并北连突厥，肆虐北境。大业十三年（617年）三月下旬，梁师都又率部击败了隋将张世隆部，乘机攻占雕阴（郡治今陕西绥德）、弘化、延安等郡，僭位称帝，建国号梁，改元永隆，与割据马邑的刘武周遥相呼应。突厥始毕可汗给师都赠狼头大旗一面，赐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不久，师都又导引突厥骑兵移居黄河以南，攻拔盐川郡（治所在今陕西定边）。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四日，梁师都派兵进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被唐骠骑将军蔺兴粲“击破”③。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下旬，突厥始毕可汗率众渡河抵达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企图入塞“抄掠”①。梁师都率部迎接，亦欲乘机南侵。适值始毕可汗患病身亡，其弟俟利弗设被立为处罗可汗。这时，唐高祖李渊所遣“奉币使于突厥”的高静到达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丰州总管张长逊又派高静持币赠于处罗，处罗可汗遂率部返回塞北。

三月一日，梁师都派兵再次进攻灵州，又被长史杨则“击走”②。

九月三十日，梁师都趁刘武周攻占太原，南攻汾、晋之际，率兵进攻延安。高祖李渊遂派延州总管段德操督军讨伐，双方在延安之北野猪岭遭遇。德操看到师都兵士众多，唐军少弱，遂坚壁不出，挫其锋锐。待其稍有疲惫，即令副总管梁礼率唐军主力从正面攻击。正当双方交战激烈之时，德操率轻骑突然从师都阵后杀出，师都抵挡不住，北遁200余里。此后，梁师都兵势大减，虽不能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但由于他“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③。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唐太宗在全国基本平定、而突厥日益衰弱之际，派人携带书信劝降师都，遭到拒绝。太宗遂派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率军征讨。这时，夏州西城已被唐军攻占，梁师都孤守东城。刘旻等率军抵达西城后，多次派轻骑“践其禾稼”，又“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④。梁师都的心腹战将李正金、辛獠儿、冯端等看到大势已去，合谋绑架师都，但未成功，遂降唐。从此，梁师都的部属“益相猜阻”⑤。刘旻看到歼灭梁师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向太宗上表请战。太宗

---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三月。

③ 《旧唐书》卷五十六《梁师都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二年三月。

⑤ 《旧唐书》卷五十六《梁师都传》。

当即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彻率兵援助。四月下旬，刘旻率部向盘踞夏州东城的梁师都发起进攻。突厥颉利可汗发兵援救，被柴绍部击败，退回故地。唐军遂将夏州东城团团围定。四月二十六日，在城中粮尽、援兵已绝的形势下，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举城投降。

第三节　东取河东

刘武周于隋末割据马邑后，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大肆南侵。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相继攻陷了太原和以南大多州县，河东告急。唐高祖李渊乘平定陇右之威，当即派李世民率唐军进入河东，收复失地。唐军经过柏壁之战等多次重大作战，终于全部歼灭刘武周及其部将宋金刚部，取得了收复河东的重大胜利，为以后的进一步平定北地和决战中原扫清了道路。

一、刘武周南下与河东危机

刘武周原为河间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其父刘匡时迁居马邑。炀帝大业年间，武周曾应募赴辽作战，以功被授建节校尉。返回马邑后，又迁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初，武周趁大乱之际，杀马邑太守王仁恭，据郡造反，自称太守，募兵1万多人，并派人向突厥表示归附。不久，隋雁门郡丞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联兵讨伐，在马邑桑干镇（今山西朔州东南）被其击败。王智辩被杀，陈孝意率残部逃回。三月二十二日，刘武周乘胜攻破楼烦郡城，占领汾阳宫（隋代行宫，在今山西静乐境内），并将抢掠的宫女、财物全部送往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振”①。不久，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又麾军北上，攻陷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并送给他一面绣有可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武周传》。

汗标志的狼头大旗。在始毕可汗的支持下，刘武周自称皇帝，改元天兴。接着，刘武周又率兵南下，包围了雁门郡城。郡丞陈孝意率众拼死拒守，终因外无援兵，寡不敌众，定襄陷落。

武德二年（619年）三月二十二日，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又大举南侵。四月初，抵达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北），逼近太原东面的军事要地榆次（今属山西）。这时，唐朝并州①总管李元吉匆忙调兵迎击。

李元吉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四子。晋阳起兵前夕，他与大哥李建成及妹夫柴绍从河东奔赴太原。晋阳起兵后，被任为晋阳留守。唐朝建立后，被封齐王，授并州总管。元吉生性酷爱打猎，曾说“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担任并州总管后，更是恣意取乐，以致“境内六畜，因之殆尽”，又“当衢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②。但对太原和河东的防务，却置之不理。故不仅使当地百姓“各怀愤叹”，而且也使他的属吏忧心忡忡。右卫将军宇文歆曾向高祖李渊奏告了元吉的荒淫行径，李渊下诏罢免了元吉职务。但元吉又指示他的心腹赴长安求情说项，不久又官复原职。当他听说刘武周率兵进至黄蛇岭后，匆忙派车骑将军张达率兵迎击。张达嫌兵力单薄不肯前往，但元吉却强迫其带兵出征。结果，唐军一触即溃，全军覆没，张达愤而投降。四月二日，刘武周率部在张达的导引下，攻占榆次，逼近太原。

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十八日，刘武周率兵包围太原。李元吉出城反击，围城之兵受挫后，稍向后退。四月二十日，李渊诏令太常卿、行军总管李仲文率兵援救太原。刘武周为了阻断唐朝援军北上之路，分兵南下，相继攻陷石州（治今山西离石），杀刺史王俭。五月二十日，又陷平遥（今属山西）。

武德二年六月初，易州（治今河北易县）流寇宋金刚被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击败后，率众4000，投奔刘武周。刘武周听

---

① 并州：即隋太原郡。唐武德元年改名并州总管，仍以太原为治所。

② 《旧唐书》卷六十四《李元吉传》。

说宋金刚勇猛善战，遂“委以军事”①，任其为西南道大行台，派他率兵数万进犯并州。

六月十日，刘武周率兵继续南下，一举攻陷介州（治所在今山西介休）②。李渊当即派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和行军总管李仲文率兵援救，刘武周亦派部将黄子英率兵狙击。双方在雀鼠谷北口对阵。黄子英多次以轻兵在阵前挑战，宝谊、仲文率全军出击。双方刚一接触，子英即假装败退。唐军奋力追击，中敌伏兵，致遭大败，宝谊、仲文均被所俘。不久，二人又一起逃回，李渊仍令其带兵防御武周。

刘武周相继攻占了雁门、楼烦、榆次、离石、平遥、介州等地，逐渐形成了对太原的合围态势，太原的形势岌岌可危。

唐高祖李渊对刘武周的南侵深为忧虑。右仆射裴寂主动请缨。六月二十六日，李渊遂以裴寂为晋州（治今山西临汾）道行军总管，率兵北征，并“听以便宜从事”。

七月二十五日，刘武周又派宋金刚率兵进攻浩州（治今山西汾阳）③，刺史刘赡在李仲文部的援助下，拼死拒守。金刚久攻不克，只得退回介休。

九月十日，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率兵抵达介休东南的度索原，与据城抵抗的宋金刚部对阵。金刚派兵断绝了唐军水源，唐军兵士数日不饮，渴乏难忍。裴寂移营就水，宋金刚乘机纵兵出击，唐军大败，散亡殆尽。裴寂率残部一日一夜驰至晋州。于是，自晋州以北，除浩州外，所有城镇几乎全部失陷。裴寂上表谢罪，李渊派人慰谕，仍令其镇守河东。

九月十六日，刘武周令诸军进攻太原。李元吉闻讯大惧，他哄骗司马刘德威说：“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④当晚，他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六月。

② 介州，义宁元年，以介休、平遥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改曰介州。

③ 浩州，即隋西河郡。唐武德元年改浩州。武德三年又改汾州。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便带兵出城，和妻妾家小一起逃回长安。刘武周顺利攻占太原。接着，他又派宋金刚率部南下，相继攻陷晋州、绛州（治今山西新绛）龙门（今山西河津）。十月上旬，又陷浍州（治今山西翼城），军势甚盛。镇守河东的裴寂生性怯懦，无将帅之才，只是频繁派遣使者，催促虞（治今山西夏县）、泰（治今山西万荣西南）二州的居民迁入城堡，焚烧粮草。致使百姓惊恐不安，皆思动乱。夏县（今属山西）人吕崇茂趁机聚众叛乱，自称魏王，响应武周。裴寂率兵镇压，反为所败。李渊立即派永安王李孝基和独孤怀恩及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张俭等率兵征讨。这时，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的隋将王行本① 也与刘武周遥相呼应，"关中震骇"②。面对河东的严峻形势，李渊认为一时很难控制，便决定放弃河东，仅守潼关以西。李渊在慌乱中作此决定，显然带有很大失误。因为刘武周旨在"南向以争天下"，野心极大。如果使其占据河东，不与争锋，势必会对关中造成严重威胁。一旦他与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连兵，就更难制服。加之北面又有突厥和梁师都部可为依靠，不但会牵制唐朝的大量兵力，而且也会对以后的统一战争带来巨大影响。故李世民闻讯，当即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③ 李渊接表后，觉得世民讲得有理，便改变初衷，把屯驻在关中的全部军队都拨给世民，使其统兵北征，李渊亲自赶到长春宫为世民饯行。

---

① 王行本：隋河东守将。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武德元年十二月载，隋河东守将尧君素在遭到唐军多次攻击后，粮草用尽。其部将薛宗、李楚宗合谋杀死君素。君素另一部将王行本带兵入城，捕杀薛、李等人，遂代君素守城。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十月。

③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二、李世民东进柏壁决战

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十四日，李世民率军从龙门乘坚冰渡过黄河，屯兵绛州西南的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部成对峙态势。当时，河东地区经刘武周部抢掠后，仓廪俱空，百姓均退聚城堡，军饷无处征敛，故唐军乏粮。李世民当即发布通告，号召百姓回归乡里，重整家园。百姓听到世民率军已至河东，纷纷归附，每天前来军营慰问和投军的络绎不绝。因此，唐军很快筹足了军粮。李世民在同江夏王李道宗商议策略时，曾询问说："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何如？"道宗回答说："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以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众，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世民说："汝意见暗与我合。"①统一认识后，世民遂下令休整士卒，秣养战马。偶尔派小股部队对敌人进行骚扰，大军则坚壁不出。因此，宋金刚部的兵势逐渐减弱。

武德二年（6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唐将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及唐俭和行军总管刘世让等率兵向盘踞夏县的吕崇茂发起进攻。在大兵压境之际，崇茂急忙向金刚求救。宋金刚立即派部将尉迟敬德和寻相率兵援救。

尉迟敬德为马邑善阳（今山西朔州）人。大业末年在高阳（今河北高阳东）入军，以骁勇著称。后归乡里。刘武周割据马邑后，敬德归附，被任为偏将。不久，又被调归宋金刚，随其南攻晋、浍。敬德作战勇猛，"善解避矟，每单骑入贼阵，贼矟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矟，还以刺之"②。因此，累立战功，甚得武周和金刚的器重。他与寻相率援军驰至夏县时，吕崇茂也率军从城内杀出，唐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孝基、怀恩、于筠、唐

① 《通典》卷一五五《兵典八·坚壁挫锐》。

②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俭及世让等均为敬德所俘。正当敬德和寻相率部从夏县返回浍州时，李世民在美良川（今山西闻喜南）设伏，进行截击，敬德猝不及防，被歼2000余人。不久，敬德和寻相又奉命率兵援蒲坂守将王行本。李世民亲帅步骑3000，在安邑（今山西运城东）阻击，宋军大败，敬德、寻相只身逃走，其余兵士全部被俘。这两次对敬德部的作战胜利，使唐军在柏壁与宋金刚部的对峙得以持续。

这时，唐军诸将都请求与宋金刚进行决战。李世民劝谕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扞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州治在今山西汾阳）、隰（州治在今山西隰县），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① 由于李世民对敌我双方的分析精当，策略正确，因而军心稳定，步调一致。

武德三年（620年）正月初，唐将秦武通率兵进攻蒲坂，王行本出战失利，被迫退守城内。在粮尽援绝时，行本企图突围逃走，但城内守军无人相从，行本只得开城投降。蒲坂王行本部的覆灭，消除了柏壁唐军的南面牵制。

二月六日，刘武周派兵南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相继攻占了长子（今属山西）、壶关（今属山西）等县。潞州刺史郭子武抵挡不住，唐将王行敏奉命援救。有人传言子武企图叛变投降，行敏将子武当即斩首，将头颅遍示全军，军心复振，接连多次打败了刘武周的进攻。

二月二十日，李渊又派将军桑显和率兵进攻夏县的吕崇茂，以期牵制宋金刚部的南面援军。

三月二日后，刘武周曾两次派兵进攻浩州，企图打通石州（治今山西离石）和汾州之间的通道，援助柏壁，但均被唐将李仲文部和行军副总管张纶部击败。三月二十一日，李、张二部又乘胜攻占石州，武周守将刘季真被迫投降。

四月十四日，宋金刚部在柏壁与唐军相持半年以后，终因军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十二月。

粮用尽，向北逃窜。

三、唐军追歼刘武周

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十四日，当宋金刚部北撤之时，李世民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率兵追击。四月二十一日，唐军在吕州（治今山西霍州）追及宋金刚的殿后军寻相部，大败其众。乘胜北上，昼夜兼行200余里，交战数十回合。唐军行至唐壁岭（今山西灵石东南）时，兵士饥渴困乏，疲惫不堪。行军总管刘弘基请求停止追击，等待粮饷。世民果断地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① 遂策马继续北进。唐军将士见主帅毫无止息之意，只得紧随其后，再也无人敢以饥饿为言。经过3天的紧急行军，终于在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部。接着，唐军又投入了激烈战斗。一日之中，交战8次，歼灭和俘虏敌军数万人。夜晚，唐军就露宿在雀鼠谷西原上。李世民和唐军将士接连两天从未进食，3天衣不解甲。当时，军中只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

四月二十三日，李世民率军抵达介休（今属山西）城下。宋金刚率残部2万多人在城西布阵，军阵南北长达7里。李世民先派部将李世勣② 率小部队在阵前挑战，宋金刚麾军出击，世勣即向后撤退。当宋金刚率兵离城追击时，李世民率精骑从宋军阵后杀出，金刚大败，被歼3000多人。金刚领轻骑逃奔太原，李世民率兵追赶。行至张难堡（今山西汾阳南），与唐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部相遇。堡中将士被刘武周部围攻多时，看到世民率部抵达，欢呼雀跃，立即献上浊酒、粟饭，款待唐军。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四月。

② 李世勣：原名徐世勣，为瓦岗军将领。李密降唐后，世勣亦归附唐朝，被高祖李渊赐国姓李氏，故又名李世勣。太宗逝世后称李勣。

金刚北逃以后，留部将尉迟敬德收集余部，据守介休。李世民派李道宗和宇文士及劝谕归降。敬德和寻相看到大势已去，只得出城归附，并献出介休和永安（今山西孝义东）二城。世民闻讯，兴奋异常，立即任敬德为一府统军，使其仍统率 8000 旧部，编制在唐军诸营之中。唐军诸将都对敬德的归降表示怀疑，甚至有人“请即杀之”。但李世民却深信不惑，并对众将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又对敬德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尉迟敬德见世民对他如此器重，便发誓“以身报恩”①。

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大败而归，惊恐不已，遂放弃太原，逃入突厥。宋金刚逃归太原后，企图收集余众，负隅顽抗。但部众军心已散，不肯相从。金刚无奈，亦带领百余骑逃奔突厥。李世民遂率军占领太原，河东州县也相继被唐军收复。不久，刘武周和宋金刚又企图背叛突厥，逃归马邑、上谷，先后被突厥所杀。

刘武周的覆灭和唐军的胜利并非偶然。首先，李渊晋阳起兵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当地百姓记忆犹新。李世民再次抵达河东后，“发教谕民”，故百姓“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但刘武周割据马邑后，却大肆“俘掠”，致使所经之地，“未有仓廪，人情恇扰，聚入城堡”②。唐朝收复河东州县后，“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颂扬李世民和唐军的胜利。这说明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其次，刘武周利用李元吉耽于畋猎、不设防务的弱点，虽相继攻占太原，南下河东，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由于他不善驾驭部下，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始则拒绝了苑君璋“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③ 的忠告，继则又发生了尉迟敬德和寻相的临阵倒戈。致使部众离心离德，政令不一。再加长驱南下后，军粮不继。这些都是刘武周部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最后，

①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武周传》。

李世民运筹帷幄，知彼知己，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屯兵柏壁，深沟高垒，拒不交战，以老敌军；敌军北逃时，又穷追猛打，不给敌军喘息之机，终于取得了全歼敌军和收复河东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不仅使秦晋连成一片，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地域，也为今后进一步平定北地和攻取中原扫清了道路。

第四节　决战中原

（参见附图 3）

隋将王世充于武德元年（618 年）在洛阳称帝建郑前后，曾击败了以李密为首的河南瓦岗军，相继占有了河南大多州县，成为中原地区最为强大的一个政治集团。武德三年（620 年）七月，唐军在平定了河东刘武周后，李渊又派李世民率主力 10 多万人东出潼关，同王世充集团展开中原决战。经过半年多的激烈战斗，唐军收复了河南地区的多数州县，歼灭了王世充的大量部队，将其包围于洛阳孤城之中。王世充在垂死之际派人向河北窦建德求救，建德倾全力赴援，又被李世民在虎牢生擒，河北起义军一朝瓦解。武德四年（621 年）五月，王世充在绝望之后，被迫出降。唐军赢得了统一战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一、李世民围困洛阳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满，原为西域胡人。后随祖父寓居新丰（今陕西临潼）。祖父死后，祖母改嫁霸城（今陕西西安东）王氏，遂冒姓王。隋炀帝大业初年，由兵部员外郎迁江都郡丞兼领江都宫监。由于他善于阿谀逢迎，取“媚于帝”，故得炀帝欢心，“每入言事，帝必称善”①。后又“委捕诸盗，所向辄定”，被炀帝“愈属信之”②。

① 《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

② 《新唐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大业十三年（617 年）七月，当河南瓦岗军在李密的率领下，歼灭了隋军主力张须陀部，攻占了河南地区的多数郡县，将炀帝之孙、越王杨侗所率的 20 万隋军围困在洛阳城中之时，隋炀帝遂派王世充率江淮精兵讨伐李密，援救东都。但世充在黑石（今河南巩义西南）、洛南等作战中，又连遭失败，只得率部退守洛阳。

武德元年（618 年）七月，王世充在洛阳城内发动政变，杀隋皇泰主杨侗的内史令元文都，控制了杨侗政权。嗣后又利用瓦岗军在和宇文化及部作战时，受到重创而未及休整之机，调集大军，向瓦岗军发动突然进攻。结果，李密率兵仓促迎战，被其击败，李密只身降唐，兵将损失殆尽。不久，占据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瓦岗军将领徐世勣亦相继降唐，瓦岗军遂告解体。河南州县大多为王世充占有。武德二年（619 年）四月，王世充废皇泰主杨侗，在洛阳称帝，建国号郑。同年十一月，击灭了宇文化及部的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部乘胜攻克黎阳。因此，在唐军击败河东刘武周后，控制河南的王世充和占领河北的窦建德遂成为山东地区最为强盛的两大势力。

王世充虽然在洛阳建郑称帝，成为中原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但其内部却很虚弱。这主要因为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又“性猜忌，喜信谗言”①。因此，他的将吏多有叛离。如骁将秦叔宝、程知节、李君羡、罗士信、席辩、杨虔安、李君义及豆卢达等先后降唐，骁将刘黑闼又投奔了河北窦建德。甚至还发生了郑国的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父子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长宇文温兄弟及散骑常侍崔德本等数十人“谋诛世充”的重大事件。这次事件虽因“事泄”② 而未果，但却说明王世充集团已陷入危机之中。王世充也自知“众心日离”，但却为了继续维持摇摇欲坠的郑国政权，便“峻其法”：下令洛阳城内如有一人逃亡，全家受戮，唯相互告发才可赦免；如全家逃亡，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

则诛及四邻。即使出城樵采，人数都要严加限制。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杀人益多而亡者益甚”①。为了防止出征将帅叛逃的现象继续发生，王世充把洛阳城内宫城变为监狱，把出征将帅的家属都投入狱中。由于叛逃的将帅与日俱增，故这座监狱的关押人数增至万人之多，每日因饥饿而死者就有数十。对此，高祖和李世民父子在歼灭刘武周后，于群雄割据之中，把王世充集团选作在潼关以东的第一个打击目标，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一日，李世民率7总管25将，10余万众从潼关东进，向洛阳推进。通过渭水、黄河漕运粮饷。第二天，突厥处罗可汗派兵南下，企图开赴洛阳，援助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奉命阻击，突厥骑兵大败而归，被缴获的牛羊万计。不久，李渊又派太子李建成率兵屯驻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南），保证东进唐军的侧翼安全；又令礼部尚书唐俭抵达并州，加强北线防务。

王世充听到唐军大举东进的消息后，当即调兵遣将，齐集洛阳。又设置四镇将军，率兵把守洛阳四面城门，大力加强洛阳防务。与此同时，又派魏王弘烈镇襄阳（今湖北襄樊），荆王行本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宋王泰钦镇怀州（治今河南沁阳）。王世充亲率左辅大将军杨公卿、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等内外军84府，共3万步骑，迎击唐军。

七月二十八日，唐将罗士信部率先包围了洛阳西面的军事重镇慈涧。王世充急忙率兵3万赶来援救。李世民率轻骑赶至阵前察看虚实，不料和王世充所率大军遭遇。由于众寡悬殊，李世民和所率轻骑很快陷入了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李世民拉弓劲射，郑军应弦而倒，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出，还擒获了世充的左建威将军燕琪。受此小挫后，王世充又匆忙撤退，并将慈涧的守军也全部调归洛阳。李世民遂指挥唐军分路向洛阳逼近：行军总管史万宝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三月。

部从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攻占龙门(今河南洛阳南),切断洛阳与南面襄阳的联系;将军刘德威率部翻越太行山,围攻怀州,隔断洛阳与北方和东面虎牢的联系;右武卫将军王君廓从洛口(今河南巩义东北),断绝王世充从洛口仓向洛阳的运粮通道;怀州总管黄君汉率部南下河阴(今河南孟津东),进攻回洛城(今河南偃师西北),断绝洛阳与东南交通。李世民率唐军主力,屯驻洛阳北面的北邙山上。诸路唐军营寨相接,逐渐形成对洛阳的包围态势。

武德三年(620年)八月九日,共州(治今河南辉县)县令唐纲和邓州(今属河南)土豪相继执杀窦建德和王世充所署刺史,举州降唐。

八月十四日,唐怀州总管黄君汉所率校尉张夜叉部乘舟沿河攻克回洛城,切断了河阳(今河南孟州南)桥上交通,收复了回洛城周30多个堡垒村落。王世充当即派其子玄应率杨公卿等部北上,企图夺取回洛,但久攻不克,只得在城西修筑月城,驻兵把守。

王世充陈兵于洛阳西北的青城宫,隔水与唐军主力对峙。他曾在阵前大声对世民说:"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世民派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皆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世充自知不是唐军对手,只得请求"息兵讲好",但却遭到严词拒绝。双方遂"各引兵还"①。

八月二十五日,翻越太行山的唐将刘德威部袭击怀州,攻入外郭,收复了城周不少堡垒村落。

九月十三日,王世充显州(治今河南泌阳)总管田瓒率所部25州降唐。于是,洛阳与郑将王弘烈镇守的襄阳间的交通完全断绝②。洛阳已陷入唐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九月十七日,李世民派右武卫将军王君廓从龙门攻占轘辕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八月。

② 时洛阳与襄阳间有两条道路可通:一是经邓州南阳,一是经显州,出蔡、汝2州。邓州已于武德三年八月九日降唐,此时显州又降,故襄阳与洛阳间交通完全隔绝。

（今河南登封西北），王世充当即遣将魏隐率兵援救。君廓假装逃遁，引诱魏隐追赶，途中设伏袭击，魏隐大败。君廓率部直追至管城（今河南郑州），收复了沿途许多州县。接着，王世充尉州（治今河南尉氏）刺史时德叡率所部杞（治今河南杞县）、夏（治今河南太康）、陈（治今河南淮阳）、随（今属湖北）、许（治今河南许昌）、颍（治今安徽阜阳）等7州降唐。世民下令：归降的王世充州县官继续留任，只是改尉州为南汴州，其余"无所变易"，"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①。

九月二十一日，李世民率500骑登上北邙山魏宣武帝景陵察看敌情，不料王世充率万骑突然赶到，将世民围在核心。郑将单雄信执槊向世民直刺，唐将尉迟敬德跃马大呼，驰入围中，将雄信刺落马下，世充军向后稍却，敬德趁机护卫世民冲出重围。接着，敬德又与世民率兵杀入敌阵，左突右冲，如入无人之境。正值屈突通率大军赶到，内外夹击，郑军大败，被歼千余人，冠军大将军陈智略被擒，王世充只身逃回。战后世民对敬德说："比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②

从武德三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相继降唐的王世充军将和地方州县官吏有张镇周、荥州（治今河南荥阳）刺史魏陆、阳城（今河南荥阳西南）县令王雄、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刺史王要汉等。由是，唐军打开了嵩山以南的道路。镇守虎牢的王世充长子玄应听到周围诸州皆叛的消息后，急忙从虎牢逃回洛阳。

十一月一日，李渊派金州（治今陕西安康）总管府司马李大亮率兵攻占襄阳樊城镇（今湖北襄樊北），并收复了附近14座城栅。二十九日，李大亮又相继攻取了王世充设置的沮（治今湖北南漳）、华（治今湖北宜城）2州。

十二月上旬，王世充的许、亳（今属安徽）等11州以及随州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九月。

②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今属湖北）总管徐毅等相继降唐。至此，河南地区的多数州县已为唐军所有，王世充仅能控制洛阳孤城。

王世充眼看大势已去，只得派人携带礼物到窦建德处乞求援兵，窦建德“许以赴援”①。

武德四年（621年）年初，王世充的梁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总管程嘉会又率部降唐。

正月下旬，李世民挑选1000多名精锐骑兵，均穿黑色铠甲，分为左右两队，分别由骁将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翟长孙率领。每次作战，李世民都率此精锐，冲锋在前，所向披靡，使敌军丧胆。

二月三日，王世充之子玄应率兵数千从虎牢向洛阳转运粮饷。李世民当即派部将李君羡率部截击，结果，大败其众，唐军缴获了全部辎重，玄应只身逃回洛阳。从此，洛阳的粮饷断绝。这时，李世民认为向王世充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宇文士及入京向高祖李渊请战。李渊当面指示说：“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②

二月十三日，李世民指挥唐军主力从北邙山南下，向王世充在青城宫布置的军阵逼近。但壁垒尚未修筑完毕，王世充即率众2万从禁苑方诸门北进，凭借门东故马坊的坚固垣堑，临谷水抗拒唐军。方诸门东位置高卬险要，易守难攻，故马坊的垣堑高大坚固，唐军将士都面有惧色。李世民经过对敌阵进行详细观察后，对左右诸将说：“贼势窘矣，悉众而出，徼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随即令屈突通率步兵5000，渡过谷水，向王世充发动攻击，并指示说：“兵交则纵烟。”③当烟火大作时，世民引大军南下，身先士卒，与屈突通合势力战。李世民欲知世充军阵厚薄，遂率数十骑冲入敌阵，直出阵后，所向披靡，杀伤甚众。但在混战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之中，世民与诸骑相失，被长堤所阻，只有将军丘行恭单骑跟随。王世充的数名骑将蜂拥而上，世民的坐骑被流矢射死，困在核心。危机时刻，丘行恭拨转马头，向驰近世民的骑将张弓疾射，箭无虚发，追兵稍退，但自己的坐骑也带箭负伤。行恭跳下马背，拔去箭矢，让世民乘坐，自己手执大刀，跳跃大呼，连斩数人，杀开一条血路，终于引世民冲出敌阵，与大军会合。后来，世民即帝位后，曾下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①，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之一——“飒露紫”，现藏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在唐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王世充亦率部拼死抵抗。先后 4 次散而复合，激战 3 个时辰，直至午时，才被迫撤回洛阳城中。李世民麾军追击，直抵洛阳城下，俘斩 7000 多人，并将洛阳团团包围。

第二天，王世充又率兵从洛阳城南右掖门移出，临洛水布阵。这时，原先被俘的唐将王怀文趁世充“引置左右”而未加防范之际，突然引槊行刺。由于世充身披重甲，枪槊“折不能入”，怀文被杀。接着，御史大夫郑颋又坚辞官职，削发为僧，世充大怒，将其斩首。从此，洛阳城内的人心更加离散。

二月二十二日，王世充的河阳（今河南孟州南）守将王泰弃城逃走，部将赵夐举城降唐。郑军别将单雄信、裴孝达与唐将王君廓在洛口（在今河南巩义东北洛水入黄河处）相持。李世民亲率步骑 5000 援助，雄信等闻讯当即向洛阳逃跑，君廓率众追击，郑军大败。

李世民打败洛口郑军后，又回师洛阳城北，指挥唐军向洛阳宫城发动进攻。城中严密守卫。所造“大炮”可抛起 50 斤重的石块，掷出 200 多步。“八弓弩箭”大如车轮，箭镞如同大斧，可射 500 多步。故唐军虽四面攻打，昼夜不息，但却连续 10 多天，久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九《丘和附子丘行恭传》。《全唐文》卷十《六马图赞》录有太宗赞文。

攻不克，伤亡与日俱增。王世充又加强内部防务，先后逮捕了13名打算翻城降唐的叛变将领。

但此时唐军将士也产生了厌战情绪，许多人都疲惫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求班师。李世民认为，唐军既已悉众而来，当一劳永逸。现在河南州县大多归附，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决不能弃之而去！于是他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① 又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入京，向高祖李渊陈说洛阳必克的有利形势，李渊表示赞同世民的决策。接着，世民又派人向王世充送去书信，劝其投降，世充拒而不答。

二月三十日，镇守虎牢的王世充部将沈悦派人向屯驻管城（今河南郑州）的唐将李世勣表示归降，并愿作内应。李世勣当即派守卫洛口的左卫将军王君廓连夜东进，袭击虎牢。在沈悦的策应下，一举攻拔，并俘获了王世充的荆王行本及长史戴胄。

武德四年（621年）三月中旬，李世民指挥唐军兵士在洛阳城周挖掘壕沟，修筑堡垒，断绝交通。洛阳城内粮饷匮乏，一匹绢只能买粟三升，10匹布仅购一升食盐，其余服饰珍玩，贱如粪土。后来，树皮草根都被食尽，老百姓只能"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②，因此，全都患上疾病，身体浮肿，死者相枕于道，由原来的3万多户锐减至300家。就连公卿贵族也都只能以糠菜充饥，尚书郎以下官员，多有冻饿而死者。王世充无计可施，只能焦急等待窦建德援救。

二、窦建德兵败虎牢

武德四年（621年）三月十六日，窦建德派其将范愿镇守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亲率精兵10万，援救洛阳。

早在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即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三月。

自称夏王以后不久，他就趁瓦岗军败亡之机，与唐军为争夺瓦岗军余部占有的黄河南北之地兵戎相见。第二年十月，窦建德倾军出动，相继攻占了相州（治今河南安阳）、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及黎阳等地，唐军被迫退回关中。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在洛阳建郑称帝的王世充又亲率大军进抵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兵锋直至黎阳城下，大有与窦建德交兵之势。这说明此时唐、郑、夏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武德三年七月，当李世民率军对洛阳发起进攻，李渊派人“连和”夏王时，窦建德既未答应，亦未拒绝，只是将俘获的李渊之妹同安公主送还长安而已。这说明此时窦建德对唐、郑交兵仍持观望态度。但到是年年底，当唐军节节胜利，世充连连败北，丢失了河南多数州县，只孤守洛阳一城，覆亡已成定局之时，窦建德这才感到“齿寒之忧”。于是，他便接受了中书舍人刘彬的建议，当即向王世充派来求救的使者答应“赴援”。同时，又派人来到唐营“请解世充之围”，企图“却唐全郑”，继续维持“鼎足相持之势”①。然后，待“唐师既退”之后，“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夏、郑）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②但李世民却将窦建德所派为世充说项的使者扣留“不答”，加之李渊又在窦建德率部渡河进攻曹州的农民起义军孟海公部时，派将军刘世让率兵从河东出土门（即井陉口，在今河北鹿泉西南），偷袭夏都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建德于武德二年十月由乐寿迁都于此），唐、郑关系遂告破裂。

武德四年（621年）三月中旬，窦建德在攻克曹州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俘获孟海公并收编其部后，遂征发曹州孟海公和兖州徐圆朗③等部农民起义军，率兵10万，从周桥西进，援救洛阳。

---

①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

③ 徐圆朗：隋末据兖州起义的农民军领袖。先附河南瓦岗军，李密败后，又归王世充。洛阳平定后，归唐，封兖州总管。后又随刘黑闼起兵，武德六年，为唐军所杀。

二十一日，进抵酸枣（今河南延津东），接着，又相继攻克管州（治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州）等地，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溯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今属江苏）行台王世辩派部将郭士衡带兵数千与建德会合，共10余万，号称30万，屯军于虎牢东原（即东广武，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上），与镇守虎牢的唐将王君廓部形成对峙态势。窦建德一面在板渚（位于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黄河侧）修筑宫室，一面派人入洛阳，向王世充通报。

在洛阳久攻不克，窦建德又率军援救的形势之下，唐军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对此，李世民曾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刺史郭孝恪和记室薛收等人认为，王世充虽据守洛阳，将士精锐，但眼下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粮食。因此，在我军包围之下，已陷入“求战不得，守则难久”的困境。现在，窦建德亲率大军，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不容忽视。但如果因此退却，使郑、夏联合，以河北粮饷供应洛阳，就会拖延战事，偃兵息武，统一天下的时日就会遥遥无期。因此，他们主张采用围城打援的策略：即以唐军主力继续围攻洛阳，深沟高垒，拒不交战；由秦王世民率领精锐，东进虎牢，休整士卒。然后，以逸待劳，伺机进攻，定会击败建德。建德被破，世充可不攻而下，不出二旬，郑、夏二主必然“面缚麾下”①。但萧瑀、屈突通和封德彝等人却认为，唐军已经疲惫思归，王世充据守坚城，不易攻克，窦建德又驱大军援救，势不可当。我军如继续围城，将会腹背受敌，这决非上策。因此，他们主张“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当即表示赞同郭、薛建议，并强调说，王世充连吃败仗，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窦建德刚刚击败孟海公，将士骄惰，我军如据守虎牢，扼其咽喉，建德要是冒险进攻，我军必会容易取胜。建德要是狐疑不战，不出一月，世充必定不攻自

---

① 参看《旧唐书》卷七十三《薛收传》、《旧唐书》卷八十三《郭孝恪传》。

溃。那时，我军获城破之胜，气势倍增，必会一举两克。如不迅速东进，建德攻破虎牢，最近归附的诸多州县，就会得而复失。那时，“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① 定下决心后，他调兵遣将，派屈突通等协助齐王元吉继续包围洛阳，自己亲率骁勇 3500 人东趋虎牢。当时，正值白昼出兵，经北邙，历河阳，大张旗鼓向巩（在洛阳东 110 里处）地挺进。王世充登城而望，猜不出唐军去向，竟不敢出兵。

三月二十五日，李世民率部抵达虎牢。第二天，李世民为了试探敌军虚实，亲帅 500 精骑，由虎牢东行，向敌营逼近。沿途设置数处伏兵，令李世勣、程知节和秦叔宝分别统领。最后仅留尉迟敬德等 4 名骑将与之同行。当行至距建德军营 3 里处时，与建德派出的流动哨兵相遇。世民有意暴露自己，并引弓射杀了一名敌骑。建德军中闻讯大惊，立即出动五六千骑追赶。世民指示另外两名骑将先行，自己与尉迟敬德殿后，“按辔徐行”。当追兵被诱入埋伏圈后，李世勣等率唐军突然杀出，歼敌 300 多，并俘获了敌将殷秋、石瓒，凯旋而归。接着，世民又致书建德，陈说利害，冀其退兵。

窦建德在虎牢被唐军阻击月余，不得西进。几次小的战斗又均遭失败，将士疲惫思归。

四月三十日，李世民又派王君廓率轻骑千余偷袭夏军粮道，并俘获了夏军将领张青特，更使夏军军心动摇。这时，夏国的国子祭酒凌敬劝建德率军渡过黄河，攻取怀州、河阳，然后，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治），占领汾、晋，进军蒲津。并说，这样做有 3 个好处：一则入空虚之地，可保全胜；二则拓地收众，增强兵力；三则关中震惊，洛阳之围自解。建德的妻子曹氏也赞同此议，主张从滏口（今河北武安南）翻越太行山，攻占山北州县，又连接突厥抄掠关中，唐军必回师自救，郑围自解。并说：“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② 但窦建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四月。

德却认为洛阳危在旦夕，如不立即援救，而舍之北去，是胆怯失信，故拒而不纳。再加之世充派来的使者，早晚都来痛哭求救，又暗中贿赂建德部将，使其阻挠采纳凌敬和曹氏的建议。于是，建德在众将的怂恿下，决定“进逼虎牢”①。

不久，唐军得到情报说：窦建德将乘唐军饲料用尽，在黄河北岸牧马之际，袭击虎牢。武德四年（621年）五月一日，李世民北渡黄河，南临广武（即西广武，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上），侦察敌情。最后决定，将计就计，故意留马千匹在河渚之上，引诱敌军出击。第二天，窦建德果然全军出动，北倚黄河，南连鹊山，在汜水东岸南北宽20多里的宽阔地带布置军阵。王世充的部将郭士衡也率部在窦军之南布阵，“绵亘数里”，大肆“鼓噪”②，以壮声威。面对强敌压境，唐将皆惧。李世民率数骑登高瞭望后，对众将说，窦建德兴起山东，从未参与大战，现在冒险喧嚣，是无纪律，逼城布阵，有傲视之心；我军按兵不出，敌军勇气自衰，待其士卒饥疲，必将自退之时，我军乘而出击，必胜无疑。并对诸将发誓说：“甫过日中，必破之矣！”③因此，他一面严阵以待，尽管建德多次派兵挑战，他拒不出击。另一方面又派人召回留在河渚的战马，准备参加总攻。

窦建德从辰时布阵，到午时已历3个时辰，士卒饥渴困倦，有的席地而坐，有的争抢饮水，有的准备退却。世民看到决战的时刻已经来到，便命令宇文士及率300余骑从建德军阵西面驰向阵南，进行试探性攻击。并告诫说：如敌阵不动，应立即退回，如阵势移动，则引兵向阵东进发。宇文士及率部驰至建德阵前，夏军果然骚动。这时，河渚的战马亦至，世民立即下令唐军全线出击。他亲率轻骑首先冲出，唐军主力紧随其后，东渡汜水，直向夏军阵前杀来。窦建德正要召集群臣议事，唐军突然杀来，使其

---

①《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②《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五月。

乱作一团。致使匆忙奔向建德处躲避的群臣，阻塞了夏军骑兵的道路。窦建德在宫室前面挥手让群臣后退，使骑兵出拒唐军。但进退之间，唐兵已至。窦建德大惊失色，慌忙向东陂撤退。唐将窦抗率部紧追，夏军拼死抵抗，"战小不利"。世民所率骑兵接阵冲击，所向披靡。淮阳王李道玄挺身陷阵，直出敌后，又突阵而归，往来两次，飞矢集身，状若猬毛，而勇气不衰，张弓劲射，敌军皆应弦而倒。其余将士，亦奋勇向前，喊声大作，尘埃蔽天。世民率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在激战之中，直穿敌后，在夏军阵后打起了唐军旗帜。夏军将士望见阵后唐旗，遂全线崩溃，向西撤退，唐军追击 30 多里，歼敌 3000。窦建德身中数创，逃至牛口渚，被唐将俘获。夏军见主帅被擒，相继投降的有 5 万多人，世民将其全部遣归乡里。只有窦建德之妻曹氏率数百骑逃回洺州。虎牢之战就这样以唐军的胜利和夏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三、王世充不战而降

虎牢决战结束后，李世民率得胜之师回到洛阳城下，继续围攻王世充。沿途的偃师（今河南偃师东）、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北）以及洛阳故城（在今洛阳东洛水北岸）的王世充守将纷纷投降。李世民将俘获的窦建德和王世充的部将郭士衡等带至洛阳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与建德哭泣而语。王世充在绝望之余，向诸将提议突围而出，南走襄阳。但却遭到诸将的一致反对，他们说："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为擒，虽得出，终必无成。"① 王世充在突围无望、守城不得的形势下，遂于五月九日出城投降。第二天，世民率军进入洛阳，严令守护街市，维持治安，秋毫无犯。又封存府库，将金帛财物分赏有功将士。只将王世充党羽中的段达、王隆、单雄信、郭士衡等 10 多人斩于洛水之上，其余不戮一人。后来，窦建德被送斩长安，王世充也在徙蜀途中被仇家所杀。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五月。

唐军从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挺进中原，到武德四年（621年）五月进入洛阳，接连取得了全歼窦建德和王世充两大政治集团的胜利，这首先应该归功于秦王李世民等人的正确决策。在围攻洛阳的会战进入相持、唐军将士疲惫思归的紧要时刻，李世民经过对敌军弱点的正确分析，果断地作出了继续围城的决定，从而统一了思想，鼓舞了士气，为后来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当洛阳久攻不克，夏军又大举增援，唐军将士产生了畏怯退却的念头后，李世民又毅然决然采纳了郭孝恪和薛收的建议，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终于取得了一举两克的重要胜利。其次，当围攻洛阳的会战打响以后，唐高祖李渊始则派太子建成屯兵蒲州，防卫突厥南侵和并州总管李仲文的叛变，保证了唐军主力的侧翼安全；继则又不断派出小部队进攻洛阳周围州县，牵制了王世充的增援部队，减少了唐军主力的四面压力。这些对唐军兵力的正确部署，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围攻洛阳和虎牢决战是唐朝统一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次会战。因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是当时两个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他们的相继覆灭，不仅使唐朝占有了富庶的关东地区，增强了经济实力，而且歼灭了两个最为棘手的竞争对象，这就为唐朝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节　进军河北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以后，建德部将刘黑闼又再次起兵反唐。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战斗，这股势力于武德六年（623年）正月终被平定。

一、刘黑闼起兵反唐

刘黑闼是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南）人，与同乡窦建德关系“友善”，并经常得其资助。隋末曾先后随郝孝德、李密起义。李密败后，为王世充所俘，被任为骑将。又因“窃笑”世充“所

为”，遂“亡归建德”①，被窦建德封为汉东郡公。建德败后，逃匿乡里，闭门不出。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下旬，唐洺州刺史李君实以及唐将秦武通等在追索窦建德的部众所藏匿的财物时，或“以法绳之，或加捶挞”，致使这些将领“惊惧不安”②，遂思作乱。不久，唐高祖李渊又诏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高雅贤等入京，使其更加恐慌。于是，他们遂以为建德“报仇”为名，推举刘黑闼为首领，起兵反唐。七月十九日，黑闼率众一举攻占了漳南县城。李渊闻讯，当即置山东道行台于洺州，又于魏（治今河北大名北）、冀（治今河北冀州）、定（治今河北定州）、沧（治今河北沧州东南）4州并置总管府，加强河北防务。二十二日，又以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专责征讨刘黑闼事宜。

八月十二日，刘黑闼率众南下，攻克鄃县（今山东夏津），击杀唐魏州刺史权威和贝州刺史戴元祥，众至2000，黑闼自称大将军。李渊急忙从关中发步骑3000赴援，又令驻洺州唐将秦武通、定州总管李玄通以及幽州（治今北京西南）总管罗艺③率部联合讨伐黑闼。

八月二十二日，黑闼又率众攻克历亭（今山东武城东北），执杀唐屯卫将军王行敏。二十六日，唐兖州总管、原王世充部将徐圆朗据州叛乱，囚捕唐将盛彦师，响应黑闼，被任为大行台元帅。于是，兖、郓（治今山东东平西北）、陈（治今河南淮阳）、杞、伊（治今河南临汝）、洛（治今河南洛阳）、曹（治今山东定陶）、戴等8州豪强皆举兵响应。不久，窦建德部将崔元逊亦执杀唐深州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闼传》。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武德二年十一月载："世充使黑闼守新乡，李世勣击虏之，献于建德。"《新唐书》卷八十六《刘黑闼传》所载与此略同。今从旧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七月。

③ 罗艺：隋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隋末起兵，自称幽州总管。武德元年归唐，赐姓李，封燕郡王。贞观元年率兵反唐，被击溃，为部下所杀。

（今属河北）刺史裴晞，响应黑闼。

武德四年（621 年）九月底，淮安王李神通率关中步骑抵达冀州，与罗艺部会合，又发邢（治今河北邢台）、洺、相（治今河南安阳）、魏、恒（治今河北正定）、赵（治今河北赵县）诸州兵，共 5 万余众，在饶阳（今属河北）城南布阵 10 余里，罗艺率部居于阵西，东西相连，互为犄角，与黑闼交战。刘黑闼所部兵少，仅依河堤单行布阵相迎。正值风雪大作，神通乘风向黑闼发起进攻，兵才相接，突然风向改变，唐军为风雪所蔽，因而大败，士马军资损失大半。西翼罗艺部亦先胜后败，只得从藁城（今属河北）退回幽州。黑闼“兵势大振”①。

十月六日，黑闼又率众北上，攻陷瀛州（治今河北河间）。不久，唐观州（治今河北泊头东）、毛州（治今河北馆陶）土豪相继执杀刺史，响应黑闼。

十一月十九日，黑闼率众又从瀛州西进，攻克定州，执总管李玄通，玄通自刺身亡。黑闼又与叛唐自立的蔚州（治今河北蔚县）总管高开道② 及突厥骑兵遥相呼应，恒、定、幽、易（治今河北易县）诸州“咸被其患”③。

十二月三日，黑闼又挥师南下，攻克冀州，击杀刺史麴稜。八日，又向宗城（今河北威县东）推进。驻守宗城的唐黎州（治今河南浚县）总管李世勣抵挡不住，逃奔洺州。十二日，黑闼率部追击，唐军大败，损失兵士 5000 多人。此后，刘黑闼长驱南下，相继攻占洺州、相州、卫州（治今河南卫辉）、魏州、莘州（治今山东莘县）、黎州等。不久，又回师北上，相继攻陷邢州、赵州。武德五年（622 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定都洺州。“半岁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九月。

② 高开道：隋沧州阳信（今山东阳信南）人。隋末从豆子蚢（在今山东惠民）格谦起义。后称燕王，建都渔阳（今天津蓟县）。武德三年归唐，被任蔚州总管。此时又叛，复称燕王。后被叛将张金树所逼，自杀。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

之间，尽复建德旧境。”① 唐将李世勣、秦武通和洺州刺史陈君实等先后率唐军从河北撤回关中。

二、李世民督军击败刘黑闼

在刘黑闼攻占河北，窥视中原及威胁关中的严峻时刻，李世民自请率兵征讨。武德四年（621 年）十二月十五日，唐高祖遂命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讨伐黑闼。

武德五年(622 年)正月八日，李世民率军抵达获嘉(今属河南)。黑闼闻讯，放弃相州，退保洺州。世民率部北上，于十四日进据相州治所安阳(今属河南)。接着，又经肥乡(今属河北)，在洺水南岸布阵，进逼洺州。唐幽州总管罗艺奉命率部南下，与世民夹攻黑闼。正月二十七日，黑闼派部将范愿领万人留守洺州，自己率大军北上，阻击罗艺。当晚，宿于沙河(今河北沙河北)。李世民派部将程名振率兵载鼓 60 具，在洺州城西 2 里的河堤上击鼓，鼓声大作，洺州城内地动屋摇，范愿以为唐军将要攻城，派人驰告黑闼，黑闼立即返回，派其弟十善与部将张君立带兵一万，北进鼓城(今河北晋州)。正月三十日，与罗艺部在徐河(即今河北保定北漕河)遭遇。经过激战，十善、君立大败，被歼 8000 余人。罗艺乘胜追击，相继攻占定、栾(治今河北栾城县西)、廉(治今河北藁城)、赵等 4 州之地，率部进至洺州之北，与李世民部对洺州形成夹击态势。不久，洺水(今河北曲周东南)人李去惑据城降唐，李世民当即派唐将王君廓率 1500 骑兵进入洺水，与李去惑共同守城。洺州陷入唐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刘黑闼为了打开通向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的东面道路，遂率兵向洺水进攻。二月十一日，行至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被唐将秦叔宝击败，只得退回洺州。不久，刘黑闼再次急攻洺水。但洺水城池坚固，城宽 50 多步，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黑闼于城东北挖掘两条甬道，作为攻城道路。李世民 3 次率兵援救，均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二月。

遭到黑闼阻击，不能接近洺水。世民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年仅20岁的罗士信请求代替君廓守城。世民应允，便登上城南高冢，用旗召唤君廓。君廓率城内守军奋力突围，士信乘机率200兵士冲入城内，代君廓固守。黑闼指挥兵士昼夜攻打，正值天降大雪，唐军不能援救。士信坚守8日，至二月二十五日，洺水城陷，士信被杀。四天以后，世民乘天晴雪霁之机，指挥唐军奋力攻城，终于占领洺水，黑闼被迫退回洺州。世民遂于洺水南北布阵，与洺州相持。黑闼虽多次在阵前挑战，唐军只是坚壁不出。不久，洺州城内乏粮，黑闼遂派兵从冀、贝、沧、瀛诸州运输粮饷，水陆俱进。唐将程名振率部千余人断其粮道，"沉其舟，焚其车"①。

唐军与黑闼在洺州相持60多天，世民估计黑闼粮尽，必来决战，便派兵士在洺水上游修堤筑堰，堵截水流，并对守堤将士说：等我军与敌交战之时，决堤放水。

三月二十六日，洺州粮尽，黑闼帅步骑2万，南渡洺水，向唐营进攻。李世民亲带精骑迎战，击退黑闼骑兵，又乘胜冲击步兵。黑闼率众拼死抵挡，从正午直战至黄昏，黑闼兵势渐弱，抵挡不住。遂与部将王小胡等向北逃遁，余众不知，犹在格斗。这时，守堤唐军决开堤堰，洺水大至，深达丈余，黑闼部众大溃，被歼万人，溺死者数千人，黑闼仅与范愿等二百余骑逃奔突厥，于是，"山东平，秦王还。"②

三、李建成率部歼灭刘黑闼

刘黑闼率残部北入突厥后，又于武德五年（622年）六月初，招引突厥骑兵，大肆进犯河北。七月八日，抵达定州。其亡命鲜虞（今河北定州）的故将曹湛、董康买等，又聚兵响应。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数十万，大举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三月。

② 《新唐书》卷八十六《刘黑闼传》。

入侵并州、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① 唐高祖一面调大军抵御，一面派太常卿郑元琦前往说和。这时，河北空虚，刘黑闼乘机南下，相继攻陷瀛州、东盐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贝州、冀州等，打败了留守河北的齐王李元吉部、淮阳王李道玄和洺州总管、卢江王李瑗部。“由是，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闼，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洺州”②。

这时，太子李建成同其四弟齐王李元吉与秦王世民之间的裂痕已经显露。太子僚属王珪和魏徵乘机对太子说：“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③ 于是建成请行，李渊应允。武德五年(622 年)十一月七日，李渊遂派建成率关中兵北征，又令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和河南、河北诸州皆受其指挥。

这时，河北地区自相州以北均归附黑闼，只有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贵乡（魏州治所，今河北大名北），拼死据守。齐王元吉退守昌乐（今河南南乐）。刘黑闼曾多次率兵向贵乡发起进攻，企图拔除这一据点，但均遭失败。

十二月十八日，太子建成率军抵达昌乐，与齐王元吉会合。黑闼当即引兵相拒，但因士卒疲惫，虽两次布阵，均“不战而罢”④。相持之际，魏徵向建成建言：前次击败黑闼，其将帅均悬名处死，妻、子囚虏；故齐王这次到来，虽有诏书赦其罪行，但并未取信。现在应全部释放在押眷属，对他们厚加慰谕，则可坐视其分崩离散！建成采纳了这一建议。不久，果然奏效，再加上黑闼的军饷已经用尽，于是，众多逃亡，有的还绑架首领前来归降。刘黑闼恐怕洺州城内叛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八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闼传》。

③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

兵杀出，与唐军南北夹击，遂连夜率兵北撤。当逃至馆陶(今属河北)，永济渠① 上的桥梁未成，被阻渠南。十二月二十五日，建成和元吉率唐军亦至。黑闼派部将王小胡率兵背水而阵，自己督兵修桥。桥刚修成，黑闼率部过桥后，兵众大溃，纷纷弃仗投降。唐军追兵仅过 1000 多骑，桥又毁坏，故黑闼得与数百骑逃脱。李建成只得令骑将刘弘基率过桥的 1000 骑兵继续追赶。黑闼在唐军的追击下，昼夜兼行，于武德六年(623 年)正月初三逃至饶阳。黑闼所属饶阳刺史诸葛德威将其骗入城中，举城降唐，将黑闼等绑送建成。建成将黑闼及其弟十善斩于洺州。至此，刘黑闼的再次起兵被彻底平定。同年二月，割据兖州的叛将徐圆朗部也被唐军围困城中，圆朗穷蹙无望，弃城逃跑，途中被杀。于是，河南、河北之地又归统一。

第六节　收复江南

唐朝建立以后，江南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之中。军阀萧铣盘踞两湖，称帝建梁；农民起义军首领林士弘也在豫章建立楚国，淹有岭南；江淮起义军也在辅公祏的率领下，举起了反唐旗帜。武德二年（619 年）二月，唐军在击灭了金城薛举、薛仁杲父子以后，李渊遂派大将李孝恭和李靖率众经略江南。经过峡州和江陵之战，于武德四年（621 年）十月，萧铣败灭；次年十月，林士弘覆亡，岭南大定；武德七年（624 年）三月，辅公祏亦被镇压。至此，唐朝的统一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重归统一。

一、平定两湖萧铣

（参见附图 4）

（一）峡州之战

---

① 永济渠：隋炀帝大业四年(608 年)所修运河。引沁水南下，达于黄河，又北通涿郡(今北京市西南)。流经汲县、黎阳、馆陶、清河等地。

峡州之战是唐军与军阀萧铣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作战。

萧铣是后梁① 宣帝萧詧曾孙，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隋炀帝大业初年任罗县（今湖南汨罗北）令。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萧铣乘天下大乱之机，纠集隋朝官吏董景珍、雷世猛、郑文秀、许立彻、万瓒、徐德基、郭华、张绣等，在巴陵（郡治在今湖南岳阳）起兵割据，自称梁王。义宁二年（618年）四月，萧铣即帝位，建国号梁。接着，遂率兵攻占南郡（治今湖北荆州江陵），徙都江陵（今属湖北荆州）。不久，又派张绣率兵进军岭南，收降隋将张镇周、王仁寿诸部。钦州（治今广西钦州东北）刺史宁长真以郁林（今广西贵港）、始安（今广西桂林）之地归附，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太守丘和亦举郡投降。于是，"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② 遂成为长江中游实力最强的一支割据势力。

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十四日，隋夷陵郡（治今湖北宜昌）丞许绍帅黔安（治今四川彭水）、澧阳（治今湖南澧县东南）等诸郡降唐，李渊诏令许绍为峡州刺史，赐爵安陆公。与此同时，高祖李渊又以左光禄大夫、山南道招慰大使李孝恭为信州（治今重庆奉节东）总管，督开府将军李靖，与许绍合兵讨伐萧铣。

峡州治所夷陵位于长江北岸，"距三峡之口，介重湖之尾"，州西25里又有长20里的西陵峡，两岸石壁千仞，为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重险之一，是江陵西面的重要屏障。为了消除西面威胁，武德二年（619年）九月，萧铣派部将杨道生率众从陆路进攻峡州，被许绍击败，道生大败而归。接着，又派部将陈普环率水军溯江西上，企图渡过三峡，攻占巴蜀（今陕南、川北、重庆一带），对峡州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许绍闻讯后，遂派其子智仁及部将李弘节率水军追击，将其击败，普环被擒。在接连两次进攻峡州均遭失败

---

① 后梁：南北朝时萧氏在江陵建立的割据政权。为西魏、北周附庸。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为隋所灭。立国33年，历萧詧、萧岿、萧琮三帝。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

以后，萧铣遂派兵驻守长江南岸的安蜀城(今湖北宜昌南长江对岸)和荆门城(安蜀城稍东)①，与峡州成南北对峙态势。

这时，唐将李靖亦从金州（今陕西安康）率部经夔州、归州抵达峡州。由于被萧铣大军所阻，久不得进。李渊怒其滞留，暗中下敕许绍将其处斩。但许绍“惜其才，为之请命，于是获免”②。

武德三年(620年)仲冬，当李世民率领唐军正在围攻洛阳王世充时，萧铣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分裂：即萧铣的心腹将领董景珍于十一月五日举长沙(今属湖南)降唐。李渊当即派峡州刺史许绍带兵接应。萧梁内部的这次重大分裂，是由萧铣的“褊狭”和“猜忌”引起的。原来萧铣建梁以后，拥戴他的部将“恃功恣横，好专诛杀”，不服调遣的现象屡有发生。为了制止这种现象滋生蔓延，萧铣便以“罢兵营农”为名，企图借此剥夺诸将军权。于是大司马董景珍之弟便心生“怨望，谋作乱”，但因“事泄，伏诛”③。当时，董景珍正驻守长沙，萧铣又派人召其返回江陵。景珍大惧，遂举城降唐。萧铣闻讯，立即派部将张绣率兵南下，将长沙团团围定。景珍打算突围而出，但被部下所杀，张绣遂平长沙。不久，张绣“恃勋骄慢，专恣弄权”，萧铣又将其处死。此后，萧铣肆无忌惮，大杀将帅，致使叛逃者与日俱增，“铣不能复制，以故兵势益弱。”④

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十四日，唐峡州刺史许绍乘萧铣内部动荡之际，率军南下，横渡长江，攻占荆门，将萧铣部队全部逐出峡州境内。唐军首战告捷，萧铣被迫将部众撤至南郡境内。

（二）江陵决战

武德四年（621年）二月初，唐将李靖向信州总管李孝恭献攻

---

① 安蜀城和荆门城：据《旧唐书》卷五十九《许绍传》载：“江南岸有安蜀城，与峡州相对，次东有荆门城，皆险峻，铣并以兵镇守。”故其当在峡州之南。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

④ 《旧唐书》卷五十六《萧铣传》。

取萧铣10策，孝恭当即派人送往长安。李渊接视李靖所献10策后，表示首肯，遂改信州为夔州，以孝恭为总管，“使大造舟舰，习水战”①。又以孝恭缺乏实战经验，令李靖为行军总管兼孝恭长史，主持军务。李靖遂向孝恭建议广召巴蜀酋长子弟，引置左右，消除唐军后顾之忧，且迅速壮大了唐军兵力。

武德四年八月，李世民所率唐军平定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政治集团以后，李渊认为向萧铣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以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统12总管，发巴蜀之兵，自夔州沿江东下；以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督军由郢州（治今湖北京山）南下；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治今湖南沅陵）道，黄州（治今湖北新洲）总管周法明出夏口（今湖北汉口）道，由东西南北四面向江陵进攻，讨伐萧铣。

九月，当孝恭率部从夔州出发时，正值长江三峡水涨，波涛汹涌，船行险阻，众将都请俟水落后进军，但李靖却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②孝恭从之，遂乘险东渡三峡，抵达夷陵。萧铣闻讯，急忙派部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驻清江(今湖北宜都东清江入长江处)抵抗。十月九日，唐军进至清江城下，文士弘率兵出战，一触即溃，唐军获战船300，歼敌万计，并乘胜追至百里洲(今湖北枝江东南江中)③，控制了南江江面，士弘进入北江，形成南北相持局面。孝恭打算立即出兵北攻士弘，李靖劝阻说：“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③ 百里洲：长江出今湖北枝江东南后分流，自北向东者为长江干流，自南向东者为南江(今松滋河)。百里洲为长江干流和松滋河之间陆洲。

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①孝恭不从，遂留李靖守营，自率精锐出击，果然败走，退回南岸，将大量军资器仗弃于百里洲中。士弘部众纷纷离舟上岸，抢夺唐军辎重，“人皆负重”。李靖看到士弘部众大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追至江陵城下。

萧铣自从实行“罢兵营农”政策以后，身边的统兵将帅已被黜杀殆尽，仅留宿卫兵士数千人。当他听说唐军已兵临城下，士弘连遭失败，恐惧至极，急忙把全部兵众调出抵抗，又派人在江、岭之外，仓促征兵。但因道路遥远，援兵不能迅速到达。李孝恭和李靖乘机指挥唐军攻城，很快就进入外廓，又攻占水城，缴获了大量战舰。李靖建议将这些船舰全部散置江中，众将大惑不解，均表示反对。李靖解释说，萧铣的地域广大，南至岭表，东距洞庭。而我军孤立深入，独自作战，如江陵未下，援军四集，我军就会四面受敌，那时进退维谷，虽获船舰，有何用处？现在将这些船舰散置江中，使其塞江而下，萧铣援军见此，必谓江陵已破，不敢轻进，往来打探，拖延二三十天，我军必定攻占江陵。众将听命。形势发展果如李靖所料，萧铣援军看见塞江而下的船舰后，以为江陵失陷，遂停止前进。

江陵被围，援军不至，萧铣内外隔绝，计无所出。于十月二十一日，被迫出城投降，唐军进入江陵后，严明军纪，“城中安堵，秋毫无犯。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②。萧铣降后数日，援军先后抵达江陵的有 10 多万，听说江陵已经陷落，全部缴械投降。

萧铣从大业十三年（617 年）割据江陵，到武德四年（621 年）投降，前后历时五年而亡。

二、抚定岭南

萧铣败降后，李渊改南郡为荆州，以孝恭为总管。又拜李靖为上柱国，赐爵永康县公，使其安抚岭南，并得承制授官。这时，早先被萧铣派往岭南略地的黄门侍郎刘洎听到江陵陷落的消息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月。

后；即以所得端（州治在今广东肇庆）、康（州治在今广东德庆）、封（州治在今广东封开）、新（州治在今广东新兴）、宋（州治在今广东四会）、泷（州治在今广东罗定东南）6州50余城降唐，被授南康州（治今广东德庆）都督府长史，统领上述6州之地。

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九日，李靖率兵度过岭南，遣使分道招抚诸州，所到之处，无不归附。萧铣的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总管李袭志率先归降，被孝恭授为桂州总管，于次年征入长安，拜柱国将军。

武德五年（622年）正月，李渊又以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兼桂州总管，率兵继续南下。二十七日，俚族① 酋长杨世略以循（治今广东惠州）、潮（治所今属广东）二州之地归降；李靖又派使者说降了泉（治今福建福州）、睦（治今浙江建德东）、建（治今福建建瓯）3州之地。

三月二十三日，隋交趾太守丘和听说李靖度岭后，派司马高士廉奉表至长安，请求归附，李渊遂以丘和为交州总管。不久，隋鸿胪卿宁长真又以宁越（郡治在今广西钦州）、郁林二郡归降，李靖承制以长真为钦州（今属广西）总管。通向交（州治在今越南河内）、爱（州治在今越南清化）2州的道路至此开通。

四月二十七日，广州（今属广东）农民军首领邓文进、隋合浦（郡治在今广西合浦东北）太守宁宣和日南（郡治在今越南荣市）太守李晙同来归降。

七月十八日，隋汉阳太守冯盎接到李靖安抚岭南的檄文后，集众商议。有人劝其仿效赵佗②，自称南越王，割据岭南。但冯盎说：

---

① 俚族：古族名。亦作“里人”。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主要分布于今广东西南沿海及广西东南一带。

② 赵佗（？～前137）：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时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为南海尉。秦末兼并桂林、南海和象三郡之地，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受封南越王。吕后时，自称南越武帝，发兵进攻长沙。景帝时归附。

“吾家居此五世矣，为牧伯者不出吾门，富贵极矣。常惧不克负荷，为先人羞，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① 遂率部归降。李靖以其地置高（州治在今广东高州东北）、罗（州治在今广东廉江东北）、春（州治在今广东阳春）、白（州治在今广西博白）、崖（州治在今海南琼山东南）、儋（州治在今海南儋州西北）、林（州治在今广西桂平）、振（州治在今海南三亚）8州，并封冯盎为高州（治今广东高州东北）总管，耿国公。至此，岭南96州之地全部平定。

三、进攻江西林士弘

林士弘，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在河南瓦岗军和江淮起义军蓬勃发展之际，士弘追随同乡操师乞②聚众起义，并一举攻占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师乞自号元兴王，建元始兴，以士弘为大将军。炀帝派隋将刘子翊统兵征讨，师乞在作战中负箭身亡，士弘继统其众，与子翊部战于彭蠡湖（即今鄱阳湖），隋军大败，子翊被杀。士弘声望大震，众至10多万。

大业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林士弘在豫章称帝，国号楚，建元太平。不久，又派兵攻占九江（今属江西）、临川（今属江西）、南康（郡治在今江西赣州）、宜春（郡治在今江西宜春东）等郡，这些地方的“豪杰”争杀隋朝官吏，以郡县响应。于是，“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为所有。”③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方与（今山东鱼台北）农民军首领张善安率部攻破庐江郡（治今安徽合肥）后，渡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七月。

② 操师乞：《隋书》卷四《炀帝纪》作“操天成”。今从新旧《唐书·林士弘传》及《资治通鉴》。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二月。《旧唐书》卷五十六《李子通附林士弘传》系士弘称帝、拓地事于大业十三年。今从《资治通鉴》。

江南下，抵达豫章城下，向林士弘请降，士弘狐疑不定，未予接纳，只是将其安置在城东南塘之上。善安大怒，遂率兵攻城，并放火焚烧了豫章外城。士弘退居南康（今属江西）。不久，萧铣又派部将苏胡儿攻占豫章，士弘再退余干（今属江西）。这时，士弘仅有南昌（治今江西永修西北）、虔（治今江西赣州）、循、潮数州之地。武德四年（621年）十月，江陵被唐军攻占后，萧铣的失散将士大多归附士弘，“士弘复振”①。

武德五年（622年）二月，农民军首领张善安部举虔、吉（治今江西吉安）等5州之地降唐，被拜洪州（治今江西南昌）总管。不久，循、潮2州亦归附唐朝。

武德五年十月中旬，林士弘派其弟药师率部进攻循州，被唐循州刺史杨略击败，药师被杀。不久，士弘部将王戎又以南昌州（治今江西永修西北）降唐，被拜该州刺史。

十月二十一日，林士弘在土地日削、势力锐减的困境中，从余干惧而南逃，藏匿在吉州安城（今江西安福）的一个山洞中。袁州（治今江西宜春）的部分豪强聚众响应，企图推举士弘东山再起。业已降唐的南昌州刺史、原士弘部将王戎也在暗中派人将士弘接于自己家中，“招诱旧兵，更谋作乱”②。唐洪州总管张善安侦知此事后，发兵征讨。正值士弘病死，部众溃散，王戎亦为善安所俘。

林士弘从大业十二年（616年）起兵称帝，到武德五年（622年）被平定，历时近7年之久。

四、平定江淮辅公祏

（一）杜伏威降唐后江淮起义军形势

由杜伏威和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是隋末三支农民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年底曾起兵于长白山（位于今山东邹平、淄博与章丘之间）一带。后来相继打败了隋军

①② 《旧唐书》卷五十六《李子通附林士弘传》。

宋颢、陈稜诸部，遂乘胜攻破高邮（今属江苏）、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势力大振，成为江淮间兵力最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炀帝后，杜伏威向隋越王杨侗上表归附，被任为东道大总管，晋封楚王。

武德二年（619年）九月，杜伏威派人至长安，向唐高祖李渊表示归降。李渊遂以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总管。

武德三年（620年）六月，唐军平定了河东刘武周后，正欲大举进攻洛阳王世充。李渊为了从东南方面牵制世充兵力，遂诏令杜伏威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晋封吴王，赐姓李氏，又以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武德三年年底，杜伏威派辅公祏率将阚稜、王雄诞及部众数千人向占据毗陵郡（治今江苏常州）的李子通部发起进攻。公祏渡江后，迅速攻占丹阳，进屯溧水（今属江苏）。子通亲率数万兵众，结阵抵抗。公祏挑选精锐甲士千人为前锋，又令千人随后，自己亲率余众为殿，向子通布置的"方阵"发起冲击。结果，子通败逃，向东南退却。公祏在率部追击中，由于轻敌冒进，反为所败，只得退守溧水。部将王雄诞建言应乘子通"狃于初胜而不设防"，再次攻击，公祏不从。雄诞遂率其"私属数百人衔枚夜击之，因顺风纵火，子通大败，走渡太湖"①，于是，"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②，伏威由历阳徙居丹阳。

李子通从太湖继续南下，乘势攻占了吴郡（治今江苏苏州西南），不久，又徙居余杭（今浙江杭州）。于是，李子通遂"东举会稽，南距岭西，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③

武德四年（621年）正月，当李世民所率唐军正在围困洛阳之

---

①《旧唐书》卷五十六《辅公祏附王雄诞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二月。

③《新唐书》卷八十七《李子通传》。

时，杜伏威派部将陈正通、徐绍宗率精兵2000西进，从东面向王世充发起进攻。二十五日，攻克梁县（今河南临汝）。同年十一月上旬，伏威又派部将王雄诞率兵南下，进攻子通。李子通率精兵在地势险要的独松岭（即今浙江安吉东南的莫干山）迎击。雄诞派部将陈当带千余人，居高临下，步步进逼，并“多张旗帜，夜则缚炬火于树，布满山泽”。子通大惧，急忙焚烧营寨，退保余杭。雄诞率部紧追，子通连遭失败，遂于十一月七日缴械投降，伏威将其执送长安。接着，雄诞又乘胜相继兼并了占据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和昆山的农民起义军汪华部及闻人遂安部。至此，“伏威尽有淮南、江东之地，南至岭，东距海”①。

武德五年（622年）七月上旬，当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政治集团早已灭亡，刘黑闼亦被击败，李世民率领唐军正在围攻兖州徐圆朗时，伏威恐惧，上表请求入朝。七月八日，遂与部将阚稜一起来到长安，被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第二年年初，又进位太保。

伏威与公祏虽为“刎颈之交”，但公祏较伏威年长，伏威以兄相称，军中士卒亦称之为“伯”，故地位与伏威相等。这就逐渐引起了伏威的妒忌。行台设置后，伏威遂以其养子阚稜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而将公祏任为仆射，外示尊崇，而实则暗夺其兵权。公祏察知伏威的用心后，怏怏不平，遂跟随方士左游仙“学辟谷以远其事”。伏威西入长安前夕，曾对部将王雄诞说：“吾入京，若不失职，无令公祏为变。”② 这说明，在伏威入关降唐以前，他和公祏之间的嫌隙已深，公祏后来与其分道扬镳是势在必行的。

武德六年八月初，即杜伏威入关降唐一年之后，辅公祏在左游仙的鼓动下，决心叛唐造反。他诈称已经接到杜伏威指示反唐的书信，并派人转告王雄诞。雄诞闻之不悦，又不知虚实，便声称有病，不再理事。公祏乘机夺得兵权，又派人将起兵反唐的计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六《辅公祏传》。

划转告雄诞，企图使其参与起兵行动，但却遭到雄诞的坚辞拒绝。公祏知道雄诞最终不可强屈，遂将其缢杀。接着，他便下令军中：杜伏威已在长安被捕，根据他的书信指示，立即起兵造反，并命令军士整修军备，储存粮饷。不久，公祏便在丹阳称帝，建国号宋，署置百官。唐洪州总管、原兖州方与（今山东鱼台北）农民军首领张善安亦举兵相应，被公祏任为西南道大行台。

（二）芜湖之战

武德六年（623年）八月下旬，唐军在歼灭了刘黑闼、徐圆朗诸部后，李渊遂令襄州道行台仆射李孝恭率水军由江陵向江州（治今江西九江）进发，岭南道大使李靖率交、泉、广、桂之众向宣州（今属安徽）进发，怀州总管黄君汉率部由亳州（治所今属安徽）南下，齐州（治今山东济南）总管李世勣率部沿泗水渡淮南下，由南、北、东三面会攻公祏，诸路唐军均受孝恭统辖。

辅公祏听说唐军大举会攻丹阳的消息后，当即派部将徐绍宗率部北渡淮河，进攻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又派陈政通部渡江进攻寿阳（今安徽寿县）。企图阻挡北路唐军。

武德六年（623年）十一月上旬，唐黄州（治所在今湖北新洲）总管周法明率部沿江东下，张善安率部在夏口（今湖北武汉）抵抗，法明遂屯驻荆口镇（今湖北武汉汉阳境内）相持。法明由于麻痹轻敌，不设防卫，被善安所派刺客刺死，唐军遂退。善安亦率部退回洪州。

十一月十二日，唐舒州（治今安徽潜山）总管张镇周等部在猷州（治今安徽泾县）黄沙（今安徽宣州东南）击败了辅公祏部将陈当世部，向芜湖推进。

十二月二日，唐安抚使李大亮率兵进至洪州，与张善安隔赣水对阵。大亮单骑入阵，劝善安归降。善安应允，遂入大亮营中。大亮执送善安于长安，公祏败后被杀。善安部众溃散，大亮遂入洪州。

武德七年（624年）年初，唐军主帅李孝恭率部沿江东下，连克枞阳（今属安徽）、鹊头镇（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东岸），于三月十日进抵芜湖（今属安徽）。在此期间，安抚使李大亮率部从洪州

东进，与唐猷州刺史左难当一起击败了进犯的辅公祏部，行军副总管权文诞又败之，并攻占了公祏猷州（治今安徽石台）境内的枚洄等 4 个城镇。三月二十一日，唐徐州总管任瓌又率部沿运河南下，一举攻占扬子（今江苏扬州南长江北岸），迫使广陵（今江苏镇江）城主龙龛投降。这样，就使辅公祏陷入腹背受击的境地。李孝恭指挥唐军主力向芜湖发起进攻，公祏部一触即溃，唐军一举占领芜湖，并乘胜攻拔梁山（今安徽和县南 70 里长江西岸）。顺利取得了芜湖之战的胜利。

（三）当涂决战

辅公祏在芜湖之战失败后，迅速收缩战线，在当涂（今属安徽）一线布置重兵，企图抵抗唐军：他派部将冯慧亮、陈当世带水军 3 万屯驻博望山（位于今安徽当涂西南 30 里长江东岸，与西岸梁山夹江对峙），并在博望与梁山之间连接铁链，锁断江面，又在梁山修筑月城，长达 10 多里，阻击沿江东下的唐军；还派部将陈正通和徐绍宗率步兵 3 万屯驻青林山（今安徽当涂东南），阻击从猷州北上的唐军。这时，唐将李世勣已渡过淮河，攻占寿阳，兵临峡石。李靖亦率部与孝恭会合，抵达博望山下，与辅公祏冯、陈诸部对峙。尽管唐军多次出兵挑战，公祏部只是凭借有利地形，坚壁不出。孝恭集众商议对策，众将都说："（冯）慧亮等拥强兵，据水陆之险，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杨（阳），掩其巢穴，丹杨（阳）既溃，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将从其议，欲引兵绕过当涂，直趋丹阳。但李靖却说："（辅）公祏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然所自将亦不为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祏保据石头，岂易取哉！进攻丹杨（阳），旬月不下，慧亮蹑吾后，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其心非不欲战，正以公祏立计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师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① 反对直捣丹阳，主张攻击当涂正面之敌。孝恭最终采纳了李靖的建议。他首先派遣老弱之兵向敌阵进攻，而率精兵结阵于后相待。老弱之兵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七年三月。

一触即败，向后撤退。冯慧亮与陈当世麾军追赶，追至数里，与唐军主力相遇。这时，曾偕杜伏威一起入关降唐的旧将阚稜摘下头盔对冯、陈兵士说："汝曹不识我邪？何敢来与我战！"公祏兵士中多为阚稜部下，他们深知这位将军"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名为陌刃，每一举，辄毙数人，前无当者"①。因此，皆丧失斗志，甚至有人竟打躬下拜。唐军乘机大举反攻，慧亮部大败而归。转战100多里，先后摧毁了博望和青林两山营寨，慧亮和正通被歼一万多人，残部逃回丹阳。李靖部率先抵达丹阳城下。不久，李孝恭及李世勣部亦相继抵达，对丹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公祏看到丹阳危在旦夕，遂率部离城东走，欲与据守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左游仙部会合。李世勣所率唐军不舍昼夜，尾随追击。公祏逃至句容（今属江苏）时，随从兵士由数万减至500。夜宿常州（今属江苏）时，部将吴骚等人打算将公祏执送唐军，被其发觉，公祏遂抛弃妻子家室，独自带领心腹数十人斩关而逃。行至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又遭到当地武装民团的袭击，公祏被捕，押送丹阳，孝恭下令处斩，又"分捕余党，悉诛之，江南皆平"②。辅公祏于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起兵反唐，到武德七年（624年）三月被唐军平定，前后历时半年之久。

在平定辅公祏的作战中，唐初军事家李靖的杰出军事才能得到了又一次的充分发挥。当公祏部占据有利地形，置重兵于当涂一线，又修筑月城，锁断江面，企图疲惫唐军，多数将领主张绕道敌后，直攻丹阳之时，李靖果断地提出诱敌出战，首先击败正面之敌的作战方案。后来的战事进展证明李靖的决策完全正确，这无疑是唐军取得当涂大捷的关键。正是由于这次作战的迅速胜利，才导致了辅公祏起义军的最终失败，从而使唐朝的统一战争至此基本结束。

---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六《辅公祏附阚稜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七年三月。

第七节　唐初统一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一、胜 利 原 因

以李渊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于大业十三年（617 年）七月从晋阳起兵，十一月攻克长安，武德元年（618 年）五月代隋建唐，同年十一月歼灭西秦，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到武德七年（624 年）平定江淮辅公祏的起兵反唐，仅用六七年时间，即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基本胜利，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业。在隋末群雄割据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李渊集团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顺乎潮流，合乎民心

自从隋炀帝即位以后，凭借隋文帝时期积累的雄厚财富，肆意挥霍，大肆聚敛，纵欲奢靡，“东西行幸，舆驾不息，征讨四夷，兵车屡动，西失律于沙徼，东丧师于辽、碣。数年之间，公私罄竭”①。加之徭役不息，“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赋役繁重，“长吏叩扉而达曙，狂犬迎吠而终夕”②；钱币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弊”③；法令严酷，“益肆淫刑”，“生杀任情”④。致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百姓黎庶被推入死亡深渊。嗣后，又经历多年的“群雄虎争”，兵连祸结，争斗不已，遂把社会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人民“无以自给”，只能“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甚至出现了同类“相食”⑤的

①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

②⑤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七月。

④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人世间最为残酷和悲惨的罕见现象。

为了复苏经济，“救济苍生”和“欲宁天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李渊就已经注意废除苛刻政治，“布宽大之令”。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李渊在给突厥始毕可汗的复信中就一再强调“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不久，李渊派建成、世民率兵进攻西河郡时，就严格军纪，“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攻占西河后，又“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慰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① 晋阳起兵后，李渊途经西河、霍邑时，“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或挑选丁壮“从军”，或将欲归军士“遣归”②。故晋阳之兵到达黄河东岸后，“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就连关中士民也“归之者如市”。渡河入关后，李渊不但对“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还下令诸军“各依壁垒，毋得入村落侵暴”③。攻克长安后，李渊“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④，又“约法为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后来，“又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⑤。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率军进入洛阳后，下令“分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⑥。同年十月，唐军平定萧铣后，李孝恭接受了岑文本的建议，严禁“纵兵俘掠”，江陵“城中安堵，秋毫无犯”。结果，“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⑦

总之，由于李渊集团在统一战争中，先后施行了顺应社会、合乎民心的诸多举措，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所以，他们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④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

⑤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五月。

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月。

是如此。

至于拥兵割据的诸路军阀，如薛举、薛仁杲父子的生性“酷暴，好鞭挞其下”①；河西李轨的“筑台”邀福，“多所糜费”② 而不恤百姓；王世充的“残忍褊隘”和“恣行威福”③；萧铣的“性褊狭，多猜忌”④ 等。总之，他们只知割地称雄，而置民众的疾苦于不顾，甚至还助纣为虐，草菅人命。因此，他们的接踵覆亡，乃是人类社会择优汰劣的必然结果。

以河南瓦岗、江淮和河北 3 支主力为首的隋末农民起义军在打击以隋炀帝为首的残暴统治、调整生产关系等方面，曾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当隋王朝已经土崩瓦解，旧的统治机构已彻底垮台，代表统一趋势的新建政权——李唐王朝已经诞生以后，这些农民起义军及其余部就由于失去了斗争方向而逐渐沦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嗣后，他们的割据行动由于背离了社会的需求和民众的期望，所以，他们也就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曾经金戈铁马、横扫河北隋军的窦建德，在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岌岌可危之际，他仅以“齿寒之忧”，麾军西进，援救洛阳，结果，兵败虎牢，身名俱灭，即是一例。至于建德亡后，刘黑闼再次起兵河北时，就受到多数建德故将的反对。如刘雅就说：“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⑤辅公祏起兵反唐以后，也受到伏威故将王雄诞的坚词拒绝：“今天下方平，吴王（指杜伏威）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今从公为逆，不过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⑥他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月。

⑤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闼传》。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六年八月。

们虽相继被杀，但他们的话却反映了广大百姓的心愿。所以，刘黑闼和辅公祏的先后败北，也是他们倒行逆施的恶果自食。

（二）集文武之才，拥地利之便

如前所述，早在晋阳起兵以前，李渊就广纳豪杰，结交英雄。晋阳起兵开始前后，在李渊身边已经集聚了一批杰出的文武贤才。其中既有“启举义之谋为首”、宦海浮沉的裴寂，又有“奋纵横之略，立缔构之功”①的刘文静；既有才兼文武、智勇双全的李世民，又有“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②的温大雅，其余如刘世龙、许世绪、公孙武达、钱九陇、李高迁、张平高、李思行、赵文恪等，皆倾心相结，遂成为晋阳起兵的骨干力量。南下河东、挺进关中、建立唐朝以及后来的统一战争中，李渊集团又大力搜罗人才，相继收降了一代名将如李靖、李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瑾等，文韬武略皆无与伦比。李渊集团正是凭借和依靠这些文武之才，才取得定鼎关中建唐立国和统一全国等一系列重大胜利。

和李渊争夺天下的诸路军阀如薛举、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萧铣、梁师都之流，却大多任人唯亲，刚愎自用，唯我是尊，最后以致众叛亲离，人才淹弃。因此，他们的接踵灭亡，实属必然。

另外，李渊集团在起兵之前，就把长安及关中地区作为攻取目标。起兵南下途中，当接到李密送来的信函后，李渊为了顺利“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遂在复信中“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③。抵达河东郡后，李渊又采纳世民的建议，果断率兵渡河，顺利攻克长安，很快控制了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形势险要，周围设有关隘，秦岭横亘于南，北山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刘文静传·史臣曰》。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一《温大雅传·史臣曰》。

③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阻断于北，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汉隋等兴起于此，终得天下，故汉初人把“入关而都”称为“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① 和“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②。另外，关中“沃野千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河流纵横，渠道交错，“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之，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③。隋末的兵徭之役及重大战事，多在中原、河北和山东等地，关中所受影响较小，足以成为立国之地。李渊正是充分利用关中的地利之便，源源不断地把隋朝在长安和永丰仓的贮粮和部署在关中的唐朝后备部队运往战争前线，使关中地区成为统一战争的可靠后方和坚强后盾。这同“土薄民贫”的凉州、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洛阳、江陵等地相比，确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利之便。

其实，对关中优越的地利条件，时人早有认识。大业九年(613 年)，当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叛乱以后，李密就把攻占关中作为稳妥之策向玄感建言：“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④ 但鼠目寸光的杨玄感却取其下策，进围东都，遂遭灭顶之灾。

大业十三年 (617 年) 五月，正当李渊集团策划晋阳起兵，瓦岗军对洛阳久攻不克之时，归附瓦岗的隋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北）县长柴孝和就曾向李密建言：“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抝，天下可定。但今

---

①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
②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③ 《汉书》卷四十《张良传》。
④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① 但李密部下均为山东人，不肯相随入关，李密只得将关中拱手让给李渊。只是在失败之后，才在迫不得已之时入关降唐。

武德四年（621年），窦建德在虎牢被唐军拦阻，部众思归洺州之时，凌敬也曾建言："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② 但窦建德最终也未能采纳这一建议，因而导致了夏兵失败和郑国的覆亡。

凡此种种，都说明唐得关中对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战略正确，策略灵活

唐朝甫建，面对薛仁杲父子对关中的频繁骚扰，李渊采纳李世民等人的建议，毅然决定首先用兵西北，相继剪除了薛举父子和河西李轨割据势力。接着，李渊又派兵北上，歼灭了刘武周集团。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渊抓住战机，派唐军主力进军中原，向王世充和窦建德发起进攻。此后不久，李渊又派兵3路，向江陵的萧铣大举兴师。经过将近一年的激烈战斗，相继灭亡了上述3个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从而取得了统一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此后，割据江西的林士弘和在河北、江淮起兵的刘黑闼、辅公祏等农民起义军，亦于武德五年（622年）、六年、七年相继被平定，全国重归统一。李渊对统一战争作出的上述战略决策，不仅使首都和关中免遭兵燹，而且也适应唐朝兵力逐步增长的趋势，使唐军主力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这无疑是统一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

另外，亲临战阵的唐军主帅李世民、李靖、李孝恭等唐初著名军事家，在统一战争中灵活而又准确地运用策略乃是致胜的重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要保证。当唐军与薛仁杲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李世民始则采取“坚壁挫锐”①，继则又“兵机务速”②，使唐军大获全胜；唐军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在柏壁相持时，李世民又采取了“敌饥以持久急之”③ 和“乘胜”④ 追击的策略，终于全歼敌军；在唐军对洛阳久攻不克，窦建德率军援救的紧急时刻，李世民又果断采取“塞险则胜”⑤ 的策略，进军虎牢。接着，又运用“引退设伏取之”⑥ 和“阵久疲致败”⑦ 的策略，终于获胜，连灭二国；在讨伐萧铣的作战中，李靖不仅献出10策，而且巧妙使用“水攻”⑧，使敌措手不及而告败北。萧铣投降后，李孝恭又采纳了李靖的“示义”策略，取得了不战而胜和扩大战果的惊人效果。正如《通典》卷一百五十五《兵四·示义》所载，唐军进入江陵后，唐将们要求对抗拒的萧铣将帅“籍没其家”，然后分赏将士，但李靖坚决反对，主张“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否则，“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以南，城镇各坚守不下，非计之善。”结果，这个策略被李孝恭采纳后，“江汉之城，闻之莫不争下。”

上述种种策略，不仅表现了唐初军事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也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二、历史意义

李唐王朝取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完成统一中国的丰功伟

---

① 《通典》卷一五五《兵八·坚壁挫锐》。
② 《通典》卷一五四《兵七·兵机务速》。
③ 《通典》卷一五五《兵八·敌饥以持久急之》。
④ 《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乘胜》。
⑤ 《通典》卷一五九《兵十二·塞险则胜否则败》。
⑥ 《通典》卷一五四《兵七·引退设伏取之》。
⑦ 《通典》卷一五五《兵八·阵久疲致败》。
⑧ 《通典》卷一六〇《兵十三·水攻》。

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统一后的李唐王朝，“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陁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①，版图比隋朝极盛时期更为扩大，从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封建帝国，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疆域的基本范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

第二，这次统一结束了自隋末以来长达10多年的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涤荡了战争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给社会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因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②。

第三，李唐统治集团及其第一、二代皇帝大都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战斗洗礼，他们亲眼看到一个强盛的隋王朝是怎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遭到灭顶之灾的。因此，在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已经统一以后，他们在商讨古今之时，由于“惕焉震惊”，而不得不对社会实行一些进步的统治政策，不得不对人民适当减轻赋役剥削，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刺激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就为创造历时近3个世纪的盛唐时期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高度文明的深入而又广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文化至今仍具有世界魅力当与此不无关系。

---

① 《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② 斯大林：庆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的《贺词》。

第三章　唐代前期的军事制度与国防建设

府兵制度是唐前期主要的军事制度。唐朝的府兵制是高祖李渊在隋朝兵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后经过唐太宗的不断改革，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并进入全盛时期的。其中十二卫是府兵的最高领导机构，折冲府是基层组织，其下还有团、旅、队、火，其编制体制日益完善。府兵平时一面参加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遇有服役任务时则分番宿卫京师或番代戍边。贞观年间，全国的折冲府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分布关中，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唐前期为了加强国防建设，还建立并实行了烽燧和军屯制度，扩大边防屯田，充足边兵军饷，改进兵器和军事装备，扩大军事交通运输。遂出现了唐代前期民富国强、“华戎同轨”的兴盛局面。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政治制度

唐高祖颁布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唐前期的主要经济制度。唐初的三省六部制是唐中央主要的政治体制。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推行均田制和三省六部制度，又任人唯贤，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崇尚节俭，因而出现了誉满古今的“贞观之治”。

一、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制度

唐朝建立之初，由于受到隋末兵戎战乱的影响，社会经济出

现衰败景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①户数也减至300多万，仅及大业年间的三分之二。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唐高祖李渊继承隋制，于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该令包括国家对官吏、百姓（包括僧尼、道士、女冠及工商业者）的授田种类、数量以及收授和土地买卖等一系列具体规定。

均田令中有关给百姓的授田规定是：凡21岁以上、59岁以下的丁男和16岁以上、21岁以下的中男每人授田一顷，其中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老男及笃疾、废疾者授田40亩，寡妻妾授田30亩；道士和僧人每人授田30亩，尼姑、女冠每人20亩；工商业者的永业和口分田各减百姓之半。百姓所授口分田在身死以后要归还官府，永业田则可以传之子孙。口分田种植粟麦，永业田只能植种桑、榆、枣。乡土不宜者，可以所宜之树代替。凡应收授之田，皆从当年十月开始，十二月结束。授田的原则是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

均田令中关于官吏授田的规定是：凡在编官员均可按照官品大小授予不同数量的永业田、职分田和公廨田。其中永业田的所授数量是：亲王100顷，正一品职事官60顷，以下每个品阶递减5～10顷。最低一级的散官云骑尉和武骑尉可授田60亩。官吏的公廨田按中央和地方的官署衙门授给，最多26顷，最少1顷。公廨田的地租收入，供给各官署衙门的办公费用；官吏的职分田亦按官员品级的大小授给：最多的12顷，最少亦有80亩。官吏职分田的地租收入归官吏私人所有，是国家发给官吏俸禄的补充形式。

唐代均田令中有关土地买卖的规定是：凡官吏的永业田和赐田均可买卖；百姓的永业田在家贫和无力丧葬时，亦可出卖；凡愿意从受田不足的狭乡迁往地多人少的宽乡，或将土地充作邸店、碾硙之用者，其永业和口分田均可出卖。

唐朝的均田令同隋朝相比，具有下列几个显著特点：

---

①《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1、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女及官户以外的一般奴婢和耕牛均不再授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和女冠以及工商业者的授田规定。这说明唐代的奴隶制残余有所缩小，而宗教和工商业者的势力却有所发展。

2、官吏授田的种类和数量比前代均有所增加，显示了土地分配的更大不均。

3、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更为松弛。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官僚地主和豪强富贾兼并土地之风，有利于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最后，应着重指出的是，唐代均田令虽明文规定了对百姓授田的数量，但这只是对农民占田数量的最高限制，国家不会、也不可能将所有土地授给百姓，更不会“尽夺富人之田，以予贫人”①，因此，百姓受田不足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但是，不能因为百姓受田不足，就否定均田制的作用。其实，唐代均田制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这是确凿无疑的。从已经发现的敦煌户籍残卷来看，几乎多数民户都有应受田、已受田和未受田若干亩的记载②，这当是唐代均田制曾经施行的确证。正是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推行，把广大农民束缚于小块土地上，有利于封建国家对他们进行租调剥削，用以增加财政收入。另外，唐朝实行均田制，也有巩固府兵制的作用。因为唐代均田令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有军府州不得（迁）住无军府州”③。即原住于有军府州的均田百姓，不得随意迁往未置军府之州。这就保证了征集府兵的兵源。唐朝建立之初，对太原元从卫士 6 万余人，就曾“于渭北白渠之下七县绝户膏腴之地，分给义士家为永业，于县置太原田，以居其父兄子弟”④。这些卫士应是后来禁军和府兵的骨干。唐朝文献中还有地方官吏追夺官僚、地主的籍外占田，以给

---

① 《文献通考》卷二十四《田赋二》。

② 参阅《敦煌资料》，中华书局 1961 年出版。

③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④ 《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邺侯家传》。

贫民的记载。贞观年间，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刺史长孙顺德曾将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等所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①；高宗永徽年间，洛州（治今河南洛阳）刺史贾敦颐将豪富之室强占的籍外占田，“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②。这些分得均田的“贫乏”之户就包括负有兵役任务的府兵丁壮。

在均田令颁布前后，唐廷又实施了租庸调制。该制规定：课户每丁每年缴租粟 2 石，每户每年调帛 2 丈、绵 3 两，或麻布 2.5 丈、麻 3 斤；每丁每年服役 20 天，如不服役，每天折绢 3 尺、折布 3.75 尺，是为庸。如有事加役超过 5 天，免调；超过 30 天，则租调全免。和正役相加，每丁每年最多不得超过 50 天。凡遭受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的地区，全年收成损失十分之四者，可免除地租；损失十分之六者，免除租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者，租调和徭役俱免。

唐前期的租庸调制是以丁身为征税对象的。唐人陆贽曾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③。故一般人将其称为租庸调法。

唐朝的租庸调制是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制订的，但较隋制为轻。这主要表现在输庸代役上。隋时规定“民年五十”，方可“输庸代役”。唐朝却把输庸代役扩大到了整个成丁。这就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不致因为从事徭役而荒废了农耕，标志着农民对封建国家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外，这一制度还按灾情轻重规定了相应减免赋役的条文，这无疑都对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随着唐廷财政开支的与日俱增，唐王朝对广大百姓的赋役剥削也逐渐加重。原来所谓的减免之法，大多成为一纸具文。贞观十一年（637 年）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

---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八《长孙顺德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上·贾敦颐传》。

③ 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载《陆宣公集》卷二十二。

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息”。唐太宗虽屡发减免诏书，但“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①。到高宗、武后时期，赋敛益重，以致“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用，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②。再加上官僚地主和豪强富贾的大肆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均田农民日益增多，他们有的“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有的则“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为了控制更多的剥削对象，唐廷又编制了一整套严密检察户口的制度，即每年编造户籍计账时，都要进行“团貌”，把人丁的形貌特点记录在案，编成手册，“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账，赴州依式勘造，分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军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三月三十日纳讫。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③。为防止农民逃亡，唐廷即根据户籍计账搜括逃户，谓之括户。又实施摊逃之法，将逃户“应赋租庸课税，令近亲邻保代输”④。但无论是括户还是摊逃之法，都不能制止农民的逃亡和反抗；恰恰相反，括户越严，摊逃愈急，逃亡更多。即使在唐前期最为兴盛的开元时期，广大农民的生活境况仍每况愈下。正如唐人杜佑所说：“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富，闾阎困矣。”⑤

二、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封建政治体制

唐朝的职官制度大体沿袭隋朝，中央仍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门下和尚书。其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负责起草政令，为

---

① 《贞观政要》卷六《论奢纵》。

② 《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③ 《唐会要》卷八十五《籍账》。

④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⑤ 《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上》。

朝廷决策机构。凡天子之言共分 7 类，曰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均由该省长官中书令草拟。其次还有中书侍郎 2 人，参决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和制订；中书舍人 6 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并参与三司决审大狱和文武官的考课等；右散骑常侍 2 人、右补阙 2 人、右拾遗 2 人、起居舍人 2 人等，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等。

门下省长官为侍中 2 员，掌审议政令。其下还有黄门侍郎 2 员、给事中 4 员、左散骑常侍 2 员、谏议大夫 4 员、起居郎 2 员、左补阙 2 员、左拾遗 2 员等。侍中之职主要掌管出纳帝命，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弼庶务。凡军国事务，与中书令参议决断。黄门侍郎为侍中助手。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并参与决审大狱等。

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掌管全国政令的贯彻执行，属执行机关。其下还有左右丞各 1 人、左右司郎中各 1 人、左右司员外郎各 1 人、都事 6 人。该省的首脑机关为尚书都省，其职能是"掌举诸司之纲纪与百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①。尚书省之下又设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长官为尚书 1 员，侍郎 2 员。尚书吏部主管天下官吏的选授、勋封和考课等事宜。其下又有吏部、司封、司勋和考功等 4 司；尚书户部主管天下田户、均输和钱谷等事宜。其下又有户部、度支、金部和仓部等 4 司；尚书礼部主管天下礼仪及科举之政令。其下又有礼部、祠部、膳部和主客 4 司；尚书刑部主管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其下亦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 4 司；尚书工部主管天下百工、屯田和山林川泽之政令。其下所设 4 司是工部、屯田、虞部和水部。

三省长官即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均为宰相。由于李世民在武德年间曾任尚书令之职，后来，世民又登极称帝，故此职遂虚设不授，尚书省的长官实际上已变为左右仆射。从贞观年间开始，唐朝诸帝均给一些官品较低的官员加上"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平章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

---

①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

事”等头衔，使其成为宰相，故使宰相的数目大增。武则天执政以后到开元年间，左右仆射渐失相职，仅判省务，只有诏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才能参决政事。

唐朝还为宰相们专门设置了议事之厅，始称政事堂，附设于门下省。高宗时又迁至中书省，开元年间又改名中书门下，其印也为“中书门下之印”①。

唐朝廷三省分掌决策、审议和执行之权，将前代丞相权力一分为三，使其相互制约，便于皇帝居中控制。又设置了政事堂，供宰相议事决策，这就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且提高了议事决策的行政效率，强化了封建统治。

除三省六部制外，唐朝中央还设有监察百官违禁行为的御史台，分掌各项事务的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常等九寺，国子、少府、将作等三监，以及专掌图书典籍的秘书省和主管内廷事务的内侍省等。

地方官方面亦承隋制，设州、县两级制。州置刺史，县设令、长，缘边重地，初设总管，武德后期改称都督，兼管军事、行政。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又按山河形便，将全国划分为10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将山南、江南分为东、西两道，增置京畿、都畿和黔中道，由原来的10道增为15道。皇帝时派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或采访使等分巡各道，对州县等地方官进行监察。

总之，唐前期设置的三省六部制是封建政治体制的中枢机构，它同以府兵制为主体的军事体制相互配合，构成了唐朝政治统治的两大支柱。

三、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高祖李渊与皇后窦氏共生四子：即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

---

①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

子元霸、四子元吉。由于三子元霸早亡，故仅留三子。唐朝建立以后，李渊按照“立嫡以长”的立嗣原则，将建成立为太子。但从晋阳起兵开始，到剪灭割据群雄和统一全国，李世民功高势重，威权日盛，并形成了一个实力很强的政治集团。正如当时任太子洗马的魏徵所说：“秦王（指李世民）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指太子建成）但以年长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①这样，建成要保住太子地位，必然会对世民产生嫉妒和加害之心。李世民凭借自己显赫的权势地位，也必然会产生觊觎储君的欲望。从武德四年（621 年）全国渐趋平定以后，双方遂都积极拉拢党羽，培植私人势力，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明争暗斗。这时，掌握废立太子大权的唐高祖李渊理应采取果断措施，或大力扶植建成，确保其太子地位，使其将来平稳接班；或按照“择贤而立”的另一立嗣原则，在太子建成恶迹已彰之时，及时实行废立，把世民升为储君。但是，在建成和世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李渊却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采取了息事宁人、委曲调和的态度，这就在客观上更助长和加剧了双方矛盾的发展。武德七年（624 年）六月，当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勾结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刺史杨文干，企图谋杀世民，举兵叛乱的阴谋败露以后，李渊在派遣李世民带兵平定叛乱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②但杨文干叛乱被平定以后，由于听信了后宫谗言，李渊遂不再实现原来诺言。武德九年（626 年）六月一日，李建成夜召世民，以毒酒饮之，世民回府后，吐血数斗。适逢李渊来到秦府，见此情状，又对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③但第二天由于建成左右又从中作梗，“事复中止”④。于是，李世民遂召集秦府幕僚商议对策，决定在六月四日发动政变，袭杀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六月。

建成、元吉。这天黎明，李世民率领兵众伏于宫城之北玄武门内，利用建成与元吉上朝之际，将其全部杀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李渊遂将世民立为太子。同年八月，李渊又主动将帝位让给世民，自己当了太上皇。八月九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改元贞观。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四日，唐太宗崩于翠微宫含风殿，在位共23年。在此期间，唐太宗以隋亡为借鉴，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治国方针，遂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昌盛，文化繁荣，国防力量日益强大，民族关系和睦融洽。后来，封建史家为了彰明唐太宗的文治武功，遂将这一时期誉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采取的治国方针大致有以下几点：

1、任人唯贤，虚心纳谏

唐太宗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举，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这就是唐太宗一贯坚持的用人原则。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曾对右仆射封德彝问道："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唐太宗立即批评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① 为了做到官得其人，人尽其才，唐太宗不分亲疏、贵贱，不问地域、新旧，甚至在反对过他的政敌中，挑选贤能，按才授官，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对其中才能优异者，甚至不惜破格重用。唐太宗不仅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尤其注意培养、关心和信任人才。因此，贞观时期，不但人才济济，英贤辈出，既有擅长筹画、机智多谋的房玄龄，又有善于决断、作风干练的杜如晦；既有"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的魏徵，又有"激浊扬清，嫉恶如仇"的王珪；既有"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又有"处繁理剧，众务必举"的戴胄；既有"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又

---

①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第七》。

有“临敌应变，动合事机”的李勣；既有“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的布衣宰相马周，又有精通古今，身怀五绝（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的一代文宗虞世南等。而且这些文武大臣也都尽心竭力，辅佐太宗，君臣之间始终保持着融洽和谐的鱼水关系。这是形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从谏如流的一代明君。他曾问魏徵说：“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① 他很赞成魏徵这个说法。为了使群臣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在贞观初年曾采取当众褒奖和物质鼓励等方式“导之使谏”。对于利国利民的正确谏言，他还能及时采纳，闻过即改。对于那些言辞激烈、据理辨析的面折廷争，他还能克制自己，以诚相待。因而，贞观年间曾先后出现了一大批直言敢谏的忠直大臣。魏徵就是这些大臣中最为著称的代表。魏徵死后，唐太宗曾沉痛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② 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大政方针其所以“鲜有败事”，与他的虚心纳谏有直接关系。

2、廉洁自律，崇尚节俭

唐太宗曾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可不畏惧乎？”所以，他把那些像秦始皇和隋炀帝等对人民横征暴敛的君主比作是“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③。在这种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对人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不以“劳弊”之事干扰农时，这是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还认为奢侈浪费、纵欲放逸是亡国的先兆。因此，他不但提倡节俭，反对挥霍，而且身体力行，戒奢以俭。不仅如此，他还

---

①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

②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③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

经常以节欲自律告谕大臣："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若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① 据说，在唐太宗的身体力行下，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丰饶，无饥寒之弊"②。

3、推行均田，大兴义仓

贞观时期，唐太宗较为重视均田制的实施。贞观十八年（644年），他亲自视察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灵口村时，听说当地每丁受田仅有 30 亩，"遂夜分乃寐，忧其不给"。第二天，即"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免除徭役），移之宽乡"③。另外，他还用减免赋税等方法，鼓励农民垦荒种田，并将"浮游无业"者，强制送回原籍生产，不但增加了国家的剥削对象，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贞观二年（628 年），唐太宗还接受了大理丞戴胄的建议，实行隋初创立的义仓制度。规定自王公以下的所有私有土地，亩税 2 升，设专仓贮备，以供荒年赈济。不久，关中连年发生灾荒，太宗下令开仓放粮。由于义仓存粮充足，"逐粮户到，递相安养，人人自安，曾无怨言。"

此外，唐太宗在大力整饬内政的同时，还居安思危，训练士卒，保卫边防，接连打败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又灭亡高昌，进军西域，大大拓展了唐朝疆宇，遂使这一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正如《资治通鉴》一书所说："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④ 因此，可以说，贞观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太平盛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唐太宗虽然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著名皇

---

①② 《贞观政要》卷六《贪鄙第二十六》。

③ 《册府元龟》卷一〇五《惠民》。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

帝，其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他的所作所为并未超出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① 其实，"忧怜百姓"是表象，"长守富贵"才是本质。正因为唐太宗是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对人民剥削的本质，必然会逐渐暴露出来，而且，愈到后来，愈加露骨。他在死前曾自我忏悔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②。这些话虽然也体现了唐太宗具有自省的可贵品质，但也揭示了他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第二节　唐前期封建军事领导体制的完善

唐前期的尚书省兵部和十六卫、东宫十率是军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尚书兵部主掌兵马调遣，十六卫和十率府主管军队的统领和训练。此外，唐王朝还在缘边重要地区设有都督府和都护府，统率边防部队。尚书兵部的驾部司、库部司以及各地的军资库、两京武库和各地的仓储则负责供应部队的军饷、马匹和粮饷器仗。遇有军事行动，则命将调兵出征，委派专门官吏供应粮草。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种日益完善的军事领导体制对巩固唐前期的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监军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的监军最早约出现于春秋末期③。此后，有关监军的记载在秦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屡见不鲜。但这一时期的监军既无定制，又无常员，只是偶尔为之。且监军大都以位高

① 《贞观政要》卷六《贪鄙第二十六》。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

③ 参阅《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传》。

职重的大将充任，有的本身即是统军将领，有的还赋有兼掌军队的权力。隋末唐初，以御史台官员御史专任监军，遂使监军督察职能逐渐趋向固定化和制度化。

据《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孔若思传》载，若思祖父孔绍安曾在隋大业末年任监察御史，“高祖（李渊）讨贼河东，绍安与夏侯端同监军，礼遇尤密。”这说明御史监军最迟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已经出现。入唐以后，大约在高宗末年始有御史监军的明确记载。《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载：“高宗击邕、岩二州叛獠，诏监其军，（李）峤入洞谕降之，由是罢兵。”这当是唐代御史监军的最早记录。

文明元年(684年)九月，即武则天执政以后的第二年，诏令将“旧御史台改左肃政台，专知在京有司及监军旅，并出使”①。由此可知，至少此时御史监军已由习惯法变为成文法令，渐以成制。此后，关于御史监军的记载屡见不鲜。如同年九月，武则天派李孝逸征讨徐敬业扬州叛乱时，即派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事”②；垂拱二年(686年)，金微州(在今蒙古境内乌勒吉河西北)都督仆固始桀骜不驯，武后命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周发兵征讨，特敕左补阙乔知之摄侍御史，“(监)护其军事”③；次年十一月，武则天欲遣韦待价将兵出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但武则天却说：“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④ 遂破例地废除了御史监军的旧制。但至证圣元年(695年)，王孝杰出征吐蕃时，仍以殿中侍御史张仁愿监督其军，并“因入言状，孝杰坐免。擢仁愿侍御史”；第二年，王孝杰起复为清边道总管，统兵18万以讨契丹，又以“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战还，自图先锋当矢石

---

① 武则天：《改元光宅赦文》，载《全唐文》卷九十六。

② 《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

③ 陈子昂：《燕然军人画像铭》，载《全唐文》卷二十一。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三年十二月。

状。武后叹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为右肃政台中丞"①。

由上述记载可知，从隋末唐初以来，凡御史台官员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等均可出使监军。监军御史官卑权重，凡"军中大小之事"，统军将领均须向其"承禀"，受其"控制"。监军御史当是皇帝牢固掌握军权的有力工具。

大约从开元末年或天宝初年开始，唐玄宗以御史监军有"以卑制尊，理便不可"为由，遂以宦官出任监军，谓之"监军使"。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奉命率兵进攻小勃律国（位于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坦），宦官边令诚即任监军使②。这当是宦官监军的最早记录。其实，监军制度的这一变化是唐朝前期军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结果。因为自从武则天当政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均田制度逐渐受到破坏，府兵制亦随之崩溃。到开元末年大多折冲府已无兵可交，府兵制名存实亡，募兵制代之而兴。于是，不仅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失控局势，领兵统帅也不再是"事解辄罢"，而是长期领兵，甚至终身不替。监军御史已失去了"以卑制尊"的作用，逐渐变成了统军将帅的附庸。最高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失控局面，遂派出家奴，监察军事，用以牵制统兵将领，这就是宦官监军产生的历史背景。但监军制度的这一演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尾大不掉的军事局势，却由此导致了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唐王朝的集权统治更加衰弱。

二、兵部的职能及其组织机构

尚书省所辖六部之一的兵部是全国主管军政的最高领导机关。初称兵部，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为司戎，咸亨元年（670年）复故；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称夏官，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故。其长官有兵部尚书1人，侍郎2人。该部

① 《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

② 参阅《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

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军官的选拔。正如《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所云："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武选于每年十一月举行，其中尚书主中铨，两侍郎分掌东、西两铨。三铨的内容有五：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录取的标准有三：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对所选五品以上的武官，皆奏闻而制授；六品以下，则量资注拟。对落选或"考试不堪，还送吏部"①。

2、军籍管理和兵马调遣。凡各军事单位的编制定额、兵源的招募减省以及兵马的征遣调动，均由兵部审定、签发。每年十一月府兵的基层组织折冲府都要将本府卫士的籍账"上于兵部，以俟征发"②。募兵制实行以后，宿卫京师的羽林飞骑，也要由"兵部召补"，所在军司"不合擅有违越"，"辄自召补"③。凡调发兵马，均要"降敕书于尚书(兵部)，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十，皆不待敕"④。

3、军训讲武。据《唐开元礼》卷八十三《皇帝讲武》条载："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銮驾至埤所，兵部尚书介胄乘马奉引至讲武所，入自都埤之北。"开元元年（713 年）十一月，唐玄宗讲武骊山，兵部尚书郭元振"坐军容不整"⑤，被配流边州。

兵部所属又有 4 司：即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和库部司。其中兵部司为头司（本司），其余为子司。

兵部司的长官有郎中 2 人、员外郎 2 人。其中郎中一人掌兵马名帐和武官的勋禄品命及选授之事。凡天下折冲府的等级编制、宿卫、番代、征集、训练以及军行器物的装备配发等事宜，均受其指纵审核。凡内外武官品命共有 29 阶，其中最高的从一品骠骑

---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② 《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

③ 《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

④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⑤ 《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传》。

大将军，最低的从九品陪戎副尉，均由其定立番等。上番期满者，六品以下并听预简选，或留本司，或送吏部。五品以上则奏闻制授。郎中另一人掌管判簿，专责兵马调遣，包括边防兵马的补充和临时军团的屯驻。员外郎一人掌管武举，选拔武官。另一人掌判南曹，即管审核选人的资历档案。

职方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该司主管天下地图的绘制和城隍、镇戍、烽燧的设置及数量、州县城门、仓库的守护等。凡天下地图委各州府 3 年一造，随当地户籍一起上报都省。内附少数族的番官至京后，委鸿胪寺询问当地的山川、风土，并绘制地图正、副二册，以副册报省。凡天下州府的区域、都鄙的废置、疆界的争议，都由该司举正裁决。州县城门及仓库须守护者，取当地中男及残疾人分为番第，轮流充任，免除本人赋役。

驾部司亦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该司"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①。全国有驿 1600 余所，驿务归所在州县管理，驿政则总于该司；全国监牧之务归太仆寺管理，监牧政令则总于驾部。正如《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所云："凡监牧羊马所通籍账，(太仆寺)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

库部司亦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该司"掌邦国军州之戎器仪仗"，"凡冬至、元正之陈设，并祠祭、丧葬之羽仪，诸军州之用仗，皆辨其出入之数，量其缮造之功以分给焉。"② 掌武器仪仗的卫尉寺要"大事承制敕，小事则听于尚书省（库部）"③。

三、军队组织指挥体系

唐前期的军队组织指挥体系在中央是十六卫和东宫十率，在

---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

②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库部郎中员外郎》。

③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地方则是都督与都护。

十六卫创设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宗时一仍其旧，高宗、武后时数易其名，其设官员亦有增减。一般是每卫设大将军一人，正三品，将军二或一人，从三品。另有长史一人，从六品上，掌判诸曹，为大将军和将军助手。录事参军一人，正八品上，掌勾稽诸曹。另有仓、兵、骑、胄四曹参军各一至二人，正八品下，仓曹掌文职军官的勋考、禄俸、医药及过所，兵曹掌武官宿卫番第，骑曹掌府马杂畜簿籍，胄曹掌兵械及其修缮。四曹与录事参军并号卫佐。其下又有司阶、中候、司戈、执戟，并为卫官，号称四色官，分别为六、七、八、九品。

十六卫中的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和左右金吾卫，皆领府兵。府兵分内府与外府两种。内府为中郎将府，以亲卫、勋卫、翊卫为名，通谓之三卫。皆取五品以上子孙年满 21 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充任。外府为折冲府，一般以地区为名，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充任。

左右卫，掌宿卫宫禁、内廊、正殿诸门，并防守皇城四面。统领亲、勋、翊卫 5 府和武成、武安等 50 府。军号骁骑。

左右骁卫，掌同左右卫。凡分兵守卫宫门，在皇城四面、宫城内外与左右卫分知助铺。统领翊府 1，永固等外府 49。军号豹骑。

左右武卫，掌同左右卫。统领翊府 1，凤亭等外府 49。军号熊渠。

左右威卫，掌同左右卫，分兵主守皇城东面。统领翊府 1，宜阳等外府 50。军号羽林。

左右领军卫，掌同左右卫，分兵主守皇城西门及京苑城门。统领翊府 1，万敌等外府 60。军号射弓。

左右金吾卫，掌宫中、京城巡警及京畿烽候、道路。统领翊府 1，同轨等外府 50。军号佽飞。

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四卫不统领府兵。监门卫掌宫禁诸门禁卫及门籍。千牛卫掌执御刀，宿卫皇帝左右。四卫皆以中郎将统直长和千牛备身供其职。

东宫十率仿十六卫建制。即太子左右卫率、太子左右司御率、太子左右清道率、太子左右监门率和太子左右内率。每率置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或二人，从四品上。亦有长史及诸曹参军，品秩稍低。10率府中唯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统领府兵，其中左右卫率统领亲、勋、翊府3，外府5，其余皆不领内府，仅领外府3。而左右监门率和左右千牛率不领府兵，仅分领监门直长和千牛备身。东宫十率的主要任务是宿卫东宫。

唐前期地方的军队组织指挥体系是都督，全称为都督某某诸州诸军事。始置于曹魏，两晋南北朝直至隋朝则改称总管府，唐初一仍其旧。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始改总管府为都督府，且将管10州以上的名为上都督府，不满10州的只称都督府。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著令，户满2万以上为中都督府，不满2万户为下都督府。各都督府前后改易废置，相当繁冗，难以备述，大致说来，开元时代有并州（治今山西太原）、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荆州(今属湖北)、扬州(今属江苏)、潞州(治今山西长治)5大都督府，另有5个上都督府，13个中都督府，16个下都督府。

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六月下制分制天下24都督府，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吏善恶，实际上是州县以上的监察机构，并不总军戎，故制下不久，以权重难制而罢。

都督府的职能是“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①，即负责管内诸州镇防城戍的行政事务，亦对当地边防部队负统领之责。

唐代前期还于边疆地区设置了若干都护府，旨在管理周边已经归附的少数族事务，诸如“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②等，均由都护府负责管理。它同“缘边及襟带之地”设置的都督府相互配合，构成了边疆地区互为补充的军事指挥体系。

---

① 《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都督》。

② 《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都护》。

如果遇有重大战事，皇帝亦偶有御驾亲征之举，多数情况下或派亲王出任元帅，或以文武大臣出任总管，率兵出征。凡将帅出兵满1万人以上者，须置长史、司马、仓曹、胄曹和兵曹参军各一人，协助将帅管理军务；发兵在5000人以上、万人以下，则仅减司马。参战诸军、诸镇之兵，则由各军使及镇使、副镇使统领。凡诸军、镇每500人又置押官一人，1000人置子总管一人，5000人置总管一人。

凡将帅出兵之前，都要奏告太庙，并向齐太公之庙辞行，当晚须宿于军营，而"不反宿于家"，翌日出征。临敌对阵，将帅应召集属下将领计议方略，小事由将帅专决，大事还要上奏朝廷，待诏准后方可实施。对于违背军令、擅自行动以及临阵怯逃、贻误军机的将士，统兵将领有权"专行其罚"。战事结束以后，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①。但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由于府兵制逐渐崩溃，募兵制代之而兴，唐玄宗又先后在沿边设置了10个节度使，于是节度使始专边兵，统领府兵的十二卫和周边都督府名存实废，内轻外重的军事局势形成。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大都拥兵自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

四、军队后勤领导机构

按照唐前期府兵制的规定，宿卫京师（番上）和戍守边防（番代）的府兵要自备衣粮，这就是所谓的府兵"随身七事"②。另外，府兵的基层组织折冲府还须自备"火具"和"队具"③之物。这些军资用具都要随同府兵贮存于服役之京师或各边防军镇的军资库中，管理军库的官员司库、司佐等要按照规定发给"食券"，府兵

①③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七事"内容见本章第六节之二《兵器与装备》。

则凭食券领取自己存入的粮饷物资。而军库官要对入库的军用物资须认真“封署点检，勿令广费”。如果因为保管不善导致损坏而不堪使用者，或“(私自)取兵士十钱以上，绢一尺以上”者，都要“重罪”。府兵阵亡或因病致死者，军库官员还要“具录随身资财及尸，付本府人将还。无本府人者，付随近州县递送”。否则，如果私自吞没、挪用，则按赃论减一等处罪，如贪占绢一尺笞十，一疋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如果“以诈欺取财物者，论减一等”①。此外，设在京师和诸州军镇的军资库还保管国家支付临时召集的兵募、义征以及补助府兵的军用物资。据载，开元以前，中央国库每年调拨给诸军镇的军资费约有 200 万贯，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增至 1260 万疋段②，几乎增加了五倍有余。以上事实说明，设在京师和地方军镇的军资库是唐朝前期军队后勤的基层领导机构，随着兵制的逐渐变化，这个基层领导机构的后勤供应作用愈益增大。

唐前期由国家配发给府兵的重兵器则由隶属于少府监之下的军器监负责制造，隶属于中央卫尉寺的两京武库和武器署负责保管、贮存，而负责调拨和分配这些兵器甲仗的则是尚书省兵部所辖的库部司。至于唐前期军马的饲养、管理及分配的后勤领导机构，详见本章第五节，此处不赘述。

第三节　军事制度与军事布局

府兵制是唐前期主要的军事制度。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继承隋制，恢复并建立了府兵制。唐太宗即位以后，经过对府兵制的不断改革，遂使这一制度进入全盛时期。不仅府兵制的组织机构更趋完善，府兵的征集与训练更加严格，府兵的任务与作用亦更加明确，而且府兵的分布亦更趋合理，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大大强化了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与此同时，唐朝统

---

①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

② 参阅《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

治者为了适应战事需要，还兼行募兵和团结兵，作为对府兵制的补充形式。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均田制的日益破坏，府兵制也迅速崩溃，终于被募兵制所代替。

一、府兵制的恢复及其全盛

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隋朝的府兵组织亦随之瘫痪解体。一部分府兵兵士因生活所迫纷纷加入到农民起义的行列，一部分则为各地的大小军阀所控制，成为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李渊在晋阳起兵之时有兵3万，其中2万即是晋阳地区的隋朝府兵，另有一万为临时招募。在此基础上，李渊曾置大将军府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自为大将军，其下又设左、中、右三军，以建成和世民分别任左、右领军大都督，四子元吉为中领军大都督，镇守太原。在挺进关中途中，李渊又相继收编了大量归降的隋朝地方军队和农民起义军部队。攻克长安后，兵力已达20多万。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为了进行削平群雄割据的统一战争和摆脱军饷匮乏的严峻形势，遂着手恢复和建立隋时的府兵制。武德二年(619年)，李渊分关中为12道：即万年(今陕西西安)道，长安(今属陕西)道，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道，醴泉(今陕西礼泉北)道，同州(治今陕西大荔)道，华州(治今陕西华县)道，宁州(治今甘肃宁县)道，岐州(治今陕西凤翔)道，豳州(治今陕西彬县)道，西麟州(治今陕西麟游)道，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道，宜州(治今陕西宜君)道。每道各置1军，共12军。原属各道的军府均隶12军统领。第二年，12军各立军号，即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礼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①。每军置军头、

① 参阅《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将军总叙》。

副军头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以督耕战。不久，又仿照开皇旧制，重新设置了骠骑将军府，改军头为骠骑将军，副军头为车骑将军。军下有坊，置坊主一人，由本坊五品勋官担任，以检查户口，劝课农桑。于是，唐朝的府兵制基层组织，遂初具规模。

武德六年（623年），李渊“以天下既定，废十二军”。八年，因东突厥入侵，关中告急，又恢复了十二军的建制。此后，遂常设不废，构成了唐初府兵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他们战时出征，平时习武，兼耕农桑，耕战并重，具备了隋朝府兵“寓兵于农”和“兵农合一”的基本特征。

就在关中十二军建立前后，李渊又在中央设立了府兵的最高领导机构，即十六卫和东宫十率，并分别任命军将。至此，隋时府兵制的规模大体完备。

李渊所置关中十二军是唐初最基本的府兵编制，也是比较固定的禁卫部队。它们与十二卫以及东宫六率、秦王、齐王六府系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由于秦王世民和太子建成以及齐王元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因而也常使十二卫、十二军同亲王六府之间形成对立之势，严重干扰了皇帝对府兵的控制与指挥。

唐太宗即位以后，在选贤任能，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同时，又大力改革府兵制，其中包括重建府兵的基层组织——折冲府，完善府兵的编制体系，并建立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府兵的征集和训练，明确了府兵的任务与作用，从而使府兵制度进入了全盛时期。

二、折冲府的建立与“内重外轻”军事布局的形成

唐前期府兵制的基层组织折冲府是唐太宗在贞观十年（636年）建立的。这是由唐高祖李渊所设统军府演变而来。有人认为这“是继骠骑改统军、车骑改别将之后进一步贬抑军府长官的措

施”，且“有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意义”①。

折冲府设于有关州府，以设置地的山川地形或名胜古迹命名。各折冲府的兵源和府兵家室居处亦有一定范围，称为“地团”、“军团”、“乡团”，即在一定地域内定为团伍，其户籍属于州县，军籍则属于卫府。地团的范围大小要按折冲府分布的疏密和兵役的轻重而定。凡兵役重、兵源多的“有军府州”，折冲府设置的就多，地团区域就小。反之，地团区域就大。

折冲府按地团的大小和领府兵人数的多少又分上中下三等，兵满1200人者为上府，1000人为中府，800人为下府。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下，下府从六品下；别将一人，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另有长史和兵曹参军各一人。折冲都尉为折冲府最高长官，掌五校之属，总戎具、资粮、差点和教习之政令。每年十一月，要向尚书兵部上报所领卫士和兵马之数。冬季农闲之时，率所领卫士教练军阵战斗之法，并维持当地治安。左、右果毅都尉为卫府副长官，协助折冲都尉处理府务。长史主管仓储、车马、介胄之事及簿书、会要之法。兵曹掌兵吏粮饷、公廨财物和田园课税之事，并将应该番上府兵的名籍上报卫所。如遇征发当府卫士参加征行，则折冲都尉与当州刺史察验符契，相合乃发。若全府征发，则折冲都尉以下全府官吏从行；若征发部分府兵，则果毅都尉从行，少则别将从行。番上或番代府兵当配发马匹者，由官府拨给马价，由服役卫士购买，每匹马予钱2.5万。

关于唐前期在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数量，诸史记载不一：其中所载数字最少的为574府②，最多的可达800③。据《新唐书·地

---

①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版第137、138页。

② 参看《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折冲府》。

③ 参看陆贽：《论关中事宜状》，载《陆宣公奏议》卷十一。

理志》记载和近人考校补逸①，唐朝有名称和位置可考的折冲府共627个，其分布大致如下：

关内道共置289府，分布在2府17州。

其中京兆府有府131，《新唐书·地理志》共列出真化、匡道、水衡等11府名，近人又辑补义阳、萨宝、宣平等50府名，合计共得府名61；华州有普乐、丰原、义仓等20府，后人辑补怀旧府1，合计共得府名21；同州有济北、唐安、秦城等26府，近人辑补隆安、望之府2，合计共得府名28；商州（治今陕西商县）有洵水、玉享府2；凤翔府（府治今属陕西）有岐山、雍北、道德等府13，后人辑补积善、杜阳府2，合计共得府名15；邠州（治今陕西彬县）有嘉阳、宜禄、公刘等府10，后人辑补邠州府1，合计共得府名11；陇州（治今陕西陇县）有大堆、龙盘、开川、临汧等府4，后人辑补大候、源沂府2，合计共得府名6；泾州有泾阳、四门、兴教等府6，后人辑补临泾府1，合计共得府名7；原州（治今宁夏固原）有彭阳、安善府2；宁州有彭池、高望、静难等府11，后人辑补罗川府1，合计共得府名12；庆州有龙息、交水、同川等府8；鄜州（治今陕西富县）有洛昌，龙交、苇川等府11，后人辑补洛交府1，合计共得府名12；丹州（治今陕西宜川）有宜城、通天、同化等府5，后人辑补通化府1，合计共得府名6；坊州（治今陕西黄陵）有杏城、仁里、永平等府5，后人辑补嘉禾府1，合计共得府名6；延州有敦化、延川、宁戎等府7，后人辑补白羌部落、阎门府2，合计共得府名9；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有武略、河间、鸣沙等府5；盐州（治今陕西定边）有宁朔、顺化府2；绥州（治今陕西绥德）有伏路、义合、万古、大斌等府4，后人辑补信义府1，合计共得府名5；会州（治今甘肃靖远），《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黄石府1。

河南道有府73，分布在1府4州。

---

① 参看劳经原：《唐折冲府考》；罗振玉：《唐折冲府补考》；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补》，载《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

其中河南府有武定、复梁、唐城等府39，后人辑补箕山、公路、金墉等府8，合计共得府名47；汝州（治今河南临汝）有龙兴、鲁阳、梁川、郏城府4；虢州（治今河南灵宝）有鼎湖、全节、金门、开方府4；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有曹阳、华望、桃林等府15，后人辑补开方府1，合计共得府名16；郑州（治所今属河南），《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溱州、临泗府2。

河东道有府166，分布在2府14州。

其中河中府有兴东、德义、胡壁等府33，后人辑补安远、桑泉、朔陂府3，合计共得府名36；晋州（治今山西临汾）有神山、平阳、丰宁等府16，后人辑补平宁、交城、羊邑府3，合计共得府名19；绛州（治今山西新绛）有新田、大平、正平等府33，后人辑补冯翊、长祚、西河府3，合计共得府名36；慈州（治今山西吉县）有仵城、吉昌、平昌府3，后人辑补隰川、太义、孝敬等府6，合计共得府名9；太原府有兴政、复化、宁静等府18，后人辑补白马、太原府2，合计共得府名20；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有嘉善、六壁、介休等府12，后人辑补崇儒府1，合计共得府名13；沁州（治今山西沁源）有延双、安乐府2，后人辑补延卫府1，合计共得府名3；仪州（治今山西左权）有辽城、清谷、龙城府3；岚州（治今山西岚县）有岚山府1；石州（治今山西离石）有离石、昌化府2；忻州（今属山西）有秀容、高城、漳源、定襄府4；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有五台、东冶、雁门府3，后人辑补清凉府1，合计共得府名4；云州（治今山西大同），《新唐书·地理志》置府阙载，后人辑补金河、云中、尚德府3；朔州（今属山西），《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尚德、石井府2；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有勘黎府1，后人辑补礼会、铜鞮、从善、上党府4，合计共得府名5；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有丹川、永固、沁水等府5，后人辑补高平府1，合计共得府名6。

河北道有府51，分布在13州内。

其中怀州（治今河南汝阳）有丹水、吴泽府2，后人辑补南阳、景福、河内等府9，合计共得府名11；易州（治今河北易县）有

遂城、安义、修武等府 9；幽州有吕平、涿城、德闻等府 14，后人辑补润德、延俊、英乐等府 4，合计共得府名 18；平州（治今河北卢龙）有卢龙府 1；妫州（治今河北怀来东南）有密云、白枟府 2，后人辑补妫泉府 1，合计共得府名 3；蓟州（治今天津蓟县）有渔阳、临渠府 2；邢州（治今河北邢台）、魏州（治今河北大名）、赵州（治今河北赵县）、相州（治今河南安阳）、洺州（治今河北邯郸东北）和恒州（治今河北正定），《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后人辑补平乡、六城、大陆等府 7。

山南道有府 15，分布在 1 府 9 州。

其中江陵府有罗含府 1，后人辑补夷陵府 1，合计共得府名 2；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有东阳府 1；襄州（治今湖北襄樊）有汉津府 1；均州（治今湖北郧县）有至诚府 1；金州（治今陕西安康）有洪义府 1；梁州（治今陕西汉中）有丽水府 1，后人辑补光义、汉中、廉让府 3，合计共得府名 4；凤州（治今陕西凤县）有归昌府 1；成州（治今甘肃成县）有平阴府 1；扶州（治今四川南坪）有安川、会川府 2；利州（治今四川广元），《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嘉川府 1。

陇右道有府 33，分布于 11 州内。

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有成纪、修德、清德等府 6；渭州（治今甘肃陇西）有渭源、平乐、临源等府 4，后人辑补渭川府 1，合计共得府名 5；兰州（今属甘肃）有金城、广武府 2；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有安西府 1；岷州（治今甘肃岷县）有祐川、临洮、和政府 3；叠州（治今甘肃迭部）有长利府 1；芳州（治今甘肃迭部东南），《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甘松、扶松府 2；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有明威、洪池、姑臧等府 6，后人辑补显美府 1，合计共得府名 7；沙州（治今甘肃敦煌）有龙勒、效谷、悬泉府 3；瓜州（治今甘肃安西东南）有大黄府 1；甘州（治今甘肃张掖），《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合黎、甘峻府 2。

淮南道有府 9，分布于 4 州之内。

扬州有江平、新林、方山等府 4；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有新

川府1，后人辑补和川府1，合计共得府名2；寿州（治今安徽寿县），《新唐书·地理志》置府阙载，后人辑补安城府1；安州（治今湖北安陆）有义安府1，后人辑补宝城府1，合计共得府名2。

江南道有府7，分布于6州之内。

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金山府1；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有浦阳府1；温州（今属浙江）、福州（今属福建），《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泉山、三州等府3；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有长沙府1；吉州（治今江西吉安），《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永泰府1。

剑南道有府11，分布于1府5州。

成都府有威远、归德、二江府3；彭州（今属四川）有天水、新兴府2；蜀州（治今四川崇庆）有金堰、广隆、灌口府3；邛州（治今四川邛崃）有兴化府1；汉州（治今四川金堂西北）有玉津府1；松州（治今四川松潘），《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交川府1。

岭南道有府6，分布于5州之内。

广州（今属广东）有绥南、番禺府2；贵州（治今广西贵港）有龙山府1；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澄州（治今广西上林南）、潘州（治今广东高州），《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滙南、上林、潘水府3。

由此可知，唐都长安所在之关内道共置府285，有府兵26万，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京兆府有131，又占关内道折冲府及府兵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就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 和“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加强了朝廷集权。置府次多的是河东道，这不仅因为这里是唐王朝的发迹之地，重要的还在于该道的太原地区历来是突厥南侵的要冲地带，在这里重设军府，无疑是为了加强对突厥的防御力量。河南道是隋唐两朝的东都所在地，武则天执政以后，又迁都洛阳，因而这里置府多于他道，自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然也有“重首轻足”之意。

据《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苏冕《会要》和李繁《邺侯家传》诸书云，河北道“不置府兵”。征诸《新唐书·地理志》及有关史书，《会要》和《邺侯家传》的这个说法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与河北道毗邻的东北地区从武则天执政以后，居住在这里的奚与契丹等少数族逐渐强盛，大肆入寇河北州县，而“河北之地，人多壮勇”①，唐朝在这里置府是显而易见的。也许这里置府比其他诸道为晚，《会要》等书所说当为未置军府时事。

三、府兵制的编制体制

唐朝的府兵编制大体可分卫、府、团、旅、队、火6个组织机构。其中朝廷十二卫② 和东宫六率是府兵的最高领导机构，折冲府是府兵的基本建制单位，团、旅、队、火则属于折冲府之下的基层组织。

朝廷统领府兵的十二卫和东宫六率的官员设置与所统军府以及职能已详述于上节第三项。这里需说明的是这些府兵的最高领导机构所统军府均散布诸道，并不集中一地。如左右卫所领50外府，多分布于关内、河东、河南、河北、陇右、剑南等6道之地；左右骁卫所领49府亦分布在关内、河东、河南、江南、山南五道；左右武卫所领49府，亦分布在关内、河东、河南、山南四道。余皆如此。同时，对某道某州而言，折冲府虽有多少之分，但所隶卫、率的系统均不相同，而战时出征的统军将帅亦往往不是本卫将领。这样，“将虽有名而权实去，兵将在内而京师实重”③，不易形成割据势力。故有人认为这是唐前期以卫统府的一个重要方略④。

---

① 《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

② 唐十六卫中，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不领府兵。

③ 杜牧：《原十六卫》，载《樊川文集》卷五。

④ 参阅《府兵制度考释》第160页。

唐朝折冲府的建置时间、数量、分布地区以及具体编制、职能等已详述于本节第二项。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折冲府虽直属诸卫统领，但折冲府所在的地方官即州刺史对折冲府仍具有一定的督察和牵制职能。如府兵平时的军事训练，州刺史有权进行检查督促，如“其艺非精，士不教习，则罪其折冲”①；折冲府的马匹出入，要由州刺史和折冲、果毅共同审验查阅决定；“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②。由于州刺史的官品一般高于折冲，故折冲都尉也要对州刺史形成一种从属的习惯。这种地方官对折冲府军事行政拥有一定监督检查的权力，乃是唐前期中央集权政治的加强在兵制上的具体体现。

折冲府所辖的军团以校尉任主官，辖两旅，有兵 200 人；旅以旅帅为主官，辖两队，有兵 100 人；队以队正为主官，队副为副官，辖五火，有兵 50 人；火以火长为主官，有兵 10 人。

四、府兵的征集与训练

唐朝的府兵有内、外之分。内府指中央的五府三卫及东宫的三府三卫。五府三卫为亲卫、勋卫、翊卫，而勋卫、翊卫又分为一、二两府，故名五府三卫。东宫的三卫不再分府，故为三府三卫。而设在地方的折冲府则为外府。但无论外府还是内府府兵在拣点、征集时，都有资产、材力和丁口三项标准，而在法令上最重资产的比较和选择。

内府三卫的卫士均为品官子弟，仅限于二品至五品的子孙，故“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正因为三卫卫士的征集条件太高，一般士大夫家的子弟只能望而兴叹，很多人便宁可做流外官，由此迁转入仕，亦不失为入仕之径。故到后来，府兵崩坏之时，“三卫益贱，人罕趋之”，走向了另一极端。

① 《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邺侯家传》。

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外府府兵主要“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①，这和内府三卫的点充二至五品官的子孙正好衔接。在拣点时又要根据资产、材力和丁口三项标准而定，即“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②。府兵兵士一般从21岁入军，60岁出军。折冲府每3年简点一次，主要办理入军和出军的有关手续。

凡简点入军的府兵丁壮除农忙时参加生产外，冬季农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习武练兵。正如《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所云："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遂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由此可知，府兵平时在军府进行的冬季训练主要有"薄战"和"纵猎"两个部分。其中"薄战"是军训的主要内容。因为当时的军队出征，队形变化极为重要。所谓"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进，退无趋走，以正合，以奇胜，听音睹麾，乍合乍离"。因此，士卒只有"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③，才能临阵有序，随阵入战。否则，紊乱阵角，就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因此，"薄战"训练当是府兵参加征行的战前演习。"纵猎"则是府兵近似实战的个人武艺训练，它可以提高兵士的战斗技能。

另外，府兵在番上或番代之前，还要由折冲府官员“率而课试”。这既是对府兵平时进行军训成绩的最后考察，也是服役前进行的一次实战演习。

---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③ 《通典》卷一六二《兵典》引《卫公兵法》。

府兵在服役期间，无论是宿卫京师还是戍守边防，其多数时间仍要进行骑射训练。唐太宗即位之初，就曾经常亲引卫士在殿廷教习骑射，并经常告诫他们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据说，从此"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①。

唐初统治者不但极其重视府兵的军事训练，而且对府兵的技艺和体力要求亦很严格。当时一般力士的头等标准是力负 630 斤，行 50 步②。其次是引弓 240 斤，弩射及 230 步，四发二中；单弓弩射及 160 步，四发二中。步兵的骁捷之士也要"左持粮，右持械，日越七百里"③。唐前期对边疆地区的战事多能获胜，当与唐政府对府兵的严格训练和严格要求不无关系。

五、府兵的任务与作用

唐朝府兵的任务主要是番上宿卫和番代征防。

番上宿卫京师是府兵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故有一套严密的规定和固定的办法。正如《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所云："凡当宿卫者，番上兵却以远近给番。五百里内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这里所说的番是以在京师宿卫的实际天数为一月计算的。例如一个距京师 500 里的上折冲府，按规定应是每年五番，即这个折冲府应将全府卫士 1200 人分作五组，轮流上番，每组平均宿卫京师的实际天数应为 73 天，加上卫士往返旅途和休息时间以 24 天计算④，两次往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武德九年九月。

② 参阅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选士篇》。

③ 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载《文苑英华》卷六四七。

④ 《唐律疏议》卷一《名例》："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这里以步行计算，每人每天旅程当为 50 里。

返当为48天，加上宿卫京师的73天，那么该府每位府兵每年的兵役负担，当在120天以上，约4个月。由于距离京师愈远的折冲府卫士用于往返旅途和休息的时间越长，故番上的次数也应越多，实际服役的时间也会增加。为了解决距离京师过于遥远军府府兵的沉重兵役，唐王朝遂将番上军府按照距离京师的远近分为两类：一类是亲身上番府，一类是纳资代番府。正如《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所载："凡诸卫及率府三卫贯京兆、河南、蒲、同、华、岐、陕、怀、汝、郑等州，皆令番上，余州纳资而已。"上述番上的府州分属关内、河东、河南和河北四道，多数距长安较近，最远的怀州亦在千里之内，仍属七番之列。其余军府均可纳资代番。纳资的具体钱数如何征收，史书阙载，已无可考，但以三卫违番和文武散官不上番的规定推算，一个府兵每年的代番钱当在2000到3000文之间。府兵的负担之重，可以想见。

番代征防是府兵的另一任务。其中防是固定上番，即每个折冲府都要在固定地区防守戍卫；征是临时差遣，即遇有紧急军务，由尚书兵部按照皇帝诏敕，向各军府颁下符契，折冲府长官和州刺史勘验无误后，府兵遂得出征。由于戍防有番期规定，征行为临时差遣，具体日期又很难确定，故又有按征行时日"免番"的规定："若征行及使，经两番以上者免两番。其不免番，还日即当番者，免上番"，"若征行之镇守者，免番而遣之"①。征行最多可免三番。如果"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免一至三番尚可相抵，如超过一年，便成超期服役。在边功频繁、战事屡兴时期，府兵超期服役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杜甫诗中讲的"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就是对府兵所受征役之苦的生动写照。

唐朝的府兵无论是在宿卫京师、戍守边防以及征行作战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唐前期政局稳定，边境安固，经济繁荣，与府兵的作用密不可分。贞观初年，李靖袭击突厥于碛口，即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以匡道府折冲苏定方所率的200骑兵为先锋，而大获全胜的①；贞观七年(633年)，嘉(州治今四川乐山)、陵(州治今四川仁寿)二州僚族起兵叛乱，邗江府统军牛进达率部将其镇压②；贞观十五年(641年)，在唐对吐谷浑的战斗中，果毅都尉席君买以精骑120击败了吐谷浑的优势兵力③；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对高丽的战争中，府兵战士最为活跃：在辽东城之战中，果毅都尉马文举勇于冲击；新城之役，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表现了极强的战斗力。类似这些府兵将士屡立战功的事例，不绝于史，举不胜举。这说明府兵在巩固边防和内外战争中确实起到了中坚作用。

六、唐前期的兵募

唐前期的府兵按每个折冲府千人计算，总数约为60余万。但这数十万府兵却分散在600多个折冲府中，且按番服役。有人推算，“每番总人数至多八万到十二三万，而宿卫京城的经常需要好几万人，所以可资调遣出征或防守外地的人数不会很多，即使集中调遣，充其量也不能超过两番总数，除留供宿卫外，不可能多于十万人”④。为了弥补府兵兵员的不足，在遇有重大战事时，唐王朝遂行招募之法，征集兵源，史称兵募。如唐太宗在用兵辽东时，就曾“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趋平壤，以伐高丽”⑤。当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曾自豪地说：“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⑥ 唐高宗在灭亡百济

① 参阅《旧唐书》卷八十三《苏定方传》。

②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太宗贞观七年十二月。

③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四月。

④ 《府兵制度考释》第174页。

⑤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

和高丽的作战中，都有大量兵募参加，其中河南、河北、淮南10余州，就“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①；咸亨三年（672年），又发梁、益等18州兵募5300人，遣右卫副率梁积寿往姚州出击叛蛮②。总之，唐前期的兵募同府兵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在保卫边防、稳定政局和中外战争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前期的兵募在武德、贞观年间大致以自愿投募为主，但已出现了“背军逃亡”的现象，故李渊曾在武德二年发布过对“义士、募人”关于“罪无轻重，皆赦除之”③的诏书。到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以后，到州县发遣兵募时，就已出现了“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④的现象。明显带有强制性质。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强制征发，渐以成制：“凡天下诸州差兵募，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选前资官、勋官部分堪统摄者，节级权补主帅以领之”⑤。并规定兵募的“军行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不足则自备，贫富必以均焉”⑥。直到府兵制瓦解以后，募兵遂代之以兴，成了唐后期的主要兵制。

七、团结兵

唐代团结兵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发府兵及兵募已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地方军团。其兵员从当地丁户殷实、材力强壮中挑选。享有蠲免征赋的优待。春夏归农，秋冬集中训练，每日供给口粮、酱菜。允许在家练习弓矢，每年按期进行考核。如有战事，则应召出征。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由于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举兵叛乱，败唐将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诸部，攻陷营州（今

---

①② 《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

③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三。

④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⑤⑥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辽宁朝阳)。武则天遂于九月"初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①。这是团结兵设置之始。圣历元年（698年）十二月，又令"河南、河北置武骑团"，每150户出兵15人，马一匹。唐玄宗时，团结兵进一步扩大，"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镇防团结兵"②，剑南节度使统团结营，有兵1.4万人，马1800匹。"陇右通共团结马步三万九千人"，"河西道蕃汉兵团结二万六千人"③。总计遍布全国的团结兵当不下10万。这些团结兵士协助府兵和兵募，在唐前期的诸多作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又设团练使和都团练使等，统领团结兵士，使之成为协助正规军抵御少数族入寇、平定藩镇叛乱及镇压农民反抗斗争的重要力量。

第四节　边防体制及军屯制度

唐朝在开元以前的边防体制由都督与都护以及军、镇、守捉、城、戍等多种机构组成。再加上完备而严格的烽燧和军屯制度，促进了边防体制的加强和巩固。开元以后，为了适应大开边功的需要，统治者又相继招募边兵，设置节度使，遂使边防力量更为强大，但由此也造成了边将和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局势，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一、边防组织体制

唐前期在沿边及"襟要之地"设置的都督府是边防地区最高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
②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③ 《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的领导机构，详见本章第二节第三项。军及守捉设置稍后，其将领称使，为带职而非官称，故无品秩。而城、镇与戍袭自前代，其将领称将、称主，皆有品秩①。凡5000人以上的军又置副使一人，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每军皆有仓、兵、胄曹参军各一人；镇、戍又按领兵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上镇置将一人，镇副一人，录事一人，仓、兵、胄曹参军各一人，中、下镇各减仓曹参军一人；上戍置主一人，戍副一人，中、下戍各减戍副。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职方员外郎》条载："凡天下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上述边防机构的名称及其设置位置大致如下：

关内道：置白草军、朔方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新昌军、新泉军、天柱军、延恩县经略军、义勇军、横野军、天德军、天安军等12军；丰宁城、保宁城、羊马城、乌延城、宥州城、临塞城、阴河城、陶子城、三受降城等11城。

又有单于都护府，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置，领狼山、云中、桑乾3都督府及苏农等14州；安北都护府，高宗总章二年(669年)由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所置燕然都护府改置，领瀚海、燕然、金微、幽陵、龟林、卢山等6都督府及狼山等羁縻州府27。

河东道：置天兵、大同、天安、代北、横野、清塞等6军，雁门、云中、楼烦等3守捉。

河北道：置恒阳、横海、北平、幽州经略、纳降、安塞、瀚海、卢龙、柳城、清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平卢、镇安等17军；宗王、乾涧、殄寇、淮北、爱川、周夔、白阳度、云冶、广边、大王、北来、保要、鹿固、赤城、西峡石、东峡石、绿畴、米砖、长杨、黄花、紫蒙、白狼、昌黎、辽西、横河、柴城、临河、黄岩等21戍；赫连、三叉、横山、米城等4城；洪水、

---

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盐城、渝关、汝罗、怀远、巫闾、襄平等7守捉。

又有安东都护府，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以高丽之地置，治今平壤，领都督府9、州42，县100。又有怀远、保定2军，安东守捉。

陇右道：置镇西、天成、振威、安人、威戎、河源、白水、天威、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赤水、大斗、白亭、豆卢、墨离、建康、宁寇、伊吾、天山等25军；平夷、绥和、合川、乌城、张掖、交城、百帐、豹文山、蓴泉、罗护、赤亭、狼山、张三城等13守捉；临塞、绥戎、定戎等3城；武安、石会汉等2戍。

又有北庭都护府，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置于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统天山以北濛池、昆陵2都护府及匐延、嗢鹿州、洁山等21都督府。设瀚海、静海2军，沙钵城、冯洛、耶勒等4守捉；安西都护府，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置于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后移龟兹（今新疆库车）。统龟兹、于阗（今于田）、疏勒、焉耆（后改碎叶）等安西四镇及西域月支、大汗、条支等16都督府。并有保大军；兰城、坎城、葱岭、于术、榆林、龙泉、东夷僻、西夷僻、赤岸等9守捉；胡弩、固城、吉良、且末、皮山等5镇兵。

江南道：有三河、上亭、湖口、湓城、百丈、涤口、花石、戎分、洞口、平阳、雷石、卢洪等12戍；犹口、桥口2镇。

剑南道：有威戎、威胜、安夷、昆明、宁远、洪源、通化、松尚、平戎、天保、静戎、威远等12军；羊灌田、朋笮、绳桥、合江、谷塠、三谷、乾溪、白望、暗桶、赤鼓溪、石梯、达节、鸦口、质台、骑安、通耳、瓜平、乾溪、侏儒、箭上、谷口、澄川、南江等23守捉；尚风戍；犍为、沐源、寺庄、牛径、铜山、曲滩、陁和、平戎、依名、利云、婆笼、马鞍、始犁、峨眉、和川、始阳、灵关、安国、定蕃、飞越、和孤、陇东、益登、清溪、御藩、吉超、宁塞、姜维、石门、龙腾、和戎、马湖、移风、伊禄、义宾、可封、泥溪、开边、平寇等47镇；七盘、安远、龙溪、新安、三阜、沙野、苏祁、保塞、罗山、西泸、蛇勇、遏戎、晏山、临通、统塞、集重、伐谋、制胜、龙游、尼阳、武侯、廓清、铜山、

肃宁、大定、要冲、潘仓、三碉、杖义、琉璃、和孤、峨和、白岸、都护、祚鼎、苻坚等36城。

岭南道：有广州经略、清海、邕州经略、桂州经略、容州经略等5军；屯门、勤连等2镇卫及西零戍。

又有安南都护府，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治交州（今越南河内）。统安南德化、郎茫、龙武等羁縻41州。

从武则天执政以后，新罗崛起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唐争夺高丽故地；吐蕃也加强了对河西和西域的入侵，后突厥默啜可汗与铁勒回纥部相继复兴，经常南入长城寇掠；奚与契丹亦大肆进犯河北地区。于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了加强边防力量，遂在周边地区设立10个节度使，派驻长征健儿，企图大开边功，整饬边防。于是节度使便成了这一时期边防驻军的最高统帅。其属僚有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掌书记一人，参谋一至二人等。这10节度的名称、设置时间、位置及统兵情况大致如下：

河西节度使，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置，治凉州，统赤水、新泉、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等8军及张掖、交城、白亭3守捉。有兵7.3万，马1.94万匹。主要为隔断吐蕃与回纥诸胡的联系，保卫河西安全。

范阳节度使，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置，治幽州。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怀柔、怀远等11军。有兵9.14万，马6500匹。主要防卫奚与契丹。

陇右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置，治鄯州（治今青海乐都）。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积石、莫门、振武、威戎、镇西、神策、宛秀、保义等12军，绥和、合川、平夷等3守捉。有兵7.5万，马1.06万。主要防卫吐蕃。

朔方节度使，开元元年（713年）置，治灵州。统经略、丰安、定远、东西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7军府。有兵6.47万，马2.43万匹。主要防卫漠北突厥诸部。

剑南节度使，开元五年（717年）置，治成都。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州、南江等6军及团结营和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718年）置，治龟兹。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及伊吾、天山、瀚海、天山等4军、葱岭等守捉。有兵2.4万，马2700匹。主要为镇抚西域诸国。

平卢节度使，开元七年（719年）置，治营州。统平卢、卢龙2军。有兵3.4万，马5300匹。主要防卫室韦、靺鞨等族。

河东节度使，开元十一年（723年）置，治太原。统大同、横野、岢岚、天兵、清塞等5军及忻、代、岚三州兵马、云中守捉。有兵5.5万，马1.4万匹。与朔方节度使互为犄角，防卫漠北。

北庭节度使，开元十五年（727年）置，治庭州。统瀚海、天山、伊吾3军。有兵2万，马5000匹。主要防卫西域突骑施等部。

岭南五府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置，治广州。统经略、清海军2军。有兵1.54万。主要防卫夷獠，绥靖海南诸族。

二、烽燧制度

烽燧亦称烽火，为古代边境地区报警的信号设施。早在商周时期即已有之。据唐人李贤《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注云："前书音义曰：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置其中，命低之，有寇即燃之，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由此可知，烽用于夜间放火报警，燧用于白昼施烟报警。由于烽燧一般均设在用土筑成的高台之上，故又称烽火台。据唐人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广动植》中云："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故唐代的燧烟亦有燃烧狼粪者。比喻战争发生的"狼烟"一词大概即由此而来。故薛逢有《狼烟》诗云："三道狼烟过碛来，受降城上探旗开"，当指此。

唐朝的烽燧制度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更趋完善。大凡每30里置一烽燧，如有山冈阻隔，可于适宜、近便之处设置，以

能够相互望见为宜，不必局限此制。临近边境的烽燧要在附近筑城，严加保护。唐代设在全国的烽燧究竟有多少数目，史书阙载。这可能由于烽燧经常增减的缘故。唐中宗神龙三年（707 年），摄御史大夫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三受降城后，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①；唐高宗永隆元年（680 年），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②。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唐玄宗“以边隅无事，寰宇乂安，内地置烽，诚为非要”，下敕“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计烽帅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③。以此推算，唐朝设在边境和内地的烽燧当在 1 万以上。

唐朝于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还有烽子若干人。均归尚书兵部职方司管理。烽燧官吏主要掌管烽燧的保护、修缮和报警。其放烽有 1 炬、2 炬、3 炬、4 炬的规定，烽炬的多少应根据入侵敌军的多少决定。施燧的规定大致与此相同。这样，接到烽燧报警以后，朝廷就可以决定派遣抵御部队的多少。另外，设在关内的烽燧，还须在每日初夜，放烽一炬，报告平安，故“谓之平安火”。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八日，由于潼关失守，烽燧吏卒皆溃，“无人复举火”，故至夜暮，“平安火不至”④，杨国忠始首倡幸蜀之策。

总之，由于唐朝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又完备的烽燧制度，故对边防安全和国内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军 屯 制 度

唐代的军屯是指在军、镇、城、戍和守捉等边防要地适宜耕垦的土地上由番代士兵进行的屯田形式。目的在于充足军粮，减

---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张仁愿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七月。

③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职方员外郎》。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少转输，节省财力。唐高祖武德初年，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以“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上表请求在太原附近开垦屯田，“以省馈运”。诏准后，“岁收数千斛”①。这当是唐朝开垦屯田之始。嗣后，唐王朝遂在边境地区大开军屯，并在军防令中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并）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疏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②。故至开元末年，沿边地区的屯田已达1037屯，其分布如下：

河东道131屯，其中大同军40屯，横野军42屯，云州37屯，朔州3屯，蔚州3屯，岚州1屯，蒲州5屯。

关内道256屯，其中北使2屯，盐州监牧4屯，太原1屯，长春10屯，单于31屯，定远40屯，东城45屯，西城25屯，胜州14屯，会州5屯，盐池7屯，原州4屯，夏州2屯，丰安27屯，中城41屯。

河西道154屯，其中赤水36屯，甘州19屯，大斗16屯，建康15屯，肃州7屯，玉门5屯，安西20屯，疏勒7屯，焉耆7屯，北庭20屯，伊吾1屯，天山1屯。

陇右道172屯，其中渭州4屯，秦州4屯，成州3屯，武州1屯，岷州2屯，军器4屯，莫门军6屯，临洮军30屯，河源28屯，安人11屯，白水10屯，积石12屯，富平9屯，平夷8屯，绥和3屯，平戎1屯，河州6屯，鄯州6屯，廓州4屯，兰州4屯，南使6屯，西使10屯。

河北道208屯，其中幽州55屯，清夷15屯，北郡6屯，威武15屯，静塞20屯，平川34屯，平卢35屯，安东12屯，长阳使6屯，渝关10屯。

剑南道9屯，其中巂州8屯，松州1屯。

河南道107屯，其中陈州23屯，许州22屯，豫州35屯，寿

---

① 《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附从孙静传》。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州27屯①。

按照唐朝规定，军屯每一大屯50顷，小屯20顷，民屯每屯20～30顷，取军、民屯每屯平均数30顷计，这一时期的屯田可达3万余顷，每亩按岁收一石计算，屯田收获当有300万石以上。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后，由于唐王朝在西北地区大兴和籴之法，使军屯顷亩大为减少。到天宝八载（749年），天下屯收仅有“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②，比开元初年相比，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以上。安史乱后，河西、陇右被吐蕃占领，河北地区亦为藩镇盘踞，故军屯数量当更为减少。

唐朝的尚书省工部屯田司是管理全国屯田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该司专责“天下屯田之政令”的长官是屯田郎中和员外郎。屯田司之下又有两个具体的领导机构：凡属中央皇室的屯田均隶司农寺管，该寺设屯监一人，丞二人，每屯又有屯主、屯副各一人；设在地方的屯田则属当地总管、都督、刺史和军、镇长官管理。唐高宗仪凤年间，由于娄师德任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军镇遂开始出现了“营田”职称的官员。到延载元年(694年)，娄师德升任河源军营田大使，“营田使”遂成为管理军屯事务的专职官员③。营田使之下的属吏还有营田副使、营田判官和营田巡官及屯主、屯副等。

军屯上的耕作者主要是本军、州的士卒，其所用耕牛、农具、种子等均由国家供给，收获一般存于本军州，充作军粮。军州长官要按照所营屯田面积和不同农作物的品种，合理给所属士卒分配功役。其计算役力的标准是：“凡艺稻一顷，料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大豆，一百九十二日；小豆，一百九十六日；乌麻，一百九十一日；麻，四百八十九日；床黍，二百八十日；麦，一百七十七日；荞麦，一百六十日；蓝，五百七十日；蒜，七百二十日；葱，一千一百五十六日；瓜，八百一十八日；蔓

① 以上参阅《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屯田司》。

② 《通典》卷二《食货·屯田》。

③ 参阅《旧唐书》卷九十三《娄师德传》。

菁，七百一十八日；苜蓿，二百二十八日”①。务使“苦乐均平，量力驱使”，否则，如果“使不以理，致令（士卒）逃走者”，要处以“杖六十”以至“徒一年半”② 的刑罚。

由于唐前期对军屯生产严格管理，极为重视，故相继出现了很多以善于经营屯田而著称的官吏。如唐高宗时期的娄师德在“检校屯田”期间，“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③；武则天大足年间，凉州都督、陇右诸州大使郭元振在大开屯田以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粟麦）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大大改变了“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④ 的粮荒局面。由此可以看出，唐前期的军屯制度对充足军粮和巩固国防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节　马政制度与骑兵发展

唐朝建立之初，即开始马政建设。唐太宗即位后又大兴马政，不仅马政制度更趋完善，而且监牧养马多达 20 多万匹，创历史最高纪录。唐朝管理军马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的太仆寺，专责养马的监牧多设在关内、陇右和河东诸道。由于唐初马政的复兴发展，使军队的骑兵装备更加精良，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战斗能力，而且也进一步巩固了边防安全。

一、唐代马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马匹不仅是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工具，而且也是进行战争的有生力量。加之历代中原王朝在同西北游牧民族

①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屯田司》。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③ 《旧唐书》卷九十三《娄师德传》。

④ 《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

强大骑兵的长期角逐中，深深懂得只有训练和配备骑兵劲旅，才能抵御边患，开拓疆宇。因此，从秦汉直至晋隋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马政建设。

早在隋朝末年李渊任太原留守之时，他就已经认识到了配备骑兵的重要性。他曾对马邑郡丞王仁恭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因此，他主张在抵御突厥入侵时，应"同其所为，习其所好"。故经挑选以后，便迅速组建了一支2000多人的骑兵部队，"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果然，大"曜威武"①。晋阳起兵前夕，他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购得突厥良马2000余匹，再加之西突厥史大奈又从会宁率众骑前来归附②，骑兵阵容更加强大。在后来的攻占霍邑、围攻河东以及克复长安等重大作战中，这支骑兵部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③。

唐朝建立以后，在李世民指挥的一系列统一战争中，装备精良而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更加英勇善战，它与步兵相互配合，形成两支突击力量，并以骑兵的快速冲击，多次克敌制胜，立下了显赫战功，以致使李世民对良马善骑喜爱不已，他曾派人把他一生中曾经乘坐的6匹骏马的形体雕刻在昭陵石壁上，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正是基于对骑兵的高度重视，故在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便把从突厥获得的2000匹战马以及从赤岸泽（今陕西大荔西南、渭河北岸）获得的3000匹隋马，徙于陇右，开始了马政建设。

唐太宗即位以后，又大兴马政。他一方面挑选贤能，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刘武周降将张万岁，让其担任太仆少卿之职，专掌

---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 参阅《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

③ 参阅汪篯：《唐初之骑兵》，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汪篯隋唐史论稿》。

监牧养马达 24 年之久，“恩信著于陇右”。经过数十年的饲养蓄息，到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 年），监牧马匹增至“七十万六千匹”①。如果加上军镇、驿站和闲厩等马，国马总数当不啻百万。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完备的马政机构和养马法令，使马政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大量而成功地引进沿边少数族优良马种，“既杂胡马，马乃益壮”②，极大地提高了中原马匹的质量。由于上述措施的实施，使马政建设盛况空前。“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生动写照。

但从麟德元年（664 年）张万岁被免职以后，由于“马官乱职，或夷狄外攻，或师圉内寇”，致使牧马“潜耗太半，所存盖寡”④。到唐玄宗开元初年，牧马仅存“二十四万匹”⑤，马政中衰。

唐玄宗即位以后，从整顿马政机构入手，选拔“奉公正直，不避权贵”⑥的王毛仲担任检校内外闲厩并知监牧使，以精通养马的张景顺为副职，专职马政，其下又置“明闲牧马者”担任基层监牧官吏，迅速恢复并提高了马政机构的效能。然后又“择张氏（万岁）之旧令”，恢复了原来行之有效的养马法规，因而出现了“郡牧孳息，遂数倍其初”⑦的复兴局面。到开元十三年（725 年），不但监牧马匹由开元初年的 24 万匹，猛增至 43 万匹，而且王侯将相、府兵将校以及庶民百姓的私马，也“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⑧。

安史之乱后，边兵内调，西北空虚，吐蕃乘机东侵，陇右被占，监牧陷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⑨，马政从此一蹶不振。

---

①③ 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载《张说之文集》卷十二。

②⑧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④⑤ 郄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碑》，载《全唐文》卷三六一。

⑥⑦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

⑨ 《唐会要》卷六十五《闲厩使》。

二、军马的管理机构及其马场分布

唐朝管理军马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兵部的驾部司和中央的太仆寺。驾部司的职责是掌管“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①；太仆寺设太仆卿一员，太仆少卿二员，“凡监牧羊马所通籍账，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②。太仆寺之下又设马坊、牧监等机构。牧监按所养马匹数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养马5000匹以上为上监，5000匹以下、3000匹以上为中监，3000匹以下为下监。每监设牧监、副监、丞、主簿等若干人，专职牧马。牧监之马分群放牧，凡马、牛以120为群，驼、骡、驴以70为群，羊以620为群。群设牧长、牧尉、掌闲等，负责调教马牧。唐高宗仪凤年间，牧监始置诸牧监使，后又有群牧都使、闲厩使等职，诸使均置副使、判官等。又立南使15，西使16，北使7，东使9，分别统领牧监、马坊。

唐前期不但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马政机构，而且还制订了一系列严密的管理制度：牧监官吏每年都要对马的年齿、数量登记造册，由群牧使统一上报太仆寺。太仆寺官员据册要对马的孳生和死耗进行检查。凡孳生繁息超过规定数量者有奖，死耗减少超过规定数量者有罚。每年年终，监牧使都要对所属牧监“巡行孳课之数，以功过相除，为之考课”③。这就大大促进了养马效率的提高和马政的迅速发展。

唐前期的牧监马坊在贞观至麟德年间主要分布在泽茂草丰、地域开阔的关内和陇右二道。当时从首都长安到陇右的岐、豳、泾、宁4州之间共置保乐、甘灵、南普润、北普润、岐阳、太平、宜禄、安定等8坊48监，地广千里，有田1230顷，募民耕种，以

---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司》。

②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

③ 《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四》。

给刍秣。后因马多地狭，又增置8监，布列于河西丰旷之野。高宗仪凤年间，在设置东、西、南、北四牧监使的同时，又增置8监于盐州（治今陕西定边）、8监于岚州，置盐、岚二使以统之。唐玄宗恢复和复兴马政以后，又将所购的突厥马匹放牧于朔方、河东和陇右诸道，与胡马杂交，不但扩大了牧监的范围，而且也提高了马匹的素质。

三、马政制度与骑兵和边防斗争的关系

唐代的监牧马匹除少数供给皇室闲厩用马以外，主要补充军镇战马。"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① 而监牧饲养马匹的粮料则主要依靠军镇的屯田供给，多数军镇长官和节度使又兼领屯田和监牧事。这样，军镇、屯田和监牧就构成了唐前期边防体制中3个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组成部分。又因为沿边军镇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故监牧的盛衰和骑兵配备的强弱在边防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贞观至麟德年间，由于马政兴盛，骑兵精良，加之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又特别重视骑兵的建设和训练，因而相继取得平突厥、灭吐谷浑、进驻西域和征服高丽等赫赫战绩，充分体现了边防力量的强大。唐高宗后期特别是唐中宗时期，由于马政中衰，边防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故出现了吐蕃再次占据吐谷浑故地，久久不能恢复的状况；武则天执政以后，虽对吐蕃、突厥连年用兵，但由于骑兵不足，却经常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蜀婴吐蕃之患"，"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②的被动局面。因此，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竟大声疾呼："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③；"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载《陈伯玉集》卷九。

③ 《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

国将危亡"①；"自古与匈奴战，非士马相资不可"② 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所以出现"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至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③的局面，与复兴马政不无关系。至于安史乱后，马坊尽失，国马耗尽，藩镇林立，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史书共载，人所共知，不再赘述。

第六节　其他国防设施与后勤建设

唐前期的国防设施和后勤建设除严密的边防组织体制、完备而兴盛的烽燧、军屯和马政制度以外，尚有充足的仓储与屯田，精良的兵器与装备以及四通八达的军事交通运输。这一切都构成了唐朝坚强的国防设施和周密的后勤建设，是唐前期取得中外战争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仓 储

唐朝建国以后，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仓廪体系：既有接纳租税的正仓，又有中转东南漕粮的转运仓以及接纳地税的义仓、常平仓和贮备军饷的军仓等。此处主要叙述的是和供应军饷有关的军仓和正仓。

唐朝的军仓是在戍边兵驻防地和屯田处设置的固定仓储，因为该仓以供应军饷为主要职能，故以军仓命名。

唐代的军仓按其贮粮数量和仓储规模大致可分为 3 种类型：即大型的军镇仓、中型的镇戍仓和小型的烽铺仓。

军镇仓是军仓中规模最大的仓储。由于该仓主要收贮军镇屯

① 《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三》。

② 陈子昂：《谏曹仁师出军书》，载《陈伯玉集》卷十。

③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史臣曰》。

田所获粟米，故该仓约与高祖武德初年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首倡在并州屯田同时产生。由于这里的屯田“岁收数千斛”，故该仓的储粮规模也应在数千斛以上。又因为该仓储粮是由当地军镇戍兵经营的屯田所获，故名军镇仓。武德六年（623 年），由于秦王世民奏请扩大并州屯田①，故这里的军镇仓规模亦相应扩大。唐太宗贞观初年，随着这一带抗击突厥的战线逐渐北移，唐朝又陆续在代州和朔州屯田置仓。

高宗、武后时期，由于东突厥已经内附，边防战事移向西南、西北和辽东地区，因此，唐廷又在陇右、河北、河东和剑南诸道，增置军镇，扩大屯田，于是一批新的军镇仓储遂在这些地区相继出现。永隆元年（680 年），黑齿常之曾在河源军处“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故其军镇仓的规模当亦随之增加。此外，凉州、甘州、瓜州、肃州等河西诸州亦相继出现了一批军镇仓储。

军镇仓的最盛时期是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是因为府兵制崩溃以后，唐玄宗为了大开边功，遂用募兵之法，广置军镇，增派健儿，又设节度使，专制兵权。由于这些招募兵健，不再自备衣粮，军饷物资全靠国家供应，故军费开支亦大为增加。为了节省正仓粮饷和运输费用，唐玄宗一面行和籴之法，在边地大购粟米，供应边兵，另一面又大开屯田，兴师务农。到开元末年为止，全国沿边八道的屯田达到一千多屯（详见本章第四节第三项）。据《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序目》载，开元天宝之际，“大凡镇兵四十九万，戎马八万余匹”。以每兵岁食粟 12 石、一马粮料相当三兵口粮计算，全国镇兵与战马每年当需粮料 800 多万石。这些军粮大致由军屯、正租与和籴等三种途径筹集。但都须储于军镇仓中，故该仓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镇戍仓是中型的军仓。据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发布的《定屯官叙功诏》云：“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令屯官巡

---

① 参阅《册府元龟》卷五〇三《邦计部·屯田》。

行，谪作不时者"①。由此可知，这种由镇戍兵所耕屯田"以供粮"的收获粟米当储于镇戍仓中无疑。

烽铺仓当是储存烽铺劚田粟米的仓廪。据吐鲁番发现《开元某年伊吾军典王元悰牒为申报当军诸烽铺劚田亩数事》（七二TAM 二二六：六四、六九）文书载，伊吾军"诸烽铺今年劚田总壹顷〈下残〉"，其迷独、故亭、花泉 3 烽劚田各 6 亩，青山烽 5 亩，柽塠烽 8 亩。以每烽 3 人计算，人均劚田 2～3 亩。这些劚田所获当就地储于烽铺仓中。由于烽铺劚田面积较小，故烽铺仓的储量也应最少。

上述 3 种军仓当归所在军镇的仓曹参军和仓督管理，由军镇长官负责领导。

唐朝的正仓是指接纳正租粟米的仓储。主要设于州、县，故正仓应是县仓和州仓的统称。唐初武德年间始行租庸调制，当同时在州县两级置仓受纳正租。唐朝正仓除主要出给官禄、供给驿递运夫口粮以及和籴、赈济等职能外，另一项主要开支就是供给军饷。其供应对象主要是征行军和戍边军。征行军由于随战事转移，既无固定居址，又无一定时限，不便设仓供给，故只能靠战时转输，或就近取给于正仓。戍边军一般由军仓供饷，但在战事频繁、兵员云集，军仓不敷供给时，往往也要借当处正仓补给。开元天宝以后，由于兵制变化，原来府兵自备衣粮的制度由国家供给衣廪所代替，故正仓供饷的比例大为增加。这一时期的清河郡（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仓由于专贮江淮诸郡租布"以备北军"，故"相传谓之天下北库"②。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三月，唐玄宗曾下敕说："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远不可运送者，宜所在收贮，便充随近军粮。"③ 其实，当时不唯关内，河北、陇右、河西诸州的正仓都在为附近军镇供饷。

---

① 《全唐文》卷三十一。

② 《颜鲁公文集》附殷亮撰《行状》。

③ 《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唐王朝为了加强对仓储的保护，不仅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督管理机构，而且还制订了严格的诸仓管理法令，因而使之较好地发挥了军需保障作用。

二、兵器与装备

唐前期的府兵装备主要是府兵的随身七事和折冲府所配备的“队具”和“火具”。府兵所使用的兵仗器械则由中央军器监制造，卫尉寺保管贮存，由尚书兵部配发。

据《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载，番上宿卫和番代征戍府兵的随身七事和折冲府配备的“队具”、“火具”大致如下：“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另外，每火还要“备六驮马”等。文中所谓“队”、“火”，乃是折冲府下属的两个基层组织，每队50人，每火10人。“队具”和“火具”显然为府兵以队、火服役时的集体用物。而“人具”乃为府兵随身七事。该文所列虽为九事，但弓、矢、胡禄三者均为射时用具，故三者实为一事。砺石虽以砺刀，但亦可以取火，故亦为一事。此外大觿是解开绳结的铁锥，毡帽可以代作头盔，毡装为御寒之物，行縢为绑腿之用，各为一事，恰符“随身七事”之数①。但也有人根据《通典》卷一四九《兵典·杂教令》所引《李卫公兵法》载，认为府兵随身七事应指服、被、资、物、弓箭、鞍辔、器仗等七件物资②。这两种说法，虽有差异，但均属府兵自用

① 参阅陈仲安：《唐府兵随身七事辨》，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参阅《府兵制度考释》第194页。

之物，这点却是相同的。按唐律规定："随身七事及火幕、行具细小之物，临军征讨，有所阙乏，一事不充，即杖一百"①。以此而贻误军机者，还要处以斩刑。其实，在"队具"、"火具"和随身七事中最为重要的是六驮马。隋初定为八驮，隋末由于"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②。唐初继承隋制，一律改用六驮马匹，偶亦用驴充之。六驮主要用于运输军用物资，跟国家供作战马截然不同，故可以驴充数。

唐前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有鼓、革、弓、弩、箭、刀、枪、甲、排、旗、袍及器用等12类。其中军鼓有铜鼓、战鼓、铙鼓3种；金革有錞、镯、铙、锋4种；射弓有长弓、角弓、梢弓、格弓4种；弩机有臂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7种；箭矢有竹箭、木箭、兵箭、弩箭4种；军刀有仪刀、鄣刀、横刀、陌刀4种；枪矛有漆枪、木枪、白干枪、朴头枪4种；铠甲有明光甲、光要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和马甲13种；彭排有膝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和皮排6种；军旗有青龙旗、白兽旗、朱雀旗、玄武旗、黄龙负图旗、应龙旗、龙马旗、玉马旗、凤凰旗、鸾旗、鵕鸃旗、太平旗、麒麟旗、飞麟旗、飞黄旗、駃騠旗、白泽旗、五牛旗、犀牛旗、金牛旗、兕旗、三角兽旗、角端旗、吉利旗、騼𩧯旗、驺牙旗、黄鹿旗、白狼旗、赤熊旗、辟邪旗、苣文旗、刃旗23种；战袍有青袍、绯袍、黄袍、白袍、皂袍5种；器用有大角、纛、钺斧、铁蒺莉、棒、钩、铁盂、水斗8种③。还有攻城的器械如云梯、冲车以及护身的楯牌等。总之，在这些兵器中既有指挥战斗、布置军阵的军鼓、金革、战旗等，又有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的弓、弩、枪、箭、军刀等，既有长兵器，又有短兵器，既有进攻性的兵器，又有防御性的装备。可

①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参阅《唐六典》卷十六《卫尉寺·武库令》。

以保证部队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退自如。唐前期的边防部队其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与其兵器和装备的精良有密切关系。

三、军事交通运输及管理

唐朝拥有发达的军事交通运输设施，这就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广阔驿道和星罗棋布的众多驿站。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记载，开元年间，每30里设置一驿，全国共有馆驿1643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如果在地势险要及须依附水草的地方，则不必以30里为限。即以每30里置一驿推算，全国驿道的长度可达近5万里。其实，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唐王朝修建在边地和偏僻之地的驿路以及后来新修的馆驿。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就曾于突厥以北、回纥以南开辟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66驿，"以通北荒"①；安史之乱后，唐宪宗和唐宣宗时期都先后修文川谷路和自夏州至丰州分别置8驿② 和11驿③ 等。由此可知，唐朝的驿道之广，驿站之多，军事交通之发达，可以想见。

唐王朝为了加强对驿道驿站的管理，还相继设立了一套严密的管理机构。

尚书省兵部驾部司是管理驿站交通的最高领导机构，"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④。尚书兵部直辖驿馆，说明馆驿的主要职能在于备军事之用，且驿站多需驿马，兵部既主兵事，又管马政，故兼主馆驿交通，指挥较为灵便。同时，这也体现了馆驿交通的军事性质。

---

①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② 参阅《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

③ 参阅《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④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

开元十六年（728 年）七月，唐玄宗又下敕令御史台御史出使，监察馆驿。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 年），遂成定制，监察馆驿的御史被称为“馆驿使”①。于是在兵部驾部司之下又增设了一级监察机构。

开元末年沿边节度使设立之后，又在节度使之下设馆驿巡官 4 人，巡察驿馆②。

地方州、县的兵曹、司兵参军和县令亦兼管传驿③。县以下则由驿长专责管理，选取“州里富强之家”④担任。驿长之下又有驿夫若干名，均由一般百姓充役。

唐朝的驿长不唯事务繁剧，外则“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之日”⑤；对内还须负责修理驿舍、饲养和增补驿马以及指挥驿夫等事宜。而且驿中马驴偶有死亡，还要负赔偿之责。但辛苦最甚的莫过驿夫。唐代诗人王建有《水夫谣》一诗云：“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如雨，受他驱遣不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生动地揭示了驿夫牵挽驿船的辛苦之状。

唐代馆驿的交通工具陆驿主要为驿马，兼有驿驴，水驿为驿站船舟。

陆驿的马匹数量要按馆驿的规模和事务闲剧配给。其中设在东西两京城内的都亭驿为全国最大驿站，故备马多达 75 匹。以下诸道馆驿共分 6 等：第一等 64 匹，第二等 45 匹，第三等 30 匹，第四等 18 匹，第五等 12 匹，第六等 8 匹⑥。处在险峻山岭、不便

---

① 《唐会要》卷六十一《馆驿使》。

② 参阅《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

③ 参阅《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

④ 《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典·乡官》。

⑤ 柳宗元：《馆驿使壁记》，载《全唐文》卷五八〇。

⑥ 参阅《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

健壮高大之马行驶者，可用体小灵活的蜀马。驿马之外，还有"传马"，即驾车之马。但无论乘坐驿马或传马，均须按驿使者的官品大小配备驿骑 。大致一品官给马8匹，二品6匹，三、四品5匹，五品4匹，六品3匹，七品以下2匹①。如果违犯规定，随意增置驿马，则要按律治罪："一匹徒一年，二匹加一等"②。

驿站马匹主要由诸监牧拨充，马颊左右皆"以'出'字印"③作为标志。配充各驿之马则由驿夫自养，每匹马皆于驿站附近给地40亩，种植苜蓿，以供饲草。为了确保驿站马匹的运输功能，唐王朝对驿马的管理及保护制订了严格的法令：如每年各州刺史和折冲府官员都要会同驿长对驿站马匹进行检查，老病不堪乘用者，"随便货卖"，及时补充。如果检拣"不以实者"，"一（匹）笞四十，三（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乘坐驿马、驴者，私驮物不得超过10斤，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如驿畜"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如果有意屠杀马牛者，"徒一年半"④ 等。

水驿所用之船亦按驿站事务闲剧配给，最多者4艘，其次3艘，最少2艘。至于江河川渎津要之处的渡船配置，亦有定数："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等皆以当处镇防人充；渭津关船二艘，渡子取永丰仓防人充；渭水冯渡船四艘，泾水合泾渡、韩渡、刘控坂渡、眭城坂渡、覆篱渡船各一艘；济州津、平阴津、风陵津、兴德津船各两艘；洛水渡口船三艘，渡子皆取侧近残度中男解水者充；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自余船别三人；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檀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

---

① 参阅《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

②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

③ 《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诸道牧监》。

④ 《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

充，分为五番，年别一替”①。至于往来官吏应给船数、船只的保护、修造以行船的有关规定，亦很周密。

唐代馆驿的食宿设施及规定亦相当完备。馆驿内大致有驿舍、东厅、西厅、上厅、别厅及楼阁台榭等建筑，同时又设酒库、茶库、葅库等，供旅客食饮住宿。过往官吏留居驿舍者，公家例给食宿，但仅限三日，家口不在给例。“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辄受供给者，杖一百计。赃重者，准盗论。”②

凡须乘坐驿站车马、船舟和住宿驿舍者，统称驿使。驿使发遣均要在中央门下省或地方留守及诸军州处领取符券。唐之符券共分 4 种：即纸券、角符、传符和银牌。纸券、角符以纸为之；传符形似龙身，以铜制作；银牌阔 2.5 寸，长 5 寸，其上隶书 5 字：“敕走马银牌”。驿使持此符券交付有司查验签署后，方可通行。

由于唐代的驿站数量众多，驿道四通八达，管理机构系统严密，驿站设施臻于完善，驿站管理法令严明，因此，驿站得以在军饷兵器的运输以及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

① 《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

②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

第四章　太宗、高宗时期巩固边疆的战争

唐朝建国之初，周边地区的形势亦很严峻：东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相继雄据漠北，骚扰北境；西突厥汗国控制西域，威胁西北；吐谷浑领有青海等地，觊觎西境；吐蕃政权崛起于西藏高原，方兴未艾。唐高祖武德年间和唐太宗贞观初年，唐廷由于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无暇他顾，因此，面对这些少数族政权的侵犯，除必要时发兵抵抗外，在多数情况下则采取纳贿求和或许婚和亲等策略。随着内部割据势力的相继平定和国家实力的逐渐恢复，从贞观三年（629 年）以后，唐太宗首先对威胁最大的东突厥汗国开始用兵，经过贞观四年（630 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的两次大规模进攻，相继灭亡了东突厥汗国的颉利可汗及其余部车鼻可汗；贞观十九年（645 年）、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唐军又对继东突厥汗国以后兴起的薛延陀汗国发动连续进攻，不但使其灭亡，而且也使铁勒回纥部的叛乱得以平定。从此，漠北大定。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唐太宗又于贞观八年（634 年）和贞观九年（635 年），先后对西面的吐谷浑发动两次进攻，使其由敌对势力变为藩属之地。贞观十四年（640 年），唐太宗又出兵西域，曾一举征服高昌、龟兹等国。接着，又从贞观十六年（642 年）开始，对肆虐西域的西突厥汗国发起进攻，经遏索山之战，咄陆可汗败亡。唐高宗继位以后，又经永徽二年（651 年）的牢山之战、显庆元年（656 年）的榆慕谷、鹰娑川之战和显庆二年（657 年）的曳咥河之战，终于击灭了西突厥汗国，解除了西北边疆的最大边患。对崛起西南的吐蕃政权，唐太宗采用和亲政策，于贞观十五年（641 年）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缔结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唐高宗继位以后，吐蕃政权为了开拓疆土，曾与唐在西域和河陇地区多次作战。唐军由于将帅不和或指挥失误，故在咸

亨元年（670 年）的大非川之战和仪凤三年（678 年）的承风岭之战中，连遭败北。但在开耀元年（681 年）的良非川之战和永淳元年（682 年）的白水涧之战中，唐军大获全胜，在一定时期内遏制了吐蕃的进攻势头。总之，经过太宗和高宗时期巩固边疆的一系列战争，使唐朝的疆宇达至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西与波斯（即伊朗）毗邻，南至交、广，东到大海，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宇最为辽阔、国力最为强盛的封建帝国。

第一节　唐初边防形势与唐太宗的边防战略

一、唐初边防概况及斗争形势

唐朝于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立国以后，不但国内军阀林立，拥兵割据，而且周边地区的东、西突厥汗国、吐谷浑以及西域地区的高昌、龟兹和刚刚兴起的吐蕃等少数族政权，也趁机大举内侵。他们或者相互联结，内应外合，肆意掠夺人畜财富；或者竞相深入，大张杀伐；或者相互攻战，残酷屠戮。致使唐初的边防斗争形势盘根错节，更趋复杂。

地处漠北的东突厥汗国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 年）由突厥汗国的分裂而形成的。其首领号为可汗，妻号可贺敦，犹如古代匈奴之单于和阏氏。可汗弟子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均谓之设，其大官称屈律啜，其次称阿波、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各级官吏都世代相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隋文帝在位期间，东突厥启民可汗“岁遣朝贡”，与隋保持友好关系。隋炀帝大业五年（609 年），启民可汗死，其子咄吉世继立，是为始毕可汗。此后不久，由于炀帝接受裴矩建议，欲封始毕弟叱吉为南面可汗，企图分化突厥，以弱其势，未遂。继而又利用互市之机，诱杀了突厥谋臣、粟特人史蜀胡悉，始毕遂愤而与隋结怨。大业十一年（615 年），发

兵南下抄掠，曾将炀帝围困雁门（今山西代县）达一月有余，炀帝遣使求救于隋宗室女、可贺敦义城公主，又遍召勤王兵赴援，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从此，“朝贡遂绝”。隋末政局动荡，内地避战乱者络绎不绝地奔赴漠北，东突厥愈益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① 当时，在内地起兵反隋的众多军阀和农民起义军首领如薛举、薛仁杲父子、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都竞相称臣，企图借助突厥扩充自己的势力。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前后，亦向始毕可汗称臣，甚至不惜牺牲“子女玉帛”，向突厥乞求援助兵马。

西突厥汗国也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由突厥汗国分裂后形成的一个少数族政权。该汗国建立之初，东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为界，与东突厥毗邻，西以乌浒河（今阿姆河）为界，与波斯相接，占有今天我国新疆和葱岭以西广大地域。汗国内部以碎叶川（今中亚楚河流域）为界，分为东、西二部。川东称左厢咄陆部，川西称右厢弩失毕部。每厢各辖 5 姓，合共 10 姓。其中左厢咄陆五姓为处木昆、胡禄居、摄舍提、突骑施、鼠尼施，右厢弩失毕五姓为阿悉结阙、哥舒阙、拔塞干暾沙钵、阿悉结泥孰、哥舒处半。可汗牙帐建于鹰娑川（今新疆境内开都河流域）上游，以右厢弩失毕部为依靠力量。此外，尚拥有都陆、歌逻禄、处月、处密等杂种诸部。其官制大致与东突厥相同。

隋末唐初之际，西突厥汗国已历四世：即达头可汗、泥利可汗、处罗可汗和射匮可汗。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 年）年底，西突厥达头可汗利用东突厥都兰可汗为部下所杀之际，率部东越金山，占领漠北地区，自立为步迦可汗，原居于漠北与都兰对峙的东突厥突利可汗（即启民可汗）也进入漠南受隋庇护，突厥全境重归统一。但由于达头对外执行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境内各部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落族人，不但极大地消耗了国力，而且也迅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故在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被隋军击败，部众溃散，达头被迫西奔吐谷浑，不知所终①。启民可汗在隋朝的支持下，又恢复了东突厥故土。

继达头以后任西突厥大可汗的泥利可汗，与东突厥启民可汗约和分境，划疆而治。但泥利任职不到半年，中道崩殂，其子达曼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处罗在位期间，由于不善御众，又对所属薛延陀等铁勒诸部厚税其物，残杀其酋长数百人，终于使族人和铁勒诸部发动叛乱，迫使其在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入降隋朝。

西突厥的第三任可汗是达头之孙射匮可汗。从这时起，西突厥汗国开始强盛，拓地东至金山，西至西海（今里海），自玉门以西诸国均被征服，建汗庭于龟兹以北的三弥山（今新疆库车东北200余里处），遂与东突厥汗国为敌。

隋朝末年，射匮可汗死，其弟统叶护可汗继立。统叶护可汗是西突厥汗国历史上一代最为著名的英主。他即位不久，即把汗庭由三弥山移向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以北的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西），是为北牙。这里地势开阔，碎叶川横贯其间，水草肥美，极利畜牧。其南牙建在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巴尔赫）附近。汗庭西移以后，不仅更易控制西域地区，而且可以直接指挥嫡系右厢五姓的兵力，进行拓地战争。在做了上述准备以后，统叶护可汗首先把兵力指向西北边境，“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②。武功达于极盛。为了防止东突厥汗国的侵扰，统叶护可汗又极力同唐朝结好，旨在从南面牵制东突厥汗国的兵力。

总之，隋末唐初之际，由于东、西突厥汗国占据漠北和西域地区，给唐朝的北境和西北边疆带来严重威胁。但是，由于东、西

---

①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纪三》，文帝仁寿三年九月及《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

两突厥汗国之间矛盾重重，兵戈屡动，也为唐朝的巩固边防以至开拓疆土，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别是东、西突厥汗国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以及反对压迫的阶级斗争，不但内耗了两国的国力，也为唐朝最后征服东、西突厥汗国提供了可供借助的力量。其中散居于突厥境内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的武装起义，就是导致东突厥汗国最后灭亡的重要因素。

薛延陀原是铁勒族的一部分，由薛和延陀两部构成。隋时散居于东起蒙古草原、西至里海之间的广袤地域。突厥分裂后，分别臣属于东、西突厥汗国。两突厥汗国对其境内的薛延陀等铁勒诸族居民进行野蛮统治，而以东突厥汗国的统治最为残酷。他们不但把可汗的子弟分封为小可汗或"设"等官职，令其坐镇铁勒诸部，对铁勒薛延陀诸部进行直接统治，而且还把铁勒薛延陀诸部原有的部落酋长全部诛除，故铁勒诸部"虽姓氏各别"，但"并无君长"。同时，他们还对铁勒诸部民众"厚税敛其物"，以致东突厥汗国用以维持庞大的统治机构、供给奴隶主贵族的奢侈生活以及对外发动战争的大量经费，都主要依靠掠夺薛延陀等铁勒民众的人力、物力来支付。这样残暴的奴隶统治，自然会使薛延陀等铁勒人民"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①。因此，他们的群起反抗自然也就带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随着薛延陀等铁勒人民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东突厥汗国内部的统治危机也日趋严重。

居住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吐谷浑族原属辽东慕容鲜卑族的一支。晋末西迁后，逐渐向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发展。其最盛时的疆宇东起今甘南、川北，南达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连。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布哈河河口附近的伏埃城。

吐谷浑族历来以畜牧业著称于世，其中养马业最为发达，产于青海湖一带的"龙种"、"青海骢"等善马，名闻史册。另外，吐

---

① 以上参阅《隋书》卷八十四《铁勒传》及《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谷浑所居的青海地区，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从青海西行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有3条道路可行，一是由伏埃城经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肃之敦煌，由敦煌西出阳关至西域鄯善（今新疆若羌），合传统的通西域南道；二是由伏埃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路合；三是由伏埃城经白兰、今格尔木，又经布伦台，泝今楚拉克阿干河谷，西越阿尔金山，沿今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一、二条路相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青海路"。这条联系中西交通的道路自从南北朝时期被开通以后，日趋兴盛，由此吐谷浑在中西陆路交通上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西巡途中，率军击败吐谷浑，占据伏埃城，迫使伏允可汗南逃党项，炀帝遂于吐谷浑故地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通交往西域的道路，开始他经营西域的伟业的。但隋末大乱以后，吐谷浑伏允可汗又卷土重来，乘机复其故土，进入复兴阶段。不久，伏允又进入河西，与割据军阀李轨联合，骚扰唐朝西北边境。同时，又东经黄河之南，横切河西走廊，北越阴山，向漠北的东突厥汗国称臣纳贡，在其庇护下，大肆扩张，威胁河陇。因此，吐谷浑便成了威胁唐朝西境并阻碍唐朝向西域发展的重要边患。

以上即是唐朝初年的周边概况及斗争形势。

二、唐太宗的边防战略

唐太宗即位以后，面对边疆地区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相继采取纳贿求和、整顿武备、分化瓦解、自卫反击以及和亲羁縻等军政战略，灵活机动地对待周边各少数族政权，因而使边防得以逐渐巩固，疆宇也随之不断扩大。

唐太宗即位后的贞观初年，唐朝虽已立国10载，但因经历了隋末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和唐初连绵不断的统一战争，社会经济一片萧条，"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

断绝，鸡犬不闻”①；“秦陇之北”，城邑破败，亦“非复有隋之比”②。不但广大百姓啼饥号寒，食不果腹，而且国家的财政经费也严重支绌。故唐太宗遂把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作为当务之急，对周边少数族上层首领的大肆侵扰、寇掠，除去在迫不得已时偶尔派兵抵御外，大多采取纳贿求和的策略，用以求得边境的安宁。这同唐高祖武德年间的边防策略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策略的实施运用，一方面是根据唐初经济的虚弱和百姓的穷困等具体国情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唐太宗汲取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而导致败亡的反面教训的结果。正如他在《政本论》③一文中所说：“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目睹此辈，何得不戒惧乎？”他还经常对大臣们谈及于此：“隋后主欲开葱岭以西，镇守俱未当，死者道路相继。如闻流沙以西，仍有隋破坏车毂，其边即有白骨狼藉。北筑长城，东渡辽水，征战不已，人无聊生，天下叛之，聚而为盗，炀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灭亡”，“朕以此事永为鉴戒”④。这个策略同当时对内实行的轻徭薄赋、大兴均田、任贤纳谏以及崇尚节俭等发展经济和整饬吏治的诸多政策相辅相承，对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日益增加，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唐太宗深知，单靠纳贿求和，决不能使边境地区得到真正安宁，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正如他在《帝范》中所说：“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因此，他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又大力整顿府兵制，加强府兵

---

①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四年八月。

③ 载《全唐文》卷十。

④ 《魏郑公谏录》卷三《对西蕃通来几时》。

的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改善国防设施，为开展自卫反击、保卫边防而积极备战。

为了有效地削弱入侵边境的少数族政权的军事力量，唐太宗在发展国内经济和增强武备的同时，还辅之以分化瓦解的策略。或者在各少数族首领之间制造矛盾，使其彼此相疑，相互攻击，坐收渔利；或者在各少数族首领中培植亲唐势力，使其内部产生分裂，以弱其势；或者在各少数族政权中联合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力量，从其内部进行牵制，使其分散兵力。由于各少数族政权中的固有矛盾由来已久并不断加深，这些分化瓦解策略也往往奏效，遂成为唐太宗建立赫赫边功的重要因素。

当上述策略相继得以实施，周边各少数族政权的势力受到削弱，唐朝的国力迅速强盛以后，唐太宗不失时机地果断派兵出击，首先对威胁最大的东突厥汗国发动进攻，一举获胜；接着又挥师西进，征服了占据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不久，又进军西域，平定了高昌、龟兹等国的叛乱，击败了西突厥咄陆可汗的武装挑衅；贞观末年，唐太宗再次出兵漠北，相继灭亡了薛延陀汗国和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漠北大定。这些自卫反击战争的接踵胜利，使唐太宗的边功达于极盛，不但有力地巩固了边防安全，而且也使唐朝的疆宇大为拓展。

对已被征服、且又愿意归附的少数族政权，唐太宗则采取羁縻统治的方法，予以怀柔。即既不将其迁徙异地，又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委派其降服的首领继续统治，是为“以夷制夷”。对于地处险地的少数族政权，还派驻唐朝军队予以保护。对于愿意入京宿卫的少数族首领，唐太宗则对其封官晋爵，赏赐田宅，让其与汉族官员一起参与朝政或统领军队。对于仰慕华风、热衷汉族文化的少数族首领，唐太宗则采取和亲政策，出嫁宗女，与其结为秦晋之好，诚心发展汉族与少数族之间的友好交往。这些政策的相继实施，不但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也赢得了少数族人民和广大汉族百姓的拥护。正如唐太宗在对大臣

总结他“平定中夏”和征服戎狄的经验时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 这个自我总结，虽有过誉之处，但他的民族政策比起那些推行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族百姓进行残酷屠杀的政策来，总要开明一些，二者所取得的社会效果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二节　巩固漠北的作战

唐太宗即位后，在各方面作了周密准备，并联合薛延陀首领夷男，于贞观四年（630年）派将军李靖率兵北进，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接着，他又接受温彦博等人的建议，将突厥降众安置在黄河以南，设置四州，进行羁縻统治，又在颉利故地设置定襄、云中都督府，统领六州之地。不久，薛延陀汗国崛起漠北，威胁唐朝北境。唐太宗又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和贞观十九年（645年），两次派兵五路，进军漠北，俘夷男真珠可汗及其侄咄摩支伊特勿失可汗等，薛延陀汗国灭亡。唐太宗又在漠北薛延陀故地设置了羁縻统治的六府七州，归燕然都护府统辖。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唐太宗又派将军高侃率部北进金山之北，一举灭亡了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漠北从此大定。

一、唐军二击东突厥

（参见附图5）

（一）东突厥的强盛及其不断南侵

唐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由于获得了从内地逃奔漠北的大量人口，迅速强盛。始毕可汗又在马邑刘武周和朔方梁师都的引诱下，趁唐朝国力虚弱和忙于国内统一战争、无暇北顾之机，大肆入侵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唐朝北境。从武德二年（619 年）到武德九年（626 年）期间，东突厥汗国几乎每年都要在夏秋季节草肥马壮时期，率兵南下，入唐抄掠，有时竟深入到唐朝腹地关中渭水北岸，不仅给北境居民带来很大苦难，而且也给唐朝统治者带来很大威胁。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东突厥始毕可汗率众渡过黄河，行至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与军阀梁师都会合，又拨给军阀刘武周 500 骑兵，企图从句注山（今山西代县北）入侵太原。行军途中，始毕猝卒，其弟俟利弗设立，是为处罗可汗。这时，唐高祖所遣出使突厥的使者、右武侯将军高静携带钱币绢帛等物，行到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听到始毕死亡的消息后，遂将携带之物“敕纳于所在之库”。处罗闻讯大怒，欲大举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立即派高静将所带钱物送给突厥，“突厥乃还”①。

武德三年（620 年）六月，李世民率部扫平了军阀刘武周后，撤回关中。处罗可汗趁机率众入侵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大掠城中子女财货而去。不久，处罗可汗死，其弟咄苾继立，是为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是位极富野心而又贪婪无厌的人，他凭借突厥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②。唐高祖鉴于中原初定，无力北顾，遂常赏赐金帛，以求安宁，但颉利却言词傲慢，求请无厌。

武德四年（621 年）四月，颉利可汗率众万余，与刘武周余部苑君璋所率 6000 人合围雁门，被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总管李大恩所率唐军击败，抄掠未遂。

武德五年（622 年）四月，颉利可汗又发骑兵数万，将代州总管李大恩部围于新城（今山西朔州南）。大恩由于孤军无援，在突围中被杀，部众溃散。同年八月，颉利又率骑兵 15 万经雁门进犯并州，并分兵直入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二州，掠夺男女五千余口。唐高祖当即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出蒲州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治今山西永济西）道，太子李建成率兵出豳州（治今陕西彬县）道，联兵讨伐。颉利遂引兵撤退。

武德六年(623年)六月，苑君璋部将高满政率部夜袭君璋，归降唐朝，被唐任为朔州(今属山西)总管。君璋逃奔突厥。同年七月，苑君璋引突厥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北)，被朔州总管高满政及唐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败于腊河谷(马邑北)。同年十月，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再次向马邑发起进攻。唐将李高迁见突厥兵马强盛，率部南逃，途中遭突厥伏兵袭击，士卒损失大半。颉利率兵攻城，高满政孤守马邑，虽奋力迎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粮饷殆尽，大有不支之势。派往援救的行军总管刘世让率部抵达松子岭(今山西代县附近)后，亦畏惧不进，还保崞城(今山西代县西南)。马邑守将、右虞侯杜士远在危困之中，袭杀满政，以城降于突厥。不久，颉利为了向唐求请和亲公主，又将马邑归还唐朝。

武德七年（624年）八月，颉利趁唐太子建成唆使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刺史杨文干发动叛乱，企图杀害世民，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日趋激烈之机，大举入寇：他派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合兵南下进犯朔、并、忻（今属山西）3州；自己与其侄突利可汗率部从西北面进犯原（州治在今宁夏固原）、陇（州治在今陕西陇县）、绥（州治在今陕西绥德）三州。兵锋直指豳州境内，大有南下进犯关中和京师长安之势。致使唐高祖和部分大臣一度产生了迁徙都城以避其锋的打算，只是在李世民的坚词进谏下，才放弃了这一念头。接着，李渊一面诏令京师戒严，一面派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率兵征讨。当时，关中霖雨不止，粮道受阻，士卒疲惫，唐廷和军中都愁云密布。唐军行至豳州，与突厥骑兵遭遇。由于双方兵力众寡悬殊，元吉大惧。而李世民却亲率百余骑直奔颉利营寨，一面责备其违背和亲之约，另一方面又对突利可汗“以恩意抚之”，答应和亲，离间其与颉利的关系。致使颉利“欲战不可”，只得“请和”① 罢兵。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八月。

武德八年(624年)四月以后，突厥颉利可汗又扬言大肆入寇。唐高祖被迫在关中复置12军，征兵备战。并派燕郡王罗艺屯华亭（今属甘肃）及弹筝峡（在今甘肃平凉西），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在今山西忻州南），封锁突厥南侵的东、西两条通道。不久，突厥兵分四路向南进攻：一路从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趋彭州（治今甘肃镇原东）；一路从东南犯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一路沿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鄯州（治今青海乐都），进攻兰州（今属甘肃）；颉利可汗则率主力沿朔州南下，进扰并、沁（州治在今山西沁源县）、韩（州治在今山西襄垣）、潞等州。对此，唐高祖调集重兵，抵御突厥主力：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瓌屯守太行，行军总管张瑾率部北山，助姜行本守卫石岭，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趋太谷（今属山西）。秦王李世民率部屯驻蒲州殿后。张瑾率部行至太原，与颉利所率突厥主力遭遇，全军覆没。不久，李靖率部到达并州，出师拒战，突厥被阻。接着，李世民又率部抵达蒲州。颉利看到唐军有备，只得引兵撤退。其余三路突厥骑兵也相继退出塞外。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颉利可汗又乘唐太宗新继帝位之机，率大军10万，沿灵州、原州南下，经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进入关中，兵临渭水便桥北岸。其别部亦抵达高陵（今属陕西），进至距唐都长安北70里处。唐太宗一面派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率部在泾阳（今属陕西）设防，阻击突厥。另一方面，又把长安城中可为“胜兵”的数万居民武装起来，大张旗鼓，开赴便桥，准备与突厥决战。并拘捕了颉利派来长安窥探虚实的使者执失思力，亲率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六骑驰至便桥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渭水对话，责其负约。唐太宗深知颉利率众深入关中，目的在于“唯贿是求”，便“倾府库以求和”①。颉利看到唐太宗身后尘土飞扬，旌旗遍野，以为唐军有备，又得到了大量府库金帛，便放弃了进攻长安的打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八月。

算。于是，双方“又幸城西，（太宗）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颉利引兵而退。”① 事后，唐太宗将这次与颉利订立的便桥之盟称为“渭水之耻”②。

（二）唐朝的反击准备及部署

唐太宗经“渭水之耻”以后，一方面积极训练府兵，整饬兵制，大力加强军备力量，准备伺机对东突厥汗国的侵扰进行大规模的自卫反击。另一方面又精心在东突厥汗国内部进行离间工作，极力拉拢和颉利可汗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突利可汗。还在漠北地区扶植反抗突厥压迫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的起义势力，并在西方结好西突厥汗国，借以牵制东突厥兵马，从内、外两个方向对颉利可汗进行分化瓦解。

突利可汗名叫什钵苾，为东突厥汗国前可汗始毕嫡子、颉利可汗之侄。曾被始毕可汗封为泥步设，居幽州之北，统东牙之兵，管辖奚、霫、契丹、靺鞨等数十部所属族人。武德三年（620年）颉利继汗位后，始封什钵苾为突利可汗，仍居东方。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奚、霫、契丹等东方诸部由于不堪忍受东突厥汗国的“征税无度”，聚众叛乱，纷纷南下，归附唐朝。居住于漠北地区的薛延陀诸部也揭竿起义，反抗颉利的残暴统治。颉利对突利丧失部众，愤怒不已，遂遣其率东牙之兵北击延陀诸部，突利又大败而归。颉利可汗借此对突利处以鞭捶之刑，并囚禁良久，然后放回东牙。这时，东突厥境内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赤地千里，人畜死亡，民不聊生。因此，居住在东突厥境内的薛延陀、契丹、靺鞨等数十部居民又相率起义，颉利政乱，只得向突利处征调兵众，突利拒之不与，叔侄二人“因起相攻”③，怨隙愈深。贞观三年（629年），突利遂遣使向太宗求救。唐太宗立即派将军周范进驻太原，“以图进取”。是年年底，突利终于脱离突厥，归附

---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②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唐朝，削弱了颉利可汗的力量。其实颉利与突利二可汗之间的矛盾，李世民早有觉察。武德七年（624年）八月当突利随颉利入寇关中时，在豳州城西五陇阪曾与李世民相遇，世民即向突利陈说利害，进行离间，突利也"因自託于世民，请结为兄弟"，二人"与盟而去"①。因此，突利的这次归附唐朝，并非偶然，当是唐太宗对其长期进行离间的结果。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唐太宗又乘"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之机，派兵消灭了割据朔方的军阀梁师都（详见第二章第二节第三项）。不仅拔除了唐朝北境的心腹之患，也扫清了北击突厥的道路。

贞观二年年底，唐太宗遣游击将军乔师望携带册书从间道潜入漠北，册拜起义的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又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东脉）建立牙帐。于是，东突厥汗国的背后又兴起了一个"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②，地域辽阔而又兵力强盛的薛延陀部落。

在此期间，西突厥汗国内部也内乱迭起。相互攻击的莫贺设与肆叶护二可汗，连兵不已。俱遣使入唐，请求和亲，企图依靠唐朝的支持战胜对方，独掌大权。唐太宗均一一拒绝，仅谕其"各守部分，勿复相攻"。旨在继续维持西突厥国内的分裂局面，借以消除唐朝的西顾之忧，得以专力攻击颉利。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专门监视突厥动静的代州都督张公瑾向唐太宗上表，陈述了应该立即向东突厥汗国发起进攻的6条理由，即：颉利暴虐无道，诛害忠良，"主昏于上"；被其统治的同罗、仆骨、回纥、薛延陀等部族皆聚众起义，"众叛于下"；突利被迫南下归降，拓设、欲谷等突厥将领多次被薛延陀等起义部族打败，"兵挫将败"；漠北连年灾害，粮草缺乏；颉利疏远本族，

---

① 事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二年十二月。

亲信诸胡，“大军一临，内必生变”；隋末逃奔漠北的华夏之人，亦多有造反，如果大军北征，“自然有应”①。接此重要情报以后，唐太宗便在北境的五处边防要塞上布置重兵：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屯兵定襄（今属山西）；以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屯兵云中（今山西大同）；以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屯兵金河（今内蒙古清水河县附近）；以营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屯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以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屯兵灵州。五路大军，共10多万，统归李靖和张公瑾统率，伺机进攻。唐朝与东突厥汗国之间的决战已迫在眉睫。

（三）李靖一击颉利可汗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唐军统帅李靖率精骑3000突然由马邑进至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向颉利可汗盘踞的北定襄城（即大利城，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20里处）发起攻击。颉利对唐军的突然兵临城下，惊恐不已，以为唐军“倾国而来”，便携牙帐北遁碛口（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与沙漠交界处）。李靖率部乘胜追击，又派间谍离间其心腹。颉利的亲信康苏密等挟持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杨政道前来归降，李靖当即将萧后及政道送往长安。与此同时，李勣又率部北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大破其众。颉利率残部退保阴山。二月八日，颉利残部又在阴山脚下遭到李靖部的重创，只得北逃铁山（今内蒙古固阳北），部众仅有数万。这时，颉利自知危在旦夕，便派使者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表示愿意举国内附，身自入朝。唐太宗当即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往慰抚，又诏令李靖率部迎接颉利归降。

但颉利虽表面归降，实则心怀叵测，企图缓至草青马肥之时逃入漠北，以图东山再起。李靖与李勣在白道会师后，认真分析了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的狡诈心态后，决计乘胜进攻，不给颉利喘息之机。于是，“勒兵夜发”，唐军前锋进至距颉利牙帐

---

①《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瑾传》。

10 里处，派将军苏定方率 200 骑为前锋，乘雾而进。颉利乘马先逃，李靖率军继至，突厥大溃，被俘 10 余万口，获杂畜数十万。颉利逃至碛口，北路已被李勣阻断，只得折而向西，投奔驻守灵州附近的沙钵罗设苏尼失处，企图由此南下，往依吐谷浑。屯驻灵州的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闻讯，一面派人指使苏尼失执送颉利，一面发兵北进。颉利慌忙连夜逃遁，藏匿于荒谷之中。苏尼失恐怕李道宗兴师问罪，派人搜获颉利。三月十五日，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进至苏尼失营寨，将颉利执送长安，苏尼失亦举兵归降。至此，东突厥灭亡，唐朝“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①

唐军在对东突厥汗国的这次作战，其所以能够迅速取胜，固然由于颉利可汗的倒行逆施，使其陷入内外交困，已成强弩之末。但唐军统帅李靖等率领精锐骑兵，出其不意，奇兵突袭，穷追猛打，不给敌以喘息之机，这些果断军事策略的运用，也是加速东突厥汗国灭亡的重要原因。另外，唐军的这次作战属于自卫反击，带有正义性质，唐军将士怀着保卫边疆、保卫北境百姓生命安全的决心，人百其勇，也是这次战役取胜的因素之一。

（四）高侃二击车鼻可汗

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唐太宗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众置于塞下，设置州府，对其进行羁縻统治（详见本章本节第五点）。其余不愿归附的突厥余众则逃奔漠北，共推原突利部人、世为小可汗的突厥贵族酋帅斛勃为大可汗，企图恢复昔日故土，重建东突厥汗国。但因雄据漠北的薛延陀汗国势力正盛，斛勃惧怕担任大可汗后，会招来杀身之祸，故“不敢当”，只得率众归附了夷男真珠可汗。由于斛勃“有勇略，为众所附”，薛延陀中有人担心斛勃将来会成为心腹之患，便劝夷男将其“杀”死，以绝后患。斛勃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部北逃。夷男发兵追击，反为斛勃所败。于是，斛勃便在金山之北（今蒙古西北科布多河一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二月。

带）建立牙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留居漠北的突厥余众逐渐归附，数年之间，拥胜兵 3 万，辖境西至西突厥葛逻禄部，北至结骨。并经常南下寇掠薛延陀边境。贞观十五年（641 年），薛延陀汗国衰落以后，车鼻可汗的势力更加强盛，贞观二十年（646 年），薛延陀汗国被唐灭亡。贞观二十一年十一月，车鼻可汗恐怕唐军继续北上，用兵金山，遂派其子沙钵罗特勤来到长安，进贡方物，并请身自入朝。唐太宗当即派云麾将军安调遮和右屯卫郎将韩华北行迎降。但车鼻的这些“好言”、“饰词”仍为缓兵之计。因为“初无来意”，故屡招“不至”①。韩华见状，遂与西突厥葛逻禄部首领合谋，企图设计劫持车鼻入唐，完纳使命，立功北境。不料中途事泄，韩华与车鼻之子陟苾特勤对射而死，安调遮亦被杀害②。

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正月，唐军在打败西突厥射匮可汗和征服焉耆、龟兹以后，太宗遂以车鼻可汗拒绝入朝为由，派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征发漠北回纥、仆骨等部骑兵，向东突厥车鼻可汗腹地开进。在唐大兵压境之际，被车鼻征服的西突厥葛逻禄部酋长泥孰阙俟利发以及拔塞匐、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相率归降。统领拔悉密部的车鼻之子羯漫陀也泣谏车鼻，劝其降唐，车鼻不听。羯漫陀被迫背父降唐，唐廷以拔悉密部置新黎州（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以羯漫陀之子、左屯卫将军庵铄统领其众③。是年五月，太宗病逝，高宗继位。高侃继续率兵北进。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年）六月，高侃率军进至阿息山（约在今蒙古察斯图博格多峰东麓），突厥诸部众叛亲离，车鼻可汗被迫携爱妾与数百骑逃遁。高侃挑选精骑紧追不舍，终于在金山之下将车鼻擒获，其余众均降。是年九月，车鼻被执送长安，唐高宗赦而不罪，并拜为左武卫将军。从此，漠北大定。

唐太宗在这次对东突厥汗国余部的作战中，采取“以夷制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十一月。

②③ 参阅《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夷”的策略，征发臣服唐朝的回纥、仆骨等少数族骑兵作为主力部队，又派遣“俭素自处、忠果有谋”[1]的唐将高侃作为统帅，遂迅速地击败车鼻，平定漠北。而唐军却未出动主力，由此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

（五）战后唐朝巩固漠北统治的军政措施

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败亡以后，唐太宗就曾召集大臣，针对如何安置突厥降众及巩固漠北地区的统治诸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臣们大致提出了以下3种意见：多数大臣认为，突厥为患已久，现在好不容易将其击败，迫其归降，应该乘此将他们迁徙中原，使其分散居住在兖（州治在今山东兖州）、豫（州治在今河南汝南）一带，与汉族百姓一起从事耕织。这样，10万突厥之众就可全部变成编户齐民。不但“中国有加户之利”，而且可使“塞北常空”[2]，永绝后患；第二种意见认为，如果将突厥降众迁居中原，数年之后，就会繁衍一倍有余。那时数十万突厥之众，“居我肘腋”，逼近王畿，必将变成“心腹之疾”，“后患”无穷。因此，主张将其遣返漠北，“居其旧土”[3]，然后，“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永无患矣”[4]。其中秘书监魏徵和中书侍郎颜师古是这种意见的代表。第三种意见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认为如果将突厥之众迁至中原，使其耕织，就会和突厥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非含育之道”；如果遣返漠北，“弃而不纳”，不但“阻四夷”归降“之意”，而且亦非“天地之道”。因此，他们主张将突厥降众应全部安置在黄河以南，使其“任情居住”，“不相统属”，又“选其酋长，遣居宿卫”。这样，既可使突厥“怀我德惠，终无叛逆”，又使其“力散势分，安能为害”[5]。中书侍郎温彦博力主此说，礼部侍郎李百药亦相附和。

---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贾曾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⑤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四月。

经过激烈辩论，唐太宗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等人的意见。不久，便将突厥降众安置在从幽州到灵州之间的广袤土地上，在此期间共设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突利任顺州（侨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并告诫其“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家族永全也！”① 接着，又在突厥原来居住的漠北故地分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北丰等六州，六州又分左右二部，左属定襄都督府，右属云中都督府。又以苏尼失为怀德郡王、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以阿史那思摩（与颉利一起被俘的突厥酋长）为怀化郡王、北开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使居黄河以南，遥领颉利旧部。并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率部监视和保护突厥诸部。最后，还把突厥诸部归降的其余大小酋长，徙居长安，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其中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吏就有100余人，几乎占据了朝官的一半。随从这些酋长入居长安的“近万家”②。

唐太宗其所以采纳温彦博等人的建议，对突厥降众作了上述处置，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万物”进行“天覆地载”的泱泱大国天子风度和对华夏、夷狄“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漠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夷男为可汗的薛延陀汗国正在崛起漠北，给唐朝北境带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唐太宗对突厥降众如此安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唐朝北境筑起一道屏障，用以防御薛延陀汗国夷男可汗的南侵。这从后来夷男可汗对唐太宗的这一处置表示极大不安的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唐太宗就是这样把既“保护”突厥又利用突厥的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收到了一举两得的社会效果。唐太宗的多数大臣所建言的第一种意见和魏徵等人提出的第二种意见，由于对薛延陀汗国日益强大这一客观事实熟视无睹，终被拒绝，当是不难理解的。

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由于发生了阿史那结社率的谋反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五月。

叛逆，又使唐太宗改变了对突厥降众的上述处置。

阿史那结社率原是突利之弟，贞观初年随其兄入塞降唐，被封为中郎将。结社率由于“居家无赖”，曾受到其兄突利的训斥，遂记恨在心，诬告其兄“谋反”。唐太宗知道结社率挟私陷害，“由是薄之，久不进秩”。结社率感到升迁无望，便在暗中联络同族 40 余人，企图在唐太宗巡幸九成宫时发动叛乱，谋害太宗，然后拥突利之子贺逻鹘返回漠北。但当其深夜进犯御营时，遭到折冲孙武开所率卫士的奋力反击，谋叛失败，只得渡渭水北逃。结果，被捕获斩杀，贺逻鹘被贬于岭外。这时，多数大臣又旧调重弹，竭力攻击温彦博等人提出的安边方略，再次提出将突厥降众迁往漠北的主张。唐太宗也一再表示“悔处其众于中国”，于是在同年七月，诏令将散居黄河以南的突厥降众全部迁至黄河以北，沙碛以南。又在故定襄城设立牙帐，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并赐李姓，使其统领突厥部众。又以阿史那苏尼失之子、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以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辅助思摩①。其实，促使唐太宗对突厥降众的处置策略发生变化，结社率的叛乱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漠北薛延陀汗国的势力日益增强，已对唐朝北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唐太宗把突厥降众北迁漠南，实际是向夷男可汗发出的警告信号，同时也是唐朝把防线北移，突厥降众实际已成为唐太宗设置在薛延陀汗国南面的缓冲地带，可避免唐朝北境遭受夷男可汗的直接攻击。

二、唐军二击薛延陀

（一）薛延陀的崛起及其对唐北境的侵扰

如前所述，居住于漠北地区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由于不堪忍受东突厥汗国残酷的民族压迫，于隋末唐初聚众起义，曾给予

---

① 参阅《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东突厥汗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一项第二点）。贞观元年（627 年），东突厥境内又发生了一场特大的自然灾难，"盛夏而霜"①，枯地千里；冬季"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②。薛延陀、回纥等铁勒诸部与汉族人民"相率"起义，并接连打败颉利可汗派来镇压的 10 万骑兵。翌年，居住于金山西南的薛延陀部也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机，揭起反叛大旗。不久，这部分 7 万余帐的薛延陀部众为了躲避西突厥汗国的武力镇压，保存实力，遂在酋长夷男的率领下，东逾金山，迁徙漠北。由于夷男骁勇善战，多次"反攻颉利"，大获全胜，致使"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③。夷男在颉利诸部和漠北薛延陀的支持下，势力日盛。颉利由于"国人离散"，势力大衰，遂"扬言会猎"，率兵而南，进入漠南地区，薛延陀等铁勒诸部全部控制了漠北地区。东突厥汗国陷入了唐朝与薛延陀的南北夹击之中。

贞观二年（628 年）年底，唐太宗为了联合薛延陀夹击颉利，遂遣使潜入漠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详见本章本节第一项第二点）。

贞观三年（629 年）八月，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其弟统特勤入朝贡物，唐太宗赐以宝刀、宝鞭，并转告夷男说："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④ 夷男大喜，遂借唐朝支持，整饬内部，日益强盛。

贞观四年（630 年）三月，在唐朝和薛延陀的联合夹击下，东突厥汗国灭亡，薛延陀汗国崛起漠北。

但薛延陀汗国真珠毗伽可汗夷男是个狂妄自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他在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前，虽然对唐表示恭顺，经常遣使通好，但其真正目的却在借唐威望，稳定内部。一旦东突厥灭亡、

---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

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八月。

薛延陀汗国日益兴盛以后，夷男的野心便日益显露，产生了与唐争锋的欲望。夷男深知，要想成为强大的游牧帝国，必须首先占据富庶的西域之地并控制丝绸之路，才能阻止唐朝势力的向西发展，进而与唐争夺中原。为此，他于贞观六年（632年）出兵击败了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将势力伸入到准噶尔盆地，又征服了占据今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一带的葛逻禄部和今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部，使薛延陀汗国的疆宇在东面和北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张。贞观十二年（638年），夷男又将他的嫡子拔灼遣居东部，统领部族强盛的延陀诸部；又将其庶子曳莽遣居西方，统领部落稀少的诸杂种部落，并请求唐太宗将拔灼和曳莽分别封为回叶护可汗和突利失可汗。夷男重新所作的这种东重西轻的军事力量部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与唐在西域地区加强争夺①。

对于夷男的上述种种扩张和军事行动，唐太宗已明察秋毫。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当阿史那结社率发动叛乱失败以后，唐太宗遂断然决定：将散处黄河以南的突厥降众全部遣返黄河以北的漠南地区，使“复其故庭，继其先绪”②。这无异是给夷男发出的警告信号。夷男害怕这些突厥人“奔亡度碛”，“翻覆漠北”，立即“勒兵以待”，作出了将要南下攻击的姿态。太宗闻讯，亦遣司农卿郭嗣本持节赐书，告诫夷男说：“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本境，若其逾越，故相抄掠，即将兵各问其罪。此约既定，非但有便尔身，贻厥子孙长守富贵。”③ 夷男接书后，虽表面“顿首奉诏”，但却仍坚持要唐“宜收（突厥）种落皆为奴婢，以偿唐人。”④其真正用意是要借唐朝之手，消灭突厥降众，清除薛延陀汗国在漠北发展的障碍。这个要求，唐太宗当然不会接受。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李思摩率部来到碛南地区。突厥

---

① 参阅《唐会要》卷九十六《薛延陀》。

② 《唐会要》卷九十六《薛延陀》。

③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突厥上》。

④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降众回到这块“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的富庶故土后，虽然“咸竞其地”，但李思摩由于对薛延陀的威胁忧心忡忡，故一面表示“竭诚奉国，作国家一狗，北门守吠”，但同时又乞求如果一旦“延陀侵逼，请家口徙入长城。”① 唐太宗为了给李思摩壮胆，也为了向夷男示威，便在朔、灵、夏等缘边驻屯大军，作出将要以武力干涉的姿态。

贞观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唐太宗下诏，准备在来年二月举行庆贺国泰民安的泰山封禅。夷男可汗闻讯后，企图利用太宗封禅之机向漠南李思摩部发动袭击，并谋于国中曰："天子封太（泰）山，万国必会，士马皆集，边境空虚，我于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②六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突然以星象不吉下诏“停封泰山”③，并在漠南各战略要地集结军队，擢并州都督长史李世勣为兵部尚书，总领北方军事。同时，还指示李思摩部待薛延陀军队南下侵扰时，当即“烧薙秋草”，坚壁清野。于是，唐与薛延陀汗国之间的战争就一触即发了。

（二）唐军五路一击薛延陀

贞观十五年（641 年）十一月十六日，薛延陀汗国夷男真珠毗伽可汗借口李思摩部突厥人“数窃羊马”④，率本部及其子大度设征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族共 20 万兵马，逾漠南下，入侵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李思摩部根据唐太宗在战前的部署，“先合辄退”，弃白道川，南入长城，退守朔州，“遣使告急”。夷男以为唐朝果真“边境空虚”，遂长驱追击。其子大度设率精骑 3 万追至长城，“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长城骂之”⑤。十一月十七日，唐太宗派兵五路，迎击夷男：以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

① 《太平御览》卷九〇四《兽部十六·狗上》。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③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

④ 《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责让》。

⑤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

管，率兵6万、精骑3000，屯朔州；右屯卫大将军张庆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营州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等族兵，压其东境；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率部出其西；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4万、骑5000，屯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其中屯驻朔州和云中的李世勣、张士贵部为主力部队，担负迎击薛延陀汗国入侵漠南军队的主要任务。张俭和李袭誉部为侧翼部队，策应唐军主力和防御薛延陀从东西方向入塞抄掠。屯驻灵武的李大亮部则阻挡薛延陀沿灵武道渡河入侵关中。诸军将发之际，唐太宗针对薛延陀"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瘠林木枝皮略尽"，战骑已经"疲瘦"的弱点，向李世勣等诸军统帅面授作战策略说："卿等当与思摩共为犄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①

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二月中旬，即薛延陀军队攻入漠南一月之后，唐军由防御转入反攻。唐军主力李世勣部首先派出6000轻骑，渡过腊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之图尔格河），直趋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夷男之子大度设望见长城内"尘埃连天"，知是唐军出击，急忙派人通报夷男先还，自己率部度青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之大青山），殿后北撤。唐军轻骑在诺真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艾不盖河）追及薛延陀殿后部队，大度设自知不能脱免，遂列阵10里，变骑战为步骑，即"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敌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②。两军交战之初，唐军由于轻骑对大度设的战术变化缺乏思想准备，故战马伤亡惨重。但时隔不久，唐轻骑统帅、朔州道行军副总管薛万彻亦指挥唐军改变战术，"去马步战"，以数百人编为一队，兵士皆手持长稍，"齐奋以冲之"。薛延陀军队的10里长阵在唐军的猛烈冲击下，四散溃逃。薛万彻乘机率领唐军"尽收其执马者"，追歼3000，俘获战马1.5万匹。大度设夺路逃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十一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遁，“其余众大奔走，相腾践而死者甚众，伏尸被野”①。接着，李世勣所率唐军主力又在回师定襄途中，击败了由代州（治今山西代县）五台（今属山西）北逃漠北的突厥思结部4万余众。唐军出击薛延陀南侵的作战以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李思摩部突厥人在唐军的护送下，仍返回碛南。十二月十九日，当诺真水大捷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唐太宗将留驻京师的薛延陀使者全部礼而遣之，并当着他们的面郑重地驳斥了薛延陀南侵的借口，指出薛延陀在这次作战中的“致此狼狈”，完全是夷男“将军逾漠，违负要约”的恶果自食。最后，还从唐与薛延陀关系的大局出发，向夷男提出了今后要“举措利害，尔当自思”② 的警告。

薛延陀在诺真水被唐军击败后，汗国内部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使夷男可汗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削弱。他为了“将倚大国，用服其众”，遂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四月，“以前扰漠南，遣使谢罪”③。同年九月，又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献马3000匹，貂皮3.8万张，玛瑙镜一面，向唐“请婚”④。唐太宗当即召集大臣商议，并首先向大臣们问道：“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即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⑤ 经过讨论，多数大臣都竭力赞成和亲，唐太宗便最后决定以新兴公主出嫁漠北，并遣兵部侍郎崔敦礼前往薛延陀向夷男通报。又派人将对夷男“和亲”的决定“报吐蕃，告思摩”，以致唐国境内“五尺童子，人皆知之”。贞观十七年（643年）闰六月，夷男可汗遣侄突利设献马5万匹，牛、橐驼万头，羊

---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责让》。

③ 《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六年九月。

⑤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10 万口，入唐谢婚，并敬献盛馔。唐太宗在相思殿接见使者，大飨群臣，百官大臣和各少数族使者济济一堂，"口歌手舞，乐以终日"①，表示庆贺。但是就在新兴公主将要赴亲漠北之际，由于铁勒契苾部酋长契苾何力的慷慨进谏，使唐太宗最终收回了和亲的成命。

原来契苾何力是在贞观六年（632 年）随母率部众千余家归附唐朝，被安置在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凉诸州居住。何力入京后，被授左领军将军。后来，又因在征吐谷浑和高昌诸战中屡立战功，被调遣守卫宫城北门，并尚临洮县主。贞观十六年（642 年），契苾何力奉诏赴凉州觐省其母。途中被叛唐北逃的部众劫持漠北。夷男可汗见到何力后，迫其归降，何力严词拒绝，夷男大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②。唐和亲大使崔敦礼到达漠北，始将何力救回。由于目睹薛延陀以夷男为首的上层统治阶层对唐朝的深仇敌意，何力入朝后，遂向唐太宗揭示了夷男请婚的真正意图，这就是想用"大国子婿"的身份，"增崇其礼，深结党援"，巩固汗位。一旦得逞，"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谓养兽自噬也"③。唐太宗接受了契苾何力的进谏，决定拒婚。但又为了避"失信"之嫌，又采纳何力建议，命夷男备齐聘礼后，亲自送至灵州，并声称自己也要赴灵州与夷男"礼会"。唐太宗预计夷男必不会亲迎公主，那时他就可以此拒婚。但不料夷男得知唐太宗将要亲至灵州"礼会"的消息后，大喜过望，"厚敛诸部，以充聘礼"④，积极准备按规定日期前往灵州。由于薛延陀汗国"先无府藏，调敛其国，往返且万里，既涉沙碛，无水草，羊马多死"，夷男终因聘礼未备而未能成行，唐太宗以此而遂"绝其婚"⑤。

---

①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② 《旧唐书》卷一〇九《契苾何力传》。

③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薛延陀》。

④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⑤ 《唐会要》卷九十四《沙陀突厥》。

唐太宗对薛延陀夷男可汗的拒婚消息传出后，使已经渐趋平静的唐朝北境的形势又复紧张起来。先是李思摩部突厥人在唐边陲官吏的唆使下，多次派兵抄掠延陀。接着，夷男可汗又于贞观十八年（644 年）遣突利失率军逾漠向李思摩牙帐定襄发起进攻，掳掠人畜和财产。同年十二月，李思摩部 10 余万众在薛延陀的多次侵扰下，悉数渡河遁入“胜、夏二州之间”，李思摩本人也因“失众”，“轻骑入朝”①。唐太宗只得另派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统领突厥之众，居于夏州之北，防御薛延陀。

唐太宗的拒婚使夷男“将倚大国，用服其众”的目的未能得逞，因而就使薛延陀汗国同被统治的回纥、同罗等铁勒诸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夷男为了治理内部，无暇南侵。于是，在李思摩部突厥迁居河南以后，唐朝北境曾维持了一段平静局面。夷男亦多次遣使朝贡，主动改善与唐的关系。贞观十九年（645 年），当唐对高丽发动大规模战争以后，虽然高丽王“潜令靺鞨诳惑夷男，啖以厚利”，使其出兵袭击唐军，但夷男不为所动，始终对唐保持善意中立。同年九月，夷男病死，唐与薛延陀的关系再趋紧张，战争阴云又笼罩了漠南地区。

（三）唐军五路二击薛延陀

贞观十九年（645 年）九月，夷男可汗死后，其嫡子四叶护可汗拔灼乘“会丧”之际，突然发兵袭杀了庶长兄突利失可汗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可汗。拔灼生性残忍，专横暴戾，其父夷男时期的亲信大臣，多为所杀，“国人不安”，内部矛盾急剧尖锐。为了转移国内部众的不满情绪，缓和矛盾，借以维护他的残暴统治，拔灼遂于贞观十九年（645 年）十二月，乘唐太宗率唐军远征高丽尚未返回之机，向唐北境发动袭击。突厥部统帅、唐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极富谋略，他指挥部众先是“羸形伪退，诱之深入”，继则又与左武候中郎将田仁会部屯兵夏州境内，列阵以待。结果，多弥可汗拔灼所率薛延陀兵众一触即溃，思力与仁会

① 《唐会要》卷九十四《北突厥》。

率部追击600余里，“耀威碛北而还”①。不久，多弥可汗再次发兵进攻夏州。这时，已从高丽前线返回并州的唐太宗当即派兵五路，迎击拔灼：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并、汾（州治今山西汾阳）、箕（州治今山西左权）、代、忻（今属山西）、蔚（州治今河北蔚县）、云（州治今山西大同）等9州兵镇守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与左骁卫大将军、突厥人阿史那社尔发胜（州治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黄河南岸）、夏、银（州治今陕西榆林南）、绥、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北）、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坊（州治今陕西黄陵）、石（州治今山西离石）、隰（州治今山西隰县）等州兵镇守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与左武侯将军薛孤明发灵、原、宁（州治今甘肃宁县）、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庆等5州兵镇守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2州突厥兵，与李道宗部相互策应。于是，在从灵州到朔州之间的唐朝北境上，布置了一道牢固的防线。多弥可汗拔灼率部入塞后，听到唐军已有防备，只得退却。

贞观二十年（646年）正月初九，仍在并州养病的唐太宗下令夏州都督乔师望与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北进，出击拔灼。结果，大破其众，俘获2000余人，多弥可汗拔灼轻骑逃走。在唐军的猛烈打击下，薛延陀汗国内部更加动乱不安。同年六月，薛延陀汗国内部的回纥酋长吐迷度联合仆骨、同罗等铁勒诸部举兵叛乱，进攻拔灼，拔灼大败。这时，已经返回长安的唐太宗决定乘薛延陀汗国国内大乱之机，向多弥可汗发起进攻。六月十七日，太宗诏令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率本部唐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部众，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率本部兵，分别从朔州、夏州、凉州、代州和营州五路，向漠北进发。又派校尉宇文法前往已经归附的乌罗护和靺鞨部，发当地兵从东面推进。宇文法率部首先突入薛延陀东境，并击败了阿波设所率的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

薛延陀东部边兵。汗国国内听说唐军大出，更加骚乱，一日数惊。多弥可汗在内外交困之际，无计可施，只得率数千骑逃奔突厥阿史那时健部。途中被叛乱的回纥部众攻而杀之，其宗族亲党几乎被诛灭殆尽。

薛延陀国内叛乱诸部相互攻击，并争先遣使至唐军归降。其余众7万余人共立夷男真珠毗伽可汗之侄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不久，咄摩支又去掉汗号，遣使奉表唐廷，请求率部居住于郁督军山之北。太宗接表后，立即应允，并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集。但世代居于郁督军山北的敕勒九姓部众由于不堪忍受薛延陀的残酷压迫，听说咄摩支将要迁徙故乡之地，皆恐惧不已，并遣使奏告，拒绝延陀入境。这时，唐太宗也担心咄摩支将来变“为碛北之患”，便收回成命，派李世勣率部与九姓敕勒夹击延陀，并指示唐军要随机应变，“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六月二十九日，唐太宗又颁示手诏，督促李世勣和李道宗、薛万彻等部“乘机”进军，而其余曾赴辽东参战部队均不“调发”，休整待命。李世勣接到诏令后，迅速北进。军至郁督军山之下时，薛延陀酋长梯达真率部归降。咄摩支见唐军奄至，进退失据，慌忙匿于荒谷之中。李世勣遣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慰，咄摩支被迫出降。对首鼠两端的未降之众，李世勣纵兵追击，前后歼灭5000余级，俘获男女3万余口。七月，咄摩支被俘至长安，唐太宗赦而不罪，拜为右武卫大将军。八月，李道宗和薛万彻率部北渡沙碛后，遇到了薛延陀阿波达官所率数万人的抵抗。道宗、万彻指挥唐军击杀1000多人，追击200余里，延陀大溃。道宗遣使招慰敕勒诸部，诸部酋长欣然听命，各自顿首归降，并请求入朝宿卫。至此，薛延陀汗国灭亡。

贞观二十年（646年）八月二十一日，唐太宗乘车驾北进，准备亲赴灵州会见漠北诸部酋长。行抵泾阳（今属陕西），与漠北的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铁勒部落所遣入贡使者相遇。太宗大喜，当即派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慰问诸部使者，并下诏自颂功德，欣慰之

情，溢于言表。九月，唐太宗抵达灵州，先期到此的敕勒诸部酋长所遣使者已有数千人之多，他们一致推举唐太宗为“天可汗”，表示诚心归附，“死无所恨”①。十二月二十日，回纥的俟利发（酋长）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俟斤（酋长）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酋长，均入朝贡物，唐太宗在芳兰殿设宴款待，极欢而散，此后又“五日一会”，接待极为隆重热情。

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正月初九，唐太宗下诏在漠北铁勒诸部设立 6 府 7 州：回纥部为瀚海府（府治在今蒙古哈尔和林），仆骨为金微府（约在今蒙古境内鄂嫩河上游），多滥葛部为燕然府（约在今蒙古乌兰巴托北），拔野古部为幽陵府（约在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上游），同罗部为龟林府（燕然府北），思结部为卢山府（瀚海府西南）。浑部为皋兰州（今蒙古乌兰巴托西），斛薛为高阙州（龟林府北），奚结部为鸡鹿州（龟林府东北），阿跌部为鸡田州（燕然府西北），契苾部为榆溪州（今蒙古乌兰巴托南），思结别部为蹛鹿州（位置不详），白霫部为寘颜州（今蒙古塔木察格布拉克东南）。各州府均以本部酋长任都督、刺史，对漠北实行羁縻统治。诸部酋长临行前夕，唐太宗在天成殿设宴饯行，诸酋长欣喜若狂，欢呼雀跃，宛转尘中。他们一直请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路，谓之参天可汗道，途中置 68 驿，驿中均备酒肉，以供过往使者，每年通过此道向唐进贡貂皮，以充租赋。并请委派文学之士，以便起草表疏。对这些要求，唐太宗都一一答应。四月十日，唐太宗又置燕然都护府（府治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护，统领 6 府 7 州。由于素立安抚有方，深得铁勒诸部拥戴，故相率竞献牛马牲畜，素立唯受酒一盅，其余如数退还。八月十七日，距唐境最远的铁勒骨利干部遣使入贡，二十二日，唐太宗即以骨利干部为玄阙州（在今贝加尔湖附近），以骨利干俟斤为州刺史。

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二月，自古未与中国通使的结骨部听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九月。

说铁勒诸部皆归附唐朝后，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亦入朝京师，唐太宗于天成殿设宴接待。失钵屈阿栈请于该部册立一官，太宗遂于二月七日以结骨部为坚昆都督府（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任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将军、坚昆都督。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置祁连州（今内蒙古境内，具体位置不详），隶云中都督府。三月九日，又分瀚海都督府俱罗勃部置烛龙州（今俄罗斯赤塔东）。是年八月，回纥部酋长吐迷度以击薛延陀之功，自称可汗，完全依照突厥设置众官，企图摆脱唐朝统治，雄据漠北。八月二十三日，太宗派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出金山道，进攻吐迷度。是年十月，回纥部内发生叛乱。吐迷度之侄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合谋袭杀了吐迷度，他们二人都是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他们企图投靠车鼻。燕然副都护元礼臣闻讯，当即派人引诱乌纥，假意要替乌纥奏请瀚海都督之职。乌纥信以为真，轻骑来见元礼，被元礼执而杀之。唐太宗恐怕回纥部由此离散，遂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不久，俱罗勃入朝贡物，被留而不遣。十月二十八日，太宗以吐迷度之子、前左屯卫大将军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回纥平定。

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年初，唐太宗派将军高侃率铁勒诸部兵进攻盘踞金山的突厥余部车鼻可汗，直到高宗永徽元年（650 年）六月，车鼻被俘，漠北大定（详见本章本节第一项第四点）。高侃部在击败车鼻主力，在被征服的突厥诸部置舍利、思辟、阿史那、绰、白登 5 州（在今内蒙古包头以东至集宁之间），隶定襄都督府；又置苏农、阿德、执失、拔延（史阙二州）等 6 州（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及宁夏东南之间），隶云中都督府。终唐之世，唐与漠北各族基本保持友好关系，很少有战争发生。

第三节　经略西北的战争

唐朝于贞观四年（630 年）击灭了东突厥汗国以后，即把战略目标移向西北地区。为了扫清唐朝进入西域的道路，唐太宗曾于

贞观八年（634年）和贞观九年指挥唐军两次攻入青海地区，征服了居住在这里的吐谷浑族，迫使其成为唐朝藩属。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又挥师西北，一举征服了地处西域东部的高昌故国，开始了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作战。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军在遏索山之战中击败了西突厥汗国咄陆可汗对唐伊州的进攻，咄陆政权覆亡。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乘胜西进，相继攻占焉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又乘西突厥内乱之际，攻占龟兹。唐高宗继位以后，又先后对西突厥发动三次进攻：永徽二年(651年)，唐军在遏索山之战中，击败了西突厥处月、处密诸部；显庆元年(656年)，唐军在与西突厥进行的榆慕谷和鹰娑川之战中，由于唐军将帅不和及指挥失误，先胜后败，被迫班师；唐高宗经过精选统军将帅和周密准备以后，又于显庆二年(657年)发动曳咥河之战，最终击败了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汗国亡。唐对西突厥长达10多年的战争至此结束。唐朝的西北边界由此与波斯相接。

一、唐军二击吐谷浑

（一）唐初吐谷浑的复兴及其对唐的侵扰

隋朝末年，吐谷浑伏允可汗乘天下大乱，重建政权，进入复兴阶段（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一项）。唐朝建立后，伏允又与割据河西的军阀李轨联合，骚扰唐西北边境。武德二年（619年），唐灭李轨，伏允可汗为了从唐获得茶、盐等生活必需品，频繁遣使，请求在边界互市。由于“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而吐谷浑又是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盛产牛马，唐高祖遂慨然答应。于是吐谷浑通过互市，从唐境获得了大量生活必需品，而唐朝也“资于戎狄，杂畜被野”①。唐朝为了保持与吐谷浑的友好关系，还主动放回了从隋末一直为质的伏允可汗的儿子慕容顺。但是，随着吐谷浑势力的不断强盛，伏允可汗逐渐不满足从互市中获得的财富。于是，

① 《唐会要》卷九十四《吐谷浑》。

他便乘着唐朝忙于统一战争之机，勾结吐谷浑之南的党项羌人，大肆侵扰唐西北边境。见于史书记载的，吐谷浑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的侵扰大致有以下几次：

武德三年（620 年），吐谷浑与党项进犯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被唐益州道行军总管窦轨及扶州（治今四川南坪）刺史蒋善合击败①。

武德四年（621 年），吐谷浑又与党项寇扰洮（州治在今甘肃临潭）、岷（州治在今甘肃岷县）2 州，被唐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刺史柴绍击退②。

武德五年（622 年）六月、八月，吐谷浑曾多次侵扰洮、旭（州治在今甘肃临潭附近）、叠（州治在今甘肃迭部）、岷等州，先后被唐益州总管窦轨、渭州（治今甘肃陇西）刺史且雒生及武州（治今甘肃武都）刺史贺拔亮等击退③。

武德六年（623 年）四月，吐谷浑先后攻陷芳州和侵扰洮、岷二州④；五月，又与党项侵扰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为刺史卢士良所败⑤。

武德七年(624 年)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和十月，吐谷浑又与党项联兵，先后五次侵扰松州、扶州、岷州、鄯州、叠州等，不但攻陷了叠州合州郡，大掠而去，且击杀了唐骠骑将军彭武杰⑥。

武德八年（625 年）正月、十月和十一月，吐谷浑又先后三次侵扰叠州和岷州⑦。

---

① 参阅《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宪附兄子轨传》。

② 参阅《旧唐书》卷五十八《柴绍传》。

③ 参阅《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六年四月。

⑤ 《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等。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六月、十月；《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新唐书》卷一《高祖纪》。

⑦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八年正月、十月、十一月。

武德九年（626年）三月、五月和六月，吐谷浑又先后三次侵扰岷州、河州等①。

唐太宗即位以后，伏允可汗虽然曾遣使入贡，又为其子尊王请婚，但仍继续侵扰唐境。面对吐谷浑的大肆入侵，唐太宗一面加紧整饬内政，增强武备，壮大军力，一面又对吐谷浑之南的党项羌人不断进行策反活动，削弱吐谷浑的同盟力量，积极准备对吐谷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二）唐军一击吐谷浑

经过贞观初年的休养生息，唐朝国力逐渐恢复，军事力量也日益强盛。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已被唐灭亡，唐朝北方的严重威胁业已解除，加之唐对党项羌人的策反又连连奏效，唐太宗遂于贞观八年（634年）决定对吐谷浑发动反攻。

贞观八年三月，伏允可汗在其宠臣天柱王的唆使下，发兵进犯凉州。又执留唐朝使者，拒不放还，虽经多次派人招谕，伏允“终无悛心”。这时，唐鄯州刺史李玄通表称吐谷浑正“牧马青海，轻兵掩之，可尽致”②。六月，唐太宗遂派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今青海湖）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今青海共和附近）道行军总管，率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沿黄河南北二道西进，向吐谷浑发动进攻。十月二日，段志玄率部由鄯州沿北道向西挺进800余里，在西海东30里处，击败吐谷浑部众。但由于士马疲惫，志玄逗留不进，致使吐谷浑尽驱牧马西遁。只有志玄亚将、兰州（今属甘肃）都督李君羡率精骑乘胜追击，在西海南悬水镇大败其众，虏牛羊2万余头而还。唐军在这次对吐谷浑的作战中，由于主帅贻误战机，吐谷浑并未受到重创，故在唐军刚刚退回鄯州以后，伏允可汗又驱兵入侵凉州。两天以后，即十一月二十一日，唐太宗发布《讨吐谷浑诏》，历数其“肆情拒命”、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三月、五月、六月。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吐谷浑传》。

“剽掠边鄙”和“拘我行人”① 等罪行，决定对吐谷浑再次用兵。

（三）唐军三路二击吐谷浑

贞观八年（634年）十二月三日，唐太宗派兵六支，分三路向吐谷浑发动第二次进攻：以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今甘肃积石山县）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今新疆若羌）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今属新疆）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刺史高甑生为盐泽（今青海茶卡盐湖）道行军总管，又以老将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路大军，分三路进攻吐谷浑：即积石道侯君集部、鄯善道李道宗部、且末道李大亮部以及行军大总管、西海道李靖部为一路，在鄯州（治今青海乐都）集结，向西海进发；盐泽道高甑生部为一路，经洮州向盐泽进发；赤水道李道彦部为一路，经松州向赤水进发。三路唐军兵力达10多万人。

贞观九年（635年）正月，当唐朝诸路大军正在集结和西进途中，伏允可汗又拉拢已归附唐朝的党项羌人发动叛乱，旨在给西进唐军设置障碍。三月十四日，洮州羌杀刺史孔长秀以叛。十九日，被行经洮州的盐泽道高甑生部所击破。与此同时，集结鄯州的李靖诸部统帅正在商议进军策略。积石道总管侯君集建言应乘敌军“尚未走险”之时，“简精锐，长驱疾进，掩其不虞，可有大利，此破竹之势也”②。李靖从之。闰四月初，李靖命令鄯善道李道宗部先进。四月初八，道宗部与吐谷浑在库山（今青海湟源县南）遭遇。伏允可汗凭借有利地形，率兵拼死抵抗。道宗潜引千骑从山后袭击，伏允大败③，遂“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④ 中，企图疲惫唐军。李靖率部抵达库山后，集众将商议。李道宗说：伏允西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札陵湖），此近河源，自古未有至者。

---

① 《全唐文》卷五，太宗《讨吐谷浑诏》。

②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③ 参看《旧唐书》卷六十《宗室·道宗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太宗贞观九年闰四月。

如今唐军兵马疲惫，又乏粮草，不可深入。不如回军鄯州，“须马壮更图之”①。众将大多附和此说。但积石道统帅侯君集却认为应乘吐谷浑“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之际，进军“取之”，否则，“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②。最后，李靖采纳了君集之策，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李靖率李大亮、薛万均、万彻兄弟及契苾何力等部从北道进击；另一路由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由南道进击。

贞观九年（635 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部将薛孤儿在夏头山（似今青海东日月山）追及伏允，大败其众，缴获杂畜，以供军用。二十八日，李靖部又败吐谷浑于牛心堆（今青海湟中西南）和赤水源（今青海东南恰卜恰河上源）。五月初，李靖部将薛万均、薛万彻兄弟率部到达赤水后，由于轻敌冒进，被吐谷浑天柱王所围，兄弟二人“皆中创坠马”，只得“步斗”，兵士损失十之六七。后因契苾何力率部拼死援救，吐谷浑才被击溃，并获杂畜 30 万③。

在此期间，由凉州南下的且末道李大亮部在蜀浑山（在今恰卜恰河上源）击败吐谷浑部，获名王 20 人。然后，两路唐军在赤水会合。不久，李靖率二路唐军攻克了吐谷浑首府伏埃城，伏允可汗被迫北逃突伦碛（今新疆且末、和田之间）中。李靖坐镇伏埃城，命李大亮、薛万均兄弟及契苾何力率部北上追击伏允可汗，命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西进柏海追歼吐谷浑余部。

北路军在抵达突伦碛前时，薛万均兄弟鉴于赤水之败，不敢深入。但契苾何力却挑选精骑千余，独自向突伦碛挺进，薛氏兄弟只得率部相从。唐军进入碛中以后，由于饮水缺乏，兵士只得刺马血而饮。伏允不虑唐军猝至，被袭破牙帐，丧师数千，又失杂畜 20 余万，只得率千余骑向沙碛深处逃遁。伏允嫡子、大宁王慕容顺眼看大势已去，遂率众击杀天柱王，举国请降。十多天后，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吐谷浑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太宗贞观九年闰四月。

③ 参阅《新唐书》卷一一〇《契苾何力传》。

伏允亦被随从骑将所杀。唐北路军大获全胜。

西路军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由库山出发后，经破逻真谷（约在今青海共和大非川东）、汉兴山（今青海苦海东），于五月一日，抵达乌海（今青海冬给措纳湖），与吐谷浑部遭遇，唐军大败其众，获其名王。后又继续西进，行程2000余里，入空虚无人之境，盛夏而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今黄河河源附近之星宿海），至于柏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接着，又折而回师，至大非川与李靖军会合。至此，唐军二击吐谷浑的战斗胜利结束。

其余两路唐军，即盐泽道高甑生部和赤水道李道彦部均因逗留不进，以致贻误会合日期，而分别受到"诬罔得罪"① 和"以勋减死"② 的处罚。

由此可知，实际参加贞观九年（635年）对吐谷浑第二次作战的唐军，只有4支部队，总兵力仅有4万余众。这4支唐军在主帅李靖的指挥下，采取"长驱疾进"和出其不意的方略，克服了行军途中遇到的乏粮断水和"盛夏而霜"等千难万险，历时半载，行程五六千里，终于取得了这次作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唐朝西部边境的安全，而且也提高了唐军在困难环境中的作战能力，为以后继续挺进西域以及对西突厥汗国的作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十八日，唐军主帅李靖所遣报捷使者到达长安。二十一日，唐太宗下诏恢复吐谷浑国号，并以伏允嫡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胡吕乌甘豆可汗。但又恐怕国人不服，仍命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慕容顺虽为伏允嫡子，但早年为质于隋，久不得归，故伏允遂以他子为太子。慕容顺归国后，长期不受重用，故心怀怨恨。被册封可汗后，他虽"长自中土，早慕华风"③，但却"遽怀二志"④，

---

①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② 《旧唐书》卷六十《宗室·淮安王神通附子道彦传》。

③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太宗《原吐谷浑制》。

④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太宗《宥吐谷浑诏》。

加之国人不服，于贞观九年十一月被其部下所杀。国人又推立其子、燕王诺曷钵。但因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国内大乱。是年十二月，唐太宗派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兵“绥抚经略”，很快便平定了这场内乱。次年三月，诺曷钵遣使请颁唐历，行唐年号，并派子弟入侍宿卫。太宗遂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授乌地也拔勤豆可汗。至此，吐谷浑对唐的藩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不但保证了西部边境的安全稳定，而且也对周边其他少数族的内附发生了有益的影响。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诺曷钵入京，朝拜太宗，妻以弘化公主。从此以后，直至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被吐蕃所灭以前，吐谷浑一直同唐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二、唐军征高昌、焉耆、龟兹

（一）西域概况及其与唐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西域是个范围十分辽阔的历史地域，从广义上说，东起我国的甘肃敦煌，西到地中海东岸，其中包括我国今天的新疆地区以及中亚、西亚和欧洲以南部分地区，都属于西域地区。隋朝著名的地理学家裴矩在他的《西域图记》序言中曾记载从敦煌西行，到达西海（今地中海）东岸的北、中、南三条道路：由伊吾经蒲类海、铁勒等部西行，沿天山北麓而至西海，此为北道；由高昌经焉耆、龟兹等，沿天山南麓而至西海，此为中道；由鄯善经于阗、朱俱波等地，沿昆仑山北麓而至西海，此为南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越过葱岭后分别到达波斯（今伊朗）和拂菻（即古罗马帝国）等西亚、欧洲各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当时的中原王朝就是通过“丝绸之路”，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和进一步密切同西域各国的友好交流的。而狭义的西域则指敦煌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地区，其基本范围即在今我国新疆南部。在这个地区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两缘走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数

十个城邦国家。

隋唐时期，西域大部地区被西突厥汗国所统治，其疆宇东到金山，西与波斯毗邻，奄有今我国新疆和葱岭以西广大地域。但是，由于从两汉以降，中原王朝便在葱岭以东和敦煌以西广大地区设置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所以这些地区和中原王朝的联系从未间断，直到隋唐时期，这里的很多城邦国家“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①。其中地处西域东部、和内地最为接近的高昌、焉耆和龟兹等地和隋唐王朝的关系最为密切。

高昌国本车师前王地，汉开西域，成为汉军驻屯重地。其地汉军城堡高昌壁，高昌即由此得名。最早由汉族人麹氏建国，都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这里正处在连接中西交通的丝路要道，土壤肥沃，盛产谷麦，以酿造葡萄酒和纺织白叠布最为著称。高昌王麹伯雅在隋炀帝时入朝，被拜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并妻以华容公主。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麹伯雅卒，其子麹文泰继立。有胜兵万人，统辖21城。

焉耆国东接高昌，西邻龟兹，位控丝路中道咽喉，拥山带湖，“颇有鱼盐之利”②。其王龙姓，名突骑支，拥胜兵2000余人。

龟兹国在西域数十个城邦国家中面积最大，“横千里，纵六百里”③。居民多有城郭屋宇，以耕田、畜牧为业。其王白姓，名苏伐勃駃，唐初曾遣使入朝。不久，勃駃卒，其子苏伐叠继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

（二）唐军征服高昌

高昌国在唐朝初年虽然臣属于西突厥汗国，但仍与唐保持着密切的友好交往。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高昌王麹文泰曾派人献雌雄拂菻狗各一，“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④。唐太宗即位以后，文泰及其妻宇文氏又贡玄狐裘、玉盘等，“西域诸国所有动

---

①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焉耆传》。

③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龟兹传》。

静，辄以奏闻”，实际上已成为唐朝设在西域地区的重要耳目。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唐灭东突厥以后，麹文泰又入京朝觐。唐太宗在其“归蕃”之际，不仅赏赐甚厚，而且还诏赐其妻李姓，封常乐公主，使预宗亲。

但从贞观六年（632年）开始，高昌与唐朝的关系却出现裂痕。原来在此以前，西域诸国都是经由高昌向唐朝贡的。由于高昌王麹文泰经常与西突厥相互勾结，阻断道路，凡是经此入唐朝贡的西域诸国使者，“咸见壅掠”①。有鉴于此，焉耆王龙突骑支在贞观六年经向唐太宗请示后，遂重新恢复了在隋末以前交通内地的“大碛”之路。这条道路经焉耆以南至罗布泊，再经白龙堆沙碛直达玉门和敦煌，而不再通过高昌。高昌国和西突厥汗国的“壅掠”之利因此而受到“侵害”，麹文泰“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②，焉耆王只得向唐“上表诉之”。另外，唐灭东突厥后，原臣属于东突厥汗国的伊吾（今新疆哈密）城主举七城之地降唐，唐以其地置西伊州（贞观六年改名伊州），这是唐在西域之地首次设置的行政机构。高昌王麹文泰由此亦对伊吾心怀叵测，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文泰又与西突厥叶护连兵进犯唐朝伊州。这时，唐朝已出兵征服了吐谷浑，解除了西顾之忧，正欲经营西域，故唐太宗听到高昌叛唐的消息后，当即下诏谴责麹文泰的“反覆”行径，并要求其护送隋末入居高昌的华人返回中原。文泰拒不奉诏。不久，高昌又与西突厥乙毗咄设联兵攻破了焉耆三城，掠其居人，焉耆王又派人奏报唐朝。唐太宗当即派虞部郎中李道裕质问文泰，文泰仅派使者谢罪，以此进行敷衍。太宗向使者揭露了高昌王的无礼行径后，又警告说：“明年我当发兵虏而（尔）国，归谓而（尔）君善自图。”③

贞观十三年（639年）三月，薛延陀汗国夷男可汗派人上言，表示愿作向导，进攻高昌。十一月，唐太宗又下玺书，向文泰谕

---

①③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高昌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焉耆传》。

以祸福，并征其入朝，文泰竟称疾不至。十二月四日，唐太宗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彻、萨孤吴仁为副总管，以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率左屯营将军姜行本、沙州（治今甘肃敦煌东）刺史刘德敏、中郎将伯屈昉、前开州刺史刘德衔等汉军将士15万、突厥和契苾部数万骑兵讨伐高昌，并将山东善于制造攻城器械的工匠“悉遣从军”①。临行前，唐军统帅侯君集遣使急赴焉耆，与之相约，东西夹击。焉耆王大喜，愿为声援。

唐军出发以后，“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自秦汉出师以来，未有如此之盛。

贞观十四年（640年）五月，唐军抵达碛口（今新疆哈密东南）。高昌王麹文泰听到唐军出发的消息后，自以为国土悬远，与唐都长安相隔7000余里，其间又有2000里沙碛，粮草运输极为困难，兵多则“粮运不给”，兵少则“吾能制之”，遂不设防备，企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这时，当他听到唐朝大军已经逼近的消息后，惊恐发病而死，其子麹智盛继立。唐军行至柳谷（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正值文泰葬日，高昌国人悉集于此。侯君集拒绝了诸将偷袭柳谷的建议，麾军西进，很快便兵临高昌田地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下。高昌田地城兵众婴城自守，君集派人谕之不下，遂削木架桥，用推撞车撞其城墙，墙颓数丈，又用抛石车向城中抛射石块。城上守军被迫退入城中，唐军乘胜攻占田地城池，俘获男女7000余口。接着，唐军又继续西进，很快将其王城高昌团团围定。高昌王麹智盛一面向侯君集致书，请求“哀怜”，停止攻城。另一面却犹豫观望，仍在等待屯驻可汗俘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的西突厥欲谷设的援助。侯君集察知麹智盛在玩弄缓兵之计，遂麾军攻城。又制作了10丈高楼，俯视城中，指挥抛石车向城中攻击，城内兵民都入室躲避。这时，麹智盛已经得知西突厥欲谷设带兵西逃1000余里，高昌孤立无援，计无所

①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出，只得于八月八日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国，俘智盛及其将吏，刻石纪功而还。”① 唐军共破高昌 22 城，得户 8046，口 1.77 万，拓地东西 800 里，南北 500 里②。捷报传至长安，太宗遂以高昌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九月二十一日，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留兵镇守。十二月五日，唐军统帅侯君集凯旋班师，返回长安，将所俘麹智盛及其高昌大臣献于观德殿。太宗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并将所获高昌乐工付于太常寺，增九部乐为十部。

唐朝平定高昌之役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一方面是由于唐朝的国力强盛，唐军统帅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正确的策略；另一方面是以麹氏为首的高昌统治集团的腐败。他们滥用民力，“缮造宫室，劳役日兴，修营舆辇，僭侈无度，法令深刻，赋敛繁重”，以致“众力既尽，人财已竭”③，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高昌政权处在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正如战前流行于高昌国内的一首民谣所说：“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④

（三）唐朝出兵焉耆

唐朝初年，焉耆国亦对唐采取友好态度，两国间开展和平交往。唐军平定高昌后，侯君集将高昌所虏焉耆居人全部放归，焉耆王“由是遣使谢恩，并贡方物”，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但时隔不久，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了拉拢焉耆，破坏其与唐的友好关系，将焉耆王之女娶为弟媳。于是，焉耆王遂在西突厥汗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叛离唐朝，归附了西突厥欲谷可汗，对唐“朝贡稀至”。唐安西都护郭孝恪上表请求讨伐，唐太宗遂于贞观十八年（644 年）八月下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 3000 出银山（今新

---

① 《旧唐书》卷六十九《侯君集传》。

②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四年八月。

③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高昌传》。

疆焉耆东）道进击焉耆。适逢焉耆王之弟颉鼻、栗婆准、叶护均等三人奔西州归降，孝恪遂以栗婆准为前导，于八月十一日向焉耆进发。焉耆王龙突骑支自恃焉耆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不设防卫。唐军倍道兼行，于八月二十二日深夜抵达焉耆城下。孝恪当即下令将士浮水渡河，拂晓时分，唐军已全部登上城墙。当即鼓角齐鸣，杀声四起。龙突骑支慌忙之中，还未来得及整军抵抗，即被擒获，同时被俘斩者达 7000 多人。唐军主帅郭孝恪留栗婆准摄领国事，率军返回。这次作战，唐军往返仅用 20 天时间，就取得了攻占焉耆的胜利，与唐太宗在战前的估计完全相符，足见唐军主帅采用战略战术的正确无误和唐军将士的勇敢善战。

唐军撤出焉耆 3 天以后，西突厥屈利啜引兵赴援。囚捕了栗婆准，又以劲骑 5000，追击唐军，结果在银山被郭孝恪击败。西突厥遂派其吐屯统领焉耆。但吐屯唯恐唐朝兴师问罪，遂遣使入贡，企图获得唐朝的认可。唐太宗严词拒绝，不予承认，吐屯只得返回其国。不久，焉耆又立栗婆准堂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依附于西突厥。唐朝这时已无力用兵，只得待机而动。

（四）唐军平定龟兹

唐朝初年；龟兹国亦同唐保持着友好交往。贞观四年（630年），龟兹王苏伐叠遣使献马，唐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①。但随着西突厥汗国势力的日益强盛，龟兹也逐渐改变了对唐的友好关系。贞观十八年（644 年），当唐朝出兵焉耆时，龟兹王遣兵“与焉耆影援”②，抵抗唐军。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龟兹王苏伐叠死，其弟诃黎布失毕立，又“浸失臣礼，侵渔邻国”。太宗大怒，遂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诏：以左骁卫大将军、东突厥降人阿史那社尔为使持节、昆丘（即昆仑山）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率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左武卫将军李海岸等五将军，并发

---

①《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龟兹传》。

②《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龟兹传》。

铁勒、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部兵10多万，连兵进讨。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西突厥汗国内乱迭起，其重臣阿史那贺鲁率数千帐内附，诏处于庭州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贺鲁听说唐军讨伐龟兹，请为先导。同年七月，西突厥相屈利啜亦请率所部从讨龟兹。九月二日，阿史那社尔率部行经西州（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时，击破了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十月，唐军兵分五路，从焉耆之西突然直趋龟兹北境。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慌忙弃城逃奔龟兹，保其西境。社尔派兵追击，擒而斩之，立其堂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使修贡职。由此龟兹大震，境内守城兵士纷纷弃城逃跑。社尔率部抵达西部碛口（今新疆轮台西），大军屯于距龟兹王都伊逻卢（今新疆库车）300里处，命伊州（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继续西进。韩威部行至多褐城（今新疆库车东80里处），与龟兹王所率5万余众相遇，韩威引兵伪退。龟兹王见唐军寡少，率部追击。韩威退至30里处，与曹继叔部会合，联兵迎击，大破其众，龟兹王率部退保伊逻卢城，婴城自守。

十一月中旬，阿史那社尔率唐军主力抵达伊逻卢城下，布失毕见唐军兵势甚盛，锐不可当，遂轻骑西逃。社尔遂拔其城，仍派安西都护郭孝恪留守，又令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率精骑追击布失毕，西行600余里，社尔率主力殿后。布失毕在穷困之际，据守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社尔麾大军西进，将拨换城团团围定，接连攻打40多天。闰十二月初一，拨换城终被攻破，布失毕及其大将羯猎颠等龟兹大臣全部被擒，只有其相那利单骑北逃。不久，那利潜引西突厥之众及龟兹国之兵1万多人，袭击伊逻卢城，企图恢复故土。伊逻卢唐军守将、安西都护郭孝恪不听劝阻，率兵营于城外。当那利率部突然兵临城下之时，孝恪才慌忙整军入城。但为时已晚，那利已捷足先登，城内龟兹人与之相应，共击孝恪，矢如雨下。孝恪抵挡不住，死于西门之下，城内大乱。仓部郎中崔义超迅速募得200余人，与龟兹战于城中。曹继叔与韩威等亦率部从西北隅攻入城中，双方展开巷战，或白刃相见，或徒手肉

搏，战斗异常激烈。直战至第二天黎明，龟兹军逐渐不支，那利始率部撤退。10多天后，那利又引兵来攻，曹继叔率部迎击，龟兹死伤8000，那利被龟兹降众执送唐军。至此，龟兹始被平定。

阿史那社尔所率唐军对龟兹的这次作战，历时3个月，前后共破龟兹大城5所，遣使说降700余城，俘获男女数万口。社尔在伊逻卢城召集龟兹父老，宣谕唐朝国威，告以伐罪之意，又立布失毕之弟叶护为龟兹王，龟兹人大喜。高昌、焉耆和龟兹等国相继平定，西域震惊。于是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献驮马军粮，慰问唐军，“社尔勒石纪功而还”①。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六月，由于龟兹王叶护不善御国，酋长争立，相互攻击，国内大乱。八月十六日，唐高宗下诏：以布失毕为龟兹王，放遣归国，统领其众。

显庆三年（658年）正月，龟兹王布失毕因与其相那利不协，君臣猜忌，各树党羽，均遣使向唐高宗奏告。高宗派人将龟兹王、相同时召至长安，并囚禁那利，又派左领军郎将雷文成护送布失毕归国。当行至龟兹东境泥师城时，降于西突厥的龟兹将领羯猎颠率众阻断道路，不许唐军和布失毕入境，布失毕只得据城自守，不敢西进。高宗闻讯，当即诏令左屯卫大将军杨胄率兵征讨。杨胄率兵抵达龟兹东境后，羯猎颠率部逆战。结果，龟兹大败，羯猎颠被擒，其党羽全部被诛，龟兹大定。唐高宗遂以其地置龟兹都督府。布失毕这时已发病而死，高宗遂以其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是年五月二日，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于阗、焉耆和疏勒四镇，是为安西四镇。以原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城。

三、唐军对西突厥的作战

（一）西突厥概况及其对唐朝的威胁

如前所述，统叶护在隋末唐初继射匮担任西突厥可汗以后，为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

了牵制东突厥汗国的兵力，使其无力西侵，曾对唐采取友好态度（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一项）。武德三年（620年）三月，统叶护曾与高昌王麹伯雅一起遣使朝贡，并献“条支巨鸟”①，向唐高祖发出了结盟的信号。这时，唐军正在秦王李世民的率领下与马邑刘武周及东突厥颉利可汗交兵晋北。唐高祖亦为了与统叶护“并力以图北番”，遂“厚加抚结”。统叶护当即表示将在武德五年冬出兵相助。当大军将发之际，颉利可汗闻之大惧，被迫“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②。不久，统叶护可汗又遣使朝贡，并求“请婚”。唐高祖采纳了宰相封德彝“远交而近攻”之策，派高平王李道立申秦晋之好，统叶护大悦。但由于东突厥频繁入寇，通往西突厥的道路受阻，和亲未果。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统叶护又“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锭宝钿金，马五千匹”，作为聘礼，迎接和亲公主。颉利闻讯，多次派兵入寇唐境，向唐施加压力，破坏唐与西突厥和亲。并派人威胁统叶护说：“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竭力进行阻挠。再加之统叶护连年对西北用兵，“部众咸怨”。先是歌逻禄部起兵叛乱，接着左厢咄陆诸部又阴谋政变，统叶护的统治危机四伏，故终“未克婚”③。

贞观二年（628年）年底，统叶护的伯父莫贺咄在左厢咄陆诸部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统叶护可汗，自立为侯屈利俟毗可汗④。

莫贺咄虽用政变手段夺取汗位，但因他原来仅为左厢咄陆部的小可汗，故右厢弩失毕诸部对他的大汗之位并不承认，仍推本部阿史那泥孰为大可汗，与莫贺咄以相抗衡。但泥孰不肯接受汗位，遂派人迎回避难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城）的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勤，立为肆叶护可汗。由是，西突厥汗国又一分为

---

①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④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二年十二月。

二，西为肆叶护可汗，东为俟毗可汗。两可汗相互攻杀，连兵不已，又俱遣使至唐请婚。这时，唐太宗正积极部署对东突厥汗国的军事反攻，不想在西方再树新敌，故对西突厥东西二部仅谕以“各守部分，勿复相攻”，均不许婚。

贞观四年（630年）冬，肆叶护可汗率右厢弩失毕部向俟毗可汗莫贺咄部发起进攻。由于肆叶护可汗是西突厥正统可汗之子，深得众心，故原先支持莫贺咄的左厢咄陆部在大兵压境之际，纷纷倒戈，莫贺咄很快便被击败，逃于金山，为肆叶护所杀。于是东西诸部“共推肆叶护为大可汗”①，西突厥汗国重归统一。

肆叶护可汗“猜狠信谗”，无统御方略，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贞观六年（632年）七月，肆叶护在北征铁勒诸部时，被薛延陀部打败。兵败之后，肆叶护又加罪臣下，并以“非其种类”为由，诛灭了定国有功的小可汗乙利可汗。不久，又猜忌迎立他为可汗的泥孰，泥孰被迫逃奔焉耆。由是，诸部震骇，“皆不自保”。接着，肆叶护又“欲图珍宝”，率其军旅，“奄袭伽蓝”②。对于肆叶护的倒行逆施，西突厥境内的左右两厢诸部纷纷起兵反抗，“设畀达官与突厥弩失毕二部酋帅潜谋击之，肆叶护以轻骑遁于康居，寻卒。”③

肆叶护死后，国人遂从焉耆迎回泥孰，立为咄陆可汗。泥孰曾在唐初到达过长安，与秦王李世民结为兄弟。立为可汗后，遂遣使入唐，请求内附。贞观六年（632年）七月二十三日，唐太宗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册立泥孰为奚利邲咄陆可汗。不久，咄陆可汗又将牙帐由原来石国千泉，东移于多逻斯川（今新疆境内额尔齐斯河流域），旨在加强同左厢咄陆部的联系，以此控制桀骜不驯的右厢弩失毕诸部。但由此却再次加剧了左右两厢的矛盾，致使右厢诸部转而支持泥孰之弟同娥设。这时，泥孰又因对东突厥阿史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

② 《大唐西域记》卷一《缚喝国》。

③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那社尔所率余部的诈降缺乏警惕，使其长驱直入，“半有其国”①，亦使左厢诸部蒙受了巨大损失。于是，左右两厢联合推翻了泥孰统治。贞观八年（634年）十二月，泥孰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忧郁而死，其弟同娥设继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

同娥设继汗位以后，汲取其兄泥孰的教训，在西突厥境内实行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体制改革：即将全国正式划分为咄陆和弩失毕左右两厢，每厢各辖五姓，合为十姓。每姓酋长各颁令箭一枝，表示各自授予一定权力，故又合称十箭。目的是在维持两厢势力的均衡，便于居中控制。在此期间，他又为了结援强国，遣使至唐，请求册封。唐太宗先后派使者刘善因和桑孝彦等持册封拜，并“令与焉耆为援”②。但由于西突厥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深蒂固，左右两厢积怨太深，故一些失势的两厢贵族遂在贞观十一年（637年）拥立咥利失可汗同娥设的重臣统吐屯发动政变，聚众偷袭可汗牙帐，迫使同娥设及其弟步利设投奔焉耆。在汗位虚阙之际，统吐屯与右厢弩失毕部阿悉吉阙俟斤等将立欲谷设为大可汗，但由于统吐屯不久为人所杀，咥利失遂在焉耆的支持下，又复得汗位。贞观十二年（638年）年底，右厢弩失毕部竟擅自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并与咥利失可汗相互攻击，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双方以伊丽水（今伊犁河）为界，河以东属咥利失可汗，河以西属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汗国又东西分裂。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西突厥东部咥利失可汗境内又爆发内乱，咥利失被迫逃奔拔汗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城附近），并客死于此。国人又立咥利失之侄薄布特勤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建牙于睢合水（即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北，谓之南庭。而乙毗咄陆可汗则建牙于镞昆山（今吉尔吉斯山）西，谓之北庭。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后，势力逐渐进入西域地区。

---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焉耆传》。

而咄陆与叶护可汗仍为争夺大可汗之位，交战不已，并相继遣使向唐求援。唐太宗遂派使者来到叶护可汗南庭，持节册命，并令双方各自罢兵。但咄陆可汗却凭借自己的“兵众渐盛”和“西域诸国复来归附”的军事政治优势，拒不听命，不断对叶护可汗发起进攻。是年七月，咄陆遣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吐屯攻杀叶护可汗，兼并其国。于是西突厥汗国又重归统一，咄陆可汗君临两厢，成了西突厥汗国名副其实的大可汗。

咄陆可汗欲谷设是个极富野心而又狂妄自大的人，他在统一了西突厥全境以后，“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逐渐对唐西北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唐军四击西突厥

遏索山之战 贞观十六年(642年)九月十日，唐太宗得知咄陆可汗“侵暴西域”的行径后，即以凉州都督郭孝恪为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并向西州和庭州大量集结军队，准备对咄陆可汗的侵扰进行反击。不久，咄陆可汗即派兵进犯伊州。进军途中，又攻占了庭州治所可汗伏图城，迅速兵临伊州境内。行安西都护郭孝恪闻讯，当即率轻骑2000，在伊州西北的乌骨地区设伏，进行阻击。结果，咄陆中伏兵败，率部西逃。败逃途中，咄陆又征发处月、处密二部兵围攻西州天山县(今新疆托克逊东北)，孝恪又派西州守将将其击败。接着，孝恪乘胜追击，沿途收复了庭州治所可汗伏图城，直追至遏索山(今新疆乌鲁木齐西南天山山脉中段)，又败其众，并收降了处密之众而归①，取得了遏索山之战的胜利。

遏索山之战的失败，并没有使咄陆可汗冷静下来。不久，他又率部西征康居。结果，侥幸得胜，并掠得康居的大量资财、人口。他曾对拘留的唐朝使者元孝友炫耀说：“我闻唐天子才武，我今讨康居，尔视我与天子等否？”② 咄陆不但妄自尊大，而且贪得无厌。他把从康居掠得的财富全都占为己有，并不分给部下。其

① 参阅《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②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部将泥孰啜心怀不满，率众抢夺，被斩首示众，遂激起众怒。泥孰啜属将胡禄屋举兵袭击咄陆，国内大乱，死伤甚众。咄陆败逃石国，率残部袭取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北、阿雷斯河上游附近）以居。右厢弩失毕部不愿咄陆继续担任可汗之职，遂遣使至唐，请求太宗另行册立。太宗派通事舍人温元隐至其国，与弩失毕诸部大臣共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咄陆可汗的统治至此灭亡。这不仅标志着西突厥汗国的全面衰亡，而且也是西域和中亚诸国全面摆脱西突厥汗国的羁绊，转而事唐的历史开端。

射匮可汗继位以后，立即向咄陆盘踞的白水胡城发起进攻。但由于他继位日浅，不为众附，将士不为所用，反被咄陆击败。而咄陆在遭受重创之余，亦众叛亲离，只得逃往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射匮可汗为了利用强国的声威，巩固汗位，故在继位后不久，即将原来咄陆可汗时期拘留的唐朝使者全部放遣归国，并多次遣使贡献方物，又请求和亲。但射匮可汗上述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假借唐朝声威，对国内的反对派施加压力，一旦局势稳定以后，他便凶相毕露，极力想把唐朝的势力逐出西域。贞观十八年（644 年），唐对焉耆用兵，射匮派兵援救，致使唐军无功而还。对于射匮可汗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唐太宗早有觉察。贞观二十年（646 年）六月，射匮可汗又“遣使入贡，且请婚”①。唐太宗虽然答应了和亲请求，但却要射匮可汗向唐割让龟兹、于阗、疏勒及朱俱波（在今新疆叶城）、葱岭（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等 5 国作为聘礼，和亲始能成行。这个条件当然是射匮可汗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双方由此决裂，为后来的唐与西突厥汗国之间的再次交兵埋下了祸根。

射匮可汗不但对外欺诈哄骗，而且对内也排除异己，竭力打击反对他的政治势力，致使内部矛盾重重，内战不已。

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四月，唐军利用西突厥内乱之际，在

---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六月。

叛归唐朝的西突厥重臣阿史那贺鲁的支持下，一举攻占龟兹，使射匮可汗受到重创。这就为后来阿史那贺鲁的卷土重来和君临汗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牢山之战 阿史那贺鲁是西突厥汗国始祖室点密的第五世孙，咥利失可汗之侄。贞观十三年（639年）年底，当咥利失可汗因内乱逃奔拔汗那后，他即投靠了乙毗咄陆可汗，被册为泥伏沙钵罗叶护，建牙于多逻斯川，统处月、处密、畀失、姑苏、歌逻禄等东部5个杂姓部落。贺鲁为人狡谲奸诈，善于审时度势，是一个很有心计而野心勃勃的人。咄陆可汗败走吐火罗，射匮可汗继立以后，阿史那贺鲁迫于射匮可汗的武力镇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率部降唐，并导引唐军取得了攻占龟兹的胜利，以功被封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并恢复了泥伏沙钵罗叶护的官爵。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二月十一日，唐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府。二月十三日，即以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但贺鲁的降唐并非出自真心实意，他只不过是要利用唐朝赐给他的政治地位，征服政敌射匮可汗，进而实现他统治西突厥汗国的目的。所以他在接到唐太宗赐给他招讨突厥的诏令后，即以瑶池都督府治所莫贺城为其牙庭，“密招携散，庐幕益众”①，逐渐奄有西突厥汗国半壁河山，成了与射匮可汗对峙东面的政治集团。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薨，唐高宗即位。阿史那贺鲁这时羽翼逐渐丰满，始谋叛唐，企图进攻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侦知后，当即上表举奏。唐高宗遣通事舍人桥宝明前往慰抚，并持弓矢、杂物以赠，要其长子咥运入朝宿卫。贺鲁无奈，只得遣咥运与宝明一起赴京。行至中途，咥运反悔，企图叛走。宝明“内防御而外诱谕，羁以至京”，高宗遂以咥运为右骁卫中郎将，厚加礼遇。为了感化贺鲁，使其不叛，高宗将咥运“寻又放归”②。

---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八《外臣部·奸诈》。

永徽元年（650年），贺鲁在其子咥运的鼓动下，举兵西征，击败了乙毗射匮可汗而并其部众，建牙于双河（今新疆博乐西之博尔塔那河）及千泉，自号泥伏沙钵罗大可汗，统两厢十姓，拥胜兵数十万。以其子咥运为莫贺咄叶护，与其婿胡禄屋酋阙啜俱领重兵。

永徽二年（651年）七月，泥伏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遣其子咥运统处月、处密、姑苏、畀失、歌逻禄等五部兵东犯庭州，相继攻陷了金满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杀掠数千人①，严重威胁到了唐安西都护府和西、庭二州的安全。唐高宗决计征讨，遂以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城在今新疆霍城西北）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侯将军薛孤吴仁为副总管，率秦（州治在今甘肃秦安西北）、成（州治在今甘肃西和西北）、岐（州治在今陕西凤翔）、雍（州治在今陕西西安）四州府兵3万人，又发燕然都护府所属回纥5万骑兵，取道天山北路，向沙钵罗可汗贺鲁发起进攻。大军将发之际，庭州刺史骆弘义曾向高宗上言，应对西突厥所属处月、处密及处木昆等诸杂部进行策反离间，使其归附，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专攻贺鲁，“贺鲁进退无路，理可成擒，有胜之谋，在斯一举”②。高宗赞同，当即派出使者分路“宣谕”。十二月二十四日，处月部不愿降唐，其酋长朱邪孤注率先“杀（唐）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而与贺鲁连合”③，接着，处密、处木昆等其他诸部亦先后杀唐使者，举兵叛乱。唐高宗只得下令梁建方和契苾何力等率部进攻处月诸部，暂不触动沙钵罗可汗。

永徽三年（652年）正月初五，梁建方部进抵牢山（约在今新疆奇台东北中蒙交界处之阿尔泰山），处月酋帅朱邪孤注率众据险抵抗。建方分兵数道，从四面登山，向处月进攻。结果，处月兵

①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二年七月。

② 《册府元龟》卷三六六《将帅部·机略六》。

③ 《册府元龟》卷九九七《外臣部·悖慢》。

寡不敌，部众大溃，被歼9000余人，被俘酋帅60，朱邪孤注挟妻子及家人夜遁。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逸率轻骑紧追，行至500余里，擒杀孤注。唐军赢得了牢山之战的胜利。与此同时，契苾何力部亦讨平了处密部的叛乱，“擒其渠帅处蜜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①。这时，唐军所带粮饷已经用尽，只得班师。

永徽四年（653年）三月十三日，唐废瑶池都督府②。这实际上也就是撤销了阿史那贺鲁的瑶池都督之职，也是唐对贺鲁发起再次进攻的前奏。

榆慕谷、鹰娑川之战　永徽四年（653年），乙毗咄陆可汗客死于吐火罗，其子颉苾达度设建号真珠叶护可汗，并率右厢弩失毕五姓兵进击沙钵罗可汗。结果，初战告捷，斩首千余级。但由于沙钵罗可汗士马强壮，真珠叶护一时难以取胜。于是他便多次遣使入唐，请唐出军，以便对沙钵罗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永徽六年（655年）五月十四日，唐高宗遂命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即葱岭）道行军大总管，王文度为副总管，主持西征事务，备粮调兵，务期穷讨。十一月八日，高宗又派丰州都督元礼臣前往册拜颉苾达度设真珠叶护可汗之号。礼臣行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沙钵罗发兵阻击，礼臣不得进。颉苾达度设部亦被沙钵罗击败，余众寡弱，礼臣只得返回，册拜未果③。

显庆元年（656年）正月，唐军西行征讨，唐高宗亲至宫城玄武门，为唐军统帅、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等饯行。八月一日，唐军与贺鲁旧部歌逻禄、处月二部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果子沟）遭遇，唐军奋勇厮杀，大破其众，俘获牲畜以万计。接着，唐军副将周智度又在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击败了西突厥突骑施和处木昆诸部，攻拔其城，虏获甚众。

---

①《旧唐书》卷一〇九《契苾何力传》。

② 参阅《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

③ 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

榆慕谷大捷以后，程知节继续率军西进。显庆元年（656年）十二月，唐军抵达鹰娑川（今新疆境内开都河上游），贺鲁派兵2万迎战。唐军前锋苏海政率部首先与敌遭遇，双方经过多次激战，互有进退。这时西突厥鼠尼施部2万骑兵突至，唐军兵寡难支。正在隔岭驻屯歇马的唐前军统帅苏定方远远望见尘土蔽天，遂率500精骑急驰参战，突厥兵众大败。唐军乘胜追奔20多里，歼敌1500余人，突厥死马及所弃甲仗，横亘山野，不可胜计。

唐军副大总管王文度接到捷报后，猜忌定方之功，遂千方百计在程知节处恶意中伤，硬把鹰娑川之捷说成是唐军"致有伤损"。他还鼓动程知节改变战术，把唐军全部"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①。这样一来，束缚了唐军手脚，遏制了主动进攻的锐气。另外，王文度又勾结监军宦官，"矫称别奉圣旨"，篡夺了对唐军的指挥权。对此，苏定方曾向程知节建言，严厉指出王文度的这种作战方略只能使唐军的"马饿兵瘦"，"士卒疲劳"，如此"怯懦"，"何功可立"！并劝告知节"囚执文度，飞表奏之"。但知节已为文度胁制，对定方不能相从。唐军行至恒笃城时，有突厥人前来归降，王文度又不听定方劝阻，下令将其"尽杀，取其资财"。此后，唐军所至，西突厥境内守城兵士拼死抵抗，拒不投降，致使唐军行动迟缓，靡费军资，士气低落。贺鲁乘机发兵反击，唐军大败，只得班师。结果，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也因迟缓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②。

曳咥河之战（参见附图6）　显庆二年（657年）正月，唐高宗决心对西突厥汗国发动更大规模的再次征讨。针对唐军在鹰娑川之战失利的教训，唐高宗对这次西征作了周密准备和精心安排：他首先在已经归附的歌逻禄部和炽俟部分别设置阴山和大漠二都督府，对其进行羁縻统治；接着，又破格擢用在鹰娑川之战中功劳卓著的苏定方为伊丽道（今伊犁河流域）行军大总管，统率燕然都督

---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三《苏定方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元年十二月。

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所统汉军及婆闰所部回纥步骑5万，为北道大军；以西突厥降将、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任流沙道安抚大使，为南道大军，集结待命。是年六月，高宗又发布《采武勇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于良、平，驰功绩于卫、霍"①的文武人才，充作西征唐军的军事骨干。这时，西突厥汗国内部也出现了乱离迹象，其右厢五姓中最强大的阿悉结部不服贺鲁，举众叛乱，被贺鲁击败，该部酋长泥孰俟斤出逃，妻子被掳。对此，唐代名将、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疏说，汉兵如有在贺鲁诸部落获得泥孰俟斤及其家口者，应"括取送还，仍加赐赉"②，旨在分化贺鲁势力，离间阿悉部，为最后歼灭贺鲁创造有利条件。这个建议很快便被高宗采用，从而获得了泥孰部的全力支持。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苏定方遂与阿史那弥射等相继率南北两路大军，向西挺进。

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北路军在苏定方的率领下渡过沙碛，沿金山之南向处月部发起进攻。结果，大破其众，"其俟斤嬾独禄率万余帐皆降"③，定方发其千骑从征。阿悉结泥孰俟斤在唐朝使者的离间下，亦率残部"请从军共击贺鲁"④。苏定方遂率唐军及处月千骑和泥孰残部继续西进，行至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西，与沙钵罗可汗所率两厢十姓10万之众相遇。苏定方看到突厥兵众势盛，便将5万唐军分为步、骑两部，令步兵万余占据河谷南岸有利地形，攒矟外向，结阵防守；亲率4万骑兵阵于北原。贺鲁看到唐军兵少，有轻视之心，率部将唐万余步兵团团包围，接连发动了三次攻击，但唐军凭借有利地形，巍然不动。待突厥兵势疲惫以后，定方率骑兵向贺鲁发起冲锋，贺鲁大败。唐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歼敌并俘获数万人。次日又整军更进，继续

---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二《举荐上》。

② 《旧唐书》卷八十三《薛仁贵传》。

③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

追击。在穷途末路之际，右厢弩失毕胡禄屋等部相率归降。贺鲁狼狈西遁，从行者仅有其子咥运、婿阙啜及处本昆屈律啜等数百骑。正在这时，气候突变，风雪大作。唐军由于连日作战，兵士疲惫，诸将建言驻军休整。但唐军统帅苏定方却力排众议，令任雅相统领唐军紧追不舍，又遣萧嗣业偕婆闰统回纥精骑直趋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以断贺鲁后路。于是，北路军全体将士不顾疲劳，"勒兵冲雪，昼夜兼进"①。

南路军在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的率领下，经伊、西、庭三州亦向西挺进。沿途"宣畅朝风"，处月、处密以及西突厥左厢咄陆诸部"各率众来降"②。行至双河（今新疆艾比湖东），贺鲁部将步失达干据栅抵抗。弥射、步真麾军急攻，西突厥守军大败。不久，苏定方所率北路军亦相继到达，南北两路唐军胜利会师，合军西进。行至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唐军又击败了贺鲁守军，顺利地渡过河西，长驱直入，径向贺鲁所居的千泉牙帐挺进。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从东线败归后，正待休整。时值大雪，以为唐军不能至此，遂出巡狩猎，在牙帐以东 2 里处正与唐军相遇。定方与弥射等纵兵大击，"尽破其牙帐，生擒数万人，并获其旗纛器械"③。贺鲁与其子咥运、婿阙啜并少数亲骑西走，企图逃奔石国。途中被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拘留，执送石国王鼠耨设。这时，唐将萧嗣业与婆闰所帅回纥骑兵已从曳咥河进至怛罗斯一带，与唐军南北二路主力会合，相继抵达石国境内。石国王鼠耨设不敢收留贺鲁，将其缚送唐军。西突厥汗国至此灭亡，唐对西突厥进行长达 10 多年的讨伐战争亦至此结束。

四、战后唐朝巩固西域的军政措施

唐朝平定西突厥汗国的战争结束以后，唐军统帅苏定方立即奉诏对西突厥降部进行安抚。他首先下令西突厥诸部各自回到原

①②③《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来的居住地，恢复正常生业。然后又恢复交通道路，重新设置驿站车马，消除战争遗迹。他又巡视诸部，询问疾苦，划疆而治，维持社会秩序。西突厥境内各族百姓很快便"安堵如故"①。

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一日，唐高宗开始在西突厥境内全面设置州府，对归附的西突厥诸部加强羁縻统治：以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昆陵都护府都护，统领碎叶川以东的左厢咄陆五姓；以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濛池都护府都护，统领碎叶川以西的右厢弩失毕五姓。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均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并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承庆又与弥射、步真二都护对归降的突厥诸姓，按其部落大小和地位高下，分别授刺史以下官。

显庆三年（658年）十一月，唐高宗又在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统领的昆陵都护府所属的西突厥左厢咄陆部相继设立了以下6个州府：

1、匐延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附近），以处木昆部置；

2、嗢鹿州都督府（在今伊犁河流域），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

3、絜山州都督府（今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北），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

4、盐泊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克拉玛依南），以胡禄属阙部置；

5、双河州都督府（在今新疆温泉、博乐之间），以摄舍提暾部置；

6、鹰娑川都督府（在今新疆境内开都河上游），以鼠尼施处半部置②。

是年，又分葛逻禄三部置以下3州府：

---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

② 以上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胡注。

1、玄池州都督府（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斋桑泊东南），以葛逻禄踏实部置；

2、阴山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塔城西南一带），显庆二年（657年）正月，以葛逻禄谋落部置；

3、大漠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布伦托海南），显庆二年（657年）正月以葛逻禄炽俟部置①。

在此期间，在昆陵都护府辖区设置的还有以下州府：

金府州都督府，析大漠州都督府置；

轮台州都督府（在今新疆轮台附近），史失所置部落名称，以地望推测，当以处密部置；

咽蔑州都督府（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尔喀什湖与阿拉湖之间），以咽蔑部置；

金满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奇台西北），以处月部置②；

蒲类州（治所在今新疆奇台），史书失载，近人于北庭故城发现该州印章，推测当为唐高宗时所置③。

与此同时，唐朝又在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统领的濛池都护府所属右厢弩失毕五姓中设立以下州府：

千泉都督府，府治碎叶城，以阿悉结泥孰俟斤部置；

俱兰都督府，府治俱兰（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西），以阿悉结阙俟斤部置；

颉利都督府（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北），以拔塞干部置。

以上3州府均未见正史记载，仅见于今陕西乾县乾陵蕃臣石像背后所刻衔名④。

---

① 以上二州府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二年春正月。

② 以上州府参阅《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

③ 参阅《蒲类州之印小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④ 参阅《唐乾陵石人像及衔名的研究》，载《文物集刊》二辑（1984年4月）。

以下州府史书失载所置部名及地望，它们是：

盐禄州都督府

哥系州都督府

哥舒州都督府

西盐州都督府

东盐州都督府

叱勒州都督府

迦瑟州都督府

凭洛州都督府

沙陀州都督府

答烂州都督府

以上10州府《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将其全部划归昆陵都护府统辖，但经近人考证，这10州府中除凭洛州都督府和沙陀州都督府可划归昆陵都护府外，其余8州府均应划归濛池都护府统领①。故置此俟考。

前已述及，西突厥汗国乙毗咄陆可汗死后，其子颉苾达度设曾于永徽四年（653年）遣使入唐，并与唐军东西夹击，赢得了榆慕谷之战的胜利。但在西突厥汗国灭亡以后，颉苾达度设却率部西进，兵锋直至双河地区，企图重新控制左厢咄陆诸部，进而恢复西突厥汗国的统治。这样，唐朝册封的兴昔亡可汗和昆陵都护的封地就受到了直接威胁。于是，阿史那弥射遂于显庆四年（659年）年初率众迎击，双方战于双河。三月五日，唐军大胜，颉苾达度设阵前被斩②。至此，西突厥的叛乱势力被彻底歼灭，从而结束了西突厥东西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两厢十姓全境归唐的曲折历程，并进一步加强了唐对西突厥地区的羁縻统治。

另外，建国于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的吐火罗（今阿富汗

① 参阅薛宗正：《突厥史》，第600～6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

② 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四年三月。

北），由于受到波斯（今伊朗）王国的东进威胁，曾于永徽三年（652 年）遣使归唐。此后，随着西突厥汗国的灭亡，西域地区的中亚诸国亦相继归附唐朝。唐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置羁縻州府，其中设在药杀水（今锡尔河）和乌浒水之间及其以北地区的州府大致有以下 8 个：

休循州都督府（今锡尔河上游东），显庆元年（656 年）以拔汗国置；

康居都督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显庆二年（657 年）以康国置；

贵霜州（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显庆二年（657 年）以何国置；

佉沙州（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南），显庆二年以史国置；

安息州（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显庆三年（658 年）以安国置；

木鹿州，州治喝汗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北），显庆三年以东安国置；

南谧州，州治钵息德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朱马巴札尔），显庆三年以米国置；

大宛都督府，府治瞰羯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显庆三年以石国置。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龙朔元年（661 年）六月条载："以吐火罗、哌哒、罽宾、波斯等 16 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上述 8 都督州府当是以此 16 国所置，其州、县、军府并失载。

又据法国人沙畹所编《西突厥史料》一书记载，唐高宗时期在阿姆河南北设置的还有以下 16 州府：

月氏都督府，府治阿缓城（今阿富汗西北汗阿巴德西北），永徽三年（652 年）以吐火罗国置；

大汗都督府，府治活路城（今阿富汗西北阿格查西南），龙朔

元年（661年）以哌哒置；

条支都督府，府治伏宝瑟颠城（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南加兹尼），龙朔元年以诃达罗支国置；

天马都督府，府治数瞒城（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以解苏国置；

高附都督府（在天马都督府西南），以骨咄施国置；

修鲜都督府，府治遏纥城（在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之喀布尔河中游），以罽宾国置；

雁凤都督府，府治罗烂城（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东巴米安），以帆延国置；

悦般州都督府，府治艳城（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东），以石汗国置；

奇沙州都督府，府治遏密城（今阿富汗北迈马纳东），以护时犍国置；

姑墨州都督府，府治怛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梅兹东北），以怛没国置；

旅獒州都督府，府治摩喝城（今阿富汗阿格查东），以乌拉喝国置；

昆墟州都督府，府治低宝那城（今阿富汗迈马纳西），以多勒建国置；

玉拔州都督府，府治褚瑟城（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西北），以俱密国置；

鸟飞州都督府，府治模逵城（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西北），以护密多国置；

王庭州都督府，府治多师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梅兹西），以护密多国置；

波斯都督府，府治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以波斯国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载："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运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上述十六州府，当是此"十

六国”所置。

总之，由于西突厥汗国的灭亡及其叛乱势力被平定，遂使唐朝国境西部和大食（古阿拉伯帝国）、波斯相接，唐朝成了与大食东西辉映的亚洲两大封建帝国。接着，唐朝又在西域地区广泛设置州县，不但进一步加强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羁縻统治，而且也促进了唐朝同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

第四节　巩固西南边疆的和战政策

6世纪后期兴起于我国西南边疆的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贞观十五年（641年），在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唐太宗将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亲手缔造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至今被汉藏各族人民广为流传。唐高宗即位以后，由于吐蕃统治者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野心与日俱增，遂与唐为争夺吐谷浑和西域地区，进入了长达20年的战争状态。经过咸亨元年（670年）的大非川之战、仪凤三年（678年）的承风岭之战、开耀元年（681年）的良非川之战和永淳元年（682年）的白水涧之战，唐军击败了吐蕃的多次侵掠，基本遏制了吐蕃的进攻势头。

一、吐蕃的兴起

吐蕃是西藏地区的最早居民，也是今天藏族的祖先。

根据近年来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5000多年以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西藏就有土著居民生息繁衍。后来，由于居住在青海和河西地区的羌人不断涌入西藏，和当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遂使吐蕃族日益兴旺起来。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西藏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不仅构成国家政权的官吏、军队和司法等相继产生，而且争夺私有财产的战争也在经常进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藏地区的奴隶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不仅传

统的畜牧业更加兴盛，而且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这时的吐蕃族聚居于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匹播城（今西藏琼结）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崛起于西藏高原北部的苏毗和西北地区的羊同，构成为西藏地区三个最为强大的割据政权。

吐蕃族在长期的生存斗争和繁衍生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吐蕃王族姓窣勃野（亦通称悉补野），国人称王为“赞普”，意为“强雄丈夫”，赞普妻曰“末蒙”。赞普以下有相，大相称“大论”，小相称“小论”。由于这里气候寒冷，不宜种粳稻，但盛产“青稞、荳豆、小麦、荞麦”，牲畜有牦牛、羊、马等。吐蕃人英勇善战，性格豪放。兵士以战死为最高荣誉，连世战没者，被视为“甲门”；临阵败逃者，用狐尾垂于头上，以示侮辱。举兵之时，以七寸铁箭为标志，军情紧急时，驿人胸前插戴银鹘，最急时，银鹘增多。两军对垒时，“前队尽死，后队乃进”。社会风俗“贵壮贱老”①。

南朝陈宣帝太建元年（569 年），松赞干布生于都城匹播②。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年），其父论赞索（即郎日松赞）赞普死，松赞干布继承赞普之位。松赞干布又称“弃宗弄赞，亦名弃苏农，亦号弗夜氏”③，他是吐蕃历史上一位具有杰出军事和政治才能的部族领袖。青少年时代，他常喜欢乘马驰杀野马、牦牛，性格雄武果敢而又慷慨豪放。他在继位赞普的第三年，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 年），将都城从匹播迁至逻些（今西藏拉萨），在他的祖先拉拖徒日赞曾经住过的红山（今布达拉山）顶上建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作为统治吐蕃的政治中心。

逻些位于吉曲河（今拉萨河）下游，这里地势开阔，原野秀美，东连娘波、工布，西邻羊同，南依雅隆河谷，北与苏毗相接。布达拉山雄峙原中，居高临下。确实是实现松赞干布扩张领土、统一西藏夙愿的理想之地。

---

①③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② 关于松赞干布的出生时间，藏、汉文献记载不一，此采一说。

迁都逻些以后，松赞干布又对政治和军事制度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遂使吐蕃政权迅速强大起来。不久，他就开始对苏毗和羊同两个政权先后用兵，开始了统一西藏的丰功伟业。

苏毗为羌人一支，原来占有雅鲁藏布江以北大片领土，王城在宇那城堡（今西藏墨竹工卡东北），在江北诸羌中最为强大。论赞索任吐蕃赞普时，曾打败苏毗，苏毗王子被迫逃往西突厥汗国，吐蕃的势力遂由雅隆河谷发展到了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松赞干布继位之初，苏毗曾利用论赞索新丧之机，勾结吐蕃内部的旧贵族，南下进攻吐蕃。年仅 13 岁的松赞干布在其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的协助下，一举平定了内部旧贵族的叛乱，稳固了内部。接着，松赞干布又亲巡江北，遏制了苏毗的进攻。

经过迁都和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吐蕃逐渐强盛以后，松赞干布遂派尚囊带兵进攻苏毗。尚囊是一位极富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用兵击败了苏毗的抵抗后，采用招抚之策，不断扩大战果。结果，未动一刀一枪，就收降了苏毗诸部。

不久，松赞干布又亲自带兵西进，用兵羊同。羊同位于西藏西部，有大、小两部，地接新疆和田，东西千余里。羊同人以畜牧为业，有精兵 10 万。国王姓姜葛氏，有 4 个大臣分掌国事。为吐蕃劲敌。松赞干布率兵进入羊同，多次打败了羊同的抵抗，最终迫其臣服。就这样，松赞干布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终于用武力统一了西藏地区，一个强大的吐蕃王朝在祖国的西南兴起。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松赞干布又派兵平定了东方的东女、附国等诸羌部落；武德九年（626 年），又征服了西方的尼婆罗（今尼泊尔）。唐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吐蕃军队又攻占了位于青海河曲一带的党项，更号其名曰“弭药”。至是，吐蕃奄有现在的西藏、四川西部和青海西南部，北以巴颜喀拉山为界，中隔白兰、党项 2 部余部与吐谷浑相接，东以茂州、岷江西岸之西山8 国与唐朝毗邻。

二、太宗时期唐与吐蕃的和亲政策

早在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索时期，吐蕃就和中原王朝发生过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地的医药、历算等类书籍大量传入西藏①。当松赞干布威服群羌、统一诸部，正在建立吐蕃王朝之时，唐朝已于贞观四年（630年）灭亡了东突厥汗国，东面的奚、契丹、室韦，西北的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以及西突厥汗国等，皆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唐朝的声威远播四方。松赞干布对唐朝的强盛国力和丰富文化早有所闻，遂于贞观八年（634年）派使者入朝进贡，与唐通好。唐太宗这时正欲对吐谷浑用兵，听说吐蕃位于吐谷浑之南，称雄一方，当即派使者冯德遐前往“抚慰”②。

冯德遐来到逻些后，松赞干布心中大悦，隆重接待。他听说突厥和吐谷浑可汗都娶唐朝公主为妻，便再次派遣使者，携带大量金宝，随德遐入朝，上表请婚。这时，唐朝已于贞观九年（635年）征服了吐谷浑，伏允可汗被部下所杀，其子诺曷钵被立为可汗。唐太宗觉得西境已无战事，吐蕃僻处西陲，距离遥远，遂拒绝和亲。吐蕃使臣未能完成使命，回国后便编造谎言说：唐天子开始待使者甚厚，并答应和亲。但吐谷浑使者入朝后，从中挑拨离间，和亲遂被拒绝。松赞干布听后大怒，亲自率领本部和羊同的军队，向吐谷浑发起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抵挡不住，逃至青海湖北躲避。松赞干布又麾军东进，攻破党项、白兰二部，于贞观十二年（638年）陈兵于唐朝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西境。再次遣使入唐，要求迎娶公主，并对部下扬言：“公主不至，我且深入。”③ 大有逼婚之势。

① 参阅《西藏王统记》，转引自《藏族史略》，第50页，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③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唐松州都督韩威听说吐蕃已入州境，不知虚实，率轻骑观察敌情，被吐蕃击败。于是，松州附近原已降唐的诸羌纷纷举兵，叛应吐蕃。松州告急。唐太宗遂于八月二十七日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步骑5万迎击。吐蕃大臣对松赞干布的犯唐边境惊恐不已，力劝罢兵，但松赞干布却拒不接受，继续东进，致使进谏大臣接连"自缢者凡八辈"①。九月六日，唐军前锋牛进达部抵达松州，乘吐蕃不备，将其击败。松赞干布这才感到唐军实力雄厚，难以匹敌，用武力绝对不会达到求婚目的，只得引兵退回。不久，第三次遣使入京，向唐谢罪，并诚恳请婚。这时，唐太宗从松赞干布的行动中，看到了其友好的本意，也认识到了吐蕃是西陲强国，为西境安宁计，为加强同吐蕃的交往，便答应和亲。使者回报后，松赞干布大喜过望，立即派宰相禄东赞携带黄金5000两，宝物珍玩数百件，赴长安纳聘。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禄东赞到达长安，陈述了松赞干布仰慕大国、切望结亲的诚意，奏对称旨，太宗遂决定以文成公主出嫁。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十五，文成公主的陪奁齐备以后，西行赴婚，唐太宗命族弟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一行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初春的积雪，经过关中平原、陇东鄯城（今青海西宁）和赤岭以后，进入吐谷浑境内。在河源郡王、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奉旨修建的行馆憩息月余，继续西行。松赞干布率众来到柏海（今青海境内札陵湖）亲迎，对李道宗执子婿之礼，十分恭敬。文成公主盛妆会见松赞干布，仪式欢乐而隆重。行过亲迎礼后，道宗回朝复命，松赞干布亦同随行的汉族工匠先程返回，与吐蕃民伕一道为公主平治道路，重设馆驿，开辟了一条连接唐蕃的道路。文成公主沿途向吐蕃居民传授安装碾硙、播种芜菁等农业技术。入藏以后，文成公主又热情向藏族妇女传授纺织、刺

---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二年八月。

绣等技术，从此，藏族人民逐渐学会了纺织丝麻，服饰有了很大改进。在文成公主的建议下，松赞干布还下令停止了用赭土涂面的风俗。不久，松赞干布又向唐请来蚕种和从事酿酒、碾硙、建筑等技术工匠，促进了吐蕃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松赞干布还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诗书礼仪，并请中原的儒者到吐蕃掌管文书章奏。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大为加强。

三、高宗时期的唐蕃战争

唐高宗即位之初，曾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赏赐织物 2000 段。松赞干布亦致书司徒长孙无忌，表示"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①。又献金银珠宝 15 种，请置于太宗灵座之前。高宗称赞不已，又进封为赍王，赐杂綵 3000 段，并刻松赞干布石像，列于昭陵玄阙之下。永徽元年 (650 年)，松赞干布卒，由于其嫡子早死，故其幼孙被立为赞普。对松赞干布的逝世，高宗曾遣使吊唁，表示哀悼。两族政权仍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但是，数年之后，随着吐蕃国力的不断强盛，吐蕃的执政宰相禄东赞扩张领土的野心亦与日俱增。他曾多次派兵向吐谷浑和西域地区发起进攻。

显庆五年 (660 年) 八月，禄东赞因与吐谷浑"不和"，遂发兵骚扰其南部边境，作试探性进攻。吐谷浑可汗、河源郡王诺曷钵当即率部抵抗。于是，双方"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唐高宗由于对吐蕃仍持友好态度，故只是"依违"其间，"未为与夺"②。

龙朔二年 (662 年) 十二月，唐朝委派统领西突厥的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与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相继死去，突厥十姓无主。龟兹和疏勒诸国阴谋叛乱，唐高宗遂派飓海道总管苏海政率部进

---

①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入西域，进行平叛。这时，吐蕃也在疏勒弓月部的勾引下，进入西域。唐军由于兵寡师老，无力与吐蕃较量，只得纳贿求和，与其签订城下之盟。不久，西突厥余部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亦“收其余众，附于吐蕃”①，吐蕃政权对西域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龙朔三年(663年)五月，吐谷浑的叛臣素和贵畏罪逃奔吐蕃，向禄东赞报告了吐谷浑在边防布军的军事情报。禄东赞遂发吐蕃兵众向吐谷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诺曷钵抵挡不住，接连败北，遂与弘化公主率数千帐逃奔凉州，“遣使告急”②。吐谷浑地据要津，为河西屏障，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唐朝当然不甘心把它拱手让给吐蕃。于是，唐与吐蕃为了争夺吐谷浑和西域等地又进入了战争状态。

（一）大非川之战

唐高宗接到诺曷钵的告急情报后，立即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防卫吐蕃。龙朔三年（663年）六月，又从高丽前线召回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任为安抚大使，令其统领诸军，援助吐谷浑。禄东赞率吐蕃之众屯驻青海湖畔，遣使入唐，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唐高宗断然拒绝，并派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对其入侵吐谷浑和西域地区的无理行径进行严厉谴责。

麟德二年(665年)正月二十四日，禄东赞又派使者来到长安，请与吐谷浑和亲，并求割让赤水之地（今青海东南），牧养牲畜，唐高宗再次拒绝。

是年三月，入侵西域的吐蕃兵众在疏勒弓月部的导引下，大举东进，入侵于阗。高宗敕令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率兵援救。

总章二年(669年)九月，唐朝因于去岁灭亡高丽，连年用兵辽东，国力虚耗，故高宗下诏将吐谷浑徙居凉州南山，打算暂避吐蕃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兵锋。但由于不少大臣建议用兵西陲，故“议久不决，竟不果徙”①。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接连攻陷西域18州之地，又与于阗攻占了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朝被迫罢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安西四镇。四月九日，唐高宗决定对吐蕃的入侵西域进行反击，遂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大总管，率兵10万，讨伐吐蕃，并护送吐谷浑返回故地。这时，吐蕃相禄东赞已死，其子论钦陵为相，继掌大权。八月，唐军抵达大非川（今青海兴海大河坝），仁贵命待封率2万人置辎重于大非川上两栅之内，轻装上阵。自率精锐先行，昼夜兼程，准备出其不意，攻敌不备。行至河口（今青海兴海东南），大破吐蕃之众，乘胜进屯乌海（亦称苦海，即今青海冬给措那湖），等候待封增援。郭待封原与仁贵官职相当，这次出征，耻居其下，故对仁贵策略多所违背。这时他又违背军令“将辎重徐进”。由于行动迟缓，途中遭到20万吐蕃兵众的袭击，待封败走，辎重尽失。仁贵在乌海孤立无援，只得退兵大非川，正与吐蕃宰相论钦陵所率40万大军遭遇，唐军大败，死伤殆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脱身逃走，最后与论钦陵“约和而还”。回朝以后，仁贵等3人均被“免死除名”②。吐谷浑全境遂被吐蕃占领。

大非川之战以后，吐蕃一面继续用遣使通好的手段麻痹唐朝，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唐朝西境进行骚扰。唐朝由于在这次战争中受到重创，一时无力反攻，仅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进行防御。咸亨三年（672年）二月，高宗又下诏迁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亹水（今青海大通河）南。由于此地靠近吐蕃，诺曷钵遂以“鄯州地狭”为由，不欲迁徙。高宗只得改迁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治今宁夏中卫鸣沙），以诺曷钵为刺史。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总章二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咸亨元年八月及《旧唐书》卷八十三、《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

上元二年（675年）年初，西域疏勒、弓月二王及于阗王伏阇雄相继脱离吐蕃，归降唐朝。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受到削弱，论钦陵遂派大臣入朝请和，并要求与吐谷浑“复修邻好”，唐高宗严词拒绝。

仪凤元年（676年）闰三月，吐蕃又进犯鄯、廓（州治在今青海化隆东南）、河（州治在今甘肃东乡东南）、芳（州治在今甘肃临潭）等州。唐高宗令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州治在今陕西略阳）、凤（州治在今陕西凤县西北）等州兵，仍予防卫。

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吐蕃又犯拱州（治今四川南坪西北）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令其说降松州都督武居寂，但孝升固执不从。吐蕃只能舍孝升撤军，孝升又率余众拒守。高宗以孝升为游击将军。是年八月，高宗令宰相刘仁轨镇洮河军（军在鄯州城内），准备对吐蕃大举反攻。

（二）承风岭之战

仪凤三年（678年）正月，镇守洮河军的宰相刘仁轨由于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和，遂向高宗奏称：“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不谙军旅，知是仁轨有意中伤，故而推辞。但高宗却说：“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① 正月十九日，敬玄遂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奉诏发剑南（今四川）、山南（今陕西南部及四川、湖北北部）兵向鄯州集结。二十六日，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又分赴黄河南北招募猛士，无论百姓、仕宦，悉募入军，积极增兵备战。

是年七月，唐军统帅李敬玄率部西进，在龙支（今青海民和东南）击败了入侵鄯州的吐蕃之众，遣使告捷。

九月十二日，敬玄率兵继续西进，抵达青海湖畔，与吐蕃论钦陵部遭遇。敬玄派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刘审礼率前锋部队继续深入，屯兵濠所，被吐蕃包围，并受到攻击，形势危急。敬玄看到吐蕃兵士众多，懦弱怯战，竟按兵不救。结果，前锋部队全

---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仪凤三年正月。

军覆没，审礼被俘。敬玄闻讯，又狼狈撤退，屯兵于鄘州广威县（今青海贵德）西南的承风岭，凭借泥沟结阵自固。吐蕃追兵占据高岗，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看到形势对唐军不利，遂率由500兵士组成的敢死队，深夜偷袭敌营，吐蕃自恃兵多，不设防备，兵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逃走。敬玄这才收集余众，返回鄯州。高宗闻报后，嘉常之之功，擢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李敬玄被“贬授衡州刺史”①。不久，唐高宗又遣以猛士从军的监察御史娄师德出使吐蕃。吐蕃将论赞婆迎于赤岭。师德向其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大悦，由此数年不再犯边。师德被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后来，黑齿常之和娄师德竟成为抵抗吐蕃入侵的著名将领。

承风岭战败以后，唐高宗常以吐蕃为忧，故多次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在讨论中，有的大臣认为应和亲罢兵，休息百姓；有的主张严设守备，待机而动；有的则想立即进攻，以纾边患。由于争论不休，竟议而未决。太学生魏元忠在上书中提出了防御三策：即“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赏厚有功”，“罚重有过”；“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②。针对当时“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的“庸人”，“当阃外之任”，“悬不信之令，设虚设之科”以及“禁百姓畜马”等弊政进行了大胆针砭。深得高宗“叹异”，被授秘书省正字，仗内供奉。

调露元年（679年）二月十一日，吐蕃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继立，年仅8岁。专制国政的大相论钦陵遣使入朝告丧，唐高宗一面派人入蕃吊唁，一面命吏部尚书裴行俭乘机进讨。但行俭认为吐蕃君臣和睦，不可轻举，遂止。是年六月，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师为质长安。高宗采行俭之策，令行俭送泥洹师归国为王，又兼安抚大食使者。行俭行至西州，擒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遣波斯王自返其国，留王方翼镇安西，使筑碎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一《李敬玄传》。

② 《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

叶城以拒吐蕃，西域粗定。

永隆元年（680年）七月，吐蕃又犯河源（今青海贵德），被黑齿常之击败。常之由此被擢为河源军经略大使。此后，常之于河源置烽燧70余所，开屯田5000余顷，岁收粟500余万石。由是军粮充足，防守有备，成为抗御吐蕃的中坚力量。不久，吐蕃又在生羌的导引下，攻占了茂州的安戎城（今四川汶川西南），留兵据守。由是西洱（今云南大理一带）诸蛮均降于吐蕃。吐蕃占有羊同、党项全境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州治在今四川西昌）等州，南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西临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三）良非川、白水涧之战

吐蕃对西南边境的大肆侵扰，引起了唐廷的极大关注。唐高宗决意对吐蕃用兵。开耀元年（681年）五月二十一日，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奉命出击，吐蕃大臣论赞婆率众迎战，双方在良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遭遇。结果，唐军大胜，缴获了大量粮饷和牲畜。常之在河源军前后7年，多次打败吐蕃，吐蕃兵众闻风丧胆，多年不敢犯边。

永淳元年（682年）五月，吐蕃大相论钦陵率众进犯柘（州治在今四川黑水南）、松、翼（州治在今四川黑水东）等州，高宗诏令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左卫郎将卫蒲山发秦、渭等州兵分道防御。

是年十月，吐蕃又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奉命出击。双方在白水涧（今青海大通西北）相遇，唐军8战8捷。从此，吐蕃的攻势受到遏制。师德以功被擢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

第五节　唐朝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原因及历史意义

唐王朝从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开始的巩固边疆地区的作

战，到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为止，进行历时半个多世纪，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北灭东突厥和薛延陀汗国于漠北，臣服吐谷浑于西境；平高昌，征焉耆，取龟兹，覆亡西突厥汗国于西域，中亚诸国相继归附；唐太宗又和亲吐蕃，缔造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唐高宗用兵青海，遏制了吐蕃上层统治者对西域和河陇地区发动的入侵之势。这就极大地巩固了唐朝边疆地区的安全。

一、胜 利 原 因

唐王朝在半个世纪巩固边疆的作战中，其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唐朝国内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是胜利的坚实基础

唐朝建国之初，高祖李渊一面派兵平定国内的割据军阀和农民起义军余部，一面继承隋朝，继续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使三省分掌决政、议政和执行之权，各自发挥定策、封驳和执行的作用，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提高了决策和行政效率，从而强化了封建机制的统治作用。又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百姓凡丁男、中男均可授田一顷，其中80亩口分，20亩永业；老男笃疾、寡妻妾以及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亦可授予一定数量的均田土地。凡受田百姓均要承受不同数量的租庸调负担。另外，唐高祖又继续实行府兵制，在关中设置12军，“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坚持“无事时耕于野”，若有战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①这样，不但很快统一了全国，而且还使受到隋末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苏息与恢复。唐太宗李世民经过武德九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升储登极以后，除继续执行高祖时期的各项基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外，又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上，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崇尚节俭，虚心纳谏，力倡民本思想，对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老百姓轻徭薄赋，鼓励他们占田垦荒，务本勤农，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在军事上又进一步完善府兵制，对府兵的组织机构、简点原则、兵力分布和军事训练等都作了认真的整顿和部署，使府兵制“兵农合一”和“农战交修”的性质更加显著，并且形成了“内重外轻”和“居重驭轻”的诸多特点。因而到贞观四年（630年）前后，唐王朝的“府库甲兵”之盛，就远超“隋世”，出现了“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①的太平景象。唐高宗即位以后，仍继承贞观遗制，无所改作，故“海内康宁”，国力仍处上升之势。所有这些，都为唐朝的征讨四夷，取得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唐朝统治者的斗争策略、战略决策以及具体战术的正确运用是胜利的关键

面对唐初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唐朝最高统治者唐高祖和唐太宗始则纳贿求和或嫁女和亲，以集中力量平定内乱，恢复国力；继而先后利用周边各少数族政权之间以及这些政权内部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斗争，大力对其进行策反离间和分化瓦解，削弱了各个少数族政权的军事力量，这就为唐军的大举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西突厥汗国虽为同宗，但因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扩张疆宇以及掠夺财富，曾进行一系列激烈而又残酷的斗争。对此，唐高祖采取“远交近攻”的斗争策略，遣使结好西突厥汗国，并答应和亲，这就使东、西突厥汗国之间的矛盾更为加深，从而使东突厥汗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一定牵制。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维持和西突厥汗国的友好关系，专力对付北狄。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对东突厥汗国内部的亲唐势力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和分化。早在高祖武德年间，李世民就同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结为兄弟”，成为盟友。贞观三年（629年），当突利在颉利的胁迫下，走投无路之际，毅然归唐，当是唐太宗进行长期离间分化的结果。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

在此之前，唐太宗又于贞观二年遣使潜入漠北，册封揭竿起义反抗颉利残暴统治的铁勒薛延陀部族酋长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这样，就使颉利可汗处在内外交困和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在大举进攻吐谷浑以前，唐高祖为了麻痹伏允可汗，也为了在其内部树立亲唐势力，同时，也为了牵制和夹击河西李轨，曾于武德年间主动放回了长期为质中原的伏允之子慕容顺。接着，唐太宗又遣使招抚位于吐谷浑之南的党项羌人，瓦解了伏允可汗的重要同盟力量。因此，当唐军深入吐谷浑腹地，追击伏允可汗之时，慕容顺当即杀死伏允的亲信大臣天柱王，率众归降，导致了吐谷浑汗国的土崩瓦解，当与唐朝统治者分化瓦解斗争策略的正确运用不无关系。

唐太宗对西域地区亦采用过相同的斗争策略。他首先利用西域诸国与西突厥汗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西域诸国内部的斗争，相继平定高昌和龟兹等国，接着又在西突厥汗国左右两厢十姓之中培植亲唐势力，致使其内乱迭起，兵力大为削弱，为唐军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在制订战略决策时，唐太宗首先把注意力集中漠北，专力对付对唐威胁最大的东突厥汗国

颉利可汗灭亡以后，唐太宗又集中兵力，麾军青海，于贞观九年（635 年）征服了吐谷浑，不但解除了西境边患，而且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道路。此后，他又于贞观十四年（640 年）平定高昌，贞观十六年（642 年）又赢得了遏索山之战的胜利，使咄陆可汗政权濒临灭亡，并遣使册立射匮可汗，导致了西突厥汗国的全面崩溃。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唐太宗在征服焉耆和灭亡了薛延陀汗国以后，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际，派兵西进，一举攻占龟兹，进一步扩大了唐在西域的基地。唐高宗继位以后，又专力经营西域，经过多次激战，终于在显庆二年（657 年）一举灭亡了西突厥汗国，西域大定。总之，集中主要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的制订和实施，使唐军避免了四面出击、分散兵力的被动局面，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四）任用一批有杰出军事才能的统帅

在选拔军事统帅时，唐朝统治者经过认真总结作战胜败的经验教训，革除了原来“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的“庸人”等弊政，坚持“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的原则，先后任用李靖、李勣、侯君集、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薛万彻、苏定方、高侃、黑齿常之及娄师德等一代名将作为统军将帅。这些将帅大多身经百战，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多次巩固边疆的作战中，他们根据“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作战原则，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或随机应变，步骑互换；或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或示弱伪遁，诱敌深入；或深入虏庭，务歼穷寇等，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再加之唐军兵士的英勇顽强和拼死战斗，成为唐军强大战斗力的基础性因素。

（五）长期以来实行民族大融合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周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人民，就大量迁徙内地，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生产和阶级斗争，形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入唐以后，在这股民族融合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汉族人民同周边少数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族政权之间亦信使往来，络绎不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例如吐谷浑通过和唐朝的互市，换回了大量的食盐、丝绸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唐王朝也获得了大量牲畜，出现了“资于戎狄，杂畜被野”的景象，缓解了因为“丧乱”，而“民乏耕牛”①的状况；连接中原和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更是繁荣兴盛，友好使者和东西商贾穿梭其间，进行着内容丰富的友好交流。在这些民族融合的大潮流中，汉族地区发达的社会文明对各少数族人民起着很大的吸引作用，致使他们“引领翘首，愿

---

① 《唐会要》卷九十四《吐谷浑》。

为臣妾"[①]；有的则自"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②]等，这就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历史趋势的具体体现。但有些少数族政权上层统治者出于对领土的扩张和财富的掠夺，大肆对边境地区进行入侵和骚扰，极力破坏汉族和少数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给边疆地区的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也损害了少数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唐王朝进行的巩固边疆的作战，不仅会给周边汉族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而且也符合各少数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唐太宗时期实行的"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体现了一定的开明性和进步性；而他所采取的"以夷制夷"的羁縻统治方式，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因而在争取和团结各少数族人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唐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能够取胜的根本保证。

二、历史意义

唐王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对唐朝当时和其后封建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由于唐朝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巩固边疆的作战并取得胜利，这就在一定时期内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少数族政权和汉族政权分立、对抗的割据状态，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疆宇得到了更大的拓展，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更为增多。唐王朝在北至贝加尔湖以北，西至青藏高原和葱岭以西，东至大海，南极五岭的广大边疆地区，或与内地一样设置州县，加强封建统治，或者设置州府，进行羁縻统治，在更大范围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宋元以至明清时期的基本疆宇，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①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加强了国内民族的融合

由于唐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的胜利，消除了阻碍中原和边疆地区相互联系的障碍，从而使汉族和各少数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大为加强。特别是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参天可汗道的修筑成功，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大量进入西域地区和漠北一带，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和吐蕃政权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过程，从而使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成员在不同的起点上基本保持了同步发展。唐王朝也在同各少数族人民的交往中，吸收了很多风格多异的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也引进了周边地区一些独特的手工业技术。高昌乐、龟兹乐等进入宫廷以及葡萄酒的传入中原，就是例证。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使民族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发展。

（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由于唐朝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西域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同唐结为藩属关系，因此唐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特别是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唐与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地的很多国家亦建立了友好关系，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以及印刷术等，相继传入西方。包括兵书在内的文化典籍亦远播海外。大食、波斯、拂菻以及吐火罗等国的汗血马、玻璃、玛瑙、药品以及打马毬、杂技等也相继传入中国。近年来，在我国陕西西安和新疆乌恰等地相继出土了大量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等，就是这一时期唐朝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

第五章　唐朝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百济的战争

唐朝建国以后，经过 20 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不断强盛，边疆亦基本平定。故唐太宗从贞观十八年（644 年）开始，以“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为名，相继对侵占中国辽东的高丽军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均因粮草不继和气候转冷等原因，无功而还。高宗继位以后，汲取了太宗两次失利辽东的教训，于显庆五年（660 年）出兵百济，先后击败了百济和日本联军，于龙朔三年（663 年）灭亡百济，遂对高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乾封元年（666 年），高丽在唐军与新罗大军的夹击之下，内乱迭兴，力量大为削弱。总章元年（668 年），唐军乘高丽虚弱之际，一举攻占平壤，高丽悉平。总计唐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百济的战争，历经 25 年，至此结束。

第一节　唐初朝鲜半岛的形势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高丽国占据朝鲜半岛北部，并侵占了我国辽水（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都城平壤，在三国中最为强大。新罗国占据朝鲜半岛东南部，都城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百济国占据朝鲜半岛西南部，都城泗沘（今韩国全罗北道扶余），在三国中最为弱小。唐朝初年，新罗和百济由于受到高丽南侵的威胁，两国先后归附唐朝，企图依靠大国调停，抑制高丽南侵。后来，由于高丽改变南进政策，转而联合百济，共同进攻新罗。因而新罗更加仰赖唐廷，多次遣使入唐求救。

一、朝鲜半岛三国概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一）高丽国

高丽，又名高句丽，是扶余族的一个支系，原居两汉玄菟郡（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极力扩张领土，先后侵占了中国的辽东郡（治今辽宁义县），攻占了乐浪郡（治今朝鲜平壤）和带方郡（治今朝鲜凤山附近）等地。到5世纪前期，其疆宇东北已侵占至我国松花江和黑龙江以南地区，西南达今韩国京畿道南端，与百济相接，东南至今韩国江原道三陟地区，与新罗对峙。都城平壤（今属朝鲜），亦称长安城。

高丽把中央官吏分为十二等级：有大对卢（亦称吐捽）、郁折、太大使者、帛衣头大兄、大使者、大兄、上位使者、诸兄、小使者、过节、先人、古邹大加等。地方行政机构设有五部：一曰内部，亦号黄部，即汉桂娄部；二曰北部，或号后部，即绝奴部；三曰东部，或号左部，即顺奴部；四曰南部，亦号前部，即灌奴部；五曰西部，亦号右部，即消奴部。中央直辖桂娄部。每部大城置耨萨一人，相当唐之都督，小城置处闾近支一人，亦号道使，相当唐之刺史。

唐朝建国之初，高丽正大肆南侵新罗、百济，故与唐保持友好关系。武德二年（619年），高丽王高建武（前高丽王高元之异母弟）遣使入唐；四年（621年），又遣使朝贡。翌年，唐朝相继平定了国内的割据军阀，形势大定。唐高祖李渊鉴于隋末从征士卒失落高丽者甚众，遂致书建武，提出互释流人，并首先将滞留中国的高丽人"追括"、"遣送"，表示要"永敦聘好"。高建武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①。

武德七年（624年）二月七日，高建武又遣使入唐，请颁唐历。高祖派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前往平壤，册高建武为上柱国、高丽王，又将天尊老子像及道士带往高丽，为之讲授《老子》，建武及道、

---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俗听讲者有数千人。

武德九年（626年）年底，新罗、百济两国先后遣使入唐，讼告高丽屡相侵掠，又"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刚刚即位的唐太宗遂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往和解，于是"三国皆上表谢罪"①。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派兵平定了东突厥汗国，高丽王高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翌年，唐太宗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丽，掩埋隋末阵亡辽东的将士尸骨，并毁掉了高丽所筑"京观"②。高建武为了巩固所占中国辽东地区，在辽东地区修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南直至渤海，长达千余里。贞观十四年（640年），高建武又遣其太子桓权入朝，并贡方物，唐太宗盛情接待。

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一月五日，唐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张俭奏告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高建武，立建武之侄高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相当唐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专制国政。

盖苏文姓泉（亦有称钱氏、渊氏者，皆为音转所致），原为东部顺奴部大人③。因其性格凶暴，屡犯法禁，高丽王及中央大臣议欲杀之。盖苏文侦知此事后，遂纠集部兵，扬言校阅，盛陈酒馔于都城之南，邀请诸大臣前往观看。结果，诸大臣被"勒兵尽杀"，死者百余人。接着，盖苏文又驰入宫中，手弑建武，砍尸数段，弃置沟中。于是号令国中，操纵政柄。盖苏文体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次乘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履肩上下。出巡于外，必严整卫队，前导大呼而进，行人皆奔走躲藏，不避坑谷，"国人甚苦之"④。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

② 京观：用敌军尸体筑起的高丘。

③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高丽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称为"西部大人"。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六年十一月。

唐太宗听说建武被杀后，为之举哀，并遣使持节吊祭。贞观十七年（643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又下诏以高藏为上柱国、高丽王，遣使持节册命。

同年九月十三日，新罗又遣使至唐，奏告百济攻取其国40余城，又与高丽联兵，企图阻绝新罗入唐之路，乞兵援救。唐太宗当即派遣司农丞相里玄奖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贞观十八年（644年）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而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盖苏文返回平壤后，即向玄奖表示，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500里之地归还高丽，“恐兵未能已”。玄奖劝谕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① 但盖苏文却拒不相从，俨然以东方盟主自居，大有抗衡唐朝之意。唐太宗遂与大臣议伐高丽。

（二）百济

百济国亦为扶余族的一个支系，原居马韩故地。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百济国家的统治机构逐步完备，并完全占有了朝鲜半岛的西南部。进入4世纪后，百济开始从南面蚕食带方郡，并先于高丽占据这一地区。嗣后，由于高丽国的不断兴盛和大举南侵，两国为了争夺这一地区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战争。直到5世纪下半叶，由于百济在争夺战中屡遭失败，逐渐丧失了汉江流域，只得于6世纪上半期，将都城由锦江流域的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迁至泗沘，并将国号一度改称南扶余。不久，百济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联合新罗，对高丽展开攻势，终于夺回了被高丽强占的汉江流域。但此时已经增强了国力的新罗，却在策划对外扩张，故不久又从百济手中夺走了汉江流域，使百济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势，百济转而结好高丽，专力对付新罗。

百济中央设有掌管宣纳之事的内臣佐平，掌管礼仪之事的内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正月。

法佐平，掌管宿卫之事的卫士佐平，掌管刑狱之事的朝廷佐平，掌管兵马之事的兵官佐平等。地方行政机构置六带方，管辖十郡。

唐朝建国以后，百济为结纳强国，牵制高丽，保卫北境安宁，极力与唐保持友好。武德四年（621 年），百济王扶余璋遣使入唐，敬献果下马；七年（624 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贡。唐高祖嘉其款诚，遣使册封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此，每年遣使朝贡，唐高祖抚劳甚厚。

武德九年（626 年）年底，百济与新罗俱遣使至唐，"因讼高丽闭其道路，不许来通中国"①，太宗诏遣朱子屠前往和解。

贞观元年（627 年），太宗又颁赐百济王玺书，劝其"忘彼前怨"，与高丽、新罗"共笃邻情，即停兵革"。扶余璋接书后，遣使奉表陈谢，但"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

贞观十一年（637 年），百济王又遣使进献铁甲雕斧。太宗盛情接待，赐綵帛 3000 段并锦袍等。

贞观十五年（641 年）五月，百济王扶余璋卒，其子扶余义慈遣使奉表告哀。唐太宗素服哭之，赠光禄大夫，并赐物 200 段，助办丧事。又遣使册命义慈为柱国，封带方郡王、百济王。

贞观十六年（642 年），百济王义慈发兵攻占新罗 40 余城，又与高丽和亲通好，欲攻党项城（约在汉江入海口附近），以绝新罗入唐之路。贞观十七年（643 年）九月十三日，新罗王遣使入唐，乞求援兵。唐太宗令司农丞相里玄奖致书高丽、百济，令其各自"戢兵"，否则，"明年发兵，击尔国矣！"②

贞观十九年（645 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丽期间，百济王乘机袭破新罗 10 城。二十二年（648 年），又破其 10 余城。至此，百济对唐的朝贡遂绝。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年）十二月，百济王扶余义慈又遣使入唐朝贡。高宗降义慈玺书，劝其将"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

---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九月。

国”，又令新罗王将“所获百济俘虏，亦遣还（百济）王”，最后，再次警告义慈要“审图良策，无贻后悔”①。

永徽六年（655 年）正月，百济与高丽、靺鞨连兵，进攻新罗北界，占领其 30 余城。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唐高宗遂决计出兵，征讨百济。

（三）新罗

新罗国本弁韩苗裔，汉时居于乐浪郡境内。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西接百济，北邻高丽。公元 2 世纪前期，新罗已具备国家体制，首都金城，向北占有乌岭地区，向南奄有洛东江上游，周围被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所环绕。4～5 世纪时期，新罗利用高丽与百济相互争夺之际，向南扩张领土至洛东江流域，向北经海路拓至东海岸中部。6 世纪中叶，新罗先与百济联合，从汉江流域驱逐了高丽势力。接着，又在同百济的战争中获胜，从百济手中夺取了汉江流域。由于汉江流域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从军事上断绝了高丽与百济联合的道路，因此，这对新罗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此期间，新罗大力发展同唐朝的关系，企图依靠唐朝声威，抑制高丽和百济对新罗的联合进攻。

新罗王所居金城，周长七八里，有卫兵 3000，设狮子卫队。中央文武官有 17 等级，并模仿中国的地方建制，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度，州长官称军主，郡长官为太守，县长官为县令。国人多金、朴二姓，异姓不通婚。

武德四年（621 年），新罗王金真平遣使朝贡，唐高祖亲劳慰问，并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出使回报，赐以玺书及绘画屏风、锦綵 300 段。自此朝贡不绝。武德七年（624 年），唐高祖又遣使册拜金真平为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

贞观五年（631 年），新罗王遣使入唐，献女乐 2 人。唐太宗“愍其远来，必思亲戚”，因而“听遣还家”②。是岁，新罗王金真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

平卒，无子，立其女善德为王，由宗室大臣乙祭总知国政。唐太宗诏赠金真平左光禄大夫，赙物200段。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遣使持节册命善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

贞观十七年（643年）九月十三日，新罗王善德遣使入唐，上言高丽、百济连兵攻袭，攻占数十余城，乞兵援救。唐太宗当即派相里玄奘持玺书赴高丽，令其“戢兵”。但高丽不纳。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诏令新罗整顿大军，策应唐兵。新罗遣大臣领兵5万，进入高丽南界，并攻占了水口城，收降了高丽守军。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新罗王善德卒，唐太宗诏赠光禄大夫，其余官爵封号如故。因立其妹真德为王，加授柱国，封乐浪郡王。

贞观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国相金春秋及其子文正入唐，唐太宗诏授春秋为特进、文正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求入国学观看祭奠先圣先师的释奠典礼及讲论经书，太宗因赐所撰《温汤》、《晋祠碑》及新编《晋书》。春秋、文正归国时，太宗又令三品以上大官设宴饯行，优礼甚称。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真德派兵大破百济之众，遣其弟春秋之子法敏入唐奏闻，并带来真德用织锦作成的《太平颂》以献，颂文共20句，最后两句云：“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① 高宗称赞久之，拜法敏为太府卿。

永徽五年（654年）闰五月十八日，新罗女王金真德卒，唐高宗诏立其弟金春秋为新罗王。

永徽六年正月，百济与高丽、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攻占30余城。新罗王遣使求救，唐高宗决计发兵征讨百济。

---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

二、唐朝对朝鲜半岛三国的基本政策

唐朝建国初期，对朝鲜半岛三国均采取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武德五年（622年），当国内形势渐趋平定之际，唐高祖曾在赐高丽王高建武的玺书中说："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① 后来，他还打算改变隋炀帝"以自尊大"的态度，无令高丽"称臣"，只是在周围诸多大臣进谏下，才未付诸实行。在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激烈争夺和相互斗争中，唐高祖也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三国矛盾的激化，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政局稳定。唐太宗即位之后，仍然执行这一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对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日益激化的矛盾，仍遣使调停。贞观元年，当百济遣使入唐，"讼高丽梗贡道"、侵北境之时，太宗"诏使者平其怨"；新罗与百济世结仇恨，攻战不已，太宗劝其各自"申好"，"宜忘前怨"②。

贞观十六年（642年），当盖苏文"贼弑其主"，篡夺高丽国政，不但与百济联兵，屡攻新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还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大有抗衡唐朝之势。对此，唐太宗始决计对高丽用兵，援救新罗。唐高宗即位以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进一步联合新罗，专力进攻百济。灭亡百济后，又对高丽实施南北夹击，终于灭亡了高丽，从而胜利地结束了长达25年的对外战争。

三、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

日本国古称倭奴，后因"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②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百济传》。

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①。其国王以“天皇”为号，都城治大和州。早在东汉初年，日本国就曾受到东汉光武帝的册封。此后，同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贞观五年（631年），曾遣使入唐通好。后来，“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②。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新罗受到高丽和百济连兵的暴掠，高宗曾致孝德天皇，令其出兵援助新罗。咸亨元年（670年），又“遣使贺平高丽”③。但日本对朝鲜半岛却一直存有扩张野心。早在4世纪末期，日本国就曾派兵入侵朝鲜半岛南端的伽倻地区，被高丽和新罗联兵击败。入唐以后，日本又转而联合百济，企图在朝鲜半岛三国的角逐中火中取栗。龙朔元年（661年），当唐军击败百济，攻占百济都城以后，日本国王又勾结百济僧人道琛及故将扶余福信，派使者送回了留质日本的故王子扶余丰，立以为王，企图在百济扶植傀儡政权。接着，又悍然出兵百济，抗拒唐军。但终因兵力不足，在白江口之战中被唐军歼灭，遂使日本染指百济的幻想成为泡影。但后来日本国对朝鲜半岛的扩张野心，始终没有收敛，时刻都在窥探方向，寻找时机，企图旧梦重温。

第二节　太宗时期进攻辽东的战争

唐太宗自贞观十六年（642年）盖苏文弑君篡国以后，就决计用兵进攻侵占中国辽东的高丽军。经过部署以后，从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他曾对高丽军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在第一次进攻中，唐太宗所率唐军虽在辽东之战、白岩之战等作战中多次获胜，接连攻占了盖牟、辽东、卑沙、白岩等城，但在安市之战中却遇到了高丽军的顽强抵抗。最后，因粮草不济和天气转冷等原因，只得班师归营。后来，唐太宗改变策略，从贞观二十一年

①③《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日本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日本传》。

(647 年)开始，又派出小股部队对高丽军连续发动了两次骚扰战，致使高丽举国困弊。

一、双方作战方略

（一）高丽方面

早在贞观五年（631 年），当唐太宗派人至辽东收瘗隋末阵亡辽东的兵士骸骨并捣毁高丽所立京观之时，高丽王建武就在辽东地区修筑了一条长达1000余里的长城，作为防御唐军进攻的第一道防线。贞观十六年（642 年），盖苏文弑君篡国以后，又在辽东和鸭渌水（今鸭绿江）以及千山山脉之间广大地区集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与此同时，盖苏文又与百济结为同盟，亲自率军南侵新罗，企图消灭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藩属之国，解除其南顾之忧。另外，他又遣使潜入漠北，争取薛延陀汗国与东北地区的靺鞨等部族，企图从北面和东北方面牵制唐军。

（二）唐朝方面

贞观十六年（642 年），当盖苏文弑君篡国和抗衡唐朝，企图称霸东亚之时，唐太宗遂以吊民伐罪为名，决计对高丽用兵。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三伐高丽的失败覆辙，唐太宗在战前制订了周密的作战方略。

首先，他在首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定州（今属河北）、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等地屯驻重兵，进行严密控制，稳定国内形势。

其次，又在全国各地征募天下骁勇之士，扩充军队，弥补府兵力量之不足，同时，也可以避免各地因强征府兵而可能引发的

动乱。

复次，大量向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营州等地运输粮饷和集结军队，以此作为陆军的进军基地；又在莱州（今属山东）大量集结战船，作为水军的进攻基地。准备水陆并进，攻击高丽。

与此同时，又遣使新罗，令其“纂集士马，应接大军”①，从南面牵制高丽，以分其势。

当进攻高丽的战争打响以后，唐太宗又采用释放和优待战俘等政策，用以瓦解敌人军心、民心；当对安市城久攻不克，唐太宗在班师以后，又遣兵在高丽境内不断进行骚扰，待其疲惫之时，再图进讨。

唐高宗即位之后，除继续执行骚扰之策外，又大力扩充水军，与新罗联兵，专力攻击百济，对高丽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后，乘其内乱之际，终于取得了灭亡高丽的胜利。

二、唐军的战前准备及进攻部署

唐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 年）灭亡高昌以后，就已经产生了用兵辽东之意。这年七月，他即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存没”消息。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②。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势。

贞观十七年（642 年），唐太宗在废立太子以后，欲乘盖苏文篡权之机，进军高丽，但因长孙无忌谏止，遂“为之隐忍”，使其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八月。

“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①。

贞观十八年（643年）二月，唐太宗派往高丽的使者相里玄奖返回长安，向他报告了对盖苏文的劝阻无效后，遂决计亲征高丽，并相继进行了如下进攻部署：

贞观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敕将作大监闫立德前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鄱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3州，督造运输军粮的船舰400艘；七月二十三日，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2都督兵及契丹、靺鞨等部族兵众对辽东作试探性攻击，“以观其势”②；又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专责河北诸州的粮草运输；命太仆少卿萧锐运输河南诸州粮饷入海，贮于乌湖岛（今山东南、北隍城岛）中，以供水军之需。与此同时，又下诏在全国募兵，“皆取愿行者”，结果，诏令发布以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③共募得天下甲士10万。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太宗乘车驾由长安行幸洛阳，欲御驾亲征，留宰相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守卫京师。

十一月初，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唐军进至辽水西岸，正值河水泛滥，久不得渡。太宗以其畏惧怯懦，召回洛阳，欲治其罪。张俭到达洛阳后，向太宗具陈了辽水沿岸的山川险易和水草美恶，太宗大悦，令其重返辽西，待机渡河东进。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诏令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泸州（今属四川）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江淮、岭南及硖中诸州兵及长安、洛阳3000募兵，战舰500艘，从莱州渡海趋平壤；又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6万及兰（州治今甘肃兰州）、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二州降胡兵趋辽东。然后，两军合势并进。十一月三十日，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

诸路陆军集于幽州。太宗又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卿丘行淹督众工匠在安萝山制造云梯、撞车等攻城器械。这时，天下各处前来应募的勇士及贡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均亲加阅视，逐次取舍。不久，下诏布告天下，陈述了这次东征高丽的五条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①。用以动员民众，增强士兵必胜信念。

十二月二日，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馈运使韦挺由于事先未能巡视漕渠，600余艘运粮船舰行至卢思台（今天津宁河）侧，渠水浅塞不通，贻误军期，被械送洛阳，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副使崔仁师亦被免官削职。

二月十二日，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共同辅政，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从定州北进，向辽东进发。

三、唐军第一次进攻

（一）围攻辽东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底，唐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率部由幽州抵达营州后，取声东击西之策，多张声势，遣小股部队东进，假装要从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渡过辽水，而暗趋大军由柳城（今辽宁朝阳）北上，经甬道向通定（今辽宁新民）进发。唐军渡过辽水的消息传到高丽后，举国震惊，城邑均闭门自守，不敢出击。四月五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将兵数千人抵达新城（今辽宁沈阳东），帐下折冲都尉曹三良引10余骑直压城门，城中军民惊恐骚乱，不敢抵抗。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一月。

锋，向建安城（今辽宁盖州西南）进发，途中击败了前来迎战的高丽兵众，歼敌数千。

四月十五日，李勣和李道宗率唐军主力从西、北两面进攻盖牟城。经过激战，李勣部率先攻入城中，俘获高丽2万余口，缴获粮饷10余万石。接着，又麾军南下，向辽东城进发。这时，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从东莱（今山东莱州）渡海，袭击卑沙城。该城四面环绝，唯西门可登。唐军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副总管王文度率部捷足先登。五月二日，攻拔其城，俘城内男女8000余口。大总管张亮又分遣总管丘孝忠等耀兵于鸭渌水，骚扰高丽都城平壤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

贞观十九年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部队4000余骑抵达辽东城下。五月初八，盖苏文派步骑4万援助辽东守军。这时，唐军诸将都觉得敌众我寡，因此，主张深沟高垒，等主力部队全部集结以后，再行出击。唯副总管李道宗认为应乘敌军援兵“远来疲顿”之时，主动迎战，“击之必败”①。李勣表示赞同，遂派果毅都尉马文举策马向敌阵冲击，所向披靡。由此，众心稍安。接着，4000余骑全部冲入敌阵。行军总管张君乂部遇到高丽优势兵力的反击，向后稍退，唐军不利，全军溃乱。李道宗收集散卒，登高瞭望，看到高丽军阵紊乱，率骁骑冲入，左右出入，势不可当。李勣率众相助，高丽军大败，被歼1000余人。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经北平（今河北卢龙）、辽泽（今辽宁北镇与辽中之间泽地），渡过辽水，留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自将数百骑驰至辽东城下，对李道宗慰劳赏赐，超拜马文举为中郎将，并奖励了有功将士，处斩了临阵退却的总管张君乂。

击退了高丽援军以后，李勣当即指挥唐军将士“负土填堑”，准备向辽东城发起进攻。唐太宗也在马上负土递送，于是，随从官员一起与将士负土致于城下。不几日，城下沟堑俱被填满。接着，李勣下令先用抛车攻城。该攻城抛车体积庞大，可将重达300

---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五月。

余斛的巨石抛出一里之外，所至皆摧，高丽守军十分惧怕。为了防御巨石袭击，守军用巨木在城上筑以为楼，但仍被抛车所发巨石击溃。随后唐军又用撞车撞其城上楼阁，无不倾倒。就这样，唐军接连攻城20多天，昼夜不息。唐太宗亦率所统六军相助，将辽东城包围数十百重，水泄不通，鼓噪之声，震天动地。五月十七日，南风劲吹，唐太宗下令精锐士卒登上冲竿之顶，用火把点燃了西南城楼，大火燃及城中住宅，火光冲天。唐军将士乘机登上城墙。高丽守军抵挡不住，被歼1万余人，俘获城中男女5万余口，唐军一举攻占辽东城。唐太宗遂以辽东城置辽州，并举燧入塞，向太子所居定州通告捷报。

（二）围攻白岩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二十八日，唐军在辽东城稍事休整后，又向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挺进。次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所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唐军将士无不感动，故人百其勇。盖苏文遣乌骨城万余守军援救白岩。唐将契苾何力奉命率劲骑800迎击，并挺身冲入敌阵，被敌刺中腰部，血流如注，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在万众之中，将何力救回。何力勇气益奋，束疮再战，从骑奋击，高丽援军抵敌不住，退遁数十里，被歼千余人。正值日暮，何力鸣金收兵。

六月初一，李勣率部抵达白岩城下。该城依山临水，四面险绝。但城主孙代音却胆小如鼠，当他听说辽东城被唐攻破的消息后，即遣使请降。但当唐军抵达白岩城下以后，他又“既而中悔”，企图凭险抵抗。李勣遂命兵士用抛车、撞车攻城，飞石流矢，雨集城中。不久，唐太宗亦率六军抵达白岩西北，怒其反复，诏令军中：“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于是，唐军攻势更加猛烈。孙代音看到唐军攻势大盛，城池将要不守，遂遣心腹请降，约定唐军临城后，以“投刀钺为信”。唐太宗遂把唐军旗帜交给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李勣看到太宗将要受降，帅甲士数十人进谏说：“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但太宗表示“纵兵杀人而虏

其妻孥，朕所不忍”，只答应对立功将士，“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①。李勣遂退。

不久，孙代音果然把唐军旗帜插于白岩城上，城中兵民都以为唐军已经登城，遂相率归降。由此，唐军获城中男女数万。唐太宗临水设置帐幄受降，给城中百姓赏赐食物，年八十以上赐以缯帛。他城之兵在白岩者，全加慰谕，分给粮饷器仗，予以释放，任其所之。又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原被盖苏文所遣援助盖牟城而被唐军俘获的加尸城（今朝鲜平壤西南）700多名高丽兵士，被唐太宗的优抚战俘的政策所感动，均请从军效力。但唐太宗却说：“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故对其赏赐粮饷，全予遣放。

六月三日，唐太宗又将盖牟城改为盖州。

（三）围攻安市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年）六月十一日，唐太宗率军从白岩出发，向安市城挺进。二十日抵达城北，立即发兵攻城。次日，盖苏文遣高丽北部绝奴部耨萨高延寿和南部灌奴部耨萨高惠贞统高丽、靺鞨之众15万援救安市。高丽军中有一老谋深算的对卢官劝延寿等“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待唐军疲惫之时，分遣勇士，断绝粮道。不过旬日，唐军粮饷必尽，就会陷入“求战不得，欲归无路”的境地，并说，这是“不战而取胜”②之策。但延寿却拒不相从，引兵直进。唐太宗为诱敌深入，诏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余人在安市南40里处挑战。刚一接触，唐军即向后撤退。高丽兵众以为唐军不堪一击，竞相追击，直进至安市城东8里的六山（位于今辽宁海城东南），依山结阵，绵亘40余里。

唐太宗与长孙无忌等率数百骑登上高岗，观察地形，对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均了如指掌。然后遣使对延寿说：“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以为真，遂不设备。这时，江夏王李道宗认为高丽倾全国兵力援救安市，都城平壤守备必然空虚，因此请拨给精兵5000，直取平壤。但唐太宗却拒不答应。当晚，唐太宗作了如下部署：

令李勣将步骑1.5万在西岭布阵，引诱敌军出击；

令长孙无忌将精兵1.1万为奇兵，伏于山北狭谷之中，待发起攻击时，从敌后冲出。

自己亲率步骑4000，挟带鼓角，收卷旗帜，登上北山。并下令诸军，以鼓角之声为号，一齐出击。又命有司在朝堂之侧设置受降帐幄，胸有成竹地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

六月二十二日，高延寿发现李勣在对面布阵，遂整顿军士，准备迎战。唐太宗登上北山后，看见狭谷中尘土飞杨，知是长孙无忌率部已进入指定地点，当即命令鼓角齐鸣。于是，唐军诸路兵马鼓噪而进。高延寿见状大惧，慌忙分兵抵抗，但阵角已乱。这时，风云突变，阴云四起，雷电交加。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薛仁贵穿着奇服，大声疾呼，冲入敌阵，所向披靡。李勣令1万步兵手持长矛，向敌进攻。长孙无忌率部又从敌后杀出，太宗亦率部自山顶冲下。高丽援军大败，被歼2万余人。薛仁贵以功被拜游击将军。

高延寿收集余众，依山自固。唐太宗率唐军将高丽军余众团团包围。长孙无忌部又拆除了所有桥梁，断其归路。高延寿和高惠贞等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率其3.68万人请降，并躬身膝行，进入军门，拜伏请命。唐太宗挑选耨萨以下酋长3500人，授之军职，迁居内地，其余兵士全部释放，使还平壤。这些获释兵士皆举手顿地，欢呼雀跃。唐军获马5万匹，牛5万头，铁甲万领，其他军用器械不计其数。经此大败，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今辽宁沈阳南）和银城（今辽宁铁岭南）守军全都自拔逃遁，数百里内无复人烟。

经此六山大捷以后，唐太宗渐有骄色，在向定州高士廉等人

的书信中曾自豪地说："朕自将若此，云何？"①因号六山为驻跸山，又令将作监造《破阵图》，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贞为司农卿。

在此期间，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在攻占卑沙城后，继续向西北推进。在抵达建安城下时，唐军壁垒尚未加固，兵士大多出外樵采放牧，建安城内高丽守军突然杀出，唐军惊扰。张亮平素胆怯懦弱，踞坐胡床，直视不言，将士以为他沉稳勇健，军心稍定。总管张金树等鸣鼓整军，向敌进攻。高丽守军抵挡不住，只得败逃城中，婴城自守，不敢出战。

七月五日，唐太宗将军营移至安市城东，与李勣等商议攻城方略。唐太宗提议舍安市而西攻建安，"建安得，则安市在吾腹中"；但李勣却认为若西攻建安，则距唐军的粮饷基地辽东城过分遥远，如果高丽断我归路，情势必定危机，故坚持"先攻安市"②。最后，唐太宗接受了李勣的建言。

八月十日，唐太宗又将军营移于安市城南，切断了安市与建安两城之间的联系。然后下令李勣攻城。李勣等拥高延寿等高丽降众营于安市城下，招降城中将士。但城中坚守不动，且每次看见太宗旌旗麾盖，必乘城鼓噪，以弓矢相拒。太宗大怒，李勣乘机请求克城之日，男子尽诛。此话传入城中，守军益愤，人皆死战，故久攻不克。这时，高丽降将高延寿献策：应释放高丽降将与妻子团聚，以动安市守军之心；然后移兵进攻乌骨城，该城守军弱少，可朝至夕克。最后麾军南下，平壤可唾手而得。群臣诸将亦建言应与张亮所率水军会师，并力攻拔乌骨，"渡鸭渌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唐太宗正要采纳这一建言，但长孙无忌却极力谏止。他认为如移兵乌骨，则建安、新城的高丽守军必"蹑吾后"，我军则有腹背受敌之忧。因此，他主张先破安市，再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③。唐太宗遂打消了移兵乌骨的念

---

①②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高丽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八月。

头，仍命诸军急攻安市。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传出猪、鸡鸣叫之声，唐太宗估计高丽守军可能夜袭唐营，遂严兵设备。果然，高丽数百人于夜半缒城而下。唐太宗亲自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见唐军有备，只得退回。

第二天，唐太宗又令江夏王道宗督众在安市城南修筑土山，以逼城内。城内守军亦增高其城，与唐军相拒。双方兵士又分番交战，每天都要六七回合。唐军兵士用冲车炮石，摧毁楼堞，城中守军即用木栅塞堵其缺。李道宗在修筑土山时，足部受伤，唐太宗亲自为其针灸。因此，筑山昼夜不息，先后历时60多天，用工50多万，山顶距城仅有数丈，下临城中。道宗派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土山之顶备敌。由于山顶过高，根基不固，屯兵过多，土山塌倒，压坏了城墙一角。这时正值伏爱擅离职守，高丽守军数百人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堑而守之"。太宗闻讯大怒，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令诸将率兵夺回土山。但接连3天进攻，均未奏效。道宗赤脚行至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而不罪。

这时，辽东地区寒霜早降，草枯水冻，加之军粮将尽，士马难以久留，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下诏班师，围攻安市之战至此结束。唐军在这次东征中，共攻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10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7万人入山海关内。共歼敌4万，唐军损兵2000，战马死者十之七八。

四、唐军第二次进攻

（一）唐军作战方针的改变

唐军在辽东对高丽军的第一次进攻结束以后，盖苏文更加骄恣专横。他虽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五月，遣使谢罪，并献二美女入朝，但却言词傲慢，对唐使者骄倨不恭。并窥视边隙，又对新罗侵扰不已。对此，唐太宗不但遣还其所献美女，而且又于同年十月十四日下诏：勿受其朝贡，更议征讨。

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二月,唐太宗派兵平定薛延陀汗国后,准备再次亲征高丽军。这时,朝廷有的大臣献策说:"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高丽)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渌之北,可不战而取矣。"①唐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遂放弃了原来用大兵团攻城略地的攻坚战术,改用小股部队进行骚扰的作战方针。

同年三月,太宗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侯将军李海岸为副总管,率水军万余人,乘楼船从莱州出海;又以太子詹事李勣和右武卫将军孙贰朗为正副行军大总管,率陆军 3000,并营州都督府兵从新城道东进,执行骚扰之策。

(二)唐军第一次骚扰战

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五月,李勣部渡过辽水后,经南苏(今辽宁新宾)、木底(今辽宁新宾)等数城,高丽守军皆背城拒战,李勣击破其兵,焚其罗城而还。

同年七月,牛进达等所率水军从鸭渌水口登陆,进入高丽国内,经百余战,每战皆捷,先后攻拔石城(位于鸭绿江南)等数城。进至积利城(位于今朝鲜平壤西)下时,高丽守军万余出战,被李海岸率部击退,歼敌 2000。不久,亦从海路回国。

经此骚扰战后,高丽举国不安,民废耕业,纷纷进入城堡躲藏。同年年底,高丽王高藏只得派其子、莫离支高任武入唐谢罪。

(三)唐军第二次骚扰战

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九月十五日,唐太宗敕令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 12 州工匠制造战船数百艘,准备对高丽再次实施骚扰。

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正月二十五日,唐太宗又诏令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右卫将军裴行方为青丘道正、副行军大总管,率水军 3 万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出击高丽。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

同年四月，薛万彻等率水军由莱州出海，经大谢岛（今山东南、北长山岛）、龟岛（今山东砣矶岛）和乌湖岛，折而东北行，仍由鸭渌水入海口登陆，进破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俘获甚众。四月十四日，唐乌湖岛镇古神感率部浮海进击，在易山（似在今朝鲜平壤东北之马山里）与高丽5000守军遭遇，唐军大胜。当晚，高丽万余水军夜袭神感所率船队。神感设伏，将其击败。至此，唐军结束了第二次骚扰战斗，胜利班师。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月，唐太宗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在剑南道伐木制造船舰，最大的舟船其长可达100尺，其宽约50尺。另遣使沿江而下，把舟船从巫峡运至江、扬二州，然后从海路齐集莱州。同年八月，又敕越州（治今浙江绍兴）都督府及婺（州治今浙江金华）、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并遣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刺史孙伏伽招募勇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输粮饷及攻城器械，贮于乌湖岛，准备乘高丽举国困弊之际，于来年发兵30余万，再征高丽。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春，太宗染疾，五月驾崩，遂罢东征之役。

第三节　高宗时期对百济、高丽的战争

一、高宗即位后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太宗死后，其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即位之初，继续唐太宗后期对高丽实施的骚扰之策，曾于永徽六年（655年）和显庆三年（658年）出兵辽东，先后对高丽发动两次骚扰作战。在此期间，高宗一直与新罗保持友好关系。显庆五年（660年），百济大举侵犯新罗，新罗王向唐求救，唐高宗遂出兵百济，同年八月，经熊津江口之战，灭亡百济。龙朔三年（663年），又经白江口决战，歼灭入侵日军与百济残余势力，既巩固了在百济的胜利，又对高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此后，唐高宗又用兵高丽，经过龙朔元年（661年）的

平壤之战、乾封元年(666年)的金山之战以及总章元年(668年)的攻克平壤,终于灭亡高丽。后来,在新罗和百济遗民的强烈反抗下,唐高宗被迫放弃了浿水(今大同江)以南,退守浿水以北,朝鲜半岛南部遂为新罗所统一。

二、唐军继续对高丽进行的两次骚扰战

(一)唐军第三次骚扰战

唐高宗即位之初,唐与朝鲜半岛三国之间曾保持了一段和平关系。永徽二年(651年),百济遣使入贡,高宗告诫其使者说:"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① 翌年正月,新罗、百济与高丽俱遣使入贡。但从永徽五年(654年)开始,高丽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增强,遂对唐及新罗取进攻态势。此年十月,高丽遣其将安固率高丽、靺鞨之兵北击契丹,与唐松漠都督李窟哥所率契丹兵战于新城,高丽大败,"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②。李窟哥遣使告捷,高宗张贴露布于朝堂;永徽六年(655年)正月,高丽又与百济、靺鞨连兵,向新罗北境发起进攻,接连攻占33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入唐,乞求援救。高宗遂决定对高丽继续实行骚扰之策,以疲弊其国。

同年二月二十五日,高宗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出击高丽军。五月十三日,程名振等率部渡过辽水后,高丽的新城守军见唐军兵少,遂打开城门,渡过贵端水(今辽宁铁岭西南)迎战。名振等率部奋击,大破其众,歼敌千余人,焚其罗城及附近村落而还。

(二)唐军第四次骚扰战

显庆三年(658年)六月,唐高宗又派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和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率兵渡辽水,向高丽军发动进攻。沿途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二年十二月。

②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高丽传》。

占据了新城西北的赤峰镇，歼灭高丽守军400余人，俘获百余人。高丽遣其将豆方娄帅众3万迎击，名振以所率契丹兵出击，大败其众，歼敌2500人，引兵而还。翌年十一月，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又率部渡辽水，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之华表山)，大破其众而还。

三、唐军击败百济、日本联军

(一)熊津江口之战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依靠高丽援助，大举侵犯新罗。新罗王金春秋向唐高宗上表求救。三月十日，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卫将军庞孝泰等1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讨伐百济；又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之众，与唐军合势，对百济实施东西夹攻。新罗王派太子金法敏及大将军金庾信等，率兵5万，迎接唐军。

同年八月，苏定方引兵从成山(今山东荣成东北)渡海，向百济进发。百济王扶余义慈派兵在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口阻击唐军。唐军在此强行登陆后，歼敌数千，余众溃逃。定方遂率水陆大军，一齐向熊津城(亦曰俱拔城、固麻城，位于今韩国公州)推进。百济倾全国兵力迎战，唐军在新罗兵士的配合下，奋勇冲杀，将其击败，歼敌万余，并乘胜入其郭城。百济王及其太子扶余隆逃于北境，唐军遂将熊津城团团围定。义慈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太子扶余隆之子文思劝其叔父扶余泰归降唐军，扶余泰不从，文思遂率左右兵众逾城投降，城中百姓皆从，泰不能止。苏定方乘百济离乱、兵力削弱之际，令唐军登城树旗，扶余泰在走投无路之时，开门请命。于是百济王义慈、太子隆及百济诸城城主相继归降。高宗下诏将其五部所统37郡200余城76万户分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任都督、刺史。平定百济后，苏定方率众归国，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即熊津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

为熊津都督，统领余众。文度渡海卒后，又以刘仁轨代之。是年十一月，唐高宗御洛阳则天门楼，接受百济战俘，自百济王义慈以下皆释而不罪。

(二)百济联合日军抗唐

龙朔元年(661年)三月，百济僧人道琛及故将扶余福信拥众据周留城(今韩国全州西)抗唐，又派人前往日本，迎回故王子扶余丰，立以为王。这时，日本国亦欲乘朝鲜半岛三国内乱之时，火中取栗，遂派阿昙比罗夫率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

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原为本番达率兼郡将，犹如中国的州刺史之职。当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初，常之亦率部归降。但定方纵兵劫掠，杀戮丁壮，常之遂与左右10余人逃归本部，纠集流亡，共保任存山(在今韩国全州西)，筑栅自固，10天左右兵众即发展到3万余人。苏定方遣兵围剿，常之率部抵抗，唐军大败，“遂复本国二百余城，定方不能讨而还”①。

苏定方归国以后，道琛与福信引众围攻百济府城，刘仁愿遣使告急。唐高宗诏令刘仁轨统王文度部众，便道发新罗兵援救仁愿。道琛在熊津江口树立两栅，抗拒唐军。仁轨率部及新罗兵四面夹击，道琛大败，士卒争入栅内，由于便桥狭窄，落水及被歼一万余人。道琛连失两栅，遂解围而去，退保任存城(今韩国全州西)中。仁愿与仁轨会师百济府城，“合军休息”②。于是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叛亡，其势益张。这时，高宗又诏新罗出兵，援助仁轨。新罗王遂遣将军金钦率兵向百济府进发。行经古泗(今韩国泗川)，遭受福信部阻击，金钦只得由葛岭道(今韩国泗川县与晋州县之间)退回，由此不敢复出。不久，福信杀死道琛，兼并其众，专制政柄，扶余丰“但主祭而已”③。

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唐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久攻平壤

---

① 《旧唐书》卷一〇九《黑齿常之传》。

②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

不克，解围归国。唐高宗也以百济府城"不可独固"，诏令刘仁轨"宜泛海还"，唐军将士亦"咸欲西归"。但仁轨却认为"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因此，主张"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①。众将觉得仁轨说得有理，只得相从。不久，扶余丰与福信俱遣使探问唐军"何时西还"。仁愿、仁轨知百济防卫松弛，遂于龙朔二年(662 年)七月，率部突袭，相继攻克克罗城(今韩国怀德)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歼敌及俘获甚众。福信等退守真岘城(今韩国大田)，凭借该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严兵守卫。仁轨引新罗之兵，乘夜逼近城边，驱众从四面攀草而登，天亮前入据其城，终于打通了通往新罗的运粮道路。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又奏请增兵。高宗诏发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今属山东)、莱、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诸州兵 7000 人增援熊津。

(三)白江口决战歼灭日军

福信等丢失真岘城后，处境日窘，又与扶余丰之间的猜忌与日俱增。福信遂装病不出，企图趁扶余丰前来问疾之时，伏兵杀之。不料此谋泄露，扶余丰便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分赴高丽、日本，乞师援助。唐高宗亦遣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部援助仁轨。

龙朔三年 (663 年) 四月十二日，唐高宗在新罗国置鸡林大都督府，以新罗王金法敏为大都督。同年八月，又以连年用兵海东，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死者甚众，诏罢 36 州制造船舰，并遣司元太常伯 (即户部尚书) 窦德玄等分赴 10 道，询问疾苦，黜陟官吏。

是年九月，孙仁师率部抵达熊津城，与刘仁愿、仁轨会合，兵势大振。嗣后，即聚众商议进取之策。诸将都提议先攻水陆要冲加林城 (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但刘仁轨却认为加林城地势险峻，急攻则伤亡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因此，他主张先攻"群凶所

①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聚”的窠穴——周留城，“若克周留，诸城自下”①。于是，唐军兵分两路：由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金法敏率陆军向周留进发，由刘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漕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以会陆军，同赴周留城。

刘仁轨所率水军行至白江口时，正与百济王扶余丰所引日军遭遇。经过四次激战，日军大败，战船被焚400余艘，火焰冲天，海水尽赤。扶余丰脱身逃奔高丽，其子扶余忠胜、忠志等帅众投降。西部人黑齿常之亦与部将沙吒相如率部归降。百济悉平，唯其别帅迟受信犹据任存城，抗拒唐军。刘仁轨遣常之和相如率部讨伐任存，仍以军粮、器仗相助。刘仁愿与孙仁师认为黑齿常之等不可靠，因此极力劝止，但仁轨坚执不从。结果，常之和相如很快便攻占该城，迟受信抛弃妻子，逃奔高丽。战后，诸将都佩服仁轨有识人之明。

这次白江口大捷，不但彻底消灭了百济的残余势力，而且也粉碎了日本国企图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刘仁轨以功被加官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为其筑私第于长安，重赏其妻子，并遣使持书慰劳。不久，高宗诏令刘仁轨镇守百济，召孙仁师与刘仁愿归国。仁轨看到百济经兵燹之后，百姓凋残，尸骨满野。始命埋葬骸骨，整顿户籍，构筑村落，设置官长，建立桥梁，畅通道路，修补堤堰，兴复陂塘，劝课农桑，赈济贫乏，恤养孤老，立唐社稷，颁布唐历。由此，百济举国大悦，阖境安居乐业。然后，修屯田，储粮饷，训练士卒，进图高丽。

四、唐军击灭高丽

（参见附图7）

（一）平壤之战

显庆五年（660年）十二月十六日，当唐军在熊津江口击败百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龙朔三年九月。

济以后，唐高宗就对征讨高丽作了如下部署：

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今辽宁辽阳东）道总管，各率本部兵马，准备出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因在上次征百济时，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立功自效，后代王文度赴百济参战。

龙朔元年（661年）正月，高宗下诏募兵河南、河北及淮南67州，共得4.4万余人，赴平壤、镂方行营。二十二日，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帅回纥等诸部兵赴平壤行营。

同年四月十六日，当刘仁轨等正与百济叛将道琛及福信在百济苦战之时，高宗又对征讨高丽的作战部署作了如下调整：

以兵部尚书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白州（治今广西博白）刺史庞孝泰为沃沮道总管，率萧嗣业及诸胡兵共35军，分水陆两路并进。高宗还欲御驾亲征，皇后武则天抗表谏止。

是年八月十一日①，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率水军在浿江击败高丽守军，攻占马邑山等，屡战皆捷，迅速兵临平壤城下。

是年九月，高丽莫离支盖苏文派其子男生率精兵数万防守鸭渌水，唐军被阻。辽东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在江水冰合之时，引众乘冰渡水，大呼而进，高丽守军大溃，唐军乘机追击数十里，歼敌3万，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不久，铁勒族回纥、同罗、仆骨等九姓叛唐犯边，高宗急召何力为铁勒道安抚大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与铁勒道行军总管郑仁泰等率部北讨。何力与嗣业奉诏班师。

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十四日，浿江道大总管、兵部尚书任雅相卒于军中。十八日，沃沮道总管庞孝泰率岭南兵与高丽军战于蛇水（今辽宁境内浑河），唐军失利，孝泰及其子13人皆阵亡。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龙朔元年七月载“七月，甲戌”，是年七月无甲戌，当为八月甲戌（十一）之误，故改。

苏定方在平壤城下，孤立无援，久攻不克，又值天降大雪，兵士不堪寒冷，遂解围归国。

（二）金山之战

麟德元年（664年）十月，留守百济的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向高宗上表说，留守百济唐军将士的"冬衣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请求"有所更张，厚加慰劳"①。高宗深纳其言，当即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率兵渡海，以代百济唐兵，仍令仁轨率部归国。并以扶余隆仍任熊津都督府都尉。

麟德二年（665年）七月，高宗诏令扶余隆与新罗王金法敏消除旧怨。八月十三日，双方在熊津城会盟，并缔结盟约，表示"各除宿憾，结好和亲"，如果今后"兴兵动众，侵犯边陲，明神鉴之，百殃是降，子孙不昌，社稷无守，禋祀磨灭，罔有遗余"②。不久，刘仁轨遂同新罗、百济及日本国使者渡海西还，准备参加将要举行的泰山封禅。高丽王高藏亦遣太子高福男前来助祠。

乾封元年（666年）五月，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卒，长子泉男生代领其职。男生初掌国政，出巡诸城，令其弟男建、男产执留后事。男生原与二弟不睦，有人乘机挑唆，男建、男产遂收捕男生亲信，以王命征召男生。男生恐遭不测，未敢返京。于是男建自为莫离支，并发兵讨伐男生。男生走保国内城（今吉林集安），遣其子泉献诚入唐求救。

六月七日，唐高宗派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兵援救男生，以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充当向导；又以右金吾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率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及左监门将军李瑾行等，同讨高丽。

是年九月，庞同泰率部首先渡过辽水，大败高丽守军，与泉男生在国内城会合。高宗诏以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

十二月十八日，为了加强唐军兵力，高宗又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司列少常伯郝处俊为副，与庞同善及契苾何力等，并力同击高丽。其水陆诸军总管及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并受李勣调遣。河北诸州租赋全部调归辽东军用。

乾封二年（667 年）九月，李勣率部渡辽水后，向“高丽西边要害”——新城发起进攻，并筑栅为阵，且攻且守。城中形势逐渐危机，不断有人缒城投降。最后，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投降，唐军遂拔新城。接着，李勣留庞同善和高侃留守新城，自率本部兵马出击，所至皆捷，连下 16 城。

这时，泉男建亲率国兵，夜袭同善、高侃军，新城告急。李勣当即派薛仁贵率部援救。仁贵纵兵大击，男建败走。同善与高侃带兵出城追击，行至金山（今辽宁本溪东北之老秃顶山），与高丽守军遭遇。唐军初战不利，向后撤退。这时，正值薛仁贵率部至此，麾军将高丽追兵拦腰截断，高侃、同善回军夹击，高丽军大败，被歼 5 万余众。唐军乘胜攻占南苏、木底、苍岩（今辽宁新宾境内）3 城，与泉男生部会合，赢得了金山之战的胜利。后来，唐高宗手敕嘉奖说：“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指薛仁贵）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左冲右击，所向无前，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①

（三）唐军攻占平壤与高丽败降

乾封二年（667 年）九月，水军总管郭待封所率水军由鸭渌水入海口登陆，向平壤推进。但运粮使所遣别将冯师本在运粮途中，因船破误期，故待封军中乏食，兵士饥困，行动迟缓。待封欲给李勣作书求援，但又恐怕被高丽军截获，得知军中虚实，乃作离合诗句，即离析字画，令之成文，以见其意，派人送达李勣。李勣接诗大怒说：“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② 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其解释诗义，李勣始悟，遂别遣粮仗资助。后来，

---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三《薛仁贵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乾封二年九月。

李勣又让万顷作《檄高丽文》，其中有“不知守鸭渌之险”语句，泉男建接书后，回报说：“谨闻命矣！”即刻加强了鸭渌津防务，故唐军不得顺利渡江。唐高宗听后，即将万顷“流于岭外”①。

唐军行军副大总管郝处俊在率部行至高丽城下之时，兵士尚未成列，高丽守军突然从城中杀出，唐军大惊。处俊踞坐胡床，正食干粮，匆忙之中，潜简精锐，奋力迎战，将高丽守军击败，将士均服其胆略。

总章元年（668年）二月，李勣又派薛仁贵率兵2000进攻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诸将皆言兵少，纷纷劝阻。但仁贵却说：“兵不在多，顾用之何如耳！”② 当即率部起程。抵达扶余城下后，城内守军倾城而出，仁贵奋勇迎战，大破其众，歼敌万余人，于二月二十八日攻拔该城。扶余川40余城，一时俱惊，纷纷向唐纳款请降。

泉男建听说扶余有失，遂派劲旅往救，与李勣部在薛贺水（今辽宁太子河）遭遇。经过激战，唐军大胜，歼敌3万余人，并乘胜攻占了大行城（今辽宁凤城西南）。接着，李勣下令诸路唐军向南挺进，九月会师平壤。

李勣率唐军主力进至鸭渌水渡津后，遇到了高丽守军的拼死抵抗。李勣麾军奋击，大破其众，追击200余里，并攻占了辱夷城，沿途诸城守军逃遁及归降者相继不断。

同年八月，辽东道安抚大使兼副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率先引兵抵达平壤城下。李勣等亦率部继至。卑列道行军总管刘仁愿因逗留不进，贻误军期，被流于姚州（治今云南姚安）。

唐军将平壤包围一月有余，城内粮饷将尽，高丽王高藏只得遣泉男产率首领98人，持白旗向唐军请降，李勣以军礼接待。但泉男建却闭城拒守，多次遣兵出战，屡遭失败。男建遂委军事于僧人信诚，信诚暗中派人来到李勣军营，约定5日之内，开门投

---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元万顷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总章元年二月。

降。信诚如期打开城门，李勣纵兵乘城鼓噪，焚烧城楼。九月十二日，泉男建自知城池不守，自杀未遂，被唐军俘获，于是高丽悉平。

同年十月，李勣率部归国。唐高宗诏令先以高丽王高藏等献于昭陵，以慰太宗亡灵。然后整顿军容，高奏凯歌，进入京师，献于太庙，告慰列祖列宗。十二月七日，唐高宗在大明宫含元殿接受降俘。以高丽王高藏政非己出，赦而不罪，并任为司平太常伯（即工部尚书）员外同正；以泉男产、僧信诚和泉男生能主动归降，分别任为司宰少卿（即光禄少卿）、银青光禄大夫和右卫大将军；以泉男建顽抗不降，流于黔中（今贵州省内）。分辽东和高丽5部、176城、69万余户为新城州（治今辽宁沈阳东）、辽城州（治今辽宁辽阳东北）、哥勿州（治今吉林通化西北）、居素州（治今辽宁抚顺东）、建安州（治今辽宁盖州）、卫乐州、舍利州、越喜州、去旦州等9都督府，南苏（治今辽宁新宾）、盖牟、代那、仓岩（治今吉林通化）、磨米、积利（治今辽宁瓦房店）、黎山、延津、木底、安市、诸北、识利、拂涅、拜汉等42州，100县，又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选拔其有功酋帅担任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共同治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2万镇守平壤。李勣以下有功将士，均有封赏。唐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的战争至此结束，共计历时25年，实为唐历时最久的对外战争。

五、唐军镇压高丽、百济军民的反抗斗争与新罗的争夺之战

唐军征服百济、高丽以后，由于对当地居民实行残酷统治，遂激起了当地居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新罗统治者也乘机与高丽、百济军民联合，企图驱逐唐军，统一朝鲜半岛。唐朝为了继续维持对高丽和百济的统治，遂对高丽和百济军民的反抗斗争进行大规模镇压，并对新罗展开了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激烈斗争。

（一）唐军镇压高丽、百济军民的反抗斗争

总章二年（669年）四月，即唐灭高丽的第二年，高丽人民不堪忍受唐军统治，大量结队南迁，逃奔新罗，请求庇护。于是，高宗下诏，迁徙高丽民户3.82万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仅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唐安东都护薛仁贵奉命归国，征讨吐蕃。高丽酋长剑牟岑趁机拥众起义，立高丽王外孙安舜为主。唐高宗遂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总管，率兵分道征讨。在唐军大举压境之时，安舜杀剑牟岑，逃奔新罗。

咸亨二年（671年）七月初一，高侃部在安市城大败高丽余众。接着，又麾军南下，转战一年有余，于咸亨三年十二月，又败高丽和百济余众于白水山（今韩国全州西）。新罗王金法敏派兵援救，企图牵制唐军，亦被高侃击败。

咸亨四年（673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李谨行亦破高丽与百济起义军民于瓠芦河（今韩国洛东江中游）之西，俘获数千人，余众皆奔新罗。这时，谨行之妻刘氏留守伐奴城（今朝鲜平壤西北），高丽军民引靺鞨之众来攻。刘氏身披甲胄，率众守城，高丽与靺鞨之众久攻不克，只得撤退。高宗闻奏，深嘉其功，封燕国夫人。

（二）唐军与新罗的争夺之战

唐灭百济、高丽以后，新罗王金法敏不断接纳这两国军民，又占据百济故地，派兵守卫，大有兼并朝鲜半岛三国之势。高宗大怒，遂于上元元年（674年）正月，诏削法敏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为新罗王，从长安归国继位。接着，又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总管，发兵征讨新罗。

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刘仁轨率部在七重城（今韩国大丘北）大破新罗兵。又派靺鞨之众渡海，进攻新罗南部边境。接着，高宗又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驻新罗买肖城（今韩国陕

川）以经略之。谨行率部对新罗发起三次进攻，三战皆捷。新罗只得遣使入贡、谢罪。唐高宗又复新罗王金法敏官爵，其弟金仁问中道而还。

仪凤元年（676 年）二月六日，由于高丽军民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留守高丽的唐军孤立无援，处境日窘，高宗只得将安东都护府由平壤迁至辽东故城，又将原任东土官职的汉人全部撤回国内。接着，又将熊津都督府由熊津城迁至建安故城，并将原来迁徙徐（州治今属江苏）、兖（州治今属山东）等州的百济民户全部安置在建安城中。

仪凤二年（677 年）正月，刘仁轨奉诏率部由熊津城归国，高宗以扶余隆代仁轨镇守熊津。扶余隆恐怕新罗侵逼，不敢滞留，不久，亦返回京师。二月二十五日，高宗又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原被迁居内地的高丽居民，与高藏俱归；并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这时百济经兵燹之后，荒残破败，遂命扶余隆寓居高丽之境。

高藏到达辽东以后，暗中勾结靺鞨，阴谋叛乱。事泄后，被召回长安，徙邛州（治今四川邛崃）而死，其余众亦被徙于河南、陇右诸州。此后，新罗不断兴兵西进北上，逐渐奄有原百济全境，并占据了原高丽浿水以南故地，完全统治了朝鲜半岛南部，唐朝退处浿水以北。高丽高氏和百济扶余氏政权遂亡。

第四节　唐对高丽、百济及新罗战争的性质及其作战指导的得失

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领土相连，相互关系渊远流长，历史上和战不已，故使唐对朝鲜半岛三国的战争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多元性质。概括地说，唐对高丽的战争初期，是收复辽东失地和巩固东北边防性质，故属正义战争；但在唐军击败百济和灭亡高丽以

后，唐朝统治者相继在征服地区推行残暴政策，企图扩张疆域，兼并邻国，遂使战争性质发生质变，由正义之战变成了野蛮侵略。最后，在百济和高丽人民强烈反抗下，唐军被迫退守浿水以北，朝鲜半岛南部终被新罗所统一。

一、战 争 性 质

要揭示唐对朝鲜半岛三国的战争性质，首先得搞清中国与古朝鲜之间的关系史以及唐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政治斗争形势。

根据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和《史记》等书记载，古朝鲜原为西周时期的诸侯箕子及其子孙所建，其中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平壤及其附近地区。战国时期，古朝鲜乘中国内乱之机，将其版图扩张到了中国的辽河以西，并以满潘汗（今辽河西）与燕国划界。西汉初期，曾将古朝鲜的势力赶至浿水以东，并将浿水定为两国国界。汉武帝即位以后，又派兵征服朝鲜，于元封三年（前 108 年）在其境内设置了乐浪、真番、玄菟和临屯 4 郡。汉武帝始元五年（前 82 年）撤销了真番、临屯 2 郡，玄菟郡治亦由沃沮城（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移至辽河流域，但浿水以东地区仍为汉所有。兴起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高丽政权又趁汉末大乱之时，积极扩张领土，相继占据了汉玄菟郡全境，并迁都于该郡的国内城。原真番郡部分境地及朝鲜半岛南部亦被百济和新罗 2 国瓜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国又先后向曹魏、西晋、北魏和北燕等中国封建王朝发起进攻，终于侵占了中国辽河以东广大地区。故在隋文帝“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①；隋炀帝时期，大臣裴矩也曾疾呼：“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② 唐高祖武德年间，中书侍郎温彦博等人也曾

① 《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②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建言："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①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朝使者相里玄奖也对盖苏文说："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② 翌年，唐太宗在渡辽水前夕，亦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③ 由此可见，唐对高丽的战争具有反对侵略、收复辽东失地的性质。

再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来看，高丽统治者对唐采取的敌对态度，亦是唐对高丽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早在隋文帝开皇末年，高丽王高汤听说陈朝被灭的消息后，即"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且言"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企图霸占辽东，抗拒杨隋；翌年年初，新继立的高丽王高元又"帅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④ 企图扩张领土至辽河以西。唐朝建国以后，高丽王虽表面遣使通好，但实质却敌意如故：武德九年（626年），高丽派兵多次侵犯新罗、百济，又"闭其道路，不得入朝"⑤，极力阻挠新罗、百济与唐的和平交往；贞观二年（628年），高丽王又在辽东境内修筑长城，与唐抗衡；贞观十六年（642年），盖苏文弑君篡国以后，不但大肆南侵新罗，抗拒唐使，而且还在辽东派遣重兵，致使唐使、太常丞邓素归国后请于怀远镇增加"戍兵，以逼高丽"⑥。上述事实说明，到唐太宗贞观末期，高丽的敌对行动已对唐造成严重威胁。唐初期对高丽的战争，是捍卫国家主权的自卫反击战争。

---

①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正月。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

④《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日、文帝开皇十八年二月。

⑥《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

二、作战指导得失

（一）唐朝方面

唐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百济的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作战指导方面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战争开始以前，唐太宗在兵力部署、后勤供应、敌情侦察以及宣传舆论等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

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即派人以出使为名，侦察敌情，详细了解高丽境内的山川地形和民情风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作战的盲目性；从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又频繁调遣军队，向营州集结，以此作为陆军的进攻基地；又遣使在江南诸州督造船舰，组建水军，集结莱州，并以此作为水军的进攻基地。这就保证了唐军在水陆两条战线能够对高丽和百济实施攻击；另外，唐太宗还把河北、河南诸州的租赋调归军饷，并组建了一支水陆兼有、装备齐全的后勤部队，保证了作战部队的物资供应；不久，唐太宗又下诏在全国招募勇士，增强作战能力；东征前夕，又向全国发布东征宣言，公开宣布5条“必胜之道”，并向大臣们表示了“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的作战宗旨，用以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争取高丽人民的同情。

其次，在战争开始以后，唐太宗及其统军将帅运用周密设计的作战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实施了诸如优待俘虏、安慰居民、严肃军纪等一系列瓦解敌军的怀柔政策，从而使唐军初战告捷。

唐军进入辽东以后，唐太宗即派遣斥候，侦察敌情，故虽深入作战，却未受到敌军袭击；在安市之战中，面对敌人强大的援军，唐太宗果断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法，亲自观察驻跸山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选定伏兵之处，分遣一部断敌归路，一部布阵诱敌，然后以主力出敌不意而猛击，终于粉碎了敌人援军；对被俘的高丽军民，唐太宗悉予慰谕，并赏赐食物、绢帛、粮仗，任

其所往。即使有的战俘自愿随军效力，唐太宗也以他们的家室为虑，全部放归，使还平壤。此后，当唐军再渡辽水后，高丽将士虽在“降敌者死”的严刑威逼下，犹望风而降，当是这一优抚政策取得实效的有力证明；在战争进行期间，唐太宗对立功将士，赏不逾时，而对违纪军人，罚不旋踵，故唐军将士人百其勇，所向无前。

复次，唐朝统治者对东征将领精加选择，用人得当，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将领的指挥和作战才能。如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有统御之才”，李勣“夙夜小心，忘身忧国”① 等，都是唐军将帅中之佼佼者。特别是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不但智勇双全，且有较高的政治才能，虽孤立百济，却能使当地百姓“大悦”，立于不败之地。所有这些，都是唐军能够取胜的组织保证。

最后，在第一次东征结束以后，唐太宗能够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及时调整作战方针：一方面采用更迭骚扰战术，用以疲惫高丽，另一方面又大量制造船舰，扩充水军，增强海上攻击力量。高宗继位以后，又继续沿用这些作战方针，在高丽困惫之时，遂先后取得了灭亡二国的胜利。

但是，唐军在作战指导方面亦不乏失误：

第一，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唐太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高丽的防御能力，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特别是在安市城下打败了高丽援军之后，唐太宗自以为逢坚必克，筹算必胜，遂不再注意发挥水军的牵制和配合作用，亦不再接受部将建议，出奇兵取胜，只是将军队屯于坚城之下，致使唐军势摧气竭，久攻不克，终在粮草不继，漠北骚动之时，被迫班师。

第二，在唐军班师之后，唐太宗在扩充水军，积极备战之时，又犯了操之过急和好大喜功的错误。以致“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出现了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总章元年二月。

"力役兼总"，"黎庶""嗷嗷"① 的状况。不但分散了兵力，而且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遣使在剑南造船时，由于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终于激起了剑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第三，唐军在灭亡百济、高丽以后，唐高宗不但在当地推行残暴的统治政策，而且对留守唐军亦"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致使他们"唯思西归，无心展效"②。

（二）高丽、百济方面

高丽、百济与唐相比，不但领土狭小，而且国力虚弱，但能抗拒唐军达20多年，完全凭借天时地利之便和陆上的三道防线，将唐军阻于坚城之下，又施坚壁清野之策，终使唐军兵力疲惫，粮草不继，久攻不克，无功而退。

高丽军陆上的三道防线，一为高丽王在辽东所筑长城，二为千山山脉，三为鸭绿江。而以辽东的长城防线最为重要。因为长城防线，难以逾越，粮草运输更为困难。加之辽东秋天多雨，辽河泛滥，常为泽国。唐军正于此时首次进入该地，结果，"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③。滞留冬季，这里又值冰雪时期，唐军行进于冰天雪地之上，受阻于坚城之下，入无用武之地，只得被迫班师。

但在强国逼境之际，高丽与百济不知联合邻国，却大肆侵犯新罗，削弱了抵御强国的军事力量。乾封元年（666年），盖苏文死后，诸子争权，内部分裂，遂致灭亡。

---

①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月；《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五月。

第六章　武则天、中宗时期的军事斗争

武则天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8年）入宫以后，开始步入最高统治层。唐高宗即位不久，再次将她接纳入宫，永徽六年（655年）立为皇后，从此参预处理朝政，宫中呼为“二圣”。唐高宗死后，武则天曾将继立为帝的第三子唐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帝（即唐睿宗），自己临朝称制。光宅元年（684年），她镇压了以徐敬业为首的扬州叛乱；垂拱四年（688年），又平定了唐宗室、越王李贞父子的豫州起兵。接着，她便大开告密之门，推行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天授元年（690年），改唐建周，终于登上了女皇宝座。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居住在辽河流域的契丹族在其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的率领下，聚众叛乱。第二年，武则天派兵将其平定。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又派大将王孝杰率兵进入西域，从吐蕃手中夺回了唐朝设置的安西四镇，并多次击败吐蕃对西域和河西地区的进攻，巩固并加强了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边防安全。但在反击漠北东突厥余众的入侵时，由于武则天先后诛杀了善于用兵、使突厥闻风丧胆的边将程务挺和黑齿常之等，致使东突厥日益强盛，从而成为武周时期北方的严重边患。直到唐中宗继位以后，任命边将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3座受降城，才遏制了东突厥的入侵。

第一节　武则天的代唐及其施政情况

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年）改唐建周，登上皇帝宝座，直到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位为止，前后专制朝政20多年。在此期间，她曾推崇佛教，广建寺院；改革科举，创立武举，不拘一格，搜罗人才；又改革官制，整饬吏治；勘察均田，检括逃户；睦

邻友好，巩固边防。遂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政治统治日益巩固。但由于她重用酷吏，推行酷吏政治，实行恐怖统治，也使武周政权充满了政治危机。

一、武则天的代唐建周及其内外政策

武则天姓武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其父武士彟曾与同乡贩卖木材，“因致大富”①。隋炀帝大业末年又任鹰扬府队正。李渊担任太原留守后，武士彟“投刺往谒”②，故而结识。不久，李渊曾多次休止其家，武士彟均殷勤接待，故“恩情愈重”③。后来，武士彟又多次劝李渊起兵，并“自进兵书及符瑞”④，被李渊任为中郎将、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晋阳起兵后，士彟又任大将军府铠曹参军。唐朝建国后，士彟以“元从功臣”累迁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武德二年（619 年），武士彟的前妻相里氏亡故，留下长子元庆、次子元爽。不久，由高祖李渊作媒，为他选择杨达之女续弦。杨达籍贯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世为门阀著姓。隋末曾任纳言、东都副监、右武卫将军等要职。杨达之女生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 年），自幼不习女工，却“明诗习礼”，“阅史披图”，满腹经纶，下笔成文。武德三年（620 年），她与武士彟结为伉俪时，年已 42 岁。后来，杨氏相继生下三女，武则天排行第二。

武则天降临人世时，其父武士彟不久即由工部尚书出任扬州（今属江苏）大都督府长史。后来，由于太子废立、新帝登基，武士彟又先后调任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利州（治今四川广元）都督和荆州（治今湖北荆州）大都督等职。由于父亲职务频繁调动，武则天随同辗转不定，所以有关武则天的生时、生地，史书均没有明确记载。

---

① 《太平广记》卷一三七《武士彟》。

②③ 李峤：《攀龙台碑》，载《全唐文》卷二四九。

④ 《旧唐书》卷五十八《武士彟传》。

武则天死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这是史书明载的，并无歧议，但对她的享年却众说纷纭：约有80岁、81岁、82岁和83岁4种说法。唐人吴兢的《则天实录》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书均说她活了82岁，故此说较为可信。据此推算，武则天应生于武德七年（624年）。因为这时武士彟仍任工部尚书，故武则天的出生地应为京师长安。至于有人认为武则天生于今天的四川广元，那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不足为凭。

武则天童年时代曾随父母辗转于长江两岸，游历于巴山蜀水之间。贞观九年（636年），武士彟死在荆州大都督任所，年仅12岁的武则天及其姐妹便同母亲杨氏一起回到长安。从此，杨氏潜心教育爱女，对视若掌上明珠的武则天更是百般教诲，诵颂经典，舞弄文墨。武则天后来的谙通文史当与此密不可分。

贞观十一年(638年)十一月，武则天被唐太宗召入宫中，立为四品才人，并赐给她一个称号“武媚”。后来，宫内外均称之为“武媚娘”。据说，唐太宗有一匹“肥逸”难驯的烈马，名叫狮子骢，无人制服。武则天在一次“侍侧”时，唐太宗曾谈及此马。武则天立即对太宗说：“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①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逝世后，武则天按照惯例随后宫众多嫔妃剃度为尼，入居感业寺，为先帝祀修冥福，在青灯黄卷中度过了悠悠3个春秋。永徽二年（651年），唐高宗孝期满后，派人迎武则天再度入宫。第二年，武则天生下长子李弘。不久，即被封为二品昭仪。入宫以后，武则天运用权谋手段登上了皇后宝座，不久，她又利用在握的权力，残酷地杀害了被废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大批反对派官员。显庆元年（656年）正月，武则天又协同高宗将太子李忠废为梁王，立其长子李弘为皇太子。并大力扶持支持他的寒门士子：李义府由中书舍人擢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许敬宗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久视元年正月。

加太子宾客，不久又册拜侍中、中书令，相继升为手握重权的宰辅。此外，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也都得到升迁。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又协助高宗，将太宗时期的《氏族志》修改为《姓氏录》，“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①，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②。这样，就在朝廷中迅速兴起了一批显赫新贵，从而使武则天的皇后地位得到了空前巩固。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染上“风眩头重”之疾，目不能视，苦不堪言，遂将军国大事让皇后参预处决。从此，武则天开始批阅百官奏疏，参决军国大计，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渊博的文史知识，她对政事的处理“皆称旨”③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权势欲的日益膨胀，武则天开始对唐高宗的气指颐使感到不满，她想“专作威福”，甚至要“制”服高宗。这就必然要使高宗“不胜其忿”了，由此，帝后之间始有芥蒂。麟德元年（664年）年底，宰相上官仪窥出了唐高宗的忡忡忧心，上疏请求废黜武后，立即得到诏准。但诏书尚未发出，武则天即赶来向唐高宗质问。一惯懦弱成性的唐高宗不但立即取消了废后的诏令，而且还替自己辩白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④武则天遂指使许敬宗将上官仪处死，受到株连的还有宦官王伏胜、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以及尚书左丞郑钦泰、左相兼吏部尚书刘祥道等。上官庭芝之女上官琬儿尚在襁褓之中，亦被没入掖庭为婢，后来以文章出众而为武则天所重用。从此，唐高宗每次临朝理事，武则天均垂帘听政，政无巨细，皆参预决策，“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⑤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四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

上元元年（674年），群臣尊称高宗为天皇，武后为天后。为了争取人心，提高声望，武则天向高宗“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覆；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廪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

武则天还多引文学之士如元万顷、刘祎之、范履冰、周思茂、胡楚客等，让他们著书立说。这些人按照武则天的旨意，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孝子传》等，为武则天壮扬声势，作舆论宣传。同时，又“密令参决”政事，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②。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死于合壁宫。关于李弘的死因，《资治通鉴》卷二〇〇是这样记载的：“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忤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重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壁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文中“时人”当指后来肃宗时谋士李泌。因为李泌曾对肃宗说过：“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即太子李弘），立雍王贤为太子。”③由此可知，李弘之死，当与他“失爱于天后”有关。因为按照武则天的倔犟性格和不容违忤的权势欲望，她决不会把对自己已构成威胁的人物留在身边，连她的亲生子女亦不例外。

上元二年（675年）六月，武则天的第二子、23岁的李贤被立为太子。永隆元年（680年）八月，即5年之后，李贤又被废为

① 《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上元二年三月。

③ 《旧唐书》卷一一六《肃宗代宗诸子·承天皇帝倓传》。

庶人。不久，又贬徙巴州（治今四川巴中）。文明元年（684 年）二月，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去巴州，逼李贤自杀。

永隆元年八月，武则天的第三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被立为太子。弘道元年（683 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于洛阳宫城之贞观殿，享年 56 岁。两天后，太子遵遗诏于柩前即帝位，年 28 岁，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以后，并没有汲取他的两个哥哥的教训，于嗣圣元年（684 年）正月上旬，相继册立韦氏为皇后，擢韦后之父玄贞为豫州刺史。还将韦氏同宗韦弘敏由左散骑常侍擢为宰相，后来还欲将韦后之父擢为侍中，将其乳母之子均授五品京官。宰相裴炎见此强谏固争，惹得这个血气方刚的皇帝大动肝火，怒气冲冲地说："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这句话虽为愤激之词，并非真要拱让社稷，但却触犯了武则天的大忌。二月六日，武则天勒兵入宫，宣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当即被扶出宫殿。刚作了两个月皇帝的李显至此尚未明白，出宫前还质问母后说："我何罪？"武则天回答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① 第二天，武则天又将她的最小一个儿子李旦立为皇帝，是为唐睿宗，时年 23 岁。为了避免前 3 个儿子因"失爱"而被废杀的事再次发生，这一次武则天干脆"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而"政事决于太后"②。于是，在皇帝年逾弱冠之时，武则天破例地临朝称制了。

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相继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和唐宗室李贞父子的豫州起兵，又推行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详见本章第二节）。与此同时，她还把两个堂侄武承嗣（即武元爽之子）和武三思（武元庆之子）召来京师，委以重任，倚为心腹；又将支持她的刘祎之、骞味道、裴居道、韦方质、韦思谦等任为宰辅；并"改东都为神都，官名大易"，在洛阳修建明堂，作为"布政之新"。又铸造九鼎，制作玉玺，作为皇权象征。显然，她要把洛阳作为她的登基之地了。载初元年（690 年）九月初，侍御史傅游艺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二月。

揣摸到了武则天的心意，率领关中父老900多人来到洛阳宫门上表，请求武则天代唐称帝，改唐帝李姓为武氏。接着，朝廷百官及帝室宗亲、四夷酋长、僧尼道士等共6万余人，相继上表，如游艺所请。九月五日，群臣又上表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又有赤雀数万聚集朝堂，这都是女皇登基的祥瑞之兆。九月七日，武则天表示接受百官大臣的请求。九月九日，她登上洛阳宫则天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革命"。九月十二日，武则天接受了大臣们给她所上尊号"圣神皇帝"，又"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① 武则天就这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时年67岁。

自从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死，直到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复位为止，武则天前后专制朝政20多年。在此期间，她所施行的内外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推崇佛教，制造舆论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和母亲荣国夫人杨氏都笃信佛教，武则天"幼小时已被缁服"②。四川广元皇泽寺至今还端坐着武则天的圆雕石像，双手交于腹前作禅定状，俨然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她的母亲杨氏更是"心持宝偈，手写金言，字落贯花，词分半月"，"将佛日而长悬，共慈灯而不灭"③，对佛教笃信不贰。所有这些，都使武则天从幼年起就受到佛教的熏陶。武则天曾说："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④，此话不诬。太宗逝世，武则天剃度为尼，青灯黄卷，悠悠数载，佛学修养，当有所加深。再次入宫以后，唐高宗对佛教的崇信更是狂热。为了给母后祀福，他主持修建了大慈恩寺；他对玄奘法师"礼敬愈隆，中使朝臣问慰无绝"⑤；又赐给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二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九月。
② 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大云经疏》，载罗福苌《沙州文录补》。
③ 《大周天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
④ 《方广大藏正经序》，载《全唐文》卷九十七。
⑤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

千匹"①，由此，寺院经济迅速膨胀。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对武则天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从幼童时开始直到唐高宗死后一段时间，武则天的崇信佛教和一般佛教徒，并无异趣，只不过是为慰藉心灵，祈求福寿而已。但最迟从临朝称制以后，武则天的推崇佛教，却另有意图，这就是为她的登上女皇宝座制造舆论。这时，东魏国寺有个聪明绝顶的僧人名叫法明的，他在诵颂后秦沙门竺佛念所译佛教经典《大云经》时，发现经文中有"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抗拒者"的文字，于是他便同武则天的一个男宠薛怀义疏证经文说："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②。意思是说佛祖已经授命武则天作天下女主，文武百官及天下百姓都应俯首听命，这样才能家业兴旺，子孙繁衍，否则，上天就要降罪惩罚。这个经疏一出，与武则天的心意一拍即合。因此，天授元年（690年）七月，当法明上表说武太后乃弥勒佛降生，应代唐称帝时，武则天立即下制将《大云经》"颁于天下"，"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③。同年十月，她改唐建周后，又"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④。天授二年（691年）四月，又诏令佛教在道法之前，缁服处黄冠之首。后来，她又在全国大修佛寺，广建浮屠，制作经像；组织中外僧人，翻译佛经，并亲自为这些经文作序；她还多次召集无遮大会，聚僧讲经，每次用钱"万缗"，"府藏为之耗竭"⑤。武则天时期佛教势力得到空前发展，成了压倒其他宗教的最大教派，其原因即在于此。

改革科举，搜罗人才　武则天深知，登上女皇宝座，并非易

---

① 苏頲：《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载《全唐文》卷二五七。

② 英国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大云经疏》。

③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薛怀义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十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正月。

事，巩固女皇地位，更为艰巨。因此，单有僧侣、佛教的拥护还是不够的，还须取得世俗官僚和广大士人的支持，故在登基建周前后，即对科举选官制度大加改革。首先，她把由吏部员外郎主持的“常举”制度化，每年定期开科取士，决不以任何理由中止贡举；其次，又重视制举，创立殿试。武则天执政以前由皇帝主持选官的制举虽名实俱存，但却偶尔为之，或数年一试，或取士甚少，在科举选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武则天执政以后，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制举考试，并增加考试科目，扩大录取人数。天授元年（690 年）二月，武则天又亲自“策贡士于洛城殿”①，于是，开贡士殿试之端，制举在科举选官中的地位大为提高。垂拱元年（685 年）五月，武则天又下“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②从而扩大了选官范围，为各种人才提供了多种入仕途径。长寿元年（692 年），她又派出 10 道巡抚使，选拔人才，“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者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③经过上述改革以后，极大提高了科举制度在广大士人中的声望，故在武周时期，“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④。武则天为了防止科举考试中作弊行为的滋生蔓延，还创立试卷糊名制度，“仍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⑤。由于这种办法对抑制考试作弊行之有效，故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武则天虽宽于选官，但却严格控制。对不称职者，一经发现，则大加贬黜。所以，虽然由于大开科举，使武周时期曾出现过官吏冗滥的局面，但也确实录用了一批贤能之士。久负盛名的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张说、裴耀卿等，都是在武则天时期科举及第，或是由她亲自选拔的著名宰相。正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元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长寿元年正月。

④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

⑤ （唐）刘悚：《隋唐嘉话》卷下。

如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所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①

改革官制，整饬吏治 武则天执政时期对官制的改革主要包括改变中枢机构和职官名称，扩充使职等两个方面。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武则天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即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门下省长官）为纳言，中书令（中书省长官）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②。在这一改革中，三省六部仅为机构和职官名称的变易，但御史台显然有所加强，其左台专知监察京官，右台专知监察地方官。这就充分发挥了监察机构的监察职能。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武则天还大力增设使职，在继续保留唐初就有的安抚使、巡察使、经略使、按察使、军使等使职外，又相继设立了知匦使、理匦使、督作使、园苑使、庄宅使、飞龙使、闲厩使、防御使、招讨使、巡抚使、括逃户使等。这些使职除少数因事而设、事解辄罢以外，其中常设的如巡抚使、巡察使等，都是为检察地方官的政绩设立的。武则天赋予他们"褒贬得失"的权力，因而对整饬吏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改革军制，扩充兵源 大致从唐高宗即位以后，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均田农民的日益贫困，府兵制亦由盛转衰，兵源枯竭，朝廷拥有的府兵人数急剧减少，军队素质亦大为降低。武则天执政以后，边疆形势吃紧，烽烟四起。为了扩大兵源，保卫边防，巩固政治统治，武则天从垂拱年间（685～688年）开始扩大募兵，不但在普通百姓中征集"白丁"入军，而且就连佐、史、里正、仓督、仓史、白直、执衣、学生等"杂任"以及由散官五品、勋官二品以上子孙充当的亲、勋、翊三卫等也列入募兵对象。万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长寿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岁通天元年（696年）以后，武则天又相继在山东、河南、河北诸州设置武骑团，规定每150户出兵50人，马1匹。同时，又下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①。另外，武则天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控制。唐高宗死后不久，她就派“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②，旨在镇压地方上可能发生的武装叛乱。只要发现军队将领中有异心者，她就果断撤换，直至处以极刑。她还重视储粮备战，曾先后派娄师德、郭元振等担任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凉州都督等职，故使边镇兵“数年咸得支给”③，“积军粮支数十年”④。武周时期其所以能够取得收复安西四镇及平定契丹叛乱等军事胜利，与此不无关系。

勘察均田，检括户籍　唐高宗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发展，均田农民逐渐丧失了原有土地，加之赋役剥削的不断加重，农民纷纷破产。到武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⑤的现象。由此，不仅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而且还直接威胁武周政权的封建统治。对此，武则天曾接纳臣下的建议，从圣历二年（69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勘察均田运动，旨在通过检括各类籍外占田和对客户田地的荫庇，使土地所出，利归官府，而不致流入私家。从长安三年（703年）开始，武则天又派遣“括逃御史”在全国进行检括户籍，并对所括逃户、隐丁、漏户及客户等流动人口提供许多优惠条件，如“逃人括还，不问户等高下，给复二年”⑥；逃户田宅可保留10年；由狭乡迁往宽乡者，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

③ 《旧唐书》卷九十三《娄师德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元年十一月。

⑤ 《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

⑥ 《长安三年三月十六日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

只要在时限内出首，即可在当地州县附籍，并“给复一年”①，鼓励人口流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改变了逃户的社会地位，促进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睦邻友邦，巩固边防　武则天对毗邻的新罗、日本、天竺、波斯等国采取平等交往、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经常亲自接见外国使节，每次都赏赐大量珍品作为回礼，还按照路程远近，拨给粮料，如天竺、波斯、大食使者，给6个月粮，真腊等国给5个月粮，林邑诸国给3个月粮等。因此，武则天时期始终同邻近诸国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特别同日本国的和平交往更为频繁。长安三年（703年）十月，日本执节使栗田真人率第八批遣唐使来华，武则天在麟德殿设宴接待，并授予他司膳郎之职，赐谷1000斛，田20顷，作为其留居长安期间的生活费用。此后，日本来华的学问僧接踵而至，大大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武则天对周边少数族也采取怀柔政策，广泛吸收其上层首领在朝廷作官，并通好和亲，大力帮助少数族地区发展经济。对骚扰边境、抢掠财物的少数族政权，武则天也予以坚决的武力反击，有力地保卫了边境安全。

二、武举的设立及其意义

创设武举是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重要改革之一。

唐朝以制举荐择武臣始于唐太宗时期。据《册府元龟》卷六十七《帝王部·求贤一》载：“（贞观）三年四月诏曰：‘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官人同中”。这是唐代诏荐文武之士的最早诏令。显庆二年（657年）二月，唐高宗又下诏说：“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所知，或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

① 武则天：《置鸿宜鼎稷等州牒》，载《全唐文》卷九十九。

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于良、平，驰功绩于卫、霍；踨二起于吴、白，轨双李于牧、广……如有此色，可精加采访，各以奏闻。”①这是唐朝专为选拔武臣而颁布的最早诏令。此后，唐高宗还于仪凤元年（676年）、仪凤二年、调露元年（679年）、弘道元年（683年）多次诏举武臣。但这时的诏举武臣既无具体的考试内容，又无正式科目和法定的选任程序，只是皇帝偶尔为之，但却为武则天的创设武举开了先河。

武则天执政以后，于光宅元年（684年）始令京官九品以上及诸州长官各举“武艺驰声”② 等科各一人，制举荐择；垂拱元年（685年）五月，又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举”。③其后，又令天下“文可以臣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蕴梁栋之宏才，堪将相之重任”者，“无隔士庶，具以名闻”④。由此可知，以“自举”和“无隔士庶”等方式，荐择武臣，均始于武后之世。到了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十七日，武则天又将武举列为科举选官的正式科目，这是她对唐朝科举制的最大贡献之一。正如《资治通鉴》卷二九七《唐纪二十三》所载，长安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按照当时科举制的规定：参加武举的乡贡举人，于每年十月齐集洛阳，十一月在尚书省兵部参加考试。其考试科目分为平射和武举二种。其中平射只“试射长垛三十发，不出第三院为第”。武举考试的内容共有七项：即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和举重。所谓射长垛，就是在500步外设垛，列坐引射，“三十发不出第三院为第，入中院为上，入次院为次上，入外院为次”；所谓骑射，就是在垛上置鹿皮，驰马射之，“发而并中为上，或中或不中为次上，总不中为次”；所谓马枪，就是立四木人于垛上，木人头上有板，应试者驰马入垛，举枪左右刺，刺掉

① 《册府元龟》卷六十七《帝王部·求贤一》。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三《改元光宅诏》。

③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

④ 武则天：《求贤制》，载《全唐文》卷九十五。

"三板四板为上，二板为次上，一板及不中者为次"；所谓步射，就是徒步箭射草人，"中者为次上，虽中而不法，虽法而不中者为次"；所谓材貌，即"以身长六尺以上者为次上，以下为次"；所谓言语，即"有神采堪统领者为上，无者为次"；举重亦称翘关，即制长一丈七尺、径三寸半大木一根，凡十举，"举以五次上为第"①。由此可知，这时的武举考试主要以骑射、臂力和枪法优劣为依据，旨在选拔能够冲锋陷阵的猛将，而非运筹帷幄的统帅，这和武举制科的选拔韬略之士和将帅之才正好相辅相承。

可应武举考试的既有勋官、品子，也有百姓"白丁"，只是无职事官应举之例。武举及第后，即取得了作官的出身，亦可以直接参选授官。

在创设武举的同时，武则天还"教人习武艺"，"制土木马于里闾"②，组织百姓在农闲时经常演练骑射。

总之，武则天的创设武举，不但为唐王朝选拔了大批"智勇兼资"和"才略并运"的军事人才，充实了兵源，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一般官僚地主子弟中长于骑射的人才，广开了入仕之门，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也进一步促进并发展了唐初的尚武之风，增强了朝野内外以至广大百姓的居安思危的战备观念，对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边防安全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政治形势

武则天懂得"建国之本，必在于农"的道理，因而比较重视兴农务本。垂拱二年（686年）四月，武则天曾组织人力，推广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付梓印行，发给各地来京的朝集使，指导农业生产。她还规定州县境内"田畴垦辟，

---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省·兵部员外郎》。

②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

家有余粮”，则升奖地方官吏；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惩处，“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①。武则天很重视兴修水利，据有关史书记载，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全国兴建的各类水利工程，就有近20项之多②。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武则天时期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高宗永徽初年全国有户385万，到神龙元年（705年）增至615万户。神都洛阳的仓粮“积年充实”③。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唐朝的开元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故连反对武则天的《新唐书》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她“僭于上而治于下”④。

但是，也应看到，武则天执政以后，由于极力推崇佛教，大肆兴建寺院、天枢，使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致使“逃丁避罪，并集沙门”⑤。加之她生活奢侈，铺张挥霍，糜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由于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掠夺农民，破坏均田，逃亡农户日益增多，阶级矛盾不断加深，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的势力受到压抑，庶族地主的势力有所发展，地主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阶级变动，是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重要变化。唐初虽然也从寒门庶族中选拔了一批将相大臣，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的政治局面。但“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一些“衰家落谱”的高门著姓，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⑥。武则天出身“寒微”，其父虽“家富于材”，但由于门第卑贱，故在隋末虽热衷功名利禄，但历尽坎坷，终未腾达。武则天再次入宫以后，又受到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士族集团的强烈反对。这就决定了她在执政以后，必然要对门阀士族采取抑制政

---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诫励风俗敕》。

② 《新唐书·地理志》。

③ 《陈子昂集》卷九十四《谏灵驾入京书》。

④ 《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传上赞》。

⑤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⑥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四年十月。

策。显庆四年（659年），她在协助高宗修订《氏族志》时，不仅以“后族为第一等”，而且还以“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①，从而提高了庶族官员的地位。另外，她又通过改革科举制度，为庶族地主子弟大开入仕之门，不但加速了地主阶级内两大阶层势力的消长，又为武周政权培植了一大批依靠力量。

在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和唐宗室的起兵以后，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对全国上下进行严密统治，在朝廷内外形成了恐怖的政治气氛（详见本章第二节）。但在武则天晚年，由于她在立嗣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朝臣中派别对立，支持拥立中宗和极力推戴武氏的两派斗争日益尖锐，也使最高统治层内潜在着极大的政治危机。

另外，在武则天执政以后，周边少数族地区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居住在西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已日益强大，时常侵扰西域和河西地区；东突厥汗国的残余势力频频南侵西攻，企图摆脱唐朝的统治，重建漠北政权；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契丹族上层首领也在策动部族造反，攻州略县，进犯中原。因此，安抚周边地区，巩固边疆安全，也就成了武则天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任务。

第二节　武则天执政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唐睿宗为帝，自己临朝称制以后，徐敬业等人以“匡复庐陵王”为名，发动扬州叛乱。但在强大官军的进攻下，仅历时一个多月，即被镇压。垂拱四年（688年），即在武则天改唐建周前夕，以越王李贞和琅邪王李冲为首的李唐宗室亦相继在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和豫州起兵，向洛阳进攻。但因准备不周，缺乏统一号令，故短促而亡。此后，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重用酷吏，推行残暴的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终于在天授元年（690年），迁移唐祚，建立大周。

---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一、徐敬业扬州起兵及其失败

（参见附图 8）

光宅元年（684 年）九月，由徐敬业、骆宾王、唐之奇、杜求仁、魏思温等人发动的扬州起兵，是武则天执政后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武装叛乱。

徐敬业原是唐初名将李勣的孙子，曾随父、祖改姓李氏，名李敬业。他自幼随祖父戎马征战，以骁勇著称，累迁太仆少卿、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等职，袭爵英国公。为人狂妄，贪图权势，利欲熏心。李勣生前曾说："破我家者必此儿。"① 嗣圣元年（684 年）初，徐敬业坐赃被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司马，其弟、周至（今属陕西）县令徐敬猷亦受到株连，被削职免官。兄弟二人与前周至尉魏思温偕行南下，寄居扬州。这时，坐事贬官的给事中唐之奇、詹事府司直杜求仁以及怀才不遇的临海（今属浙江）丞骆宾王等亦麕集扬州。他们共述衷肠，"各自以失职怨望"，遂企图在政局变迁、朝廷更迭之际，以匡复庐陵王为辞，阴谋叛乱。

为了扫除反叛障碍，他们首先计谋捕杀唐扬州长史陈敬之。徐敬业先派其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装扮成朝廷派往扬州的使者，然后又派雍州（治今陕西西安）人韦超至仲璋处告变，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遂以使者身份将陈敬之逮捕入狱，从而使扬州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瘫痪。数日后，徐敬业乘坐驿站车马，假扮成新任的扬州司马，来到扬州官邸，扬言"奉密旨，以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北）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②。于是，派人打开扬州府库藏，又令士曹参军李宗臣率众占据扬州钱坊，驱赶囚徒、工匠当兵，授以兵甲器仗，作为叛乱的军事力量。随后将陈敬之杀死狱中，枭首示众，扬州府长史属吏均俯首听命，无

① 《隋唐嘉话》卷中。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敢动者。接着又调遣扬州之兵，齐集扬州，大开三府：即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徐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蒋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10多天内，兵力即达10万之众。徐敬业又命文才横溢、被称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撰写《代李（徐）敬业讨武氏檄》文，对武则天大肆攻击，极尽诬蔑中伤之能事；又厚谀徐敬业是“皇唐旧臣，公侯冢子”，由他发动的扬州起兵，是“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何城不克”；最后还号召天下要“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如果“眷恋究城，徘徊歧路”，“必贻后至之诛”。全文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① 作结，文笔犀利，一气呵成，极富煽动性。连武则天阅后，都产生了深深的遗才之憾，不无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②

这时，徐敬业又在扬州城内找到了一个和已故的太子李贤面貌相似的人，欺骗众人说：“（李）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发号施令。于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司马李崇福帅所属山阳（今江苏淮安东）、盐城（今属江苏）、安宜（今江苏宝应）3县响应敬业。惟盱眙（今属江苏）人刘行举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率部进攻，行举拼死抵抗。武则天下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六日，武则天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30万，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大总管，讨伐徐敬业。并派人将宰相裴炎逮捕入狱，并于九月十八日，将其斩于洛阳都亭驿。

裴炎原为唐高宗末年的顾命大臣。他在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时，是支持武则天的。但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并大封诸武之时，裴炎

---

① 《骆临海集》卷十。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遂与武则天发生嫌隙。他曾向武则天进谏说："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① 引起武则天"不悦"，裴炎由是得"罪"。武则天之侄武承嗣和武三思忌恨唐高祖李渊的两个儿子、韩王元嘉和鲁王灵夔"属尊位重"，多次劝武则天诛杀他们。武则天集宰相商议此事，刘祎之、韦思谦等人均唯唯诺诺，缄默不语。只有裴炎固执力争，激烈反对。致使武则天"愈不悦"②。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叛乱以后，裴炎的外甥蒋仲璋也为骨干之一。因此，裴炎对发兵征讨一事，持消极态度。当武则天向他询问对策时，他回答说："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③这就触犯了武则天的大忌，因此她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监察御史崔察猜中了武则天的心意，便上言裴炎心怀"异图"，武则天据此便捕杀了裴炎。但也有记载说，裴炎与"敬业合谋，扬州兵起，炎以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鹅'，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之。"④ 还有记载说，裴炎打算"乘太后出游龙门，以兵执之，还政天子，会久雨，太后不出而止。"⑤ 但这些记载都没有确凿根据，不足为凭。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条所加《考异》说："此皆当时构陷者所言耳，非其实也。"

正当武则天调兵遣将，准备赴扬州讨叛之际，叛军内部也在讨论起兵计划时发生分歧：军师魏思温主张率10万之众，北进中原，直指洛阳，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可得到"四面响应"；而右司马蒋仲璋却认为"金陵有王气"，又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因而主张先攻常（今属江苏）、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二州，然后以此

---

①③ 《旧唐书》卷八十七《裴炎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

④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五。

⑤ 《新唐书》卷一一七《裴炎传》。

为基地，再北图中原，这样就可“进无不利，退有所归”①。显然，魏思温的起兵计划较为合理。因为在武则天调遣兵将之际，可乘虚取胜，又可得到中原军民以及唐宗室诸王的响应。而江淮一带远离东都，受政局变化影响较小，大多不肯响应叛军，因而很难发展。但徐敬业却最终采纳了蒋仲璋的建议，令唐之奇镇守扬州，自己带兵南下，攻打润州。

这时的润州刺史李思文是敬业叔父，当他得知敬业叛乱的阴谋后，立即派人向武则天“间道上变”。徐敬业率兵抵达润州后，思文婴城拒守，拼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十月十四日城破被擒。前来援救的曲阿（今江苏丹阳）令尹元贞亦兵败被俘，不屈而死。

光宅元年（684 年）十月十九，武则天下诏追削徐敬业父、祖官爵，发冢砍棺，收回国姓，复姓徐氏。这时，唐扬州大都督李孝逸正率部向扬州进发。徐敬业也已从润州渡江北上，屯兵于高邮（今属江苏）下阿溪，又命其弟徐敬猷率兵进驻淮阴（今属江苏），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都梁山（位于今江苏盱眙南），布成犄角之势，抵抗唐军。

李孝逸部抵达临淮(今江苏洪泽西)后，即派偏将雷仁智渡江向徐敬猷发动进攻，初战失利，只得退回江北。孝逸大惧，遂按兵不动。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对孝逸说："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② 孝逸接受了这一建议，立即麾军渡江。十月二十四日，唐将马敬臣击杀尉迟昭，进抵都梁山下。敬业别将韦超犹占据都梁山，抵挡官军，唐军不能进。李孝逸召集将佐，商议作战方案。多数将领主张分兵防守韦超，“大军直趋江都，覆其巢穴”；但支度使薛克杨和魏元忠却认为韦超虽然据险抵抗，但“其众非多”，“其势必举，举都梁，则淮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

阴、高邮望风瓦解”，然后再攻徐敬猷所守卫的淮阴。因为徐敬猷“出于博徒，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①。李孝逸最后采纳了薛、魏的建议，引兵先向都梁山发起进攻。经过激战，韦超大败，连夜逃遁。孝逸又继续东进，进攻淮阴，敬猷又败，脱身逃走。接着，唐军向高邮进发。

十一月十三日，唐军先锋部队抵达高邮，与徐敬业部隔溪对峙。后军总管苏孝祥带领5000先锋部队，用小舟渡溪，向叛军发起夜攻。由于徐敬业早有防备，官军败绩，士卒赴溪而死者过半，孝祥战死，左豹韬卫果毅成三郎被俘。叛军左长史唐之奇为了鼓舞叛军士气，指着成三郎对士兵说，这就是官军主帅李孝逸！但成三郎却大呼道："我果毅成三郎，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妻子籍没，尔终不及我。"戳穿了唐之奇的谎言，也大灭了叛军的锐气。

不久，李孝逸所率官军主力抵达下阿溪北，并接连向叛军发起了多次进攻。但由于叛军占据有利地势，致使官军的多次进攻均遭失利。孝逸又恐惧不已，打算撤退。监军魏元忠和行军管记刘知柔再次劝说孝逸坚定平叛信心，抓住时机与叛军展开决战，并建议采用火攻。孝逸接受了魏、刘建议，率官军全线出击，"因风纵火"，焚烧叛军营寨。叛军由于置阵既久，士卒疲惫，阵营不整，因而大败，被歼7000余人，赴溪而死者不可胜数。徐敬业率残部逃回扬州，然后携妻子再逃润州，企图从润州乘船出海，逃奔高丽。李孝逸率部紧追，进屯扬州后，分遣诸将搜歼叛军。

十一月十四日，敬业率残部行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县界，正欲乘船出海，但逆风强劲，无法行船，眼看追兵已到，亡在旦夕。叛将王那朝在危急时刻，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之首②，投降官军，余党唐之奇、魏思温亦相继被捕，传首神都。徐敬业扬州起兵，从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光宅元年十一月。

② 《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上·王勃附骆宾王传》载："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今从《资治通鉴》。

九月三十日开始，到十一月十四日灭亡，首尾不过44天①。

徐敬业的扬州起兵是在“海内晏然”和“百姓思安久矣”的政治形势下发动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故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叛军统帅徐敬业缺乏战略决策才能，起兵后未能抓住有利时机，挺进中原，扩大军事基地，争取中原地区唐宗室诸王的配合、支持，而是南下争夺江淮一隅之地，故在强大官军的攻击下，短促而亡，亦非偶然。

二、唐宗室的起兵及其失败

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以后，武则天当女皇的欲望更加强烈。因此，她一面指示心腹为她的登基称帝大造舆论，一面推行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严厉打击异己势力。自然，李唐宗室就首当其冲了。

唐朝初年，对皇家宗室子弟实行食封户地租和担任地方州县长官的分封制度。这时的宗室成员主要有：唐高祖之子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元嘉，青州（今属山东）刺史、霍王元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灵夔；元嘉之子、黄国公李譔，元轨之子、江都王李绪，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唐太宗之子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纪王李慎以及李贞之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他们在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对李唐社稷形成步步进逼之势时，均“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②。其中以越王李贞父子最为活跃。他们经常与诸王交通串连，又在本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结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外托以畋猎，内实习武备”③。加之李贞“少善骑射，颇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条《考异》。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七月。

③ 《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涉文史，兼有吏干”，在宗室中享有美名，被称为“材王”①，故很快便成为宗室领袖。另外，在反对武则天的政治势力中李唐外戚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高祖之女常乐公主及其婿、驸马都尉、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赵瑰，越王李贞之婿、汝南（今河南汝南西）丞裴守德以及唐高宗之女太平公主之婿薛绍等，都相继参加到李唐宗室的起兵中来。他们相互煽动，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一场武装叛变是在所不免了。

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则天之侄武承嗣导演了一出河“洛出书”的闹剧。他先派人在一块白色卵石上雕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又以碎紫石和药物填之，然后派心腹唐同泰连同表章，一起献给武则天。声称该石获于洛水，正与《周易·系辞上》所云“洛出书”相符，是武则天称帝的祥瑞之兆。武则天看后，当然喜不自胜，立即将唐同泰擢为游击将军，并命其石为“宝图”。五月十一日，武则天下诏：亲拜洛水，接受“宝图”，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在拜洛受图前十日齐集洛阳。

李唐宗室诸王及外戚接此诏书后，均大惧不安，“密有匡复之志”。有人还散布流言说：武则天打算在拜洛大飨之际，“尽收宗室，诛之无遗”。黄国公李譔又诈为唐睿宗玺书说：“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唐高祖之孙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刺史、东莞郡公李融还派人潜入洛阳，向其亲信成均助教高子贡打探说：“可入朝以否?”子贡回答说：“来必取死”②。这就更加坚定了宗室诸王起兵的决心。

垂拱四年（688年）八月上旬，琅邪王李冲命令长史萧德琮等招募兵士，并派人分头转告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越王李贞及纪王李慎，各令起兵，进攻洛阳。李贞亦派人与东莞公李融、寿州刺史赵瑰等人相约。赵瑰之妻、常乐公主对来人说：“为我报越王，与其进不与其退。尔诸王若是男儿，不应至许时尚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 《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虢王凤传》。

未举动”，“诸王必须以匡救为急，不可虚生浪死，取笑于后代。”①于是，李唐宗室与外戚俱秣兵厉马，磨刀霍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久，范阳王李蔼亦遣使谒李贞父子，建议诸王同时举兵，“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②。李贞父子遂与诸王约期同时起兵。

就在李唐宗室诸王紧锣密鼓地酝酿起兵的关键时刻，鲁王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知越王必败，就派人向武则天揭发了诸王准备起兵之事。李冲得知事机泄漏后，匆忙于八月十七日起兵发难，李贞闻讯亦在豫州起兵响应。

武则天接到李蔼的密奏后，立即以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征讨。

李冲率所募 5000 兵马准备从博州渡过黄河，与济州（治今山东东阿西北）刺史薛顗联兵东进，薛顗也正在积极准备接应。但博州所属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北）县令郭务悌却婴城自守，拒不响应。故李冲只得率部东进，先攻武水。郭务悌急忙向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求救。魏州刺史立即派莘县（今属山东）令马玄素将兵 7000 赴援，准备在中道截击李冲。但玄素恐兵力不敌，故率兵直入武水，与郭务悌一起闭城自守。李冲率部抵达武水后，派兵士推草车堵塞武水南门，顺风纵火，欲乘火势冲入城中。但火起不久风向逆转，叛军不得入城，士气受挫。这时叛军将领董玄寂对部下兵士散布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③李冲立即将玄寂斩首示众，于是叛军兵士纷纷逃入草泽之中，不可禁止，最后仅留下数十名家僮。李冲自知兵力不支，只得返回博州。八月二十三日，李冲刚入博州城门，即被守门者所杀。这时，丘神勣亦率官兵抵达博州城下，博州官吏均素服出迎，被丘神勣全部处死，凡破千余家。

九月一日，武则天又派左豹韬大将军麹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

---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八月。

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将兵10万，征讨越王李贞，以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并削去李冲属籍，更姓虺氏。

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后，曾攻占上蔡（今属河南），且兵力有所发展。但当他听说李冲兵败的消息后，却慌恐不安，甚至“欲自锁诣阙谢罪”①。正在犹豫之际，适逢新蔡（今属河南）县令傅延庆募得勇士2000余人，举众响应。李贞遂打消了“谢罪”之意，准备继续起兵。他一面欺骗兵众说：“琅邪王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另一面又将征发所属县兵5000余众分为5营，派汝南县丞裴守德等分别率领，并署置九品以上官500余人。但所署官员均受胁迫，莫有斗志，只有守德与之同心，李贞将其女嫁他为妻，署为大将军，委以腹心。为了鼓舞叛军士气，李贞还强令道士、僧人诵经念佛，乞求事成。左右心腹及叛军士卒皆佩带辟兵祥符。当麹崇裕率领官军抵达豫州城下时，李贞派其少子李规及裴守德率叛军出战。结果，叛军一触即溃，大败而归。李贞闻讯大惧，婴城自守，不敢出城迎战。崇裕乘胜将豫州团团包围。李贞心腹看到亡在旦夕，即对李贞说：“王岂可坐待戮辱！”于是李贞、李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官军兵不血刃，收复豫州，将李贞、李冲父子之首传送东都阙下。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国公李譔以及常乐公主等均被捕入狱，迫其自杀。李唐宗室的起兵至此失败。

事后，武则天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当时正在清查李贞党羽，株连者有700家，被籍没者达5000余口，刑部派人催促行刑。仁杰赴任以后，向武则天上奏说这些株连者皆为“诖误”，代为“申理”。武则天诏准，遂将这些被株连者全部开成活罪，流放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这些被“诖误”之人途径狄仁杰曾任刺史的宁州（治今甘肃宁县）时，宁州父老迎劳说：“我狄使君活汝邪”，并相携哭于仁杰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②。

越王李贞父子的起兵其所以迅速失败，主要由于这些宗室诸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九月。

王多是纨绔子弟，他们或生性“贪鄙”、残暴，或放荡不羁，专事斗鸡走狗，畋猎耽乐；有的虽“好学”不倦，“聚书至万卷”，但仅能“修身洁己”，不谙军事。他们在起兵前未能制订周密的作战部署和统一的行动计划，仓促举兵，缺乏统一号令，因而被官军各个击破。另外，这些宗室诸王在担任地方长官期间，大多鱼肉百姓，虐待下属，有的甚至“所在或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诸僮侵暴部人”①，因而得不到百姓同情和支持。临时召募的兵士既缺乏训练，又多为“胁迫”之人，毫无战斗力。因而在强大官军的进攻下，迅速败亡。

三、武则天的专制统治

武则天镇压了徐敬业的叛乱以后，“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②。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曾向武则天上书，请求铸造铜匦，接受天下密奏。武则天立即采纳，遂在洛阳乾元殿旁朝堂前，置一铜匦。该匦为正方形，内有一室，中分4隔，每隔各有一窍，供告密者投递告密奏书。其东隔叫“延恩”，专供“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隔叫“招谏”，专供“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隔叫“伸冤”，专供“有冤抑者投之”；北隔叫“通玄”，专供“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③。窍空仅容奏书，可进不可出。又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轮流掌管开启。于是，铜匦就成了武则天接纳洛阳及其附近吏民告密奏书的工具。

接着，武则天又诏令给全国各地的告密者广开门路：凡官民有告密者，地方官不得过问；告密者皆可乘坐国家驿马，沿途供给五品官的待遇，即每天供细米2升，白面2升3合，酒一升半，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羊肉3分，瓜两颗，其余盐、豉、葱、韭、葵、姜等各有差。到达洛阳后，均在鸿胪寺或典客令的客馆下榻，即使农夫、樵人，武则天“皆自召见”。如果告密者合于“旨”意，即可破格提拔，迁官进爵。就是随意捏造，诬告不实者，亦不追究。于是天下告密者蜂拥而起，“人皆重足屏息”①。

武则天通过奖励告密，网络了一大批以残酷著称的官吏。与此同时，她还设置了凌驾于尚书刑部和大理寺以上的“制狱”。放手让这些酷吏利用“制狱”，对被告者罗织罪名，严刑逼供。于是这些官吏便狐假虎威，大肆杀戮，无恶不作。史称“酷吏政治”。

在武则天豢养的大批酷吏中，以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侯思止、王弘义等最为著称。

来俊臣，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从小“凶险不事生产，反覆残害，举无与比”。曾因犯“奸盗”被捕，后“遂妄告密”。武则天以为“忠”，累迁侍御史、朝散大夫、左台御史中丞等职。曾主持武则天设在丽景门的推事院，并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冤滥之声，盈于海内”②。

周兴，雍州长安（今属陕西）人。少习法律，曾任尚书省都事、司刑少卿、秋官侍郎等职。自“垂拱已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③。

索元礼，胡人。生性残忍，因告密称旨，被破格擢为游击将军，专于洛州牧院推案制狱。每审讯一人，逼迫其供出数十百人。因而“衣冠震惧，甚于狼虎”④。

侯思止，雍州礼泉（今陕西礼泉北）人。原为“闾巷庸奴”，以卖饼为业。后因诬告唐高祖之子、滑州刺史、舒王元名及裴贞谋反，被武则天任为游击将军，累迁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等职。在主持“制狱”期间，“苛酷日甚”⑤。

此外，尚有“谲异险诈”的万国俊、“白兔御史”王弘义、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②③④⑤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上》各自本传。

"四其御史"郭霸、"阴毒敢言事"① 的吉顼等。

这些酷吏在武则天的纵容下，利用掌管的"制狱"，对被告者大搞严刑逼供。仅所作大枷就有10种之多："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枷上又连接"铁笼头"，被捕入狱者，"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②。其所用刑法，更是名目繁多，苛酷无比。将囚犯的手足捆绑在木椽上，让狱吏扭转木椽，谓之"凤凰晒翅"；用绳索绊住囚犯腰部，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让囚犯跪在棒枷上，头顶大瓮，谓之"仙人献果"；使囚犯站在高木上，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将囚犯倒悬于梁柱之上，脖项缒石，以醋灌鼻；或用铁圈套囚犯之首，四周加楔，有的囚犯"至有脑裂髓出者"③。有的酷吏还让囚犯"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④。有的"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毡褥，遭之者斯须气绝矣，苟自诬引，则易于他房"⑤。真是骇人听闻，酷绝人寰。

据载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被酷吏迫害甚至处死的将相大臣就有狄仁杰、张光辅、徐敬真、张虔勗、范云仙等，受到株连的中外大臣有益州长史任令晖、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凤阁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孙元通、给事中周湲、泾州刺史王勔、监察御史王助等数十百人，被涉嫌流放的海内贤士、名家及其亲故有千余人。酷吏万国俊在天授二年（691年）一次就杀死岭南流人300多，其党羽刘光业杀900人，王德寿杀700人。此外，还有鲍思恭、王大

---

①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上》各自本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上·来俊臣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④⑤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上·索元礼传》、《王弘义传》。

贞、屈贞筠等“少者咸五百人”①。至于李唐宗室，更是被杀略殆尽。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恐怖的政治气氛，神都洛阳更是危机四伏，“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②

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和推行酷吏政治的目的是为她登上女皇宝座而扫清道路，而一旦政敌伏首、女皇宝座得到巩固以后，她也会适应“省刑尚宽”的政治需要，对酷吏予以翦除。其中“请君入瓮”③ 就是典型一例。大致到神功元年（697 年），武则天诛杀了最后一个酷吏来俊臣，酷吏政治遂告结束。

第三节　巩固边疆的作战

万岁通天二年（696 年）六月，武则天派军讨平了东北地区的契丹叛乱；在此之前，即长寿元年（692 年）十月，武则天又派兵出征西域，从吐蕃手中收复了安西四镇，恢复了唐朝在西域的行政建制，巩固了西北边疆的安全。但由于武则天对东突厥汗国余众的入侵采取消极防御政策，加之接连诛杀了在抵御突厥入侵中屡立战功的著名边将程务挺和黑齿常之等，自毁长城，故使突厥的入侵愈演愈烈，以致酿成了北方的严重边患。直到唐中宗复位以后，任命张仁愿担任北方唐军统帅，修筑了三受降城后，突厥的南侵才受到一定遏制。

一、契丹的侵扰与武则天的对策

（一）契丹的兴起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契丹为东胡族的一支，与鲜卑宇文氏为同一族源，北魏时始

---

①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上·万国俊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四月。

③ 参阅《新唐书》卷二〇九《酷吏·来俊臣附周兴传》。

称契丹，含有镔铁或刀剑之意。另外，由于契丹最先居住于辽河流域，故有认为“契丹”一词亦有水草丰美之地的含义。同时，契丹与奚族东西相邻，故“契丹”亦有“奚东”之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契丹族以经营畜牧业著称于世。他们不但以“名马、文皮”进献中原王朝，而且也以这些畜牧产品同中原地区进行“互市”，维持他们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但由于这时的契丹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生产力十分低下，故经常受到中原封建王朝和漠北突厥奴隶主政权的侵扰和欺凌。降及隋朝，契丹族为了防御外族侵扰，各部落经过长期的离析合并，逐渐由原来的“古八部”发展为10个部落。到唐朝初年，契丹族又由隋时10部演变为新的“八部”①。这八部的共同君主为大贺氏，拥“有胜兵四万”②，东为千山山脉，西与奚族相接，南临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北距靺鞨、室韦，阻冷陉山（位于今辽宁与内蒙古赤峰之间的努鲁儿虎山）以自固。大贺氏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集；平时畜牧、狩猎，则各部自行。称臣于东突厥汗国，被封为俟斤。但与西邻奚族经常征战不已，“每斗不利，辄遁保鲜卑山”③。

契丹族兴起之初，与唐朝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

武德四年（621年），契丹氏族贵族、部落长之一的“别部酋帅孙敖曹”，曾“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唐高祖“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④。武德六年（623年），契丹族君长大贺氏“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⑤。

贞观二年（628年），契丹族君长摩会摆脱了东突厥汗国的控制，“率其部落来降”。东突厥颉利可汗遣使请以梁师都交换契丹。唐太宗回答说：“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中国人，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我师往

---

① 参看《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②③ 《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契丹传》。

④⑤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

讨，便来救援。计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契丹易之。"①严辞予以拒绝。

贞观三年（629年），"摩会入朝，赐鼓、纛，由是有常贡"②。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东征辽东，契丹和奚族均派首领率部参战。唐太宗在回师途中，路过营州，特地接见契丹酋长和耆老，"赐物各有差，授其酋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酋长"窟哥等部咸请内属"，唐太宗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无极县男，赐姓李氏。

显庆初年，唐高宗"又拜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③。在此期间，契丹8部相继归附，分别被封为峭落州、天逢州、羽陵州、白连州、徒何州、万丹州、匹黎州、赤山州等8部，统隶于松漠都督府④。与此同时，契丹西邻奚族首领可度者亦率部内附，高宗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将军兼饶东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接着，唐高宗"复置东夷都督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⑤。管辖契丹和奚两族事务。

显庆五年（660年），松漠都督、契丹族酋长窟哥死，继任松漠都督的阿卜固率契丹诸部与奚族连兵反叛。同年五月，唐高宗遣突厥降将阿史德枢宾为沙砖道行军总管，讨伐契丹。不久，契丹兵败，阿卜固被擒送洛阳。唐高宗遂以窟哥之孙李枯草离为左卫将军、弹汗州刺史，封归顺郡王；另一孙李尽忠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继统契丹8部。

垂拱初年，武则天又将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曾孙孙万荣授予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从此，契丹与唐又恢复了藩属关系，保持着正常的朝贡往来。

---

①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

②《辽史》卷六十三《世表》。

④ 参阅《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奚传》。

（二）契丹的起兵与武则天一讨契丹的失利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年初，契丹发生饥荒，广大百姓生活无着，穷困潦倒。刚愎自用的营州都督赵文翙不但不予赈给，反而“视酋长如奴仆”①，又多次侵侮其管辖的契丹部属，遂激起了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和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的不满。孙万荣曾以侍子入朝中原，颇知中国山川险易，早有叛离之心。借此与其妹婿李尽忠相互勾结，煽动契丹部族反叛。于五月十二日率部攻陷营州，杀文翙。

消息传至洛阳，武则天大怒。五月二十五日诏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 28 将率兵征讨。七月十一日，又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道安抚大使，纳言姚琦为副使，屯兵胜州（治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作为第二道防线。同时下诏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不久，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占据营州，以孙万荣为前锋，率众东进，攻城略地，所向皆下，10 多天兵至数万，进围檀州（治今北京密云），被清边道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败。

八月，李尽忠听说武周大军北讨的消息后，一面在西硖石黄麞谷（在今河北卢龙西）埋伏兵力，准备伏击官军；一面设计麻痹官军将领。原来李尽忠在攻陷营州后，曾获俘数百，囚之地牢。这时他便派守牢狱吏欺骗这些俘虏说：“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接着，就将这些战俘从地牢中放出，饲以糟糠之粥，并叮嘱说：“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说罢遂将这些俘虏全部释放。这些战俘逃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后，正与官军相遇，遂把契丹乏食之状俱告官军统帅曹仁师等。“诸军闻之，遂生轻视之心，争欲先进”。八月二十八日，唐军行抵黄麞谷西。这时李尽忠又派老弱之众迎降，还有意将老牛、瘦马置于道侧，示以饥馑疲惫之状。官军见此，诸将遂弃步卒，将骑兵进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

入谷口。埋伏在谷中的契丹军队从四面出击，官军大败，张玄遇和麻仁节被飞索擒获，将士跌入山谷而死者，不计其数，几乎全军覆灭。契丹又将官军军印诈为军牒，并强迫被俘的张玄遇和麻仁节等官军将领在牒上署名，对官军的殿后部队总管燕匪石和宗怀昌等牒告云："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匪石、怀昌得牒后，信以为真，遂率步卒，昼夜兼行。契丹乘官军士马疲惫之时，于中道设伏邀击，官军"全军皆没"①。

（三）契丹侵扰河北与武则天反击的胜利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武则天下诏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右拾遗陈子昂为总管府参谋，率部征讨契丹。

这时，龙山军讨击副使许钦寂与契丹战于崇州（治今辽宁义县境内），军败被擒，契丹兵众乘机进围安东（今河北卢龙），强令钦寂在安东城劝守军投降。安东都护裴玄珪率众守城。钦寂在城下对官军大声喊道："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忠节。"② 不屈而死。

十月二十二日，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并收集余众，军势复振，并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今属河北），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向魏州挺进，河北震动。武则天下制以彭泽县（今江西彭泽东北）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魏州刺史独孤思庄惧怕契丹猝至，遂将附近百姓驱入城中，修缮守备。仁杰至，全部遣民归农，并说："贼犹在远，何烦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③ 百姓大悦。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三月初，武则天又遣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17万，讨伐契丹。三月十二日，孝杰率部与契丹孙万荣部在东硖石谷（在今河北卢龙东）遭遇。谷道狭窄险峻，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十月。

契丹凭险守卫，孝杰亲率精锐为前锋，奋勇冲杀，且战且进。及出谷口，契丹四面围攻，孝杰布置方阵，拼死抵抗。但后军总管苏宏晖畏敌兵众凶悍，弃甲而遁，孝杰孤立无援，阵脚大乱。最终因寡不敌众，孝杰坠谷死，官军将士被杀及跳崖而死者殆尽。节度管记张说驰奏其事，武则天下诏追赠王孝杰为夏官尚书，封耿国公。并遣使斩苏宏晖以徇。使者尚未到达幽州，而宏晖已立功赎罪，"竟免诛"①。

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武攸宜率部抵达渔阳（今天津蓟县），听到王孝杰部败没的消息后，军中震恐，不敢前进。孙万荣遂于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西北400里险要之处修筑新城，将其老弱、妇女留住城中，并贮存了大量物资器仗，派其妹夫乙冤羽守卫。并遣使说突厥默啜，与其连兵。然后亲引精兵，进犯幽州。沿途攻城略地，抢掠吏民。武攸宜遣将击之，不克。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四月十八日，武则天又遣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增援河北。五月八日，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20万，讨击契丹。

六月下旬，武懿宗率部抵达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听说契丹别将骆务整率数千骑将至冀州，心中大惧，打算向南逃遁。有人劝止他说："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② 但懿宗不从，退据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并丢弃了大量军资器仗。契丹军遂屠赵州。

这时，孙万荣所遣出使突厥的五名使者中的前3人先至默啜黑沙（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牙帐，对默啜说："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默啜大喜，赐以绯袍。另二名使者后至，默啜怒其迟缓，将欲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遂将李尽忠已死，官军正在大举征讨等，一一俱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王孝杰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六月。

实相告。默啜遂杀前三人而赐后二人绯袍，并使为向导，发兵攻占了孙万荣在营州西北400里处修筑的新城，尽俘以归，军势大振。

孙万荣此时正与武攸宜所率官军在幽州相持，听说新城有失，慌恐不安。被孙万荣挟持叛乱的奚族兵众又叛归武周。于是，武周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族兵众击其后，获其将何阿小，契丹大溃，孙万荣帅轻骑数千东逃。六月三十日，武周前军总管张九节率兵于中道阻击，万荣穷蹙，与其家奴逃至潞水(今北京东之潮白河)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①家奴斩其首以降，其余众及奚、霫等皆降于突厥。

契丹初平，武则天制命河内王武懿宗以及娄师德、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懿宗生性残暴，所到之处，凡是被契丹胁从而复来归者，懿宗均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时人都把他同契丹"多屠害士女"的别帅何阿小相提并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②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七月，武攸宜率众从幽州凯旋而归。武懿宗奏请将被契丹胁从的河北百姓全部族灭。左拾遗王求礼在朝堂当众折之曰："此属（指河北胁从百姓）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委罪于草野诖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③ 司刑卿杜景俭亦奏请"悉原"河北胁从百姓。懿宗不能对。武则天最后接受了杜景俭的奏言，将河北胁从百姓全予赦免。

二、对东突厥侵扰的反击作战

（一）东突厥的再兴及其对唐朝的侵扰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唐将高侃击灭东突厥车鼻可汗以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从祖弟懿宗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七月。

后，曾将跟随车鼻返回漠北的突厥部众安置在郁督军山之下，置狼山都督府领其部众。不久，又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其中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3都督府和苏农等14州；瀚海都护府领瀚海、金徽、新黎等7都督府和仙萼等8州。各州刺史和都督均以突厥各部酋长担任，进行羁縻统治（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项）。

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原居于云中故城（今内蒙古托克托）的阿史德氏部所属300余帐突厥族人势力渐盛。其酋长来到长安，“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高宗回答说：“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①。遂于正月十六日改云中都督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幼童殷王李轮遥领单于大都护，而以宿将萧嗣业为单于大都护府长史，具体管理军政事务。

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所属阿史德温傅和阿史德奉职二部同时叛乱，立突厥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14州酋长皆率部响应，人数达到数十万众。

由于这次叛乱猝然而起，唐朝失于防范，故立即陷入被动局面。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和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仓促将兵镇压。唐军初战获胜，遂生骄心，“因不设备”。不久，天降大雪，粮道又为突厥所阻，士卒冻馁，突厥乘机发动夜袭，嗣业狼狈拔营逃走，兵众大乱，被突厥叛众杀死者不可胜数。花大智和李景嘉率部且战且退，终于奔回单于大都护府。三将回朝复命，“嗣业减死，流桂州，大智、景嘉并免官”②。

突厥叛众击败萧嗣业后，声势益振。又向定州（今属河北）进攻，刺史、霍王元轨下令守城军队开门偃旗，突厥疑有伏兵，惧而宵遁。不久，奚与契丹亦起而响应，进犯营州。唐高宗急忙派右金吾将军曹怀舜率兵前往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守卫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又派右武卫将军崔献前往绛州（治今山西新绛），

---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正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十月。

守卫龙门，阻河为固，屏卫京畿。营州都督周道务遣户曹唐休璟出御奚和契丹，“破之于独护山，斩获甚众”①，叛乱者的攻势虽被遏制，但漠南广大地区已非唐所有。

调露元年（67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唐高宗又以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为定襄（今属山西）道行军大总管，将兵18万，并西军检校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总30余万大军，讨伐突厥。诸路大军“连亘数千里，并受行俭节度，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②。

裴行俭这次汲取了萧嗣业兵败的教训，先固粮道。当他率部抵达朔州（今属山西）后，诈为粮车300乘，每辆车内藏伏壮士5人，各带陌刀、劲弩，以老弱之兵数百护送，粮车周围险要之处埋伏精兵。突厥看见官军粮车缓缓而行，护送兵士均老弱疲惫，不堪一击，遂向粮车扑来。护送兵士弃车逃走，突厥叛众遂驱车而去。行至泉水处，解鞍牧马，正欲从车中取粮，车中壮士一齐杀出，埋伏在附近的官军精锐亦同时赶到，里应外合，突厥叛众被杀获殆尽，余众奔溃。从此以后，“续遣粮车，无敢近之者”③。因而保证了粮草供应，使诸路唐军得顺利深入漠南腹地。

调露二年（680年）三月，唐军抵达黑山（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后，与云中都督府叛军遭遇，经过激战，突厥大败，其酋帅阿史德奉职被擒，可汗泥熟匐被部下所杀，“以其首来降”④；另一叛首阿史德温傅率残部退保狼山（今内蒙古包头东）葛逻禄部。裴行俭率部屯驻单于都护府城，亦不穷追，飞书报捷。唐高宗派户部尚书崔知悌驰赴定襄，宣慰将士，处理善后事宜。裴行俭奉诏凯旋归国。

同年七月，突厥余众又在阿史德温傅的率领下，东山再起，围攻云州（治今山西大同），被代州（治今山西代县）都督窦怀悊和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唐休璟传》。

②③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三月。

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将兵击破”①。

调露二年（680年）八月二十三日，唐高宗改元永隆。此后不久，阿史德温傅又迎突厥已故可汗颉利之侄阿史那伏念于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北古白城子），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之”②。

永隆二年（681年）正月，突厥叛众进寇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庆（州治今甘肃庆阳）等州，关辅震动，唐高宗被迫停止封禅大典，令右卫将军李知十、右威卫将军李杲分往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庆二州，防“备突厥”③。四月二十二日，又以裴行俭出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右威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为副，率兵出讨。行俭派曹怀舜与李文暕率前军北行，自率主力屯驻代州陉口（今山西代县西北）。

同年三月，曹怀舜与裨将窦义昭率前军行至瓠芦泊（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后，有人传言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在黑沙躲藏，左右只有30余骑，可迳直轻取。怀舜信以为真，便将老弱之兵留驻瓠芦泊，自率轻骑，昼夜兼行，直奔黑沙。行至该地，人困马乏，一无所见，遂引兵撤退。途中又与正欲投奔阿史那伏念的薛延陀部相遇，延陀酋帅看到唐军兵马众多，因而请降，怀舜遂与其偕行南下。抵达长城以北时，又与阿史德温傅所率突厥叛众遭遇。双方仓促交战，因互不知对方虚实，各自退兵。

阿史那伏念听到唐军轻骑北进的消息后，率精锐掩袭，在横水（今山西朔州平鲁北）追及唐军。曹怀舜与裨将窦义昭以及李文暕与裨将刘敬同将唐军分为四路，布为方阵，且战且退。相持一日，伏念乘顺风麾军大击，唐营溃乱，死者甚众。怀舜等收集余众，敛集金帛，厚赂伏念，与之约和，杀牛为盟，伏念北去，怀舜等始得返回。不久，怀舜以罪免死，流于岭南。

这时，屯军于陉口的唐军主帅裴行俭一面遣使间道诣回纥可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七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开耀元年正月。

汗牙帐，约“碛北回纥南向逼之”①；一面又派裨将何迦密自通漠，程务挺自石地道，北进金牙山，掩取阿史那伏念妻室、辎重。伏念与曹怀舜约和而还后，到达金牙山，妻室、辎重全失，士卒又多染疾疫，遂引兵北走，保聚细沙（今山西右玉北长城杀虎口外）。裴行俭又派副总管张虔勗与程务挺等将单于都护府之兵追击。漠北回纥亦如期南下，南北合围。裴行俭又亲率唐军主力继至，阿史那伏念处境日窘。行俭乘机施用反间计，挑拨伏念和温傅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猜忌。伏念恐惧，秘密送款，仍请自效。行俭不泄其事而密表以闻。几天以后，烟尘大起，行俭召三军谓曰：“此是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敌，但须严备。”②仅遣单使迎前慰劳。伏念果然率部缚温傅诣军门请罪。于是，行俭尽平突厥余众。

同年九月二十七日，裴行俭将突厥降俘献于洛阳。十月一日，将突厥叛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 54 人斩于都市。当初在阿史那伏念欲降而未降时，行俭曾许以不死。但献俘洛阳以后，宰相裴炎忌行俭之功，奏言说：“伏念为副将张虔勗、程务挺所逼，又回纥等自碛北南向逼之，穷窘而降耳。”遂诛之。行俭叹曰：“但恐杀降，无复来者”，遂“称疾不出”③。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 年）十月，突厥叛将阿史那骨咄禄及阿史德元珍又收集余众，纠合 700 人，占据黑沙城，出掠九姓铁勒的马畜，势力逐渐壮大，乃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随后突厥部民归之者约数万人，又经东击契丹，北征铁勒，最后占领了漠北的乌德鞬山（即郁督军山，亦称都斤山，即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并建牙于此，以黑沙城为南牙，派其弟突利设默啜驻守其地。重新建立起一个奴隶制的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汗国”。

不久，骨咄禄派兵南寇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及单

---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七《裴炎传》。

②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开耀元年十月。

于府北境，杀死了前来镇压的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刺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奉命在云州邀击，仁贵率众奋力进攻，歼敌万余人，俘获2万。元珍大败。

弘道元年（683年）二月，突厥叛众又相继入寇定州、妫州（治今河北怀来东南），被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三月，骨咄禄与元珍又率部围攻单于都护府，执杀司马张行师。高宗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将兵分道援救，亦为突厥击败。

同年五月，骨咄禄又寇妫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将兵在朝那山（在今内蒙古五原南、黄河北）截击，官军大败，智辩被俘。

阿史那骨咄禄连败唐三大都督，朝廷震动，以致多数大臣提议废罢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夏二州。丰州司马唐休璟固争说："丰州控河遏贼，实为襟带，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田畴良美，尤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今若废弃，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① 高宗从之，废弃之议乃止。

同年六月，骨咄禄又派突厥别部寇掠岚州，被偏将杨玄基击走。

十一月十五日，高宗又以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征讨突厥。骨咄禄的南侵势头始被遏制。

是年十二月四日，改元弘道。不久，高宗崩于贞观殿，太子李显柩前继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专决军国大事。

（二）武则天对后突厥汗国的和战政策

武则天执掌国政以后，以骨咄禄为首的后突厥汗国继续大举入侵，河北、河东和西域地区均受其害。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改唐建周的政治目的，只是专心在国内推行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

---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唐休璟传》。

甚至不惜诛杀立有赫赫战功的边境宿将，以树其威，这就大大地削弱了边防力量，致使骨咄禄的入侵势头愈演愈烈。改唐建周以后，继任后突厥可汗的默啜在武力南侵的同时，又玩弄和亲手段，麻痹武后，壮大实力。武则天对默啜的入侵仍然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而对默啜施用的和亲伎俩和无理要求不作认真分析，屡屡中计，致使默啜的势力日益增强，以致成为武周时期严重的北方边患。直到唐中宗复位以后，任用宿将张仁愿主持边务，才遏制了后突厥汗国的侵掠势头。

光宅元年（684年）七月，即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唐睿宗即位以后不久，阿史那骨咄禄又率突厥叛众入寇朔州。同年九月，武则天又重新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防卫突厥。由于程务挺善于御众，威信大行，将帅用命，故多次打败突厥的入侵，骨咄禄相率远去，“不敢近边”①。同年底，程务挺由于对宰相裴炎下狱事“密表申理”，又与徐敬业叛乱集团中的唐之奇、杜求仁等关系友善，有人便诬告务挺与裴炎和徐敬业通谋叛乱。武则天当即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驰赴军中，将务挺斩首，并籍没其家。突厥叛众听到这一消息后，“所在宴乐相庆，仍为务挺立祠，每出师攻战，即祈祷焉”②。不久，夏州都督王方翼也因与务挺素相友善，被流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而死。

垂拱元年（685年）二月，武则天又以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今山西阳曲西南）道行军总管，讨击突厥。四月八日，突厥叛众又入寇代州，淳于处平率部援救，行至忻州（今属山西），被突厥击败，死伤5000余人。同年十一月，武则天又以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出击突厥。不久，引兵而还，被调任出征吐蕃，另委高丽族将领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主持边务。

垂拱二年（686年）年底，突厥叛众又入寇边塞。黑齿常之率部出击，行至两井（今河北鹿泉北），与突厥3000叛众遭遇。突厥叛众皆下马擐甲，准备步战。常之以200骑兵发起攻击，突厥

---

①② 《旧唐书》卷八十三《程务挺传》。

均弃甲逃走。傍晚时刻，突厥大至，常之下令营中燃起篝火，东南方向亦有火起，突厥疑有伏兵，连夜逃遁。

垂拱三年（687 年）二月，突厥骨咄禄又入寇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武则天又命黑齿常之率诸军出击，突厥退回。

同年七月，骨咄禄又与元珍率众入寇朔州。武则天以黑齿常之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左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为副，统兵北伐，与突厥在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遭遇。唐军奋勇冲杀，突厥大败，追奔 40 余里。左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疾常之之功，表请穷追余寇。武则天下诏令其与常之计议，互为声援。但宝璧欲专其功，并不告知常之，自引精兵 1.3 万先行，出塞 2000 余里。同年十月，追及突厥。斥候奏报阿史德元珍等部均不设备，但宝璧却自持兵力强盛，派人告知突厥，“使得严备”，然后与战。由于突厥兵马精锐，又事前作好战斗准备，故唐军大败，死伤殆尽，宝璧“单骑遁归”。武则天一怒之下，不但诛杀宝璧，而且又改“骨笃禄曰不卒禄”①。

永昌元年（689 年），武则天又以僧人薛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于五月、九月两次北征突厥。由于骨咄禄率众西征西域，漠北空虚，唐军两次抵达紫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均未遇敌，怀义遂“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②。是年九月，唐边境宿将黑齿常之被酷吏周兴诬告谋反，武则天下诏拘捕入狱。不久，常之自缢而死。

天授元年（690 年）九月，武则天改唐建周，接受尊号圣神皇帝。同年十月，后突厥汗国可汗骨咄禄病死，阿史德元珍亦在征讨西域时，临阵战没。骨咄禄之子年幼，其弟默啜自立为可汗。

证圣元年（695 年）正月，武则天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讨击突厥。是年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请降，则天大悦，册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于是，突厥一度停止南侵。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三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永昌元年五月。

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九月，默啜乘契丹叛乱之机，又大举入寇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许钦明率部出击，兵败被俘。不久，默啜又遣使请拜武则天为母，并为其女请婚，还悉归河西降户，声称要为国讨伐契丹。武则天当即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摄司宾卿田归道册授默啜为迁善可汗。十月，默啜乘李尽忠新丧之际，袭击松漠，尽虏尽忠、万荣妻室和辎重而还，兵众渐盛。武则天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神功元年（697 年），突厥默啜又相继率兵进攻灵、胜二州，均被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击破。默啜看到用武力入寇收获甚微，遂又玩弄求和手段。同年三月，他遣使请求归还原被唐朝安置在丰、胜、灵、夏、朔、代 6 州的突厥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请求赐给谷种、缯帛、农器等物。武则天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竟答应了默啜的请求，悉驱 6 州降胡数千帐归还默啜，并赐给谷种 4 万斛，杂綵 5 万段，农器 3000 件，铁 4 万斤，还答应了其女的婚事，“默啜由是益强”①。

圣历元年（698 年）六月六日，武则天令其侄孙、淮阳王武延秀北去突厥，纳默啜之女为妃，又派阎知微和右武卫郎将摄司宾卿杨齐庄携带大量金帛，作为聘礼，护送前往。

同年八月一日，延秀一行抵达突厥南牙黑沙。默啜看到延秀后，对知微、齐庄说：“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此是天子儿否?我突厥积代已来，降附李家，今闻李家天子种未总尽，唯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立。”②于是收捕延秀，以阎知微伪号南面可汗，率众 10 余万，进犯静难（军所在今陕西彬县）、平狄（军所在今山西代县）、清夷（军所在今河北怀来）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崱闻风率部投降，突厥兵势大振，进而又寇妫、檀等州。默啜又移书朝廷，扬言“欲取河北”③。河北诸州大恐，纷纷征发民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圣历元年八月。

众缮修城备。武则天闻讯发兵3路: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位于今山西太原)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将兵30万,讨伐突厥。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15万殿后。

八月二十六日,默啜率部入寇飞狐(今河北涞源),二十八日,攻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

同年九月,默啜派阎知微招谕赵州,被将军陈令英严辞拒绝。不久,默啜率部围攻赵州,长史唐般若翻城响应。刺史高睿与其妻城破被擒,不屈而死。突厥退后,高睿被追赠冬官尚书,谥曰节。唐般若被族诛。

九月十五日,武则天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十七日,命太子任河北道元帅,征讨突厥。原先募人月余,兵众不满千人。这次听说太子李显出任元帅,应募者云集,很快便超过5万。二十一日,武则天又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因太子坐镇洛阳,并不出行,故命狄仁杰知元帅事,并亲自为其饯行。

九月二十六日,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今河北易县西南)道北归,所过之处,杀掠不可胜纪。天兵两道总管沙吒忠义只是引兵追蹑,并不逼近。默啜返回漠北,拥兵40万,拓地万里,西北诸少数族皆来归附,甚有轻唐之心。

圣历元年(698年)十月,武则天一面下制在洛阳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和九江王武攸归统领,加强洛阳防务;一面又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安抚河北州县。当时河北被突厥驱迫而胁从为乱之人害怕杀头,四散逃匿,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狄仁杰上疏请求"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武则天诏准。仁杰于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又禁止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①。

不久,阎知微被默啜遗弃,使还洛阳,武则天杀之于天津桥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圣历元年十月。

南。

圣历二年（699年），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立骨咄禄之子默矩为右厢察，各领兵2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之上，领兵4万，统西突厥处本昆等十姓，又号拓西可汗。这说明以默啜为首的后突厥汗国经过对武周政权多年的军事进攻，不但巩固了在碛北、漠南的统治区域，而且其势已伸展到了西域地区，已经建立并巩固了在北亚大陆的霸权地位。

久视元年（700年）十二月，后突厥汗国拓西可汗匐俱率众抢掠陇右诸监牧马万余匹而去，准备再次大举入侵。

大足元年（701年）五月，武则天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防卫突厥。

长安二年（702年）正月上旬，突厥左厢察默矩率部进犯胜州，杀都督王铣。接着，又“寇盐、夏等州，杀掠人吏”①，并取道石岭关（在今山西忻县南），进犯并州。唐将韩思忠凭险据守，拼死抵抗，但终因“军孤势弱”，援军断绝而“兵灭”②，韩思忠仅率少数骑兵突围而出。突厥乘胜鼓噪南下，进围并州。武则天急忙“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度”；同年四月，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③。默啜始引兵而归。

长安三年（703年）六月，后突厥汗国默啜之子、拓西可汗匐俱西征西突厥的战事全线败退，不仅被侵吞的西突厥部落全部叛去，而且东突厥原有的属地也出现了叛离的危险。故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④，并放回了被拘留的淮阳王武延

---

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② 参看《张说之集》卷二十二《为魏元忠作祭石岭战亡兵士文》等。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二年二、三、四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三年六月。

秀。武则天当即许诺，制立皇太子李显之子、平恩郡王重俊与义兴郡王重明“盛服立诸朝”①，接见突厥使者。这就使默啜能够从容地抽调漠南兵力，迅速平定内乱，恢复元气，再图入侵。

（三）中宗复位后收复漠南的作战

长安四年（704年）年底，武则天染病卧床，不能理事，宰相数月不得晋见，只有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侍侧。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张易之兄弟更加专权用事。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崔玄晴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等率左右羽林兵500余人冲入宫中，杀张易之兄弟及其党羽，逼武则天让位，扶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后来，张柬之等五人以功同日封王，故史称这一事件为“五王政变”。这一政变的成功，就标志着武周政权的灭亡和李唐社稷的复兴。

突厥默啜虽以拥立中宗复位相号召，向武周政权发动进攻，但这仅是其入寇边境、抢掠财物的口实而已。他并不会因为中宗反正而停止入侵。对此，唐中宗从复位之初，即对突厥保持高度警惕。神龙元年六月四日，中宗曾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②。

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九日，突厥默啜果然率部入寇鸣沙（今宁夏吴忠西南）。唐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率部抵抗，双方经过激战，唐军大败，死伤数万。接着，突厥又乘胜南下，进犯原、会（州治今甘肃靖远）等州，抢夺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沙吒忠义坐此免官。

景龙元年（707年）正月，唐中宗为了对突厥大举用兵，一面“制募猛士、武艺超绝者，各令自举”③，一面又令“内外群官各进破灭突厥之策”④。右补阙卢俌上疏说，选拔统军主帅，应“不取

---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景龙元年六月。

③④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

一夫之勇”；择任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当务之急应是“搜卒乘，积资粮，来则御之，去则备之”；要等到“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①。中宗表示接纳。

十月十三日，唐中宗选择“善阵能师”的左屯卫将军张仁愿担任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仁愿到达军所后，立即率部追击掠夺陇右监牧马匹的突厥叛众，大破而归，重新夺回了被掠的监牧马匹。

景龙二年（708年）三月，默啜率众西征西突厥突骑施于西域北境，漠南空虚。张仁愿上疏请求乘虚夺取漠南之地，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首尾相应的“三受降城”，以断绝突厥的南侵之路。因为朔方军以前一直与突厥以黄河为界，唐军守河南，突厥守河北。河北岸有一拂云神祠，突厥每次入寇，必先在祠堂“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如乘虚占领漠南，并在河北岸修筑三城，首尾相应，即可断突厥南侵之路。奏疏送至京师后，中宗集大臣商议。太子少师唐休璟认为在突厥境内筑城，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因而表示反对。但仁愿执意请求，中宗最后答应了仁愿的奏疏。于是仁愿又上表请留戍边岁满的兵士以助其功。结果“六旬而三城俱就”，遂以拂云祠为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与东、西两受降城相去各400余里，皆据津要，遥相应接，向北拓地300余里，又于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烽候1800余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②

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十五日，唐中宗下诏以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北庭都护并碎叶镇守使吕休璟为主帅，统朔方、金山两道诸军兵马及突骑施、黠戛斯二部蕃将共18万兵马，分东、中、西三路北伐突厥，旨在“稽其六月之师，逋寇祸盈，穷此百年之运”③。但至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景龙元年正月。

② 《旧唐书》卷九十三《张仁愿传》。

③ 唐中宗：《命吕休璟等北伐制》，载《全唐文》卷二五三。

六月二日，中宗被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死，殇帝即位，韦后临朝称制。不久，相王李旦第三子李隆基与其姑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废殇帝，杀韦后，扶相王即位，是为唐睿宗，改元景云。张仁愿"以老致仕"，唐休璟接替朔方道大总管之职。默啜可汗又请求和亲，主和派重新抬头，北伐遂告废止。

三、对吐蕃的作战

（一）收复西域四镇的作战（参见附图9）

唐高宗于显庆年间灭亡了西突厥汗国以后，曾册拜突厥降酋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分别任兴昔亡可汗和继往绝可汗，并创设昆陵、濛池二都护府，隶属安西大都护府，对西域实行羁縻统治。同时，又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派驻重兵，保护西域主权，是为安西四镇（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项）。此后不久，兴昔亡和继往绝二可汗相继死去，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部收集余众，又勾结吐蕃，侵入西域，使西域地区动荡不安。后来，吐蕃又大举北攻，接连攻陷西域18州之地，并占领了于阗、龟兹等地，唐朝被迫罢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安西四镇。于是吐蕃疆域东抵凉、松、茂、巂诸州，南邻天竺，北至安西四镇，西抵突厥，幅员万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弘道元年（683年）年底，高宗驾崩，中宗即位，武则天专制朝政。这时，西突厥"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武则天决心驱逐吐蕃，恢复唐时对西域的羁縻统治。擢授阿史那弥射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令袭兴昔亡可汗，统领左厢五咄陆部落；又以阿史那步真之子阿史那斛瑟罗为右钤卫将军兼濛池都护，令袭继往绝可汗，统领右厢五弩失毕部落。结果，由于阿史那元庆"不能招胁十姓"，致使"四镇尽沦"①；斛瑟罗西行履职后，采纳金牙道司兵达奚思敬之计，

① 参看《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传》。

“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①，再度撤回了安西四镇②，西域形势又趋混乱。

永昌元年(689年)五月，武则天又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以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督36总管讨伐吐蕃。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兵马粮草和兵甲器仗，还取消了监军制度，把西征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由待价掌管。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准备，韦待价于同年七月率部从碛西进入西域。他先派兰州(今属甘肃)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侦察敌情。师将“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军追蹑，至于焉耆”③。但抵达寅识迦河(今新疆霍城西)后，由于待价“非将帅之才”，指挥失据，故与吐蕃接战后，唐军大败。加之粮草不继，“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只有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抚安西土”④。此战之后，四镇又失，安西大都护府还治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武则天盛怒之下，处死了副总管阎温古，韦待价被削职除名，贬流绣州(治今广西玉林北)。

天授元年(690年)十月，即武则天改唐建周的第二个月，唐朝册立的第二任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又在东突厥默啜可汗的侵逼下，率残部六七万人退出碎叶，迁居内地，被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天授二年(691年)五月，武则天又以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率部西征吐蕃。但军行中道，酷吏来俊臣诬告岑长倩与宰相格辅元、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谋反”，驰驿召还，被捕入狱。同年十月，岑长倩等皆“坐诛”⑤。

---

① 《全唐文》卷一六五《达奚思敬碑》。

② 参看吴玉贵：《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载《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8月出版。

③ 崔融：《拔四镇议》，载《全唐文》卷二一九。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永昌元年七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二年十月。

吐蕃于再克四镇以后，为了进一步向西突厥十姓故地进行扩张，扶立兴者亡可汗阿史那元庆长子阿史那俀子为西突厥可汗，立国碎叶川西弩失毕之地，兴兵犯唐，企图独霸西域。这时，西州都督唐休璟上表朝廷，请求发兵抵御吐蕃，收复四镇。武则天遂于长寿元年（692年）以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众讨伐吐蕃。王孝杰曾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与吐蕃在大非川作战中兵败被俘。因为吐蕃赞普见他相貌很像其父，故厚加"礼之"，竟得放归。故孝杰因久在吐蕃，"悉其虚实"①。

长寿元年（692年）十月，王孝杰率部抵达西域后，接连"大破吐蕃"，相继克复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并"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②。王孝杰以功被迁左卫大将军，并升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清源男，声名大振。

（二）唐军反击吐蕃的胜利

吐蕃执政论钦陵对丢失安西四镇并不甘心，曾多次发兵反攻，企图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

长寿三年（694年）二月，论钦陵派吐蕃大将勃论赞刃和所立傀儡可汗阿史那俀子各率3万兵马，分别从冷泉和大岭（在今甘肃临潭西）向北进攻，被王孝杰率部击败；与此同时，论钦陵又唆使西突厥泥熟俟斤拥兵叛乱，亦被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率部击破。

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三月，论钦陵又亲率吐蕃兵马进犯洮州（治今甘肃临潭）。肃边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及副总管娄师德率部抵抗，双方在素罗汗山（今甘肃临潭西）展开激战。结果，唐军大败。王孝杰因此被免为庶人，娄师德被贬为原州员外司马。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论钦陵在素罗汗山大捷之后，又遣使请求和亲，并对武则天派来接洽谈判的使者、右武卫胄曹参军郭元振提出：罢安西四镇唐兵，分十姓突厥之地等。郭元振

---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王孝杰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长寿元年十月。

质问说：“（安西）四镇、（西突厥）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意乎？”钦陵回答说：“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乎？”由于双方谈判未成，故钦陵又遣使随元振入朝请之。武则天被吐蕃使者说得迟疑不决，只得集众商议。郭元振深知吐蕃“甚欲”占领四镇、十姓，所谓“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云云，只不过是蒙蔽视听而已。但为了避免因“直拒其善意”而导致“边患必深”的不良后果，元振建议要吐蕃“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然后“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并提出“岁发和亲使”前往吐蕃，以符合吐蕃民众“疲于徭戍，早愿和亲”的愿望，旨在“离间”吐蕃执政与下属百姓之间的关系，“使其上下猜阻，祸乱内兴”①。武则天接受了郭元振的建议，遂使吐蕃企图利用和亲侵占西域的幻想成为泡影。

神功元年（697 年）十月，宰相狄仁杰上疏，以“百姓虚弊”和“远戍劳人”为由，请求放弃安西四镇，撤回驻军。但疏奏不纳，被武则天断然拒绝，其事“不行”②。

圣历二年（699 年）四月，吐蕃内乱。原来吐蕃执政论钦陵在赞普器驽悉弄年幼之时，把持国政，诸子弟亦手握重兵，分据方面，专横跋扈，并不断挑起唐蕃边境争端，又出兵西域，国无宁日，吐蕃民众疲于奔命。因而民怨沸腾，群情忿激。器驽悉弄年长以后，遂与大臣论岩密谋杀之。正值论钦陵外出，赞普诈称出猎，集兵捕杀了钦陵亲党 2000 多人，并遣使征召钦陵兄弟。钦陵举兵反抗，赞普率部镇压，钦陵兵溃自杀。其弟赞婆率部投降唐朝，武则天派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兵迎接，封赞婆为特进、归德王。不久，钦陵之子弓仁亦率所部吐谷浑 7000 余帐归降，被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接着，武则天又以娄师德为天兵军副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招抚吐蕃降者。经此乱离以后，吐蕃的兵势大为削弱。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
②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久视元年（700年）七月，吐蕃经过一段整顿内政以后，赞普器弩悉弄又派大将麹莽布支进犯凉州昌松（今甘肃古浪西北）。陇右诸军大使、凉州都督唐休璟率兵抵抗，双方在昌松附近的港源谷遭遇。吐蕃兵甲鲜明，气势极盛。唐休璟一面鼓舞唐军士气，一面披甲上阵，身先士卒。结果，六战皆捷，吐蕃大败。唐军“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①。

长安二年（702年）九月十五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论弥萨入都求和，武则天宴之于麟德殿。由于吐蕃并无和谈诚意，故不果而止。十月十四日，吐蕃赞普亲率万余兵马入寇茂州（治今四川茂县），都督陈大慈率部抵抗，四战皆捷，歼敌千余人。

长安三年（703年），吐蕃南境诸部一时俱反，赞普器弩悉弄亲自率兵镇压。由于军务繁忙紧迫，卒于军中。诸子争立，国人立其子（时年七岁）弃隶蹜赞为赞普。此后，吐蕃政局再次陷入混乱，兵力大减，唐朝的西部边患亦大为缓解。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久视元年七月。

第七章　唐高宗至睿宗时期阶级矛盾的加深与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

从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继位到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让位以前这半个多世纪中，伴随着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刀光剑影的宫闱斗争（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一、二项），唐前期的生产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官僚贵族、豪强富贾和僧侣地主等大肆兼并土地，导致了均田制的日益破坏；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填补财政开支的巨大亏空和满足自己日益奢侈的贪欲，加重对广大农民进行租庸调剥削，迫使农民大量逃亡。这些逃亡农民在走投无路之际，为了求得生存，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起义，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反抗唐朝统治者的封建剥削。发生在永徽四年（653年）的由睦州女子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唐前期最早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阶级的武装斗争。接着，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又遍及岭南、西北、西南和江南等地，几乎散布全国各地。这些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有汇聚成席卷全国的武装斗争，最终被唐朝统治者所各个击破，相继失败，但却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勇于反抗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同时，也迫使唐朝统治者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对广大农民施行一些让步措施，从而为唐朝极盛时期的出现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一节　封建剥削的加重与阶级矛盾的加深

唐初统治者继承北朝、隋制，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均田制，并没有触及大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因而广大百姓受田不足

的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后来，唐朝历代帝王和最高统治集团成员，或任意将公田攫为私有，或大量赏赐勋亲显贵。于是更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之风，贵族官僚、豪强富贾以及僧侣地主都在占有土地上展开角逐，均田制遂出现了瓦解之势。从武则天执政以后，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官吏人数急剧增加，加之频繁用兵，官俸军饷严重支绌。另外，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奢侈之风日益泛滥，挥霍之费，与日俱增。为了应付急剧增加的财政开支，统治者便对广大农民加重剥削，于是社会和阶级矛盾遂不断加深。

一、均田制的变化与土地兼并的激烈

如前所述，由于隋炀帝末年的暴政引起的多年政治动乱，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故唐高祖于武德年间开始，继续推行均田制。不仅促进了荒地开辟，增加了耕地面积，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土地占有情况，缓解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项）。但是，均田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土地占有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状况。而且，从唐高宗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致使均田制出现了瓦解之势。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从均田制的具体内容来看，一个一品官吏按规定可占 60 顷的永业田，12 顷职分田和一定数量的公廨田，三者相加，最少也有七八十顷。而一名成年男子却最多只能占田一顷，他们之间相差达七八十倍。这说明唐朝的均田制也和北朝、隋朝的田制并无二致，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平均地权，反而保护了官僚地主对土地占有的绝对优势，而占有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一般百姓却只能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一二十。均田制还规定：家贫无力丧葬者可卖永业田；“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可卖口分田；狭乡迁往宽乡者，永业田和口分田均可出卖；官吏的赐田、勋官

的永业田等，“亦并听卖”①。所有这些，都比前代均田令中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更加松弛，这就更加助长了僧俗地主和贵族官僚对土地的兼并欲望，同时，也给均田制的破坏埋下了潜在的祸根。

2、从均田制的实施情况来看，广大百姓占田不足的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早在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在视察关中临潼灵口村的均田时，就发现老百姓中丁男的受田仅有“三十亩”②。其他地区百姓受田的数量更少。有人曾对已发现的敦煌户籍残卷中尚未残缺的55户受田者的受田情形作过统计，其中两户老男不课户，完全没有受田；索思礼和令狐进尧两户都有官勋，勋田不计，受田都超过限额；李大娘一户，因为买田，全部受足；其余50户受田农民均受田不足③。到武周时期，有些地方的“百姓所营之田”，每户才仅有“十亩、五亩”④。这说明，从均田制颁布之初，唐朝政府用来“授受”的均田仅仅是一些“荒闲无主之田”和“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的“墟宅桑榆”而已，“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⑤。恰恰相反，均田制着重保护的乃是官僚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均田制施行的过程中，官僚地主和豪强富贾们利用各种手段对土地进行大肆兼并，也就可想而知了。

3、如果说高祖、太宗时期由于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都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他们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还能“惕焉震惊”，对均田制的实施还能认真执行，对土地兼并还能采取一些抑制措施的话，但从唐高宗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消退，骄奢淫佚、贪

---

①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

② 《册府元龟》卷一〇五《帝王部·惠民》。

③ 参阅韩国磐著《隋唐五代史纲要》，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 狄仁杰：《乞免贫民租疏》，载《全唐文》卷一六九。

⑤ 《文献通考》卷二十四《田赋二》。

图享受的欲望却与日俱增。于是，他们便率先兼并土地。大致从武则天执掌朝政以后，历代皇帝都争先将国家掌握的公田占为已有，在全国各地遍设皇庄和官庄，并委派专人管理，被称为内庄宅使、内园使、内宫苑使、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其地租收入全归皇室和朝廷有关官员私人所有。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被籍没和收夺的私人土地以及大量官田，任意赏赐给宗室显贵和亲信爪牙，这就更加助长了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之风。例如：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就开始了大量赐田的先例。他曾在"京师平"定以后，就给大将军府长史裴寂"赐良田千顷"①；武德二年(619年)，他又给瓦岗军投降将领徐世勣"赐良田五十顷"②；武德四年（621年)，陕东道行台李世民又赐给淮安王李神通"田数十顷"③，以致和张婕妤发生争执，引起高祖对世民大动肝火。后来，唐朝诸帝都竞相效尤。如武则天对"武家诸王"，不但"封建依旧"，而且"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赋邑，万姓失望"④。

在封建帝王和最高统治集团的导引下，贵族官僚、豪强富贾以及僧侣地主遂竞相对土地展开角逐，大挖均田制的墙角，遂使土地兼并之风愈煽愈烈。在这场对土地的角逐中，得利最多的当然是身兼要职的贵族官僚了。他们利用显赫的地位和在握的权势，或者以廉价"抑买中书译语人地"⑤；或者"并占境内膏腴之田"⑥；或者"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打着"借荒"的名义，侵夺有主熟地，利用设置私人牧场之机，抢占山谷，不限多少；或者涂改"籍书"，或者诈称"典贴"，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地，"致令百姓，无处安置"⑦。正如《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所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③ 《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隐太子建成传》。

④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传》。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元年十月。

⑥ 《旧唐书》卷五十八《长孙顺德传》。

⑦ 《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

载，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在长安城西的庄园中所兴建的定昆池，“延袤数里”，占地超过数顷，相当于几个丁男所受永业和口分田的总和；唐睿宗时，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

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在兼并土地中也毫不示弱，他们利用手中拥有的大量金帛财货，勾结地方官吏，上下其手，大肆“籍外占田”。唐高宗永徽五年（654 年），仅洛州一地，被刺史贾敦颐括获的被“豪富之室”抢占的这类土地就有“三千余顷”①，相当于 3000 丁男所受均田。洛州如此，其他地区当亦如之。

另外，从唐初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僧侣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的一支强大力量。如上所述，唐初颁布的均田令中就有关于僧尼和道士女冠的受田规定。后来，唐朝诸帝为了利用佛教，巩固统治，“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②。例如唐高宗就曾赐给西明寺“田园百顷”③。到武则天执政以后，由于一些佛教徒为武周政权的建立效尽犬马之劳，故更加受到青睐，遂使寺园经济迅速膨胀。不但“营建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④，而且“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敢亦非少”⑤。致使“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⑥。寺园占田之多，可以想见。

总之，由于唐朝最高统治集团、官僚地主、富商大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大肆兼并，从唐高宗至睿宗时期，均田制已出现了瓦解之势，代之而起的是以僧俗地主为代表的大土地私有制。

二、租庸调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唐朝建立之初，唐朝统治者鉴于隋末赋役繁重、官逼民反因

---

①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上·贾敦颐传》。

② 《法苑珠琳》卷六十二《献佛部》。

③ 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载《全唐文》卷二五七。

④ 《旧唐书》卷八十八《韦思谦附子嗣立传》。

⑤ 狄仁杰：《谏造大像疏》，载《全唐文》卷一六九。

⑥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而亡国的教训，在颁布均田令的同时，还制订了新的赋役制度——租庸调法。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项）。但从唐高宗以后到中宗、睿宗时期，由于均田制的变化、官俸军饷的急剧增加以及统治集团的大兴土木等原因，致使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日益沉重。

大致从唐高宗后期武则天参政以后，她为了树立私人势力，为其后来的篡夺唐鼎作组织准备，一面任用酷吏，大杀异己，另一方面又改革科举制度，广开入仕之门，大力搜罗各种人才，致使官吏人数急剧增加。以致时人编写了“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① 的歌谣加以讽刺。唐中宗复位以后，不但皇妃、公主“墨敕”而授的斜封官多至数千员，而且朝廷也“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遂使官员愈滥，以致“金银不供其印，束帛无充于锡”，“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②。于是，官俸开支大为增加，以致成了统治者沉重的财政负担。

另外，这一时期又频繁用兵，更是严重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永徽二年（651年），进军西域，直到显庆二年（657年），始灭西突厥汗国；永徽六年（655年），又出兵辽东，于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总章元年（668年）灭高丽。武则天执政以后，先是契丹大举入寇，经过一年多的发兵北伐，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始被平定；时隔不久，东突厥余部又叛，虽经连年征讨，但北境终未宁静，直到中宗复位以后，始被遏制。另外，从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又频繁入侵，一度攻陷安西四镇，控制西域，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才予收复。由于连年用兵，浩大的军饷，沉重的兵役、徭役负担，都一齐落到广大百姓的身上。正如狄仁杰在神功元年（697年）和圣历初年的上疏中所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

---

①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一。

②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池城，缮造甲兵，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近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①。至于随军出征的府兵士卒及其家属的处境，更是苦不堪言。大约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频经渡海，不被记录"，而且渡海以后，"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因此，渡海征辽之时，"已有自害逃亡，非独海外始逃"②。但唐高宗却下诏对逃亡军人严法处治，不但"身并处斩"，而且"家口没官"③。

这一时期，统治阶级为了推崇佛教，又大修寺塔，广度僧人，糜费了大量民脂民膏。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先后修建了长寿寺、大云寺、白马寺、崇先寺、授记寺等，以至"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④。而每个寺院"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而且还强迫百姓"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⑤。正如时人狄仁杰所说："今之伽兰，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苦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⑥。唐中宗复位以后，依旧"盛兴佛寺"，以致"伐木山空，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⑦。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又为他死去的金仙、玉真两公主修造道观、寺院，"烧瓦运木，载土填坑"，不但费"钱百余万贯"⑧，而且"用工巨亿"⑨。

---

①④⑥《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②《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③《旧唐书》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

⑤《旧唐书》卷八十八《韦思谦附子嗣立传》。

⑦⑧《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⑨《旧唐书》卷一〇一《韦凑传》。

这一时期统治集团还大兴土木，大肆营建宫阙、陵墓，给广大百姓又平添了繁杂的徭役负担。永徽五年(654年)，唐高宗为修筑京师罗城，就曾“和雇”京兆府百姓4.1万人，“板筑三十日而罢”①。其实，“虽云和雇，皆是催迫发遣”②。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薨，高宗诏令在河南府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南)营建恭陵，并征发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泽(州治今山西晋城)等州丁夫数千人修筑。由于“过期不遣”，丁夫不忍“恚苦”，遂于“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③。由此可知，唐高宗和武则天死后，营建规模巨大的乾陵宫寝，其役使民夫数量之多，助役功作的“恚苦”之甚。武则天执政时期，土木之役更加频繁。垂拱四年(688年)，她曾下令拆毁东都宫城正殿乾元殿，于其地修建明堂，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300尺，仅役夫就有数万人。明堂之北又筑天堂，“广袤亚于明堂”;证圣年间，薛怀义由于恩宠渐衰，“恨怒颇甚”，遂纵火焚烧了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④，所费财帛、人力，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她又大兴离宫，建造殿宇，以致“西幸东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岁月不空”⑤。另外，这一时期贵族官僚私役百姓的现象亦司空见惯。如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宰相李义府将其祖父的坟墓改葬于三原(今陕西三原西北)永康陵侧时，三原县令李孝节私役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今属陕西)、华原(今陕西耀县)、栎阳(今陕西临潼)、富平(今陕西富平北)、云阳(今陕西三原西北)、同官(今陕西铜川西北)、泾阳(今属陕西)等7县县令均效法孝节，全都私征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因“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⑥，被役死的民

---

① 《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

② 《唐会要》卷四十八《寺》。

③ 《唐会要》卷二十一《诸陵杂录》。

④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薛怀义传》。

⑤ 《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

⑥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夫、耕牛，当不在少数。唐睿宗时，太平公主的“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供送，相属于路”，“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①。

为了填补国家财政的日益支绌，这一时期统治者不但加重对农民的租庸调剥削，而且还于税外加敛，加重征收地税、户税，又利用“和籴”、“和雇”、“和市”等名目，掠夺百姓。仅“配户和市”一项，就使长安“百姓苦之”，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裴耀卿担任长安令后，“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值，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②。

三、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

综上所述，由于唐高宗至唐睿宗时期官俸、军饷的大量增加，兵役、徭役的日益繁重，唐初制订的租庸调制远远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财政开支，统治者便开始在税外加敛，役外加征，对广大百姓进行超经济的强制掠夺。而贵族官僚和僧侣地主却可凭借权势，豁免赋役。富商豪强也利用各种手段躲避徭赋，他们或者“出财依势”，“尽度为沙门”③；或“参逐官府”，“东西藏避，并即得脱”。而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④，或“所未度者，唯贫穷与善人”⑤。总之，繁重的赋役全都落在无钱无势的百姓头上。

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和贵族官僚、豪强富贾以及僧侣地主的大肆兼并土地，广大农民受田不足的现象更加严重，以至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广大百姓即使在“年谷丰登”之岁，仍“未有储蓄”⑥，如遇灾荒之年，就只有啼饥号寒

①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攸暨妻太平公主传》。

② 《旧唐书》卷九十八《裴耀卿传》。

③⑤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④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⑥ 《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

了。但一些地方官吏却并不恤民苦，他们鞭打杖责，强征赋役，致使百姓“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①。田舍卖尽以后，就只有流离道路，逃往异乡。如果仍不能存活，就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起义，用武装斗争的形式，以求生存。正如武则天证圣元年（695 年）凤阁舍人李峤在上表中所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乱”②。唐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监察御史韩琬也说，近年以来，由于“军机屡兴，赋敛重数，上下逼促”，“人多失业，流离道路”，“游惰既多，穷诈乃作，既穷而诈，犯禁相仍”③。

周边内附的少数民族，也在贪官污吏的压榨下，奋起反抗，反对民族压迫（详见本章第三节）。

唐王朝分封制度下封户百姓的处境亦很艰辛。他们不但要承担比一般百姓高达十多倍直至数十倍的地租剥削，而且在灾荒之年也不能按照规定，予以豁免。如唐中宗神龙初年，河北遭受水灾。贝州（治今山东临清西北）刺史“议称”武三思在该州实封数千户的“租庸及封丁并合损免”，但宰相韦巨源却“以为谷稼虽被湮没，其蚕桑见（现）在，可勒输庸调，由是河朔户口颇多流散”。

总之，由于土地兼并引起均田制的变化和租庸调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致使高宗至睿宗时期的社会阶级矛盾不断加深，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接踵而起，震撼了唐朝的封建统治。

第二节　浙江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

发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 年）的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北）女子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唐前期最早发生的一次规模最

---

① 《旧唐书》卷九十四《李峤传》。

②③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大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江南地区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日益沉重，生活日益穷困的背景下发生的。起义人数发展到数万人，波及到了周围数州之地，给唐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一、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陈硕真起义的发生地睦州属唐江南道东部，位于今浙江西部。这里和江南其他地区一样，经过孙吴、东晋、南朝4代及隋朝将近4个世纪的长期开发，社会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与北方经济的悬殊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且还出现了正在接近和超越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势。故从唐高祖和太宗开始，由于关中地狭，所出不足供给京师，每年都要通过隋炀帝时期兴修的大运河，“漕转东南之粟”20万石，供应长安。自唐高宗以后，由于官俸和军饷等国家财政的急剧增加，从江南地区漕运的粟米，“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①。这就大大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赋役负担。正如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宰相狄仁杰所说：“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② 不仅如此，江南百姓负责漕运租税的徭役负担和运夫之苦，亦很沉重。大抵江南各地的赋税漕粮由运夫运抵扬州后，每年二月又从扬州出发，八、九月份才得“上河入洛”，其间“漕路多梗，船樯阻隘”，船夫所受艰辛，可以想见。加之“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以至“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费如此”③。有时由于军情急迫，唐政府还强令江南运夫将所运漕粮，“勒往幽州，纳充军粮”④。故江南运夫往往常年劳累，不得休息。如果漕粮损失，还得负责赔偿。因此，船夫家破人亡的事是屡见不鲜的。陈硕真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

①③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三》。

②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④ 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载《陈子昂集》卷八。

二、起义的发展与政权的建立

陈硕真起义酝酿于唐高宗永徽初年。最初，硕真“自言仙去，与乡邻辞诀”①，准备用仙人救世的封建迷信方式组织民众，揭竿起义。不料被人告发，被捕入狱。但经过审讯，官府并没有获得她发动起义的“罪证”，便“诏释不问”②。经此挫折以后，硕真没有灰心丧气。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她又指使妹夫章叔胤扬言“硕真自天还，化为男子，能役使鬼物”③。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附近百姓听说陈硕真能够救人苦难，便接踵归附，很快就有2万多人聚集在硕真所擎的大旗之下。接着，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以章叔胤为仆射，迅速建立了革命政权。十月二十二日，文佳皇帝陈硕真发号施令，派兵四面出击，由仆射章叔胤率众北上，进攻桐庐(今属浙江)；东路军进攻东阳(今属浙江)；南路军由部将童文宝率领，进攻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西路军进攻歙州(治今安徽歙县)。陈硕真在“撞钟焚香”④之后，亲率2000余众进攻睦州。这诸路兵马在沿途饥饿百姓的支持下，迅速壮大，官军一触即溃。起义军迅速占领了睦州、桐庐、于潜(今浙江临安西南)，兵势波及到了睦、婺、歙、杭(州治今浙江杭州)四州之地。这是起义军发展的鼎盛时期。

三、起义的失败及其历史作用

陈硕真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唐朝廷惊恐不已。唐高宗急令婺州刺史崔义玄和扬州（今属江苏）刺史房仁裕率兵征讨。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连战连捷，故在百姓中流传说：“硕真有神灵，犯其兵马无不灭门。”⑤ 因此，官军更是闻风丧胆，不敢交战。婺

---

①②③ 《新唐书》卷一〇九《崔义玄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四年十月。

⑤ 《册府元龟》卷六九四《武功》。

州司功参军崔玄籍为了鼓动官军士气，便声嘶力竭地对士兵说："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① 于是，刺史崔义玄便以崔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为后援，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行至下淮戍（今浙江桐庐东），正与起义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看到官军来势凶猛，便以弓箭手对阵，万箭齐发，矢下如注，企图遏制官军的进攻势头。官军兵士恐怕刺史受伤，急用楯牌遮蔽义玄。义玄立功心切，对兵士说，刺史怕死避箭，谁还能拼死向前！遂命兵士撤掉牌楯。于是官兵随刺史拼死冲锋。起义军虽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急忙西撤。官军尾随紧追，直至睦州境内。这时，扬州刺史房仁裕率领官军相继到达，两路官军连兵向睦州进攻，并将睦州团团包围。起义军虽奋力抵抗，但仍不能遏制优势官军的进攻。十一月二日，睦州陷落，硕真、叔胤等起义首领被捕，不屈而死，一万多起义军全部被俘，起义失败。崔义玄以功被拜御史大夫。

陈硕真起义虽前后历时仅有十天，终因准备不周，兵力分散，遭到失败。但她的行动却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忍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精神。陈硕真在起义发生不久，就敢于蔑视皇权，自称"文佳皇帝"，这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皇权和夫权思想的一次冲击。另外，这次起义是唐朝前期爆发最早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它对后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农民反抗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次武装起义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唐朝的封建统治，迫使唐朝统治者不得不对他们施行的某些政策进行调整，收敛他们的贪欲，对广大农民作出一些让步，亦将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此后，众多官吏，如狄仁杰、李峤、陈子昂、辛替否等人，都曾针对当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方面的失误以及各级官吏的贪暴行为，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就是这种作用的曲折表现。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四年十月。

第三节　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陈硕真起义被镇压以后，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此起彼伏，方兴未艾，有边疆各地少数民族参加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武装起义，犹如无数星星之火，遍及大河上下和长江南北。其中岭南地区有柳州吴君解起义、琼州僚民起义、闽广人民起义、安南俚户暴动和始安欧阳倩起义；西北地区有关中民变、绥州稽胡白铁余起义、歧州兵变；西南地区有姚州蛮民起义和蜀川逃户起义；江南地区有常州刘龙子起义和宣州钟大眼起义等。

一、岭南地区的起义

岭南地区属唐朝的岭南道，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3省的全部、云南省的东部和越南的北部等地。这里唐时是汉族和蛮、僚等少数族杂居之处，而以蛮、僚少数族为主要居民。由于唐王朝派往这些地区的汉族官吏大多"贪纵"残暴，对当地少数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有时亦纵容少数族首领任意侵渔部众，"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未尝鞫问"①，故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先后爆发了多起蛮、僚等少数族人民参加的武装起义。

柳州吴君解起义　唐时柳州（今属广西）在岭南道东北部。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五月三十日，这里的蛮酋吴君解由于不堪忍受汉族官吏的残酷压迫，聚众起义，攻城略地，多次打败官军，几乎横扫州内的府兵军团，对整个岭南地区造成了极大震动。唐高宗慌忙调遣冀州（今属河北）长史刘伯英和右武卫将军冯士翽南下广州（今属广东），率岭南道大军征讨。起义军因为寡不敌众，

---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

最终被官军镇压①。

琼州僚民起义 琼州（治今海南定安东北）原为隋珠崖郡。武德四年（621年），唐军平定萧铣后，于此置琼州都督府，管辖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儋（州治今海南临高西南）、振（州治今海南乐东南）诸州。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由于都督李逸“控驭失所”②，僚民被迫聚众起义。起义民众聚集山洞，壮大力量，伺机袭击官军，先后消灭了唐朝派驻这里的武装力量。僚民起义军在势力壮大后，进攻州城，“遂致沦陷”③。直到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岭南节度使李复派遣判官、监察御史姜孟京、崖州刺史张少逸等率兵“悉力致讨，累经苦战”④，才收复了州城。后在李复的奏请下，唐德宗始“移镇军在此”，并升琼州为下都督府，仍加琼、崖、振、儋、万安等五州招讨游奕使。这说明唐高宗乾封二年的僚民起义，坚持反抗斗争达130多年，是这一时期历时最久的一次民族斗争。

闽广人民起义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广州崖山县的人民举行起义，反抗封建统治。潮州（今属广东）附近民众群起响应，揭竿起义，严惩贪官污吏。潮州刺史派陈元光率兵镇压，起义失败。永隆二年（681年），潮州人民再次起义，并进攻州城。最后，又被陈元光所率官军击败。垂拱二年（686年），武则天接受陈元光的奏请，于潮、泉（今属福建）二州之间设置漳州（今属福建），并以陈元光担任刺史。不久，漳州地区的少数族蛮民又“啸聚”⑤起义。刺史陈元光率兵镇压，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元光被杀。后来，有人作诗云：“当年岭北正危时，数郡生灵未可知，不是有人横义概，也应无计保藩维。”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族和少数族人民起义斗争的浩大声势和斗争精神。

---

① 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龙朔三年五月；《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②③④ 《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

⑤⑥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一《福建路·漳州·官吏》。

安南俚户暴动 安南（治今越南河内）在唐初为交州总管府治所，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改为安南都督府。唐初这里居住的多为“俚”① 民。当时规定：“岭南俚户，旧输半课”②，即缴纳内地百姓租庸调制所定租调数量的一半。但当刘延祐担任安南都护以后，却“遂勒全输”③。即要岭南俚户和内地百姓一样缴纳租庸调制所定数量的全部。因此，引起了广大俚户的不满，他们准备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反抗。不料事机泄漏，被官府侦知，俚民首领李嗣仙遭到捕杀。到了垂拱三年（687年），李嗣仙的挚友丁建、李思慎等再次发动俚民，集众起义。对刘延祐早就怨恨积久的广大俚民群起响应，人数很快就发展到数千人。他们在丁建、李思慎的率领下，攻打安南，并将府城团团包围。当时安南城中仅有数百守军，延祐自知兵力单薄，不是起义军的对手，便“禁门坚守，以候邻境之援”④。广州大族冯子猷企图待机邀功，遂幸灾乐祸，按兵不动。起义俚户乘机大举攻城，并一举占领了安南，都护刘延祐被杀。后来，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司马曹玄静率兵镇压了这次俚户起义。

始安欧阳倩起义 始安（今广西桂林）为唐朝桂州治所。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十一月，始安人民“为吏所侵逼”⑤，便在首领欧阳倩的领导下，举兵起义，当地獠民纷纷响应，人数很快即达数万，并相继攻陷了很多州县，岭南震动。武则天闻讯，“思得良吏以镇之”，遂以司封郎中裴怀古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前往桂州招抚。怀古一行刚至岭北，即派人“飞书示以祸福”，表示只要起义民众放下武器，自动归降，不但赦而不罪，还可以豁免赋役。欧阳倩等起义首领看到起义的目的已经达到，遂

---

① 俚：古族名。亦称“里人”。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獠并称。主要分布于今广东西南沿海与广西东南等地。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一说在海南岛的，发展为今日的黎族。

②③④ 《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上·刘胤之附弟延祐传》。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三年十一月。

表示愿意归降。怀古知其“诚恳”，便轻骑赴之，厚加抚慰。起义僚民听后“喜悦”，便将所掠财物全部缴出。“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尽来款附，岭外悉定”①。

二、西北地区的起义

我国的西北地区在唐时为关内道和陇右道境地。这里北与突厥相接，西与吐蕃为邻，西北即是西域。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蕃和西域之间发生的相互战争，多在这里进行。故西北地区的广大百姓所承担的兵役和徭役负担最为沉重，凡有军府的丁壮几乎扫地为兵。结果是“一人就役，举室捐业。籍军者督戎仗，课役者责粮赍，竭资经纪，犹不能济”②，出现了“十万兵在境，则百万家不得安业”③的状况。再加之“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④，广大百姓更是不堪重负。特别是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不但要承担皇室和朝廷百官的多数官俸开支和挥霍之费，而且“差科非一”⑤，农民“所出”，不下“百役”⑥，因而“劳弊尤甚”⑦。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和最高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关中人民的赋役负担更为沉重。再加之连年“荒馑”，数岁不登，到武则天执政之时，“自河以西，莫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白骨纵横，阡陌无主”⑧。因而这里就成了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农民起义接连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次：

---

①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下·裴怀古传》。

② 《新唐书》卷九十九《戴胄传》。

③ 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载《陈子昂集》卷八。

④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⑤ 《旧唐书》卷七十八《高季辅传》。

⑥ 《册府元龟》卷八十王《赦宥》。

⑦ 《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

⑧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陈子昂传》。

关中民变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关中遭受了一次特大的自然灾害。是年六月，先是霖雨不止，待收割的小麦全被“涝损”，接着，又连续大旱，蝗灾继至，“食苗并尽”，加之疫疠流行，“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京师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饥寒交迫的广大百姓无以自存，只得铤而走险，聚众抢劫，打富济贫，以求存活。故史书记载“寇盗纵横”①。唐高宗一面诏“罢朝会。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绥等州就食”，一面东巡洛阳，逐粮东都。由于“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唐高宗害怕东幸途中遭受饥民抢劫，“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②。不久，雍州长史苏良嗣“为政严明，盗发三日内无不擒擿”③。硬是用武力将这次民变镇压下去。后来宰相魏玄同向高宗上疏说：“方今人不加富，盗贼未衰，礼谊寖薄者，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④ 深刻揭示了激起这次民变的原因不唯天灾，亦有人祸。

绥州稽胡白铁余起义　白铁余者，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北）稽胡族人。他曾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在深山一柏树之下埋一鎏金铜佛像，数年之后，草生其上。他便对乡党们说：“吾于此数见佛”，但乡党们多不相信。不久，他便邀请众人，选择吉日，当众掘地，果然挖出了一座佛像，前来观看的人都惊奇不已。于是，白铁余便对大家说：“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⑤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遍了周围数州之地，前来“布施”者络绎不绝。但白铁余却将佛像用杂色绫绢包裹得严严实实，足有数十层之厚。如有前来欲观者，则剥去一层，亦布施一回，直到收布千端以后，始见佛像。二年以后，终使多数乡人“归伏”，亦积蓄了大量物资。

---

① 以上均见《旧唐书》卷五《高宗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高宗永淳元年四月。

③ 《旧唐书》卷七十五《苏良嗣传》。

④ 《新唐书》卷一一七《魏玄同传》。

⑤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高宗永淳二年四月。

永淳二年（683年），白铁余遂率领饥饿的乡人及附近百姓揭旗造反，并迅速攻占了城平县（今陕西清涧西）。铁余自称光明圣皇帝，署置百官，建立了农民政权。接着，起义军又挥师北上，进攻绥德（今属陕西）、大斌（今陕西子洲西南）2县，沿途诛杀贪官污吏，焚烧地主庄园，陕北震动。唐高宗急忙派遣宿将、右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与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都督王方翼率兵镇压。历经“数年”①，这次起义才被平定。

岐州亡卒兵变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数百逃亡士卒在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哗变，剽劫行旅，道路不通。官府派兵擒捉，并对被捕的亡卒进行严刑“穷讯”②，但亡卒的兵变却始终没有被平息。奉命出使岐州的狄仁杰当即上奏高宗，请求张贴露布，公开赦免亡卒首领，释放被捕者，并“禀而纵之”③。高宗诏准。逃亡士卒便“皆自缚归”④，兵变始渐平息。

三、西南地区的起义

我国的西南地区唐朝属剑南和黔中二道。这里距离京师遥远，交通不便，又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故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特别是巴蜀四川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富饶，自古即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在这里任职的官吏大多贪得无厌，对百姓大肆搜刮，拼命聚敛。正如武则天时期陈子昂在《上蜀川安危事》中所说：“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⑤ 就连武则天自己也说，蜀中“久缺良守，弊于侵渔，政以贿成，人无厝足。”⑥ 因此，这里也是唐前期农民和少数族百姓举兵起义较为集

①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

②③④ 《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

⑤ 《陈子昂集》卷八。

⑥ 《旧唐书》卷八十九《姚璹传》。

中的地区之一。

姚州蛮民起义 姚州（治今云南姚安）位于唐剑南道西南，始置于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年）。主要是蛮族聚居之地。从唐初开始，由于这里“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①加上唐王朝为了防卫吐蕃，“每岁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镇守，路越山险，死者甚多”。另外，唐廷在“姚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静寇之心，又无（诸）葛亮且纵且擒之伎。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他们或者“扇动酋渠，遗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或者“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蒲博，一掷累万”。因而，致使阶级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置州不久，姚府官吏“李孝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②。唐高宗当即派遣郎将赵武贵率蜀兵征讨，才把这次起义平息下去。咸亨三年（672年）春，姚州永昌（今云南保山）蛮民再次起义。起义蛮民在其首领的率领下，向东挺进，惩治贪吏，烧毁官府，官军不能制。有史籍记载说：“咸亨之变，犬羊大扰，枭将失律，元凶莫惩”③ 云云，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次蛮民起义的原因和声势。唐高宗闻讯，急忙派右卫副率梁积寿发梁（州治今陕西汉中）、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等18州兵募5300人，前往镇压。由于起义蛮民寡不敌众，被官兵打败④。不久，蛮民再次起义，而且声势更为壮大，唐军“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乃废”⑤。武则天长寿年间（692～694年），姚州蛮民又联合巂州（治今四川西昌）蛮众“反叛”⑥，被唐监察御史裴怀古所率官军镇压。唐睿宗即位以后，姚州西洱河（今云南洱海）周围的蛮民叛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兵征讨。叛乱被平定以后，知古又奏请于姚州

---

①②⑤ 《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

③ 《金石萃编》卷六二《王府君（仁求）碑铭并序》。

④ 参阅《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八》，高宗咸亨三年正月；《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两爨蛮传》。

⑥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裴怀古传》。

修筑城池，派驻军队，重征租税。黄门侍郎徐坚以为“劳师涉远，所损不补所获，独建议以为不便”①。但睿宗不从，仍诏令知古征发剑南府兵前往筑城，并企图在姚州像内地一样设置州县，对这里进行封建统治。知古到达姚州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②，于是，蛮民愤怒，蛮酋傍名导引吐蕃攻入姚州，杀死知古，并以其尸祭天。从此，姚、巂 2 州路绝，多年不通。

蜀川逃户起义 武则天圣历元年（698 年），由于蜀川诸州地方官吏对广大百姓严征赋税，急发徭役，迫使 3 万多户农民背井离乡，纷纷聚集在蓬（州治今四川仪陇南）、渠（州治今四川渠县）、果（州治今四川南充东北）、遂（州治今四川遂宁）等州交界的山林之中，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窠穴其中”，“劫杀公行”，甚至“攻城劫县，徒众日多”③，反抗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不久，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冯元常被派往剑南，对这些起义逃户“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贼徒舍器杖，面缚自陈者相继。”④ 起义才逐渐平息。

四、江南地区的起义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 年）睦州女子陈硕真领导的起义被镇压以后，江南地区的人民起义不但没有就此平息，而且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农民起义仍此起彼伏，接连而起，几乎燃遍了江南大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次：

常州刘龙子起义 唐高宗开耀元年（681 年）五月，常州（今属江苏）人刘龙子看到当地百姓穷困不堪，到处流亡，遂准备聚众起义。为了组织民众，他特意制作了一个金龙头首，藏在袖中，

---

① 《旧唐书》卷一〇二《徐坚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元年十二月。

③ 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载《陈子昂集》卷八。

④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上·冯元常传》。

并将盛装蜜水的羊肠缠绕在龙头之上，每在众人相聚之处，便将龙头取出，说是圣龙吐水，饮之可治疗百病。于是，逐渐便得到了不少百姓的信赖。正当刘龙子将要率众起义前夕，不料有人告密，官府闻讯缉捕，龙子逃走。但不久被捕，被杀于常州街市。这次起义被扼杀于摇篮之中①。

宣州钟大眼起义 钟大眼，宣州（今属安徽）人。他于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率众起义，附近百姓纷纷参加，很快波及到常州、湖州（治所今属浙江）等数州之地。武则天急派汝州（治今河南临汝）武兴县主簿张昭道出使宣州，率兵讨击。昭道到达宣州后，采用剿、抚结合之法，最后镇压了这次起义②。

① 参阅《新唐书》卷三《高宗纪》；《朝野佥载》卷三。

② 参阅《旧唐书》卷一〇一《薛登传》；《千唐志斋藏石·唐故太子舍人张府君（昭道）墓志铭并序》。

第八章　唐玄宗统治前期巩固边疆安全的战争

武周政权被推翻以后，唐中宗和唐睿宗相继即位。此后，李隆基经过平定韦、武集团和太平公主之乱，升储登极，是为唐玄宗。唐玄宗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励精图治，任用精于吏治的姚崇、宋璟以及韩休、张说等人为相，选用贤才，整饬吏治，革除奸滥，改革财政，遂使唐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盛唐气象；与此同时，玄宗又变府兵为募兵，在沿边地区设置10节度，大兴马政，扩充军队，严格军法，训练士卒，增强了边防力量。经营州之战、抱白山之战和都山之战，击败了契丹和奚族的入侵，收复了辽西；开元二十年（732年）以后，玄宗又派兵深入渤海，接连打败了渤海郡王大武艺的反叛，迫其就范；在北方边疆，唐军经呼延谷之战以后，又相继打败了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登利可汗、骨咄叶护可汗和乌苏可汗；在西域地区，唐军又击败了突骑施苏禄可汗和吐火仙可汗，收复了碎叶镇，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在河西、陇右、安西和小勃律地区，唐军又多次击败了吐蕃的进攻，使开元边功达于极盛。

第一节　“开元之治”与玄宗的强兵方略

一、韦、武集团乱政时期的内外形势

唐中宗虽然在张柬之等人的支持下，复位建唐，但他在登基以后却转而依靠韦皇后、武三思以及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等人，遂使政局大坏。

韦皇后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被纳为太子李显之妃。嗣圣元年（684年），李显即帝位后，立为皇后。是年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韦氏随帝同被发配房州（治今湖北房县）。李显到达房州后，慌恐不安，每闻武则天遣使出巡，即欲轻生。韦氏经常劝谕说：“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李显听后，精神受到很大安慰，曾感激地对韦氏发誓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①

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位后，成为皇后的韦氏由于地位变迁，权势日隆，遂产生了攫取最高政治权力，以女主而君临天下的野心。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与前妻相里氏所生第二子武元庆的儿子，武则天之侄。武周时期官至特进、太子宾客、监修国史。中宗复位后，三思又在上官婉儿的荐引下，并利用其子武崇训娶妻安乐公主的姻亲关系，进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与韦后结为死党，玩弄权柄，树立私人势力，诛杀正直大臣，狐假虎威，为非作歹，紊乱朝纲。

上官婉儿是唐高宗时西台侍郎上官仪的孙女。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因谏废武后被杀后，婉儿与其母郑氏被没入掖庭为婢。后因“天性韶警，善文章”②，受到武则天的青睐。圣历元年（698年）以后，开始参决政事。中宗复位后，婉儿因善于奉迎谄媚，深得中宗和韦后的信赖，令其专掌制命，不久，又拜为昭容，其母亦被封为沛国夫人。她因与武三思“淫乱”不止，故在草拟制敕时，往往推尊武氏而排抑皇族，并将武三思引荐给了韦后，使韦、武结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上官婉儿在这个集团中当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安乐公主是韦氏随庐陵王李显刺配房州途中所生，因道途仓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

② 《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韦皇后附上官昭容传》。

促，解衣褓之，故起名“裹儿”①。渐长以后，生性惠敏，容质秀绝，被中宗和韦后视为掌上明珠，于诸子女中最为宠爱，“恣其所欲，奏请无不允许”②。这样，就使她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以至产生了想当“皇太女”的奢望。在这种私欲的驱使下，安乐公主很快便成了韦、武集团中的骨干力量。

神龙元年（705 年）五月中旬，即中宗复位的第三个月，武三思和韦后在中宗处诬陷张柬之等人“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③，中宗信以为真，遂于五月十六日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等 5 位功臣同时罢知政事，用明升暗降的手段，收夺了他们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武三思还把被张柬之等贬逐的官员全部官复原职，把依附张柬之等人的官员全部驱逐出京。于是，“大权尽归三思”④。侍御史周利用、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等 5 人为其耳目，时人呼为“三思五狗”⑤。宰相韦巨源、杨再思以及宗楚客、纪处讷等亦趋炎附势，党附韦、武。安乐公主也趁机卖官鬻爵，不但挟制中宗墨敕大授“斜封官”，而且“自王侯、宰相以下，除拜多出其门”⑥。上官婉儿等人还大竞奢侈，强夺民宅，“建宅第、山池”，“穿沼筑岩，穷饰胜趣”⑦。遂使吏治大坏，统治集团内部亦危机四伏，宫闱斗争日益加剧。

神龙二年（706 年）三月，驸马都尉王同皎（尚中宗定安公主）对武三思的专权跋扈，心怀不满，遂密招壮士，准备在武则天的灵柩发引之际，劫杀三思。因为同谋者冉祖雍中途告变，被三思奏告中宗，中宗“遂斩同皎于都亭驿前，籍没其家”⑧。

同年七月，武三思又派人在洛阳天津桥张贴疏文，罗列韦后

---

① 《新唐书》卷八十三《中宗八女·安乐公主传》。

②⑥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三思子崇训传》。

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神龙元年五月。

⑤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三思传》。

⑦ 《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韦皇后附上官昭容传》。

⑧ 《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上·王同皎传》。

"秽行"，请求将其废黜。企图嫁祸于张柬之、敬晖等人。中宗闻讯大怒，当即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重按其事。李承嘉由于早已被武三思用重金收买，故在未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诬告是张柬之等5人所为，并请将其全部"族诛"。中宗鉴于这5人有拥戴之功，不忍加诛，只是将其全部贬出京师，发配边州。不久，武三思又以大理丞周利用为出巡使者，矫制将此5人诛杀。

神龙三年（707年）七月，皇太子李重俊举兵造反。李重俊为后宫妃子所生，因韦后无子，故被立为太子。韦后以太子非己所生，心怀厌恶，武三思亦颇忌恨。安乐公主因为想当皇太女，把太子更加视为眼中钉，故与其婿、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经常凌侮太子，甚至呼太子为奴。太子不堪欺凌，遂于七月六日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独孤祎及沙吒忠义等矫制征发羽林千骑兵300余人，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杀死在宅第里。同时，还杀死了三思党羽10余人。接着，重俊又派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别守卫宫城诸门，自己与多祚引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并急叩阁门，搜索上官婉儿。婉儿闻讯，当即对中宗和韦后说："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指中宗）。"①于是，中宗遂与韦后、安乐公主及上官婉儿登上玄武门，躲避兵锋，并派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楼下以自卫。宰相杨再思、苏瑰、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亦拥兵2000余人，屯于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多祚率兵先至玄武门楼下，企图冲入楼内，但被守卫飞骑所阻，不得登楼。不久，太子继至，同多祚在楼下狐疑不定，按兵不战，企图向中宗说明起兵缘由。未等太子开口，站在中宗身旁的宫闱令杨思勗请求出击，并首先从楼内冲出，杀死了李多祚之婿、前锋总管、羽林中郎将野呼利，多祚部众士气顿衰。这时，唐中宗凭楼向多祚所率千骑兵士劝谕说："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②于是千骑兵士倒戈，群起杀死了多祚、承况、祎之、忠义等人，其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景龙元年七月。

余部众全部溃散。进攻右延明门的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亦因久攻不克，被宗楚客和纪处讷部所杀。太子李重俊看到大势已去，遂率百余骑向终南山方向逃走。行至鄠县（今陕西户县）之西，身边只剩数人相随。当他倚树歇息之时，被随从所杀。李重俊的政变至此结束。韦氏集团的势力不但未被削弱，反而更为增强，她的权势欲亦随之愈加炽烈。

同年八月，宗楚客率百官表请加韦后尊号为顺天翊圣皇后。

景龙二年（708年）春，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又奏请尊韦后为国母，主蚕桑之事，又上《桑韦歌》12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①。中宗应允。上官婉儿亦从婕妤升为昭容。

景龙四年（710年）五月，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司兵参军燕钦融上言，揭露韦后、安乐公主、公主之婿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及宗楚客等“干预国政”、“图危宗社”等罪行，被宗楚客矫制发飞骑将其捕杀。中宗闻讯，“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②。

同年六月二日，安乐公主伙同党羽散骑常侍马秦客、光禄少卿杨均等，于御饼中进毒，鸩死中宗。韦后秘不发丧，自总朝政。六月三日，韦后又征发诸府兵士5万人屯驻京师，派驸马都尉韦捷、韦蕴、韦后族弟卫尉卿韦璿、族侄长安令韦播、外甥郎将高嵩分领；又令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率兵500，驰驿防卫均州（治今湖北丹江口西北），以备中宗第二子、谯王李重福。又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然后，她便召集宰相，讨论修改中宗遗制。原来中宗遗制最早是由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起草的，内容是“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③。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幼女，曾支持“五王政变”，协助中宗复位。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二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云元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此后，她便发展自己势力，与韦武集团相互诋毁，各树党羽，展开角逐。上官婉儿虽属韦武集团中坚，但在太子李重俊起兵杀了武三思父子以后，加之其姨表兄弟、左拾遗王昱的劝谕，觉得韦后集团犹如冰山，并不可靠，政治立场开始转向以相王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和太平公主等人为代表的李唐王室一边。故在草拟中宗遗制时，力主相王参谋政事。但这样一来，必然会给韦后的专权以至君临天下带来障碍。故在韦温和宗楚客等人的支持下，遂将遗制修改成由韦后临朝称制，罢相王政事。

六月四日，韦后在进行了上述篡位准备后，召集百官发丧，大赦天下，改元唐隆。又令族兄韦温总知内外兵马事。六月七日，立李重茂为帝，由韦后临朝摄政。不久，宗楚客又与武延秀及司农卿赵履温、韦氏宗族诸人共同劝韦后遵武后故事，以太后君临天下。还阴谋废杀重茂，加害相王及太平公主。李唐社稷又面临倾覆的危险。

另外，韦武集团乱政时期的边疆形势亦很严峻。居住在北方蒙古草原的后突厥汗国不断入侵河套和西域地区，给唐的北部边防带来严重威胁。兴起于碎叶川地区的突骑施汗国亦杀唐使者，举众叛乱。甚至有的部族还用贿赂手段收买唐廷的执政宰相，勾结吐蕃进入西域，西域告急（详见本章第四、第五节）。

二、玄宗即位与“开元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 年）八月五日。神龙元年（705 年），中宗复位后，隆基被封临淄王，任卫尉少卿。景龙二年（708 年）四月，隆基由于受到太子李重俊起兵的株连，被逐出长安，贬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别驾。景龙三年（709 年）冬，唐中宗将要举行祭祀南郊的典礼，隆基奉诏入京。这时，在韦后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下，朝政败坏，一片混乱。多数大臣趋炎附势，追随韦后，少数正直大臣，遭到排挤陷害。隆基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凭借对唐廷宫闱政变的

耳闻目睹，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李唐社稷又一次面临被异姓女皇篡位的危险。因此，早在他担任潞州别驾时，就“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①，准备随时投入到维护李唐社稷的斗争中去。回到长安以后，隆基又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争取最为精锐的宫廷部队——北衙军万骑之中。他曾“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②。因此，很快便赢得了万骑将领的信任和拥戴。另外，他又与交游广泛、具有一定影响的尚衣奉御王崇晔深相结纳，并通过崇晔，“遂遇利仁府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苑）总监钟绍京”③。在李隆基的苦心经营下，逐渐聚集了一股力量，为日后战胜政敌奠定了基础。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二日，中宗遇毒身亡，韦后临朝摄政，李唐社稷危如累卵。为了清除篡位道路上的障碍，韦后派人对相王、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府第“设兵潜备”，使其“内外阻绝”④。但李隆基在严兵包围的紧急形势下，仍巧妙地通过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普润等人和外界保持密切联系。他先派人同他的姑姑太平公主接头，公主大喜，立即指示他的儿子、卫尉卿薛崇简出面协助。这时，原为韦武集团党羽的兵部尚书崔日用转向隆基一边。当他得知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将要举事的消息后，“乃因沙门普润、道士王晔密诣藩邸，深自结纳，潜谋翼戴”，并向隆基建言：“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⑤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李隆基决定立即发动政变。

唐隆元年（710年）六月二十日傍晚，李隆基派人通告薛崇简、麻嗣宗、前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尉刘幽求、万骑果毅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齐集苑总监钟绍京宅第，商议政变计划。他也在道士冯处澄的掩护下，乔装改扮，秘密来到钟宅，向众人说明了

---

①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② 《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

③④ 《册府元龟》卷二十《帝王部·功业二》。

⑤ 《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

诛杀诸韦的打算，到场诸人全都表示愿意以死自效。接着，李隆基便提出了首先夺取玄武门，然后冲入宫城，诛杀韦党的政变方案。因为众人都知道宫城北面的玄武门地势高昂，俯视宫城，有高屋建瓴之势，为北衙禁军的屯防重地。玄武门的得失是政变成败的关键。因此，这个政变方案很快便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夜半时分，万骑果毅葛福顺和李仙凫等人手执刀剑直入玄武门羽林营，一举杀死了正在宿卫的羽林军首领韦播、韦璿、高嵩等韦后党羽，并对羽林兵士说："韦后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① 万骑兵士当即表示欣然从命。李隆基看到万骑兵士已全部归附，便带领刘幽求等人离开钟宅，从禁苑南门出发，向玄武门进发。钟绍京率丁匠、户奴 200 余人，执斧锯相从。隆基来到羽林营后，先派葛福顺率左万骑进攻玄德门，李仙凫率右万骑攻白鲁门，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合。福顺、仙凫等斩关而入，未遇多少抵抗，即按期到达凌烟阁前。接近三鼓时分，李隆基率总监工匠和羽林兵士，出禁苑南门，向玄武门发起进攻。由于得到守门兵士的响应，很快便占领该门，并向太极殿大呼而进。宿卫中宗灵柩的诸卫兵听到喊声后，均披甲响应。韦后闻讯，慌忙逃入飞骑军营。已经归附的飞骑兵士立即将其斩首，送于隆基。政变兵士冲入安乐公主住处时，公主正在照镜画眉，亦被斩首。接着，武延秀和内将军贺娄氏相继被杀于肃章门外和太极殿西。上官婉儿听到政变消息以后，执烛率宫人迎接，并拿出她和太平公主草拟的中宗遗制给刘幽求等人观看，乞求不死。但隆基不许，也被斩于旗下。当晚，隆基率兵在宫内悉诛诸韦及其党羽，拂晓时分，宫内平定。这时，隆基入见其父相王李旦，叩头告知不事先奏报之罪。相王抱头痛哭说："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② 这一天，相王下令关闭宫门及京师诸门，搜捕诸韦亲党。韦温、宗楚客、宗晋卿、赵履温、韦巨源、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先后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被杀。兵部侍郎崔日用率兵在长安杜曲韦氏聚居之地诛杀韦氏，虽襁褓婴儿亦无幸免。

六月二十三日，少帝重茂禅位于相王。次日，相王登基，是为唐睿宗。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七月，大赦天下，改元景云。

睿宗即位不久，刚趋平静的政局又出现危机。导致政局混乱的根源主要来自太平公主。

原来太平公主是个权势欲极强的女人。武则天统治时期即“每预谋议”，且极富“权谋”。只是由于当时“宫禁严峻，事不令泄”，故她尚能“畏惧自检”①。神龙元年（705年），因参预“五王政事”，以预诛张易之密谋有功，被进号镇国太平公主，权势日隆。平定韦武集团以后，她更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不但取得了大量财富，过着骄奢淫佚的糜烂生活，而且权势欲恶性膨胀。史载“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甚至“军国大权，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②。这种贪得无厌的权势欲必然驱使她要和已被立为太子的李隆基之间发生冲突。景云元年（710年）十月，即隆基被立为太子的第四个月，太平公主就散布流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③既而又派人严密监视太子行动，就连太子的东宫官属也多被收买。因此，太子的举动言行，她都了如指掌。并时常在睿宗处密告太子，隆基被弄得深不自安，唐睿宗也觉得无所适从。

景云二年（711年）正月下旬，太平公主在大明宫光范门内会见宰相，公开提出改易太子的念头。只是因为受到了宋璟的据理驳斥，才遭到宰相拒绝。但这就标志着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之间的冲突已经公开化了。

由于太平公主步步进逼，李隆基的处境日益困窘。宰相姚崇

---

①②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攸暨妻太平公主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元年十月。

和宋璟遂秘密向睿宗上言，请求将睿宗长子、宗王成器和高宗的长孙、邠王守礼由左右卫大将军出为州刺史，罢去隆基之弟岐王隆范和薛王隆业左右羽林大将军之职，使其任东宫左、右率之职。企图以此巩固太子地位，削弱太平公主的威胁。并请将太平公主和武攸暨夫妇于洛阳安置。这个建议被睿宗当即采纳，只是将太平公主移置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

李隆基在太平公主的进逼下，采取退让策略，先示之以弱。因为隆基知道他的太子地位掌握在睿宗之手，如果在没有得到睿宗示意的情况下，主动向太平公主展开进攻，一旦得罪睿宗，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他把稳固自己地位和裁抑太平公主的希望，在开始时寄托在睿宗身上。故当太平公主听到将她要安置蒲州的消息后，怒气冲冲地责问隆基时，隆基十分恐惧地将责任推到了姚崇和宋璟身上，并向睿宗请求将姚、宋二人处以极刑。其实，这是隆基有意试探睿宗的态度，究竟是偏袒儿子，还是倾向妹妹。睿宗心里自然明白，姚、宋的建议是以社稷为重的正义之辞，绝无离间之意，而且未必受隆基指示。但为了应付太平公主，他还是将姚、宋贬为外州刺史。接着，他还是坚持要太平公主移居蒲州。从这些举措可以明显看出，睿宗在儿子和妹妹两边天平的权衡上，还是倾向儿子一边的。

景云二年（711 年）二月，睿宗在召见三品以上大臣时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宰相张说回答说："此是谗人议计，拟动摇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① 这个建议使睿宗豁然醒悟。因为这样既可使太子的地位得到巩固，又可使睿宗摆脱裁抑太平公主的责任，可谓一举两得。所以睿宗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诏令太子监国，六品以上官的除拜和徒罪以下的量刑，都取太子处分。不久，睿宗又将左、右万骑和左、右羽林军编为北门四军，派太子的心腹葛福顺率领。

---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同年四月，唐睿宗又在召见三品以上大臣时，提出了要传位太子的打算。虽然由于太平公主党羽、殿中侍御史和逢尧的竭力阻挠，传位没有实现，但在四月十三日的制文中却说："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① 再次将更大权力移交太子。

景云二年（711年）五月，在太子李隆基的请求下，唐睿宗将太平公主由蒲州召至京师。

延和元年（712年）七月，太平公主利用彗星出现这一天象，派方术之士对睿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② 她的本意是想借此挑拨睿宗和太子的关系，但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加速了睿宗传位的决心。所以睿宗当即回答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③，并对太子意味深长地劝谕说："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④李隆基对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当然是心领神会的，这说明这对父子之间已经达到了无言的默契。

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唐睿宗正式下制传位太子。太平公主看到太子即位已不可逆转，遂劝睿宗仍应自总大政。

同年八月三日，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八月七日，改元先天。尊睿宗为太上皇，并下制说，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

唐玄宗即位以后，利令智昏的太平公主仍在做着女皇梦。她将当时的7个宰相中的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等4人拉为自己私党，朝中"文武大臣，大半附之"。她又控制了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等将领，掌握了部分军权。她企图利用结帮拉派等手段，驾空玄宗，进而达到君临天下的目的。

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宰相刘幽求和左羽林将军张暐看到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二年四月。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玄宗先天元年七月。

太平公主的权势日隆，密谋利用羽林军诛之，并向玄宗奏告了这个计划。玄宗这时已对睿宗的意图了如指掌，当即表示应允。但还未等计划实施，即被张時泄露出去。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玄宗只得将刘、张二人贬出京师。太平公主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在秣兵厉马，密谋举行兵变。于是，双方的斗争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以后，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决定在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四日举事。其部署是先派常元楷和李慈率羽林军进攻玄宗所在的武德殿，再由宰相窦怀贞、萧至忠和岑羲等于南衙举兵响应。但还未等动手，即被宰相魏知古所侦知，立即向玄宗作了报告。玄宗觉得事情紧急，遂与其弟、岐王隆范和薛王隆业以及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等密议对策。最后众人一致决定提前动手，先发制人。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唐玄宗令王毛仲领闲厩马及兵士300余人，从武德殿入虔化门，收斩了常元楷和李慈，并在内侍省捕杀了散骑常侍贾膺福和中书舍人李猷，在朝堂捕杀了宰相萧至忠和岑羲。窦怀贞闻讯，自缢而死。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后出首，被赐死于家。她的儿子薛崇简及其党羽被杀者数十人。七月四日，唐睿宗以太上皇的身份宣布："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① 同年十月十三日，唐玄宗将贬为外州刺史的姚崇召回长安，任为宰相。十二月一日，改元开元，开始了治理大唐的辉煌业绩。

姚崇是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人，武则天时曾两度出任宰相。又曾先后担任宋、常、越、许等州刺史。任职地方官时，"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任宰相时，更是"吏道敏捷"，"善应变成务"②，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尽管从武则天后期开始，宫闱斗争此起彼伏，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但姚

---

① 《旧唐书》卷七《睿宗纪》。

② 《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崇却能“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①。说明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唐玄宗选择姚崇任相，确是独具慧眼。

拜相之日，姚崇即向玄宗提出了“十事要说”，即“先仁义”、后“刑法”；“三数十年不求边功”；“中官不预公事”；“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对“冒犯宪纲”的“近密佞幸之徒”，“请行法”严惩；“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一切“贡献求媚”；“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对朝廷大臣，应“接之以礼”；“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大胆“进谏”；后族乱政之事，应“书之史册，永为殷鉴”②。这个“十事要说”既是姚崇针对武则天后期和中、睿二宗时期的弊政提出的施政纲领，也是当时整饬吏治、稳定政局和增强国力的当务之急。故唐玄宗均一一应允。这说明这对君臣已经达成了心理上的相互默契。

姚崇还是当时一位杰出的无神论者。开元三、四年(715～716年)，山东、河南地区两次蝗虫成灾，田中禾苗顷刻即被食尽。当地百姓和地方官眼看蝗虫肆虐，却手不敢近，只是在田旁设祭祀恩，焚香膜拜。有的则背井离乡，流寓异地。姚崇当即建议：“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③并奏请派御史到受灾地区督促州县官员组织民众实施灭蝗。但这一建议提出后，却受到朝野官员的反对。有的认为蝗虫众多，用人力捕杀，除不可尽，有畏难情绪；大多数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④，反对捕杀蝗虫。面对这些异议，姚崇毫不动摇，他对唐玄宗立下军令状说：“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⑤终于坚定了玄宗灭蝗的决心。于是，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姚崇的灭蝗方案得到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仅汴州（治

---

①③⑤《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二十六》，玄宗开元元年十月《考异》引吴兢《升平源》。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二月。

今河南开封）一地即捕蝗14万石。故虽“连岁蝗灾，不至大饥”①。有的地方，庄稼还颇有“收获”，人“不甚饥”②。

不久，唐玄宗又将“守法持正”的宋璟任为宰相。从此，姚崇和宋璟二人相互配合，协力辅佐，被誉为一代贤相。

为了煞住从武则天后期形成的“奢靡”之风，唐玄宗于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下制说：“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③ 不久，又罢废了东西两京的织锦坊。于是，风俗大变，宫廷内外，人自节俭，国家的财政开支大为减少。

为了整饬吏治，唐玄宗还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贡。”④ 根据这一原则，他大革奸滥，裁汰冗官，精简机构，把武周以来所置的员外官、试官及斜封官等数千人，一律罢免。另外，他又把一批曾参加过诛除韦、武集团和太平公主之乱的所谓“唐元功臣”中居功自傲、利欲熏心者如刘幽求、钟绍京、姜皎、王毛仲、葛福顺等，或贬官削职，或清除赐死，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整顿吏治中，唐玄宗尤其重视对县令、刺史等地方官的选用。开元四年（716年），有人上疏说：“今岁吏部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全不简择。”玄宗当即对新选县令出题复试。结果，只有一人合格，其余200多人均不称职。其中45名成绩太差者，被“放归学问”⑤。为了提高地方官的素质和声望，改变当时重京官而轻外官的风气，唐玄宗还下令“选京官有才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后来，还进一步规定：“三省郎官有阙，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阙，先求曾

---

①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五月。

②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七月。

④ 《唐会要》卷八十一《阶》。

任县令者"①；"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②。与此同时，唐玄宗还特别重视对官吏政迹的考核与监察。为此，他还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当道按察使较量理行殿最，从第一等至五等奏闻较考，仍使吏部长官总详覆"③，考核结果要作为官员任免升降的依据。真正做到"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④ 在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开元时期的吏治日益清明，出现了官得其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为了消除财政危机，增加财政收入，唐玄宗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均田和检括户籍的运动。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10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豪强地主的"籍外占田"和荫庇逃户。结果，增户80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征客户钱数百万"⑤。

为了解决边兵军粮不足的困难，唐玄宗诏令兵民垦荒屯田。史载开元年间，在河东道、关内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边远州县和军镇等地共设置屯田1037屯，如按每屯30顷计算，全国共有3.111万顷军屯土地，大大地丰富了边境地区的军粮供应，同时，也节省了百姓的运输费用。与此同时，唐玄宗还征发民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总计这一时期全国共建56项水利设施，相当于整个唐朝所修水利工程的五分之一以上。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鉴于从武周时期开始的佛教势力及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唐玄宗接受了姚崇的建议，于开元二年（714年）二月下诏，裁汰天下僧尼，结果，以伪妄还俗者12000余人。同年八月，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写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僚与僧

---

① 玄宗：《重牧宰资望敕》，载《全唐文》卷三十五。

②③ 玄宗：《整饬吏治诏》，载《全唐文》卷二十七。

④ 玄宗：《诛裴景仙敕》，载《全唐文》卷三十四。

⑤ 《旧唐书》卷一〇五《宇文融传》。

尼交往。

由于上述改革措施的相继施行，不但使唐朝的政治日益清明，而且也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史载“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储粮，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①；粮价低廉，物资丰盛，全国各地商贾云集，“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②。正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所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朝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

三、玄宗的强兵方略

唐玄宗即位之初，边疆地区的形势仍很严峻：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东突厥余部时时都在窥测方向，伺机入侵，企图恢复突厥汗国时期的广袤疆宇；契丹族上层首领也在积极备战，梦想越过辽河，进占辽西地区；兴起于西域地区的突骑施势力也在蓄积力量，妄图吞并西域；吐蕃奴隶主贵族也想染指河西、陇右和西域地区。为了巩固边防，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步骤。

改变军制，召集募兵　从武周时期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农民被迫逃亡的现象日趋严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出现了瓦解之势。加之应役府兵受到种种剥削，地位低下，“上番多别驱使”，以致被“京师人耻之，至相辱骂，必曰侍官”③。于是府兵丁壮“逐渐逃散，年月既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④。到了开元十一年（723年），府兵丁壮逃亡现象更加严重，致使折冲府无兵可交，兵源枯竭。故宰相张说奏“请一切招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

---

① 元次山：《问进士第三》，载《全唐文》卷三〇八。

② 《通典》卷七《食货典》。

③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④ 《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

为条例”①。即停止府兵番上，改行募兵，用以解决京师的宿卫问题。这个建议被玄宗接受。次年十一月，玄宗命尚书左丞萧嵩会同京畿蒲、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等州地方长官招募当地丁壮入伍。结果，逃亡百姓“争来应募”，很快就募得兵士12万人，分为两番，宿卫京师，号称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725年），又将长从宿卫改称彍骑。不久，征戍边兵也由募兵充任，称为长征健儿。到天宝八载（749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②。至此，府兵制名存实亡，募兵制代之而兴。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改变军制，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唐玄宗在位期间，边功最为兴盛，当与实行兵农分离的募兵制度不无关系。

设置节度，增强边兵　为了增强边防力量，唐玄宗在改变军制的同时，又在周边地区相继设置节度使。到天宝元年（742年）为止，共设置了10节度，重新布局并进一步完善了边疆地区的防卫体制。关于10节度的设置地点、时间、统军及防卫任务详见第三章第四节第一项。

节度使始设时主要管理军务，不涉及行政、财务。后来，唐玄宗往往让节度使身兼营田使、支度使、采访处置使等职，兼营屯田、营田、军资及督察地方的行政事务。于是，节度使权力大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这无疑对解决边兵的军粮供应和提高兵士的战斗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当时的边疆形势来看，设立节度使和扩大边兵，仍然不失为一个巩固边防的正确步骤。只是唐玄宗在采取这一步骤时，没有重视京师防卫力量的配置，没有建立一整套对节度使进行督察、控制的约束

---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机制，以致形成了天宝末年的内轻外重之势，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大兴马政，扩充骑兵 玄宗即位以后，唐朝的养马业正处于低谷。唐高宗永隆年间（680～681年），仅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一地的牧马，就因管理不善，死失18.499万匹。武则天垂拱年间（685～688年），诸监牧马更是“潜耗太半”。到开元初年，全国的监牧马匹仅有24万匹，仅及唐初最盛时的三分之一。对此，唐玄宗于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任命王毛仲为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派其总领马政。王毛仲在任职期间，精心养马，经过10多年的勤恳饲养，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监牧马匹增至43万。王毛仲因罪免职后，养马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发展。这是因为唐玄宗在继续选用能吏、制订马政法规、发展监牧养马的同时，又批准以朔方军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南）为互市马场，每年用钱帛换取突厥的优良马种，使唐马的素质大为提高。到天宝十三载（754年），仅陇右监牧就有诸畜共60.65万头（匹），其中牧马32.17万匹。

为了复兴马政，唐玄宗还于开元九年（721年）正月下诏，以“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蓄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等优待政策，鼓励民间养马。到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①。私人养马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为边防部队提供了大量精良马匹，形成了强大的骑兵力量。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严格军法，训练士卒 唐玄宗十分重视军容、军纪等军法的贯彻执行，认为这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早在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他在新丰（今陕西临潼）骊山之下讲武阅兵之时，就因“怒军容不整”，当即下令将兵部尚书郭元振缚于旗下，欲立威斩首。虽在张说等人的劝谏下，元振被开成活罪，但仍被贬流

---

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后来，他又发布《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充，并精加简择，其有老考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战兵别简为队伍，专令教练，不得辄有使役”①。大大提高了边防部队的作战能力。

第二节　战契丹奚族收复辽西

唐玄宗即位之初，奚与契丹族上层首领率众入侵，向辽西地区大举进攻。从开元二年（714 年）开始，唐军接连对奚与契丹发动营州之战、抱白山之战和都山之战，击退了奚和契丹的入侵，收复辽西地区，巩固了东北边防。

一、营州之战

武则天神功元年（697 年），契丹首领孙万荣在唐军的打击下，部众溃散，万荣被其家奴所杀，契丹余众不能自立，遂与奚、霫等族降于突厥（详见本卷第六章第三节第一项）。唐睿宗景云元年（710 年），奚族首领李大酺遣使进献方物，睿宗待以嘉宾之礼，宴赐甚厚。但时隔不久，大酺又联合霫族大举犯塞，抢掠渔阳（今天津蓟县）、雍奴（今河北廊坊东），出卢龙塞（今河北遵化东北和宽城西南）而去。

延和元年（712 年）六月二十二日，幽州都督孙佺率兵 12 万，征讨奚族，与大酺部在冷陉相遇。孙佺先令副将李楷洛率 4000 骑兵出击，大酺以 8000 骑迎战，唐军不利。孙佺生性怯懦，不敢相救，引兵欲还。大酺乘胜追击，唐兵大败，全军覆没。孙佺和副将周以悌被俘，大酺将其献于突厥，默啜可汗将其全部处死。只有副将李楷洛和乌可利率残部逃归。睿宗遂以宋璟接替幽州都督之职。

① 玄宗：《练兵诏》，载《全唐文》卷二十六。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十一月，契丹与奚族2万余众又入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契丹与奚众大掠而去。

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唐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长史、和戎与大武等军节度大使薛讷奏请出击契丹，复置营州。营州地势险要，“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①，南面又有隋时所修运河永济渠，军需粮饷运输便利，为唐朝东北边防重镇。但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由于都督赵文翙刚愎自用，对契丹族所遇灾荒不仅不予赈济，反而将其酋长视如奴仆，肆意凌侮，激化了民族矛盾。故契丹族酋长李尽忠和孙万荣率众叛乱，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迫使唐朝把营州治所从柳城（今辽宁朝阳）移至渔阳城。营州治所东移以后，唐失去了防卫奚与契丹的有利地势，奚与契丹的叛乱得以持续多年，长期不能平定。李尽忠和孙万荣相继败死以后，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族又由于“无所依投”，被迫归附突厥。所以当薛讷关于“复治营州”的建议提出以后，很多人都随之附和，认为“若唐复建营州，（东北各族）则相帅归化矣”②。只有姚崇等少数大臣表示反对。但唐玄宗欲雪去年的冷陉之耻，已有讨击契丹之意，遂拒绝接受姚崇等人的意见，当即以薛讷为紫微黄门三品，令其与左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今属河北）刺史崔宣道等率众6万，讨击契丹与奚。于是唐为兴复营州与奚、契丹进行了多次作战。

开元二年（714年）七月，薛讷率部抵达檀州（治今北京密云）。杜宾客建言：“士卒盛夏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难以成功”，劝其休整部伍，伺机再进。但薛讷却说：“盛夏草肥，羔犊孳息，因粮于敌，正得天时，一举灭虏，不可失也。”③ 拒绝接受宾客建言，继续麾军前进。经盐城守捉（今河北遵化西北），行至滦水（今滦河）以东山峡中时，契丹伏兵从山上冲出，唐兵大

---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七月。

败，死伤十之八九，薛讷仅与数十骑突围逃出。后军将领崔宣道得唐军败北的消息后，亦向后撤退。逃至幽州后，薛讷将罪责归于崔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8人，玄宗下制将其全部在幽州处死，削除薛讷在身官爵，仅赦免了杜宾客之罪。

开元四年（716年）八月二十八日，契丹首领、李尽忠堂弟李失活及奚族首领李大酺各率所部归降，唐玄宗复置饶乐（治今内蒙古赤峰南）、松漠（治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北）二都督府，以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又置静折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以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契丹8部落酋长均拜为刺史。

开元五年（717年）三月，唐玄宗接受了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宋庆礼的建议，下制复置营州都督府于柳城，并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庆礼共同发民伕修筑柳城城池，三旬而毕。营州管内州县、镇戍皆依旧制。庆礼清正勤谨，在营州柳城附近开屯田80余所，招辑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商贸兴盛。同年十一月，契丹王李失活入朝，玄宗以东平王李续外孙女、永乐公主杨氏嫁失活为妻。

开元六年（718年）五月，李失活死，玄宗下诏以其弟李娑固袭任其职。

开元八年（720年）十一月，李娑固与契丹牙官、静折军副使可突干发生火并，可突干先发制人，首先率众袭击娑固。娑固兵败，逃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当即遣安东都护薛泰率骁勇500与奚王李大酺部偕娑固余众前往征讨，又被可突干部击败。娑固与大酺均临阵战死，薛泰被擒，营州震恐。许钦澹闻讯后即率部由营州退入渝关（今河北抚宁东），柳城失守。可突干立娑固堂弟郁干为主，并遣使谢罪。唐玄宗看到可突干势力强盛，一时不可制服，只得赦免其罪，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

开元十年（722年）闰五月，契丹主郁干入朝，玄宗以余姚县主之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嫁郁干为妻。开元十二年（724年）郁

干死，其弟吐干袭位，复妻燕郡公主。

开元十三年（725年），契丹王吐干因与可突干相互猜忌，携公主来奔，不敢复还。玄宗封其为辽阳王，留京宿卫。可突干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主。同年十一月，玄宗东封泰山，邵固南下参加封禅大典，被拜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又嫁宗室外甥女东华公主为妻。邵固返回契丹后，又遣可突干入朝进献方物，中书侍御史李元纮不甚为礼，可突干怏怏而归。

二、抱白山之战

开元十八年（730年）五月二十六日，可突干杀契丹主邵固，立屈烈为主，并率国人及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投奔唐朝。唐玄宗闻讯，立即下制，令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率部征讨，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河北等分道招募勇士。六月二十三日，玄宗又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李浚（即后来的肃宗李亨）遥领河北道行军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为副元帅，率程伯献、张文俨、宋之悌、李东蒙、赵万功、郭英杰等18总管继讨奚与契丹叛乱部众。

开元二十年（732年）二月，唐军前锋、幽州长史赵含章部与奚族契丹叛众相遇，可突干望风遁去。这时，平卢先锋将乌承玼对含章说："二虏（指奚、契丹），剧贼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诱我也，宜按兵以观其变。"①但含章却执意不纳，仍率部追赶，遂与契丹和奚众在抱白山（今河北蔚县北口外）展开激战。可突干帅伏兵一齐杀出，唐军大败。乌承玼率本部兵马从西面向契丹发动突然袭击，契丹与奚众抵挡不住，遂向后逃走。这时，代忠王李浚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的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祎和副总管、户部侍郎裴耀卿率唐军主力继至，奋勇追击，又大败契丹、奚众，可突干率残部逃脱，余众流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率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二十年三月。

5000余帐来降。李祎引兵还归。唐玄宗赐李诗琐高归义王，充归义州（治今北京房山东南）都督，将其部落徙于幽州境内安置。

同年六月，玄宗又命裴耀卿载绢20万匹，分赐奚族降部有功将领。耀卿奉命后先期而往，分道并进，一日之内，赐给完毕。等到突厥和室韦闻讯派兵在隘路阻截绢帛时，耀卿已返回幽州。

三、都山之战及张守珪、安禄山对奚、契丹进行的作战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闰三月，契丹首领可突干又率部东进抄掠。唐幽州长史薛楚玉遣副总管郭英杰及副将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等率精骑万人和归降奚众，从渝关出发迎击。双方在都山（位于今河北青龙西北）遭遇。由于可突干勾引突厥参战，兵力强盛，而唐军中的奚族降众临阵哗变，四散而逃，退居险要，唐军孤立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部伍溃散。英杰及克勤被杀，知义及守忠仍率6000余众拼死抵抗。尽管可突干多次出示英杰首级招其投降，但唐军将士无一人缴械，最后全军覆灭，无一生还。唐玄宗将薛楚玉削夺官爵，以鄯州都督、陇右节度使张守珪继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不久，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

张守珪是开元年间一位著名边将。他“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①。开元初年，曾建功西域，由一名低级军官升任左金吾员外将军，充建康军使；开元十五年（727年），又屡败吐蕃，由瓜州（治今甘肃安西东南）刺史升任陇右节度。他到幽州赴任后，训练士卒，修缮城堑，多次率部出击并击败契丹叛众。赵含章和薛楚玉任职时期屡屡失败的局面有了明显改观，士气大振，以致引起了契丹主屈烈和可突干的极大恐惧。

---

①《旧唐书》卷一〇三《张守珪传》。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二月，可突干在屡败之后，采用诈降之计，企图争得喘息之机。守珪当即派管记王悔前往接洽。王悔到达契丹牙帐后，看到契丹君臣上下不但没有归降之意，而且还将军营向西北迁徙，秘密派人勾结突厥，企图杀死王悔，举兵入侵。为了粉碎可突干的这一阴谋，王悔拉拢分典兵马的契丹牙官李过折，利用他和可突干之间相互猜忌的矛盾，唆使他袭杀可突干。李过折遂在深夜时分，率部包围了屈烈牙帐，将屈烈、可突干及其党羽悉杀无遗，并率部向唐军归降。张守珪闻讯，亲率大军进至紫蒙州（治今河北卢龙北），大耀兵力，镇摄契丹余众。同时将屈烈及可突干的首级派人送往东都，唐玄宗悬其首于天津桥南示众。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正月，契丹牙官李过折入京献捷，被玄宗任为北平王、松漠州都督。但为时不久，过折及其诸子又被其大臣涅礼（亦称泥里）所杀，只有一子名剌乾者逃奔安东得免，被封左骁卫将军。涅礼派人向唐廷上言说，过折用刑残酷，众心不安，以故杀之。玄宗赦免其罪，以其为松漠都督，并赐书责之曰："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过折是卿之王，有恶辄杀之，为此王者，不亦难乎！但恐卿为王，后人亦尔。常不自保，谁愿作王！亦应防虑后事，岂得取快目前！"① 不久，突厥引兵东击奚与契丹，被涅礼和奚王李归国率众击败。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幽州长史张守珪派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率众讨伐奚与契丹。安禄山恃勇轻进，反为所败。四月二日，守珪奏请将禄山处斩。禄山临刑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② 守珪亦惜其骁勇，遂将其解送长安。宰相张九龄批示按军法处斩，但唐玄宗却下诏赦免。张九龄虽多次固争，玄宗最终赦之。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六月，幽州部将赵堪、白真陁罗矫节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四月。

度使张守珪之令，派平卢使乌知义率部出击奚族叛众，知义不从。白真陁罗迫其出兵，知义不得已率众出讨，与奚众战于潢水（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北）之北，先胜后败。守珪闻讯，遂隐瞒败状，反以大获全胜奏闻。事泄后，白真陁罗自缢而死，守珪被贬为括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刺史。以安禄山为幽州副节度大使。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八月，安禄山又被任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不久，又升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二年（743年），又兼范阳节度使。因为安禄山多次以设会、饮酒为名，诱杀奚与契丹之众，有时多至数千人，并以此向朝廷谎报军功，由是宠遇日隆，权势渐盛。

天宝四载（745年），契丹大酋李怀秀归降，被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又以宗室之女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嫁怀秀为妻。不久，怀秀杀公主叛去，被禄山率部击败。玄宗又以契丹首领李楷洛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

天宝十载（751年）八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率兵6万，讨击契丹，并以奚族骑兵2000人为先导。从平卢军（在今内蒙古赤峰南）北行千余里，抵达土护真水（今老哈河）时，天降大雨。禄山率部冒雨昼夜兼行300余里，行至契丹牙帐，契丹大惊。由于霖雨如注，弓弩水湿皆弛，不能使用，大将何思德对禄山建言说："吾兵虽多，远来疲惫，实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临之，不过三日，虏必降。"① 禄山听后大怒，欲杀思德，思德只得自请前驱效命，才被赦免。思德貌类禄山，故契丹之众竞相向思德进攻，思德被杀。契丹以为禄山已死，士气倍增，加之前导奚骑2000余众临阵倒戈，与契丹夹击唐军，唐军大败，伤亡殆尽。禄山马鞍中箭，冠簪射落，靴履亦失，仅率20余骑突围而出，狼狈逃至师州（在今北京房山），契丹兵众仍紧追不舍。平卢守将史定方率精骑2000赴援，契丹退去，禄山才被救出。事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八月。

后，禄山将罪责归于突厥降将、左贤王哥解和河东兵马使鱼承仙，并将其斩首示众。

天宝十一载（752年）三月，安禄山又发蕃、汉步骑20万出击契丹，欲雪去秋败师之耻。但因突厥降将阿布思叛归漠北，禄山只得顿兵不进。原来阿布思归降以后，颇受玄宗赏识，给他赐名李献忠，爵奉信王，并累官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亦恃才傲物，不甘心居禄山之下，常出言不逊，辱骂禄山，遂引起禄山忌恨。故这次出征契丹，禄山特意奏请玄宗，诏令李献忠率数万同罗骑兵，同他一起出征。献忠恐怕途中被禄山所害，遂率部大掠库藏，叛归漠北，禄山只得罢兵休战。

从此以后，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为止，奚与契丹叛、附不定，所谓复治营州，亦不过是有名无实而已。

第三节　击渤海巩固东北

渤海国是由靺鞨族粟末部在唐前期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始称震国，后改渤海，亦称靺鞨。其创始人是大祚荣，曾被唐玄宗封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因此，渤海国从一开始就是在唐朝管辖之下的一个地方政权，并同唐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但在大祚荣去世，其子大武艺继立以后，渤海国企图摆脱唐朝控制，并向四邻大肆扩张。唐军奉命出击，很快便将其击败。武艺之子大钦茂继位以后，又重新恢复了渤海与唐朝的藩属关系，并仿照唐朝建立了一整套军政制度，不但进一步促进了渤海国社会的发展，也大大加深了渤海与唐朝的进一步融合。

一、渤海国的兴起及其军政制度

靺鞨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古老民族，先秦时称肃慎，汉晋时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时期又称靺鞨。世居白山（或称不咸山、徒太山、太白山、长白山）黑水（今黑龙江）之间。

隋时靺鞨拥有数十个部落，其中以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白山、黑水、粟末等七部最为强大，而这七部中又以居于粟末水（今松花江）流域的粟末部最为强盛。

隋朝初年，靺鞨诸部相率遣使朝贡，受到隋文帝杨坚的盛情款待。其使者曾向隋帝表示："臣等僻处一方，道路悠远，闻国内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得长为奴仆也。"① 这说明靺鞨在隋时已臣服中原王朝。不久，靺鞨诸部由于受到契丹族的频繁劫掠，被迫依附高丽。只有粟末部在其首领突地稽（又作度地稽）的率领下，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南下，降服于隋，被安置在柳城一带，突地稽也被隋文帝封为右光禄大夫、辽西太守。留在故地的部分粟末人则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和号室等与靺鞨先后沦为高丽附庸。

唐朝初年，靺鞨诸部散布在粟末水和黑龙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南与辽东地区相接，北与室韦为邻，西与东突厥汗国相连。当时，由于唐朝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无暇北顾，故靺鞨诸部"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②。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高丽灭亡，靺鞨诸部溃散。粟末、白山等靺鞨诸部与部分高丽人被移居营州附近，而地居最北面的黑水靺鞨却乘机大举南下，入居安车骨和伯咄故地，并与高丽遗民暗中联络，逐渐向粟末部所居营州方向推进。

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命令靺鞨籍将领李多祚率部征讨黑水靺鞨，唐军大胜，安车骨、伯咄诸部故地均被唐军占领，与粟末水及辽河流域的辖地连成一片。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武则天又在这里设置营州都督府和10多个羁縻州府，用以安置靺鞨诸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叛乱被平定以后，武则天又把胁从叛乱的靺鞨降酋乞四比羽封为许国公，粟末降酋乞乞仲象封为震国公，并赦免了他们的反

---

① 《隋书》卷八十一《靺鞨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靺鞨传》。

叛之罪。但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却拒不受命，他们趁靺鞨故地空虚之际，叛离营州，东渡辽水。武则天遂命契丹降将李楷固率兵追击。结果，乞四比羽被杀，乞乞仲象病死。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继领其众。大祚荣骁勇善战，长于用兵，他率领靺鞨与高丽部众在天门岭与唐军大战，唐军战败退回。大祚荣乘机兼并靺鞨余众，收容高丽遗民，东渡辽河，返回靺鞨故地，占有太白山（今长白山）东北和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在今吉林敦化的敖东筑城以居，这就是粟末靺鞨的最初都城，后来被称为"旧国"①。圣历元年（698年），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仍称靺鞨，实则已承认受唐之封，为唐属国。

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宇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以至成了东北地区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

唐中宗即位以后，为了专力对付突厥，曾派侍御史张行岌出使震国，进行招抚。大祚荣当即表示愿意归附，并派遣他的儿子大门艺随行岌入唐为质，宿卫京师。不久，因契丹、突厥连年寇边，道路被阻，使命不达，册封未果。

先天二年(713年),刚刚即位的唐玄宗又派郎将摄鸿胪卿、敕持节宣慰靺鞨使崔忻前往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地置忽汗州(治今吉林敦化),并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从此，震国始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渤海国正式成为唐朝版图内的一个羁縻府州。忽汗州都督府，即渤海，从此便成了唐王朝设在东北地区的一个最高军政机构。

渤海国在极盛之时，南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为界，与新罗毗邻，西南以鸭绿江之泊汋口及长岭府南境与唐相接，

---

① 王承礼:《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载《考古》1962年第十一期。

东至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5000里。在大钦茂执政时期，渤海还仿照唐朝，建立了一整套军政制度。

渤海国的行政制度称国王为“可毒夫”、“圣王”、“基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王的诏令称“教”，在世有尊号，死后有谥号，葬墓称“陵”。国王之下，设有三省六部。三省为中台、宣诏、政堂。中台省草拟和制订政令，其行政长官为右相；宣诏省与中台省职掌同，行政长官为左相；政堂省执行政令，其长官为大内相。三省之下设忠、仁、义、智、礼、信六部，为具体的职能部门，统归政堂省总管，其行政长官称“卿”。

渤海国在中央还设有中正台，为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内外百官，行政长官为大中正。此外，还设有殿中寺、宗属寺、太常寺、司宾寺、司藏寺、引膳寺、大农寺等7寺。还有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等机构。

渤海国设置上京、东京、中京、南京和西京等5京之制。5京之下，又设15府，领62州。上京龙泉府（治今黑龙江宁安渤海镇），以肃慎故地置，领龙、湖、渤三州；中京显德府（治今吉林和龙西城子），位于上京之南，领卢、显、铁、汤、荣、兴6州；东京龙原府（治今吉林珲春八连城），领庆、盐、穆、贺4州；南京南海府（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德源），以沃沮故地置，领沃、睛、椒3州；西京鸭渌府（治今吉林临江），以高丽故地置，领神、桓、丰、正4州。其中上京龙泉府为渤海首都，其余4京为京畿地区，分别控制东南西北四方。5京、5府之外，尚有10府。这10府分别实行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即建国初期在渤海本土设置的扶余、鄚颉、长岭3府，由唐廷派都督、刺史直接统治；其余在新开拓的地区设置的其余7府则任用和依靠各部落的首领，进行羁縻统治。除10府之外，又设郢、铜、涑三州，由渤海王廷直接管辖。

渤海国的兵制仿照唐朝的府兵十六卫建制，设左右猛贲卫、左右熊卫、左右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等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等编制，兵力多达数十万。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一人。全国各地设折冲府，隶属十卫之下。每个折冲府设折

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别将、兵曹、参军各一人，校尉五人。

由此可知，渤海国的军政制度均模仿唐朝，虽略有变革，但大致相似。史实证明，渤海国从建立之初就是唐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政权，是唐王朝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唐朝与渤海国的关系

如前所述，震国王大祚荣于先天二年（713年）接受唐朝的册封，将国号改称渤海以后，渤海国便成了唐朝所辖的地方政权。渤海郡王既是靺鞨粟末部的最大酋长，又是唐王朝的地方长官。因此，在渤海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大祚荣任渤海郡王期间，一直和唐保持着良好的藩属关系。故以后渤海郡王之位虽可世袭，但均须向唐朝奏报，得到认可，经过册封，才能正式继位。大祚荣被册立以后，每年都要遣使入贡。开元七年（719年）三月，大祚荣死后，渤海遣使入唐告哀，唐玄宗派左监门军率上柱国吴思谦摄鸿胪卿赴渤海吊唁，并册封其子大武艺承袭父职。大武艺即位以后，曾一度寇掠唐境，但不久即向唐廷上表谢罪，继续履行臣节。大武艺在位18年，曾先后派遣入唐朝贡的使团共有23批之多。此后继任的渤海郡王大都恪守藩臣之礼。特别是在继大武艺以后担任渤海郡王的大钦茂曾多次派人到唐都长安抄写唐礼、《汉书》、《三国志》等文化典籍，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并仿照唐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和五京之制，推行京、府、州、县行政机构和府兵制度，进一步促进了渤海国政治、军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渤海在建国以前就曾受到唐文化的深刻影响。建国以后，随着与唐政治联系的加强，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渤海国曾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到长安，进入太学，学习儒家经典，研究中原王朝的古今制度。有的还参加唐朝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宾贡进士。他们回到渤海国后，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努力传播汉族文化，为促进渤海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唐朝众多诗人的诗

作也大量传入渤海，在唐诗的熏陶下，渤海国也出现了一批诗作丰盛、造诣高深的诗人。正是由于唐文化与渤海文化的频繁交流，使渤海文化与唐文化日趋接近，以至融为一体。正如唐朝诗人温庭筠在饯送渤海王归国时所赠诗中所说："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三、唐军击败渤海国进攻

开元七年（719年）三月，大祚荣去世。同年八月，唐玄宗遣使册封其嫡子大武艺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承袭父位。大武艺继位以后，自恃国力强盛，遂不再接受唐朝管辖，擅自改年号为"仁安"，一反其父大祚荣岁岁朝贡的惯例，与唐分庭抗礼，并四出向诸邻耀武，大肆向外扩张。唐朝为了打击大武艺的叛逆行径，进一步控制渤海，遂遣使联合新罗与黑水靺鞨，从南、北方向夹击渤海。新罗与黑水靺鞨为了抵御渤海侵掠，积极与唐结盟。开元十四年(726年)，唐王朝正式设立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靺鞨酋长为都督。于是，渤海国就处在了唐朝的钳形包围之中。

大武艺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派遣其弟大门艺及其舅父任雅率兵北进，企图首先制服黑水靺鞨。大门艺由于早年曾在长安宿卫，知道唐国力兴盛，不可为敌，便劝阻武艺说："黑水请唐家官吏，即欲击之，是背唐也。唐国人众兵强，万倍于我，一朝结怨，但自取灭亡。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抗敌唐家，不事宾伏，唐兵一临，扫地俱尽。今日渤海之众，数倍少于高丽，乃欲违背唐家，事必不可。"① 但大武艺拒不听从。门艺被迫带兵北进。当进至黑水靺鞨边境之时，又一次上书固谏。武艺大怒，当即另遣堂兄大壹夏代大门艺出征，并将门艺从前线调回，企图将他处死。门艺在走投无路之时，被迫抛弃部众，间道奔唐，被诏授左骁卫将军。由于临阵易帅，将士不服调遣，故渤海国的

---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渤海传》。

北进失利。大武艺在兵败黑水靺鞨以后，又遣使向唐朝贡，并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求玄宗将其处死。唐玄宗为敷衍武艺，遂暗中派门艺前往安西（今新疆库车东），并遣使对武艺回报说："门艺穷来归我，谊不可杀，已投之（岭南）恶地。"① 不料事机泄露，武艺又上书说："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② 唐玄宗只得将门艺遣送岭南，又将出使渤海的使者李道邃和源复贬为外州刺史。

开元二十年（732年）八月，渤海郡王大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盗渡海进攻登州（治今山东蓬莱），登州刺史韦俊率众抵抗，兵败被杀。唐玄宗当即派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征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又遣使至幽州发兵，与葛福顺部联合讨伐渤海。正月二十二日，又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出使新罗，发兵进攻渤海南境。这时幽州一带连降大雪，雪深一丈有余，加之山路阻险，士卒冻饿而死者超过一半，故无功而还。大武艺率本部兵马趁势进攻，行至马都山（今河北山海关附近）时，被唐军击退。大武艺把这次战争归罪于大门艺，怒恨不已，密遣刺客潜入东都，在天津桥南对门艺行刺，门艺拼死格斗，刺客逃走，行刺未遂。玄宗下令河南府严厉搜捕，最后将刺客全部捕杀。不久，大武艺上表向唐廷谢罪，重新与唐恢复藩属关系。

四、战后唐对渤海国的政策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武艺死，其子大钦茂继立。第二年，唐玄宗遣内侍段守简持册封大钦茂为渤海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并敕令他"永为藩屏，长保忠信，效节本期，作范殊俗"③。此后又对渤海实行优待政策，允许渤海使者到内地进

① 《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渤海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渤海传》。

③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

行参观访问，并提供种种方便；允许渤海贵族子弟进入太学，学习汉族文化，其中学业优长者，还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用以促进渤海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些和平使者和贵族子弟的带动和协助下，大钦茂一反父辈穷兵黩武和侵掠四邻的扩张政策，实行偃武修文的方针，并仿照唐制建立了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统治制度，不但促进了渤海地区的社会发展，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同唐朝的友好关系。

第四节　平后突厥汗国巩固大漠南北

后突厥汗国是指东突厥叛将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德元珍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 年）纠集东突厥余众在漠北建立的又一个东突厥政权。武则天天授元年（690 年）骨咄禄可汗死，其弟默啜可汗继立。以骨咄禄和默啜可汗为首的后突厥汗国曾在武周时期大举入侵，对唐朝的北部边境和西域地区带来严重威胁。直到唐中宗即位以后，接受了边将张仁愿的奏请，在黄河以北修筑了三受降城后，后突厥汗国的入侵势头才受到一定抑制（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二项）。唐玄宗开元四年（716 年），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又策动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返回漠北，势力大振，相继对唐境南侵西扰，致使边民少有宁日。对此，唐玄宗一面加强北部边防，一面增派西域驻军，对毗伽可汗的侵扰给予了有力还击。开元末年，后突厥汗国内部内乱迭兴，国力削弱。唐朝乘机联合漠北的回纥、葛逻禄和拔悉密等部对后突厥汗国发动进攻，突厥大败。天宝四载（745 年），回纥怀仁可汗又乘后突厥汗国衰亡之际，大举进攻，白眉可汗被杀，后突厥汗国灭亡。

一、唐朝的备战政策

唐睿宗即位以后，后突厥默啜可汗企图趁唐廷内乱甫定、无暇北顾之机，亲率大军西进，进攻西域地区的突骑施和黠戛斯等

部。同时又遣使入唐，请求和亲，用以麻痹唐廷，为西线战事创造有利条件。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唐睿宗接见了默啜的和亲使者后，当即答应以宋王成器之女为金山公主，许嫁默啜，又遣御史中丞、摄鸿胪卿和逢尧出使漠北。和逢尧到达默啜牙帐后，对默啜说："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何不袭唐冠带，使之闻之。"① 默啜遂穿戴唐朝衣冠，南向再拜称臣，并遣其子杨我支及国相随逢尧入朝。延和元年（712年）八月，睿宗禅位，玄宗登极，遂绝其和亲。默啜的西征亦被大食（古阿拉伯帝国）所败。

开元元年（713年），默啜可汗又故伎重演，一面派其子杨我支特勒入朝宿卫，并请金山公主和亲，一面秣兵厉马，准备对西域地区发动再次西征。唐玄宗早已识破了默啜伎俩，遂许以蜀王之女南和县主出嫁，坚执不嫁金山公主。默啜便以和亲未成为由，准备大举入侵。面对默啜的武装挑衅，唐玄宗积极加强北部边防，又在西域地区增派军队，准备迎击默啜的西侵。

开元二年（714年）二月七日，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兵进入西域，围攻北庭都护府（治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被都护郭虔瓘率部击败。同俄特勒恃勇邀功，单骑驰至北庭城下，虔瓘指挥埋伏于道侧的唐军壮士突然杀出，同俄授首。突厥将士听说同俄有失，当即派人向唐军言和，表示愿意以军中所有资粮赎回同俄。虔瓘以同俄首级相示，突厥将士遂恸哭而去。火拔颉利发不敢返回漠北，只得投奔唐军，被玄宗封为左卫大将军、燕北郡王，并赐宅一区，奴婢10人，马10匹，缯帛1000段。

同年闰二月，唐玄宗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晙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军所在今宁夏永宁西）、定远（军所在今宁夏永宁北）和三受降城及附近诸军皆受王晙统领，并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西），置兵屯田，

---

① 《唐会要》卷九十四《北突厥》。

防备突厥。

这时，后突厥默啜可汗自恃兵强将勇，遂穷兵黩武，虐用其众，愈到晚年愈加昏暴。致使部落叛离，渐多逃散。先是漠北地区的葛逻禄等部至凉州降唐，接着，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十姓之婿高丽莫离支高简文与跌跌都督思太、高丽大酋高拱毅等相继归唐，前后共万余帐。后来，位于西域北部的胡禄屋酋长支匐忌、漠北地区的铁勒首领阿布思等，亦因屡遭默啜侵袭，归附唐朝。唐玄宗把其中大多数归降部落安置在河曲地区（今黄土高原东部、黄河南岸），对其酋长封官拜爵，赏赐物品，进行安抚。于是默啜的势力大减，对唐的威胁亦随之缓解。

开元二年（714年）四月二十五日，默啜又遣使入唐，请求和亲，并自称“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①。玄宗拒之不许。同年十月十五日，默啜又遣使求婚。唐玄宗鉴于西南吐蕃的入侵之患日益加深，陇右、河西等地皆被寇掠，西北战事吃紧，遂答应于来年出嫁公主。

开元三年（715年）四月，唐玄宗在击败了吐蕃的入侵、西线战事得以缓解之时，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总管，领赤水（在今甘肃武威西南）等军，居凉州；以左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今属山西）镇大总管，领和戎等军，居并州。勒兵以备突厥。在此期间，默啜以西突厥接踵反叛降唐，遂发兵西击葛逻禄、胡禄屋和鼠尼施三部。这三部西突厥诸族抵挡不住默啜的进攻，向唐求救。唐玄宗当即派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援助。五月十二日，玄宗又令汤嘉惠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三部相互策应，以拒突厥。默啜看到唐军大批出动，只得退回漠北。

同年七月，唐玄宗又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大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为副大总管，率兵北征。向默啜发动主动进攻。

---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四月。

开元四年（716年）年初，当北击突厥的唐军正在调动途中，刚从西域东返漠北的默啜可汗又率部北上，进击已经降唐的铁勒拔曳固部。同年六月，双方在独乐水（今蒙古境内土拉河）遭遇，拔曳固大败，兵众溃散。默啜恃胜轻进，不设防备。拔曳固被冲散的将领颉质略率残部突然从柳林中冲出，默啜猝不及防，被颉质略杀死，颉质略将其首级献于奉命出使突厥的大武军（位于今山西代县北）副将郝灵荃，灵荃立即派人送往京师。唐玄宗下令将默啜首级悬于大街示众，庆贺胜利。地处漠北的回纥、同罗、霫、仆骨及拔曳固等铁勒五部皆来归降，玄宗将其置于大武军之北。

二、呼延谷之战

默啜死后，其子匐俱小可汗立。但默啜兄子阙特勤因战功卓著，不服调遣，并率部袭杀了匐俱，默啜诸子及其亲信几乎被诛杀殆尽。不久，阙特勤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即汗位，是为毗伽可汗，国人称为“小杀”。毗伽以国固让其弟，阙特勤不受，毗伽遂以阙特勤为左贤王，专典兵马。

毗伽可汗即位之初，漠北的形势仍对后突厥汗国不利。不仅默啜的旧部心怀怨愤，时图报复，而且东方的奚族、契丹和北方的拔曳固等亦相率降唐，西方的突骑施苏禄亦自立为可汗，脱离了突厥的羁绊。对此，毗伽重新起用了默啜时期的重臣暾欲谷，稳定内部。又派人策反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唆使其返归故土。而这时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也因地少人多，过着“无马、无衣”的穷困生活，正在渐生叛意。

开元四年（716年）八月，并州长史王晙得知河曲降户企图叛离的消息后，立即上疏朝廷，奏告了河曲“却逃者甚众，南北信使，委曲通传，此辈降人，翻成细作”的情状，并预言他们即将“来逼军州，虏骑凭凌，胡兵接应，表里有敌”的发展趋势，唐军将会陷入“进退无援”的困境。最后还请求朝廷诏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并将这些降户“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

仍给程粮，送至配所”。这样，“虽复一时劳弊，必得长久安稳”①。但这条疏文却没有引起唐廷的应有重视，故疏奏未报。

同年八月底，肩负边防重任的单于副都护张知运对河曲边境地区日趋紧张的局势忧心忡忡，并采取了强有力的防范措施：“悉收降户兵仗，令渡河而南”②。知运主兵多年，素以“宽厚沉毅，外方内直，威而勇决”③而著称，局势不到至关严重的地步，决不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但突厥降户却在奉命巡边的御史中丞姜晦到来以后，抢先告状，“诉无弓矢，不得射猎”④。姜晦既对河曲形势缺乏了解，又未向张知运询问情况，即轻率地作出了将突厥降户被收夺的弓矢“悉给还之”的决定。故突厥降户在获得“抗敌之具”以后，立即聚众叛乱，向单于副都护张知运部发起突然袭击，知运仓促应敌，双方在青刚岭（今甘肃环县北）展开激战，唐军大败，知运被擒。突厥降户押送知运北行，打算献给突厥。行至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境内时，受到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讷部将郭知运的截击，突厥降户在黑山呼延谷（位于今陕西清涧境内）被唐军打败，张知运获救。突厥降户遂分左右二队渡过黄河，北投突厥。这就是震动唐廷的河曲降户叛乱事件。同年十月，唐玄宗下令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并州长史王晙亦率部渡过黄河，昼夜兼行，进行追击。结果，破其左队，斩获3000余众，其余均逃奔漠北。事后唐玄宗竟以“丧师”之罪，将张知运“斩之以徇”⑤，而对导致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御史中丞姜晦却置之不问。

三、平后突厥汗国收复失地

毗伽可汗在河曲降户跌跌思泰和阿悉烂等诸部返回漠北后，

---

①《旧唐书》卷九十三《王晙传》。

②④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十月。

③《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势力渐强，即欲南下大举犯唐。但其谋主暾欲谷却认为突厥国力同唐相比，仅及“百分之一”，加之降户诸部初来乍到，“犹尚疲惫”。因此，建议“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小杀（即毗伽可汗）又欲修筑城池，建立寺庙，暾欲谷又加劝阻说，突厥其所以能与唐朝抗衡，就是因为“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如果修造城池，“我一败，必为所擒”；“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强术”①。毗伽可汗完全接受了暾欲谷的建言，改用默啜故伎，以和亲麻痹唐朝，以武力进攻铁勒九姓，使其重新臣服后突厥汗国。

开元五年（718 年）七月，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对散居太原以北的突厥降户应增驻重兵，加强镇抚。玄宗接受上次河曲降户叛乱的教训，立即应允，并于七月二十四日置天兵军于并州，派兵 8 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

开元六年（719 年）正月初六，毗伽可汗遣使入唐，请求和亲，唐玄宗“答而不许”②。二月十一日，唐玄宗将横野军由蔚州（治今山西灵丘）移向山北（今河北蔚县南），并屯兵 3 万，牵制突厥，援助铁勒九姓降户。又令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哥等各出骑兵，分别任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皆受天兵军调遣。有事则随时出征，无事则各归本部牧猎，仍常加存抚。

开元六年（718 年）夏，唐朝册立的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死。毗伽可汗乘机率部向奚族、契丹发动进攻，奚族由于孤立无援，被突厥击败。接着，毗伽可汗又遣使与突骑施和吐蕃政权缔结和亲盟约，加强了他的政治地位，出现了中兴之势。

开元八年（720 年）六月，散居在受降城侧的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和跌跌部落暗中勾结突厥，企图攻占军城。朔方大使王晙秘密向玄宗奏请，发兵围剿。诏准后，王晙遂在受降城中设宴，引诱勺磨等入城宴饮，设伏将其全部杀死，由是河曲降户散亡殆尽。居

①②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住在大同军（位于今山西朔州东）和横野军侧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降户闻讯大惧。同年七月，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亲引 20 余骑前往慰抚，诸部始安。

不久，朔方大使王晙又奏请玄宗，发西域和奚族、契丹之众，联合进攻毗伽可汗。玄宗当即令西突厥拔悉密部首领右骁卫大将军金山道总管处木昆执米啜、坚昆都督右武卫将军右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毕、契丹都督左金吾大将军松漠郡王娑固、奚都督右金吾大将军饶乐郡王李大酺等率蕃、汉兵 30 万，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总管王晙为元帅，约期于开元八年（720 年）八月齐集稽落河（位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分道袭击毗伽可汗牙帐。毗伽可汗听到唐军大举出动的消息后，惊恐不已。但老谋深算的暾欲谷却胸有成竹地说："拔悉密今在北庭，与两蕃（指奚与契丹）东西相去极远，势必不合；王晙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轻而好利，闻命必是先来，王晙与张嘉贞不协，奏请有所不惬，必不敢动。若王晙兵马不来，拔悉密独至，即须击取之，势易为也。"①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如所料。唐军主帅王晙由于受到宰相张嘉贞的处处掣肘，使之难以按时出击。奚族新败，疮痍未复。契丹国由于可突干把持国政，与李娑固相互猜忌，皆意存观望，迟迟不能出军。只有拔悉密酋长执米啜由于对毗伽怀有破国之恨，志在复仇，遂按期到达指定地点。但由于奚和契丹及唐军主力均未到达，孤军无援，只得仓皇引退。毗伽可汗采纳暾欲谷的建议，率部尾随追击。行至据北庭 200 里处，毗伽又分兵从间道攻占北庭府城，主力直向拔悉密部发起进攻，大破其众。执米啜率残部逃至北庭，看到府城已失，只得向突厥投降。毗伽可汗在回军途中，又绕道河西，入寇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凉等州，并打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部，大掠契丹部落而去。

唐朝这次北征失利，主要由于战线拉得过长，诸军不能相互

---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配合，唐军统帅又和朝廷宰相之间相互猜忌，掣肘内耗，致使拔悉密部深入漠北后，孤立无援，招致惨败。东突厥经过这次胜利以后“尽有默啜之众”①，势力大振。

开元九年（721年）二月九日，后突厥毗伽可汗又遣使求和。唐玄宗在复书中严厉指出默啜时期“口和心叛，数出盗兵，寇抄边鄙，人怨神怒”的卑劣行径，警告毗伽可汗不要故伎重演，并希望他如果真“有诚心，则共保遐福”，否则，“无烦使者徒尔往来。若其侵边，亦有以待，可汗其审图之。”② 毗伽接书后与暾欲谷认真分析了突厥和唐朝的国力对比，深感不能再对唐犯边寇掠，急须改弦更张。于是唐与后突厥汗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开始缓解，出现了和平友好局面。

唐玄宗由于对毗伽可汗所表示的友好姿态深怀戒心，遂于开元十一年（723年）二月置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今属山西）、辽（州治今山西左权）、石（州治今山西离石）、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汾（州治今山西汾阳）、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忻（今属山西）、朔、蔚、云（州治今山西大同）等10州。

开元十二年（724年）七月，毗伽可汗遣使臣哥解颉利发入唐求婚，玄宗“以其使者轻，礼数不备，未许”③。

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唐玄宗准备东封泰山，宰相张说担心东突厥乘机南侵，建议增兵备边。玄宗采纳兵部郎中裴光庭的建议，遣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出使漠北，征其大臣入朝，参加封禅大典。毗伽遂派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并扈从东巡。同年十二月，颉利发辞归，玄宗只是厚加赏赐，并不许婚。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唐玄宗又于定（今属河北）、恒（州治今河北正定）、莫（州治今河北雄县北）、易（州治今河北易

---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九年二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十二年八月。

县)、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5州分别置北平军、恒阳军、唐兴军、高阳军、横海军等5军，加强河北边防，以备突厥。

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吐蕃大举入寇河西，并遣使持书约毗伽可汗联合侵唐。毗伽派大臣入唐朝贡，并献吐蕃之书，玄宗大悦，诏令在北境与东突厥进行绢马互市，每年用数十万匹绢帛换取突厥马匹，以助军旅，且为监牧种马，由是国马益壮。

此后，后突厥汗国内乱迭兴，国力渐弱。

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东突厥左贤王阙特勤死，唐玄宗遣使吊唁，并派出宫廷画师和石匠为其营建祀庙，镌刻《阙特勤碑》。陵墓地面的石人、石马、侍俑及碑铭至今犹存，当是中原王朝与东突阙友好关系的实物证据。接着，毗伽可汗又频繁遣使请婚。玄宗看到毗伽诚心和亲，遂许婚。毗伽遂派哥解栗必入朝答谢，并请约订婚期。

毗伽可汗虽一面向唐频繁请婚，但另一面却又插手奚与契丹的叛乱，武装干涉唐朝的平叛战争。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闰三月，当唐军与契丹在都山发生激战时，东突厥就在可突干的勾引下，夹击唐军，致使唐军不利，几乎全军覆没。这就在唐与东突厥之间的关系上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二月，东突厥大臣梅禄啜在毗伽可汗的饮食中下毒，企图毒死小杀。小杀中毒未死，发兵征讨，梅禄啜及其党羽全被诛杀。不久，毗伽可汗亦死。其子伊然可汗继立，未几亦死。毗伽之弟登利可汗又立，并遣使向唐告哀。

登利可汗即位以后，在频繁向唐派遣和平使者的同时，又伺机向唐发动侵掠。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登利趁契丹王李过折死，其子涅礼继位之机，发兵4万，向契丹进攻，企图将契丹变成东突厥的属国。由于契丹和奚族奋勇反击，加上唐军的协同作战，突厥大败，使登利的幻想化为泡影。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登利可汗又向契丹发动了第二次东侵。这时由于唐军正在西线同突骑施展开决战，无暇东顾，玄宗

只得告谕蕃、汉诸军“须有严备，远加斥堠，动静须知”①。与此同时，又致书登利，邀其“出师西行”，助唐击突骑施，答应“事成之日”，赏赐“羊马土地”和“子女金帛”②。但登利全不理会，坚持向契丹和奚族进兵。结果，“奚既破伤，殆无遗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③。于是，东突厥的气焰益炽。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七月，登利可汗被其叔父、左杀判阙特勤所杀。原来早在登利即位之初，他的两个叔父分典兵马，号称左、右杀。登利恐怕两杀专兵，势力渐盛，形成强臣逼主之势，遂与母亲设谋，首先诱杀了右杀，夺其兵权。左杀闻讯，当即勒兵向登利发起进攻，登利兵败被杀。判厥特勤遂立毗伽可汗之子为可汗。不久，骨咄叶护又杀毗伽之子，更立其弟，旋即又杀其弟，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唐玄宗决定乘后突厥汗国内乱之际，大举北伐。同年七月二十五日，诏令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慰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征讨突厥。

天宝元年（742年）七月，回纥、拔悉密及葛逻禄三部联兵向东突厥发起进攻，骨咄叶护兵败被杀。于是三部共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酋长分别为左、右叶护。东突厥余众则立叛阙特勤之子为乌苏未施可汗，以乌苏之子葛腊多为右杀。唐玄宗遣使谕令乌苏内附，乌苏不从。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在碛口（位于今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西）陈盛兵威之，乌苏大惧，遂遣使请降，但却心怀观望，迁延不至。忠嗣知道乌苏并无诚意，遣使说拔悉密、葛逻禄和回纥三部酋长，向乌苏发起进攻。结果，乌苏兵败逃遁，国中大乱。忠嗣乘机出兵北击，取其右厢以归。

同年八月十五日，后突厥汗国乌苏可汗的西叶护阿布思及右杀葛腊多、默啜之孙勃德支、毗伽可汗之女大洛公主、登利可汗之女余烛公主等率部众千余帐，接踵归降。九月九日，唐玄宗在

---

① 张九龄：《敕平卢使乌知义书》，载《曲江集》卷五。

② 张九龄：《敕突厥可汗书》，载《曲江集》卷六。

③ 张九龄：《敕张守珪安禄山书》，载《曲江集》卷五。

兴庆宫花萼楼设宴招待突厥降者，赏赐甚厚，并以葛腊多为怀恩王。同年十二月，回纥叶护骨力裴罗遣使入贡，玄宗赐爵奉义王。

天宝三载（744年）八月，拔悉密部酋长率兵向东突厥发动进攻，阵斩乌苏可汗，传首京师。东突厥余众又立乌苏之弟鹘陇匐白眉特勒，是为白眉可汗。这时，东突厥国内更加衰弱。唐玄宗诏令朔方节度使乘机北伐，王忠嗣率部行至萨河内山，与东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11部相遇，大破其众。这时，回纥与葛逻禄部酋长同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发生火并，联兵向其进攻，拔悉密部众大败，颉跌伊施可汗被杀，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并遣使向唐奏报。玄宗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回纥遂占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其后又兼并了拔悉密和葛逻禄二部，加上旧统药逻葛等九姓，共11部，各置都督，每有战事，则以拔悉密和葛逻禄二客部为先。

天宝四载（745年）春，回纥怀仁可汗率众向后突厥汗国余部发起进攻，白眉可汗被杀，传首京师。东突厥毗伽可汗之妻率余众归降。后突厥汗国亡。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①。总计后突厥汗国自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由默啜可汗创立，至此灭亡，历时50余年。

第五节　攻突骑施收复碎叶镇

（参见附图10）

突骑施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崛起于西域地区的西突厥别部。景龙三年（709年），唐中宗正式册拜突骑施首领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汗国正式成立。唐玄宗开元初期，在唐朝廷安抚政策的感召下，突骑施苏禄可汗政权在抵抗大食、吐蕃的入侵、平定内部叛乱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保卫了西部边疆的领土完整和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四载正月。

社会稳定。但从开元十四年（726 年）以后，由于唐朝边将的妄自尊大和突骑施可汗的恃勇傲慢，遂使唐与突骑施汗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一度破裂，陷入战争状态。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斗争，至天宝元年（742 年）突骑施大臣都摩度转而降唐，苏禄可汗之子吐火仙骨咄被立为十姓可汗，从而使唐在西域地区的统治更为加强。

一、突骑施的兴起

突骑施原是突厥的别种，由突骑施、车鼻施和处木昆三大主姓组成，故有“三姓突骑施之称”。这三大主姓最早居住漠北，统称铁勒。突厥汗国建立以后，被征服的铁勒诸部纷纷改变原有族名，被称为异姓突厥。在这些异姓突厥中以“三姓突骑施”的势力最为强大。

三姓突骑施中的车鼻施部最先游牧于贪汗山下的可汗俘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突厥泥撅处罗可汗时曾聚众反抗，被击败以后，部众离散，一支北徙金山（今阿尔泰山），转依东突厥；一支远徙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不久，又迁居甘、凉二州降唐，为唐将契苾何力所统；留居故地的车鼻施余部则成为阿史那贺鲁的基本部曲，并随贺鲁西迁伊丽河（今伊犁河）流域。

原居漠北的突骑施和处木昆二部曾于 6 世纪中叶随突厥木杆可汗西征，后来遂留居西域。唐太宗贞观年间，西突厥咥利失可汗整理两厢十姓时，突骑施和处木昆被划为碎叶川以东的五咄陆部落。高宗显庆初年，唐军平定贺鲁叛乱后，突骑施被一分为二：以莫贺索葛啜部置嗢鹿州，位于热海以东的库纳萨尔一带；以阿利施啜部置洁山州，位于伊丽水西。以处木昆部置匐延州，亦在碎叶水（今楚河）东。

武则天执政以后，唐朝册立的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和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由于相互火并，接踵败亡，西突厥十姓无主，动乱迭兴。吐蕃乘机攻陷安西四镇，尽有

西域南道诸国。后突厥汗国亦向西域扩张势力。为了巩固唐对西域的统治地位，改变西突厥的内乱局面，武则天曾擢授阿史那弥射之子元庆为左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汗位，统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为右钤卫将军兼濛池都护，袭继往绝汗位，统五弩失部落。企图通过元庆和斛瑟罗二可汗恢复对西突厥的统治，并南拒吐蕃，东抗后突厥汗国。西域的形势一度有所好转，相继从吐蕃手中收取了安西四镇，后突厥汗国的势力亦受到遏制。但由于元庆与斛瑟罗久在长安宿卫，不谙边事，又无统御之才，所以西突厥很快又陷入混乱。元庆狼狈逃归长安，斛瑟罗也在吐蕃和东突厥的夹击下，率残部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改号竭忠事主可汗。元庆和斛瑟罗的相继失败，说明了在西域曾显赫一时的阿史那家族已全面衰微，而异姓突厥突骑施却在首领乌质勒的率领下，迅速崛起。

乌质勒原为突骑施莫贺索葛啜部的酋长，隶属于继往绝可汗斛瑟罗，号为莫达干。斛瑟罗为政暴虐，部众惧恨。而乌质勒却善于抚恤其众，威信大增，远近诸胡争相归附，部落渐盛。乌质勒遂将部众分为 20 都督，各领 7000 人，共有精兵 14 万。协助唐军先后击败吐蕃和东突厥，克复四镇，攻占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又将牙帐设于碎叶，称碎叶川为大牙，而以弓月城（今新疆霍城西北）和伊丽水为小牙（即故牙）。这时，另一主姓车鼻施也徙居于此，于是三姓合流，势力更盛。

圣历二年（699 年），乌质勒遣子庶努入朝，武则天厚加慰抚，授以瑶池都督。

久视元年（700 年），武则天又以斛瑟罗为平西道行军大总管，还镇碎叶，重新入主西突厥十姓部落。不久，吐蕃支持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之一的阿悉吉酋长薄露发动叛乱。斛瑟罗不能抵挡，最后在唐将田扬名和封思业的支持下，才平定了这次叛乱。但斛瑟罗用刑严酷的恶性不改，因而众叛亲离。长安三年（703 年），乌质勒率领突骑施三姓与西突厥诸部相攻，斛瑟罗大败，再度入唐，不敢回归西域。这样，乌质勒就取代了阿史那家族，取得了对西

突厥十姓部落的实际统治权和全部故地。唐廷也不得不承认突骑施对西域的统治地位，于神龙二年（706年）正月，诏令摄御史大夫解琬持册赴碎叶，册立乌质勒为怀德郡王。乌质勒此时虽未称可汗，但已尽占西突厥故地，为突骑施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唐中宗派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到突骑施牙帐商议军事事宜。当时正值天降大雪，元振立于帐外，同乌质勒会谈。大雪愈积愈深，元振足不移地，而乌质勒年老体弱，不胜严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以为其父是被元振陷害而死，遂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闻讯，劝元振连夜逃走，但元振却说："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①第二天一早，他就到突骑施牙帐行吊唁之礼，哭之甚哀。娑葛终被元振的诚心所感动，和好如初。十二月二十八日，唐中宗以娑葛袭爵怀德王、嗢鹿州都督。

景龙二年（708年），娑葛与其父乌质勒时的部将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多次发生武装冲突。阙啜忠节由于兵少将微，渐不能支。安西大都护郭元振遂奏请将忠节召入京师宿卫，移其部落于瓜、沙（州治今甘肃敦煌）等州，中宗应允。阙啜忠节奉命率部东撤，行至播仙城（今新疆且末西南），同唐西域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周以悌劝忠节以重金贿赂朝廷宰相宗楚客和纪处讷，请求留在西域，发安西都护府之兵，并招引吐蕃之众，进攻娑葛。然后求立阿史那元庆之子阿史那献为可汗，招集西突厥余众，恢复西突厥汗国。这样，"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②忠节听从了以悌的建议，遣使厚贿楚客、处讷，宗、纪二人果然答应了忠节的请求。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上疏，指出如果将吐蕃引入西域，"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而忠节所求立的阿史那献同他的父兄阿史那元庆和阿史那斛瑟罗一样，都是"非有过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

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因此，忠节所请，实为“不体国家中外”的“非计”① 之举。但疏奏不纳。最后，宗楚客等人仍坚持派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又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二州及其以西诸州之兵，兼征吐蕃之众，征讨娑葛。这时娑葛所遣向唐献马的使者娑腊正在长安，闻讯后立即驰回碎叶，通报娑葛。娑葛当即派5000骑向安西进发，5000骑向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进发，5000骑向焉耆进发，5000骑向疏勒进发，对西域唐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在疏勒赤河（今克孜勒河）河口树栅防守，不敢出击。阙啜忠节率本部兵马在计舒河口（位于今新疆库车东南）迎接安抚大使冯嘉宾，娑葛派兵偷袭，忠节被擒，嘉宾被杀，侍御史吕守素亦在僻城（今新疆库车附近）被擒杀。不久，安西副都护牛师奖所率甘、凉诸州兵继至，与娑葛战于火烧城（今新疆库车东南），唐军大败，师奖战殁。娑葛乘胜攻陷安西，四镇路绝。娑葛然后遣使上表，请求唐廷处死楚客、处讷。但宗、纪二人依仗韦后之势，又奏请以周以悌代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征元振入朝，并以阿史那献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派军进驻焉耆，讨伐娑葛。

娑葛在唐军将要抵达焉耆时，上书安西大都护郭元振，揭露了宗楚客和纪处讷接受阙啜忠节贿赂的罪恶，希望元振设法阻止唐军。元振遣子携带娑葛书信间道至京，通过太平公主上奏中宗，终于扭转了朝议。周以悌被贬流白州（治今广西博白），复以元振为安西大都护，赦娑葛之罪。不久，咽面、葛逻禄、车鼻施和弓月四姓部落又归附娑葛，娑葛自立为贺腊毗伽十四姓可汗。

景龙三年（709年）七月，娑葛遣使降唐，唐中宗册拜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赐名守忠，其弟遮弩赐名守节。突骑施汗国正式建立，西域经过短暂动乱以后，又重新安定下来。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

二、唐对突骑施的安抚政策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立国仅二年的突骑施汗国内部发生叛乱。钦化可汗娑葛之弟遮弩对他所领部落少于其兄心怀不满，怒而叛投东突厥，并导引默啜可汗率兵攻打突骑施。结果，娑葛兵败被擒。默啜对遮弩说："汝于兄弟尚不和协，岂能尽心于我。"①遂将娑葛与遮弩同时在漠北杀死。

娑葛死后，西域地区的十四姓部落又陷于混乱。景云二年（711年）十二月，唐睿宗又遣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不久又擢为碛西节度使，使其安抚西域。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三月，西突厥十姓酋长阿史那都担率部叛乱，被阿史那献率兵击败，都担被杀，碎叶川以西的西突厥部落一时归降约2万余帐。同年十月，西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相继至北庭归降，玄宗命北庭都护郭虔瓘厚加抚存。十一月，又遣左散骑常侍解琬至北庭，宣慰突厥降户，便于区处有关事宜。

开元三年（715年）四月，唐玄宗鉴于西突厥十姓部落归降者不断增多，遂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统兵驻守凉州，又以左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大总管，统兵驻守并州，东西配合，防备默啜，保卫西域。

不久，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发兵西进，向西突厥葛逻禄、胡禄屋和鼠尼施三部发动进攻，屡破其众。玄宗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和左散骑常侍解琬率兵援救。同年九月，又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征讨默啜。并派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抵抗默啜。虔瓘奏请自关中招募兵士一万多人，皆给递驮、熟食，向安西进发。

这时，吐蕃与大食（古阿拉伯帝国）在早已归附唐朝的拔汗

---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那国（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内扶立阿了达为王，并发兵向拔汗那王遏波之进攻。遏波之兵败后逃奔安西，向唐军求救。正奉命在安西巡察的监察御史张孝嵩立即对安西都护吕休璟说："不救（拔汗那），则无以号令西域。"① 遂自帅附近戎落之兵万余人，由龟兹出发，西行数千里，连克数十城，长驱而进。开元三年（715年）十一月，到达拔汗那境内。孝嵩又指挥兵士向阿了达盘踞的连城发起进攻，孝嵩跃马擐甲，率部急进，与城内守军展开激战。孝嵩部连克 3 城，俘斩千余人，敌兵溃散，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躲避。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位于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大宛（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罽宾（位于今阿富汗东北）等 8 国皆遣使请降。默啜闻讯，遂退兵漠北。

突骑施钦化可汗娑葛及其弟遮弩被默啜杀死以后，原娑葛部将、车鼻施首领苏禄鸠集余众，自立酋长。由于苏禄善于"绥抚"部下，西突厥十姓部落渐相归附，势力浸盛，有兵力 20 余万，成为西域地区一支很有实力的军事力量。同年年底，苏禄遣使入京，朝见玄宗，被任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开元四年（716 年）八月，突骑施苏禄自立为可汗。

开元五年（717 年）三月，苏禄自恃部众强盛，虽职贡不阙，但却暗中存有叛唐之心。十姓可汗阿史那献准备征发葛逻禄部众讨击苏禄，玄宗不许。

同年七月，苏禄勾引大食、吐蕃之众，包围了拨换和大石城（今新疆乌什），企图占领安西四镇。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发葛逻禄等西突厥三姓兵及阿史那献部进行迎击。阿史那献对苏禄的心怀叵测忌恨不平，必欲灭亡而后快，遂身自入朝，请求给西域增派军队。但唐玄宗这时正欲对东突厥大举北伐，故对苏禄实行安抚政策，拒绝了阿史那献的请求，仅派左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抚慰苏禄。开元六年（718 年）五月，又册封苏禄为顺国公。

开元七年（719 年）十月，玄宗又册拜苏禄为忠顺可汗。在玄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三年十一月。

宗安抚政策的感召下，苏禄终于翻然悔悟，拒绝大食、吐蕃之众入境，向唐纳款效忠。

开元八年（720年）四月，大食国遣使分赴乌长（即乌苌、乌荼，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骨咄（又称阿咄罗，在今阿姆河上源瓦罕、喷赤二河之间）、俱位（又称商弥，在今吉尔吉斯山北）三国，企图诱其叛唐。三国国王在突骑施苏禄可汗的支持下，拒不相从。唐玄宗遣使赐册命给三国国王。同年十二月，玄宗又以继往绝可汗三世阿史那怀道之女为金河公主，嫁苏禄可汗为妻，作为对其镇守西域和抗拒大食入侵之功的褒奖。

开元十一年（723年），大食国又进犯拔汗那国，苏禄率兵驰援，大败其军；翌年，大食再犯拔汗那，苏禄又率部将其击败，大食将领赛义德仅以身免。史称此役为"渴水日之战"。

三、唐军收复碎叶镇

开元十四年（726年）以后，由于唐朝边将在处理同突骑施汗国的关系时妄自尊大，加之苏禄可汗的恃勇逞强，遂使双方关系破裂，又使西域地区陷入战争状态。

同年十二月，突骑施可汗之妻金河公主遣牙官驱赶战马千余匹至安西互市，使者要求按照金河公主指定的价格进行贸易。继任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同平章事的杜暹听后大怒道："阿史那（怀道之）女，何得宣教于我！"① 并派人杖其使者，拘留不遣，还拒绝与突骑施进行绢马交易。结果，1000多匹战马在风雪中冻饿而死，无一生还。苏禄可汗闻讯大怒，遂发兵进犯四镇。适逢杜暹奉命入京，代理安西副大都护的赵颐贞率部婴城自守。安西四镇的人畜储积，被苏禄掠夺殆尽，安西仅存。当苏禄听说杜暹已入相回朝的消息后，才率部撤退，并遣使入贡。

开元十五年（727年）闰九月，苏禄可汗又与吐蕃连兵，围攻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四年十二月。

安西，被赵颐贞率部击破。翌年正月，唐军又大败吐蕃于曲子城(今新疆库车东)。

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一月，吐蕃赞普由于入寇西域之众连遭失败，遣使和亲。突骑施苏禄可汗亦遣使入贡。唐玄宗在长安大明宫丹凤门设宴款待。

开元二十二年(733年)四月，突骑施酋长阿悉吉阙俟斤驱马至北庭互市，因马多绢少，同监护市易的北庭都护刘涣发生冲突。这时，前来归降的突骑施将领何羯达密告阿悉吉阙"图陷庭州"①。刘涣未经奏请，遂勒兵将其擒杀，并夺其马匹。这时，突骑施另一首领阙伊难如携带厚礼，翻越唐界，准备结好吐蕃，被唐军截获，礼物全被扣留。苏禄可汗闻讯，遂大举犯唐，"自夏以来，围逼疏勒"②，并向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发起进攻。唐玄宗为了平息这场战事，便以"擅杀彼使"之罪，诛杀刘涣，传首苏禄，又以"一州庸调"偿还马价，所扣阙伊难如及其厚礼，均派人送还吐蕃赞普，"一物不留"③。至此，苏禄可汗始引兵撤退，遣使请和。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十月，苏禄可汗又发兵进攻北庭、安西及拨换城，并射杀了拨换守将朱仁惠。这时，唐廷已识破了苏禄"外示求和，内将诱我"的"奸诈"④伎俩，决定对其实施全面反击：玄宗一面指示北庭都护盖嘉运整顿部兵，"扬声大入"，分突骑施之势，以救安西；又征调河西、朔方诸军，齐集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庭等州，加强碛西的防御力量；又传谕岭右诸国及后突厥汗国，经略大食，约其合兵攻击突骑施；另外又重新扶立西突厥阿史那献之子阿史那震袭继汗位，招辑西突厥诸部，抗击苏禄。突骑施苏禄可汗在中外大军的夹击下，东败于唐，西败于大食，国势渐衰。

---

① 《册府元龟》卷九十五《外臣部·褒异》。

② 唐玄宗：《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书》，载《全唐文》卷二八四。

③ 唐玄宗：《敕突骑施可汗书》，载《全唐文》卷二八六。

④ 唐玄宗：《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载《全唐文》卷二八六。

随着国力的日益衰弱，突骑施汗国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在不断加剧。苏禄早年“爱治其人，性勤约，每战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诸族附悦之，为尽力”，但到晚年，“愁窭不聊，故卤获稍留不分，下始贰矣”①。因此，汗国内部导致分裂，逐渐形成黄、白二姓部落。国人以娑葛部为黄姓，以苏禄部为黑姓。黑姓中又以酋长莫贺达干和都摩度（又称都摩支）两部最为强大。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六月，莫贺达干和都摩度率两部兵马夜袭苏禄，苏禄兵败被杀。但时隔不久，两部酋长又因汗位继承问题发生离异。莫贺达干立尔微特勒为黑姓可汗，都摩度立苏禄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相互攻击。莫贺达干部抵挡不住都摩度部的进攻，遣使向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求救。唐玄宗诏令嘉运招集突骑施和拔汗那以西诸国赴援。在唐军和碎叶以西诸国的强大攻势下，吐火仙可汗与黑姓可汗由相互对立变成相互联合，吐火仙与都摩度占据碎叶城，尔微特勒与莫贺达干占据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连兵以拒唐军。

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八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率本部及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王莫贺咄吐屯及史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南）王斯谨提两国之兵，协助莫贺达干向碎叶发起进攻。吐火仙可汗出兵迎战，兵败被擒。接着，盖嘉运又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詧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引兵攻入怛罗斯城，生擒黑姓可汗尔微特勒，并乘胜占领曳建城，取金河公主，将所俘获的突骑施数万之众全部交给了拔汗那王。同年九月，原隶属于突骑施汗国的西域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部皆帅众内附，仍请徙于安西都护府境内。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三月，盖嘉运献俘长安。唐玄宗将吐火仙可汗赦而不罪，又任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修义王。又擢莫贺达干为右骁卫大将军，册封石国王莫贺咄吐屯为顺义王，加拜史国王斯谨提为特进。不久，唐玄宗又接受了盖嘉运的奏请，册立阿史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昕为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之妻为交河公主。

同年十一月，莫贺达干听到阿史那昕被立为十姓可汗的消息后，大怒道："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即阿史那昕），何以赏我！"① 遂率诸部又叛。玄宗闻讯，又改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使统突骑施部众。十二月，莫贺达干虽表面声称愿意内附，但内心不服。因为莫贺达干虽被封为突骑施可汗，但仅为小可汗，阿史那昕十姓可汗的头衔并未取消，而且还是大可汗，位居莫贺达干之上。

天宝元年（742 年），唐玄宗派兵护送十姓可汗阿史那昕赴突骑施就任。行至俱兰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东）时，遭到莫贺达干部的袭击，阿史那昕被杀，西突厥阿史那氏汗位遂绝。这时，突骑施大纛官都摩度转而降唐，是年六月被册为突骑施三姓叶护，授左羽林大将军之职，并放还苏禄之子吐火仙骨啜还番，立为十姓可汗，称伊里底密施骨啜禄毗伽可汗。又令都摩度辅政，安定西域诸部。此后，突骑施归顺唐朝，唐在西域的统治便趋稳定。

第六节　战吐蕃保卫河西巩固西域

吐蕃在唐中宗和唐睿宗时期，由于内乱迭兴，国力削弱。唐廷内部也发生过多次宫闱斗争，无力外顾，所以双方保持了一段友好关系。后来，由于吐蕃用欺骗手段取得九曲之地，国力复盛。玄宗即位以后，经过改革军制，设置节度，边防力量大为加强。双方遂在河西、陇右和安西、小勃律地区展开激战，唐军最终打退了吐蕃对这些地区的进攻，巩固了唐对河西、西域和小勃律地区的统治。

一、保卫陇右、河西之战

武则天长安三年（703 年）年底，吐蕃赞普器弩悉弄率部在镇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十一月。

压南境诸部叛乱时，卒于军中，诸子争立。结果，国人立器弩悉弄之子弃隶蹜赞（亦称尺带珠丹）为赞普，时年7岁。

景龙元年（707年）三月，吐蕃赞普的祖母遣大臣悉薰热入唐廷贡献，并为其孙请婚。唐中宗许将所养雍王守礼之女金城公主嫁弃隶蹜赞赞普为妻，并于景龙四年（710年）正月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为使，送公主入藏，中宗亲自送至始平（今陕西兴平），敕改始平为金城县。

唐睿宗即位以后，接纳了摄监察御史李知古的奏请，派其征发剑南兵募经略原先叛附吐蕃的姚州（治今云南姚安北）诸蛮，被蛮酋傍名招引吐蕃兵众攻杀。在此期间，安西都护张玄表亦与吐蕃在边境地区有过多次交锋，互有胜负。吐蕃在这段时期虽与唐军经常发生摩擦但表面上仍保持友好姿态。景云元年（710年）年底，吐蕃又派人贿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求割让河西九曲之地（在今青海湖南黄河河曲之处），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之所，杨矩奏与之。九曲地区土壤肥沃，水草丰盛，利于屯兵畜牧，又与唐境接壤，吐蕃得之，国力复兴，由是复叛，大举入寇。相继与唐在河西陇右地区发生了九曲、河源之战，甘州、瓜州之战和青海、石堡城之战。

九曲、河源之战　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五日，吐蕃遣使入京，请求结盟友好，刚刚即位的唐玄宗当即应允。翌年五月二十三日，吐蕃相坌达延又在写给唐宰相的书信中，要求先遣原朔方大总管解琬赴河源（今青海西宁）划定双方疆界，再订盟约。这时解琬已年老致仕，玄宗遂将其召入朝中，拜为左散骑常侍，令其赴河源划界。解琬久居边任，深知吐蕃必怀不测，故临行前多次请求在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渭（州治今甘肃陇西）等地屯兵10万，以备吐蕃发动突然袭击，但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同年六月十一日，吐蕃遣相尚钦藏来到长安，进献盟书，但到八月二十日，吐蕃相坌达延及大将乞力徐却率兵10万，进驻兰州（今属甘肃），进攻临洮（今属甘肃），先头部队直抵渭源（今甘肃渭源东北），掠取唐监牧马匹。玄宗闻讯，立即起用曾在滦水之战中被

契丹击败、以罪免官的前并州长史薛讷，将其任为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史，以右骁卫将军郭知运为副，与太仆少卿王晙率兵出击吐蕃。并在全国大募勇士，补充河、陇兵力。同年十月，吐蕃又入寇河源。十月二日，唐玄宗下诏准备御驾亲征，并发兵10万，马4万匹，迎击吐蕃。十月十日，薛讷率部在武街（今甘肃临洮东）与吐蕃军遭遇。当时吐蕃坌达延所率10万大军屯于武街南面的大来谷。唐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晙选勇士700，穿着吐蕃战服，于深夜向坌达延部发动偷袭，又于前锋部队之后5里处多置鼓角。先遣部队接近吐蕃军营时大声呼喊，后面的鼓角闻声齐鸣。吐蕃以为唐军主力已至，惊慌逃遁，自相残杀，死伤万计。驻军武街的薛讷率主力与王晙部两面夹击，吐蕃大败。坌达延率残部向洮水逃窜，唐军紧追不舍，前后俘斩数万。

十月十四日，唐玄宗又接受宰相姚崇和卢怀慎等人的奏请，派人焚毁了吐蕃架设在黄河上的桥梁和设置在九曲附近的独山、九曲等军所。不久，玄宗又令左骁卫郎将尉迟瑰出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借此遣大臣宗俄因予至洮水请和，并要求使用敌国之礼，订立盟约。玄宗不许。由是吐蕃连年犯边，频开边衅。

开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唐廷设置陇右节度大使，领秦、河（州治今甘肃东乡西南）、渭、兰、临（州治今甘肃临洮）、武（州治今甘肃武都南）、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廓（州治今青海化隆西南）、叠（州治今甘肃迭部）、岩（州治今甘肃舟曲西北）等12州，防卫吐蕃。

开元四年（716年）二月，吐蕃发兵东进，入寇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被唐松州都督孙仁献率部大破于松州城下。

开元五年（717年）七月，吐蕃又犯九曲，被唐陇右节度使郭知运部击败。

开元六年（718年）十一月，吐蕃遣使奉表请和，乞求双方以甥舅关系签署友好盟约，彼此宰相均署名其上，玄宗又不许。翌年六月，吐蕃遣使又请结盟。玄宗回答说："昔岁誓约已定，苟信

不由衷，亟誓何益！”① 再次拒绝。

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在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西北）丧师（详见下）以后，转而向河西侵扰，又开甘州、瓜州之战。

甘州、瓜州之战　开元十四年（726年）九月七日，吐蕃大将悉诺逻及烛龙莽布支又率兵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㚟之父。接着，又进攻玉门军（军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并将所俘唐军将士放归凉州，有意引君㚟出战。君㚟登上凉州城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烛龙莽布支又率别部进攻常乐（今甘肃安西南），县令贾师顺率众拒守。瓜州陷落后，悉诺逻又率吐蕃全军会攻常乐。由于城内军民拼死守卫，吐蕃兵众攻城10多天，竟不能克，最终退去。回军途中，又焚烧了瓜州城池。当吐蕃刚离城之时，师顺即派人打开城门，收取器械，修缮守备。果然，吐蕃又遣精骑驰至城下，企图偷袭，但看到城中有备，只得撤走。

同年（726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从大斗谷（在今甘肃民乐东南扁都口）北上，进犯甘州，并大肆焚掠，企图从积石军（在今青海贵德西）西归。甘州都督王君㚟在吐蕃兵士因焚掠而疲惫之际，率部兵尾随追击。正值天降大雪，吐蕃兵士冻死者甚众。行至大非川（在今青海湖南切吉平原）时，悉诺逻下令休整士卒，但道旁的刍草、饲料已被王君㚟派人焚烧殆尽，吐蕃战马得不到喂养，死亡过半。悉诺逻只得驱兵西进，当前军踏冰渡过青海（今青海湖）西岸时，君㚟所率唐军继至，击破未及渡湖的吐蕃后军，缴获辎重、羊马万计而还。君㚟以此役之功迁羽林大将军，其父王寿亦被拜为少府监致仕。

开元十五年（727年）闰九月，吐蕃军在安西城下被唐军击败后，又遣使间道来到漠北，企图与东突厥连兵入寇。王君㚟闻讯后，即伏兵肃州（治今甘肃酒泉），企图截击。但行至甘州南之巩笔驿时，却遭到回纥瀚海司马护输余众的袭击。唐军由于寡不敌众，虽力战半日，最终全军覆没，君㚟被杀。护输载着君㚟尸体，

---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七年六月。

投奔吐蕃。凉州唐军闻讯，出城追赶，护输弃尸而走。唐军此役失利，使河、陇震动。

不久，唐玄宗以左金吾大将军信安王祎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萧嵩又将刑部员外郎裴宽引为判官，与君臭的原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河、陇地区的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接着，萧嵩又奏请以建康军（军所在今甘肃高台西南）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率余众修缮城池。筑城工作刚刚开始，吐蕃引兵突至城下，城中守军相顾失色。张守珪急中生智，于城上置酒作乐，迷惑蕃兵。吐蕃以为唐军有备，不敢攻城而去。守珪麾军追赶，吐蕃败逃。于是守珪又继续督众修缮城池，并收合离散，士农工商各归旧业，秩序井然。朝廷为了嘉奖守珪之功，遂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瓜州都督府都督。

由于吐蕃在河西之战中接连获胜，使吐蕃大将悉诺逻的威名大振。萧嵩为了消除这一心腹之患，施用反间之计，派人潜入吐蕃，散布悉诺逻与唐将通谋反叛等流言蜚语。赞普果然中计，将悉诺逻收而斩之，吐蕃兵力由是渐衰。

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二月十一日，唐玄宗又制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出兵5.6万人，河西道及诸军出兵4万人，并征发关中兵万人，齐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治今甘肃靖远），于秋季戍边，至冬初无寇而罢。如遇吐蕃入寇，则相互连兵，腹背夹击。是为“防秋”。这样，河西、陇右地区的防卫力量大为加强。

开元十六年（728年）七月，吐蕃入寇安西之兵被击败以后，又遣大将悉末朗率兵入寇瓜州，被瓜州都督张守珪所败。七月十一日，唐河西节度使萧嵩及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又大破吐蕃于渴波谷（今青海湖西），吐蕃败走。张忠亮率部尾随追击，乘胜攻占了大莫门城（今青海共和东南），守卫该城的吐蕃兵众全部被俘，吐蕃架设在黄河上的骆驼桥亦被唐军烧毁。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唐左金吾将军杜宾客所部强弩手4000余众又与入寇河西的吐蕃之兵在祁连城（今甘肃民乐东南）遭遇。双方从辰时战至傍晚，吐蕃大溃，士卒逃入山谷，哭声四起。

青海、石堡城之战 为了扩大对吐蕃作战的胜利成果，唐玄宗下令河西、陇右诸军对吐蕃进行全面反击。

开元十七年（729 年）三月，瓜州都督和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刺史贾师顺奉命率军向吐蕃的大同军（军所在今甘肃敦煌附近）发动进攻，大破其众。与此同时，玄宗又诏令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与河西、陇右诸军共议攻取吐蕃石堡城（今青海湟中西南）事宜。众将大多认为该城不但地形险要，而且道途遥远，如果兵临城下，久攻不克，难以生还。因而认为应按兵观望，相机行事。但信安王祎却力排众议，引兵深入，迅速抵达石堡城下，并督军四面攻城。守城蕃兵猝不及防，纷纷投降，石堡城遂落入唐军之手。信安王祎又分兵据守要害，吐蕃由是不敢轻易东进。从此，河西、陇右诸军的占地向西拓展了 1000 余里。唐玄宗闻讯大悦，更名石堡城为振武军。

开元十八年（730 年）五月，吐蕃在河西、陇右连吃败仗以后，遣使持书在边境求和，玄宗不许。大臣皇甫惟明进谏说："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① 玄宗应允，当即命皇甫惟明与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

同年九月，皇甫惟明与张元方抵达逻些讲明来意后，赞普大喜，遂将贞观以来唐朝诸帝写给吐蕃赞普的敕书全部拿出来给惟明观看。十月，赞普遣大臣论名悉猎携表章与方物随惟明入京朝贡。表中称道："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抄，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者，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傥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② 从此，吐蕃又纳款归附。

开元十九年（731 年）正月，吐蕃遣使向唐求请《毛诗》、《春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八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八年十月。

秋》、《礼记》等汉族文化典籍。同年九月，吐蕃宰相论尚它硉又至长安，请求于赤岭（今日月山，位于今青海湖东侧）开放互市。唐玄宗均予应允。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二月，金城公主遣使请求在赤岭立碑，划分双方边界，亦得到玄宗诏准。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遣使对吐蕃边将乞力徐说："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望皆罢之"①。乞力徐始则不可，但在崔希逸的再三劝说下，双方才杀白狗为盟，各自去掉守备。这时，吐蕃正派兵西攻勃律，勃律向唐求救，玄宗诏令吐蕃退兵，吐蕃不肯，玄宗大怒。适逢崔希逸的使者孙诲因奏事正在京师，听说玄宗盛怒吐蕃的消息后，便想乘机邀功，遂将吐蕃在河西边境地区罢除武备的事情奏告朝廷，并请发兵偷袭。玄宗当即诏令内侍赵惠琮与赵诲一起察看边境形势。到达边境后，赵惠琮矫诏令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出兵袭击吐蕃，希逸不得已只得率部从凉州南下，向西深入吐蕃之境2000余里，直至青海西岸。由于吐蕃守兵寡弱，守备不修，一触即溃，死伤2000余人，乞力徐单骑逃走。惠琮、孙诲以此役之功均受到厚赏，吐蕃亦从此断绝朝贡。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三月，吐蕃为了对唐军实施报复，大举入寇河西，但被节度使崔希逸率部击败。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乘胜又攻占了吐蕃新城（今青海门源），并以其地置威戎军，派兵千人驻守。是年五月，崔希逸调任河南尹，但希逸自认为失信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玄宗遂以岐州刺史萧炅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并派人捣毁了赤岭碑。

同年七月，陇右节度使杜希望率鄯州唐军又攻占了吐蕃盘踞的黄河大桥，并在黄河东岸修建了盐泉城（今青海贵德西）。吐蕃发兵3万向盐泉城发起反攻，守城唐军兵力寡弱，将士皆惧。这时，左威卫郎将王忠嗣率所部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接连杀伤吐

---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八年十月。

蕃兵士数百人，番阵大乱。杜希望率部乘胜出击，吐蕃大败。于是置镇西军于盐泉，忠嗣以功迁左金吾将军。九月，剑南节度使王昱亦率众向吐蕃的安戎城（今四川理县西）发起进攻。由于该城地势险要，唐军久攻不克。王昱督众在该城两侧修筑了两座城池，并屯军蒲婆岭下，运输粮饷，步步进逼。吐蕃发大兵援救安戎，唐军大败，死伤数千人，王昱仅以身免，粮饷辎重全被掠夺一空。王昱以此被贬死高要（今属广东）。不久，唐玄宗又遣使册封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使其从西南牵制吐蕃。

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八月，吐蕃又派兵入寇白草军（军所在今宁夏同心东南）和安人军（军所在今青海湟源西北），被陇右节度使萧炅击破。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三月，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暗中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和被俘的唐维州（治今四川理县东北）别驾董承约为内应，率兵向安戎城进攻。在翟都局和董承的接应下，唐军顺利进入安戎城中，尽杀吐蕃守军，终于占领了该城，派监察御史许远将兵守卫。同年十月，吐蕃又发兵对安戎城和维州实施反攻。唐玄宗下诏发关中彍骑赴剑南援助。吐蕃兵退去。玄宗更命安戎城为平戎城。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告哀，并请和好，玄宗不许。

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六月，吐蕃出动 40 万大军，西入长宁桥，经河源军所（今青海西宁），向安人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但被浑崖峰骑将臧希液所率 5000 唐军击败。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吐蕃又派兵攻陷了廓州达化县（今青海贵德东），尽杀城内军民。接着，又乘胜攻占了石堡城，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不能御，只得退走。吐蕃对石堡城失而复得，势力稍振。

天宝元年（742 年）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及青海道莽布支部 3 万余众，杀伤 5000 余人。不久，河西节度使王倕又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

天宝二年（743 年）四月，皇甫惟明又率军从西平（今青海西宁）出发，进攻吐蕃，推进千余里，在洪济城（今青海共和南）大

破其众。接着，又乘胜进攻石堡城，但久攻不克，副将诸葛诩战死。

天宝五载（746年），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被宰相李林甫陷害贬官，唐玄宗以王忠嗣继任其职，并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忠嗣在朔方、河东任节度使时，持重安边，在同诸胡互市中，高抬马价，故突厥、契丹及奚族等争先卖马于唐，由是胡马愈少，唐马益壮。赴任河西、陇右以后，他又奏请将朔方、河东马9000匹调拨陇右，其军亦壮。忠嗣身兼四镇节度使，控制万里边疆，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他以郎将哥舒翰任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专责防卫吐蕃军务。

哥舒翰为突骑施人，40岁时丧父，客居长安。不久，从军河西。由于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官至陇右节度副使。早时积石军附近的麦子每年快要成熟时，吐蕃都要前来强行收割，无人抵御，以致沿边地区都把这一带称为“吐蕃麦庄”。哥舒翰担任陇右节度副使以后，在当年的麦收季节，指挥军队埋伏于积石军附近，待吐蕃强收麦子的兵士到达以后，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吐蕃兵士全被俘获，无一逃归。此后，吐蕃不敢复来。

唐玄宗欲使王忠嗣再次进攻石堡城。但忠嗣上言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屯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① 玄宗不悦。将军董延光为了迎合上意，自请带兵攻打。于是玄宗诏令忠嗣分兵相助。忠嗣虽不得已而奉诏，但因对此举存有异议，故相助不力，延光怨愤。

由于石堡城地势险要，吐蕃守军兵力强盛，故唐军久攻不克。延光遂将责任推到忠嗣身上，说他“沮挠军计”，玄宗大怒，加上李林甫又从中陷害，忠嗣被征召入朝，逮捕入狱。

天宝六载（747年）十一月，唐玄宗以哥舒翰判西平太守，充陇右节度使，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掌武威（今属甘肃）军事，充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六年十月。

河西节度使，接替忠嗣之职。

天宝七载（748 年）十二月，哥舒翰在青海龙驹岛中修筑应龙城，城中置神威军。并以此为基地，多次击败了吐蕃进攻。此后，吐蕃一度不敢兵临青海。

天宝八载（749 年），唐玄宗诏令哥舒翰率河西、陇右及突厥阿布思之兵，更增以朔方、河东兵，共 6.3 万人，向石堡城发起进攻。石堡城三面临山，均为悬岩峭壁，不可攀登，唯有一面可上。吐蕃在此贮有大量粮饷和滚木礌石，故易守难攻，唐军的多次进攻，均遭失败。这次哥舒翰率兵攻城，亦数日不拔。哥舒翰大怒，欲斩裨将高秀岩和张守瑜。高、张二将请求延期三日，再行军令。结果，如期而克，俘获吐蕃大将铁刃悉诺逻及兵士 400 人。但唐军也损失了数万士卒。不久，唐廷以石堡城为神武军。从此，河西、陇右的防卫力量大为加强。

二、收复安西之战

安西都护府是唐设在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其所辖的安西四镇是唐在西域驻军的主要军事基地。唐王朝就是通过行政机构和军事基地对西域地区实行政治统治的。自从武则天时期唐将王孝杰从吐蕃手中收复了安西四镇以后，吐蕃时刻都在幻想着重新夺回四镇之地，从而把西域纳入他的统治之下。因此，唐玄宗即位以后，安西地区就成了唐与吐蕃进行争夺的重要战场。

开元五年（717 年）七月，吐蕃在突骑施苏禄可汗的导引下，再次派兵西域，与大食之兵包围了拨换和大石城，企图进而占领安西四镇。后因苏禄可汗受到唐廷招抚，拒绝吐蕃及大食兵入境，才未果而止（详见本章上节第二项）。

开元十五年（727 年）闰九月，吐蕃又派兵进入西域，企图与苏禄可汗连兵围攻安西城，被唐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败。

开元十六年（728 年）正月，吐蕃又入寇安西，被唐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在曲子城打败。

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六月，吐蕃赞普又以其女嫁突骑施苏禄可汗，企图利用和亲手段，在西域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伺机进占西域。但随着苏禄可汗政权的灭亡和突骑施汗国的衰弱，这一企图遂成泡影。故至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吐蕃入侵西域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三、讨小勃律之战

（参见附图 11）

勃律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有大、小两个国家。其中大勃律国位于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坦，小勃律国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由于勃律介于吐蕃与西域之间，吐蕃从此西进，可与唐争夺乌浒河（今阿姆河）流域的昭武九姓诸国，东进可控制四镇之地。故这里是唐与吐蕃必争的战略要地。

开元初年，小勃律国王没谨忙入唐朝贡，唐玄宗以子相待，并以其地为绥远军，使其防卫吐蕃。吐蕃亦向小勃律地区发动过多次进攻，均为所败。吐蕃赞普曾派人对没谨忙露骨地说：“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① 但没谨忙仍勒兵守境，不肯假道。

开元十年（722 年）九月，吐蕃在九曲之战被唐军打败以后，继续玩弄结盟友好的伎俩，又被唐廷识破，遂派兵西进，包围了小勃律首府孽多城（今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特），并相继攻占了该国九城之地。小勃律王没谨忙向唐北庭节度使张嵩求救说：“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② 张嵩遂派疏勒副使张思礼率番、汉步骑 4000 往援。思礼驱兵昼夜兼行，与小勃律国兵众联合夹击吐蕃，大破其众，俘斩数万。经过此役，吐蕃以后长时期不敢出兵勃律。

开元末年，吐蕃赞普又以其女嫁小勃律国王为妻，企图利用

---

①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十年八月。

和亲手段，将小勃律拉为附庸。小勃律王贪图美色，纳吐蕃女为妻。勃律国附近的 20 多个国家也都竞相效尤，归附吐蕃，断绝了对唐的朝贡关系，前后几任安西节度使如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詧等都多次发兵征讨，均无功而还。

天宝六载（747 年）三月，唐玄宗下制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高丽人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军万人，征讨小勃律。

仙芝率部从安西西行，经拨换城、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播密水（今阿富汗瓦汉附近），同年六月，到达特勒满川（今瓦罕河）。然后又兵分三路：一路由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 3000 骑兵从北谷向吐蕃连云堡（今阿富汗兰加尔）；一路由拨换守捉使贾崇瓘统领，自赤佛堂路南下；一路由高仙芝与中使边令诚率主力从护密国南下。三路兵马约定于七月十三日辰时在连云堡下会合。三路兵按时出发，如期抵达。堡中吐蕃守军仅有千人，不意唐军猝至，一时皆惊，慌乱中只能依山拒战，滚木礌石如雨而下，不可攀登。城南 15 里处据守栅寨的八九千吐蕃兵亦遥相声援。堡城之下的娑勒川水正泛滥大涨，深不可渡。仙芝挑选精锐兵马，各带三日干粮，饱餐早饭以后，强行渡过川水，登上城旁高山，呐喊挑战，城中守军被迫出城。双方激战两个时辰，蕃兵大败。城堡中和栅寨中的吐蕃守军连夜逃跑，唐军奋勇追击，俘斩 6000 余人，余皆逃入山谷。唐军获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但监军中使边令诚认为孤军深入，惧不敢进。仙芝遂留令诚率羸弱兵士守卫连云堡城，自率余众继续南进。疾行三日，到达坦驹岭（在今兴都库什山米尔峰东）上。岭下坡陡路险，两岸悬岩峭壁。仙芝恐怕兵士胆怯不进，便选遣 20 余人装扮成阿弩越城的奉迎使者，从岭下攀援而上，对唐军士兵说："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① 娑夷河即古弱水（今流经克什米吉尔吉特之北的印度河上游支流），水上架有藤桥，桥长数丈。这是吐蕃为了假道小勃

① 《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

律，用了一年时间在婆夷河上修建的一座便桥，也是吐蕃连接小勃律的唯一通道。仙芝听到“使者”的奉迎之语后，假装欢喜，兵士们也以为吐蕃必不赴援，这才一齐下岭，行40余里，抵达阿弩越城下。城中守军果然遣使相迎，唐军遂顺利进入城中。入城以后，仙芝首先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率兵先修桥梁、道路。次日，又令席元庆率1000余众行至小勃律首府孽多城下，对小勃律王说：“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① 小勃律王派城内首领相迎，元庆按照仙芝命令，将其全部拘捕。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慌忙逃入石窟躲避。仙芝率唐军主力到达后，首先处死了该国与吐蕃关系最为密切的五六个首领，然后又令席元庆督众砍断了通往吐蕃的藤桥。这时，吐蕃兵马已至婆夷水东岸，桥已被唐军砍断，吐蕃兵马只得隔水观望，不能援救。接着，仙芝又派人招谕小勃律王。小勃律王看到吐蕃兵众被隔在水东，援军路绝，生路无望，只得携公主出降，其国遂平。

天宝六载（747年）八月，仙芝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凯旋而归。九月，抵达连云堡，与边令诚会合，一起返回，并遣使告捷。抵达京师后，唐玄宗将小勃律王赦而不罪，拜为右威卫将军，留京宿卫。诏改小勃律国号为归仁，置归仁军守卫。西域诸国又重新归附于唐。高仙芝以此役之功被拜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詧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

① 《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

第九章　唐代前期军事思想与兵学著述

唐代前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其间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制约并影响甚至决定政治、经济、文化等进步情况的军事，在这一时期也以其特有的辉煌彪炳史册：府兵制达到鼎盛；军事法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创立了武举制度；轻骑兵逐步取代重甲骑兵，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增强；发生了唐初统一战争和固防拓边等多次战争；造就了诸如李渊、李世民、李靖、李勣、苏定方、刘仁轨、裴行俭、郭元振等著名军事统帅和将领，其战略谋划能力和作战指挥艺术都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批兵书，有些兵书还传入日本等国。这一时期特有的军事环境产生了丰富多采而又极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前期军事思想具有积极进取和创新求实两大特点。无论从唐初统一天下的战略指导思想看，还是从唐统一全国后实行的国防思想看，抑或从当时主要军事人物的军事思想和兵书的内容看，都体现了这两个特点。

李渊集团在唐初统一战争中，采取了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李渊在起事之前，首先卑辞厚礼以结交突厥，取得其支持，从而解除了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另外，他推戴李密，“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之为李渊集团南下争夺关中“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①。李渊攻占关东后，拥代王杨侑为帝等，都体现了为积极进取而因势借力、以屈求伸的战略思想。李渊进入关中后，剪灭群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雄的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破，先北后南，先急后缓，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兼施，也获得成功。唐统一天下的战略是从其自身的力量、所处的地位以及当时的形势出发制定的，既积极进取，又从实际出发，因而李渊集团能在激烈的斗争中生存、发展、壮大，并最后统一全国。

唐统一全国后，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唐太宗时期是如此，高宗、武后等基本都是以此思想为指导。高宗时，苏定方征西突厥，裴行俭用兵西域，武后时用兵突厥和吐蕃等，都体现了唐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顺则抚、叛则伐的政策。这些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只是到了玄宗时，才把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推向极端，发展到穷兵黩武的地步，因而导致自己走向反面。

综观唐代兵学发展情况，大致呈“兴—衰—兴”马鞍形状。唐代初期，兵学兴盛，出现了一批兵书。太宗之后至安史之乱前这一时期，兵书为史籍所著录者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人们在承平日久的情况下对军事问题的轻视和忽略。后来发生战乱，人们才又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于是谈兵者又多起来。所以安史之乱后，又出现了不少 的兵书。唐建国初期之所以兵学兴盛，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过较长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积累了较丰富的军事经验；二是建国后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为总结这些经验提供了条件；三是当时的统治者及整个社会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比较重视武备。唐前期兵书见于著录的虽然不少，但亡佚严重，这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兵学研究的情况和军事思想增加了困难。好在还留下了几部重要兵学著作和一些有关资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兵学著述也同样体现了积极进取和创新求实的精神。

第一节　李渊的军事思想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洮），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7 岁

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岐州刺史，荥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 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 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南犯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 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①，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②，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③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鸣，为沛公驱

①③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

② 分见《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除"①，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厥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厥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② 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借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厥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厥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③ 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

②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

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①。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②，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打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氐、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③，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

①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

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招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宇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胄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

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①。他用“空城计”败突厥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宋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拊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② 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③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瓌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

---

①③ 分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卷中。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

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 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①，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 12 道，置 12 军。三年，12 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 12 卫和东宫 6 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② 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第二节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

李世民（599～649）是唐朝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唐高祖李渊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幼聪睿，有大志，而

---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

② 《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

能屈节下士，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其深远。他曾参与谋划晋阳起兵，参加了攻克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独立指挥了击灭薛仁杲的浅水原（今陕西长武西北）之战，大败宋金刚的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之战，消灭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洛阳（今属河南）、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之战等重大作战。继位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府兵制；实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先后派兵击灭了东突厥和吐谷浑；与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和亲政策；平定薛延陀等，使“北荒悉平”，诸蕃内附，从而开创了文治武功均达鼎盛的“贞观之治”的局面。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乘机起事、夺取天下的思想

李世民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他主张，在隋末天下大乱时，应乘机起兵，“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①。他认为，起事必须进行隐蔽、周密的准备，其中主要的是争取人才，“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②，为乘机起事积蓄力量。他重视起事战略的谋划与制定，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他与晋阳令刘文静“与图大事”，赞成刘文静提出的“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以成“帝业”③ 的起事战略，并坚决将其付诸实施。他认为，一旦兴兵起事，就要坚定不移，有进无退，坚决进行到底。在李渊率军南下途中，雨久不止，又传言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有人主张还救根本（太原），更图后举。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② 《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③ 分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认为“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①，后果只能是失败。因此，他力主攻克霍邑，继续南下，对李渊定下继续前进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当军队受阻于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有人主张仍攻河东时，李世民从实际出发，反对顿兵坚城，坚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入长安，也体现了他贯彻既定战略的思想。夺取长安后，他主张暂不介入关东之争，而是先固根本，再图中原。在打败屈突通后，李渊曾派他与李建成率军10余万东征洛阳，“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世民认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② 遂引军还。在先后克平薛仁杲、刘武周，关中巩固、无后顾之忧后，再出兵东击洛阳，逐鹿中原，统一全国。这无疑是正确的战略谋划。

二、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正确料敌、因势定谋的战前决策思想 李世民认为，知彼知己是兵家大要，强调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③。为此，他十分重视平时对敌情的掌握和临阵对战场的侦察。从他协助李渊晋阳起兵的情况看，他对当时关中乃至全国的形势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从他在战前和战中对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情况的分析中，也可看到他平时对这些对手了解之深刻和准确。在战场上，他不仅仅满足于对间接情报的掌握，而是总要亲自进行实地侦察，了解敌军实力和战场形势。在准确料敌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如在洛阳、虎牢之战中，当窦建德率军支援王世充时，诸将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李世民由于对敌情有全面而准确的掌握，才能力排众议，做出了围城打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

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一举两克的正确决策；他在此战中为引诱窦建德所采用的"牧马计"，也是在他亲临前线"察敌形势"后制定的策略。

坚壁挫锐、待衰而击的持久防御思想 对力量强力、利在速战之敌，李世民主张"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①，消敌锐气，断敌给养，提高自己军队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敌人粮草不继、士气衰落或准备退却时，以反击取胜。如在二战浅水原时，开始众将请求出战，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② 经过60多天的相持，薛军果然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乘机出击，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在打败宋金刚、窦建德等人之战中，他也采用了此法。

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进攻思想 阵后反击，是李世民与敌决战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战术。他认为，使敌乘己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己乘敌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③。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先令庞玉于原南列阵，与敌将宗罗睺苦战，李世民"亲御大军，奄自原北"，"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睺大溃"④。介休之战，他令李勣先与宋金刚交手，在李勣军开始退却时，自己"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⑤，大败宋金刚军等，都是采用的此法。

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 李世民认为"兵法尚权，权在于速"⑥，主张正确料势，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使敌"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如此，则可"取之若振槁叶"⑦。反对犹豫不决，贻误战机。在取得作战决战胜利之后，应乘破竹之势，穷追猛打，

---

① 《通典》卷一五五《兵八》。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附子仁杲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九月。

④⑤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

⑥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务求将敌人全部歼灭。他在击败薛仁杲部将宗罗睺后，其舅窦轨劝他不要轻进，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势，不可失也。"① 坚持乘胜追击，迫薛仁杲献城投降。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②，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

三、文武并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李世民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③ 基于这一认识，为强化国家防卫力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恢复并发展生产，较快地扭转了因战争造成的国家经济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视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认为"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要求"农隙讲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④。同时，又反对穷兵黩武，认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⑤。在对周边各部族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主张友好相处，以文德服人，尽量不诉诸战争。贞观四年（630 年），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出兵讨伐，唐太宗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言语之间，何足介意！"⑥ 贞观十七年（643 年），有人建议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武德三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三年十二月。

④ 《帝苑》卷下《阅武篇》。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十二月。

⑥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

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唐太宗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① 不得已而用兵时，也是"必待有罪，然后讨之"②。主张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批评"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主张对不同种落"爱之如一"，用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强大的国力。对表示臣服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或和亲政策，使这些地区对唐周边敌对势力形成战略牵制或成为唐抗击外来侵略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组织反击赢得时间。反对前代帝王"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的行为，表示，这种虚名即使"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③。对外来侵扰，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保守。自唐建国以来，突厥多次侵扰唐境，唐王朝起初一直采取退让态度，有人甚至建议采取迁都的措施消极逃避，李世民坚决反对，提出"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④。贞观二年（628 年），颉利拥兵窥边，有人建议筑长城防御，李世民答："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⑤ 他批评隋炀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厥的消极做法，认为"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⑥ 在反击外来侵扰的作战中，他主张对敌务必全歼，擒捉首恶，不留后患，以求久安。唐军征东突厥之战和击吐谷浑之战等，都贯彻了他这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四、重视军制建设、善于知人用将的建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李世民高度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和对将才的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七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

③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七月。

⑤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上》。

⑥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提拔使用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从而保证了军队军政素质的提高。李世民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①，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他在位期间，整顿完善了府兵制，健全了十二卫和东宫六率中央军事统帅机构；遵循中外相维、居重驭轻的原则，合理部署全国武装力量；实行兵农结合、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和严细的番上措施；统兵权、发兵权、指挥权相分离，以保证皇帝对军权的绝对掌握，“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②；大力发展牧马业，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府兵制达到鼎盛。另外，他十分重视对将才的收罗；培养和使用，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和建树，因此，能驱驾英才，诸将都愿为他效力。一些曾是敌对营垒的人，后来也成了他得力的将帅。他对将帅十分爱护，如他听说李靖病后，命“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妪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③；听说李勣病后须用胡须灰做药引子，他就剪下自己的胡须烧化后放到药中让李勣吃，事后使李勣感动得“顿首流血”。李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他亲自给他针灸等。在用将上，他主张舍短取长、“弃怨用才”；他善于知人而后任，既已任用，就“洞然不疑”。主张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将从中御”。太宗赐李靖诏书中讲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④他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因此，战乱时期用人偏重于才；和平时期用人要重视德。反对以卑尊取人，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⑤，即善于因才而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开国皇帝之一，而且还善于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为国家又立新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载李世民问李靖之言：“光武中

---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

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③④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孙彦芳传》。

⑤ 分见《帝苑》卷上《求贤篇》、《审官篇》。

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使之继续发挥作用，此则善于将将乎?”李世民不独强调保全功臣，且“任以吏事”，堪称真正善于“将将”者。他主张对少数民族将领也充分信任，倾心依赖，使他们在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少数民族将领之多，发挥作用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中是绝无仅有的。他重视军队训练，强调“教得其道”，如赞成根据蕃、汉特点，各施其教；用讲武、狩猎等方法进行训练；适时校阅，根据校阅成绩，赏罚负责训练的官员等。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也有其难免的局限性，如他在晚年征高丽之战中，作战指挥有所失误；其用权术驾驭将领的做法也属封建糟粕等。

第三节　李靖与《大唐卫公李靖兵法》

李靖（571～649）是唐朝初期杰出的将领、军事家，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通书史，精兵法，未仕时即深得其舅韩擒虎等人的赏识。隋大业末年，任马邑丞，后归唐，被秦王李世民引为三卫，因平王世充有功，被授开府之职，后奉命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筹划消灭萧铣之事。武德四年（621年）正月，李靖看到萧铣猜疑乱杀手下将领，政局动荡，有机可乘，遂向李孝恭献取萧铣十策。二月，被高祖李渊任命为行军总管兼孝恭长史，委以军事。九月，乘秋天江水上涨、敌疏于戒备之机，发兵攻萧铣，一举平定江汉之地，因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检校荆州刺史。受命度岭分道招抚各州，连下96州，得户60余万。武德七年，协助李孝恭镇压杜伏威余部辅公祏。李渊盛赞李靖用兵“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①

李世民继位后，李靖任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东

①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

突厥发生内乱，李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奉命率李勣等六总管征讨，采用分进合击、骁骑奇袭的战术，擒颉利可汗，平灭东突厥。战后，被人弹劾“持军无律，纵士大掠”，险被加罪。李靖无所辩。后来李世民知此事系人“谮短”李靖，加赐帛2000匹，迁尚书右仆射。李靖为人“沈厚”，于此可见一斑。八年正月，任畿内道大使，巡察风俗，以足疾上表辞官，唐太宗称赞他“富贵而知止”，“引大体”，“为一代法”。

不久，吐谷浑入侵，李靖以65岁高龄请缨率兵出战，被任命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侯君集等5总管兵远征吐谷浑，采取远程奔袭、攻其无备、穷追猛打的战术，大败吐谷浑，迫其可汗伏允自杀，更立大宁王慕容顺而还。回军后，又遭人诬告，因按验无状，免于治罪。从此，李靖闭门谢客，虽亲戚不能随便进见。十一年，改封卫国公，进开府仪同三司。死后，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景武。

李靖在军事上“临机果，料敌明”①，善于抓住战机，出奇制胜，史书称他与李勣为当时“烟阁之最”②。他不但在军事实践上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唐朝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所著《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另外史籍记载他的著作还有：《六军镜》三卷，《玉帐经》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彭门玉帐》（《崇文总目》著录）；《兵钤新书一卷》，《李仆射马前诀》一卷，《卫国公手记》一卷，《韬钤秘术》一卷，《总要》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兵家心术》一卷，《六壬用兵太一心机要诀》一卷，《明将秘要》三卷（《通志·艺文略》著录）；《集太公兵法》（《遂初堂书目》著录）；《李卫公兵机》，《李卫公四门经史》，《李卫公武略》，《李卫公元戎必胜录》（《文渊阁书目》著录）等。这些书因均已亡佚，故难辨其真伪。但即使其中有些是托名之作，亦可看

①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赞语。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史臣曰。

出李靖在军事上声名影响之大。现存世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以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反映了李靖的一些军事思想。

《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或称《卫公兵法》《李靖兵法》。《通典》多称《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此书新旧《唐书》中均无著录，但《通典·兵典》引文中保存了它的部分内容，说明在唐代确有此书。作者为李靖，素无疑问。清代学者汪宗沂据《通典》引文，参杜牧《孙子注》、宋《太平御览》等书所载该书佚文，辑成《卫公兵法辑本》，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言将务兵谋，中卷讲部伍营阵，下卷谈攻守战具。内容较《通典》有所增益，并大体进行了分类，但仍不系统连贯，非《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原貌。

从我们目前见到的《卫公兵法》内容看，其在军事学术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强调以谋取胜

该书认为，“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反对“不达权变”。指出，“计无所出”、“进退狐疑”的指挥员率兵作战，无异于“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啖虎狼”①。对如何知彼知己，决策制敌，带兵治军等，进行了具体论述。强调料敌制胜，即“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其中包括“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地势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工巧孰与己能，秣饲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② 等12个方面，较孙子的“五事”“七计”增加了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的论述也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强调军队“宁十日而不作，不可一日而不胜”③，即始终处于战而能胜的状态。书中所提出的“敌有十五形可击”（“新集；未食；不顺；后

---

① 《孙子兵法·形篇》杜牧注引李靖语。

②③ 《通典》卷一五〇《料敌制胜附》。

至；奔走；不戒；动劳；将离；长路；侯济；不暇；险路；扰乱；惊怖；不定"）；"帅有十过"（"勇而轻死；贪而好利；仁而不忍；知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洁而爱人；慢而心缓；刚而自用；懦志多疑；急而心速"）；①"间之道有五"（"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佯缓罪戾，微露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②等，是在总结新的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对《孙子》行军察敌、"将有五危"、用间思想的深化阐发。主张"用兵上神，战贵其速"③，这是在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的条件下，对《孙子兵法》速战速决思想的发挥和发展，李靖指挥的平东突厥和吐谷浑等作战，均体现了这一思想。对"形"与"势"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攻济，如以未可则击动而必败"。从实际作战指挥出发，指出造势、任势之"势"是气势、地势、因势三种，言简而中要，为行家论兵之言。

另外，该书从理论上提出了"持久战"的问题。对"兵之情主速"，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④《孙子》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只言持久之害，未及持久之利。《卫公兵法》总结了后来战争的经验，认为速决与持久应根据情况而定，二者不可偏废，从而在理论上纠正了只讲速战、反对持久的片面观点。在战争指导上将持久与速决统一起来，是《卫公兵法》军事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

① 《通典》卷一五〇《敌十五形、帅十过附》。

② 《通典》卷一五一《间谍》。

③④ 《通典》卷一五四《兵机务速》。

二、注重严明治军

《卫公兵法》注重严明治军，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严明编制法规。《卫公兵法》十分重视军队编制的合理和法规的健全，体现了以法制统兵治军的思想。如规定，诸大将出征，约授兵2万人，将其分为七军：中军4000人；左右虞侯各一军，每军各2800人；左右厢各二军，每军各2600人；马步军共计14000人，另有6000人守辎重。重视军队基层战斗编组，规定3人相得意者为一小队，3小队为一中队，5中队为一大队，另有押官、队头、执旗副队头、右右傔旗等，每大队共50人组成。每队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阵前；帐幕要按规定的尺寸、位置、方向扎布，每帐按规定的人数住宿等。《卫公兵法》对军队的法令制度都作了详细具体的条令性规定，从而将《孙子兵法》"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① 的思想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法规。

2、严明赏罚。该书认为"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要做到"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赏罚的关键在于"必行"、"必当"，"赏罚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赏罚的施行要讲求时效性，"诸有功合赏，不得逾时；有罪合罚，限三日内"。对如何实施惩罚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如，规定："搴旗斩将，陷阵摧锋，上赏；破敌所得资物仆马等，并给战士"；"与敌斗，旗头被伤，救得者，重赏"；"泄露军事"，"背军逃走"，"后期"，"无故惊军，叫呼奔走，谬言烟尘"，"奸人妻女"等，都要斩首。同时强调爱护吏士，规定"诸将三日一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食饮粗精，均劳逸，恤疾苦，视医药"等②。

3、严格训练。《卫公兵法》强调按照实战要求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规定了"教旗法"、"教阵法"及一般教战练兵的内容、方

---

① 《孙子兵法·势篇》。

② 《通典》卷一四九《杂教令》。

法和步骤。如"教旗法"规定："凡教旗，于平原旷野，登高远视处，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左右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衙官，驻队如偃月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要求"兵刃精，新甲胄，幡帜分为左右箱（厢），各以兵马便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至奔迸，退无趋走，以正合，以奇胜，听音睹麾，乍合乍离。"通过教练，使将卒熟知"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① 等。这些均体现了其严格训练、练要得法、练为战用、着眼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想。

4、重视攻守战具的制作、配备和使用。《卫公兵法》中以较多的篇幅讲述武器装备问题，特别是对攻守城器具、水战具等论述甚详，说明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作者强调武器的配备要合理，弓、弩、刀、棒、枪等抛射兵器、长短兵器、骑步兵武器等参合配置，以互相取长补短。另外，书中对通讯、侦察手段，如旗鼓、烽台、地听、马铺（驿站）、游弈（侦察巡逻的士兵）等都有具体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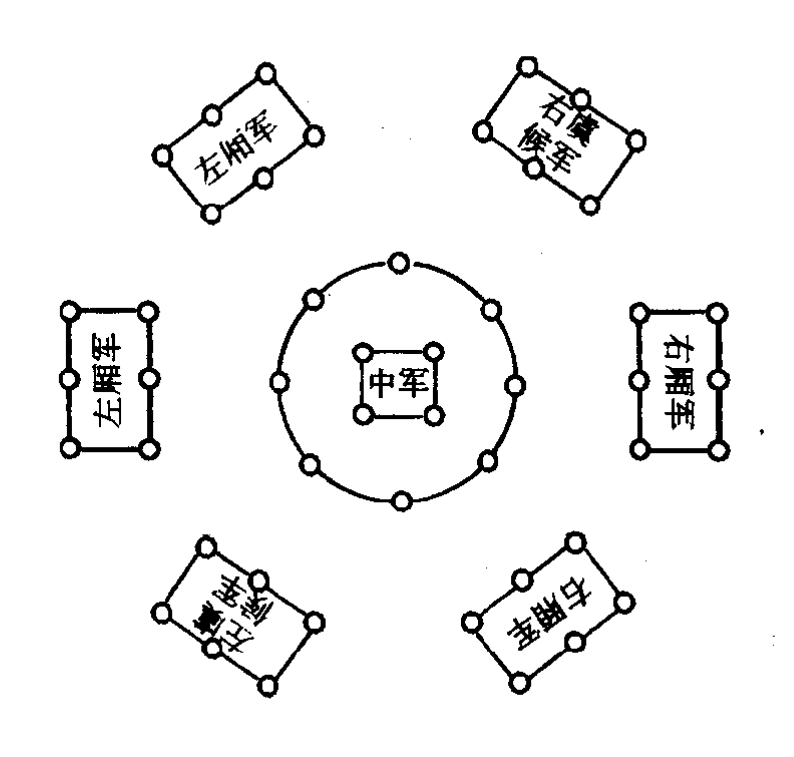
三、战术上多有创新

《卫公兵法》以较多的篇幅论及战术问题，表明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高深的造诣。强调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敌固无小，蜂虿有毒"，即使对弱小的敌人也必须慎重对待，周密谋划。认为"军无小听，听必审也；战无小利，利必大也"。在交战之前，必须全面详审地"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根据不同地形特点使用不同兵种，在通常情况下，采取多兵种协同方式："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三者相待，参合乃行"。战阵内，通常弩手居前，其次弓手，再次为战锋队步兵；后为马军、跳荡（突

① 《通典》卷一四九《法制》。

击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由骑兵组成，似不确）、奇兵；再后为驻队。不同兵种递次配备，灵活运用。提出了使用战术的一般原则：“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①。

《卫公兵法》对六花阵法、行军法、撤退法、行引法、安营法、教战阵法、旗法等多有独到的创见和详备的论述。



六花阵图

所谓六花阵，即“象六出花”的战斗队形。通常以中军居中，六军居外，中军居中，大阵包小阵、大营含小营，各阵营之间互相衔接，不同兵种合理配置，具有协同、集中、机动等特点。据《李卫公问对》及《武备志》说，六花阵有圆阵、方阵、曲阵、直阵（纵阵）、锐阵等五种阵形，这五种阵形又各有五种变化，共有25变，指挥员可根据不同的敌情、地形、攻防需要等布列不同的阵形。从《卫公兵法》看，其基本阵形是横阵和竖阵。

横阵是合七军战兵为170队，分作两梯队，前为战队，后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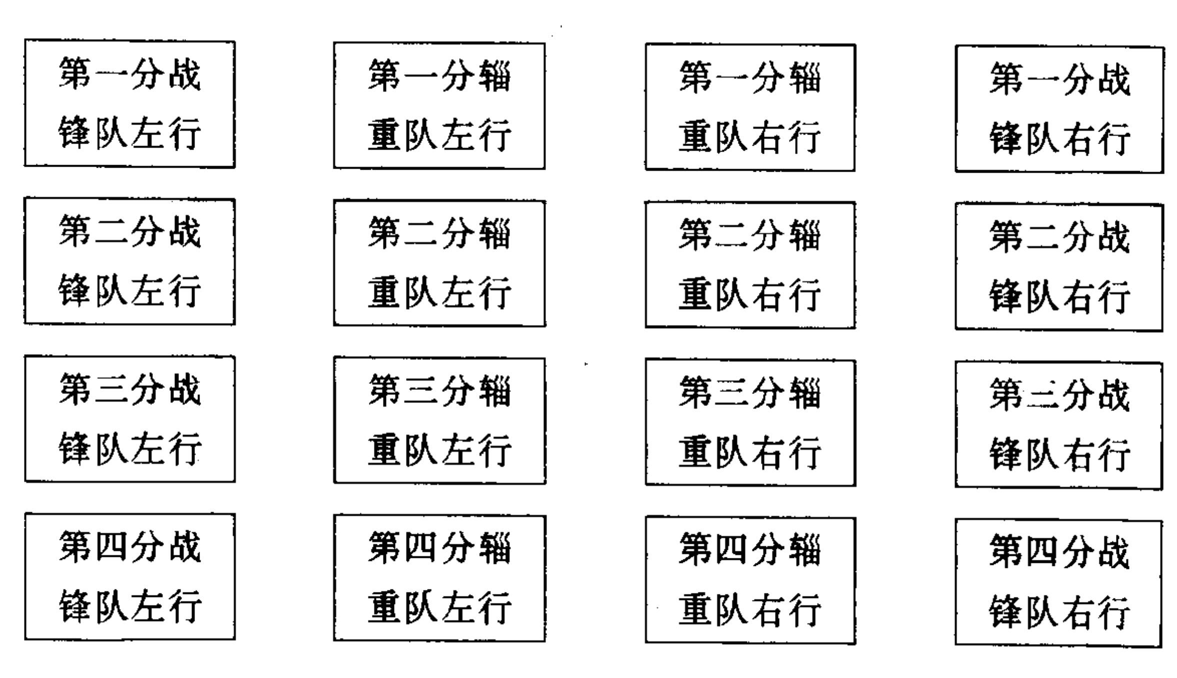
① 《通典》卷一五九《总论地形》。

驻队。每梯队横列 85 队，每队据地 20 步，85 队共据地 1700 步。每队中按弩手在前、弓手次之、然后步兵的顺序梯次配置。马军各在当队后，驻军左右，骑手下马立。听鼓音响，弩手、弓手先后发箭，步军、马军等依次接战①。

竖阵即纵队阵形。如果碰到恃险固守之敌，因地形险阻，不能列成横阵，就用竖阵。其阵法是：弩手、弓手和战锋队混合编组，相间引前；后为跳荡、奇兵；两驻队两边相翊。进攻时，按横阵之法依次接战②。

另外，李靖还创立了行引方阵和撤退阵法。

所谓行引阵法，是引导护送辎重等的行进阵形。其阵形是，辎重成 4 分队两道中间行，护送辎重的战锋队成 4 分队两道两侧行（并行分队数可根据道路宽窄变化），其阵形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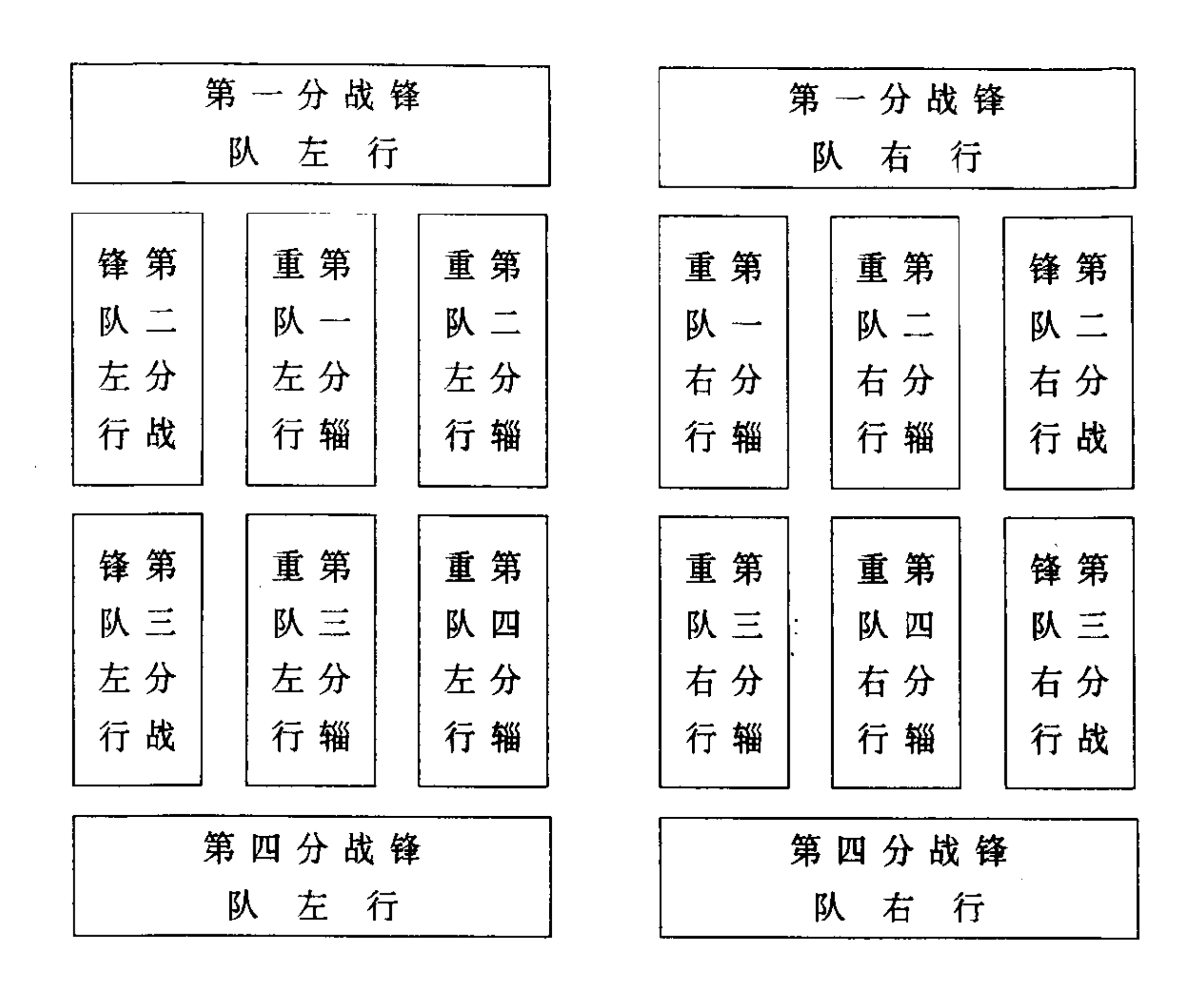


行引方阵甲

如遇敌，第一、三分辎重队分别后缩，插入二、四分辎重队。第一分战锋队横引以挡其前；第四分战锋队横列其后以殿后；第二、三分战锋队各挡其左右。从而组成方阵，以阻击来敌。其阵

①② 《通典》卷一五七《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附》。

如下图：



行引方阵乙

撤退阵法是在与敌交锋不利、须撤出战斗时，用隔队抽队撤退的阵法。其法是隔一队抽一队，所抽之队撤至阵后百步立阵，未抽之队阻击敌人掩护其撤退。已撤之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持戈、枪、刀、棒并弓弩等张施等贼，张施了，即抽前队”。前队亦后撤阵后百步立阵，准备掩护前队撤退。如此循环往复，撤出战斗。这种隔队抽队、边战边退的阵法可以“免被贼奔蹙”，多为后世兵家作为撤退战术使用。

总之，《卫公兵法》强调以谋取胜，主张严明治军，战术上多有创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可操作性强，在继承前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有新的发挥和发展，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第四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反映的唐前期军事思想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简称《问对》，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写成的问答体兵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被列为武学教科书《武经七书》之一。现存宋、元、明、清以来《武经七书》系统诸本数十种，在国外亦有一定影响。

对此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自宋以来，聚讼不已。一说确为唐太宗与李靖谈话的辑录，成书于唐初，时间在贞观十八年（644年）至贞观二十三年之间；一说为北宋阮逸或他人依托之作。认为此书是伪托之作者，首起于陈师道，他在《后山集》中写道："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苏洵），而子瞻（苏轼）言之"。何薳《春渚纪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均持此说。明马端临则认为"非阮逸之假托"。

查此书中有后人撰写的痕迹。如该书卷上载太宗之言："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安北都护府是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时由瀚海都护府改置，时唐太宗和李靖已去世20年，他们绝不会讲出"安北都护府"这一名称。另，《问对》中多次讲到"李勣"。李勣之名也是在高宗时改的。太宗在世时，曾下令天下对自己的名字"不连言者勿避"①，他不可能率先为避己讳而称"李世勣"为"李勣"。再如，晋阳起兵时，李建成统左军，李世民统右军。而《问对》则称李建成统右军，李世民统左军，显系此书作者疏忽致误，唐太宗自己是不会讲此错话的。总之，此书不是贞观时所作，更不可能是李靖亲著。其问世时间不会早于宋神宗熙宁朝。因熙宁八年（1075年）时，神宗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六月。

诏书中还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①，《问对》是“完书”，如果此书此时已然问世，神宗不会如是说。他下令要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李靖兵法，以供武人将佐学习②。可知此书系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宋史·兵志九》作“收”，《文献通考·兵九》作“皎”），中书吏房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参加了校正，最后经朱服等校定，将此书作为《武经七书》之一正式颁行全国。王震等在“提举修撰”过程中，应参考了《通典》所载《卫公兵法》以及其他史籍中所载唐太宗、李靖的事迹和言论，其中也包括由阮逸家中献出的兵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提举修撰”乃提精举要、修订撰写之意，并非编辑一本完整的《李靖兵法》。由此看来，《问对》应是宋朝官方组织人力依据散见的李靖兵法内容进行“提举修撰”而成的一部兵书。修撰者对唐太宗、李靖之事迹和思想有深入研究，在充分占有李靖兵法资料的基础上对他们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发。因此，应将此书作为反映唐代军事思想的著作来研究。

历史上对此书学术价值的评价也大相径庭。明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此书“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南宋戴少望则认为其“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认为“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从此书的内容看，应当说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价值。胡氏之言，有失偏颇。

此书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用兵思想

如何用兵，其说繁杂不一，人们往往难得其要。《问对》指出，

---

①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神宗熙宁八年二月戊寅。

③ 转引自明郑瑗《井观琐言》。

用兵的关键在于争取战争主动权。《问对》卷中记李靖的话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下载李世民的话说：“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示形造势，多方误敌，以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另外，《问对》中多次讲到“主客”，强调要使己“变客为主”，使敌“变主为客”。《问对》认为，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有个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掌握者胜，失之者败。书中对奇正、虚实、攻防、阵法等的论述，都是围绕这一战争指导原则展开的。

“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是李靖在讨论奇正问题后作出的结语。这说明，他认为讨论和运用奇正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掌握战争主动权。此书对“奇正”这一军事哲学范畴做了精譬阐发。《孙子》提出了“奇正”这一重要的军事学范畴并对其作了简要论述。后来的兵学家们虽曾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在《问对》之前，大抵只为例释，如“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①；“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② 等，未能从理论上对奇正关系做出精确论述。《问对》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它批评那种只知“以奇为奇、以正为正”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指出，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阅”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没有固定的划分，而只有“临时制变”。作者认为，正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奇，奇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正。指挥员如果按照兵书规定的什么是奇、什么是正去用兵，就会出现奇也未必奇、正亦不是正的现象。善用兵者必须善于根据情势运用奇正转变规律，善于因正而为奇，因奇而为正，做到“无不正，无不奇”，而关键在于“使敌莫测”。这样做了，就会无论奇正，均可致胜。《问对》对“奇正”的这种阐发是高于前人的。

《问对》认为，虚实问题也是为达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

---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奇正篇》。

②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

的的一个重要策略。“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因此强调要用“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侦察手段以察敌虚实。在此基础上，以奇正致敌虚实。因“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故在掌握敌人虚实之后，才能用奇正手段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①，这样，就可把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做到无往而不胜。

《问对》认为，无论攻防，也都有个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掌握主动权的手段在于“多方以误之”，即用示形手段欺骗、调动敌人，“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因而使敌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如此，即可处于主动，避免被动。为争取主动，《问对》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②。攻和守是矛盾的，但《问对》在“同归乎胜”上将其统一起来，从而深刻地阐明了攻与守的辩证关系。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和被动消极的防御都不可取，只有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互为手段和目的，才能达到“胜”。另外，在攻防问题上，《问对》还主张：“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即最大限度地暴露、疲惫敌人，阴蓄我力使之达到精锐充沛状态，后发制人，夺取胜利。

另外，为掌握战争主动权，《问对》还提出了反对迷信、利用迷信的观点，认为阴阳术数不可废，“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③；主张在考镜源流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阵法进行创新，并灵活运用，书中对鱼丽阵、八卦阵、六花阵、四兽之阵等都有独到的论述；强调安营据地，要选择有利地形，对“丘墓险阻”也要加以利用；重视士气的作用，认为“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

---

①② 分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卷下。

③《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先察吾士气，激吾胜气”等。

二、训“节制之兵”的治军思想

《问对》十分重视对军队的训练和管理，其基本思想是训练“节制之兵”，正如书中所言：“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① 为此，书中提出了“教得其道”的训练方法和爱威兼施的管理原则。

《问对》首先强调要高度重视军事训练，认为《司马法》“首序蒐狩”，就是因为“重其事也”，“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② 强调训练要“教得其道”，只有如此，“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③。《问对》提出的训练方法，一是循序渐进，分等教练：“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最后还要由皇帝校阅。如此训练的军队，则“无施不可”④。二是番汉分教，战时合用。即训练“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⑤。三是“教正不教奇”，即只教授常法，变法由被教者潜心体会，“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⑥。四是强调将帅习兵，要循序渐进，“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以求“渐而深”，反对“重空言、徒记诵”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习兵方法。

在对军队的管理上，《问对》强调“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也”，要“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②③⑤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④⑥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峻法，鲜克济焉”。对下要“推赤诚，存至公”，不应以杀戮立威，“臣倾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扬干，斩一庄贾”①。在选将用人上，强调将帅要具有忠义、持重、多谋等素质。李靖推举李勣的首要条件就是“忠义臣”；肯定用兵持重者，批评“幸而成功”者；强调将帅要善于伐谋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②。主张国君要善于将将，不但“能保全功臣”，而且能“任以吏事”③，即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能为国再立新功。对出师任将，既“必与公卿议论”，又“必使之便宜从事”，“假以权重”④，不搞将从中御等。

从军事学术上看，《问对》提出在兵权谋家中，又可分成两类："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从我国古代兵权谋家情况看，大致可以分成以《孙子》、《司马法》为代表的正兵家和以《六韬》、《三略》为代表的政兵家两种流派。这两种流派在战争观上，在对政略、兵略关系的处理上，在培养对象上等，都有所不同。如前者是培养将帅型军事家的摇篮，后者则是哺育“王者师”的乳汁。中国历代都有“张良型”（高参型）和“韩信型”（将帅型）军事家出现，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军事文化在他们头脑中分别积淀的结果。《问对》对这两种流派的特征虽没有作出明确的概括和论述，但它最早发现并提出中国兵学中的这一重要特征，是应予肯定的。

《问对》有些观点有片面性倾向，如认为“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等，就有些绝对化了。主张驭将使用封建权术，愚弄和驱使士兵为其卖命之类的观点，则属封建性糟粕。

第五节　非兵书言兵

唐前期一些非军事著作中，也有谈兵的内容。如《北堂书

---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②③④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钞》、《艺文类聚》、《群书治要》、《长短经》等书中，都有辑录、阐发兵学思想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的编撰者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先秦至唐以来形成的中国兵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概括和归纳。这种概括和归纳尽管在今天看来还不够准确、完善，但毕竟这是兵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是一件对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实践都很有益的事情，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宋明时期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的出现，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弘文馆学士虞世南抄录。其中卷一百十三至卷一百二十六《武功部》为军事内容。该书将兵学理论体系分为论兵（军事基本理论）、讲武（军事训练）、征伐（战争观）、将帅（将帅修养）、谋策（用兵谋略）、号令（令行禁止之法）、阵（阵法）、骑（骑兵）、军容（军队威仪）、兵势（军队威势）、攻战（攻守谋略）、克捷（战胜后处置方法）、守备（战备）、御边（边防）、降伏（降顺要求）、功勋（庆功封勋）等16个方面。另外，还有关于旗帜、兵器、通讯工具等武器装备方面的内容。每一项中辑录前人有关言论、故事等。如，《谋策》中辑有："谋谟为剑戟，策略为旌旗"，"上略伐智，下略伐势"，"武之善经，军之善谋"，"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不动犹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往如岳立"，"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每句话后面介绍语句出典及相关论述或事例，使之互相印证，以加深人们对这些军事原则的理解，便于读者分类掌握兵法谋略精要。另外，此书抄录大量古兵书之言，对于校勘兵书原文、整理兵书佚文等，有参考价值。

《艺文类聚》也是一部分类摘引古文献资料的图书。弘文馆学士欧阳询领修。其中卷五十九"武部"为言兵内容，内分"将帅"和"战伐"两类。"将帅"谈将帅的重要、将帅修养、将帅任用等内容；"战伐"讲战争的目的、方略等。两类中，分别摘前代经、史、子、诗、赞、表、论等之言以说明之。卷六十为"军器部"，分别介绍牙、剑、刀、匕首、铗、弓、箭、弩、弹、稍等兵

器的有关知识。这种分类方法，旨在“摘其菁华，采其指要”①，反映了作者对兵学理论主体内容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当时兵学理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浸润。

《群书治要》是一部辑录经史百家中有关国家兴衰存亡重要言论的政书。魏徵主编。它不像《北堂书钞》、《艺文类聚》那样分类辑录前人精言粹语，而是基本按照原著作名称排列，只是摘取作者认为其中之“精要”者。书内摘有《司马法》、《孙子》（在第三十三卷）、《吴子》（在第三十六卷）、《尉缭子》（在第三十七卷）、《三略》（在第四十卷）等兵书内容，另外还有一些非兵书的言兵内容。从摘录内容看，反映了作者偃武修文、重正轻奇等观点，如在《孙子兵法》题下摘录其文近千字，无篇题，一以贯之，并带曹注。选录的主要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慎战、爱卒、唯民是保、知彼知己等。作战指挥方面的内容所摘甚少；“兵者诡道”之类一无所取。

《长短经》和以上之书有所不同。它不仅辑录经典言论，而且有作者自己的阐发，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关于军事问题的观点。此书又名《长短要术》，唐赵蕤撰。据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赵蕤，梓州盐亭（今属四川）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具有隐操，不应辟召。《新唐书·艺文志》亦载，赵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时，召之不赴。《长短经》是一本谈论王霸经权达变之要的著作，内容与体例仿佛《淮南子》而又有某些发展。书成于开元四年（716年）。《长短经》作者自言此书共10卷。《四库全书》存9卷，缺第10卷《阴谋》。书中多论及军事谋略，卷九题为“兵权”，乃专门论兵之作。作者认为，“自古兵书，殆将千计。若不知合变，虽多亦奚以为？故曰少则得，多则惑。所以举体要而作《兵权》云。”

此卷将古兵学理论视为一个整体，分门别类地列举其精要，以便读者阅读和掌握。卷内分24节，体现了作者对古代军事理论体

① 欧阳询《艺文类聚序》。

系框架的认识。其内容依次为：出军、练士、结营、道德、禁令、教战、天时、地形、水火、五间、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正、掩发、还师。其中《出军》讲对战争的看法；《练士》谈军队指挥机关的组成和对士卒因材编组；《结营》言安营置阵；《道德》论将帅"恩养素蓄，策谋和同"；《禁令》说令行禁止之法；《教战》谈军事训练问题；《天时》讲对天气风候的利用；《地形》论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原则；《水火》谈水攻火攻问题；《五间》讲用间之道；《将体》论将帅条件和对将帅的考察使用；《料敌》谈对敌情的掌握和判断；《势略》言对兵势的认识与运用；《攻心》谈政治瓦解之术；《伐交》论通过外交斗争结友分敌；《格形》言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略；《蛇势》谈因势制敌和内部团结之法；《先胜》论先胜后战原则；《围师》讲包围战术；《变通》谈根据形势灵活用兵；《利害》论利害转化问题；《奇兵》讲奇正之变；《掩发》谈突袭谋略；《还师》言战后"全功保首"。在作者看来，这 24 个问题构成了中国兵学思想的基本框架。这种分法虽嫌烦细，未能深刻揭示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大致将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主要方面都讲到了。

作者通过以上各节论述的主要观点是：1、用兵的目的是"诛暴讨乱"，"以义而诛不义"。2、在治军上，主张以"勇智仁信必"的标准选拔将领，任命后，君"不可从中御"，臣"不可怀二心"。而后，"简炼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职，各取所长"，组成军队的指挥机关。将对下既要蓄恩不倦，又须禁令严明，对士卒要严格教战，用其所长。3、在作战指导上，强调重天时、地形，以水火助攻；善于用间，明于料敌，长于任势，攻心为上，注重伐交，先胜后战；批亢捣虚，以形格势禁解杂乱纠纷；善陷士卒于"同舟"，以使军队成"率然之势"；围师故阙，以瓦解敌人困兽之志；机动灵活，善于"变通"，以奇兵制胜。另外，该书还主张，人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要注意"全功保首"，人主则要以高位显功赎买他们手中的军权而不丧其身等。这些思想在其以前的兵书

中大都论及，《长短经》博采其要，进行分类综合，便于人们系统掌握兵家要义。但创新思想较少。

总之，冷兵器时代的兵学研究至唐代向总结性、阐发性、可操作性方向发展。《卫公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一些非兵书言兵内容基本体现了这些特征而各有侧重。如《卫公兵法》将《孙子兵法》等古兵书中提出的许多军事原则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发，提出了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和规章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侧重于对《孙子兵法》某些军事原则的理论阐发，特别是对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范畴论述较详，有些有独到的见解，以理论性见长。《长短经·兵权》等则偏重于对军事理论进行总结、归纳和分类，以使之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便于人们分门别类地掌握古兵法之精要。总之，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既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又有较强的适用性，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第六节　名将事略

一、“料敌应变，皆契事机”的李勣

李勣（594～669）是唐初杰出的开国和卫国拓边将领。他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唐初赐姓李，高宗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去“世”字，单名勣。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西北）人，后迁居卫南（今河南滑县东）。17 岁时参加翟让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反对起义军侵掠当地乡民，主张在汴水所经过的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郑州（治所在今河南荥阳汜水西北）一带拦截往来公私船只，以供军需。被翟让采纳。瓦岗军因此军资充足，同时得到当地百姓拥护，兵势大振。大业十二年（616 年），他与翟让、李密等打败隋齐郡通守骁将张须陀，歼敌 2 万人，李勣斩须陀于阵。十三年，他与王伯当向翟让建议，共推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并设奇计在洛水打败前来镇压起义军的隋将王世充，被李密封为右武

侯大将军、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发生水灾，百姓饿死者每天都有数万之多。李勣认为，天下之乱本于饥，建议起义军乘机夺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东北），以仓粮募兵，壮大起义军力量。为李密采纳。瓦岗军因此迅速发展到20多万。十四年，他领兵固守黎阳仓，用地道战术打败宇文化及的进攻。他在瓦岗军期间，为起义军的壮大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瓦岗军失败后，李勣随李密降唐，被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侯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李密被李渊所杀，李勣穿孝衣，为之举行厚葬，朝野因此盛赞其义。后于黎阳败降窦建德。不久，复归唐。武德四年（621年），随秦王李世民参加洛阳、虎牢之战，击败窦建德和王世充；五年，又从李世民破刘黑闼、徐圆朗，升任为右监门大将军。七年，与赵郡王李孝恭、李靖攻打辅公祏，率步卒1万渡淮，拔寿阳（今安徽寿县），进至硖石（今安徽凤台西南），连破辅公祏将陈正通于梁山（在今山东梁山南），败冯惠亮于江西，并追斩辅公祏于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江南悉平。

唐太宗即位后，出任并州都督。贞观三年（629年），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与兵部尚书李靖等共击东突厥。他率军出云中（今山西大同），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大败突厥军，与李靖会师后，共谋乘颉利可汗松懈无备时突袭其牙帐，李勣至碛口（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堵截颉利，俘5万余口而还。高宗为晋王时，李勣为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十一年，改封英国公，在并州凡16年，号为称职，太宗称赞他胜于长城。

十五年，李勣任兵部尚书。逢薛延陀部入侵，即受命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军追歼薛延陀至青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大青山），虏5万余众。十七年，任太子詹事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八、十九年，随太宗征高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攻破盖牟、辽东、白崖（均在今辽宁境）等城。二十年，又奉命击薛延陀，在郁都军山（今蒙古杭爱山）大破敌兵，迫其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来降，可汗咄摩支南窜于荒谷。

高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师等职。乾封元年（666年），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兵攻高丽，克其都城平壤（今朝鲜平壤），虏其王高藏等。

李勣少年时性情暴烈强悍；及为将，以忠义律己，为时尚所崇。一生戎马生涯近60年，战功卓著。归唐后，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为国家所依重。其为将，善于筹算，史称“料敌应变，皆契事机”①。与人议事，能择善而从，战胜之后，多推功于下，所获财物，分发给士卒，执法严明，严于律己，因此，人乐为用，所向多捷。史书将其与李靖并列，称“英卫二公”，为当时“烟阁之最”②。

二、“灭三国，皆生擒其主”的苏定方

苏定方（592～667）是唐朝初期著名将领，名烈，字定方，冀州武邑（今属河北）人。曾先后领兵讨灭西突厥、思结、百济三国并活擒其主，为唐初固疆拓边立下了赫赫战功。

苏定方年少时就“骁悍多力，胆气绝伦”③。15岁跟随其父参加战斗。父死后，代领其众击败农民起义军张金称、杨公卿。后从窦建德，多有战功。为其部将高雅贤养子，雅贤死后，回归乡里。

贞观初年，苏定方为匡道府折冲。贞观四年（630年），随李靖征东突厥，在铁山（在今内蒙古阴山北）奉命率200骑为前锋，乘雾袭击颉利牙帐，杀获甚多，迁左卫中郎将。永徽六年（655年），与营州都督程名振征高丽，因功拜右屯卫将军，封临清县公。显庆元年（656年）十二月，从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讨西突厥，为前军总管，在鹰娑川（今新疆开都河上游）率500骑击败敌2万

①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勣传》。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③ 《旧唐书》卷八十三《苏定方传》。

骑，追击20里，杀1500人，获马2000匹。副大总管王文度阻挠进军，苏定方向程知节建议囚文度以待天子之命，知节不从。后王文度又杀俘虏并分其财，定方坚决反对，对俘虏财一文不取。

显庆二年，苏定方被任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为征西突厥主帅，在金山（今阿尔泰山北）破处木昆部。进至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以万余人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10万之众，鏖战30里，斩首数万级，并乘胜踏雪追至金牙山（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北），直抵贺鲁牙帐，袭破敌数万人，贺鲁逃往石国（都柘折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苏定方部将萧嗣业迫石国国主将贺鲁执送唐军。西突厥遂亡。苏定方因功拜左骁卫大将军、邢国公。

显庆四年，思结部俟斤都曼逼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国叛唐。苏定方复任安抚大使，率兵至叶叶水（在今新疆玛纳斯河东），选精卒万人、马3000匹，一昼夜行300里，进至都曼所据之马头山，击败其军，围马保城，迫都曼投降，葱岭以西遂定。苏定方因功迁左卫大将军。

显庆五年，苏定方出为神丘道大总管，领兵自成山（今山东荣成东北）渡海讨百济，在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击败百济守军，然后水陆齐进，直取百济都城真都①。百济倾全国兵力来战，唐军经酣战大破其军，迫百济王扶余义慈投降。

龙朔元年（661年），苏定方又任平壤道行军总管，破高丽军于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围平壤，因大雪，解围还。三年，任凉州安集大使，以镇抚吐蕃、吐谷浑。乾封二年卒。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谥曰庄。

苏定方在唐前期的固疆拓边作战中，所用战术，如正兵对敌，奇兵袭后；不失时机，穷追猛打，务求全歼等，深得唐太宗用兵妙蒂。他不仅智勇兼备，且忠心为国，不辞艰辛，多次远征；敢

---

① 百济都城，新旧《唐书》苏定方本传及东夷列传均作真都城。《北史》《百济列传》：百济都居拔城，亦曰固麻城。

于坚持正确的意见，抵制错误的指导，亦为难能可贵。史载他将用兵奇术授裴行俭①，说明他在兵学研究上亦有心得。惜未见其有兵书传世。

三、"文雅方略，无谢昔贤"的刘仁轨

刘仁轨(602～685)，是唐高宗时期文兼武备的治军安边将领。字正则，汴州尉氏（今属河南）人。仁轨少时贫贱好学，以知识广博而闻名。为息州参军，转陈仓尉。辖区内折冲都尉鲁宁暴横不法，仁轨杖杀之。唐太宗听说后，召仁轨诘责，仁轨据理抗争，太宗以为刚正，擢为栎阳丞。后又因谏止太宗校猎而受赞赏，拜新安令，累迁给事中。显庆四年（659 年），因得罪宰相李义府，出为青州刺史。

显庆五年，唐军攻百济，仁轨监统水军，因海运覆船误期免官，以白衣随军自效。苏定方平百济后，留部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反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引兵包围仁愿。诏命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率军救仁愿。仁轨之兵军容严整，所向皆下，迫道琛等解围而去。

龙朔二年（662 年），苏定方攻平壤，不克而还。高宗诏仁轨率军去新罗商议去留之计。将士全都想回国，仁轨认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使国家者，得专之"，说服部属继续留在百济坚守观变，乘势图敌。后引新罗之兵，乘夜袭占要寨真岘城（今镇岑），从而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

不久，扶余丰袭杀福信，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求援兵。唐高宗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浮海支援仁轨。仁轨率军在白江口（今白马江口）击败援救百济的倭军，四战四捷，焚其舟 400 艘。扶余逃走。百济诸城除任存城外，均降。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愿率子弟取任存城。仁师提出，二人新降，恐其有诈。仁

---

①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

轨认为此二人忠勇有谋，不须猜疑。后二人果然攻克此城。百济平后，仁轨加官六级，任带方州刺史，检校熊津都督，留镇百济。于是，他命葬死者，录户口，置官长，通道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劝课耕种，赈贷贫乏，修营屯田，积粮抚士等，将当地治得甚有条理。他上书反映兵募情况，切中时弊，为高宗嘉纳。

麟德二年（665年），仁轨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入朝，参加高宗封泰山仪式，被封为大司宪。乾封元年（666年），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封乐城县男。三年，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辅助李勣讨平高丽。总章二年（669年），回朝，以疾辞职。咸亨元年（670年），复授陇州刺史。三年，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五年，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东伐新罗，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今韩国积城）。上元二年（675年），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仪凤二年（677年），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以御吐蕃。武则天临朝，加授特进，复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知留守事，曾上书言“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被武则天誉为“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垂拱元年（685年），按新令改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死后，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

刘仁轨的军事活动主要在朝鲜半岛。做为唐前期的一员儒将，他既能统兵打仗，又善从政治上观察、思考、解决问题；既能治军，也善理民，还工文章；既劲直，又圆活。与一般武将和文臣有许多不同之处。史书称他“文雅方略，无谢昔贤”①。在中国历代名将中当有其特殊的地位。

四、“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的裴行俭

裴行俭（619～682）是唐高宗时期文武兼资、治戎安边的著名将领。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出身官宦世

①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史臣曰。

家。贞观时，为左屯卫仓曹参军，从苏定方学习兵法，尽得其用兵奇术。后迁长安令，出为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665年），累拜安西大都护。总章二年（669年），迁司列少长伯（后复改为吏部侍郎），上元二年（675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三年，吐蕃叛唐，诏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寻又为秦州镇抚右军总管，以御吐蕃。

仪凤四年（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联合吐蕃侵逼安西（治今新疆库车），朝中大臣多主张发兵征讨。裴行俭认为西境连年征战，不宜再动干戈，可乘波斯王去世之际，以送其子去波斯册立为名，至西都时便宜从事，以智取之。高宗因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册送波斯王子。至西州，裴行俭扬言天气炎热，待秋凉之后再动身。都支果不设备。裴行俭又以狩猎为名，招四镇酋长子弟万人，经短期训练，急行西进，在离都支10余里处，先遣其亲近者前去问安，又派人召见都支，都支仓促不知所措，率子弟500余人出迎，被唐军轻易擒获。然后裴行俭命简精骑奔袭李遮匐，迫其投降，从而大获全胜。高宗因裴行俭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平定西突厥，有文武才，授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一身而兼文武两大要职。

调露元年（679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单于管24州之众响应，叛众达数十万。高宗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军30余万进讨。为保持粮道畅通，慑止敌人抢掠粮车，裴行俭设伏兵赚杀劫粮者，此后，敌不敢接近唐军运粮车队。唐军进至黑山（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大败突厥军，泥熟匐可汗为其部下所杀，部众持其首来降；其大首领奉职亦被唐军所擒。裴行俭胜利班师。

永隆二年（681年），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又与温傅联合反唐。三年，裴行俭再次领兵出击，屯代州陉口（今山西代县西北），用反间计令伏念与温傅互相猜疑，裴行俭许伏念以不死，使伏念执温傅来降。回朝后，唐廷一些人要将伏念和温傅一同斩首，裴行俭坚决反对，认为“杀降则后无复来矣”。力争未果，伏念与温傅俱被杀。裴行俭于是称疾不出。永淳元年（682年），十姓突

厥车薄叛，裴行俭复为金牙道大总管，军未出而疾卒。赠幽州都督，谥曰献。

裴行俭治军主张知人善任，所领偏裨后来多为名将；强调"抚士贵诚，制敌贵诈"①；对下宽严相济，尤善以宽得人。在作战指导上主张以智取胜，"治戎安边，绰有心术"②，为唐初西北边疆的稳定作出了卓越贡献。著有论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内容的兵书《四十六诀》，后被武承嗣取走，不复传世。裴行俭文武兼资，博学多艺，史书称其为"儒将之雄"③。

五、"武纬文经"，"善于抚御"的郭元振

郭元振（656～713）是武后至玄宗初时的守边将领。名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人。18岁举进士，为通泉尉。因不拘小节，被武后诘责，既与语，甚奇其才；又读其文章，颇为赞赏，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吐蕃请求和好，但其大将论钦陵要求唐廷解除西北四镇之兵，分十姓之地。郭元振奉命出使吐蕃，回来后，献离间吐蕃之策，被采纳。吐蕃君臣果互相猜疑，论钦陵被诛，其弟赞婆及兄子来降。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于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南境硖口建和戎城（今甘肃古浪），在北界碛中置白亭军（在今甘肃民勤东北），控制要路，将凉州境地由南北400里扩展为1500里，此后，吐蕃、突厥之兵再没侵陵到凉州城下。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凉州数年丰稔，积军粮可供数十年之用。郭元振在任5年，远近畏慕，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遗，对凉州地区的安定和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神龙（705年）中，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三月。

②③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史臣曰。

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其首领乌质勒来郭元振牙帐议事后因年老体弱被冻死。其子娑葛误以为郭元振是故意害死乌质勒，图谋起兵攻打唐军。副使御使中丞解琬劝他乘夜逃走。郭元振说："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安卧帐中。第二天，亲自到娑葛帐中吊唁，哭祭甚哀。娑葛感其义，复与唐军通好，并遣使进贡5000匹马、200头骆驼、10余万头牛羊。郭元振被授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后因反对唐廷引吐蕃兵击娑葛，得罪宰相宗楚客，被诬"有异图"，险遭陷害。

睿宗立，宗楚客被诛，召郭元振入朝为太仆卿。离任时，安西酋长多有哭送者，距离凉州还有800里，凉州城中居民已经准备壶浆欢迎。景云二年（711年），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吏部尚书，封馆陶县男。先天元年（712年），为朔方军大都督，筑丰安（今宁夏中卫西）、定远城（今宁夏平罗南），使戍守军队得以有屯驻之所。翌年六月，以兵部尚书复同中书门下三品。

同年七月，李隆基诛太平公主，郭元振亲自率兵保护睿宗，因功进封代国公，俄又兼御史大夫，复为朔方大总管，以备突厥。适逢玄宗于骊山讲武，三令后，玄宗亲自擂鼓，郭元振突然出班奏事，致使演练中止，因坐军容不整之罪，免死流放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开元元年（713年），起为饶州司马，抑郁病逝途中。著有兵书《定远安边策》三卷。今佚。

郭元振守边多年，无显赫武功，以建设、安抚见长，故能"克致隆平"，"安远定边"。他"武纬文经"，以诚信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因而深得他们的爱戴，能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突厥、吐蕃之兵，这就是所谓的"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① 了。此等边将，对于保持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

① 《孙子兵法·形篇》。

第十章　唐朝后期军制的变化与军事技术的发展

唐朝后期的军事制度与前期相比变化较大。府兵制遭到破坏，代之以募兵制。京师宿卫主要由府兵担任变为由彍骑、再变为由禁军（主要是神策军）承担。节度使的设置由周边地区扩展到内地，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军队既是其赖以对抗朝廷的工具，也常被朝廷作为平定叛镇的军事力量。唐后期的军事技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战船制造技术的提高和火药的发明两方面，尤其是火药的发明，是唐人对人类社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节　府兵制的破坏与募兵制的代兴

关于府兵制由盛转衰的历程，谷霁光先生有一个概括的说明："府兵趋于破坏到最后崩溃有一个不算短暂的过程，从永淳二年（683年）到开元元年（713年）为第一阶段，这时形式上尚能维持，实质上已日趋败坏。从开元元年到天宝八载（749年）为第二阶段，这时形式上的上番也很难维持，终于停止上下鱼符了。以后仍保持着折冲府的机构和官吏、兵额，名存实亡，又达三十多年之久。"① 作为府兵制的补充，募兵在唐初就已存在，自开元十年（722年）张说招募宿卫之士后，募兵制大行，遂成为唐朝征集兵员的主要形式。

① 《府兵制度考释》第2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一、府兵制的破坏

府兵的主要任务之一为宿卫，即轮番宿卫京师，故当时称之为侍官，言其侍卫天子，又称为卫士。唐初规定："卫士于宫城外守卫，或于京城诸司守当，或被配于王府上番。"① 府兵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征战。当时虽然兵役负担沉重，但由于士兵尚能够分配到足够的永业、口分田，府兵本人也能够免除身庸租调，因此他们经济上还能承受，军队的战斗力也比较强。自武则天统治以来，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受田很难足额，不少府兵除了保有一些永业田外，口分田基本上分不到，使得他们经济状况不断下降。唐初，府兵作战有功，往往能够得到勋赏。后来由于长期作战，府兵受勋者较多，动辄万数，那些获得较高勋级的人，按规定应多受勋田，可实际上所受田很少。这种情况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中有明确反映，如《唐开元九年帐后户籍残卷》中的曹仁备，其勋官为上柱国，应受田（包括勋田）共 31 顷 81 亩，实际只受到 63 亩②。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唐制，府兵自备戎具、资粮。由于府兵日益贫困，缺乏资财，自备戎具、资粮便成问题。唐玄宗开元以来，府兵寡弱，不得不另外征募，以解决战争所需兵员。开元三年（715 年），郭虔瓘经略四镇，请募关中兵万人，皆给公乘，并供熟食。如果不是府兵贫弱，就不需要另行招募，也不需官府供给递驮熟食。十二年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马。"③ 府马也明令改由官给，说明维持府兵制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崩溃了。

战争的长期性、连续性，也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唐太宗时期虽然也对外用兵，但"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

---

① 《唐律疏议》卷二十八《捕亡》。

② 《伯希和敦煌文书》第 3877 号。

③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而能克捷”①，所以府兵的兵役负担还不算沉重。后来，战事频仍，府兵逐渐不堪重负。如吐蕃部族强盛，唐军大量地驻扎在今青海、甘肃一带，长期抵御吐蕃军队。这些士兵大量的是招募而来的所谓征人，其中也有不少府兵，他们常因边防局势紧张而不能按时番替。加之战争巨大的消耗，更使府兵制难以维持。如唐高宗仪凤三年（678 年），唐军 18 万，被吐蕃击败于青海。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唐与契丹战于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唐军死者数万。神功元年（697 年），唐与契丹战于平州，唐军 17 万，死亡殆尽。这些唐军的统兵大将均为十二卫将军，其所统率的军队中当有大量府兵。由于府兵为世兵，战争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使其兵员难以得到补充。加上“番役更代多不以时”②，番休的士兵大量逃亡，因此，到开元中期，府兵基本耗散殆尽。

有人说：“唐代府兵之废坏，实由其遇之太薄。”③ 确有一定的道理。府兵的社会地位原来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其经济逐渐趋于衰颓，使他们身份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自武则天统治以来，十二卫将军不是由外戚无能者充任，就是由归唐的番将充任。十二卫的僚佐，也都成了权要子弟的进身之阶。这些将佐多把卫士当作“僮仆”一样看待，为其家执役服务。使得人们把充当卫士看作是一种耻辱，“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④。关东一带人民耻于充当府兵，“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⑤。富人不愿应役，雇人代番，许多“番上者贫羸受雇而来”⑥，府兵的兵员成分发生变化，是府兵制不易维持的又一重要原因。加之府兵贫困，待遇太差，使府兵制更加步履艰难。唐中宗景龙三年（709 年），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上疏说：“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⑦宿

①⑥ 《玉海》卷一三八《兵制三》引《邺侯家传》。

②④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③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 121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1 月版。

⑤ 《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考三》。

⑦ 《旧唐书》卷八十八《苏瓌传》。

卫如此，征戍者情况也大同小异。唐睿宗时，左补阙辛替否上疏说："当今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①

唐朝规定："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② 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穷兵黩武，戍边士卒多战死沙场，但将帅们往往恃宠讳败，不把真实情况汇报朝廷，致使很多士卒虽已战死，但其原籍的户籍并未注销姓名。天宝四载（745年），王鉷任勾当户口色役使，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便根据丁籍，硬要戍卒家属补缴过去免缴的多年租庸。戍卒家属的困难状况可想而知。此外，边将对戍卒的残酷虐待，也是导致府兵和其家属逃亡的原因之一。

唐初规定：21岁入募，60岁出军。开元元年（713年）改为25岁入募，40岁出军，如果"频经征镇"的，则35岁即可出军③。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把原来40年的兵役期，缩短为15年以至10年，企图挽救府兵制。但由于积习难返，法令根本不能兑现，"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同时，原来规定的府兵3年一简点，在开元六年（718年）改为6年一简点④，反映出府兵制已走到全面崩溃的边缘。唐制，府兵或征人，远戍边地以4年为限⑤。自开元以来，实际上已无期限可言，多的长达20余年，甚至长住边镇。杜甫《兵车行》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即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为了躲避沉重的兵役和残酷虐待，农民采取的主要反抗方式就是逃亡，逐渐使府兵制陷入了瘫痪状态。开始是"宿卫之数不给"，继而是"军容每阙"，最后是"无兵可交"⑥。唐代府兵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举行它的葬礼的。

---

①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② 《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③ 《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记为二十一岁入募，六十一岁出军，开元元年改为二十五岁入募，五十岁出军。与《唐会要》记载不同。

④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⑤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镇兵以四年为限诏》。

⑥ 《玉海》卷一三八《兵制三》。

在府兵制破坏的过程中，京师宿卫出现了彍骑，戍防兵卒演变为长征健儿，地方则有团结兵，这是当时军事制度的一大变化。尽管如此，折冲府的机构、官吏、兵额，在名义上、形式上还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原来唐朝廷调发府兵，要用敕牒和铜鱼符，都督、刺史、折冲都尉核对无误后，才能发遣府兵。至天宝八载（749年），停止了府兵上下鱼符，府兵的上番和发兵活动，在法令上宣告结束。天宝以后直至昭宗时，折冲府尽管徒具形式，却不曾有过废止的命令。

二、募兵制的兴起

募兵之法唐初就已实行。早在李渊太原起兵时就曾广募兵丁。武德七年（624年），太子"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①。唐太宗伐高丽时，"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趋平壤"②。高宗、武则天时期也都有募兵行动见之于记载。《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载："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可见唐初已行募兵制。这一时期府兵制尚在，募兵非经常行为，只是作为对府兵制的一种补充而存在。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由于府兵制废坏，府兵"逃亡略尽"，于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建议，"请招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③所谓"兵农之分"，也就是募兵制；"从此始矣"的说法，虽然不准确，但是募兵制从此大为盛行，并成为唐朝兵员最主要的来源，却是不争之事实。十一年，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今陕西西安市）、蒲（治今山西永济西）、同（治今陕西大荔）、岐（治今陕西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六月。

② 《太平御览》卷一〇九。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十年九月。

凤翔)、华(治今陕西华县)等州长官，在当地招募和挑选府兵与白丁12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分两番宿卫京师，即一年中要轮流宿卫6个月。十三年，改长从宿卫为“彍骑”，分隶十二卫，每卫万人，分六番宿卫京师①，即一年中轮流宿卫两个月。

自开元十年以来，不仅京师之兵为招募而来，其他部队也多是如此。如开元二十五年，“敕以方隅底定，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闲剧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军”②。则边军亦是招募而来。又，安禄山反叛后，唐朝“以(封)常清为范阳节度副大使，乘驿赴东京。常清募兵，得六万人”③。自此以后直至唐末，节度使之兵均为招募而来。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就说过：“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④ 所谓“诸侯”，在当时指诸道节度、观察、经略等使。除方镇之兵外，州郡之兵也多为招募而来。如安禄山叛乱，平原太守颜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万人，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简阅”⑤。此类记载，多不胜举。不仅州郡及其上级军政长官募兵，中唐以来，县令、县尉募兵的也不乏其人。连朝廷禁军都依赖招募而补充，左右神策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禁军，都有不少通过招募补充兵员的记载见于史籍。这一切都说明募兵制已经代替征兵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征集兵员的制度。

募兵制的特点在于兵、民分家，兵由国养。即主要由国家供给其衣粮。元代学者胡三省说：“兵农既分，县官费衣粮以养军，谓之官健，犹言官所养健儿也。”⑥ 而府兵则是衣粮兵械自备。这

---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其后彍骑是也。”据此彍骑乃是开元十年所招募的和开元十一年所选补的兵的改名。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

③ 《新唐书》卷一三五《封常清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纪七十九》，昭宗天复二年三月。

⑤ 《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

⑥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三年十二月胡注。

是募兵制的第一个特点。募兵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要求招募对象具有一定的能力。唐代史籍记述募兵时，经常出现“募猛士”、“募壮勇”、“募死士”、“募锐兵”、“募骁勇”等字样。或者根据特殊要求，招募具有某种技能的人，如善射者、善泳者、善骑者、善攀越者等。有时为了保证质量，还要进行选拔。但也有急不待选，所募非人的现象。募兵制的第三个特点是被募者在名义上系自愿投军。因此，唐代史籍记述募兵时，多有“应”、“应募”或“投募”等字样。但实际上强征的现象十分严重。募兵制的第四个特点是招募无地区限制。朝廷可以向全国或全国某些地区招募兵员，全国各地区的人也可以自愿应募。各地区在特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其他地区招募。募兵制的第五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即所招募的军队职业化。在府兵制下，府兵们除了上番时间外，大部分时间用来从事生产。招募来的兵士，由于官给衣粮，尤其是长征健儿“长充边军”，不要更替，便成为终身的职业兵（团结兵例外）。由于军队的职业化，长期固定地由某些将帅统率，使得上下级之间容易形成亲党胶固的关系，这就为日后藩镇割据，对抗朝廷创造了条件。

三、彍骑、长征健儿、团结兵

在府兵制破坏过程中，新起的军队主要是彍骑、长征健儿、团结兵。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①，就是指这三类军队而言。

（一）彍骑

彍骑的组建已如前述，它是直接代替府兵的，主要任务是宿卫京师，所以最初有“长从宿卫”的名称。兵源一部分出自招募，一部分出自简点。兵源范围以关内道（辖区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元年正月《考异》引《旧纪》。

北，甘肃祖厉河流域以东，内蒙古呼和浩特以西，阴山、狼山以南及宁夏)，主要以京师附近为主，包括一部分“潞州长从兵”。入选者都是壮士，“但取材力，不问所从来”，并可以免去“征镇赋役”。以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率领习射和上番。开元十三年，彍骑兵分布情况是：京兆府6.6万人，华州6000人，同州9000人，蒲州1.23万人，绛州(治今山西新绛)3600人，晋州(治今山西临汾)1500人，岐州6000人，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东北)3000人，陕(治今河南陕县)、虢(治今河南灵宝)、汝(治今河南临汝)、郑(今属河南)、怀(治今河南沁阳)、汴(治今河南开封)等州各600人，其中还有弩手6000人①。

天宝元年（742年），彍骑还有6万人，此后逐渐废弛。宋人陈傅良所撰《历代兵制》卷六载：“自天宝后，其法寖以废弛。士失附循，往往流散。”原来的士兵因待遇太差而流散，新招募的又多为市井无赖。他们不受军事训练，有钱的去做生意，有力气的进行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样彍骑很快就名存实亡了。关于彍骑迅速废弛的原因，陈傅良认为：“承平日久，议者谓兵可稍减。是时民间挟兵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而不齿。”由于放松兵备，禁止民间拥有兵器，轻视军人，使得军队战斗力大为降低，朝廷有兵等于无兵。以后安史叛军进攻长安时，唐玄宗只得仓皇出逃避难。此后，唐朝廷的宿卫就完全靠禁军来维持了。

（二）长征健儿

健儿原为防人或戍卒，在唐初只是对勇健兵卒的形容性称呼，大约在唐中宗时成为专称。《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载：“天下诸军有健儿，皆定其籍之多少，与其番之上下，每季上中书门下。”据此可知天下军镇皆有健儿在服役。开元十六年（728年）十二月诏：“使健儿长镇，何以克堪，可分五番，每一年放一番休沐，选取先年人为第一番，周而复始，每五年共酬勋五转。”② 说明此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修武备》。

前还没有健儿番休的具体规定。从引文看，每一番健儿要需5年才能轮休一次，服役时间要比防人3年一更替长得多。虽然健儿有番休制度，但长途跋涉终究不便，于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改为“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①。这些长住的健儿又称长征健儿。由于其家口也一同迁往边地，使健儿能够长期驻防边地，免却了往来更代的劳弊。但也不是长役无番，凡休役在家多半还要务农，上引诏书中也明确提到“给田地屋宅”。这时的健儿还不都是雇佣的职业兵，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生产。

安史之乱后，健儿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番休制被取消，变成了雇佣性的职业兵。他们有固定的驻扎地，是分驻各地的常备兵，衣粮完全由国家供给，其家口之粮也由国家供应②，并享受差科减免、拨给死绝户田地充永业、贷与种粮等优待。由于他们完全靠国家养活，故又称官健，因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兵，所以也称长从兵。长征健儿的“长征”二字，也是长期征行的意思。健儿的军籍由朝廷控制，各军不得擅自招募。大历十年（775年）诏：“其官健逃亡，非承正制敕，不得辄招募。”③即使割据跋扈的藩镇，在名义上也得遵从。朝廷控制诸道兵额的办法，主要是通过钱粮供给来调节，凡多征兵员朝廷不增拨钱物。建中元年(780年)，派定天下两税，同时核定各道兵士定额后，这种利用经济手段控制地方兵额的倾向便更加明显。军队完全由国家供养，给唐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当平时任务不繁重时，便有“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的议论出现④。由于长从官健已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利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② 《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杂录上》：“兵士量险隘招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

③ 《唐会要》卷七十二《军杂录》。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三年十二月。

益的军人集团，当其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会有剧烈的反应。唐后期几次因减损或缺供衣粮而导致的兵变，便是证明。同时这个集团在其将校领导下，也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

（三）团结兵

唐代团结兵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的。安史之乱前，主要设置在河南、河北及关内道一些地区。《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载："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其他地区人数不详，数量可能不会太多。安史之乱后，设置区域有所扩大，但时置时废，这是因为建置之权握在藩帅、刺史手中，所以往往随他们任职的变动而兴废。团结兵的名目因地区不同而杂乱繁多，如称团结军、团结、团练兵、土团、雄边子弟、土团子弟、子弟军、义营、乡兵、坛丁子弟等。

唐代的团结兵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农忙务农、农闲训练的团结兵。这类团结兵通常"选丁户殷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免其征赋，仍许在家，常习弓矢，每年差使，依时就试"①。这类团结兵实质上就是民兵，基本不离乡土，不脱离生产。大历十二年（777年）诏："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②。可知团结兵在秋冬集训时，国家是要供给身粮酱菜的，因而带有雇佣性质。团结兵的兴起和府兵制的破坏有紧密关系。胡三省说："府兵废，行一切之法，团结民兵，谓之'团兵'。"③可见其和府兵有渊源关系。两者的相同点是都不离乡土，有时间从事生产；不同点是团结兵不需自备戎具、资粮，与府兵在负担上差别很大。在安史之乱前，这类性质的团结兵数量上相对来说要多于其他类别的团结兵。其职责主要是防卫地方和维持治安。第二类为因军事急需而临时征发的团结兵。他们实际上是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二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五年十二月胡注。

一种地方部队，多出现在安史之乱后。当军事急需时，藩帅就地征发土团或丁壮，组成“土军团练”，用于作战。安史之乱结束不久，唐廷下诏说：“如地非要害，无所防虞，其团练人等并放营农休息”①。唐武宗时，平定刘稹叛乱，朝廷诏令说：“用兵已来，刘稹所收团练、官健，放归营生。”②此类史料还比较多，说明在战争中无论朝廷或藩镇都曾广泛地使用团结兵。这类团结兵当其被征发投入战争期间，则完全脱离生产，只有放还归农后才能重新生产，所谓“缓者修农，急者为兵”③。第三类为地主豪强所组织的土团军。此类土团武装多集中于唐末江南一带。如唐僖宗广明中，“湖南饥，盗贼起，（雷）满与同里人区景思、周岳等聚诸蛮数千，猎于大泽中，乃击鲜釃酒，择坐中豪者，补置伍长，号土团军，诸蛮从之，推满为帅”④。雷满就是当地土豪，后被唐廷授为武贞军节度使。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北）人钱镠“大散家财，广招勇士”，组织“乡兵”⑤。一般来说，乡兵是不给身粮、酱菜的，武装形式也不尽相同。唐末黄巢起义时，不少地主豪强就是利用这种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从而成为朝廷大吏或藩镇的。

建中元年（780年）国家实行两税法后，把藩镇两税钱物分为上供、留使、留州三级分配，多数藩镇的供军钱物由本地区解决，军费开支浩大。因此，他们不愿在平时训练团结兵。唐后期团结兵主要是临时征发的不正规的地方部队。从唐朝各种军队的数量、作用看，团结兵只是对禁军、官健的一种补充而已。

---

①② 《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九《广德二年南郊赦》；卷一二五《平潞州德音》。

③ 《玉海》卷一三八《兵制》。

④ 《新五代史》卷四十一《雷满传》。

⑤ 《全唐文》卷八九八《吴越国武肃王庙碑铭》，卷八五四《徙封越王钱镠为吴王敕》。

第二节　节度使的设立与藩镇兵的盛行

唐朝设置节度使是出于巩固国防，防御侵扰的需要，所以最初只置于周边地区，内地则不置。由于节度使拥有大量军队，内地兵力相对寡弱，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布局。安史倡乱，朝廷一时无兵可御，遂使国家破败，人民涂炭。安史之乱平定后，地方势力增强，朝廷控制力削弱，内地藩镇林立，军阀割据。如何处理藩镇问题，成为唐廷后期的主要难题。

一、节度使的设立

自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唐朝边境一度无大的侵扰威胁。高宗中期以来，局势有所变化，西部及西南部受吐蕃严重威胁，北部又重受突厥威胁，东北部的契丹、奚、室韦、靺鞨等少数族政权也经常袭扰边境。随着唐朝疆土的扩大，边防线也越来越长，尤其是自关陇到西域一线，一旦发生战事，唐廷长途调兵运粮，困难很大。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划分若干军事区域，增加边防驻军，延长屯戍时间，势在必行。军队长期屯驻，其长官亦得久任，节度使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唐朝地方行政实行州县（或郡县）两级制。在其初年，凡重要州镇，分置大总管或总管，主管军事。武德七年（624 年），改大总管为大都督，总管为都督，设大都督府、都督府，总管数州或数十州军事。“永徽已后，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①。即是说从唐高宗时起，已有类似节度使之官，并逐渐形成节度使这一名称。正式以节度使名官则是后来的事。仪凤二年（677 年），唐高宗命刘仁轨为洮河（今青海乐都）镇守使，率大军屯驻，以御吐蕃。在此之前，凡有战事，征集军队，

① 《唐会要》卷七十八《节度使》。

临时命将，战后，兵归诸卫，将则还朝，不长期屯驻某一地区。唐朝从刘仁轨起，开始了大将握重兵长期屯驻边地之先例。唐睿宗景云元年（710 年），以幽州（治今北京西南）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景云二年，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名至此正式确立。

唐玄宗开元以后，西、北部沿边重要军事要地，几乎都陆续设置了节度使。节度使往往还兼任其所辖地区的经略、支度、营田、转运、监牧诸使。开元二十年（732 年），幽州节度使开始兼领河北采访处置使。于是，节度使的权力日重，辖区内的民政、财权、司法、监察等各种事务，也逐渐由节度使掌管。节度使凌驾于州郡之上，唐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实际上已由两级制变成三级制了。

天宝元年（742 年），唐朝沿边共设置了 10 个经略、节度使，列表如下：

名　　称	治　　所	兵　数	马匹数
朔方节度使	迴乐（今宁夏灵武西南）	64700	14300
河东节度使	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55000	14000
范阳节度使	蓟（今北京西南）	91000	6500
安西节度使	龟兹（今新疆库车）	24000	2700
北庭节度使	金满（今新疆吉木萨尔北）	20000	5000
河西节度使	姑臧（今甘肃武威）	73000	19400
陇右节度使	湟水（今青海乐都）	75000	10600
剑南节度使	成都（今四川成都）	30900	2000
平卢节度使	柳城（今辽宁朝阳）	37500	5500
岭南经略使	南海（今广东广州）	15400	700

二、藩镇募兵与地方军阀

藩镇与节度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节度使是藩镇的统帅，藩镇则是节度使所辖地区与军队。因此节度使的出现，也就

表明藩镇的产生。

《新唐书》作者宋人欧阳修等认为："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① 这种看法虽不全面，但也抓住了问题的某些实质。唐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长期存在下去，最根本的是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其次才是土地、财赋等等。藩镇的军队主要是招募而来的，朝廷仅仅限定其数额，兵士的选择则由其主帅决定。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将帅还可以倾其私财募兵。招募对象主要是所辖地区内的丁壮，也不排除偶尔到外地区招募，因此藩镇军队基本上都是以土著为基础的武装集团，并在本地区内形成半封闭状态。这是藩镇军队的一个特点。

藩镇军队的内部结构也比较复杂。府兵的简点之法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② 内府三卫选用高品子弟；外府则选取六品以下子弟或白丁无职役者。这样就使军队始终保持一定数量的品官和富户子弟，以便使府兵自备粮具的原则能得以贯彻。后来虽有所变化，但军队的基本成分仍是自耕农和大量的破产农民。唐朝后期藩镇军队的成分除了破产农民和无本业浮浪人外，还包括许多市井屠沽、亡命无赖、山棚（从事射猎的悍民）、蕃蛮等。藩镇军队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其具有更多的野蛮性、凶悍性，不易控制，他们可以为自身的某些利益去抗衡朝廷，也可以因自身利益受到危害或为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举行兵变，所谓"兵骄而好乱"③，变易主帅，有如儿戏。这是唐朝藩镇军队的另一个特点。

藩镇军队的士兵与将帅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府兵制时期，将帅与士兵的结合比较松散，军队无固定将帅，将帅无不变的军队。设节度使后，将帅与所辖军队的关系日趋紧密。士兵的职业化，使其对长官的人身依赖不断加深。士兵的招募、训练、

---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③ 《全唐文》卷七一四李宗闵《马公家庙碑》。

供给、晋升，皆握于节度使之手。尤其是河北的魏博、成德、卢龙三镇以及淮西、淄青诸镇，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军队和将帅之间一般都能维持十数年或数十年的统属关系。这正是某些藩镇能够抗衡朝廷的主要原因，也是藩镇军队的又一重要特点。

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和府兵以及中央禁军有很大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 3 个层次：

1、衙军。又称牙军。即主帅自己的私兵或精锐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守卫牙城或保卫节帅。最早设置的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其养兵 10 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①。从他以后，各镇相继仿效，少者数百，多则数千，甚至上万。由于牙军勇健凶悍，战斗力很强，所以节帅往往也在战争中将其作为主力部队，在关键时刻投入使用，以夺取战争的胜利。牙军由于能征善战，劳苦功高，待遇优厚，加之节帅滥赏，一味姑息，所以特别骄横。唐后期藩镇军队劫帅作乱，大多为牙军所为。于是，节帅又在牙军之外另置亲兵，作为自己最贴身的卫队。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乐）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为亲兵，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胡三省指出：“魏博牙兵始于田承嗣，废置主帅率由之。今乐从训复置亲兵，牙兵疑其见图，故不安。”② 可见亲兵与牙兵并非一回事。

2、支郡兵。指藩镇所属各州的军队。其领兵者为州刺史，有些刺史还兼有团练使、防御使、镇遏使等名号。各州之兵，“皆有常数”③。通常由朝廷统一确定各州军额，然实际上由节度使所控制。支郡兵要听从节度使调遣，朝廷不能直接调发支郡军队。

3、县镇。藩镇辖区内诸县置镇兵，谓之县镇。县镇的统兵将领有镇遏使、十将、副将、押衙、虞候等。县令通常不兼任本县镇遏使，也不得过问军事。晚唐时期，镇遏使（镇将）多为节帅

---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十三》，僖宗文德元年二月条及注。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二年五月。

亲信充任，故侵削县令职权的现象非常普遍。镇兵数额没有一定之规，通常有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特殊情况有达数万人的。如唐末海陵县镇遏使高霸“有民五万户，兵三万人”①。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是出于某种军事需要而特置。县镇除隶属各支郡外，重要的由节度使直接统领，兵马也由节度使直接派出。县镇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有些也承担一定的作战任务。

唐代辖州较多的藩镇，也根据军事需要或地理形势的便利划分若干小军事区域，如卢龙节度使管区内有静塞军，成德节度使有永宁军。大多置于支郡州县，所辖兵力无统一规定，其统兵主将通常带节度副使衔。

三、玄宗后期“外重内轻”军事布局的形成

唐初，分关中（指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陇关以东的今陕西关中盆地）为12道，每道为一军，共12军，军有将、副各一人，分统诸车骑府、骠骑府，督率20万府兵且耕且战②。贞观十年（636年），分天下为10道，按照“居重驭轻”的原则部署军事力量，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③。这种内重外轻的局势对唐前期的巩固和加强朝廷集权，起到了有利的作用。

自从府兵制破坏以后，京师宿卫不得不靠招募而来的彍骑充任。开元中张说曾募到12万人，此后，逐年减少，到天宝元年（742年），只有6万人左右④。在关中兵力日益衰弱的同时，唐朝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光启二年六月。

② 关中有府兵20万人的说法，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 《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

④ 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第5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边防兵力却不断增强，使当时的军事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玄宗在经过开元初年的励精图治后，至开元中期国力有所增强，“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①。穷兵黩武的思想大大地膨胀起来，为了扩充疆土，耀武异域，便不断加强边防兵力。在天宝元年，沿边10个节度使、经略使共计统兵49万，马8万匹，和关中兵力形成鲜明对照。

沿边节度使在开始设置时，也只是“专膺一面之寄”，没有兼统数道的。唐玄宗一味贪求边功，为了取得更大的战果，开始增加节帅所统兵力。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盖嘉运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兵力达14.8万人；牛仙客为朔方、河东节度使，两镇合兵达11.97万人；天宝五载（746年），王忠嗣以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四镇合兵达26.77万人之多，史称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②。天宝十载，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三镇合兵为18.39万人，占唐边兵总数49万人的五分之二左右。

唐玄宗还改变了建唐以来边帅不久任的制度，常常十数年不易其人。如朔方节度使王晙，自先天元年（712年）至开元九年（721年），前后居镇10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自开元二年（714年）至开元九年，前后居镇8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自开元二十年（732年）至开元二十八年，前后居镇8年；平卢节度使安禄山，自天宝元年（742年）任节度使，至天宝十四载，前后达14年之久。由于节帅久任一方，戍卒又变为长征健儿，长期归节帅统率，其权力自然日益膨胀起来。

唐朝腹心地区不仅兵力数量少，而且战斗力很弱，京师所募彍骑，“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③。朝廷平时不重视对他们的军事训练，后来遇到战事，自然一触即溃。内地其他地区，

---

① 《唐鉴》卷五。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五载三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八载四月。

由于承平日久，也都兵备松弛，“百姓累世不识兵革”①，有些州县基本无可用之兵。唐玄宗后期的这种军事布局，本身就潜伏着很大的危机。

第三节　禁军的兴废

禁军是皇帝的亲军，负责保卫京师和宿卫宫廷。唐初，军事制度基本沿袭西魏、隋以来的府兵旧制，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整顿和发展，这时的禁军即统辖于南衙十六卫的在京番上府兵。府兵制破坏后，南衙诸军仅存空名，禁军则指北衙诸军，主要是神策军。它实际上是一支由宦官统领的朝廷军队，唐代宦官集团之所以能够专擅朝政，控制皇权，根本原因就在于控制了禁军兵权。

一、禁军的性质及其沿革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云：“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由此观之，唐朝禁军由两个系统组成，即南衙十六卫的番上府兵，他们是唐前期宿卫京师的主要武装力量；北衙禁军是专职保卫天子的禁军，在唐后期他们不仅负有宿卫京师的责任，而且还肩负着征伐野战的任务。广义的禁军包括南、北衙，狭义的或者说更严格意义的禁军则指北衙禁军。

在唐高祖、太宗以及高宗前期，宫廷、京师宿卫主要由南衙卫兵充任。龙朔二年（662 年），改左右屯营为羽林军，标志着北衙的出现，此后北衙作用渐重。府兵制崩溃后，一度由彍骑宿卫京师，开元十六年（728 年）把彍骑弩手抽出来并入羽林军飞骑②，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

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彍骑进一步削弱，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天宝八载（749年），“彍骑之法又稍变废”①，彍骑之名，也罕见于史册了。南衙诸卫渐成空设，尽管直至唐末十六卫名称仍然保留，然徒具空名而已。北衙禁军成了唐中央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唐朝维持统治的最重要的军事支柱。

唐高祖武德初年统一关陇后，把渭水北岸白渠灌溉的绝户肥沃良田，分配给跟随他从太原起兵的军士。这批兵士原有6万人，其中3万因不愿留居关中而被遣散回乡，其余3万称“元从禁军”，给予土地，留居关中，任务是宿卫宫禁。元从禁军年老后，由其子弟替补，因此也称为“父子军”。又由于他们主要守卫玄武门（即北门）一带，故称北门屯兵。北衙禁军就是从北门屯兵发展而来的。

唐太宗贞观初年，从北门屯兵中挑选出精于骑射者百人，一年分两番，每番6个月，在北门（玄武门）长上宿卫，称之为“百骑”。每当皇帝出猎时，百骑皆“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是皇帝的贴身警卫。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为了加强宫廷宿卫，又把员额扩充到千人，并以“户奴”来补充，称为“千骑”，分隶于左右羽林营。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中宗又扩充千骑为万骑，分为左右营，各置使以统率之。虽然左右万骑营已初具成军规模，但在组织上仍属于羽林军。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把万骑营从左右羽林军分出来，独立自成一军，称为左右龙武军。其建制以羽林军为标准，“官员阶品、人数、职掌，如羽林军也”②。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在北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其兵士称“飞骑”，这一调整使北门屯兵的力量有所加强。左右屯营由诸卫大将军、将军统领。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置大将军各一员，将军各两员，以下置长史、参军、兵曹等官员，人数、品秩皆如诸卫。左右羽林军与

---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

左右龙武军合称为北门四军，它的出现，标志着唐朝北衙禁军的发展臻于完整。这是唐朝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的重大措施，也是唐王朝健全中央宿卫体制的实际需要。北门四军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武则天末年，宰相张柬之等利用羽林军举行政变，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使中宗复辟。唐玄宗也曾利用万骑的力量翦灭韦后，拥立睿宗，从而使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在这些事件中，北门四军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唐代警卫天子和京师的南北衙军队，是直接取法于汉朝的南北军形式。元代学者胡三省指出："南军，十六卫军；北军，羽林及万骑也"①。南衙十六卫归宰相管辖，唐朝统治者在南衙诸卫之外另建北衙系统，目的是通过南北军的互相牵制，加强朝廷对军事力量的控制，确保封建政权的巩固。因此，北衙禁军最初统辖于天子，此后则由天子家奴宦官来统率，这种体制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的。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置左右神武军。这支部队主要由跟随肃宗到灵武的兵士和回长安的官吏与禁军子弟组成，也称"神武天骑"。其官员的人数、品秩同于北门四军，与北门四军合称为北衙六军。肃宗还设置了殿前射生左右厢，选择善骑射者千人充之，又称供奉射生官。不久，殿前射生左右厢扩充为左右英武军，代宗时又号称为宝应军，德宗时改称为殿前射生左右军，寻又称为左右神威军。加上代宗时设置的左右神策军，总称为北衙十军。肃、代之际所置禁军还有长兴、宁国、威武、威远、骁骑等。由于当时局势动荡，禁军废置不一，这些部队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除个别的外，其余不可稽考。

唐后期北衙禁军除神策军外，其他皆名不副实，论其兵力、地位，和唐前期都有显著的区别。元和二年（807年），罢去左右神威军，合为一军，号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并入左右神策军。广德二年（764年）敕，"左右神武等军，各一千五百人为定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睿宗景云元年六月胡注。

额，左右羽林军，各以二千人为定额”①。连同左右龙武军，估计约万人左右。而天宝时仅左右羽林军就有1.5万人。可见北衙六军已严重衰落，兵力所剩不多了。唐德宗贞元（785～805年）以后，宿卫主要依赖神策军，北衙六军虽然仍列营禁苑之中，由于兵力寡弱，其主要职能已不再是宿卫，而是以天子六军的名号装装门面，充任仪仗而已。德宗时，令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军各置统军一人，秩从二品，阶品虽高而无职事，成为军将迁转升任或“藩镇罢还无职事而奉朝请者”② 的阶梯而已。

二、神策军的兴立及作用

神策军原为西北的一支戍边军队。唐玄宗时哥舒翰击败吐蕃，在天宝十三载（754年）置神策军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磨环川，以成如璆为军使，统兵戍边，防遏吐蕃。安史之乱起，成如璆派卫伯玉率千余人赴中原参战。乾元二年（759年），九节度兵败邺城后，神策军退驻陕州，防备安史。不久，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和继任者郭英乂先后调离，神策军权遂为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所控制。在这期间，鱼朝恩把陕州节度使所辖军队并入神策军，使其扩大为万人以上的大军。由于神策军故地已为吐蕃所攻占，于是便长期驻扎陕州。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入长安，禁军溃败，代宗仓皇奔陕，“朝恩率神策军以迎，兼护车驾，幸其营焉。京师克平，朝恩以所统军归于禁中”③。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军队再次进攻关中，“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寖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它军比”④。至此，神策军正式成为禁军。

---

①③ 《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

②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

④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据《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载，兴元元年（784年），神策军分为左右厢。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同时还设置大将军各一人，正二品；将军各四人，从三品。十四年，又设置统军各二人，正三品。据《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四上》载，神策军的重要官员还有“护军中尉各一人，中护军各一人，判官各三人，都句判官二人，句覆官各一人，表奏官各一人，支计官各一人，孔目官各二人，驱使官各二人。自长史以下，员数如龙武军”。最高统帅为护军中尉，神策将吏皆受其节制。由于神策军分屯在京师、畿内与关中要塞之地，所以在两护军中尉之下设左右神策行营，分统京畿和所在地区军队。这样，神策军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和指挥系统。

唐后期，由于朝廷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日益尖锐，严重的局势使唐朝统治者认识到必须拥有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握的、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加强神策军势在必行。根据史籍记载，神策军曾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扩编。一次在代宗大历（766～779年）初年，主要收编了平卢镇邢君牙部、阳惠元部，安史降将尚可孤部，朔方镇郝廷玉部、侯仲庄部等。这些军队都是久经沙场，极有战斗力的藩镇部队，使得神策军势力大增。另一次在德宗贞元（785～805年）年间。主要收编镇国镇骆元光部，朔方镇李朝采部，河东镇符璘部等。又以“神策行营”的名义，强行把京畿和关内的诸军兼并，如凤翔镇、银夏镇的军队等。另外，还招募了部分新兵，如神策军使白志贞从京师曾一次招募3000人；宰相李泌把因陇右失陷而留居京师的西域朝贡酋长，安西、北庭校吏及其子孙4000人，尽数召入神策军，“以酋长署牙将”①。此后，还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小的扩编，使神策军的兵力达到15万人。到唐穆宗初年，“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及都防御使下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余人”②，为神策军的全盛时期③。

---

① 《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锷传》。

② 《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

③ 见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神策军主要成分为原藩镇军队或边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新招募兵员人数较小，不是神策军的主力。

神策军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禁军，也是一支朝廷直属的野战部队。

神策军布防不同于以前王朝禁军，早期主要驻扎在京畿道一带。在唐代宗时期，神策军驻地可以考知的，除京城长安外，还有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属陕西）、好畤（今陕西乾县东）、麟游（今属陕西）、普润（今陕西麟游西北）、兴平（今属陕西）、天兴（今陕西凤翔）、鄠县（今陕西户县）、陕州等地。《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载："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把神策军的驻防说得比较清楚。德宗时神策军驻防之地有所扩大，至唐宪宗时期，除京畿地区外，扩大到关内道。根据胡三省注来看，左神策军驻扎在京西北8镇，即普润镇、崇信城、定平镇（今陕西长武东北）、归化城、定远城（今宁夏平罗南）、永安城、郃阳县（今陕西合阳县）；右神策军驻扎奉天镇、麟游镇、良原镇（今甘肃崇信东南）、庆州镇（今甘肃庆阳）、怀远城（今宁夏银川）等5镇①。此后，虽有变化，但不出京畿、关内一带。

神策军主要军事任务除保卫京师外，还有以下三项：第一，随时奉命征讨。在唐中央讨伐叛乱藩镇的战争中，神策军多次奉命出征，如对魏博镇田承嗣、淮西镇李希烈、成德镇王承宗、西川镇刘辟等的讨伐。德宗时朱泚之乱，也主要是靠神策军平定的。故《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说："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第二，与防秋诸军相互策应防御吐蕃。从上面所述的神策军驻扎地看，多分布于京师西北，其军事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关于神策军与吐蕃的作战，后有专文论述。第三，监临关内诸军。由于京西北地区是唐王朝的重点防御区，是抗击吐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二年四月胡注。原文残缺，少一镇。

蕃的前线，这里又靠近京师长安，所以唐统治者对这一区域非常重视，驻扎有重兵。在这些军事驻扎地区犬牙交错地布置神策军，除了互相策应对吐蕃作战外，同时也起到了监临诸军的作用。自唐德宗贞元（785～805年）以来，京畿和关内地区保持长期稳定局面，消弭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动荡形势，这和神策军的监临作用是分不开的。

由于唐廷拥有神策军这样一支庞大军队，所以，一般藩镇对之不敢过分睥睨，同时也阻遏了吐蕃的侵扰，保障了京师的安全。神策军是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来得以继续维持100多年统治的重要保证。唐文宗时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说："左右神策军，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唯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宝。"① 这个评论是符合史实的。

唐穆宗以后，神策军渐渐腐化，战斗力下降。神策军的腐化孕育于其极盛之时。由于其拥有许多特殊权利，故促成了其自身的腐化。神策军至少在三个方面享有特权：第一是给养三倍于其他军队，还经常得到一些额外赏赐。从代宗以来，每次大赦都要厚赐神策军。每个新皇帝即位，也要犒赏神策军，如穆宗即位，"赐左右神策军士人钱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②。由于神策军待遇优厚，对其他军队颇具吸引力，乐意隶属神策军麾下，称之为"神策行营"。第二是在其将吏迁转升任方面有优先权。据载："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③ 当然，他们的这种优先权利也得益于护军中尉的偏爱和关照。第三是在法律上也享有特权。唐制，京师各机构、各部门，每季派御史巡按监察。后来由于禁军地位特殊，御史皆不敢去巡察。贞元十九年（803年），监察御史崔远不了解这种变化，进入了右神策军驻地，结果被杖四十，流

①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宪宗元和十五年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三年九月。

放外州。说明皇帝已承认神策军在法律上的这种特权地位。这些特权不仅促使神策军日益腐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某些藩镇发动叛乱的借口。唐朝末年，藩镇势力屡次进犯京师，常以翦除宦官为口号，而这时的神策军将吏大都卷入宦官集团中去。由于穆宗以后，神策军很少外出征战，驻扎京师日久，军士多习杂戏、角觝或游乐射猎，建造宫阙，军纪日益败坏。其普通军士也非当年善战的边兵，多以工商富家子弟充任，不堪一战。封建统治者给予神策军特权，目的是让这支军队为维护封建统治发挥更大的作用，却适得其反，促使其走向腐化，丧失战斗力，这是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

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入关，僖宗仓皇南逃入蜀，左右神策军或溃败，或为藩镇招谕收容。后宦官田令孜另招神策新军54都，每都千人，以都将分领。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举兵攻长安，昭宗"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谨，乃引去"①。天复二年（902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进入关中，次年击败李茂贞，逼昭宗杀死大宦官韩全海等20余人，把残余的神策左右军的兵士并入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等六军，"而神策左右军繇此废矣"②。至于所谓六军，实际也是"名存而已"。

三、宦官操纵禁军

（一）唐朝前期禁军控制权转移之回顾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以前，北衙尚未成军，禁军统帅权皆在十六卫大将军之手。龙朔二年之后，北衙的左右羽林军已经建立，其统帅权逐渐发生转移。武则天执政时，有意削弱十六卫大将军的地位，以种种借口诛杀了卫大将军十余人。她又紧紧抓住左右羽林军，依靠其力量废中宗，大杀诸王。武则天、韦后

---

①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唐中宗皇后）执政时期，还多用本家或皇亲充任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唐睿宗是依靠唐玄宗李隆基和诸王的力量上台的，当时是岐、薛二王分掌左右羽林军，对此他极不放心，即位后就下诏规定：今后诸王、驸马不得典禁军，现任者改任他官。剥夺了诸王的禁军统帅权。唐玄宗是依靠禁军和诸王的支持而取得政权的，但是他对诸王并不放心，表面上对诸兄弟亲密无间，然实际上戒备甚严，绝不任以任何职务，更不用说允其染指禁军。这样，军将、外戚、诸王、驸马等都在不可信任之列，禁军兵权已非宦官莫属。

唐初，元勋宿将为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皇帝利用他们掌握兵权，尚不疑惑。武、韦时期，以女主君临天下，对军将的信任度下降，则多用本家、亲信掌握禁军。睿宗、玄宗时期尤忌诸王，因为宗室靠血缘关系有争夺皇位的可能，而外戚靠姻亲关系也有篡位夺权的可能，军将依靠武力也可能夺位，这种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为君者不会不引起警惕。宦官为皇帝近侍、"家奴"，又是"刑余之人"，在皇帝看来，自然无篡位之嫌，把禁军兵权交给他们，则皇帝放心。唐德宗设立护军中尉后，曾对窦文场说："朕今用尔，不谓无私。"① 公然承认自己授受禁军兵权是出于私心和偏爱。皇帝为什么独独偏爱宦官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既是自己亲信又不可能篡位，用宦官典禁军就如同亲自统帅一样。

（二）宦官掌典禁军制度的形成

早在唐玄宗时期，就开始以宦官任诸卫将军，如任大宦官高力士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并把一些亲信宦官升为三品将军。但北衙禁军之权尚未轻授宦官。肃宗、代宗时，惩藩镇专兵之患，对军将更加不信任，宦官李辅国因拥戴肃宗之功，开始掌管禁军兵权。李辅国之后又有宦官程元振掌管禁军。但他们都是以"判元帅行军司马"的职务而典军的，这种职务属暂时管摄，故宦官还不能常主北衙兵柄。神策军成为北衙禁军后，代宗即以大宦官、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知神策军兵马使"，又以宦官骆奉先为神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二年六月。

策军容使，直接统率神策军。兵马使为武职军将，由宦官充任，这是不多见的。鱼朝恩死后，由其爱将刘希暹、王驾鹤先后掌管神策军。唐德宗即位后，起用军将白志贞掌管，宦官一度失去了北衙兵权。泾原兵变发生后，德宗以“禁军仓促不及征集”① 为由，罢去白志贞北衙兵权，将其流放，禁军兵权重新落入宦官之手。唐后期禁军以神策军为主，其他军队只存名号而已，故所谓对禁军的控制，实际上只是指对神策军的控制。

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为征讨叛镇途经长安，因朝廷赏赐太薄而发生兵乱，奉闲居长安的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帅，禁军逃散，无人御敌，德宗仓皇逃往奉天。当时，文臣武将或逃亡、或投敌，侍从宦官却无一人叛变，忠心耿耿，随驾扈从。德宗由此深信，只有宦官最可靠，于是把神策军交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统率。贞元二年（786年），改神策军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勾当左右神策军之职，由窦、霍分任，“以宠中官”②。十二年，“以监勾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勾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③。从此以后，以宦官典禁军便制度化了。“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④。

窦、霍之后，宦官杨志廉、第五守亮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至唐末，禁军统帅权始终牢牢控制在宦官集团手中，神策军将吏多由忠于宦官者充任。顺宗时，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革新集团试图夺取神策军权，“乃以故将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

---

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

②③《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④《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霍仙鸣传》。

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希朝、韩泰已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①。范希朝、韩泰的任命，当然是顺宗批准的，但当宦官们意识到这实际是一次兵权转移行动时，竟置皇帝之命于不顾，致使革新集团这次行动失败。

（三）宦官掌典禁军的影响与危害

第一，使宦官集团长期控制皇权。唐朝自穆宗以后，天子多受制于宦官。穆宗以后共有九帝，其中，除敬宗、哀帝外，其余均为宦官所立。敬宗虽不是宦官拥立，但却死于宦官之手。宦官集团之所以能掌握皇帝的生、死、废立大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神策军兵权，以神策军为工具控制皇权。皇帝让宦官代表自己掌握禁军的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然而，当宦官一旦兵权在握，地位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成为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社会力量，这一点却是始作俑者所未能料到的。

第二，操纵朝政，使政治更加黑暗。由于宦官是所谓“刑余之人”，身份低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文化，缺乏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才干，他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和地位，必然要不择手段地残酷打击政敌，贪婪地攫取财富。宦官集团利用禁军控制皇权，又利用皇权操纵朝政，权势很大。他们多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无恶不作。凡触犯他们利益的人则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如文宗时，宦官仇士良以“甘露之变”为借口，出动神策军，大杀朝官，死者六七百人，朝中几乎为之一空。皇族贵戚的命运也操在其手，仅仇士良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②。其他宦官无不如此。宦官专权的结果，使唐朝政治更加腐朽、黑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

第三，使封建割据局面更加严重。宦官专权以后，地方藩镇的节度使任命多操纵在其手中。史载：“自大历已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

---

① 《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

② 《新唐书》卷二〇七《仇士良传》。

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①。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二是造成了藩镇对朝廷更加离心离德。襄阳节度使来瑱因拒绝宦官的某些要求，后被借故诛杀，致使"天下方镇皆解体"②。宦官的贪财受贿还激起藩镇的反叛。如"李宝臣方奉命讨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马承倩劳之，宝臣赠绢少，承倩呵而掷于途，宝臣顾左右有惭色，于是转与承嗣连衡拒命矣"③。唐末不少藩镇都曾以诛宦官为名，举兵进攻朝廷，如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宦官集团的倒行逆施不仅激化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唐王朝在两种矛盾交织发展中趋于灭亡。

第四节　唐后期军事技术的发展

唐后期尽管战争比较频繁，但生产与科学技术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从而使武器装备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战船及兵器制造技术的改进和火药的发明等方面。尤其是火药的发明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人类战争开始步入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在唐代战争中，尽管火药的使用只是初步尝试，但却开了宋代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的先声，其意义不可估量。

一、战船的发展与进步

唐代的造船工场很多，根据史籍记载，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江州（治今江西九

---

① 《旧唐书》卷一六二《高瑀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四《程元振传》。

③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江）、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扬州（今属江苏）、江宁（治今江苏南京）、桂州（治今广西桂林），以及今四川地区。工场规模也比较大，如刘晏在扬州就设置了10个造船工场，每场置专知一人，“竞自营办”①。所造之船载重量也较大。早在隋炀帝时，其南游所造的五牙大楼船，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可容士卒800人。到了唐代，船的载重量有了进一步提高，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荆南节度使成汭在一次作战中出动“舟师十万”，其中一艘巨舰，制作“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谓之‘和舟载’。其余谓之‘齐山’，‘截海’，‘劈浪’之类甚众。”胡三省注说：“齐山，言其高也。截海，言其长也。劈浪，言其轻疾也。”这些战船规模都很大，“每舰载甲士千人，稻米倍之”②。大大超过了隋代水平。唐代江淮一带万斛大船比较常见，唐人称赞大船说：“崇崇大舟，内谽谺而坑谷，外突兀以山丘。长百寻，受万斛，浅淮泗，带原陆，兀若簸大海以出鲸鱼，邈若漂昆仑而横地轴。”③ 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大船的雄伟和壮观。

在唐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轮船。荆南节度使李皋，吸收前代造船技术与经验，“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④。用两个大轮子挟在船左右，船工在船内用足踏轮，使船运转，速度可抵帆船。这种脚踏轮船发明后，推广情况未见记载。后来在宋代洞庭湖的杨幺起义军中，大量使用这种轮船，并发展为九轮、十三轮、二十轮，速度进一步提高。后来宋朝也大量制造这种轮船作为战船使用。

二、火药的发明

火药的原料是硝酸钾、硫磺和木炭。硝石和硫磺在我国古代

---

① 《唐语林》卷一《政事》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十》，昭宗天复三年四月。

③ 《全唐文》卷九五三常晖《大舟赋》。

④ 《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

是作为药物使用的。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把它们均列为上品药。该书记载硝石时说："苦寒，主五脏积热，……炼之如膏，久服轻身"。由于硝石不但能炼药治病，而且长久服用，可以使体轻神爽，这就导致炼丹家用硝石作原料炼制长生药，而炼丹家对硝石、硫磺药性的研究，不自觉地成了火药发明的动因。

东汉的炼丹家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记载了硫磺与水银化合，能生成红色汞，从而涉及到了硫磺的化学性质。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记载了他用硝石、玄胴肠（猪脂）、松脂三物合炼雄黄的试验，如果所用硝石较多，则用火点燃合炼的生成物，就会发生爆炸。

唐代的炼丹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伏火硫磺法"，其法记载在《诸家神品丹法》摘引的《孙真人丹经》中，《孙真人丹经》约成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至三年（758～760年）①。所谓"伏火"即是对一些性能猛烈的药物进行适当处理，使其药性变得温和一些。具体办法就是用火烘烩以改变药物的易燃性、挥发性和毒性等性质，以免在练丹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由于此法把硫磺引入自供氧燃烧体系，这就为火药的发明打开了一道重要的大门。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成书的《太上圣祖金丹秘诀》（炼丹家清虚子撰，后收入《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一书内），提出了"伏火矾法"，比"伏火硫磺法"前进了一大步。其法是："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两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边，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其硫磺"。此法的特点是把等量的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质马兜铃粉均匀拌和，使之成为较完备的自供氧燃烧体系，无须借助空气中的氧而能进行迅猛燃烧，已具备了雏形火药的性质。略后的《真元妙道要略》一书，也记载了"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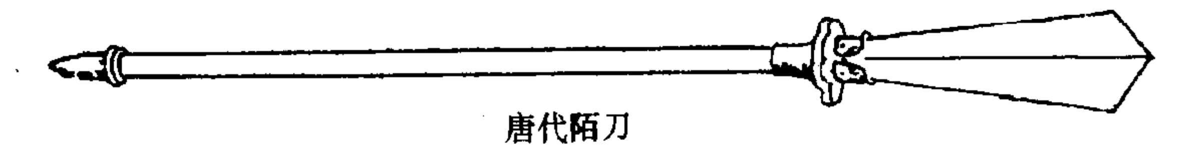
① 郭正谊：《火药发明史料的一点探讨》，《化学通报》1981年第6期。

者”。说明这时人们已熟知这些生成物的燃烧和爆炸性能。

火药雏形发明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完善，至迟在唐末已被用于军事方面，发明了火药武器。据路振《九国志》卷二《郑璠传》载：唐哀帝天祐初年（904 年），郑璠率众围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龙沙门”。据宋人解释，“飞火”就是火箭、火炮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把火药捆绑在箭杆上，点燃引信后，再用弓弩发射出去，延烧敌人营房和人员。该书还说，郑璠不失时机，“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可见火药武器一旦用于战争，便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这是火药制造的武器用于战争的最早历史记载。

三、武器制造技术的提高

在冷兵器时代，作战武器设计与制造质量的好坏，对战争的胜负有很大的影响。唐代军队所使用的兵器从形制、质量、效能等方面，大都比前代有所提高，现就其中改进较大的几种兵器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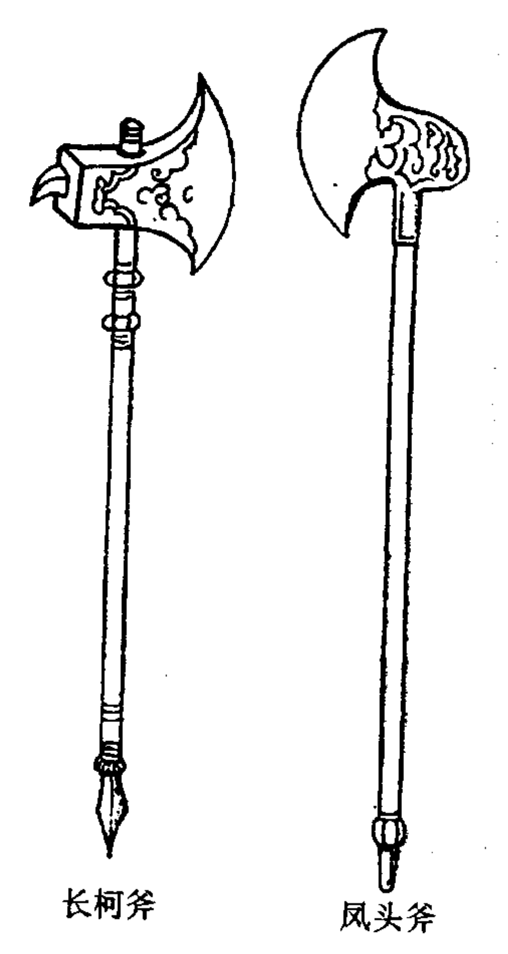


唐代陌刀

陌刀：陌刀是从长刀发展而来的一种砍杀兵器。长刀创自东汉，就是在大刀上安上长柄，以提高砍杀效能，尔后历代都作为常备武器之一。至唐代形制有了较大的变化，由一面有刃，改进为两面有刃，称为陌刀，又称拍刀。《新唐书》卷九十二《阚稜传》载：“善用两刃刀，其长丈，名曰‘陌刀’，一挥杀数人，前无坚对。”同书卷一九三《张兴传》：“兴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贼将入，兴一举刀，辄数人死，贼皆气慑。”可见陌刀威力之大。大约在唐玄宗天宝初年，陌刀大量装备军队，并组成专持陌刀的部队，安西镇（治今新疆库车）大将李嗣业和田珍就曾任左右陌

刀将，在征服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①。

斧：作为一种劈砍兵器，早在商周时期已经使用，由于形体不大，又为铜制，硬度不强，因而逐渐降为装饰性兵器或统兵将帅的权力标志和仪仗。随着铁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可以制造锋利而沉重的大斧，斧又重新被重视。至少在东汉末年又大量装备军队，把斧同刀枪提至同等重要的位置。唐代的斧，战斗性能大为改进，刃部加宽，柄部减短，比较便于使用。依其式样叫做长柯斧和凤头斧。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唐军与安庆绪军在长安香积寺大战，唐将李嗣业率“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②。大败安庆绪军，收复长安。根据《唐六典》卷十六记载，斧是当时常备兵器之一，由两京武库令掌管。


长柯斧　凤头斧

弩箭：弩就是安有臂的弓，弓臂上装有弩机，弩机外面有一个匣，匣内上面有挂弦的钩，下面安有扳机，发射时先把箭放入匣内，把弓弦向后拉挂在钩上，瞄准目标后，扣动扳机，箭即射出。弩发明于战国时期，历代沿用，性能也逐渐有所提高。唐代的弩，据《唐六典》卷十六《两京武库》载，有臂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七种。前两种属于轻弩，其余都是强弩，射程远，主要用于野战。如大木单弩，弓长1.2丈，发射时以绞车张之，“一发声如雷吼”③。还有一种车弩，

① 《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
② 《新唐书》卷一三八《李嗣业传》。
③ 《卫公兵法辑本》卷下。

把12石之弩，设在绞车上，能同时发射7枚箭，可射700步远，威力极大，所中城垒，“无不摧陨”①。强弩威力虽大，但从准备到发射所用时间长，又笨重，故多装置在兵车或船上使用。唐代的箭分竹箭、木箭、兵箭、弩箭四种②。前两种主要用于射猎，后两种用于作战。兵箭用钢制成箭镞，刃部长而锋利，可穿甲盔。弩箭“用之陷坚也”③。如车弩的箭，“镞长七寸，围五寸，前杆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④。也有以皮革为羽的。唐代箭的特点是能够保持箭的飞行方向，减少空气阻力，因而可增加射程和准确性。

盔甲：据《唐六典》卷十六《两京武库》载：唐代甲有明光甲、光要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等13种。其中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锁子等甲，“皆铁甲也”。“皮甲以犀兕为之”，其余各种甲都以布绢木等物制造。锁子甲用铁链子衔接，互相密扣连缀而成，穿着柔和、便利，比大型坚甲轻巧。唐宣宗时，河中节度使徐商发明纸甲，据说非常坚固，“劲矢不能洞”⑤。唐代的盔甲除了坚固轻便外，还讲究华丽美观，甲的外表一般涂以金漆和各式花纹，光彩耀目，用以装备军队，显得阵容严整，威武雄壮。

抛车：这是一种抛掷石头的攻守城垒的武器，又称发石车或抛石机。唐代称之为“将军砲”或“礧石车”。体积比前代大，需要多人操作，威力也有很大的提高。如安史之乱中，安军大将史思明围攻太原，唐将李光弼“乃彻民屋为礧石车，车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死”⑥。

---

① 《卫公兵法辑本》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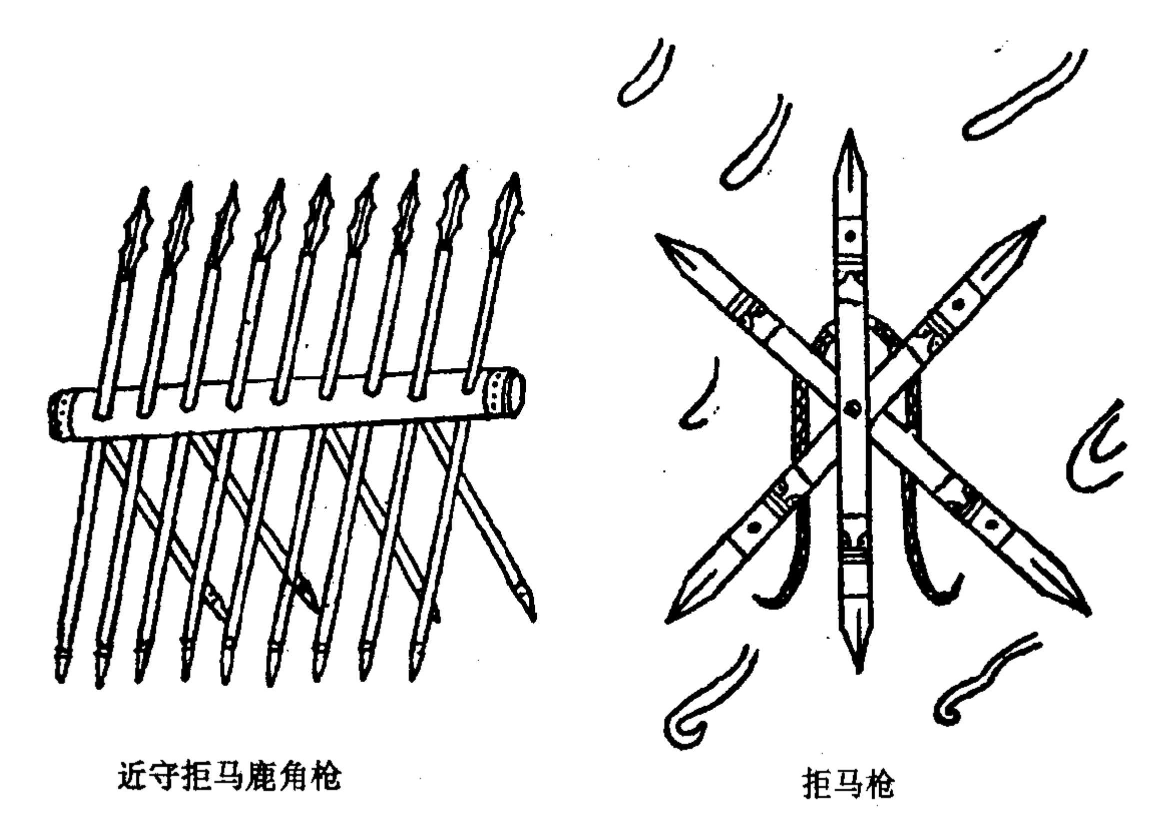
②③ 《唐六典》卷十六《两京武库》。

④ 《卫公兵法辑本》卷下。

⑤ 《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附徐商传》。

⑥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拒马枪：拒马是一种木制的可以移动的障碍物，唐代叫做



近守拒马鹿角枪　　　　　　　　拒马枪

“拒马枪”。它用直径六寸多的圆木为干，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长短，在圆木上十字凿孔，安上长一丈的横木若干根，横木上端削尖，安设在要路、城门、巷道，以阻止人马通过。唐代还有一种大型拒马枪，叫做近守拒马鹿角枪，用圆木一根，长短依需要而定，在圆木上凿孔，以安装铁枪，前面设四根斜木制成，使用时将其打开，用铁链固定在地上。行军时，可以驮载随军行动，故又称为远驮固营拒马。

第十一章　安史之乱与唐王朝的平叛战争

（参见附图 12）

唐玄宗即位之初，方当英年，励精图治，虚心纳谏，任用贤能，革除积弊，发展生产，编修典籍，弘扬文化，使当时的社会出现了所谓“开元盛世”。但他到了晚年，尤其是天宝时期（742～756 年），自以为大功已成，骄奢淫逸，任用佞臣，使得政治腐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奸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举兵反唐。很快攻陷河北大部州郡及洛阳，不久又夺占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唐玄宗在少数禁卫军护卫下，仓皇南奔四川。太子李亨北逃朔方，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称帝，是为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安史之乱持续了 8 年之久，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叛乱才算平息。从此以后，唐王朝国势每况愈下，逐渐衰落。

第一节　玄宗统治后期的社会危机

唐朝到了开元末年至天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旧的事物已被破坏，新的尚在产生之中。如均田制已经破坏，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赋税制度仍沿袭租庸调制，使得农民不堪重负，激化了阶级矛盾。府兵制也破坏殆尽，募兵制代兴。沿边设置节度使，屯驻重兵，形成“内轻外重”的军事布局，加上连年的开边战争，激化了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大肆挥霍浪费，军事开支浩大，加深了财政危机。唐玄宗和执政的宰相们不能够正视这

种社会现状，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得社会危机愈加严重。

一、均田制的破坏与阶级矛盾的加剧

均田制的破坏是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初的均田令虽然规定永业田、口分田不准买卖，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准许贴卖，如当时规定：身死家贫，无法承担埋葬费用者，允许卖永业田；自愿迁往宽乡（地多人少地区）者，允许卖口分田；如果已卖掉住宅、邸店、碾硙者，虽然并不迁往宽乡，也可卖口分田。诸田在主人服远役或外任，无人守业的情况下，也允许抵当或典卖。由于法令中有一些可以允许买卖土地的条文存在，就为地主、官僚大肆兼并土地开了口子，他们可以寻找种种借口，合法或非法地兼并农民土地。

从武则天、唐中宗以来，土地兼并渐趋盛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对土地的贪欲也越来越凶，他们凭借势力，侵占民田。到唐玄宗统治时期，占田之风更盛，所谓“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①。如工部尚书卢从愿“占良田数百顷”，人称“多田翁”②。礼部尚书李憕和吏部侍郎李彭年因为广占土地，被人称为有“地癖”③。贵族、官僚还用“借荒”的名义，侵占“熟田”；或者借口设置牧场，侵占大片山谷，或者以“典帖”的名义把土地买下。由于大量土地被占，大批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于是在天宝十一载（752年）下诏，禁止在两京（长安、洛阳）500里内设置牧场，再次重申“不得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声称要对“浮逃人”计口授田④。然而，在王公、贵族、官

---

① 《通典》卷二《食货典二》。

② 《新唐书》卷一二九《卢从愿传》。

③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憕传》。

④ 《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

僚兼并土地成风的时期，法令也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挽救均田制崩溃的趋势。

在农民大量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国家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改变，仍然要求每丁每年缴纳租粟2石、调绢2丈、庸绢6丈，其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此外，农民还要负担繁重的差科和兵役。国家规定民夫每年要轮番去衙门公廨充任"防阁"、"执衣"、"白直"等差役，如果不去应役，要出代役钱，每丁每月208文。差科通常是传送文书，护送往来官吏，充作驿夫和纤夫，护送马匹，修筑城戍，运送粮食、物资等。如果损失运送物品，护送人要赔偿，有延误则要受处罚。繁重的差科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

在沉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下，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好流亡异地他乡，"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①。当地地主对待这些客户非常苛刻，或"薄酬其佣"，或视若"家僮"，极尽压迫奴役之事。当时，农民逃亡较多地方的官吏是要受到处分的，故"州县惧罪"，"耻言减耗"；不把逃亡者的户口从户籍簿上注销，其租庸"令近亲邻保代输"②。这些近亲邻保不堪重负，只好也随着逃亡。破产农民除了以逃亡为手段来反抗官府剥削外，化为"流贼"，武装反抗的也不少。只是因为当时统治阶级控制尚严密，还没有汇成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对付农民逃亡，唐朝廷曾多次派遣官吏到全国各州"括户"，仅开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年），就检括出逃户80多万户，未检出的尚不知多少。可见当时逃户问题多么严重。不管唐朝廷采取什么措施，农民逃亡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敕令也不得不承认："俾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贪婪日蹙，逋逃岁增。"③ 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阶级矛盾已经相当激化了。

---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

②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③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听逃亡归首敕》。

二、政治腐败与奸佞专权

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愈来愈腐败，他本人已完全失去了前期励精图治的锐气，一心想作太平天子，在思想上由原来的不信神仙祥瑞转为深信、迷信。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玄宗迎“自言有神仙术”的张果入宫后，“上由是颇信神仙”。胡三省说：“明皇改集仙为集贤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则颇信矣，又至晚年则深信矣。”① 唐玄宗还在宫中造“真仙之像”，每夜焚香顶礼。又令道士采药饵，炼仙丹，崇尚长生轻举之术。在生活上他日益腐化，终日沉溺于歌舞声色、盛宴美酒之中。开元二十三年，他在东都洛阳“御五凤楼酺宴，……时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帅所部音乐集于楼下，各较胜负”②。喜爱音乐甚至到了上朝听政时，有时怀揣乐器上下抚弄。致使朝廷百官也竟投其好，“皆喜言音律”③。把军国政务全都委于奸相李林甫等，使他们长期独揽朝纲。

唐玄宗早年宠爱能歌善舞的赵丽妃。因此立其子李瑛为太子。开元中赵丽妃人老色衰失宠，他又宠爱武惠妃；武惠妃病死后，又迷恋杨贵妃。杨贵妃名玉环，本是玄宗十八子李瑁的妃子，玄宗见她美丽，先把她转为道士，号太真，后迎入宫中，天宝四载（745年），立为贵妃。由于杨贵妃的关系，杨贵妃的3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从兄杨铦、杨锜，皆封高官。“四方赂遗，其门如市”。有的人因为善献殷勤，“致擢居显位”④。杨贵妃另一从兄杨国忠，就任宰相，身兼40余职，铨选官吏，于私第“暗定”，“贿赂公行”⑤；为讨贵妃欢心，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正月。

③ 《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十二》。

④ 《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

⑤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

有限极"①。仅3位国夫人的脂粉钱，每年要各赐钱百万。杨氏兄妹的府第，皆仿宫室建造，每建一堂，费逾千万。其他珍奇或贡献，皆多赐于杨氏兄妹，使者前后竟不绝于路。《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说："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玄宗还多次带领贵妃及杨氏兄妹临幸华清宫，铺张排场之大，世所罕见。此外，玄宗还对其他宠臣大肆赏赐，如把全国一年的农业财政收入全部赏给李林甫。为安禄山营造府第，不限财力，只求壮丽，"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②。为了满足玄宗的侈糜需要和赏赐无节，主管财政的官员更加肆意刻剥，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源源不断运入长安，因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后人评论说："明皇暴敛而横费之，其不爱惜如此，安得无祸乎！"③

李林甫出身于唐宗室，史称"林甫面柔而有狡计"④，是一个精明阴险而又极富野心的阴谋家。他自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入相以来，连结武惠妃，欲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五月，太子李瑛被废，不久赐死。同年十二月，武惠妃病死，寿王瑁失去靠山，不能立为太子。玄宗另立第三子李玙（后改名亨）为太子，即后来的唐肃宗。李林甫与宦官相勾结，宫中动静必先告知林甫，林甫有意先奏，深合玄宗心意，以此更得玄宗恩宠。他采取种种手段，排挤打击朝中正直官员或异己者，杜绝他们入相之路。又怕边帅出将入相，劝说玄宗重用蕃将，充任边帅。蕃将极少精通汉文字，自然没有入相的可能，就不会破坏自己专权的局面。李林甫还重用酷吏吉温，屡兴大狱，杀害了户部尚书裴敦复、刑部尚书韦坚、户部侍郎杨矜慎、陇右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等。尤其是他迫害著名将领王忠嗣，使其遭到贬逐，过早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正月。

③ 《唐鉴》卷五。

④ 《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死亡，对唐朝廷后来平定安史之乱造成极不利的影响。李林甫前后把持相位 19 年，在朝中结党营私、贪赃受贿、阻塞贤路、逢迎天子，又极力拉拢扶持安禄山，使得当时政治更加黑暗，社会矛盾激化。后人评论说："荡覆天下，林甫为之也"①。认为他迷君误国，是造成天宝之乱的祸首。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专权，使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唐朝的危机加深了。

三、战争频繁与财政日蹙

早在开元二年（714 年），玄宗即位不久，就不听朝中诸臣的劝告，拜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长史兼和戎（今山西大同）、大武（今山西代县北）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为相，率军 6 万进攻契丹，结果唐军大败，死者十之八九。这已经暴露了玄宗"轻于用武"的心理。到了开元末年，国力有所增强，玄宗的黩武思想再度膨胀，所谓"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②。天宝元年（742 年）沿边设置的 10 个节度使、经略使，共拥有军队 49 万多、马 8 万匹。自天宝以来，"师旅数起"，边将或邀功贪赏，无端寻衅，或凌辱少数族人引起反抗，或为扩张领土挑起战端，牺牲了大批军士的性命，耗费了巨额资财。如为了夺取战略意义不大的吐蕃石堡城（今青海湟中西南），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杨国忠贪图边功策动的对南诏战争，前后死亡 20 多万人，"只轮不还"。其他如安禄山之败于契丹，高仙芝受挫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的江布尔城），都损兵折将，损失惨重。玄宗还改变了建唐以来边帅不久任的制度，常常 10 余年不易其人。这样，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将领，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结党营私，扩充实力，组织叛乱。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唐代天宝之乱，原因孔多，

① 李贽：《藏书》卷五十九《贼臣传·李林甫》。

② 《唐鉴》卷五。

边兵之重，要为其大者。”① 确有一定道理。

由于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大肆挥霍浪费，加之连年战争，军费开支浩大，使得唐廷财政开支日趋紧张。如开元初年，边防开支每年没有超过 200 万贯。到天宝时代，折冲府已无兵可交，彍骑、健儿的军需家粮等等一切都由官家供给，就是团结兵也要支付津贴，导致边防军费大大增加。开元末军费为 1000 万贯，天宝末已达 1400～1500 万贯，较之开元初年增长 7 倍多。天宝时代，运送诸道节度的军粮达 1000 万石，仅河东、幽州、剑南 3 道的军粮就达 190 万石。另外，西北沿边数十州，多屯驻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②。为了和籴粟米，官府以绢布支付，每年支出绢布 360 余万匹。边防军士的衣服用绢布，每年共需 530 万匹，还有其他军需项目开支 210 万匹，总计每年边防军费仅绢布一项开支，就达 1100 多万匹之巨。

天宝以来，边镇将帅为了笼络军士，凡有微功，即授官爵，久而久之，致使行伍间“无白身者”。河北、陇右、朔方等道诸郡，官仓积贮粟粮，多者百万石，少者不下 50 万石，由于支付官禄，到天宝末年已告罄矣。同时，唐政府的庞大官僚机构，也需数目浩大的费用支出。以关中为例，仅稻米一项数目增长就非常之快。唐初每年漕运租米入关中不过 20 万石，开元中已达 250 万石，增长了 10 多倍。如此巨大的开支，造成了唐政府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也使广大劳动人民苦难日深。

第二节　安史之乱的爆发与西京的陷落

天宝十四载（755 年），安禄山在范阳（治今北京西南）起兵反唐，这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唐玄宗腐朽统治造成的恶果。安禄山的行动，不是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

① 《隋唐五代史》上册，第 18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月。

的行为，也不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其性质是拥有雄厚力量的野心勃勃的藩帅反对唐朝廷，企图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武装叛乱。唐朝平定安史叛乱的战争历时8年，大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至次年六月长安失陷，为第一阶段；当年肃宗在灵武即位，至乾元二年（759年）九月，邺城之战失败，洛阳再度失陷，为第二阶段；从这时起至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败死，为第三阶段。

一、安禄山的叛唐准备

安禄山，小名轧荦山，突厥语“战斗神”的意思。父亲是康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人，早亡。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人，为本族巫师，后改嫁安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安延偃，因冒姓安，改名禄山。安禄山小时从康国迁到营州（今治辽宁朝阳），这里是胡商聚居之地，商业交易非常活跃，所以安禄山年轻时曾干过互市牙郎。

史思明，史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入唐侨民，本名窣干，与安禄山同乡里，比安禄山早出生一日。及长通晓九蕃语，骁勇善战，与安禄山同为互市牙郎。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时，二人投其帐下，又同为捉生将。由于安禄山熟悉奚、契丹等的情况及那里的山川形势，每次出动必有俘获，深为张守珪所赏识，以军功升为衙前讨击使，再迁至平卢兵马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安禄山已升任为幽州节度副使兼平卢军使，押两蕃（指奚和契丹）、渤海、黑水（靺鞨）四府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又升任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节度使。

安禄山性巧黠，厚赂朝廷往来使者，故人多言安禄山好话，玄宗也信以为真。御史中丞张利贞巡视河北时，安禄山百般谀媚，赠以厚礼，张利贞回朝后盛赞安禄山才能。河北黜陟使席建侯、裴宽等也因得其厚赂而争言其公直无私。当时，李林甫猜忌汉族将领，恐其出将入相代替自己的位置，因此劝玄宗信任安禄山，安

禄山也暗中讨好李林甫，以固兵权。在这些人的赞誉下，玄宗更加信任安禄山。天宝三载（744年），任命他为范阳节度使兼平卢节度使。天宝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三镇兵力总计为18.39万人，占当时全国边兵的37%。同时，他还兼任河北、河东采访处置使，到天宝十三载，又兼领闲厩、陇右群牧等使。这样，不仅西自忻（治今山西忻州）、代（治今山西代县），东到平（治今河北卢龙）、营，这一广大地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等大权，全都归安禄山一手掌握，而且连国家马匹也都归安禄山调遣了。

天宝初年，东突厥归附唐朝的部落，由叶护阿史那阿布思统率，当时他的官职为朔方（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副使。阿布思素与安禄山不和，安禄山为扩充实力也时时想兼并其部落。天宝十一载，安禄山将出兵攻契丹，请求唐廷派阿布思率众共同出击。阿布思洞悉安禄山想乘机吞并的阴谋，于是率所部叛唐归返漠北。不久，阿布思部众被回纥在漠北击败，余众南归，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使其势力大增。阿布思的部众大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他还在同罗、奚、契丹人中选骁勇之士8000人，谓之"曳落河"（壮士），养为假子，他们"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①。安禄山还利用他兼任闲厩、群牧使的职权，密派亲信在各牧区不断地挑选良马送往范阳，使其拥有的战马达数万匹之多。安禄山还在天宝十四载请求玄宗批准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统率军队，如愿后使唐朝廷更难控制他了。他还百般拉拢人心，对所俘获的少数族人，亲自抚慰，使他们归顺后补入自己的军队。

在经济上，安禄山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唐玄宗曾允许安禄山在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起五炉铸钱"。此外，安禄山还分遣胡商到全国各地贩运罗帛，"将为叛逆之资"。在范阳他广招商贩与之交易，诸道胡商"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②。这样，在财力方面安禄山也大大地充实了，起兵反叛的条件更加成熟。

太子李亨与宰相李林甫矛盾颇深。李林甫早年为讨好武惠妃，

---

①② 《安禄山事迹》卷上。

极力主张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引起李亨对他的不满。此后，他时时寻机想废去李亨，另立寿王为太子，而李亨为自身安危计，必然竭力防卫，双方明争暗斗，矛盾激化。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时，安禄山看不起杨国忠，“视之蔑如也”①，两人之间也有矛盾。安禄山既为李林甫集团人物，必然成为太子与杨国忠的攻击对象，尽管李亨与杨国忠之间也有矛盾，但两人对安禄山的看法却一致，他们都多次向玄宗反映，说安禄山必反，玄宗不信。杨国忠又建议请安禄山入朝以验明其状。安禄山揣知其意，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入京，谒见玄宗，玄宗慰勉再三，拜尚书左仆射，放归本镇。

史载：“禄山既兼领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自以曩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又见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②。又载：他欲“伺上千秋万岁之后，方图叛换”③。安禄山之所以没有等到唐玄宗死后再发动叛乱，是因为其阴谋逐渐暴露，不得不提前行动。天宝十四载（755年）春，因杨国忠等人屡言安禄山反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去范阳以珍果赐安禄山，实际上是察访其反迹。安禄山厚贿辅璆琳，辅璆琳返京后，“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④。不久，辅璆琳受贿事泄，玄宗托以他罪而杀之。自此始怀疑安禄山，而安禄山也因此提高了警惕，“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称疾不出迎，盛陈武备，然后见之”⑤。杨国忠急于获得安禄山反叛的证据，指使京兆尹李岘搜查安禄山在长安的府宅，“得安岱、李方来等与禄山反状，缢杀之”⑥。至此，安禄山反谋无可掩饰。玄宗派中使（宦官）冯神威赴范阳召安禄山入京，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⑦，欲待入京时扣留他。安禄山遂于当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二载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二月。

③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四载二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四载四月。

⑥ 《新唐书》卷一三一《李岘传》。

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四载七月。

年十一月举兵反叛。

二、安史叛军南下与玄宗仓促应战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人共15万，号称20万，以讨杨国忠、清君侧为名，步骑相间，鼓行南下。其部署是：以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保护其根据地的安全。又派高秀岩守大同军（治今山西朔州东北），以防御朔方的唐军。安禄山自率大军迅速南下，攻陷河北后，即先下陈留（治今河南开封），再攻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进逼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直指长安（今陕西西安）。

河北原是安禄山的管辖区，因此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地方官员或弃城逃窜，或开门迎降，或为所擒戮，没有敢于抵御的。安禄山还派遣轻骑袭取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杀尹杨光翙。由于国家太平日久，军备弛坏，故使安军势如破竹，无人敢挡。当安军围攻荥阳时，唐"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①。

唐玄宗由于事先无防范准备，当他得知安禄山叛乱的确实消息后，匆忙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主要是：

1、罢免与安禄山有亲属关系的安思顺朔方节度使职务，任命九原（治今内蒙古五原南）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镇守太原；以程千里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长史，就地募兵，阻遏安军。

2、增设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睢阳（治今河南商丘南）、濮阳（治今河南濮阳东南）、淄川（治今山东淄博西南）、灵昌（治今河南滑县东）、彭城（治今江苏徐州）、淮阳（今属河南）、汝阴（治今安徽阜阳）、谯（治今安徽亳州）、济阴（治今山东定陶西）、琅玡（治今山东临沂）、临淮（治今江苏盱眙北）、东海（治今江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苏连云港西南）等13郡，以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镇陈留，以屏蔽江淮。

3、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时封常清入朝长安，即任命此职），驰往洛阳募兵抵挡安军。常清旬日之间，募得6万人，乃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州西南）为守备，并进军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唐廷又在长安募兵，并把在京的边兵及飞骑、彍骑集中起来，共计5万人，由前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统率，宦官边令诚任监军，屯于陕郡（治今河南陕县）。以上部队多市井子弟，战斗力很弱。

4、在安军进兵方向上的各个郡设防御使。令朔方、河西、陇右等道除留守城堡的军队外，诸军必须在20天内汇集长安。玄宗下诏御驾亲征。

十二月二日，安禄山企图在灵昌北（在今河南延津西北）渡河，当日天气寒冷，安军用长绳连结破船及草木，横贯黄河南北，当夜冰封河面遂成一浮桥，安军得以顺利渡过黄河，并袭取灵昌郡。随后进逼陈留，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仓促督兵上城防守，人心恐慌，难以守御。六日，陈留太守郭纳开城门投降，陈留陷落，张介然被俘。当安禄山听到留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诛杀的消息后，放声痛哭，为了泄忿，将陈留投降的唐军将士及居民万余人尽数杀死，并斩张介然。然后命其部将李庭望驻守陈留，自率大军向西进攻荥阳（今属河南）。八日，攻陷荥阳，大肆杀掠，然后进逼虎牢。

三、安军袭占东都洛阳

屯驻在虎牢的唐军，为新募之军，未经训练，尽管封常清富有作战经验，也挡不住安军铁骑的冲击，军队溃散，常清收拾余部，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败。收兵又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再败。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安禄山纵兵鼓噪，从四门入城，烧杀掳掠。封常清率残军战于都亭驿、又战于宣仁门，皆败。河南

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采访使判官蒋清，皆守节不屈被杀。

封常清率残部退守陕郡，当时陕郡太守窦廷芝已逃往河东，城中吏民皆已逃散。封常清向驻守该地的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居潼关以拒之。"① 高仙芝接受了他的意见，率军退往潼关，安军追至，唐军部伍混乱，自相践踏，死者甚众。到潼关后，修完守备，据险抗击。安禄山部将崔乾祐率部赶至，一时不能攻下，只好退居陕郡。当时，唐廷所征的朔方、河西、陇右诸道兵，尚未抵达长安，关中震动。幸好安禄山滞留洛阳准备称帝，没有全力进攻，加之高仙芝、封常清及时退守潼关，作好拒守准备，遏制了安军攻势，关中军民慌恐之情才得以稍安。

安禄山攻陷洛阳之时，他所任命的大同军使高秀岩在北方也展开攻势，进攻朔方的振武军（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南）。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军迎击，大败高秀岩军，乘胜攻下静边军（治今山西右玉）。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反攻静边军，郭子仪派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濬、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迎击，大破薛忠义军，斩杀 7000 余骑，并进围云中（治今山西大同）。郭子仪又派部将公孙琼率 2000 骑进击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很快攻下此城。郭子仪这一攻势不仅打通了朔方与太原的联系，使安禄山南下太原、夹攻关中的计划成为泡影，而且为其后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南）、入常山（治今河北正定）、给安禄山以拦腰打击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时期，由于洛阳、陈留已经陷落，江淮租赋自汴水（指通济渠，南至盱眙对岸入淮河，北到板渚沟通黄河。因隋开通济渠时，从荥阳至开封一段就是原来的汴水，故当时人把通济渠东段全流统称汴水或汴渠）之漕运不通，势必改道江汉以补给关中。为了保证这一路线的安全，以支持讨乱大计，唐廷下令以永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王李璘（玄宗子）为山南节度使，史源洧为副使，以保荆襄。又以颍王李璬为剑南节度使，崔圆为副使，以保四川。这一措施极为重要，此后唐军与安史长期争战，江淮、西川始终未乱，并源源不断地向唐廷输运财赋，保证了平叛战争所需的物力财力的供应。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高仙芝不从，边令诚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① 玄宗大怒，派遣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奉命斩杀了二人。当时，士卒向前，大呼称冤，声音震天。封常清死前上遗表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高仙芝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② 边令诚皆不听。这一错误处置引起了军心的动摇，也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对平定安史之乱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之后，唐玄宗任命病休在长安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领兵 8 万，连同诸道援兵及高仙芝旧部，号称 20 万，进驻潼关。并令各地四面进兵，会攻洛阳。

天宝十五载（756 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安禄山的叛乱，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取得了战争初期的胜利。主要原因有二：1、起兵的时间选在冬季，兵强马肥，利于骑兵驰骋。天寒冰封，使十数万人马得以迅速顺利地越过黄河天险，长驱直入中原腹地。2、安军乘中原空虚，唐廷武备松懈之机，以步、骑协同作战，以骑兵为突袭主要力量，予唐军以突然猛烈打击。而唐军之所以连吃败仗，除了准备不足，仓促应战，指挥不当等因素外，主要是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弱，经不住安军骑兵的猛烈冲击。另外，洛阳会战唐军与安军兵力对比悬殊，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四、河北、河南军民抗击叛军的斗争

在洛阳失守后，唐朝廷迅速调集和组织兵力，在洛阳南、北两个方向抗击安军。在河北有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治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东平（今属山东）太守吴王李祗、济南（今属山东）太守李随、饶阳（治今河北深州西南）太守卢全诚等，皆以兵讨安禄山，阻击和牵制了安军，使其不能西进。在洛阳南，真源（今安徽亳州西）令张巡率众于雍丘（今河南杞县），与安军大战，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也固守南阳（治今河南邓州），牵制了安军部分兵力，并阻止了安军向江淮方向的发展，保护了唐朝的交通运输线，使江淮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

（一）牵制安军西进的作战

常山之战 安禄山叛乱初起时，常山（治今河北正定西南）太守颜杲卿因无力拒敌，而伪降之。东都洛阳陷落后，颜杲卿密谋起兵讨安禄山，正好平原（今属山东）太守颜真卿（杲卿从弟）派人联络共同起兵。杲卿遂遣人西连太原尹王承业，东联颜真卿以起兵。首先，托言奉安禄山之命，召镇守西井陉的安将李钦凑来郡受犒赏，斩其首，收其甲兵。又用计擒住从洛阳北来的安将高邈和何千年，声势大振。共推颜杲卿为盟主，河北17郡皆响应，合兵达20万，仅范阳、卢龙、密云（今属北京）、渔阳（治今天津蓟县）、汲（治今河南卫辉）、邺（治今河南安阳）等6郡，仍附于安禄山。

安禄山正欲西攻潼关，诸军已至新安（今属河南），因常山起兵，河北诸郡响应，后方动摇而退守洛阳，派史思明、蔡希德率军进攻常山。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六日，安军前锋骑兵逼近常山，包围全城。由于常山守备未完，太原王承业又拥兵不救，颜杲卿率众昼夜拒战，粮尽矢竭，至九日城陷。颜杲卿被俘，送到洛阳后不屈被杀，安军杀城中军民万余人。攻下常山后，史思明等分兵攻击河北诸郡不从者，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大部分反正

的郡城再次为安军所陷，唯饶阳太守卢全诚守城不从贼，被史思明包围。河间（今属河北）郡出兵 8000 人前往援救，皆被史思明击败。于是，唐政府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率兵出井陉以定河北。

李光弼二月十五日至常山时，常山军民已杀散守军，活捉安史守将安思义以迎唐军。史思明听到常山失守的消息，解饶阳围，率军 2 万直抵常山，与李光弼激战 40 余日。三月底，史思明断绝常山粮道，命蔡希德进攻石邑（今河北石家庄西南），以围攻李光弼。李光弼告急于郭子仪，郭子仪发朔方精兵出井陉，会合李光弼军，兵力达 10 余万，声势复振，由被动转为主动。四月中旬至五月，双方先后在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嘉山（今河北定州西）一带数次交战，大败安军，仅嘉山之战，就歼灭安军 4 万人，史思明坠马，披发跣足，落荒逃走。李光弼遂进军包围史思明于博陵（治今河北定州）；河北十余郡，皆杀安将而降。各地军民，痛恨叛军残暴，少者数千，多者数万，各自为营，打击安军。安禄山的后方交通线由此断绝，军心动摇，一度"议弃洛阳，走归范阳"①。

平原之战　安禄山举兵反唐时，河北诸郡多降，独平原（今属山东）太守颜真卿坚持抗击叛军。他修城池，料丁壮，实仓廪，招募勇士，旬日得万余人。又派司兵参军李平赴京师驰奏。《新唐书》卷一五三《颜真卿传》载："玄宗始闻乱，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谓左右曰：'朕不议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颜真卿在得知李光弼克复常山的消息后，会合清河郡（今属河北）兵马，围攻魏郡（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斩杀万余人，捕获千余人，得马千匹，遂下魏郡。又联合北海（治今山东青州）太守贺兰进明，进兵信都郡（治今河北冀州），以策应在常山与史思明大战的李光弼。郭子仪援军到后，郭、李大败史思明。此时安禄山的平卢游奕使刘客奴遣使和颜真卿联系，愿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五月。

归顺朝廷，并请取范阳以自效。为了坚定刘客奴之心，真卿遣判官贾载运去大批衣粮以助刘客奴，并把幼子送去为人质以示信。这一时期，唐朝在整个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

六月，哥舒翰在灵宝战败，潼关失守，玄宗逃往四川。于是，郭子仪、李光弼被迫率军退保太原。刘客奴引兵袭范阳，未至，被史思明击败，刘客奴弃妻而逃，军士死者 7000 余人，形势为之大变。八九月间，史思明相继攻陷常山、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十月，攻陷河间（今属河北）、景城。随即史思明派部将康没野率军进攻平原，颜真卿力不能支，遂弃城渡黄河赴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河北诸郡相继为安军所攻陷。

（二）阻截安军南下江淮的作战

雍丘之战 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以其将张通晤为睢阳（治今河南商丘南）太守，使与陈留太守杨朝宗向东发展。郡县望风降服，唯东平太守吴王李祗，济南太守李随等，起兵讨贼。单父（今山东单县）尉贾贲率吏民击杀张通晤，克复睢阳，并乘安将令狐潮离雍丘（今河南杞县）之机，进据雍丘。唐真源令张巡也率吏民起兵讨贼，率众至雍丘会合贾贲共同守城。天宝十五载（756年）二月十六日，令狐潮领精兵进攻雍丘，贾贲出战败死。张巡遂领贾贲之众，担负了保卫雍丘的重任。

三月二日，安将令狐潮、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率军 4 万，争夺雍丘。张巡亲率千余人，分数队开城门突出，直冲敌阵，安军刚到立足未稳，遂退去。第二天，安军再次攻城，张巡采取束蒿灌脂，焚而投下等战法反击，使敌兵无法攀城。又伺机出兵猛击，或利用夜间偷袭敌营，前后 60 余日，大小 300 余战，终于击退安军，并乘势追击，歼灭敌兵 2000 余人。五月中旬，令狐潮再次引兵来攻，双方相持 40 余日，安军始终不能得手。七月，令狐潮闻知玄宗已逃往西蜀，以书信招降张巡，当时张巡部下六员大将也劝他降敌，被张巡当众责以大义而斩之。城中箭尽，张巡束蒿草为人千余，穿以黑衣，夜晚缒于城下，安军以为偷袭者，发箭争射，张巡因此得箭数十万。以后于晚再缒人下城，安军以为

仍是藁草人，不以为备，张巡乃以勇士500人突袭敌营，安军大乱，追奔10余里。令狐潮数败，引兵退还陈留，派兵7000人屯白沙涡（今河南宁陵北），以断雍丘后方补给之线。张巡引兵夜袭，大破其众。

八月，安禄山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亲率大军2万进攻雍丘，距城东30里安营，以断张巡之后。张巡率精兵3000出击，大破安军，斩杀大半。李庭望收军连夜逃去。十月、十二月，张巡又两次大破令狐潮军，使其不敢轻易围攻雍丘，只好在雍丘之北筑城，以逼张巡。又遣兵攻陷东平（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济阴，派杨朝宗率军2万攻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以断张巡之后。在这种情况下，雍丘已不可守，张巡只好放弃雍丘，转守宁陵，以便与睢阳太守许远相呼应。杨朝宗之军到达宁陵后，张巡和许远联兵击敌，经过一昼夜激烈厮杀，大破安军，斩首万余级，流尸塞汴水而下。张巡以功被唐廷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

南阳之战 安军攻占洛阳之后，唐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率岭南、黔中、襄阳等地军队5万人，屯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之北，守于滍水（今沙河）之南，以防备安军南下江淮。天宝十五载（756年）四月，安将武令珣、毕思琛等率军进攻，从滍水上流渡河，侧击鲁炅之军，乘风纵火，飞箭如雨，唐军败退，全线崩溃。五月四日，鲁炅收拾残部，退保南阳，安军追到，围而攻之。鲁炅固守不出，安军屡攻不下。潼关失守后，唐军统帅哥舒翰被俘，遂降于安禄山，并遵安禄山之命，写信招鲁炅投降（鲁炅原为哥舒翰部将），被鲁炅拒绝。安禄山遂命田承嗣率军会合武令珣军，猛烈攻城，唐军两次来援，皆被安军击败。

至德二载（757年）二月，南阳城中食尽，一鼠值钱400文，饿死者不计其数。唐肃宗遣宦官曹日升突围入城宣慰守城军民，人心振奋。曹日升又赴襄阳（治今湖北襄樊）筹粮并设法运入城中，使鲁炅又坚守了3个月。五月十五日，南阳城中再次断粮，周围数百里由于战火摧残，村邑萧条，已无烟火。鲁炅只好乘夜黑之时，率残兵数千，突围而出，直奔襄阳。田承嗣派军追击，被鲁

灵击退，斩获甚多。鲁炅防守南阳前后一年之久，使江汉地区得以保全，使唐廷所依赖的江淮财赋运输畅通无阻，与张巡守雍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五、灵宝之战与西京长安的陷落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以前，军事态势对唐朝来说极为有利。张巡、鲁炅守住了雍丘、南阳，使安军南下江淮的企图不能实现。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破史思明军，诸郡多杀逐安军将吏而归顺朝廷，安军归路被切断。安禄山军困守于洛阳附近数郡，军心已经开始动摇。只要哥舒翰固守潼关不出，则安军无计可施。稍待时日，其范阳老巢必生变故（见前述刘客奴之事），那时安军必然人心涣散，呈崩溃之势，唐军乘势四面围攻，安禄山之叛则可早日平定。史载：郭、李在河北大胜史思明后，“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又载：“禄山大惧，召高尚、严庄诟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① 高尚、严庄为安禄山谋主。安禄山已经开始商议如何逃回范阳之事。尽管如此，但安禄山军主力尚存，战斗力仍很强，而唐军多为新募之兵，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因此必须精心筹划，精心组织，逐步削弱和瓦解安军实力，而后战而胜之。但由于唐玄宗急于求成，因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一再督促哥舒翰出关求战，希望一鼓荡平叛乱，结果反被安军击败，致使潼关失守、长安被占，安史叛乱一发不可收拾，唐军也由主动态势而变为被动。

（一）灵宝之战与潼关失守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唐玄宗过高地估计唐军实力，在兵力尚未集中，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催促哥舒翰发起攻击。在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五月。

这之前有人报告说，安军将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 4000 人，且羸弱无备。于是宰相杨国忠奏请玄宗，命哥舒翰进兵，以收复陕、洛。哥舒翰认为，安禄山习于用兵，不会无备，表面上兵力薄弱，实则采取的是诱兵之计，如果出击，正中其计。主张唐军应在潼关据险坚守，待其兵力削弱，内部发生变乱，再行反攻。郭子仪、李光弼也上奏说："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① 可是，唐玄宗求胜心切，听不进正确意见，他轻信杨国忠"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的话②，派中使（宦官）再三催促，要哥舒翰率兵反攻。哥舒翰不得已，只好于六月四日领兵出关。

六月七日，唐军前锋进至灵宝（今属河南）西南之西原（距灵宝约 50 里），与安军崔乾祐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约 70 里的狭长隘路。安军精锐事先埋伏在险隘的侧后方，故意以万人的兵力在正面散乱布阵，或疏或密，或前或后，以诱唐军进入隘路聚而歼之。八日，哥舒翰浮舟黄河中流，以观军势，见敌军少，乃督诸军向前会战。唐军以王思礼率精兵 5 万为前锋，庞忠率兵 10 万继进，哥舒翰领兵 3 万在黄河北岸高地击鼓助攻。两军接战，安军呈卷旗欲逃之状，唐军追之，被诱入隘道。安军伏兵突出，以檑木滚石投下，击伤唐军甚众。唐军人多道隘，难以展开，互相拥挤，混乱不堪。哥舒翰命用毡车向前冲击，想打开一条通道，安军以草车数十堵塞，纵火焚烧，时过中午，东风正急，烟焰弥漫，唐军看不清目标，以为敌军用烟雾作掩护进攻，便乱放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烟中并无敌兵。这时，崔乾祐以同罗精骑从南面迂回到唐军侧后冲击，唐军首尾不能相顾，自相践踏，溃散乱走，有的弃甲窜逃山谷，有的自相拥挤入河溺死。安军乘势追击，唐军后续部队见前锋大败，纷纷溃逃，黄河北岸唐军见势不利，也溃散逃走。潼关外为防御敌军，原先掘有三道堑壕，深丈余，宽 2 丈。从灵宝败回的唐军，人马坠入其中，不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一会堑壕被填满，余众踏之而过，得入关者才8000余人。九日，崔乾祐攻入潼关。哥舒翰被部将挟持到洛阳投降了安禄山。

（二）西京长安陷落与马嵬之变

潼关失守后，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西）、华阴（今属陕西）、冯翊（治今陕西大荔）、上洛（治今陕西商州）等郡防御使，皆弃郡逃走。长安也陷入一片混乱，当晚，报送平安的烽火不燃，玄宗惊惧。十日，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宰相杨国忠首先提出放弃长安，建议玄宗逃往四川，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长安“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①。十三日，玄宗带领杨贵妃、太子李亨、宰相杨国忠等官员，由数千禁军护驾，仓皇逃离长安，其他妃嫔、公主、皇孙及百官，皆抛弃不顾，向四川方向逃跑。不久，安禄山部将孙孝哲率兵占据长安。安军占据长安后，未乘胜追击玄宗，纵兵在城内大掠三日，又在附近郡县大肆搜刮勒索。叛军的暴行，激起关中民众的强烈反抗，不断袭杀其官吏，安军虽几次镇压，但反抗却更加激烈。安军虽占据长安，但其势力所及方圆不过百里，其他广大地区仍在唐朝控制之下。

六月十四日，玄宗逃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20里），将士饥疲，怨声四起。禁军将领陈玄礼与大宦官高力士合谋，利用军士对杨国忠的不满情绪，杀杨国忠及韩国、秦国夫人。虢国夫人与其子逃至陈仓县（今陕西宝鸡），被当地官员所杀。禁军军士又围住马嵬驿不散，要求玄宗将杨贵妃“割恩正法”，玄宗不得已，乃命高力士引杨贵妃于佛堂缢杀。次日，玄宗将从马嵬出发，禁军将士因为杨国忠曾兼任剑南节度使，其心腹将吏皆在四川，不愿前往。玄宗只好答应暂到扶风郡（今陕西凤翔）后，“徐图去就”。众人这才整队前行。十七日，到达扶风后，士卒中多有对玄宗不逊之言，局势很难控制。正好四川进贡春綵10余万匹到扶风，玄宗将这些东西分赐军士后，才使人心稳定，得以使禁军护送他到达成都（今属四川）。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当玄宗从马嵬出发之时，当地父老遮道请玄宗留太子共击敌军，迫使玄宗同意留下太子李亨。不久，李亨退至平凉（今属甘肃），再退至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七月十二日，在西北诸将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从此，就以灵武为中心，在肃宗的领导下，开始对安史叛军的讨伐战争。

灵宝之战是唐军由主动变为被动的一个转折点。由于此战的失败及潼关的失守，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其他战场唐军的失利。在河北战场，迫使郭、李退出河北，原因是：一则史思明在博陵（治今河北定州）固守，一时难以攻下，安禄山攻下潼关后势必全力增援。如果郭、李不退出河北，将陷于腹背受敌之地。二则安军如北渡黄河直取太原，唐军归路将被切断，还会威胁到朔方的安全。郭、李退军太原，不仅可以保有山西，拱卫朔方，一旦时机成熟，还可以再度东出井陉，进攻河北，威胁范阳。所以郭、李在潼关失守后的决策是正确可行的，并非仅为自保。但河北诸郡因此得而复失，安军后方得以巩固。此前由于潼关驻有唐朝近20万大军的牵制，尽管河北史思明连吃败仗，安禄山也不敢大量抽调部队增援，南阳、雍丘唐军也得以固守。哥舒翰大军失败后，安军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大量抽调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唐军的士气则因此战的失败而大受影响，各战场之间也因此难于相互呼应与支援，唐军遂陷于全面被动的局面。

灵宝战败、潼关失守的主要原因是：唐玄宗在反攻时机不成熟时勉强进行反攻决战。他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故有此败。这已是不易之论。此外，唐军指挥系统混乱、人心涣散、士无斗志，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哥舒翰患有严重的风疾病，玄宗强迫他扶病出征，他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多委以行军司马田良丘代理，田良丘又不敢专断，致使军令不一，部伍不整。其大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执不和，难以配合。加之其对敌情判断有误，中敌诱兵之计，使军队在不利的地形上与敌决战。在前军失败后，后军如能组织有效抵抗，潼关也许还可固守。事实却截然相反，其前军一败，后

军随之崩溃，黄河北岸的数万军队未与敌军直接接触，也溃乱逃亡。指挥不力，军心涣散，是这一历史悲剧最终被搬上舞台的直接动因。

第三节　肃宗灵武整军与组织战略反攻

唐玄宗避居西蜀，远离前线，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对唐朝军事的领导权，也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唐肃宗在西北灵武即位，领导广大军民平叛，是顺应民心之举，对鼓舞军民士气、统一组织对安军的战略反攻，起了核心性领导作用。但由于肃宗对内不能革除积弊，致使内宠（张良娣）用事，宦官（李辅国、鱼朝恩）弄权；对外不能听取正确意见，不从整个战略大局出发，不以疲惫和歼灭安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急于收复两京（长安、洛阳），使安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九节度围邺之战失败后，东都洛阳得而复失，战争呈胶着之状，从而延长了平叛时间。

一、灵武整军与反攻准备

李亨与玄宗分手时，玄宗曾分后军2000人给他，退到平凉（今属甘肃）后，又得牧监马数万匹，并募兵500人，军势稍振。李亨到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当时文武官员不满30人，披草莱，立朝廷，制度草创，急需人才和军队。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兵5000人，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兵7000人，均先后至灵武。郭子仪也率精兵5万来灵武与肃宗会合。肃宗以此为基础，逐步集中西北边兵，充实军力，准备反攻。灵武地处黄河河套地区，为朔方节度使的驻所，是一个既便于控制西北各镇兵力，又便于南下关中，东击安军后方的战略要地。肃宗在马嵬北上时，已遣使召李泌于颍（今河南登封西南颍阳镇）。李泌兼程赶赴灵武，从而担起扶危定倾的重任。李泌为北魏八柱国之一李弼的后代，幼年居长安，以才敏而著称。肃宗为太子时，玄宗欲授予官，不受，使

与太子为布衣交，后因得罪杨国忠，被斥置于蕲春郡（治今湖北蕲春蕲州镇西北）。肃宗对李泌的到来非常高兴，事无大小皆向其咨询，所谓“入议国事，出陪舆辇”①，直接参予制定平定安史叛乱的战略计划。

不久，肃宗重新调整了朝廷机构和官员，任命郭子仪为武部（兵部的改称）尚书、灵州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即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以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负责征收和运输江淮租赋，以保证讨伐安军之需（运输路线是自襄阳经今陕西白河县抵扶风，由扶风太守薛景仙掌管经营）。组织元帅府，以广平王李俶（肃宗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为肃宗谋划大计，规劝肃宗不要希望速胜，他说：“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②李泌的这个计划是在正确地分析了双方实力情况后提出的，其中包括三个战略步骤，即先以郭、李两军牵制安军四将，击其首尾，使敌军长途奔波，消耗其兵力；然后命建宁王率军经塞外攻范阳之北，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攻范阳之南，夺其巢穴；最后以大军四面攻击，合围两京，彻底扫平叛军。按这个计划执行，唐军可以以逸待劳，一步一步地夺取胜利。当时肃宗也赞成这个计划，于是，命李光弼屯兵太原，准备东出井陉，攻常山，图范阳；命郭子仪领兵攻冯翊、河东等郡。郭子仪领兵从洛交（治今陕西富县）东渡黄河，攻克河东郡，威胁安禄山占据的洛阳、长安地区；

---

①② 《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又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指挥江淮方面的作战。此时，唐军在河北、河东、河南等地不断袭击安军侧翼和后方，牵制了安军相当多的兵力，为日后唐军的大举反攻创造了条件。

二、太原、睢阳保卫战

（一）太原保卫战

潼关失陷后，郭子仪与李光弼为了保守河东道（治所太原，辖境相当于今山西长城以南，中阳、沁源、榆社、左权以北地区），主动从河北撤退，郭子仪率军5万赴灵武，李光弼留守太原。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军史思明部在再度夺取常山、平原等河北诸郡，打通后方交通线后，以4路兵马合围太原，即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党（治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共计10万大军，企图一举攻下太原，夺取河东，进而取朔方、河西、陇右。当时李光弼的主力部队都抽调到灵武，太原所剩仅“团练”（地方武装）之众，不满万人。太原诸将皆惧，建议加固城垣，以利防守。李光弼认为，太原城周长40里，安军很快就到，加固已来不及。于是，率士卒及民众，在城外挖壕以自固，构筑坚固堡垒，并将挖出的土运入城内，做成土坯数十万块，用以随时修补毁坏的城垒。

安军围城月余，攻打不下，从外地运来攻城器具，被李光弼派人于半途截击，尽杀护送器具安军3000人，烧其攻具。史思明又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妄图乘隙袭取太原，由于李光弼军令严整，警逻未尝稍懈，使安军阴谋未能得逞。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军，李光弼派人挖地道到城外，甚至挖到敌人营中，经常袭扰攻击敌人。敌军用梯冲以堆土山攻城，刚一接近城池，就被埋伏在地道口的唐军杀捕，“自是贼行皆视地”①。李光弼还制作大砲（抛石机），发射巨石攻击敌军，一发辄毙敌数十人，死于城下的敌军士卒甚众，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二载正月。

安军被迫后退，不敢近城集结。由于众寡悬殊，安军的围困仍很严密。为了打破围困，李光弼派人诈降，与安军约期出城“投降”，暗地派人挖地道于安军营地周围，地道上面土层很薄，以木材支撑为陷坑。到了约期，李光弼派兵数千出城，伪装投降，吸引其注意力。在安军调动出营时，纷纷陷入坑中，死者千余，并乘胜发动猛烈攻击，俘斩安军万余人。

太原之战正当紧张之时，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自立为帝。遣使令史思明等部回守范阳，以固根本。仅留蔡希德等继续围攻太原。李光弼侦知安军人心不稳，于当年二月，率敢死之士出击，大败蔡希德军。安军败退途中，各县人民痛恨其残暴，处处截杀，使安军损失惨重，狼狈逃走。太原之战唐军共歼敌 7 万余人，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二）睢阳保卫战

睢阳保卫战几乎是与太原之战同时展开的。安庆绪为了向江淮发展，夺取唐朝财赋供应地，乃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率兵攻打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至德二载（757 年）正月二十五日，尹子奇率妫（治今河北怀来东南）、檀（治今北京密云东北）二州及同罗、奚等兵 13 万进攻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率军 3000 余自宁陵入睢阳，与许远的 6800 名军队会合，在全城人民的支持下，与安军展开激战。双方激战 16 天，有时一天击退安军 20 余次冲锋，共俘获安军将领 60 余人，歼敌 2 万余。张巡与许远又作了分工，许远负责调军粮、修战具等后勤保障工作；张巡全面负责军事指挥。尹子奇由于屡次攻城不下，只好退去。

三月中旬，尹子奇再次引大军围攻睢阳。张巡激励将士，以全军出战，安军见唐军兵少，遂不以为意，张巡亲率将士直冲敌阵，安军准备不足，大溃。唐军追逐数十里，斩杀千余人。此后，双方昼夜激战，最激烈时一昼夜要接战数十次。四月，尹子奇仍不能得手。张巡为了疲惫敌人，经常于夜晚鸣鼓整队，作出要出击的样子，使安军通宵不敢休息。天明后，又息鼓寝兵，安军以飞楼瞰视城中，见无动静，于是解甲休息。张巡与勇将南霁云、雷

万春十余人，各率50骑兵，开城突出，直冲敌营，营中大乱，斩敌将50余人，杀士卒5000。又射伤尹子奇的左眼，几乎活捉了他。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尹子奇再次败退。

七月六日，尹子奇又一次领兵数万围攻睢阳。在这之前，虢王李巨把许远原先积存6万石粮食的一半分给了濮阳（今属河南）、济阴（今山东定陶西）二郡，致使睢阳城中发生粮荒，士卒每日粮食减至一合（10合为1升），只好掺以茶、纸、树皮等为食，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由于外无救援，兵力得不到补充，使守城兵力减至1600余人，但张巡等仍坚持战斗。安军在城下堆积柴草作成蹬道，想借此登城，张巡派人于夜间投以松明干蒿等易燃物。十余日后，张巡率军出城大战，并使人放火烧其蹬道，火经20余日方灭。为打退敌人的进攻，张巡采取了随机应变的战术，或烧其云梯，或毁其钩车，或铩其木驴，使安军不敢轻易攻城。叛军无计可施，遂于城外挖三重壕堑，立木栅以围困睢阳。张巡也在城内掘壕以为防备。由于城中粮尽，士卒已锐减到600人。张巡派南霁云率骑兵30人，突出重围，向驻守临淮（治今江苏洪泽西）的贺兰进明求救。贺兰进明不但不救，还想把南霁云留为己用。南霁云只好到宁陵求得步骑3000余人，于闰八月十五日，返回睢阳，在城外经过大战，死伤之外，仅得千余人入城。

尹子奇知道城中粮尽援绝，加紧攻城。十月，城中树皮、马匹、鼠雀也被吃光，甚至人相食。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议论弃城突围而走，但张巡、许远认为睢阳为江淮之保障，如弃而不守，江淮必危，而且城中之众，皆疲弱不堪，也难以走脱，故决心坚守待援。十月九日，安军破城，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36将被杀，许远被俘。睢阳之战，达10个月之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贼卒十二万人”①。加上此前的雍丘之战，共计21个月之久，使得唐朝财赋供应基地江淮地区得以保全，并为唐军组织反攻赢得了时间。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肃宗至德二载十月。

在此之前，唐宰相兼河南节度使张镐闻知睢阳危急，昼夜兼程，并命浙东、浙西、淮南等道节度使以及谯郡（治今安徽亳州）太守闾丘晓等共同出兵救援。闾丘晓距离最近，竟不遵命出兵，等张镐赶到睢阳时，城破已3日了。张镐一怒之下，召闾丘晓至，将其毙于杖下。

三、收复两京的决策及作战

（一）战略反攻决策的议定

至德元载（756年）十月，肃宗在尚未完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同意宰相房琯的请求，任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率兵5万向长安进攻。结果在咸阳东两次战败，损失4万余人。大大地挫伤了唐军士气。十二月，镇守江陵（今属湖北荆沙）的永王李璘，率军数万，顺江而下，准备占据金陵，割据江表，次年二月，兵败于江宁（治今江苏南京）附近。这一时期，肃宗宠妃张良娣与宦官李辅国狼狈为奸，陷害建宁王李倓，说李倓想当元帅，要谋害广平王李俶。肃宗大怒，赐李倓死。唐廷内部的腐败与混乱，大大地影响了反攻大计。

直到至德二载（757年）二月十日，肃宗才在李泌的建议下进驻凤翔，部署反攻之事。十一月，命郭子仪出兵收复河东，并分兵攻取冯翊。不久，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军队已陆续会齐，从江淮征收的物资也运到汉中（今属陕西）。李泌认为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再次建议肃宗按照他原来提出的计划先取范阳，遭到肃宗拒绝。肃宗认为应先攻取长安、洛阳，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① 李泌指出：“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只有攻取范阳，“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②。但肃宗急于返回京师，

---

① 《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二载二月。

听不进李泌的意见，仍决定攻取两京。

二月中旬，唐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率军驻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驻于武功东原，大将王难得率军驻于西原。安军安守忠部先发动攻势，王思礼大败，退军凤翔，安军游骑至凤翔东50里的太和关，凤翔震动。下旬，郭子仪遣其子郭旰及李韶光、王祚等渡黄河攻下潼关。安军反击，唐军大败，死者万余人。四月，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担负收复两京的作战任务。郭子仪重新调整部署，命其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等，设伏于三原北以防侧翼，郭子仪与王思礼率军进屯沣水（今沣河，在陕西长安境内）。安军安守忠、李归仁等部屯清渠（今陕西西安三桥镇附近）防御。五月六日，安军伪遁，唐军追之，遭到安军骑兵夹击，唐军溃散，退至武功，反攻初战失利。

（二）沣水之战与收复长安

早在至德元载（756年）九月，肃宗为反攻计，欲借回纥兵以扩充实力，遂以李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为使向回纥借兵。李承寀与回纥可汗相约，攻下两京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回纥借予精锐骑兵4000助战。至德二载九月十三日，元帅李俶、副元帅郭子仪率兵15万，号称20万，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进至长安西，列阵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南）北，沣水以东地区，安军出动10万相对抗。唐军以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率中军，王思礼率后军。交战后，唐军积极进攻，挫败安军前锋，迫近安军主力。安军集中兵力反击，唐前军退却，阵形混乱，辎重丧失不少。安军争抢辎重，唐前军李嗣业乘机整顿阵形，"阵乃稍定，于是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摧靡"①。安军在阵东埋伏精锐骑兵，企图袭击唐军侧后，被唐军发现。郭子仪派仆固怀恩率回纥4000骑兵，将其全部歼灭。接着回纥兵又迂回到安军阵后，与唐军主力夹击安军。安军大败，被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肃宗至德二载九月。

"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①，残军退入长安城中。

当夜，仆固怀恩估计安军将弃城逃走，建议广平王李俶派精骑追击。李俶以激战终日，军队疲惫为由，没有采纳。怀恩说："归仁、守忠，贼之骁将，骤胜而败，此天赐我也，奈何纵之！使复得众，还为我患，悔之无及。战尚神速，何明旦也。"②往返四五起，李俶始终不同意。天明，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和田乾真果然弃城向东逃去。唐军遂入长安。入城后，回纥叶护请如前约，元帅李俶拜于叶护马前说："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③请求攻下洛阳后再如约，叶护同意。于是，郭子仪引蕃汉军向潼关追击。

（三）陕州之战与收复洛阳

唐军进入长安休整 3 日，其主力直趋潼关，以一部进击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迂回合击洛阳。郭子仪率军追至潼关，击败安军，歼灭 5000 余人，并连下华阴（今属陕西）、弘农（治今河南灵宝）2 郡。唐军王难得部攻下武关，又克上洛郡。安军张通儒等部退守陕郡。安庆绪为阻唐军东进，发洛阳主力大部，由严庄率领，增援陕州，合兵后共计步骑 15 万。

十月十五日，郭子仪军与安军相遇于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安军依山列阵，声势甚壮。郭子仪部初战失利，被逐下山。回纥兵自南山（新店之南）由安军阵之一侧，袭击其背，安军溃乱。郭子仪军乘势猛冲，与回纥兵合力夹攻，安军大败，僵尸遍野，严庄、张通儒等弃陕郡而逃。唐军乘胜收复陕郡，令仆固怀恩等分路追击。

严庄逃回洛阳后，向安庆绪报告战败消息，强调回纥强悍，快马如风，难以抵挡。安庆绪知大势已不可为，于十六日夜带领少量部队弃洛阳，逃往邺城（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李俶与郭子仪入洛阳，见回纥已纵兵大掠，遂以绢罗万匹向回纥进行赎买，始止其扰掠。二十一日，郭子仪派张用济、浑释

---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肃宗至德二载九月。

之，统军攻取河阳（今河南孟州东南）、河内（治今河南沁阳），迫使严庄投降。陈留军民杀死安将尹子奇，举郡来归。在收复洛阳的胜利形势下，围攻颍川（今河南淮阳）的安将田承嗣等率军北逃。安军大将李归仁、阿史那承庆等及曳落河、同罗兵数万人，皆溃散逃走，有的降唐，有的归安庆绪，有的投奔范阳史思明。十一月，唐河南节度使张镐率鲁炅、来瑱、李嗣业、李奂、吴王李祗等，在河南、河东分兵略地，迅速收复两地诸郡县，唐军节节胜利，安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不久，安军大将史思明、能元皓、高秀岩皆归降唐朝。在这种形势下，唐军如能乘势迅速进兵，不难迅速消灭安庆绪，但肃宗和元帅李俶在收复洛阳后，忙于大封功臣，整修宫殿，没有及时组织战略追击，给安庆绪以喘息之机，使之得以重整旗鼓，收拾残部，东山再起。

四、唐军围邺之战的失败

安庆绪从洛阳逃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后，步骑不过千余人。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率军自上党（治今山西长治）来，田承嗣率众自颍川来，武令珣率军自南阳来，安庆绪又招募河北诸地团练兵，遂有军士 6 万人，兵势复振。

史思明降唐后，唐肃宗封他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乾元元年（758 年）元月，李光弼认为，史思明必定不可靠，迟早要叛乱，劝肃宗以史思明的亲信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命其联络其他将领，密谋除掉史思明。史思明发觉后，抢先杀了乌承恩，再次举兵反唐。这样在河北就形成了安庆绪和史思明两个反唐集团。

七月，唐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嫁于回纥可汗，以酬其助兵攻取两京之劳，并再次要求回纥出兵帮助唐朝讨伐安庆绪。八月，回纥遣精锐骑兵 3000 至，肃宗命仆固怀恩率领，向安庆绪进攻。九月，肃宗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后赐名李忠臣），率步骑数

十万讨安庆绪；又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所部军助攻。肃宗认为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元勋，难以互相统属，故在攻邺部队中不设统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全军。

十月，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卫辉东南的黄河南岸）渡黄河，进至获嘉（今属河南），击破安军安太清部，斩4000人，俘500人。安太清逃至卫州（治今河南卫辉），郭子仪率部包围卫州。接着，鲁炅自阳武（今河南原阳）渡河北上，季广琛、崔光远自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北）渡黄河，李嗣业随后继进，与郭子仪部会合。当时，安庆绪在邺自认为犹有7郡60余城，兵精粮足，唐军疲惫，无力北攻，故不亲政事，专以声色自娱。其大臣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勇将蔡希德在内争中被杀，部下数十将皆逃散。安庆绪实已外强中干，灭亡有日了。唐军围卫州后，安庆绪即率军7万，急救卫州。郭子仪以弓箭手3000人埋伏于垒垣之内，自引军进击安军。先伪退，待安军追到垒下，伏兵起而射之，安军退走，郭子仪乘势率军猛追，大败安庆绪军，擒杀其弟安庆和，唐军遂克卫州。郭子仪等乘胜追至邺城，包围安庆绪于城内。唐军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等皆率军赶到。安庆绪于邺城西的愁思岗收兵再战，又败，唐军前后斩杀安军3万余人，俘获千余人。安庆绪无力再战，只好据城固守。李光弼部此时也赶到邺城，唐朝九节度使之军全部到齐，把邺城团团围住。

在危急中安庆绪派薛嵩往范阳，以让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本欲发范阳兵13万南下救邺，但因唐军势大，观望未敢进，只派其将李归仁率兵万余人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安庆绪助声势。此时，唐军崔光远部攻克魏州。十一月，史思明兵分3路，向魏州进攻。十二月底，史军攻陷魏州，崔光远败退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史思明攻下魏州后，按兵不动。李光弼认为史军不动，是企图乘唐军懈怠时进行袭击，建议分兵直逼魏州，迫使史思明出战，史军必不敢轻出，时间一久，邺城必然疲困而为唐军所攻克。邺城攻下后，史思明将陷入孤立，易被唐军歼灭。这个计划

遭到宦官鱼朝恩的反对，未能实施。

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唐军仍未能攻下邺城，李嗣业不胜其忿，亲自引本部兵攻城，为流矢所中而死。兵马使荔非元礼代领其军。二月，围邺唐军“筑垒再重，穿堑三重，壅漳水灌之”①。邺城中河水四溢，粮尽兵疲，唐军皆以为朝夕可下邺城。由于唐军未设统帅，缺乏统一指挥，进退无序，围城日久，师老兵疲，上下离心。史思明看出唐军弱点，认为进兵时机成熟，遂亲率主力自魏州援邺。他命诸将离城50里各自扎营，每营选骑兵500人，以击鼓为号，遥相呼应，昼夜轮番抄掠。唐军出击则退，唐军退则进，使唐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樵采甚艰”。唐军所需物资，全靠车船从江淮和山西等地调运。史思明又派部队伪装唐军，抢掠焚烧唐军车船，杀戮运送物资人员，致使唐军粮草匮乏，“人思自溃”②。史思明乘机率军直抵邺城，准备和唐军决战。

三月六日，史思明亲率精兵5万前往交战，唐军号称步骑60余万，布阵于邺城北面的安阳河北。唐军望见史军，误以为是游骑，漫不在意，等到史军发起猛攻时，唐军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节度使才匆忙率军迎战。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死伤各半，鲁炅中流矢受伤。郭子仪军继后，未及列阵，忽然狂风大作，吹沙拔树，天昏地暗，对面咫尺不能相认，唐、史两军皆大惊。唐军向南撤退，史军向北溃退，双方各丢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退至洛阳，“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③。于是，派军扼守河阳（今河南孟州东南）桥，以保东都。诸节度使各自溃归本镇，溃兵所过，剽掠不止，唯李光弼、王思礼全军而还。

史思明击败唐军后，诱杀安庆绪，收编其军队，占据邺城。派兵攻取怀州（治今河南沁阳）。本欲向西扩展，虑其后方范阳尚不稳固，乃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史思明率军返回范阳，自称大燕皇帝。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肃宗乾元二年二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肃宗乾元二年三月。

五、河阳、邙山之战与洛阳的再陷

乾元二年（759 年）七月，唐肃宗以邺城之师溃败，郭子仪先退，遂将郭子仪从洛阳召回，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率河东骑兵 500 人，驰往洛阳，整顿部队，巡视沿河诸营，准备迎击史思明。肃宗又以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代李光弼守太原。在此之前，以河西节度使来瑱充陕、虢（治今河南灵宝）、华州节度使，屯驻陕州，为防御史思明的第二梯队。

九月，史思明率军分四路南下，以其子史朝清守范阳。四路兵马是：令狐潮率兵 5000 自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渡黄河直取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史思明自率大军自濮阳（今属河南）南下；史朝义自白皋（今河南滑县西北）渡河南进；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东北黄河渡口）渡黄河，会合于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唐汴滑节度使许叔冀镇守汴州，李光弼与其相约，15 日内必来相救。史军来攻，许叔冀与之战，不胜，遂与其将濮州刺史董秦、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投降史思明。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今属河南）。李光弼知汴州失守，与诸将商议守战之策。东都留守韦陟认为史军势大，应退守陕州、潼关，据险以挫敌锋。判官韦损主张坚守洛阳。李光弼分析说：如守洛阳，则汜水（今属河南荥阳）、崿岭（今河南登封西北）、龙门（即河南洛阳南伊阙）等地皆要设防，兵力寡少，势难分散。目前“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①。于是，李光弼下令撤退，放弃洛阳，北守河阳。至河阳时，李光弼有兵 2 万，粮仅够 10 日之用。

史思明进入洛阳，城空无所得，又怕李光弼的部队抄袭其后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肃宗乾元二年九月。

路，不敢住于城内宫中，便退屯于白马寺（今河南洛阳东）南，筑月城于河阳南，与唐军隔河相峙。十月，史军渡河进攻河阳，派骁将刘龙仙至城下挑战，被唐将白孝德所斩。史军又派战舰数百艘，以火船为前导，战舰继后，欲乘流烧毁河阳浮桥。唐军用长杆、铁叉以拒火船，使其不能前进而自燃尽，并在桥上发石击毁史军战舰，残余战舰退去。史思明派兵到河清（河阳之西，黄河北岸），欲断唐军粮道。李光弼派兵至野水渡（河清东）防御，设计诱降了史军勇将李日越、高庭晖。其后，史思明率主力再攻河阳，李光弼派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南城，自引兵屯中潬城（在河中渚上筑城，以保护河阳桥）策应，击败史军周挚部的进攻后，进入河阳北城。周挚又移军渡河攻北城。李光弼命骁将郝廷玉率精骑攻史军阵地西北隅，命论惟贞率军攻敌阵东南隅，督诸将齐进死战，歼灭史军2500人，活捉大将2人，周挚仅率数骑逃走。史思明闻知北城战败，于是率兵从南城退兵。十二月，史思明派李归仁率军进攻陕州，被唐军击败。

上元元年（760年）二月，李光弼留兵守河阳，亲率大军进攻怀州。在沁水之上击败史思明援兵，斩首3000余人。三月，击破史军安太清部于怀州城下。尔后留兵一部围攻怀州，自回河阳以防史思明偷袭。史思明果然率兵来袭，李光弼乘史军在河阳西渡河过半之机，发动攻击，歼灭5000余人，史军退回洛阳。经百余日，怀州因无外援，被唐军攻破，并活捉守将安太清。

上元元年（760年）九月，肃宗命郭子仪率兵7万，自朔方直取范阳。令下十日，为宦官鱼朝恩所阻，未能实现。

史思明欲使李光弼渡黄河到洛阳，与其优势的兵力决战，百般诱之，然李光弼不为所动。上元二年二月，肃宗根据鱼朝恩和仆固怀恩的建议，命李光弼反攻洛阳。李光弼认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①。然肃宗派来催战的中使相继于途，不得已李光弼只好出战。他命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与仆固怀恩会同神策军节度使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二月。

卫伯玉攻洛阳。二十三日，唐军与史思明军前锋相逢于洛阳西北的邙山，李光弼命仆固怀恩依托邙山据险布阵，但仆固怀恩通过鱼朝恩阻止依山布阵，要于平原列阵，争论半日不能决断。史军乘唐军列阵未定，出兵冲击，唐军大败，死伤数千人，军资器械损失殆尽。李光弼、仆固怀恩退保闻喜（今属山西），卫伯玉退保陕州，李抱玉弃河阳奔泽州，于是河阳、怀州相继失守。

三月，史思明企图乘胜西攻潼关，令其子史朝义为前锋自崤山北道进攻陕州，自率大军从南道继进。史朝义军进至礓子岭（在今河南陕县东南），被卫伯玉击败。此后数次进攻，皆被击败。史思明欲以军法斩史朝义，立史朝清（史思明少子）为太子。史朝义与部下诸将密谋，先下手擒杀史思明，自立为帝。然后密令在范阳的张通儒杀史思明之少子史朝清等数十人。范阳城中互相攻杀，混战数月，死者数千人。史朝义自立为帝后，遂罢西攻潼关的军事行动，继续向南进攻，企图夺取或破坏唐朝的江淮财赋供给地。但史思明所部节度使皆为安禄山旧将，多数不服史朝义调遣。至此，这个军事集团四分五裂，无力组织大规模攻势。唐军也因反攻受挫转入守势，积蓄力量，准备展开战略攻势。

唐军组织反攻，取得了连克两京的胜利，本应乘胜追击，彻底歼灭安军。但由于其缺乏远见，未予追歼，使得安庆绪得以收集残兵，组织力量，固守邺城。这是唐廷战略指导上的一大失误。一年后，唐朝调集九节度数十万大军围攻邺城，军力数倍于安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却不设统帅，大军缺乏统一指挥与协调，不能展开有组织的攻势。委前线指挥重任于一个不懂军事且又专横跋扈的宦官鱼朝恩，置数十万大军于坚城之下，师老兵疲，授敌以可乘之机。史思明降唐后，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先消灭安庆绪集团，再根据具体情况设法铲除史思明集团。由于处置不当，致使史思明又一次起兵反叛，增加了平叛的难度。所以，邺城之败既有军事上的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在李光弼与史思明相峙于河阳之时，战局刚趋稳定，唐肃宗又急于夺回洛阳，并使鱼朝恩监军，鱼朝恩又再次干扰李光弼的军事计划，使唐军再次受挫。如

果没有史军内部变乱，唐朝统治腹心关中又将再一次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唐廷在战略指导上的一再失误，结果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增大了军力、物力的消耗，使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战火的煎熬之中。

第四节　代宗再克洛阳，反攻最后胜利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皇后张良娣因和宦官李辅国有嫌隙，召太子商议诛杀他和另一宦官程元振。太子不从。张皇后又令越王李系（肃宗次子）伏甲兵于长生殿，欲诛杀李辅国等。程元振探知其事，密告李辅国。他们乘夜起兵收捕越王李系和张皇后。第三天，肃宗病死。李辅国杀张皇后与越王，拥立太子李豫（原名李俶）即帝位，是为代宗。李辅国恃功更加骄横，他曾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①引起代宗对他的不满。于是，代宗利用程元振和李辅国的矛盾，罢去了他的禁军兵权，不久，李辅国被人暗杀。唐朝消弭内乱后，就开始重新部署对史朝义用兵。十月，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并再度向回纥借兵。唐军终于攻下洛阳，相继收复河南、河北等地。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兵败自尽而死，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

一、唐军收复洛阳之战

（一）唐朝借助回纥兵

在唐代宗即位之前，唐军乘史军内乱，李光弼、卫伯玉等先后在许州（治今河南许昌）、永宁（今河南洛宁北）、渑池（今属河南）、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等地，向史军屡次发动攻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代宗即位后，史朝义乘唐朝帝位变化，内乱甫定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四月。

之际，遣使向回纥可汗游说："唐荐有丧，国无主，且乱，请回纥入收府库，其富不赀"。① 回纥贪图唐朝财富，即发兵南向。

唐朝还不知道回纥已为史朝义所诱，仍遣宦官刘清潭为使，前往回纥结好，并请回纥出兵助唐讨伐史朝义。宝应元年（762年）九月，刘清潭至回纥可汗牙帐，登里可汗说："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②此时，回纥兵已到朔方三受降城（今内蒙古黄河以北，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北、狼山口南；中受降城位于今包头西；东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南）一线，"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志，乃困辱清潭"③。刘清潭派人向唐廷密报了出使情况。唐廷大惊，又遣殿中监乐子昂前往忻州（今属山西）南迎劳。登里可汗要求仆固怀恩前来相见（仆固怀恩之女为登里可汗妻）。时仆固怀恩在汾州（治今山西汾阳），代宗命其速与登里可汗相见。仆固怀恩劝登里可汗与唐结好，不可负唐家恩惠，可汗遂遣使上表，愿助唐讨史朝义以自效。

登里可汗欲自蒲关（今陕西大荔东的黄河西岸）入，由沙苑（今陕西大荔南）出潼关向东进兵。乐子昂建议说："自寇乱来，州县残虚，供亿无所资，且贼在东京，若入井陉，以取邢、洺、卫、怀，收贼财帑，乃鼓而南，上策也。"可汗不听。又建议南下太行，占据河阳，扼史军咽喉。仍不听。最后提出从陕州大阳津（今山西平陆南黄河渡口）渡黄河，与唐诸道军队共同进兵。可汗从之④。回纥此次入唐，号称有众10万，然据乐子昂考察，有精兵4000人，孺弱者万余人，马4万。尽管如此，由于回纥兵剽悍骁勇，以前屡次重创安史军，使史军心有余悸，所以此次出兵对史军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二）唐军会攻洛阳

十月，唐廷以李适、仆固怀恩为正副元帅，以兼御史中丞乐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

---

①②④《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九月。

进为行军司马，会同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兵集结于陕州，以进讨史朝义。二十三日，以仆固怀恩及回纥兵为前锋出陕州，陕西节度使郭英乂从渑池方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从河阳方向，李光弼从陈留方向，会攻洛阳。二十六日，史朝义闻唐军至，召诸将商议对策。阿史那承庆说："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① 史朝义不从。二十七日，唐军进抵洛阳北郊。二十八日，李抱玉军攻占怀州。三十日，仆固怀恩军列阵于洛阳西面，其余各路唐军列阵于洛阳北郊的横水，史军也在城外立栅进行防守。会战开始后，仆固怀恩派精锐骑兵及回纥兵沿南山迂回史军阵后，从左右两翼夹击，仆固怀恩从正面进击，大破史军。史朝义亲率主力10万出城援救，列阵于城西昭觉寺北，唐军分路猛击，杀伤甚多，然史军阵地不动。鱼朝恩派射生军500人参加正面攻击，力战中杀伤大量史军，但仍不能动摇其阵地。唐镇西节度使马璘突入敌阵，左右冲杀，大军乘势猛攻，史军大败。唐军主力获胜后，又在城北石榴园、老君庙等地，连续大败史军。此战，史军被杀6万，被俘2万，史朝义仅率数百骑向东逃窜。唐军收复了洛阳。又分兵攻取河阳，擒史朝义的中书令许叔冀、王伷等。

二、唐军战略追击，平叛最后胜利

（一）收复河南、河北

收复洛阳后，仆固怀恩留回纥兵于河阳，派其子右厢兵马使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万余人，乘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先至郑州、再退至汴州，皆被唐军击败，唐军连克两州。史朝义逃往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初，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逃至卫州（治今河南卫辉）。仆固怀恩率部攻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攻下后又继续追击，并攻下卫州。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十月。

史朝义的节度使田承嗣等率军4万余人，与史朝义残军会合后，来拒唐军，被仆固玚之军击败，唐军长驱直入攻至昌乐（今河南南乐）东。史朝义率魏州兵来战，又被唐军击败。于是，史军大将薛嵩以相、卫、洺（治今河北永年东南）、邢（治今河北邢台）四州，降于李抱玉；张忠志以赵、恒（治今河北正定）、深（治今河北深州西南）、定（治今河北定州）、易（治今河北易县）五州，降于唐河东节度使辛云京。

史朝义逃至贝州（治今河北清河）后，与其大将薛忠义合兵3万南下迎战，进至临清（今河北临西），仆固玚设伏以击之，史军遭伏击而大败。此时，回纥兵也赶到，会合唐军追击史军，于下博（今河北深州东南）东南大战，史军大败，"积尸拥流而下"①。史朝义逃到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北），与败退到这里的田承嗣部会合，相与共同守御莫州。仆固怀恩派薛兼训、郝庭玉、田神功、辛云京等部包围了莫州，史军屡次出战皆败。

（二）叛军最后覆灭

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唐廷授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加左仆射兼中书令，朔方行营的精兵劲卒都归他指挥，河北方面的军事由他全面负责。仆固怀恩见史朝义所置节度使尚多，各拥有重兵，如果一一讨平，则河北战事势将延长时日，因而想采用纳降授土以分化敌军之计。又鉴于朝廷中宦官专权，皇帝昏庸，文臣受欺，武臣涣散，尤其是立有大功的勋臣如郭子仪等，更受朝廷猜忌。在方今大乱未平之时，尚且如此，一旦天下太平，自己势必失势，于是，产生树朋党以固宠之念。在薛嵩、张忠志等乞降时，遂决心恢复他们所任伪职，以为羽翼。上表朝廷，建议采用纳降分化之计，以广招来者，分解史军阵营，早致太平。

唐廷也想早日结束讨叛战争。在讨伐安史叛乱期间，西北边兵大量东调，使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内侵，连陷数十州，尽取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

唐河西、陇右之地，并威胁长安。在这种情况下，唐廷迫切希望早日了结河北战事，对付日益严重的西北边患。因此，在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确规定："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予封赏。"① 东都收复捷报传来四天，又下制："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② 故唐廷在接到仆固怀恩的建议后即表示同意，并任命薛嵩为卫相节度使，使统相、卫、洺、邢、磁（治今河北磁县）5 州；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 5 州，并赐张忠志姓名为李宝臣。后又以降将田承嗣为魏、博（治今山东聊城东北）、德（治今山东陵县）、沧（治今河北沧州东南）、瀛（治今河北河间）5 州都防御使；以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但是，唐廷鉴于安史教训，也采取了"分而帅之"的办法，大大缩小了各镇的势力地盘，较之当年安禄山独擅三镇和史思明乾元中投降时授以整个河北节度使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迄于唐亡，河北分成几个独立的小王国，强梁不可复制。

广德元年（763 年）正月，田承嗣听到唐廷已恢复薛嵩、张忠志的节度使职务，暗中派人接洽请降。并劝史朝义亲赴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发兵，以救莫州，自请留守待援。史朝义率精锐骑兵 5000，夜自莫州北门突出，田承嗣遂献城投降，送史朝义母妻子女于仆固怀恩。

史朝义北走后，仆固玚等率军 3 万追击至归义（今河北雄县西北），史朝义回战，大败，遂逃向范阳。时史军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通过中使（宦官）骆奉仙请降，遣其兵马使李抱忠率兵 3000 镇守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史朝义至范阳城下，不得入，于是范阳人在史朝义左右者，纷纷逃散。史朝义不得已率数百骑奔向广阳（今北京房山东北），又遭守军拒绝，只得向北逃走，欲入奚、契丹，行至温泉栅（今河北卢龙境内）时，李怀仙的追兵赶到。史

① 《唐大诏令集》卷二《代宗即位赦文》。

② 《册府元龟》卷八十八《帝王部·赦宥七》。

朝义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林中自杀。李怀仙取其首级，献给仆固怀恩，仆固怀恩又传首到京师。至此，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历时 8 年始告结束。

第五节　唐军平叛胜利的原因及作战指导的得失

唐朝平定安史叛乱的战争，最后虽然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政治上，朝廷集权遭到削弱，地方势力迅速膨胀，唐王朝从此急剧走向衰落。在战争指导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下面主要从战略方面探讨唐王朝战争指导上的得失。

一、平叛获胜的原因及其意义

（一）唐军获胜的根本原因

安史起兵反唐，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武装叛乱，是地方割据势力反对唐朝廷而进行的战争，其目的是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因此，安史方面不可能提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纲领和口号；相反，安史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破坏生产，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和痛苦，其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叛乱战争一起，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击安史军队，筑垒保家，袭扰安史军队的后方交通线，主动协助唐军守卫城池。如张巡、许远坚守睢阳，颜杲卿在河北组织义兵等，都是广大人民支持唐廷，反对安史叛乱的有力证明。人心所向是唐王朝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唐王朝取得战争胜利的又一重要原因，就是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潜力大大优于安史方面。唐廷拥有全国绝大部分地

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包括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淮地区，这些地区为支持唐廷的战争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物资和钱财，使唐廷在经济上能持续地得到补充。而安史方面虽有范阳为反唐基地，然地域相对狭小，物产不甚丰富，经济潜力要比唐王朝弱得多。随着战争时日的推移，双方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唐军由劣势变为优势，安史军则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以至最后被消灭。

唐廷获胜的另一原因，是军事力量从总体上强于安史叛军。天宝时期，全国军队57.4万多人，沿边10个节度使、经略使，共有军队49万多，马8万匹，其中安禄山所领3镇拥有军队18万，马1.6万匹，军队数量占边兵的三分之一强，马占五分之一。从数量看，唐朝占优势。由于安禄山突然发动叛乱，唐廷思想松懈麻痹，缺乏防范，使对方兵力一时占据优势。当战争呈对峙态势时，唐廷得以抽调周边地区的军队对付安史军队，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已占优势。唐廷还在战争期间于中原地区设置了众多的节度使，授予他们招募军队的权力，新组建了不少军队。这些军队初期战斗力较弱，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遂成为较精锐的部队。唐廷在收复两京、邺城之战等重大作战中，投入的兵力达数十万，均大大超过安史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安史之乱平定后，全国军队达76.8万之多。另外，回纥兵的参战，对改变双方军力对比，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战争最后阶段，唐代宗吸取了以往经验教训，采取了集中主要兵力，迂回包围，前后夹击的战法，在洛阳北郊击败敌军主力，再次收复洛阳。以后，又利用史朝义内部分裂，士卒疲惫，后方不稳的弱点，对史军迅速组织远距离战略追击，不给其喘息的机会，采取军事打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办法，仅两个多月时间，就彻底消灭了史朝义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争指导比较正确，是唐军后期反攻取胜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平定安史之乱的意义

安禄山、史思明都是以唐朝边将的身份反唐的，其行为是地

方势力反对朝廷的反叛行为。唐廷对安史的讨伐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割据的行动，尽管唐廷与安史叛乱者之间的矛盾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但由于唐廷的讨伐战争具有上述性质，所以其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当然想推翻唐朝统治，由他们掌握最高统治权，同时也做好一旦目的不能达到，便退而割据一方的准备。安史占据两京以后，源源不断地将珍宝、财物从长安、洛阳运回范阳的行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虽仍由安史旧部占据，但他们再没有另外建立政权，在政治上仍承认朝廷的领导地位，这些地区的节度使在名义上仍由朝廷任命，国家在政治上没有分裂。平定安史之乱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意义。

安禄山和史思明领导的这个武装集团具有较多的野蛮性，他们所到之处肆行杀戮，破坏生产，使得田园荒芜，人口锐减。比如洛阳地区，“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今河南沁阳），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可见其破坏性之大。假如他们的目的得逞，将会使中国社会产生历史性倒退。因此，唐廷平定安史之乱，制止了其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保卫了中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具有维护社会进步的意义。

二、作战指导上的经验教训

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在战略方面有不少值得检讨的教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宝末年“内轻外重”的军事布局，对应付内地的突发战争极为不利。安史叛乱爆发前，内地兵力空虚，朝廷直接控制的军队只有数万人，各地州县武备松懈，缺乏对安史军队的抗击能

---

①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力。加之唐玄宗思想麻痹，对安禄山宠信不疑，致使唐军在突然袭击面前惊慌失措，陷入混乱被动局面。

2、在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战略反攻。战争开始不久，唐王朝凭借广大的后方和潜在的人力、物力资源，迅速调整部署，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迟滞和阻截安军前进。同时，河北、河南广大地区军民，自动组织起来反抗安军的残暴行动，牵制和消耗了大量安军兵力，使唐军得以稳定战局并逐渐改变被动状态。但唐军第一线兵力较弱，安军强大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郭子仪、哥舒翰等人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极力主张固守潼关以消耗安军，郭、李率军攻击安军在河北的交通线，进而袭占范阳，使安军首尾不能相顾，为反攻创造条件。由于唐玄宗急于求成，在局势稍微稳定之后，急于收复洛阳，在反攻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行命令哥舒翰率军出潼关决战，结果导致灵宝一战 20 万大军溃败，潼关不守，长安失陷，唐王朝几乎崩溃。这是唐玄宗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使唐军再次陷于被动局面。

3、以收复两京为急务，不以歼灭安史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肃宗以灵武为反攻基地是正确的，这是关系到唐王朝统治能否继续下去的重要战略措施。如果唐廷偏安于西蜀，不在灵武建立抗击安军的指挥中心，则各地唐军人心涣散，将会进一步溃败，平定叛乱将成为泡影。经过充分准备后，到至德二载（757 年）二月，唐军力量得到加强，反攻条件已经粗备。反攻的主要方向选在何地？主要次要方向如何密切配合？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当时，李泌提出分兵进攻范阳，夺取安军的后方基地，动摇其军心；再南下切断两京安军的归路，配合唐军主力，东西两面夹击，围歼两京安军主力。这是积极稳妥具有远见的战略计划，如果能够付诸实施，将会削弱安军实力，改变被动的局面，最终给安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①。但是，肃宗为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五》。

"先收平贼之功"，"以弹压天下"①，拒绝接受这个计划，急于收复两京。因而造成了如李泌所说"贼必再强，我必又困"② 的后果。唐军在反攻作战中又把全部兵力集中长安和洛阳方向，没有南北配合，即使打胜了，也只能打跑或击溃敌军，不能歼其有生力量。这样，就给了对方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机会。这是肃宗战略指导上的一大失误。

在战术指导方面，唐朝也有一些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缺乏有效配合的协同作战。在战争中，唐军各部不能统一协调作战，有的甚至拥兵不救，致使友军被安史军队围歼。如颜杲卿在常山被围攻时，太原王承业坐视不救，导致常山失守，颜杲卿被俘。张巡在睢阳与安军大战10个月之久，兵粮皆竭，危急万分，向驻守临淮的贺兰进明求救，遭拒绝。谯郡太守闾丘晓距睢阳最近，也抗命拒不发兵救援，造成睢阳的失守。九节度围攻邺城时，诸军各自为战，互不配合，缺乏统一指挥，进退无序，数十万大军围攻一孤城而不下，最终导致了空前的大溃败。如果各部唐军能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战争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

2、不能抓住战机，穷追猛打，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唐军与安军在长安城西决战中，击败安军，当时仆固怀恩估计敌军会当夜弃城逃走，建议派精锐骑兵追击，被李俶拒绝。如果唐军能抓住战机，连夜进击，将会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最后胜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但唐军却失去了这一机会。唐军第一次收复洛阳时，安军或降或逃，呈土崩瓦解之势，如唐军能乘势迅速进兵，安庆绪不难很快灭亡。可是，唐政府却忙于大封功臣，整修宫殿，一年后才组织军队发动攻势，使安庆绪得以喘息，重整旗鼓，和唐军对抗。

安史军方面也存在战略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五》。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二载二月。

1、缺乏远大的战略谋划。安禄山反叛虽然是为了夺取唐朝的最高统治权，但由于安史等人皆为“粗猛无远略”① 之辈，以为夺取两京，就算取得了天下。因此，安禄山拒绝了一些部下的正确建议，坚持直接攻占洛阳、长安。《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载：“何千年亦劝贼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治今陕西定边）、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鄜（治今陕西富县）、坊（治今陕西黄陵东南），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取太原，团弩士万五千入蒲关，以动关中；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今属山东），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这个计划颇具远见，安禄山如能采纳，安史之乱将不易平定。由于否定了这个计划，所以他在攻占洛阳后急于称帝；占领长安后，不再追击南逃的唐玄宗，本人滞留于洛阳，“无复西出之意”②，沉醉于歌舞声色的帝王生活。

2、战线长，兵力分散，侧翼空虚，后方不稳。安军的兵力分散在范阳、洛阳、长安这样一条数千里战线的各要点上，难以集中成强有力的打击力量，侧翼也完全暴露在唐军的威胁之下。而唐军在河南、河北、河东等地一直拥有相当的力量，可以据险扼守，牵制安军，也可以东出或南下，截断安史军联系。尤其是朔方军曾多次切断安史军交通线，威胁安史军的后方，加之广大河北人民奋起抗击安史军，使其始终无法摆脱后顾之忧。

3、内部不稳，矛盾重重。安禄山、史思明集团，由勇悍凶蛮的胡人和心怀异志的汉人构成，他们可以因一时利益相同而暂时结合在一起，一旦局势有所变化，其内部矛盾便激化起来。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安禄山与史思明之间，安史与诸将之间，诸将相互之间，都存在许多矛盾和权力之争③，所谓“虽腹心雅故，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五月。

③ 李协民:《论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微妙关系》,《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皆为仇敌”④。在这些父子相残、上下相杀的内争中，安史集团四分五裂，不仅不能一致抗击唐军，而且严重削弱自身力量，故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说：“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⑤。从某种意义上看，此话有相当深刻的道理。

---

④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

⑤ 《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十一》。

第十二章　代宗时期农民起义、反击吐蕃、回纥及国内平叛战争

安史之乱虽以唐朝胜利、安史败亡而告终，但对唐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并对其后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战争中，广大人民深受战乱之苦，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迫离乡背井。中原地区田园荒芜，村邑化为丘墟，北方的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安史之乱给唐廷的财政造成了极大困难，为了增加收入，唐廷便不断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从而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为反抗唐朝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江淮地区连续爆发农民起义。安史之乱期间，由于边兵内调，使得边备废弛。代宗统治时期，吐蕃、回纥多次内侵，对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国内割据势力动辄反叛，唐廷对之软弱乏力。内忧外患，进一步加深了唐王朝的社会危机。

第一节　代宗时期唐王朝社会危机的加深

一、生产破坏、经济停滞

经过安史之乱的摧残，广大北方地区的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三月条载："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关中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踊贵，广德二年

(764 年)，斗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①。河东地区的生产长期得不到恢复。永泰元年（765 年）四月，河东租庸使裴谞入京奏事，曾向代宗反映说：“臣自河东来，所过见菽粟未种，农夫愁怨”。② “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③。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④。河北地区为藩镇所割据，他们“所得之地，各为已有”，“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⑤。使人民不能安心生产，生活非常痛苦。如魏博镇田承嗣，在境内大肆征兵，使“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⑥。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西北地区，虽未经安史之乱战火的直接破坏，但由于吐蕃、回纥的不断进扰，破坏也很严重，如灵武一带，“百姓凋弊，戎落未安”⑦。泾、陇、邠等州，“贼之所至，俘掠殆尽”⑧。由此可见，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涉及到整个北方广大地区。北方本是唐朝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经过长期战火的摧残，加上此后藩镇混战，边患频繁，社会生产恢复时断时续，社会经济遂逐渐落后于南方。

战争还使唐朝户口数急剧下降。玄宗天宝十四载(755 年)，朝廷户籍上的户数为 891.4709 万；代宗广德二年（764 年），户数为 293.3125 万，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其中虽有一部分是逃亡隐漏户口，但相当多的还是死于战乱。户口的减少，标志着社会劳动力的减少，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劳动力的多寡，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同时，户口的减少，还标志着纳税人的减少，导致朝廷赋税收入的锐减，加剧了唐朝的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二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四月。

④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二年十二月。

⑥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⑦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永泰元年闰十月。

⑧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朝廷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广德二年（764 年），下令："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① 大历元年（766 年），又下令："如有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②想通过授予土地的办法，吸引逃户归业，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然而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极度膨胀的情况下，收效甚微。

安史之乱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土地兼并情况更加严重。唐朝廷也承认，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③。如代宗时的宰相元载，在京城以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④。官府和皇室也到处设置田庄，加入到兼并土地者的行列中去，官庄、皇庄遍及许多州县。管理官庄的官员称庄宅使，隶属司农寺；管理皇庄的则称内庄宅使，隶内廷。大历十四年（779 年），"内庄宅使奏：州府没入之田，有租万四千余斛"⑤。可见皇庄规模之大。土地的大量兼并，使大批的自耕农变成地主的佃户、寄庄户、客户、逃户或隐户，这些人户在户口总数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使课税户不断减少。唐朝廷欲想增加赋税收入，就必须改变赋税制度。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以两税制代替旧的租庸调制，乃势所必然。

二、剥削加重、民不聊生

安史之乱以来，北方州县残破，河北诸镇跋扈骄横，"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⑥。故唐王朝的财政主要依靠江淮地区来支撑，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⑦。这一时期唐朝廷对江淮人民剥削

①②③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④ 《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

⑤ 《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⑥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七月。

⑦ 《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

之重，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如宝应元年（762年），租庸使元载在江淮按户籍追征天宝末年至当时八年以来的租调，甚至“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①。人民为了反抗这种强暴行为，不得不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均田制破坏后，按户籍征收租庸调已越来越困难。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唐朝的军队数量急剧增加，其后仍有增无减，大历末至建中初年，总计已达76.8万余人。而这一时期在籍户口是：广德二年（764年），293.3125万户；建中元年（780年），308.5076万户。以建中元年之数计，平均四户养活一士兵。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载（755年），户数为891.4709万，军队约为57万多人，平均15.6户养一士兵。可知人民的负担相当于安史之乱前的四倍。加之政府除了应付军费开支以外，还要养活皇室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于是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名目之多，凡有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②。地主们有的享有免除课役的特权，有的“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③，以逃避课役。这样，就把赋役的负担都压在农民身上，更何况“权臣猾吏，因缘为奸，公讬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使得农民“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④，甚至背井离乡，沦为客户、浮人。

地主阶级对佃农、雇农的剥削也是很沉重的。官庄的租额大抵每亩“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⑤。私庄的剥削量一般在每亩五斗至一石之间⑥。这样的剥削量，按当时的产量计算，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建寅月。

②④ 《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③ 《通典》卷七《食货典七·丁中》。

⑤ 《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八《同州奏均田》。

⑥ 《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占收获量的五成至八成以上。此外，农民还要向庄主提供一定的无偿劳役。如果农民借了庄主的种子或粮食，赁了庄主的房屋和生产工具，整年辛劳，不得休息，全部收入用来还债还不够①。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三、国力衰弱、边备松弛

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经济从顶峰迅速地落入低谷。以唐朝廷财赋数为例：天宝（742～756年）中，户税年收入为222.5万贯，地税1246万石；租税粟1260万石，布570万端，庸调绢740万匹，绵185万屯，布1035万端。总计钱222.5万贯，粟2506万石，绢布2345万端（匹），绵185万屯②。代宗大历末年（779年），年收入钱为1200万贯，税米（麦）大历中数量不详，姑且以建中初年（780年）数计，为1600万石③。可以看出此时的收入已大大低于天宝中的收入，而财政开支却增加很多。

造成唐朝廷财政困难的原因，除了安史之乱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以外，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藩镇林立，他们"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④，也是造成政府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这些地区原来是唐政府主要财赋来源地之一，也是唐朝的统治中心地区，对唐王朝具有特殊意义。以人口而论，天宝元年（742年），全国户口数为852.5763万户，其中河北占148.7503万户，河南占183.6561万户，两河地区共计为332.4064万户，占全国户数的39%。从国家贮备谷物看，天宝八载（749年），全国各地贮藏谷

---

① 《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②③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84页，乙表1，《唐天宝中户税、地税及租庸调估计收入数》；第286页乙表3，《唐建中年间税户、籍兵数及钱谷收支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物 9616.2220 万石，其中河北贮备 2102.9924 万石，河南贮备 2246.7641 万石，两道合计 4349.7565 万石，占全国贮备谷物的 45％。天宝十四载（755 年）以前，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是唐朝征收绢帛的主要区域，三地共占全国征收绢帛数的三分之二，而且绢是当时的主要交换手段，在唐朝财政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长期为藩镇所割据，唐朝廷失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二分之一的谷物，三分之二的绢帛，使得财源枯竭，国力衰弱，不得不依赖江淮地区财赋的供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历六朝、隋朝虽然发展很快，但毕竟是半壁河山，要承担一个全国性政权的财政开支，负担是相当沉重的。

藩镇动乱，对抗朝廷，削弱了中央集权，导致政令不通，激化了社会矛盾，是中唐以来社会动乱的直接导因。如“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①。他们“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磐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他们却“完城缮甲，略无宁日”②，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各藩镇之间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往往对邻道采取兼并行动。如“大历中，薛嵩死，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共攻其地，得者为己邑。（李）正己复得曹、濮、徐、兖、郓共十有五州”③。节度使的更替，也多有不由朝廷任命的现象。如大历十四年（779 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死，其侄田悦继任，代宗为息事宁人，予以认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好色”，为其部将李希烈所驱逐，李希烈取而代之，代宗又一次姑息，同样予以认可。由于唐朝廷的姑息之政，更加助长了藩镇们跋扈专横的气焰，使藩镇之祸愈演愈烈，从而加深了社会危机。所谓“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七月。

② 《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

③ 《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

生，寇生由乎政缺"①，形成恶性循环。

安史之乱还使唐朝的边备松弛，国土内缩，不断遭到外族的骚扰。在东北方面，唐朝主要依靠平卢、范阳两道来维持统治，其中以平卢节度使为控制东北的最前线军事机构，范阳节度使为直接支援机构。由于平卢、范阳两镇为安史叛军的地盘，故对唐朝在东北的政策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上元二年（761年），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归顺朝廷，率军南下至青州（今属山东），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唐朝廷便废掉了辽西的平卢镇，使得唐朝失去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在西北方面，唐朝原来设置有安西、北庭、河西、朔方、陇右等道节度使，各屯驻有重兵，不仅有效地守御住边境，还有余力向外扩张。安史之乱时，西北边兵大量内调，使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内侵，占据了陇右、河西数十州，并进而威胁唐朝的统治腹心关中地区。安史之乱后，在西北方面，除了朔方镇一度还有力量外，其他诸镇多一蹶不振，唐政府便不得不把神策大军布防于京西北地区，以护卫京师安全。同时调关东兵到西北防秋，即防御吐蕃。中唐以来，唐朝的军事布局和安史之乱前正好相反，近80万大军半数以上分布在内地诸镇，尤其是唐宪宗以来，吐蕃衰落，西北边兵有所减少，内地兵力进一步加强，军事布局呈外轻内重的态势。这是因为中唐以来，朝廷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藩镇之乱，对于外患只能采取被动防御政策，无力同时兼顾了。

第二节　农民起义的爆发

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成了唐廷的主要财赋来源地，为了应付巨大的财政开支，就不断地增收苛捐杂税。宝应元年（762年），租庸使元载在江淮迫征多年积欠租调，人民不堪重负，"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②。又据《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载：

① 《全唐文》卷六六九《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建寅月。

“初，州县取富人督漕輓，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又宝应元年（762年），江淮大饥，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官府仍加紧搜刮。代宗时期的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爆发的，给唐朝在这一地区的残暴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一、袁晁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

袁晁本是管“鞭背”刑的小吏，州县官让他负责扑灭小股农民暴动，他拒绝应命，并趁机聚众起义①。宝应元年（762年）秋，在明州翁山县（今浙江舟山岛）举起造反大旗。当年八月，起义军攻下台州（今属浙江），“建元宝胜，以建丑月为正月”②，并建立政权，设置公卿官员。农民军迅速向北、西、南几个方向发展，先后攻下越州（治今浙江绍兴）、衢州、信州（治今江西上饶）、温州、明州（治今浙江鄞县）等地，声势浩大，队伍发展到20余万。武康县（今浙江德清西）人朱泚、沈皓聚众起兵响应，“分守两洞，攻陷城垒，县郭室庐，变为灰烬”③。湖州刺史独孤问俗派将军辛敬顺率兵镇压，起义群众寡不敌众，起义失败，沈皓投降官军。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唐朝廷急忙抽调大军前往镇压，以河南副元帅李光弼负责全盘军事，与御史中丞袁傪、嗣曹王李皋等率军分路围攻。广德元年（763年）三月，李光弼派部将张伯义率军与起义军大战于衢州，起义军大败。唐洪州刺史张遗爱屯兵上饶，又一次击败了起义军，斩杀3000余人。嗣曹王李皋“前后大战一十有一，小战二十有六”④，杀害了大批起义农民。同月，起义军

① 《新唐书》卷一二六《韩滉传》。

②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③ 《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武康县》。

④ 《千唐志斋藏石》樊泽《嗣曹王墓铭并序》。

主力在台州北部与唐军大战，数日内交锋十几次，终因组织、训练、装备不如唐军而失败，袁晁被俘，英勇就义。袁晁弟袁瑛率残部 500 余人退入宁海县北的紫溪洞据险抗击。唐军封锁洞口，切断洞中粮道，袁瑛等宁死不屈，全部壮烈牺牲。

二、方清领导的皖南农民起义

在皖、浙、赣交界的丘陵地带，是中唐时期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地区，当地人民往往依据险阻进行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宝应元年（762 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①，又是荒年，饥民遍野，“土豪方清乘岁凶歉，诱聚饿隶于黟、歙间，其众数万”②。方清是歙州（治今安徽歙县）人。广德元年（763 年），他与陈庄领导农民起义军在广德（今属安徽）会合，攻克了许多州县。永泰元年（765 年），方清势力发展到高潮，势力所及北到舒州（治今安徽潜山），东达浙西，西抵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农民军所到之处，镇压官僚豪绅，焚烧官衙，使地主阶级闻风丧胆。

唐军在镇压了袁晁起义军后，集中数路军队大举进攻，并动员地主土豪组织武装，联合镇压义军，因此形势发生了逆转。大历元年（766 年），袁傪督率唐军包围了石埭城（今安徽石台县城），经过激烈战斗，唐军攻破石埭，方清战败，壮烈牺牲。这次起义也失败了。

三、陈庄领导的浙西农民起义

广德元年（763 年），宣州（今属安徽）广德县人陈庄率众起义③。以乌石山为据点，抗拒官军，连下江西州县，唐江西观察使

---

①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② 《册府元龟》卷六七一《牧守部·选任》。

③ 《权载之文集》卷二十五《邵州长史李公墓志铭》。

李勉部将吕太一、武日升，相继投入义军，势力大振，攻下舒州。李勉听从判官李芃的建议，以宣州的秋浦（今安徽贵池）、青阳（今属安徽），饶州之至德（今安徽东至）等县，另置池州（治今贵池），以李芃摄行州事，防备陈庄势力向西发展。唐廷命河南副元帅李光弼督诸道军队镇压，李勉以江西军队从西面围攻堵截，淮南节度使崔圆在北面围攻，李栖筠率军在浙西进攻，具体负责前线军事指挥责任的是李光弼的行军司马、御史中丞袁傪。大历元年（766年），陈庄义军在优势官军的围攻下，连遭挫折与打击，退守乌石山，据险防守。由于方清战死，陈庄义军陷于孤立无援境地，不得已陈庄率余众2.5万人投降唐军①，起义失败。

代宗时期袁晁、方清、陈庄等3支农民起义军相继失败，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原因是：唐军无论在数量、训练、装备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其统兵将领比较有作战经验，往往采用数面围攻的战法，强弱悬殊，义军不敌，终至于失败。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起义军往往以某一固定据点为基地，面对优势官军不能采用灵活战术，机动地与官军作战。如袁晁以宁海的紫溪洞为据点，方清以石埭城，陈庄以乌石山为据点，当他们所攻占的州县被官军攻陷后，即都退守这些据点，据险死守，容易被官军四面包围，陷于孤立无援境地而遭镇压。不能设法跳出围攻，向外线发展，灵活机动地歼敌。2、起义军缺乏明确的政纲，不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与政府作斗争，纪律较差，流寇习气浓厚，甚至“劫商旅为乱”②，“舟行舡泝，人不自保”③。这样，使许多人不仅不支持起义军，反而在义军到来时，“州民拒贼”④，主动协助官军作战。使起义军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同情，对壮大起义队伍很不利。尽管如此，江淮地区的

① 《文苑英华》卷五六六独孤及《贺袁傪破贼表》。

② 《新唐书》卷一四七《李芃传》。

③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江南西道》。

④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沿革》。

农民起义仍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残暴统治，使统治阶级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蠲免赋税，加以赈恤。如袁晁起义失败后，唐朝廷“蠲免越州今年半租，温州、台州、明州各给复一年”①。一些地方官员还采取了恢复生产、开仓放粮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节　吐蕃、回纥的内侵与唐军的反击作战

吐蕃乘唐朝内部发生安史叛乱、西北边防空虚之机，攻陷陇右、河西数十州，并一度攻陷长安，给唐朝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威胁。由于唐廷处置失当，迫使仆固怀恩叛唐，并两次导引吐蕃、回纥入侵，如果不是他突然病死，将会给唐朝制造更多的边患。代宗时期唐朝外有吐蕃、回纥之患，内有河北藩镇之乱，加上宦官弄权，农民起义，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国力衰弱，民不聊生，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特点。

一、唐军对吐蕃的作战

（一）吐蕃入占河西、陇右

唐朝在玄宗统治时期，于西北地区设置了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诸镇，屯驻重兵，主要用来对付吐蕃。一度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控制了西域，维护了丝绸商路的畅通，迫使吐蕃暂时处于守势。安史之乱时，西北边军精锐奉命内调，所留者寡弱不堪一击，吐蕃乘机东进，唐朝无力兼顾，眼睁睁地看着吐蕃夺取河、陇地区。早在肃宗至德元载（756年），“吐蕃陷威戎（今青海门源）、神威（今青海海晏西北）、定戎（今青海湟源西南）、宣威（今青海西宁北）、制胜、金天（今青海共和东南）、天成（今甘肃东乡西）等军，石堡城（今青海湟中西南）、百谷城（今青海

① 《册府元龟》卷四九〇《邦计部·蠲复》。

贵南东北)、雕窠城(今青海同仁东北)"①。至德二载，"吐蕃陷西平(今青海乐都)"②。西平即鄯州，为陇右节度使治所所在地。乾元元年(758年)，"吐蕃陷河源军(治今青海西宁)"③。上元元年(760年)，"吐蕃陷廓州(今青海化隆西南)"④。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相继攻陷兰(治今甘肃兰州)、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洮(治今甘肃临潭)、岷(治今甘肃岷县)、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成(治今甘肃礼县东南)、渭(治今甘肃陇西东南)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⑤。把唐、蕃双方的军事对峙线由原来的祁连山至黄河九曲一线推进到唐都长安西北的凤翔、宁县、泾原一带。吐蕃攻占河西、陇右之地，不但使唐前期全力经营西北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而且对唐朝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第一，使唐朝失去了对西域和丝绸商路的控制权。河、陇失陷之初，使安西、北庭10余年与朝廷不通音讯，建中二年(781年)以后，"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⑥。唐朝以绢帛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是增加经济收入，扩大政治、经济影响的强有力手段。丝路不通，回纥乘机大做中间贸易，以马强市绢帛，"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⑦。而且，安西、北庭假道回纥，"回纥征求无厌"⑧。这样，唐在丝绸商路逐渐无利可图，安西、北庭也显得无维持的必要，终于在贞元六年(790年)眼看着安西、北庭最后失陷于吐蕃。随着河陇、安西、北庭的失陷，唐朝往日的巨大贸易收入与繁荣景象全部付诸东流，经济力量大大削弱。

第二，使唐朝失去了河陇天然牧场，战马严重缺乏，军事力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三十六》，肃宗至德二载十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三十六》，肃宗乾元元年十二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肃宗上元元年十二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元年七月。

⑥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⑦⑧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量大受影响。陇右道一直是唐朝的战马供应基地，优良牧场，幅员千里，太宗至高宗时期，养马达 40 万匹，开元时期尚有 27 万匹，至此“国马尽散”①。国家用马虽有与回纥的绢马互市，然收效甚微，“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②。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唐军战斗力。

第三，吐蕃占据河陇后，直接威胁唐朝都城长安的安全，使唐廷不得不重新调整防线，派驻重兵“防秋”，造成了很大的军事、经济压力，难以集中力量对付藩镇之乱。

（二）长安陷落与唐军的反击

广德元年（763 年）九月，吐蕃大举入侵，边将告急，为宦官程元振所阻，代宗竟毫无知觉。十月，吐蕃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刺史高晖以城降于吐蕃，并为其向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治今陕西彬县），上始闻之”③。于是，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道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防御。郭子仪自邺城之战后，被召还京师，闲居在家，部曲散尽，受命后仅招募 20 余骑，便赶赴咸阳。“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位于今陕西周至境内）渡渭，循山而东。子仪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请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见”④。郭子仪兵少，无法御敌。只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率精兵 2000 人，在盩厔（今陕西周至）西小胜吐蕃军。当吐蕃大军围攻盩厔时，吕月将之军全部战死，他本人力尽被俘。

吐蕃通过渭水便桥后，唐代宗慌乱不知所为，仓皇逃出长安，奔向陕州（治今河南陕县）。由于皇帝逃走，无人主政，“官吏藏窜，六军逃散”⑤，吐蕃军遂入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郭子仪闻知天子逃出长安，急从咸阳返回，领部曲数百人南入牛心谷，到达商州（今属陕西），收拾整顿六军逃散者，与武关（位于今陕

---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宗传附传》。

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元年十月。

西丹凤、商南间）防兵4000会合，军势稍振。准备出蓝田（今属陕西）进击长安。当时，“鄜延节度判官段秀实说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孝德即日大举，南趣京畿，与蒲（治今山西永济西）、陕、商、华（治今陕西华县）合势进击”①。

郭子仪派左羽林大将军孙全绪率军出蓝田，命宝应军使张知节率军接应，到达韩公堆后，白日则击鼓虚设旗帜，夜晚则多燃火光，“以疑吐蕃”②。又派人入长安城中暗中连结忠义百姓，夜晚击鼓于朱雀大街，吐蕃军惊慌不安，不知唐军到底有多少。百姓们又散布说：“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③。吐蕃军慌恐，入长安仅15天，便仓皇撤出，唐军遂复长安。

吐蕃军退至凤翔（今属陕西），节度使孙志直闭城拒守，吐蕃围攻数日不下。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勤王，途经凤翔，遂突入城中，不解甲，又出城迎战，斩杀吐蕃军千余人。吐蕃见唐军兵力增加，知城不可下，遂于次日退走，返至原（治今宁夏固原）、会（治今甘肃靖远）、成、渭一线。

（三）代宗中后期唐与吐蕃的战争

大历二年（767年）九月，吐蕃军数万围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游骑至潘原（今甘肃平凉东）、宜禄（今陕西长武）”④。郭子仪率甲士3万镇泾阳（今属陕西），随即又移奉天（今陕西乾县），以保卫长安。十月，唐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城下大破吐蕃军，斩首2000余级，吐蕃败退而去。

大历三年（768年）八月，吐蕃出动10万大军再次围攻灵州，另一路2万余人围攻邠州，京师长安震动。九月，郭子仪率兵5万屯奉天以防御吐蕃进攻长安。进攻灵州的吐蕃军受到唐军的猛烈反击，朔方骑将白元光击破其众2万余。在邠州的吐蕃军被邠宁节度使马璘击败，大挫吐蕃锐气。与此同时，唐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部将李晟率兵5000，出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南），到达洮州，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元年十月。

④《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二年九月。

攻下其屯积军需的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①。吐蕃军得知这一消息，恐归路断绝，陷于前后夹击的境地，于是，从灵州撤围退去。

大历八年（773年）十月，吐蕃兵分两路，一路万余人围攻灵州，以牵制唐朔方军，被唐军击破。另一路10万人为主力，进攻泾、邠等州。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浑瑊率步骑5000于宜禄拒敌，命马璘于盐仓（今甘肃泾川西）拒敌。浑瑊命设拒马防敌骑驰骋冲击。宿将史抗、温儒雅等五六人，看不起浑瑊，拒不执行命令，又轻敌饮酒大醉，致使唐军阵地被吐蕃骑兵冲破，士卒四散，死者十之七八。马璘在盐仓也被吐蕃军击败。郭子仪召集诸将，重新部署军事。命浑瑊率兵趋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扼吐蕃军归路；命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刺史李国臣引兵赴秦原（今甘肃清水东），攻击吐蕃军后方；马璘一军直趋潘原，与浑瑊军相呼应。吐蕃军此时已达百里城（今甘肃灵台西南），闻知唐军去向，急忙退军，浑瑊军于隘路截击，夺回吐蕃抢掠去的人口和财物。马璘也在潘原袭击吐蕃军，夺其辎重，杀数千人，吐蕃军大败退去。

此后，吐蕃还多次侵扰唐境，皆被击退。如大历十年（775年），吐蕃攻临泾（今甘肃镇原）、陇州（治今陕西陇县），被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击退。攻泾州，被泾原节度使马璘击退。大历十二年（777年）九月，吐蕃军8万攻破方渠（今甘肃环县），郭子仪派李怀光率军击退之。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击破吐蕃军于岷州。十三年，吐蕃兵分3路，进攻盐、庆（治今甘肃庆阳）、银州（治今陕西榆林南）、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及泾州，皆被唐军击退，无功而返。

在西南地区，吐蕃也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吐蕃陷松（治今四川松潘）、维（治今四川汶川西北）、保（治今四川理县新保关西北）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三年九月。

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①。这是这一时期吐蕃在剑南道获取的最大胜利。此后，唐廷调整部署，“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②，统一指挥这一地区军事，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德二年，严武大破7万吐蕃军，攻下当狗城（在今四川理县东南）。不久，又攻下吐蕃盐川城，二城均在维州境内。永泰元年（765年），严武任崔旰为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刺史，“使将兵击吐蕃于西山，连拔其数城，攘地数百里”③。大历十年（775年），西川节度使于西山击败吐蕃数万，斩首万余级，俘虏数千人。大历十一年正月，“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④。十二年，崔宁又大败吐蕃10万余众，斩首8000余。十四年，吐蕃与南诏联合进攻剑南，出兵10万。唐派名将李晟率军入蜀，大破敌军，收复七盘城（今四川旺苍东南）及维州、茂州（治今四川茂县）。“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⑤。这是吐蕃自广德时占据河陇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败，其实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吐蕃在剑南非但没占上风，而且屡吃败仗，显然非剑南唐军敌手。主要原因是吐蕃在此处缺乏充足的后勤供给，故战斗力不如河陇主战场。河陇地区吐蕃虽拥有主动权，但由于关中是唐朝统治腹心所在，驻有重兵，防守严密，吐蕃虽屡屡发动攻势，多无功而返。

（四）唐朝的防卫措施

面对吐蕃的连年侵扰，唐朝廷被迫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广德元年（763年），在郭子仪收复长安，代宗自陕州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二年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永泰元年闰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一年正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代宗大历十四年十月。

返回京师不久，于当年十二月，“筑城于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屯兵以备吐蕃。以骆奉仙为鄠县筑城使，遂将其兵”①。同时将平定安史之乱的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及朔方等军的部队陆续调至京西北，作为防御吐蕃的主力部队，常年驻防。永泰元年（765年），以泽潞李抱玉兼凤翔陇右节度使。次年，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璘兼邠宁节度使。大历三年（768年），调朔方军自河中移驻邠宁。在大历初年，唐在京西北共设立了凤翔、泾原、朔方、河东4个独立的节镇。十四年，又把朔方军一分为三，以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邠宁节度使，朔方右留后常谦光为灵盐节度使，朔方左留后浑瑊为振武节度使。到贞元三年（787年），又增置鄜坊、银夏节度使。这样，在京西北就形成了凤翔、泾原、邠宁、鄜坊、银夏、灵盐、振武、河东等8个独立的节镇。

第二，把新建的禁军即神策军布防于京西北。在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神策军出镇京西北已成为定制。《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说：“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神策军布防多与诸方镇军队交错配置，既可犄角呼应，又可起到监督诸军的作用。

第三，征调关东诸方镇军队轮番到京西北屯戍，以增强对吐蕃的防御力量。大历初年，还未形成制度，当时只是因军事需要，随时抽调关东诸镇部队屯防。大历九年（774年），代宗接受郭子仪建议，调发河北、河南、江淮、岭南等方镇军队轮番到京西北戍边，从此形成制度。《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河陇陷蕃已来，西北边常以重兵守备，谓之防秋”。主要是指防遏吐蕃侵扰的军事行动。因为吐蕃是游牧民族，秋季草长马肥，其侵扰活动多在这个时期进行，故唐朝称防遏吐蕃的军事行动为“防秋”。这些部队到达京西北后，分属于当地各节度使。如大历十年时规定：淮西、凤翔防秋兵由马璘统领，汴宋、淄青、成德等镇兵士归朱泚统领，河阳、永平兵士由郭子仪统率，扬楚兵士归李抱玉统率。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

关东戍卒通常是3年更替一次，衣粮费用由原所在方镇供给。这种制度客观上解决了边军兵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造成将不专兵的局面，故中唐以来西北虽驻有重兵，但都极少发生藩镇割据或叛乱事件。唐末情况则另当别论。

唐朝在京西北屯驻兵力大约有40万左右①。军队人数虽然众多，但对吐蕃的防御效果并不很佳，根本原因是缺乏统一的指挥。京西北有8个独立的节镇，互不统属，神策军和诸节镇又各成指挥系统。指挥系统的多元化，严重削弱唐朝的军事力量，使其在与吐蕃的军事对峙中，总体数量上虽占优势，局部战场上数量反倒处于劣势，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也获得过一些胜利，但始终未能扭转战场被动局面。

二、仆固怀恩叛引吐蕃、回纥入侵与唐军的反击作战

（参见附图13）

（一）仆固怀恩叛唐的酿成

仆固怀恩是铁勒部人，金微都督府都督仆骨歌滥拔延之孙，世袭都督。他“善格斗”，“有统御才”②，为西北边军统帅王忠嗣所赏识，被视为心腹。后又跟随安思顺，以功被任为朔方军兵马使。安史叛乱时，他先后跟从郭子仪、李光弼讨伐叛军，多次立有大功。乾元二年（759年），升为朔方行营节度使、大宁王。宝应元年（762年）十月，肩负了扫平安史残余势力的主帅重任，其父子血战河北，终于扫灭叛军，为唐朝立下赫赫战功。在平叛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③。为了结好回纥，助唐平叛，其女远嫁回纥。就是这样的唐室勋臣，在平叛战争结

① 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73年第4期。

②③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

束不久，却背叛唐朝，并两次诱引吐蕃、回纥侵扰唐朝边境，为害之烈，“不啻于禄山、思明之难”①，同时还造成了“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惮于转输，家室相吊，人不聊生”的局面②。其原因何在呢？这是需要认真探索的。

在史朝义军被扫平后，仆固怀恩奉命送回纥可汗出塞，途经太原，唐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以回纥可汗为怀恩之婿，恐怕他们合谋袭击，遂闭城防守，也不犒劳其军。返还时，也是如此对待。此事引起仆固父子的很大不满，上表朝廷反映辛云京之状，被置之不理。仆固怀恩于是驻军于汾州（治今山西汾阳），命部将李光逸屯于祁（今山西祁县），李怀光屯于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张如岳屯沁州（治今山西沁源），命其子仆固玚率万人屯于榆次（今属山西），以待朝廷之命。

广德元年（763年）七月，中使骆奉仙至太原，辛云京厚结讨好，并说仆固怀恩谋与回纥造反。骆奉仙返京时途经仆固怀恩处，受到盛情款待。仆固怀恩为多留骆奉仙一日，藏匿了他的乘马，骆奉仙以为要杀害他，当夜越墙逃走。仆固怀恩大惊，派人追赶并送还其马。骆奉仙回京后，即奏仆固怀恩确实谋反。仆固怀恩也上表辩解，请诛辛云京、骆奉仙。代宗下诏和解。仆固怀恩大失所望。

仆固怀恩自认为有大功于朝廷，而为人构陷，朝廷不予清洗，愤怨难忍，遂上书代宗，历数其功劳，指出自己之所以被人诬陷，是代宗宠信宦官，“内忌忠良”的缘故。又说：“且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是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却信嫉妒谤词，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毁黩。弓藏鸟尽，兔死犬烹，臣昔谓非，今方知实”③。仆固怀恩的这些话并非虚构之词，而是唐朝当时政策的真实反映。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主要倚重

---

① 《全唐文》卷七八四穆员《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

②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③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

于朔方军，其重要将帅大多都出自于朔方，如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以及其他许多将领。在长期的战争中，朔方军系统的将领大多握有重兵，朔方军本身的地位也高于其他部队。李唐王朝吸取安史鉴戒，一方面不得不倚重这支军队，另一方面又对其戒备甚严，处处防范。如"再造王室，勋高一代"的郭子仪，在肃、代时期就曾数罢兵权；对"战功推中兴第一"的李光弼，也因功高震主而受到冷遇；对仆固怀恩当然不能例外，当他们父子在河北与史朝义酣战之际，朝廷却"密为之备"①。在平乱中，唐廷让朔方军和其他地方部队在前线与叛军搏杀，却让神策军退屯后方保存实力。当仆固怀恩扫荡幽蓟时，"惟有神策兵马，顿军独住陈留"②。此后，朔方军一再被削弱、被分化，使天宝、开元时期拥有"战士十万，战马三万"的朔方军，到后来"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③。大历时，吐蕃连年入寇，郭子仪请求充实朔方军兵力以抵挡吐蕃，代宗宁愿增调关东军队，也不愿扩充朔方军。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唐廷是有目的地遏制以朔方军为主力的西北边军的发展④。所以当有人反映仆固怀恩谋反时，正中代宗下怀，其罗织罪名也是在皇帝默许下进行的。实际上代宗心中也清楚当时仆固怀恩并无反志，他曾说过："疑隙之端，起于群小，察其深衷，本无他志"⑤。在仆固怀恩死后，代宗"为之悯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⑥

广德元年（763年）九月，代宗派裴遵庆往仆固怀恩处宣谕，并察其去就。仆固怀恩号哭诉冤，本来已答应一同返京，后由于其部下劝谏，怕入朝后被杀而拒绝回京。吐蕃攻入长安，代宗避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

②⑥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

③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④ 参见《文史杂志》1991年第2期，陈勇《从仆固怀恩反唐看中唐的河朔政策》。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二年六月。

难于陕州，再次召怀恩入朝，仍遭拒绝，也不出兵赴难，于是，嫌疑更深。代宗回长安后，有人建议派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以代替仆固怀恩，朔方军将士多为郭氏旧部，必然弃仆固怀恩而投奔郭子仪。于是，代宗任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前往镇抚河东。在这种情况下，仆固怀恩派其子仆固玚率兵围攻太原，为辛云京所败。仆固玚又围榆次，被其部下杀死，郭子仪将其传首京师。朔方军将士数万闻听郭子仪到河东，遂弃怀恩而奔归郭子仪，仆固怀恩势孤，遂率数百骑渡黄河逃奔灵州。

（二）仆固怀恩一引吐蕃、回纥入侵与郭子仪出镇奉天

广德二年(764年)六月，仆固怀恩抵达灵州，收拾散亡之众，其势复振。八月，引回纥、吐蕃10万之众入寇。代宗急命郭子仪出镇奉天以抵御之。九月，郭子仪派其子郭晞率军万余援救邠州，命李国臣率军为郭晞后续。十月，仆固怀恩大军抵邠州，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和郭晞闭城拒守。吐蕃、回纥又分军进逼奉天，京师戒严。“诸将请战，郭子仪不许，曰：‘虏深入吾地，利于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① 十月七日夜，郭子仪始出，率大军列阵于乾陵之南，吐蕃、回纥军以为唐军无备，然见郭子仪大军军容严整，惊愕不已，不敢贸然出击。

在仆固怀恩率吐蕃、回纥军南下时，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兵5000人，交给监军柏文达统率，说：“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②柏文达依计率军进攻摧沙堡（今宁夏固原西北）、灵武县，攻下后又直扑灵州。仆固怀恩听到灵州危急的消息后，急率军从前线撤退还救。到灵州后，夜袭柏文达军，大胜，唐军死伤过半，退回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此次解关中之危，退吐蕃、回纥之军，杨志烈、柏文达功居第一。

（三）仆固怀恩二引吐蕃、回纥入侵与郭子仪单骑退回纥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二年十月。

永泰元年（765 年）九月，仆固怀恩第二次引吐蕃、回纥数十万众入侵，兵分 3 路：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率军自北道直取奉天；党项将领任敷、郑庭、郝德等率军自东道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企图经华阴直攻蓝田（今属陕西），扼唐军南路；吐谷浑、奴剌等军自西道攻盩厔（今陕西周至），以回纥军与仆固怀恩所率的朔方军为后续支援部队。京师震动，人心恐慌，代宗下诏亲征，“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马璘、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天、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治今陕西黄陵东南），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今陕西西安西）。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①，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半圆形防御线。

仆固怀恩在进军途中得急病，只好返回，九月初八行至鸣沙（今宁夏中卫东）病死。其部下大将张韶代领其众，别将徐璜玉不服，杀死张韶。不久，另一将领范志诚又杀徐璜玉，自领其军。怀恩军自相残杀，大大地削弱了自身力量。

吐蕃军抵达邠州，白孝德据城自守。十五日，另一路吐蕃军约有 10 万之众抵达奉天，京师震动。唐奉天守将浑瑊、白元光列阵于城外，浑瑊率 200 骑兵直冲敌阵，击败前锋，挫其锐气。十六日，吐蕃军攻城，被唐军击退，死伤甚重。浑瑊又夜引兵袭击敌营，斩杀 5000 多人。十七日，代宗命郭子仪率军自河中进屯泾阳。是时，天降大雨不止，吐蕃军不能攻城，于是便移攻醴泉（今陕西礼泉东北）。党项军西攻白水（今属陕西），东侵蒲津（今陕西大荔东）。二十八日，吐蕃军抢掠男女数万口而归，在澄城（今属陕西）被周智光截击，大破其众，吐蕃军败退往鄜州。

十月，吐蕃军退至邠州，遇到回纥军，遂合兵再度入侵。三日，进至奉天。八日，抵达泾阳。这时进驻泾阳的郭子仪只有万余人，众寡悬殊，子仪命诸将严备不战。命其将李国臣、高升拒东面，魏楚玉守南面，陈迴光挡西面，朱元琮守北面。郭子仪自

①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率精骑2000往来策应，出没于前后左右。这时回纥、吐蕃已知仆固怀恩死讯，“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①。郭子仪探知其情，派牙将李光瓒往城西回纥大营游说，欲和回纥共击吐蕃。回纥不信郭子仪还在世，说“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② 当得到肯定答复后，回纥又提出要与郭子仪见面。郭子仪不听诸将劝说，不顾个人安危，领数十骑出营，免胄释甲，直赴回纥大营。回纥大惊，皆下马罗拜，曰：“果吾父也”③。郭子仪与回纥首领饮酒言欢，赠与罗锦，双方重结旧盟，约定共同夹击吐蕃而返。吐蕃得知唐朝与回纥结好的消息后，连夜引兵退去。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白元光率军会合回纥军，追至灵台西原赤山岭（今甘肃泾川东40里），大破吐蕃，斩杀万余，并夺回所掠士女4000多人。

与此同时，回纥首领石野那等人至长安朝见代宗，送回仆固怀恩亲属及部将，代宗皆赦其罪。二十七日，回纥胡禄都督等也入见代宗，唐廷赠与缯帛，前后达10万匹之多，府库空竭，乃以百官俸给之，可见泾阳之盟唐朝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唐朝还派慕容休真以书招谕党项，其酋长郑庭、赫德等也至凤翔请降。至此，持续3年的仆固怀恩之乱始告平息。

三、唐军反击作战的主要特点

唐朝在京西北地区虽设置了8个节镇，屯驻数十万大军，但由于指挥系统上的多元化，所谓“节制多门”，遇有吐蕃入侵，诸镇不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统一对敌行动，严重地削弱了唐的军事力量。不但不能主动出击收复河陇失地，往往陷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尽管吐蕃、回纥的多次侵扰最终被击退，除剑南地区外，在河陇地区并不能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致使敌军去而复来，长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十月。

②③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期威胁关中安全。从代宗时期对吐蕃、回纥几次侵扰的抗击作战看，唐军作战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利用吐蕃深入唐朝腹地，四面临敌，军心不稳之机，虚张声势，以疑兵之计退敌。如广德元年，吐蕃攻陷长安，郭子仪奉命拒敌。他白日虚设旗帜，夜晚多燃火光，使吐蕃以为唐朝诸镇勤王军队大至。又派人潜入长安散布唐大军云集的消息，利用夜晚在城中击鼓大呼，使“吐蕃惶骇”，不敢久居孤城，“悉众遁去”①。

2、攻击后方，断其归路，造成前后夹击的态势，迫敌退兵。这种战法唐军曾多次采用，非常有效，虽然唐军每次出击的方向不同，使用的兵力多寡不一，都起到了调动吐蕃军队，迫其退兵的目的。如大历三年（768 年），吐蕃军进攻灵州、邠州，唐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部将李晟率军 5000 人，出大震关，到达洮州，攻下吐蕃屯积粮草军需的定秦堡，焚烧其积聚，使吐蕃后方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且缺乏军需供应，不得不退军。大历八年（773 年），吐蕃进攻灵州与泾、邠等州，大败唐军，杀获甚多。郭子仪及时调整部署，采取正面坚守不战，以奇兵袭其后方的战法，派李国臣率兵趋秦原，马璘攻潘原，浑瑊赴朝那。三路齐出，互相呼应，扼其归路，击其后方，迫使吐蕃退军。又在吐蕃军返归途中据险截击，获得较好的战果。仆固怀恩第一次引回纥、吐蕃攻唐时，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从凉州发兵，不顾河陇地区大部被敌攻占，自己地处西北一隅，势孤力单，毅然出兵攻击仆固怀恩的根据地灵州，迫使其退兵回救，虽然后来损失惨重，但却解救了关中之困。

唐军之所以能够屡次运用这种战法退敌，和唐在京西北的军事布局有很大关系。唐朝在京西北的诸镇，分布在今宁夏、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广大地区的各军事要地上，呈半圆形防线。战线长，地形复杂，军队布防的密度相对比较疏散（长安附近例外），这样的布防使敌军有可能从唐军据点的空隙中突入关中，威胁长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元年十月。

安。也由于这样的布防特点，使敌军不可能同时攻击唐军各军事据点，使唐诸镇自顾不暇。于是，一部分节镇便可以抽调出兵力，主动出击，从各自的方向袭击吐蕃后方，从而迫使吐蕃军回救。可惜这种行动往往是某些唐军的单独行动，如果当时唐廷能统一协调各路军队行动，克服诸镇各自为战的缺点，在敌军后撤时，集中兵力，围追堵截，前后夹击，将会大量歼灭吐蕃有生力量，使其不敢轻易东向。

3、利用对方矛盾，分化孤立一方。最显著的战例便是仆固怀恩第二次引吐蕃、回纥侵扰时，郭子仪利用怀恩突然暴亡，吐蕃、回纥之间的矛盾，争取回纥站到唐朝一方，联合进攻吐蕃，获得较大胜利。尽管此举回纥要价甚高，唐朝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府库为之一空，但从军事角度看，唐军所采取的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策略是成功的。

第四节　唐廷对周智光、李灵曜、田承嗣作战

仆固怀恩之乱平息不久，又相继发生了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汴宋节度留后李灵曜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叛。周智光军驻地同华镇靠近京畿，其叛乱对唐朝的统治中心威胁甚大，幸赖郭子仪等临之以威，促使其内部发生分化，使这次叛乱迅速平息。魏博田承嗣之乱，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割据河北的安史余部的首次对抗朝廷的军事行动。唐廷本应予以严惩，以重振朝廷纲纪。从当时情况看，唐廷举天下之兵伐一叛镇，并不难将其平定。然代宗先是行姑息之政，后虽勉强用兵，却不能痛下决心，误中其缓兵之计，使田承嗣危而复安，平叛因此迁延岁月，空耗民力国财，唐廷只好再次与田承嗣达成妥协。唐朝不能平定田承嗣之乱，消极影响颇大，助长了河北诸镇的骄横气焰，使“李正己、李宝臣党叛而自相袭夺，不复知唐之有天下也”①。

---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代宗十》。

一、平定周智光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吐蕃军东侵,大掠而还,被周智光截击于澄城,大破其众,并追至鄜州。由于周智光与鄜坊节度使杜冕有隙,遂坑杀杜冕家属81人,杀鄜州刺史张麟。十月,周智光献捷于长安,代宗不能治其罪,放归本镇。周智光回到华州后,更加骄横,召之不至。代宗没有讨伐,反而命杜冕跟从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于梁州(治今陕西汉中)躲避。周智光派兵于商山(今陕西商州东)邀击,不获。由于代宗一味姑息,周智光气焰更加嚣张,竟招聚亡命无赖之徒数万,纵之剽掠。又擅自截留关东运往关中的漕米2万斛,并截杀关东藩镇遣往京师的使者,抢其贡献之物。连诸州前往京师应试的学子,也不敢途经华州,而是转经同州入京。周智光听说后,又遣兵截阻,死者甚众。他还擅自斩杀路过的陕州监军张志斌。周智光倒行逆施,肆无忌惮,已成为唐廷的心腹之患。

尽管如此,代宗对他仍一味存抚,并于大历元年(766年)十二月,加周智光为检校左仆射,遣中使徐元仙持告身(任官状)往华州授之。周智光大怒,骂曰:"智光有大功于天下国家,不与平章事而与仆射!且同、华地狭,不足展材,若益以陕、虢、商、鄜、坊五州,庶犹可耳"①。公然宣称说:"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②。这实际是公然宣布叛乱。朝野为之愤慨,郭子仪请求出兵讨伐,代宗仍忍让不许。

次年正月,唐廷得知周智光将要出兵攻取陕、虢(治今河南灵宝)、商、鄜、坊(治今陕西黄陵东南)5州,并继续截夺朝廷漕粮,不得已命郭子仪率军讨伐。郭子仪命浑瑊、李怀光率军进驻渭上,"智光麾下闻之,皆有离心"③。两天后,周智光大将李汉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元年十二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二年正月。

惠率所部军自同州投降了郭子仪。直到这时周智光才知自己力不能敌，心中恐惧，上表请求赦免。唐廷下诏贬他为澧州（治今湖南澧县）刺史。几日后，其部下牙将姚怀、李延俊等起兵杀周智光，这次叛乱遂平定。

二、一讨田承嗣

大历八年（773 年），昭义节度使薛嵩死，其子薛平年方十二，将士拥立为帅，薛平假装答应，后让位于其叔薛崿，请朝廷任为留后，自己乘夜逃归本乡。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谋图扩展势力，暗中拉拢昭义将士投己，并为安史父子立“四圣堂”，表示自己念旧不忘本。唐廷下诏谴责田承嗣，令其毁去安史祠堂。田承嗣乘机要求加同平章事衔以交换，唐廷为求安宁，竟同意其要求，并以代宗之女永乐公主下嫁田承嗣之子田华，“上意欲固结其心，而承嗣益骄慢”①。十年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在田承嗣播弄拉拢之下，举兵作乱，驱逐昭义节度留后薛崿，率其众归田承嗣。田承嗣以救援为名，引军袭取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唐廷遣使制止，田承嗣拒不受命。又派其大将卢子期攻陷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杨光朝攻陷卫州（治今河南卫辉），还派人杀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刺史薛雄，全部占据了昭义军所属 4 州之地。

田承嗣此举使朝野震动，唐廷下令讨伐。由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平时为田承嗣所轻视，也不愿田承嗣独吞 4 州之地，欲想分肥。于是，皆上表请讨田承嗣。当时，卢龙节度使朱泚入朝，其弟朱滔代他为卢龙节度使，正想效忠朝廷，也愿为讨叛出力。唐廷利用此机，于当年四月令河东、成德、卢龙、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等镇发兵讨伐，以李宝臣与河东节度使薛兼训出兵攻魏博之北；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魏博之南，并贬田承嗣为永州（今属湖南）刺史。五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九年三月。

月，田承嗣部将霍荣国以磁州（治今河北磁县）降，李正己攻下德州（治今山东陵县）。李忠臣统永平、河阳、怀、泽步骑4万围攻卫州。六月，田承嗣命其将裴志清攻冀州（今属河北），裴志清率众降于李宝臣。田承嗣亲率大军来争冀州，李宝臣命大将张孝忠率兵4000为先锋，自领大军继后。田承嗣不敢相争，烧辎重而退。

田承嗣见诸镇兵四合，部将多有叛降，心中大惧。八月，遣使奉表朝廷，请求只身归朝待罪，唐廷下诏暂停进攻。这样，使田承嗣有喘息的机会，以稳定其行将崩溃之势。不久，田承嗣即遣其将卢子期率兵攻磁州。九月，李正己、李宝臣会攻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田承嗣率军往救，使其卒伪装成淄青、成德兵卒，互传双方薪饷厚薄，以挑拨相互之间的关系。淄青卒闻听成德兵卒赏厚，有怨言，李正己恐发生兵变，引兵先退。李宝臣不得已也退去。李忠臣听到贝州唐军退兵的消息，遂解卫州之围，渡黄河南走阳武（今河南原阳）。卢子期围住磁州攻打甚急，磁州求救，李宝臣与昭义节度留后李承昭共往救援。十月，大破卢子期军，擒卢子期送京师斩首。河南唐军大破田承嗣侄田悦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田承嗣大惧，以利诱李正己，使其按兵不进，河南诸镇见此情况也不敢涉险进兵。

田承嗣既无南顾之忧，遂专意对付北方之敌。李宝臣因救磁州有功，唐廷遣中使马承倩劳问，返回时李宝臣赠缣百匹，马承倩嫌礼薄，掷于道并诟骂之。李宝臣大怒，遂有玩寇之志。田承嗣乘机挑拨李宝臣进攻卢龙（治幽州，今北京西南），节度使朱滔不意友军会进攻自己，缺乏防备，大败而归。李宝臣因范阳有备，不敢轻进，领兵而退。

唐廷得知李宝臣与朱滔之事，李正己又为田承嗣求情，允其改过自新，田承嗣本人再次上表请入朝。代宗知已无法讨伐，只好于十一年二月，下诏停止用兵，恢复田承嗣官爵，允其入朝。

三、平灭李灵曜

大历十一年(776年)五月,汴宋节度留后田承玉死,朝廷以永平(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留后。汴宋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孟鉴,连结田承嗣为援,抗拒朝命。田承嗣出兵滑州,击败李勉,迫其承认李灵曜为汴宋节度留后。同时,田承嗣上表朝廷,为李灵曜请命,唐廷无奈,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任命李灵曜为汴宋节度留后。田承嗣也借机称病,上表朝廷不肯入朝。

李灵曜以暴力获得节度留后后,愈加骄慢,把管内诸州刺史、县令全部换成自己亲信,无视朝廷之命。八月,唐廷下令讨伐,命李忠臣、李勉与河阳三城使马燧率军进攻。李正己与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请命讨叛。汴宋节度副使李僧惠、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牙将刘昌与高凭、石隐等将,本李灵曜之党,见朝廷来讨,知不可抗拒,遂上表请求讨李灵曜。唐廷遂任李僧惠为宋州刺史,高凭为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刺史,石隐为郓州(治今山东东平西北)刺史。此举使李灵曜所管8州失去了3州,极大地削弱了其力量。

九月,李忠臣与马燧正会攻郑州(今属河南),李灵曜自汴州(治今河南开封)率军向西来救。两军不意李灵曜会来救援,退军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李忠臣军士溃逃十之五六,郑州士民皆惊恐逃散。李忠臣、马燧两军坚壁不动。数日,李忠臣散卒也相继来归,兵势再振。这期间李正己攻克郓、濮(今山东鄄城北)2州。十月,马燧与李忠臣分道东攻,数次击败李灵曜,进抵汴州境内与陈少游军会合,大战于汴州之西,李灵曜军大败,退守城中。这时田承嗣派田悦率军来救,击败李勉与李正己军,直抵汴州北安营。李忠臣遣部将李重倩引轻骑夜袭田悦之营,营中大乱,李忠臣与马燧以大军乘势猛攻,田悦军大溃,田悦只身北逃,将士死伤惨重。李灵曜见田悦军大败,开城夜遁,汴州遂下。李灵曜逃至韦城(今河南长垣东北),被永平节度使李勉部将杜如江所

擒，送往京师斩首。李灵曜之乱遂平。

四、再讨田承嗣

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因田承嗣拒不入朝，又助李灵曜叛乱，再次下诏讨伐田承嗣。

为了激励李正己、李宝臣、李忠臣等人，唐廷下诏加三人同平章事衔，并命出兵讨叛。田承嗣为自身安全计，分遣说客劝说三人各移节度使治所，以扩展辖地，不使血战夺来之地为朝廷所有，否则，将悔之莫及。三人心动，皆按兵不动。李正己原有淄（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今属山东）等10州之地。讨李灵曜，又占得曹、濮、徐（今属江苏）、兖（今属山东）、郓5州。以其子李纳守淄、青原10州之地，自己移节郓州统治新得5州，拥兵10万，无进讨之意。李宝臣原有恒（治今河北正定）、赵（治今河北赵县）等5州之地，新得冀（治今河北冀州）、瀛（治今河北河间）、沧（治今河北沧州东南）3州。因与朱滔结怨，不敢轻易出战，遂玩寇自保，不肯出兵。李忠臣原有蔡（治今河南汝南）、光（治今河南潢川）等4州之地，新得汴、宋、陈（治今河南淮阳）、亳（今属安徽）4州，乃移镇汴州，采取观望态度，不肯单独进讨。

田承嗣上述计划得逞后，一面上表朝廷谢罪，一面遣人游说卢龙节度使朱滔、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相互连结自保。唐廷在这种情况下，无计可施，只好妥协，乃下诏再次赦免田承嗣，恢复官爵，允其不必入朝。

唐廷两次讨伐田承嗣皆无功，主要原因是无切实可行之计划，又不设前线统帅，诸镇各自为战，容易被各个击破或拉拢。其次，利用安史旧将讨伐安史余党，又无切实驾驭之法，使得旧叛未灭，新叛又起，故难以成功。再次，代宗本人为懦弱寡谋之君，既知田承嗣为安史旧将，恶性难改，本应在进攻得手之际乘胜攻击，彻底铲除祸根，却轻信其降而停止进攻，致使田承嗣稳住崩溃之势，继续为害。

第十三章　德宗时期削藩与反击吐蕃侵扰的战争

大历十四年（779 年）五月，唐代宗病死，太子李适即位，史称唐德宗。此时唐朝正当内忧外患，国事艰难之际，河北、山东等地藩镇相互勾结，为所欲为，对抗朝廷；朝内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吐蕃在一度沉寂后，又不断对唐朝边境发动侵扰战争。德宗即位之初，颇想有一番作为，励精图治，整顿财政，调整人事安排，提倡节俭，减少宫中用度，并矫正代宗以来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发动了一系列旨在讨平叛镇的战争。但由于处置失当，加之朝廷军力不足，基本上仍采取以藩镇制藩镇的政策，使得旧叛未平，新叛又起，战乱连年不息，削藩战争大都以失败而告终，藩镇之祸更加严重。在对吐蕃的战争中，由于采取了联合回鹘、南诏，孤立吐蕃的正确策略，军事上处置也比较得当，取得不小的胜利。

第一节　德宗即位前后的国内形势

一、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在逃亡途中下令设置山南东道、江南东道、西道、黔中、淮南等节度使，企图稳住半壁江山。肃宗即位后，又在关中设置同华、京畿、凤翔、邠宁等节度使，在与叛军争夺激烈的河南设置宣武、郑陈、豫许、东畿等节度使。永王李璘企图割据时，肃宗又设置淮西等道节度使。整个战乱期间，唐朝先后设置数十个节度使，对加强各地管理，变和平体制为战

时体制，对安史叛军进行的有效抵抗，都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在河北共设置4个节度使，即昭义薛嵩、成德李宝臣、魏博田承嗣、卢龙李怀仙。昭义镇薛嵩死后，其地即被肢解，剩下三镇节度使皆为安史旧将，是日后藩镇动乱的最主要策源地。河北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当时平叛统帅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①；另一方面是“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②。在唐廷看来，只要诸叛将名义上承认朝廷，就可两相无事。

代宗、德宗时期，唐朝还陆续设置一批方镇，如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在关中增置泾原节度使。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为加强漕路的防务能力，置徐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同年，成德镇将张孝忠归顺朝廷，又从其镇分出3州，设易、定、沧3州节度使，即义武节度使。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分卢龙的棣州（治今山东惠民东南），淄青的德州（治今山东陵县），置德、棣2州都团练守捉使，即横海镇。

唐代藩镇的设置到德宗时止，已达40多个，以后还陆续设置大批藩镇。有的学者根据唐代藩镇对朝廷的态度和其所为，分为4种类型，是很有道理的③。这4种类型分别是：

1、河朔割据型。包括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等镇。这些藩镇皆招兵买马，私置官署，赋税不入朝廷，皇帝无法控制。不少节度使还豢养着一批牙兵，选军中骁勇士卒组成，待遇优厚，平时宿卫节帅，战时则冲锋陷阵，战斗力很强。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为了换得地方支持，尽快平定叛乱，允许各地节帅自择幕僚和管内州县长吏，署后奏闻即可，使节帅掌握了本地人事权。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宗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敕令节帅再不得署摄支郡刺史。这道敕令对河朔型藩镇并不产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代宗广德元年闰正月。

③ 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生约束力，他们对所属州县长吏的任用，仍以旧例委亲信充任，并广置镇将统领各地驻军，严密控制地方事务。此外，这些节帅的继任，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取舍于兵将，形成将专兵骄的局面，与唐廷分庭抗礼。在唐代的藩镇叛乱事件中，以河朔诸镇为最多，且长期割据与朝廷对峙。通常所说的藩镇割据，主要指这一类型的藩镇。

2、中原防遏型。包括宣武、忠武、武宁、河阳、义成、河东、陕虢、河中、金商、山南东道等镇。这类藩镇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控扼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战略地位。它们是唐廷防御河朔叛镇的主要力量，战时多受调遣征讨叛镇，平时具有保护东南通往关中的漕运干线的作用。史称“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①，指的就是这类藩镇。这种客观状况势必要求中原诸镇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一些藩镇兵力耗散有所削弱时，唐廷也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充实。有的地方一度罢镇，后为了加强该地区的威慑力量，又重新设置，如徐州在贞元初罢镇后，在李泌的建议下又予以恢复，“繇是徐复为雄镇”②。另外，中原诸镇由于节度使多系武人，这里又是用武之地，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批骄悍的节帅。他们利用讨伐叛镇的战争，发展自己军事实力，又利用朝廷凭借他们抗御叛镇的需要而拥兵自重，如宣武、河东等镇。尽管如此，它们仍不失为朝廷遏制河朔诸镇的武力屏障，其动乱行为也比较短暂，总的来说是忠于朝廷的。

3、边疆防御型。包括凤翔、邠宁、鄜坊、泾原、振武、银夏、灵武等西北边疆诸镇；山南西道，西川、东川、黔中、桂管、容管、安南、岭南等西南边疆诸镇。安史之乱期间，吐蕃、党项乘西北边兵内调平叛之机，步步进逼，不断侵扰唐朝边境。后来唐廷也在关内地区大量设置藩镇，又征调关东之兵防秋，使这一地区兵力达数十万之多，西北地区遂成为唐朝军事斗争的重心之一。

---

① 《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一》。

② 《新唐书》卷一五八《张建封传》。

为了加强对西北诸镇的控制，唐朝把神策军大量地布防于这一地区，与诸镇犬牙交错。加之西北诸镇在财力上主要依赖于度支供给，使他们对朝廷的依赖性大大加强，故西北诸镇很少发生对抗朝廷的叛乱事件。同时，由于西北乃贫瘠之地，人口稀少，军队众多，开支浩大，一旦供馈不足，衣粮欠缺，便容易激烈事变。西北诸镇发生的动乱大部分都属于这类性质的兵变。西南诸镇主要是为了防御吐蕃、南诏及周边民族而置，虽也免不了出现一些动乱，但总的来说还是属于忠于朝廷而又比较稳定的地区。

4、东南财源型。包括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等镇。东南地区原是唐朝重要财赋之地，安史之乱后，军国资用，取于江淮，更成了唐朝赖于生存的经济命脉所在。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评论说："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①。唐中后期虽然屡经大难，而国家始终不倾颓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东南地区财力上的支持。东南地区对唐廷来说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控制这一地区的藩镇，便成了唐廷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限制东南诸镇兵力，始终是其控制这一地区的一个基本方针。即便在与安史叛军艰苦作战之时，这里的兵力仍受到限制，永王李璘之乱与袁晁、方清起义，都是靠从中原抽调兵力才得以平定。此外，东南诸镇的节帅极少用武夫，通常多由文人充任，并且频繁换易，防止其在当地培植势力。这些措施使唐廷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故东南诸镇动乱极少，较大的反叛行动仅李锜一起，人称"天下方镇，东南最宁"②。

从以上对中唐时期藩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型方面，其他藩镇虽然也有动乱，但多是内部兵乱，不是割据叛乱。尽管如此，这些割据型藩镇的出现，对唐朝的政治格局影响也是很大的，安史之乱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朝廷政令不能通达各地，对军事、经济以及政局的稳定都

---

① 《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宣宗九》。

② 《全唐文》卷四一七《代杜相公让河南等道副元帅第二表》。

带来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威胁京师。唐朝京西北的局势在代宗大历后期一度缓和，德宗时期又趋紧张，吐蕃连续侵扰，形成很大威胁。而这一时期魏博、成德、卢龙、淮西等镇接连叛乱，朱泚、李怀光事件也搞得唐廷穷于应付。长期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财力，使唐政府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在军事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此外，代宗时期藩镇叛乱者主要是田承嗣，其他诸镇包括河朔在内，尚不敢过分跋扈。德宗时期的情况则严峻得多，河朔诸镇相继加入割据行列，造成的影响也比代宗时期严重得多。

第二，破坏经济。河朔的割据和唐王朝的反割据，使得这一地区战争比较频繁，战火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产基础，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同时，中原诸镇处于遏制河北叛镇的前线，每有战争爆发，这里首先要出兵征讨。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财政制度上有较大变化，由朝廷统一调配全国财赋变为军费开支地方化，即所在军镇"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①。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的两税法改革，虽改变了征税制度的混乱，但"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②，仍强调了财政的地方化。这样，中原诸镇的频繁参战，势必加重当地人民的负担，影响当地的社会生产。本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在安史之乱前一直是唐朝的财赋主要来源地，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由于割据战争的破坏和影响，社会生产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经济水平逐渐落后于江南地区。

第三，政局动荡。唐廷为平河朔之乱，调泾原兵东向，致使朱泚谋逆，关中混乱，德宗不得已奔于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平朱泚又造成李怀光叛乱，使德宗再奔于梁州（治今陕西汉中）。所谓"天下鼎沸，河北连兵以叛，李希烈横亘于中，朱泚内逼，天子匿于褒、汉，李楚琳复断其右臂，韩滉收拾江东以观成败，其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七月。

② 《陆宣公奏议》十二《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

有必亡之势者十九矣"①。造成这种动荡局面，固然有唐德宗政治上处置不当的因素，然从根本上看，河朔诸镇割据叛乱仍是祸乱之源。

二、边防斗争形势危迫

德宗时期唐朝的边患主要来自吐蕃。德宗即位后，吐蕃遣使聘唐，唐朝为了缓和双方之间紧张关系，也遣使聘问吐蕃。但吐蕃并非真心与唐改善关系，而是为了扩地掠财。吐蕃大相尚结赞以为唐朝良将只有李晟、马燧、浑瑊，如果除去这 3 人，就可以攻取长安。于是使用反间计，使唐解除了凤翔节度使李晟的兵权。又遣使到马燧军中卑辞请和，以麻痹马燧，马燧遂为之请和。当唐使到吐蕃后，又遭拒绝，使德宗厌恶马燧，罢去其兵权。贞元三年（787 年），唐蕃于平凉（今属甘肃）会盟，唐以浑瑊为会盟使前去定盟。吐蕃却伏兵于平凉盟坛之西，妄图一举袭杀浑瑊。浑瑊后虽逃脱，但唐军由于缺乏准备，损失很大。此后吐蕃连续侵扰唐朝边境，战火多年不息，唐军疲于奔命，陷于被动局面。只有西南方面，唐军联合南诏，孤立吐蕃，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吐蕃对唐作战，带有很强的掠夺欲望，不仅掠夺财富，人口也是掠夺对象。如贞元三年（787 年），吐蕃大掠陇州的汧阳（今陕西千阳西）、吴山（今陕西千阳西南）、华亭（今属甘肃）3 县，"老弱者杀之，或断首凿目，弃之而去，驱丁万余悉送安化峡（今甘肃清水西）西"②。又大掠泾（治今甘肃泾川北）、陇、邠一带，"虏分捕山间亡人及牛羊率万计，泾、陇（治今陕西陇县）、邠（治今陕西彬县）之民荡然尽矣"③。四年，又以骑兵寇掠泾、宁（治今甘肃宁县）、邠、庆（治今甘肃庆阳）、鄜（治今陕西富县）

① 《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德宗十三》。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③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5州，“焚吏舍民閭，系执数万”①，给当地的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

三、朝廷内部政治状况

（一）革除旧弊，整顿财政

德宗即位之初，惩代宗之弊政，励精图治，整顿朝纲，以谋复兴。首先，罢各地岁贡，减宫中服御常费，虽诞日也不纳内外贡献。禁止天下贡珍禽异兽，放四方鹰犬，对于外国所献的舞象32头，也令放归山林。又释放宫女百余人，减梨园伎和伶官300余人，所余之人皆归太常寺管辖。下令以后不许再建寺观及剃度僧人。代宗时期，宦官出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致使宦官公开索取贿赂，每奉帝命赐一物，宣一旨，皆要索取，无有虚还者。至此下令革除，严禁索贿，有违反者，严厉处罚。如宦官邵光烈出使淮西，接受节度使李希烈赠缣700匹，被杖60发配。还规定王府六品以上官及诸州县所属机构可省并者，官吏可减免者，皆量事省并。士庶田宅逾制者，予以清查，元载、马璘、刘忠翼等人的府第，华丽雄侈，德宗皆令毁之。

其次，整顿任官制度，革除以贿求官的弊端。代宗时，元载、王缙执政，四方求官者，争相贿赂，其门如市。常衮为相时，反其道而行之，四方奏请，一切不问，无所甄别，致使贤愚同滞，影响了国家对人才的选拔。常衮性刚急，为政苛细，曾因中书舍人崔佑甫当面顶撞过他，而奏贬其为外州刺史。德宗即位不久，就罢去常衮，任崔佑甫为相，崔佑甫又举荐杨炎为相。又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其原所领副元帅、朔方节度使、河中尹及诸使全部罢去。以其部将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节度使，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盐夏等军州节度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振武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德宗此举固然是要夺郭子仪之权，然

①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郭子仪为人宽厚，政令颇为不肃，致使管内弊端不能革除，经过这番整顿后，军纪政令皆有所改观。

再次，整顿财政，推行两税法。唐朝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出入须比部审覆。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诸将求取无节，第五琦无法应付，遂将租赋交入大盈库（皇室私库），变成皇家私藏，导致主管财政的官员不知收入之数，国用不能及时支拨，弊病丛生。杨炎执政后，奏请恢复旧制，由主管部门掌管。建中元年（780年），根据杨炎建议，废除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改行两税法，以地税、户税为主，一年分两次征收，夏征不超过六月，秋输不超过十一月。两税法的推行，是我国古代社会税制的一大变革，影响后世最为深远，同时也使唐政府的收支情况大大改善，唐朝能继续统治100多年之久，与两税法的施行不无关系。

（二）猜忌多疑、自乱其政

杨炎为相，独执大政，他以个人恩怨为事，打击当时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时任判度支、盐铁转运使，推行榷盐法以充军国之用。起初江淮盐利一年不过40万贯，在刘晏主持下每年达到600余万贯，使全国的财赋收入由每岁400万贯，上升到1000余万贯。他转运江淮租米，源源不断输往长安、洛阳，并改进运输方法，“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万余斛，无斗升沉覆者”①。“（刘）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②。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理财家，却被杨炎诬陷在代宗时犯有附和宦官刘清潭谋废太子（指德宗），另立韩王李迥为太子之罪。德宗轻信谗言，贬刘晏为忠州（治今重庆忠县）刺史，后又下令缢死。此事震动朝野，“天下冤之”③，连跋扈的山东藩镇也上表要求公布刘晏“罪状”，为他鸣不平。在这种情况下，杨炎又把责任推到德宗身上，密遣心腹分诣诸道，说杀刘晏是德宗的主张，与己无关。德宗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久贬杨炎为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在途中缢死，另以卢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七月。

杞为相。德宗在即位后的前两年就轻率地处死两位干练大臣，造成严重损失。

德宗任用卢杞为相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旧唐书》卷一三五《卢杞传》载："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又说他"忌能妬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元老重臣颜真颜、右仆射崔宁、殿中侍御史郑詹等被陷害而死。宰相张镒、京兆尹严郢、户部侍郎杜佑等，皆被排挤贬官。他又重用赵赞为判度支，赵赞无理财之能，唯知重税盘剥，甚至搜人财货，严刑峻法，强迫京师商贾出钱以助军费，"长安为之罢市"①。又征间架税，行除陌法② 等。由于卢杞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在群臣及强藩的攻击下，德宗被迫罢去其相职，贬往外州。又先后用张延赏、崔造、陆贽等为相，皆不久罢去。在陆贽罢相后，德宗躬亲政事，宰相只起到颁行文书的作用。官员的任用，也由德宗自行选择，正直之臣备受排挤，狎谄之徒尽得重用，如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宜、韦渠牟之徒，皆大受宠信，充斥于朝堂。功大如李晟、马燧者，却被置之闲散之地。故《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颜真卿传论》史臣曰："德宗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

德宗在经过泾原兵乱（详后）之后，见仓廪耗竭会引起动乱，"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③。诸道官员为讨皇帝之欢心，大肆盘剥，频繁贡献，有所谓"日进"、"月进"、"羡余"等名目。凡厚贡献，善聚敛者皆视为能臣，甚至对其言听计从。长此以往，遂使朝内忠佞倒置，朝外民不聊生。

（三）宦官专权与宫市之弊

---

① 《旧唐书》卷一三五《卢杞传》。

② 间架税：以房屋两架为一间，分三等，上等每间征税 2000 钱，中等 1000，下等 500；除陌法规定：交易额 1 贯，旧征算钱 20，赵赞改为征钱 50，大大高于旧制。

③ 《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二》。

《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霍仙鸣传》说:“初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以亲军委白志贞。……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文场、仙鸣率诸宦官及亲王左右从行。……德宗还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德宗因猜忌朝臣,急不择人,而信任宦官,委之兵权,造成严重的后果。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特置左右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统帅神策军,以窦文场、霍仙鸣分任左右神策军中尉,张尚进、焦希望分任左右神策军中护军。宦官们利用皇帝的信任和手中兵权,干预朝政,专横跋扈,收受贿赂,“贪利冒宠之徒,利其纳贿,多附丽之”①,诸道节帅也多出于其门下。使宦官势力盘根错节,逐渐形成一个政治集团。肃宗、代宗时期,李辅国、程元振虽干国政,但未全握军权。鱼朝恩虽任观军容宣慰使,然唐大军自有统帅,宦官不过是监军而已。德宗此次授予军权,又任其与边将、诸镇相联结,宦官之祸遂不可治。

德宗时期又有所谓宫市,危害甚烈。先前,宫中购买市场物品,由官吏主持,按值论价。贞元十四年(798年)前后,“时屡有中官于京城市肆,强买人间,率用直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仍索脚价及进奉门户,谓之宫市”②。中官(宦官)购物,不持文牒,以口传敕命。又派数十百人于市中查望,称之“白望”,多“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③。中官每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④。搞得人们持物入市交易,常常空手而归,“名为宫市,其实夺之”⑤。京兆尹吴凑、徐州刺史张建封入京时,皆言宫市之弊,德宗不听。却听信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的鬼话⑥,坚持不取缔宫市。其实,苏弁的行动是受宦官指使而为的。

---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霍仙鸣传》。

② 《唐会要》卷八十六《市》。

③④⑥ 《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二》。

⑤ 《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

四、议复府兵制的失败

唐自代宗以来，为防御吐蕃侵扰，调关东之兵到京西北“防秋”。长途跋涉，劳师费财，不胜困苦。“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①。这是当时防秋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边兵皆招募而来，“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而以前上番戍边的府兵，尽管边将残虐，归者无几，“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②。所以李泌在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时，提出恢复府兵制，认为“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③此议得到德宗的赞同。由于当时正忙于平定关东藩镇之乱，德宗提出待乱平之后再议。

贞元三年（787年），德宗用李泌为宰相，再次提出恢复府兵制的问题。李泌建议说：“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又说：“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④。李泌这个恢复府兵制方略的核心，是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纪五十》，德宗贞元九年五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二年八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七月。

变三年一更代的戍卒为土著，不离乡土，耕作一定量的永业田，承担兵役，并自备资粮、戎具。这个办法包涵了府兵制的某些因素，但还不是府兵制的全部内容或基本内容。关于这个方略是否实施，《邺侯家传》中说："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①。据此似乎已经实施，而且效果还不错。然现代一些学者认为"实未尝行，或则全为李繁所假讬，并无是言也"②。主要理由是贞元九年(793年)，陆贽曾再次提出恢复府兵制，其所上奏章中并无一言提及此事。如果当时实施并效果颇佳，陆贽当不会不提及。李繁是李泌的后代，其所作《邺侯家传》对李泌之事多有夸大，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故以上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贞元九年（793年）陆贽再次提出恢复府兵制之事，《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记载颇详，现简述如下：陆贽认为"今者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认为当时的边备之法有六种失误，主张恢复府兵制，罢防秋之制。他说："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植，待经一稔，俾自给家"。"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陆贽提出的恢复府兵制的方略和李泌的办法大同小异，其基本原则都是通过戍卒土著化，授予一定数量的土地，安置家口，采取且耕且战的办法，恢

① 《玉海》卷一三八《唐关内置府》引《邺侯家传》。又《资治通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也出自《邺侯家传》，这一点已为古今许多学者所指出。

②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第1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文中引用乃唐长孺的观点，吕思勉亦赞同之。

复府兵的某些制度。只是具体实施步骤与办法稍有差异而已。对于陆贽的建议，据《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说："德宗极深嘉纳，优诏褒奖之。"没有说是否实施。《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九年五月条说："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可见没有完全采纳。既然德宗此时不能采纳实施陆贽的建议，如何可能在数年前实施李泌的建议呢？如果那时真的实施了李泌的建议，并且效果不错，陆贽此时就没有必要再提出这个问题，即使提出这个问题，德宗也应该欣然接受并实施之。这就再次证明《邺侯家传》的说法不可靠。

第二节　对魏博镇田悦作战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袭节度使，德宗欲革前弊，坚决不同意其请求。李宝臣早在生前，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相约，以土地传于子孙。因此，在大历十四年（779年）田承嗣死时，李宝臣、李正己皆为其侄田悦出面，请求以田悦继任其位，代宗曲从之。至此，田悦也屡次为李惟岳出面，请求让他继任。在德宗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李惟岳遂自称留后，决计举兵对抗朝廷。田悦、李正己各遣使至成德镇，约定共同举兵以拒朝命。梁崇义此时因德宗下诏要他入朝，恐惧不敢前往，也加入了反叛的行列。于是，德宗时期削藩与反削藩的战争便拉开了序幕。

一、邢、洺之战

（参见附图 14）

当年相卫（即昭义）节度使薛嵩死后，田承嗣曾夺得洺（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相（治今河南安阳）、卫（治今河南卫辉）等州，而磁（治今河北磁县）、邢（治今河北邢台）2州及临洺县

（今河北永年）为朝廷所有。田悦对此非常不满，谋图夺为己有，如能如愿，其西境可达太行山，可以山为险阻，故田悦对其众说："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①。于是在建中二年（781年）五月，命其将康愔率军8000包围邢州，以杨朝光率5000人屯于邯郸（今属河北）西北以防昭义镇救兵，田悦自率大军数万围攻临洺。

临洺虽为洺州西北小城，然唐守将张伾筑有坚壁，屯兵以守，故田悦久攻不下。唐邢州刺史李共断定田悦必来攻城，预先作好抵御准备，田悦之将康愔也久久不能攻克。

这时，李正己闻听唐廷动员各地大军，声势浩大，前来征讨，心中恐惧，遣兵扼守徐州埇桥（又名符离桥，位在今安徽宿州濉河新河边）、涡口（即涡河入淮河口，在今安徽怀远东），以断南北漕运通道，威逼唐廷让步。

同年六月，梁崇义也派兵阻断襄阳以北水陆交通线，与李正己互相策应。朝廷震动，江淮漕船千艘，不敢北上；湘楚之船也不敢入汉水而上。唐廷下令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率诸道军讨伐梁崇义。

七月，临洺城中粮食将尽，士卒死伤甚众，守将张伾仍激励将士坚守城池，宁死不屈。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见临洺危急，急遣人报知朝廷。唐廷即命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等，率军往救临洺、邢州。同时还派永平节度使李勉、宋亳节度使刘洽、郑汝节度使路嗣恭、河阳节度使李艽等，率军东讨李正己、田悦。命幽州节度使朱滔、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进讨李惟岳。

马燧与李抱真率军往救邢、洺二州，未出淳口（今河南林州西南）之险，"先遣使持书谕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不设备"②。马燧、李抱真两军合兵8万，东出壶关（今属山西），进驻邯郸，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二年五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二年七月。

击败田悦的一支小部队。杨朝光在邯郸急忙求救于田悦，田悦此时正急攻临洺，以为旦夕可破，不能亲自来救，遣兵5000人援救杨朝光。马燧大军猛攻杨朝光军营栅，杨朝光难以拒敌，再次告急于田悦，田悦乃留兵继续围攻临洺，亲自率万人赴援。马燧得知田悦亲自来救，遂命大将李自良率军于双岗（今河北邯郸西北）阻截，“令之曰：‘悦得过，必斩尔’。自良等力战，悦军却”①。击退田悦援军后，唐军无后顾之忧，全力攻击杨朝光军，“燧推火车焚朝光栅，斩朝光，获虏首五千余级”②。马燧军获胜后，休整5日，进军至临洺，与田悦军大战，凡百余合，田悦军大败，斩首万余级。田悦引残军夜遁，其将闻知后，也率军自邢州退走，邢州围亦解。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命讨伐梁崇义。八月双方僵持于江陵（治今湖北荆州）东，梁崇义军闻知田悦军大败的消息，军心动摇，一战而败，逃回襄阳（今湖北襄樊）。李希烈军沿汉水而上，与诸道军会合后，进攻襄阳。梁崇义遣其将翟晖、杜少诚率军迎战于蛮水（今蛮河，位于湖北保康、南漳、宜城境内），被李希烈军击败，追至疎口（古称疎水，亦称襄水，在今湖北襄樊南入汉江处），再败二将。翟晖、杜少诚穷途无路，向李希烈请降，李希烈命二人率军千人，先入襄阳，慰谕军民。梁崇义闭城拒守，“守者开门争出，不可禁”③。梁崇义无路可走，与其妻投井而死。李希烈入襄阳，取梁崇义首级送往京师，遂据襄阳为己有，不肯撤回本镇。九月，德宗以河中尹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打算派禁军送他赴镇。李承恐激起李希烈之叛，决定单骑赴镇，以理折之，使其归镇。李承持诏秉节到达襄阳后，“希烈置之外馆，迫胁万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阖境所有而去”④。李承精心治理一年有余，军府始成规模。他料到李希烈野心颇大，日后必叛，乃密遣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二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二年八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二年九月。

心腹臧叔雅往来许（治今河南许昌）、蔡（治今河南汝南）之间，厚结李希烈心腹周曾等人，与之密图李希烈。

二、洹水之战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闻知田悦大败于临洺，忧惧而死。其子李纳自领军务，田悦求救于李纳、李惟岳。李纳遂遣其将卫俊率万人，李惟岳遣兵3000人往救之。田悦收拾残兵2万余人，驻于洹水（今安阳河，源于河南林州林虑山，向东流入卫河）下游以防御唐军，以淄青军驻于其东，成德军驻于其西，互相呼应。马燧率诸军屯驻于漳水一线，准备进击田悦军。唐廷令河阳节度使李芃率军会合马燧等军，进攻田悦。李纳奏请袭位，德宗不许。

十月，李纳所属徐州刺史李洧举州归顺朝廷，并请求领徐（今属江苏）、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沂（治今山东临沂）3州观察使，以拒李纳。唐廷加李洧为御史大夫、充招谕使。李纳得知李洧归顺朝廷的消息后，遣其将王温，会同魏博将崇庆共攻徐州，李洧遣使告急，唐廷调拨朔方、宣武及神策军，由宣武节度使刘洽统领，前往解救。十一月，唐军大破淄青、魏博军，解徐州之围，江淮漕路由是畅通。不久，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遣军至海州，刺史王涉迎降，沂州刺史马万通也降于淮南军。

刘洽等解徐州之围后，移军攻李纳于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攻下其外城。李纳畏惧，遣使与其弟李经、其子李成务入朝，请求自新。德宗欲赦之，使攻田悦，由于宦官宋凤朝的阻挠，遂不肯赦。李纳见朝廷不肯赦，遣将袭取海、沂2州，再次与田悦、李惟岳联合，共拒唐军。

建中三年（782年）正月，马燧与李抱真、李晟等率军准备渡漳水向南进攻，被田悦部将王光进沿漳水南岸所筑的月城阻挡，不能渡过漳水之桥。马燧乃以铁锁连车辆数百，装以土袋，在夜间推下漳水，阻其上游，使河水变浅，然后挥军涉过漳水，与田悦军夹洹水列阵，相持于黎阳仓口（今河南内黄楚旺镇西）。当时唐

军缺粮，马燧等军只带10日口粮，诸将心中不安。李抱真、李芃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于速战，今三镇连兵不战，欲以老我师，我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君破之'"①。于是，唐军在洹水上修三桥，每日挑战，田悦坚守不出。马燧为争取主动，调动敌军出战，命军士夜半饱食，乘夜色黑暗沿洹水直趋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少量军士抱薪以待，候敌军过桥后即焚毁洹水之桥。田悦发现唐军空营东去，与淄青、成德等军4万人，急过桥向北转而向东追赶，火把遍地，鼓噪前进，追10余里，始追上唐军。

马燧率军行10余里后，知敌跟踪而来，遂选择有利地形列阵，以精兵5000人列阵前以待敌军。等田悦军赶来，喘息未定，列阵未稳之机，唐军乘势猛攻，敌军立足未定，向后退却。诸军合力进击，田悦等军大败，唐军追杀10余里。田悦败军逃回洹水桥边，见桥已毁，军心大乱，争赴水中，溺死者不可胜数。唐军斩敌首2万余级，俘获3000余人。田悦仅带千余残兵逃向魏州。

当时魏州城中士卒不满数千，"死者亲戚，号哭满街"②。田悦与诸将截发而誓，约为兄弟，又出府库之财赏赐士卒，召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缮守备，军势复振"③。由于李抱真与马燧不协，互相牵制，皆迁延不进。田悦居魏州10余日后，唐军始来围攻，故一时难以攻下。

田悦的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守将李再春以城降于朝廷，洺州守将田昂、守漳水月城的王光进等也归降朝廷。田悦势孤力单，危殆万分，魏博镇几乎被唐廷扫平。

第三节　对成德镇李惟岳之战

幽州节度使朱滔奉命讨伐李惟岳后，派人游说成德镇所属的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正月。

易州刺史张孝忠，张孝忠遂降，朝廷任命为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令与朱滔共同讨伐李惟岳。李惟岳被讨平后，朱滔、王武俊自以为功大赏薄，心中怨恨朝廷，遂联合田悦，共同举兵反叛，河北局势更加复杂。

一、恒州之战

建中三年（782年）正月，李惟岳遣兵与田悦将孟祐守束鹿（今河北辛集东北），朱滔与张孝忠联兵围攻，克之，并进围深州（今属河北）。

李惟岳在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得知束鹿失守的消息后，甚为忧虑。其掌书记邵真劝其秘密上表，遣其弟李惟简入朝，然后诛杀诸将不从命者，自身入朝。使其岳父冀州刺史郑诜权知节度事，以待朝命。李惟岳表示同意，遂遣李惟简动身入京。孟祐回到恒州，知道此事后，即派人密告田悦。“悦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见惟岳，让之曰：‘尚书（指田悦）举兵，正为大夫求旌节耳，非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归尚书，自求雪身，尚书何负于大夫而至此邪！若相为斩邵真，则相待如初，不然，当与大夫绝矣’”①。李惟岳的判官毕华也力劝他不要对朝廷屈服。李惟岳怯弱，无有主见，乃斩邵真，出动军队万人与孟祐再次围攻束鹿。朱滔、张孝忠与其军大战于束鹿城下，李惟岳军大败，烧营而逃。

李惟岳的兵马使王武俊有智勇之才，其左右妒之，在李惟岳面前多次诬陷他，李惟岳对王武俊虽不信任，但惜其勇智，一时不忍除去。进攻束鹿时，以王武俊为前锋。王武俊认为“我破朱滔，则惟岳军势大振，归，杀我必矣”②。故在战斗中不力战而败。

朱滔在束鹿之战取胜后，打算乘胜进攻恒州，张孝忠不但不积极配合，反而引军向西北退去，驻于义丰（今河北安国）。诸将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正月。

皆感到奇怪，张孝忠解释说："恒州宿将尚多，未易可轻。迫之则并力死斗，缓之则自相图。诸君第观之，吾军义丰，坐待惟岳之殄灭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识浅，可与共始，难与共终也。"① 在这种情况下，朱滔也只好屯驻束鹿，不敢单独进兵。

李惟岳部将康日知在赵州（治今河北赵县）见唐军势大，遂以赵州归降朝廷。这一举动使李惟岳更加怀疑王武俊，王武俊感到非常不安。有人劝李惟岳说："先相公委腹心于武俊，使之辅佐大夫（指李惟岳），又有骨肉之亲。武俊勇冠三军，今危难之际，复加猜阻，若无武俊，欲使谁为大夫却敌乎？"②李惟岳以为然，乃遣大将卫常宁与王武俊共同领兵进攻赵州，又命王武俊子王士真将兵宿卫节帅府以自卫。王武俊领兵出恒州后，对卫常宁说："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复归矣，当北归张尚书（指张孝忠）。"③卫常宁劝他倒戈攻击李惟岳，如果不胜再投奔张孝忠，王武俊以为然。正好李惟岳派要籍官谢遵到赵州城下王武俊军中办事，王武俊拉拢谢遵共同谋图李惟岳。谢遵返回恒州后，即把商议好的计划密告王士真。闰正月，王武俊与卫常宁从赵州回袭恒州，谢遵与王士真为内应，开城门迎接王武俊军入城。黎明之际，王武俊率数百骑兵突入节帅府门，王士真在府内接应，活捉了李惟岳，将其缢杀后传首级于京师。深州（治今河北深州西南）刺史杨荣国及李惟岳姐夫、李惟岳所署的定州（今属河北）刺史杨政义等均降于朱滔。

二、王武俊之叛

李惟岳被灭后，李纳在濮州被河南诸军围攻，朝不保夕，形势危迫。唐廷以为天下不久即可太平，于是以张孝忠为易、定、沧（治今河北沧州东南）3 州节度使；以王武俊为恒、冀（今属河北）2 州都团练观察使；以康日知为深、赵 2 州都团练观察使；把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正月。

德（治今山东陵县）、棣（治今山东惠民东南）2州改隶朱滔，并令各自还镇。朱滔因没有得到深州，由是怨望朝廷，留屯深州不归。王武俊自以为功在张孝忠之上，而没有得到节度使职务，又失去赵、定2州，也对朝廷不满。“又诏以粮三千石给朱滔，马五百匹给马燧。武俊以为朝廷不欲使故人（指王武俊）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分其粮马以弱之，疑，未肯奉诏”①。田悦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机会来到，遂生出分化瓦解唐军之策。建中三年（782年）二月，田悦遣判官王侑、许士则至深州，游说朱滔曰：“司徒（指朱滔）奉诏讨李惟岳，旬朔之间，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指王武俊）因司徒胜势，得以枭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诏书，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隶本镇，今乃割深州以与日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然则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继绝之义，亦子孙万世之利也。”②又许以事成以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相酬谢。朱滔大喜，一面打发王侑回报田悦，一面派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一同前往恒州，游说王武俊，建议“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则他日永无患矣”③。王武俊许诺。朱滔还派人游说张孝忠，但没有成功。

三月，德宗遣中使（宦官）往河北，调发朱滔、王武俊、张孝忠等军，往魏州讨田悦。王武俊不受诏，并扣押使者送往朱滔。朱滔对其部下说：“将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勋，皆不遂。今欲与诸君敕装共趋魏州，击破马燧以取温饱，何如？”④众皆不应，再三询问，众人皆说不愿背叛朝廷。朱滔于是诛杀大将数十人，厚抚其士卒。康日知得知此事后，转告马燧，马燧又上奏朝廷。德宗因魏州未下，不愿树敌过多，乃赐朱滔爵通义郡王，以安抚之。朱滔深知朝廷用意，把深州授予王武俊所派刺史王巨源，又派兵屯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二月。

④《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三月。

于赵州，以逼康日知。

王武俊得到深州后，决心背叛朝廷，以其子王士真为恒、冀、深3州节度留后，自率大军围攻赵州康日知。此役唐廷虽平李惟岳，却又发生王武俊之叛，在成德镇问题上等于劳而无功。

第四节　对幽州镇朱滔作战

一、朱滔反唐

朱滔决定起兵反叛时，其表兄弟涿州（今属河北）刺史刘怦，曾以书信劝阻说："司徒（指朱滔）身节制，太尉（指朱泚、朱滔兄）位宰相，恩遇极矣。今昌平有太尉乡、司徒里，不朽业矣。能以忠顺自将，则无不济。比忘上乐战，不顾成败如安史者，今复何有？司徒图之，无贻悔。"① 朱滔不听。在起兵前，又恐怕张孝忠为后患，再次遣使劝说他一同行动。张孝忠坚决不从，并劝朱滔不要轻易反叛朝廷，指出王武俊性易反复，请他不要忽视自己的忠告。朱滔见张孝忠不从，派刘怦领兵屯驻要害之地，以防止张孝忠派兵袭击。

朱滔亲自统兵2.5万人，从深州出发，到达束鹿，休息一夜，"诘旦将行，吹角未毕，士卒忽大乱，喧噪曰：'天子令司徒归幽州，奈何违敕南救田悦？'"② 朱滔大惧，逃入驿站后堂躲避。朱滔心腹将领蔡雄、宗项出面劝说，并用谎言进行欺骗，妄图安定军心，士卒不听。朱滔只好率军退回深州。到深州后，下令密查领头的士卒，杀死200余人，其余士卒恐惧，被迫再次南下。到达宁晋（今属河北）后，屯驻以等待王武俊之军前来会合。

---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二《朱滔传》。又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四月条胡注："朱泚、朱滔本昌平人，朝廷以其官名其乡里，以宠其兄弟之功。"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四月。

王武俊举兵反叛后，德宗派恒冀团练副使孟华返回恒州（王武俊诛李惟岳时，曾派孟华入京面见天子），劝说王武俊不要反叛。王武俊不听，夺孟华之职，囚于私第，然后，亲统步骑 1.5 万人，直趋宁晋，会合朱滔。

二、魏州之战

田悦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得知朱、王援兵将到，遣大将康愔率军万余人出战，被马燧等军击败，退回城中。由于马燧与李抱真早有私怨，各自统兵平叛，不复相见，“由是诸军逗桡，久无成功”①。德宗数次遣中使(宦官)调解二人关系，均无成效。王武俊军逼近赵州时，李抱真曾分麾下军队 2000 人戍守邢州，以相互呼应。马燧得知此事后，大怒，说：“余贼未除，宜相与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②打算领兵归镇。李晟闻知后，劝马燧说：“李尚书(指李抱真)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③马燧大悟，乃单骑入李抱真营，“相与释憾结欢”④。这时正好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刺史自请入朝，马燧奏请德宗，把洺州划归李抱真的昭义镇管辖。李晟的部队原先隶属李抱真，至此又请兼隶马燧指挥，以表示和好之意。从此，马燧与李抱真的仇怨得以化解。

朱滔举兵时，遣人以蜡书送往凤翔节度使朱泚处，约以同反，被马燧截获，连同送书人及蜡书送往长安。德宗召朱泚入京，以蜡书和送书人相示，朱泚顿首请罪，表示并不知情。德宗说：“相去千里，初不同谋，非卿之罪也。”⑤于是留朱泚住在长安，赐予名园、良田、锦綵、金银等物，以安其心。

六月，朱滔、王武俊率大军自宁晋抵魏州，以救田悦。这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大军 1.5 万人，奉命讨伐田悦，也到达魏州。马燧认为朱滔、王武俊之兵士气正旺，李怀光军新到疲惫，主张休整数日，再根据敌情变化进兵。李怀光认为应乘朱、王之军营

---

①②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四月。

垒未固之机，发动攻击，不然后患无穷。遂领兵向朱滔屯兵的城北惬山进攻，朱滔出兵迎战，被李怀光军斩杀千余人，其军崩溃，“怀光缓辔观之”，非常得意，士卒争入朱滔营垒抢取宝货，“（王）武俊乘其怠”①，以精锐骑兵 2000 人突然出击，冲入李怀光军中，将其军分割为两半。朱滔乘机引军反攻，唐军大败，互相践踏，挤入永济渠中淹死者不计其数，河水为之不流。马燧等军各自收兵退守营垒，才免遭俱败。

当夜，“（朱）滔等堰永济渠入王莽故河，绝官军粮道及归路，明日，水深三尺余”。马燧见形势对官军极为不利，遣使卑词以游说朱滔，请求让诸道节度使各归本镇，并许愿上奏天子把河北之地委托朱滔掌管。“滔亦阴忌武俊胜且不制”②，不顾王武俊的坚决反对，同意马燧的请求。于是，马燧等军涉水移驻高地，坚壁固守，军势复振。王武俊见朱滔专横，不能采纳其意见，心中忿恨，从此，两人结怨。

三、贝州之战

田悦在魏州之围解除后，为感谢朱滔、王武俊的援助，提出奉朱滔为主而臣事之，朱滔谦让说：“惬山之胜，王大夫力也。”③于是共议四镇各自立国称王，不改年号，筑坛定盟，有叛盟者共讨伐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以朱滔为盟主称孤，其余皆自称寡人。所居之处称殿，妻称妃，子称国公，并设置百官。朱滔还改幽州（治今北京西南）为范阳府，以其子为府留后，“称元帅，用亲信为留守”④。

马燧自魏州之败后，退居永济渠以西高地防御，并监视魏州城中动向。不久，命李晟率军北上攻易（治今河北易县）、定（今属河北）2 州，使张茂昭攻涿、莫（治今河北任丘北）2 州，“以

①② 《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

③④ 《新唐书》卷二一二《朱滔传》。

绝滔援”。建中四年（783年）五月，李晟与张孝忠之子张升云率军把易州刺史郑景济包围在清苑（今河北保定），攻打月余不下。朱滔命马实留守魏州大营，自率步骑1.5万增援清苑。李晟在内外夹攻下大败，退守易州，张升云退居满城（今属河北）。不久，李晟因病又退至定州。朱滔乃还军于瀛州（治今河北河间）。

由于朱滔没有及时返回魏州，王武俊派其部下宋端赴瀛州催促。宋端言辞不恭，朱滔大怒，派人对王武俊表示强烈的不满。王武俊对朱滔留在魏州的马实说："寡人望王（指朱滔）速来指踪，决胜负，复何恶？王异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为节度足矣。"①马实据实说于朱滔，朱滔转怒为喜，遣使报谢。然王武俊因此更加怨恨朱滔，与田悦商议，打算和朱滔断绝关系。

六月，李抱真得知王武俊与朱滔不和之事，遣参谋贾林往王武俊在魏州的大营诈降，王武俊接见时，贾林说："林来奉诏，非降也。"②王武俊问其故，贾林接着说："天子知大夫宿著诚效，及登坛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徇忠义，天子不察。'诸将亦尝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语使者曰：'朕前事诚误，悔之无及。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③王武俊表示悔罪之意，并请天子赦免河北诸镇。贾林返回，报告李抱真，暗中相约，谋讨朱滔。

田悦劝王武俊与马实袭击在临洺的李抱真。李抱真再次派贾林游说王武俊，使田悦的计划破产，于是王武俊与马实率军各自归镇。

十二月，朱滔利用唐廷忙于平定朱泚之乱，攻魏诸军相继退去之机，出兵欲夺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并娶回纥女为侧室，引回纥兵3000骑助战，出动步兵5万，骑兵2万，车千乘，浩浩荡荡向南进发④。路过王武俊辖区，王武俊以牛酒劳问。入魏州境，田悦派人慰劳，供给丰厚，然田悦本人不肯出城相见，恐遭袭击。

---

①④《新唐书》卷二一二《朱滔传》。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六月。

田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事先得到王武俊的劝告，让他防备朱滔，免遭不测，田悦心中疑惑，故不出城相见。朱滔到达贝州时，田悦的贝州刺史邢曹俊闭城拒守，朱滔感到疑惑不解。这时王武俊遣使者对朱滔说："悦有憾，须公南，以兵断公归路，宜少备"①。朱滔大怒，杀田悦使者，纵回纥兵大掠，并命马实攻魏州、贝州及所属各县。田悦大惊，命全境各城闭门拒守以自保。唐廷闻知这个消息后，于兴元元年（784 年）正月以王武俊为恒、冀、深、赵 4 州节度使，加田悦检校左仆射，以李纳为平卢节度使，共拒朱滔。

朱滔攻打贝州不下，乃引水冲淹，月余仍无法攻下。李抱真与王武俊欲联兵救贝州，恰在此时，田承嗣之子田绪杀田悦而取代之。二人闻变不敢进兵。朱滔听到田悦的死讯后，即遣郑景济率兵 5000，协助马实急攻魏州。尽管朱滔军队全力攻打，由于魏、贝二州城池坚固，防守严密，贝州被围百余日，魏州被围 40 余日，仍不能攻下。李抱真见魏、贝二州被围日久，恐朱滔一旦得手，势大难制，遣使劝王武俊出兵援救。王武俊率兵至贝州西 30 里扎寨，李抱真也领兵来会，并领数骑亲赴王武俊营谒见。王武俊初时严加防备，后见李抱真真诚相见，大感惭愧，二人遂相约，同心协力，誓破叛贼。

朱滔见救兵已到，急召围困魏州的军队返回贝州。开始打算以回纥兵断其粮道，自己率军坚守不战，待对方粮尽然后出兵进攻。由于回纥将达干极力主战，于是又改变主意，决定立即决战。第二天，王武俊埋伏 500 骑兵于桑林，自己领骑兵居前，李抱真列方阵于后。回纥纵骑冲击，王武俊命前队骑兵让开通道，使回纥兵冲过。回纥兵冲到阵后，无所得，又折回冲击。王武俊命前队骑兵还击，桑林中的伏兵又冲出拦腰攻击，迫使回纥骑兵由李抱真军阵前横方向奔逃，多被后队步兵射死。朱滔见回纥军队大败，引骑兵向回溃逃，冲散了本军步兵阵营，自相践踏，全军溃

---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二《朱滔传》。

散，王武俊与李抱真军合兵追击，朱滔大败，死亡万余人，逃散万余人，只数千人奔回营寨坚守。此战，从早晨到黄昏，大战一整天，使朱滔军闻风丧胆。

朱滔败后，自度难以取胜，乃于当夜焚营逃走，军资器械，丢弃无数。因为大雾天气，王武俊与李抱真也不敢轻易追赶，使朱滔得以逃回幽州。朱滔此战败后，一蹶不振，得病不能治事，一年后死去。

第五节　对淮西镇李希烈之战

一、李希烈反唐与德宗的对策

建中三年（782年）七月，唐廷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兼淄青、平卢、兖（今属山东）、郓（治今山东东平西北）、登（治今山东蓬莱）、莱（今属山东）、齐州（治今山东济南）节度使①，讨伐李纳。十一月，李希烈率兵3万，徙镇许州（治今河南许昌）。由于先前征讨梁崇义时，李希烈谋图占据襄阳，被唐廷所派李承接替，被迫退归本镇，心中对朝廷不满。此时，见唐廷困于河朔诸镇之叛，又自以为兵强马壮，遂生谋逆之志。他一面派人告知永平（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李勉，说明自己兼任淄青等镇节度使，欲借道讨伐李纳；一面又派人与李纳联系，谋欲袭取汴州（治今河南开封）。李勉也采取了相应对策，一方面准备好军需物资，屯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准备接待李希烈，一方面治兵严备。李纳为了和李希烈连兵，曾数次遣游兵断绝汴州粮道，以接迎李希烈。李希烈并没有出兵响应。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称王时，曾派使者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虽无称帝，却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七月。

当李希烈徙镇许州时，唐廷即以原湖南判官李元平为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别驾、知州事，以汝州距许州最近，欲使李元平拒李希烈。李元平“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①，实无才干。李元平到汝州后，马上招募工徒加固城防，做好防守准备。在李元平招募丁壮时，李希烈遣壮士数百人应募，李元平没有觉察。建中四年（783年）正月，李希烈遣部将李克诚率数百骑突至汝州城下，应募的壮士响应于城内，活捉李元平，攻陷汝州。李希烈委任其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遣别将董待名等率兵四处抄掠，攻下尉氏（今属河南），包围郑州（今属河南），唐军多次被击败。李希烈军队的巡逻骑兵甚至到达彭婆镇（今河南伊川东北），东都（今河南洛阳东）士民惊骇不安，窜匿山谷。东都留守郑叔则移驻于西苑（洛阳城西御苑），准备一旦危急便向西奔逃。于是江淮财赋经汴渠转输入关中的通道又被断绝。

面对李希烈之叛，德宗问计于宰相卢杞，卢杞欲害颜真卿，乃曰：“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②德宗即命颜真卿往许州宣慰李希烈。颜真卿在许州受到百般辱骂和威胁，然不为所动，李希烈留而不遣，后竟为所害。

德宗见颜真卿囚于许州不归，于是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凤翔、邠宁、泾原3镇兵及奉天（今陕西乾县）、好畤（今陕西乾县东）行营神策军共万余人，东讨李希烈。又命江西节度使李皋、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山南节度使贾耽、永平节度使李勉等，率诸道兵共同讨伐。

二、襄城之战

哥舒曜奉命东讨，行至郏城（今河南郏县），击败李希烈部将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正月。

陈利贞所率的前锋部队，获得小胜。李希烈遣其将封有麟占据邓州（今属河南），断绝江淮财赋入关中之南路。建中四年（783年）二月，哥舒曜又攻下汝州，擒李希烈所属之刺史周晃。三月，江西节度使李皋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击败李希烈部将韩霜露，并进攻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北）。当时，李希烈派兵驻守蔡山（位于今湖北黄梅境内），险阻难攻。李皋声言西攻蕲州，率水军沿长江逆水而上，驻守蔡山的军队沿江紧追不舍，离蔡山300里时，李皋突然回军，顺流而下，乘蔡山防守空虚之机，一鼓而下。李希烈的军队发现后，已来不及援救，只好败退而去。李皋乘胜攻下蕲州，接着又攻下黄州（治今湖北新洲）。

在唐军连续胜利的形势下，李希烈集团人心惶恐，纷纷自谋生路。其都虞候周曾、兵马使王玢、押牙姚儋、韦清等，秘密遣人向永平节度使李勉联系，欲归顺朝廷。当时，周曾与康秀琳率兵3万欲进攻哥舒曜，行至襄城（今属河南），打算回军许州袭击李希烈，并约王玢、姚儋、韦清等为内应。此事为李希烈所知，于是遣副将李克诚率精锐骡军3000人，袭击襄城，杀死周曾，又杀王玢、姚儋等人，唯韦清得以逃脱。李希烈派去进攻郑州（今属河南）、尉氏等地的军队闻听事变，也纷纷退回许州。李希烈见形势不妙，上表悔过，把反叛责任推到周曾等人身上，自己领军返回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实际是在等待朱滔等镇的援助。

德宗深恨李希烈，不赦其罪，下诏有能斩其首者，四品以上官即授以李希烈原职，五品以下官食封400户，民蠲免三年赋税徭役。四月，命神策军使白志贞募禁兵以击李希烈，又命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副使；命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李皋为副使。分别督率诸道兵共同讨伐。哥舒曜部奉命迅速进兵，行至颍桥镇（今河南襄城东北），遇大雨，退保襄城（今属河南）。李希烈遣部将李光辉率军攻襄城，被哥舒曜击退。

八月，李希烈亲自统兵3万包围襄城。德宗急命永平节度使李勉与神策军将刘德信出兵援救。九月，李勉命宣武镇大将唐汉

臣率万余人，会合刘德信所率3000军队前往解围。当时，李勉上奏说："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①同时命二将率军向许州进发，途中，德宗遣中使（宦官）至，责其违诏，二将狼狈而返。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于半途伏击，唐军死伤大半，唐汉臣率军逃往汴州，刘德信逃往汝州（治今河南临汝）。李希烈游骑四处剽掠，最远到达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逼近东都（今河南洛阳东）。李勉急遣其将李坚率兵4000助守东都，李希烈派兵断其后路，截断了东都与汴州联系，李勉自顾不暇，襄城更加危急。德宗又调泾原等镇兵援救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5000东进，途经京师长安，发生兵变（详见本章第六节），德宗仓皇逃出长安。此后唐军忙于平定泾原兵变，无力援救襄城。哥舒曜在襄成坚守多日，粮草用尽，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退守东都，李希烈遂夺得襄城。

三、李希烈称帝及其失败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奉诏讨李希烈，屯兵盱眙（今属江苏），听到泾原兵变的消息后，退回广陵（今江苏扬州）。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也闭关以自保。二人还强行抢夺输往京师的钱帛。当时，南方藩镇多闭境自守，唯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多次遣使贡献。

李希烈夺得襄城后，派兵围攻汴州，李勉坚守月余，因无外兵援救，只好放弃汴州，退往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李希烈攻下汴州后，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刺史李澄大惧，遂以城投降。接着李希烈又攻下襄邑（今河南睢县），并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江、淮大震。陈少游见李希烈势大，遣使向其献计，诱其南下江淮。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希烈称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设置百官，分境内为4节度。

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张建封上书德宗，陈述陈少游与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九月。

李希烈勾结之状，德宗即以张建封为濠（治今安徽凤阳东北）、寿、庐（治今安徽合肥）3州都团练使。李希烈命其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率兵万人先取寿州，然后攻扬州。张建封命部将于霍丘（今属安徽）立栅设防，杜少诚无法通过，只好南攻蕲（治今湖北蕲春）、黄（治今湖北新洲）等州，欲迂回截断淮南与江南的联系，攻张建封后路。李皋遣兵7000命蕲州刺史统率，拒战杜少诚于永安戍（今湖北黄州境内），大破其军。

李希烈又命其骁将董侍率敢死之士7000人，进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武昌），刺史李兼偃旗息鼓闭城以待，董侍焚门进攻，李兼率军突出，大破董侍之军，鄂州遂安。李兼因功升任为鄂、岳（治今湖南岳阳）、沔（治今湖北武汉汉阳）3州都团练使。于是，李希烈东畏李皋，西惧李兼，不敢再有窥探江、淮之志。

李希烈围攻宁陵日久不下，乃引水冲灌，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刘昌率3000人昼夜防守，45日兵不解甲。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遣其将王栖曜率数千强弩手援救宁陵，王栖曜乘夜暗敌军不备之机，游过汴水进入宁陵城。第二天，强弩手从城上猛射攻城叛军，弩箭射抵李希烈所张幄伞，李希烈大惊说："宣润弩手至矣"①，遂引兵解围退去。韩滉解宁陵之围后，又遣使贡献绫罗、米等物入关中，以表示对唐廷的忠心，实际是以补前过。

七月，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为了保证江南漕运之道的畅通，派其将伊慎、王锷围攻安州（治今湖北安陆）。李希烈派其甥刘戒虚率兵8000前往救援，李皋另派别将李伯潜于应山（今属湖北）截击，大破其军，斩首千余，生擒刘戒虚。安州守将见救兵已败，遂以城投降。

十月，李希烈遣其将翟崇晖围攻陈州（治今河南淮阳）。滑州刺史李澄降李希烈后，见其屡败，又见其留在汴州的军队不多，不能对己形成威胁，遂归顺朝廷，德宗授以汴滑节度使。宋亳节度使刘洽遣刘昌与曲环率兵3万往救陈州。十一月，败翟崇晖于陈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唐纪四十六》，德宗兴元元年二月。

州之西，斩首3万多级，并生擒翟崇晖。然后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大惧，放弃汴州，逃往蔡州，汴州守将田怀珍投降。李澄接受了李希烈郑州守将孙液的投降，遂引兵占据郑州。不久，李澄被改任为郑滑节度使。

贞元元年（785年）三月，李希烈又攻陷邓州（今属河南）。四月，李希烈部将李思登以随州（今属湖北）降。贞元二年（786年）二月，李希烈遣部将杜文朝攻襄州（治今湖北襄樊），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败，并生擒之。三月，李希烈又派兵攻郑州，被李澄击败。至此，李希烈兵势日衰，已呈败亡之势。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死李希烈，并诛杀其兄弟妻子，举众归降，德宗即以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第六节　对朱泚、李怀光作战

（参见附图15）

为了讨伐淮西李希烈，唐廷调泾原兵东进平叛，途经长安时因犒赏太薄，激起兵变。乱军拥朱泚为主，占据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在平朱泚之乱中，唐廷因处置不当，又激起前来参加平叛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反叛，使局势更加复杂。幸赖李晟、马燧、浑瑊等将力战，唐廷才得以平定这场叛乱。

一、泾原兵变与朱泚雄据长安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5000人东进以救襄城（今属河南）之危，路过长安，天下大雨，“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①。走到浐水，德宗命京兆尹王翃犒军，唯糙米蔬菜。士兵愤怒，掀翻饭菜于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十月。

地，扬言说："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①。士兵们鼓噪返回京师，百姓狼狈奔走。德宗见发生兵变，急召禁军拒战，竟无一人应诏。德宗只好携妃嫔、太子、诸王、公主以及宦官百余人，在右龙武军400余人的保护下，仓皇逃出大明宫，当夜到达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第二天，又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左金吾大将军浑瑊闻变赶到奉天。浑瑊是一名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他的到来，使奉天慌恐的人心逐渐稳定下来。

泾原士兵进入长安后，在姚令言的策动下，拥立闲居在京的太尉朱泚为主。朱泚在泾原士兵的拥护下，入大明宫居含元殿，自称权知六军。朱泚是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其父为安、史部将。年轻时与弟朱滔同为李怀仙部将，此人"外宽和，中实很刻"②。朱希彩为卢龙节度使时，颇得信任。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被部下所杀，士卒拥朱泚为帅，代宗任以节度留后，不久，升为节度使。3年后，自求入京朝谒天子，赏赐颇厚。其弟朱滔利用代行其职的机会，发展自己势力，朱泚自知失权，请求留居长安。德宗即位后，任凤翔节度使。后泾原将刘文喜叛乱，诏朱泚与李怀光率兵平叛。刘文喜勾结吐蕃，引起部下不满，裨将刘海宾率众杀死刘文喜，"入泚军，泚一无所戮，由是泾人德之"③。这是泾原士兵拥立朱泚的主要原因。朱滔叛乱时，遣人送信给朱泚相约谋逆，被马燧截获其信，并献于德宗，德宗召朱泚入京，虽无治其罪，然留居京师，不遣返回镇，并派宦官监视，引起朱泚的不满。这是朱泚叛唐称帝的内因。

兵变发生后，许多失意的唐朝文臣武将，纷纷劝朱泚称帝。朱泚因时机尚未成熟，未敢答应。几日后，前往救襄城的凤翔、泾原将张廷芝、段诚谏，将出潼关（今陕西潼关北）时，听到朱泚占据长安的消息，率数千人返归朱泚。"泚于是自谓众心所归，谋反遂定。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十月。

②③ 《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朱泚传》。

……百司供亿，六军宿卫，咸拟乘舆”①。在朱泚即位的前两日，他遣泾原兵马使韩旻率精兵3000人，声言奉迎天子回京，实际是想乘奉天守备不严，袭取奉天。前泾原节度使、司农卿段秀实忠于唐室，知道奉天兵力寡弱，如果韩旻前去偷袭，很有可能失守，于是他盗用司农卿印符，遣善走者去追韩旻，骗其返回长安，挫败了朱泚阴谋。当天，朱泚召集段秀实等议事，段秀实夺取象笏，袭击朱泚，中其前额，溅血洒地，朱泚脱走，其部下争前杀死段秀实。

这时，凤翔（今属陕西）将李楚琳作乱，杀死节度使张镒，降于朱泚。与其同降的还有陇州（治今陕西陇县）刺史郝通。于是，朱泚认为羽毛已丰，称帝的时机成熟。

二、朱泚称帝与唐军收复长安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初八，朱泚徙居大明宫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设置百官，以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二人共掌国事。“凡泚之谋画、迁除、军旅、资粮，皆禀于休。休劝泚诛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绝人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②。

（一）奉天之战

德宗在奉天避难，消息传开后，各地勤王军队逐渐汇集。右龙武将军李观率兵千人，又招募5000余人，“列之通衢，旗鼓严整，城人为之增气”③。泾原留后冯河清、知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事姚况，“闻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④。奉天当时正缺兵器甲仗，得之，士气大振。

朱泚称帝后，以仇敬忠为同华节度使，向东扩展，以拒关东之师；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留守长安；以李日月为先锋经略使，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副元帅，在朱泚率领下，向西进攻奉天。

邠宁节度留后韩游瓌奉诏统兵3000人前往渭河便桥拦截朱

①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十月。

泚军，在醴泉（今陕西礼泉东北）与朱泚军队相遇，韩游瓌见叛军已过渭桥，担心奉天守军兵力薄弱，遂引军退往奉天，朱泚也随后赶到，包围了奉天。唐军出战迎击，受挫，朱泚军争先抢入城门，京畿、渭北节度使浑瑊率甲士以长刀砍杀，并以草车数乘堵塞城门，纵火焚烧，与韩游瓌一同率军乘火进击，朱泚军始退。长安西明寺和尚法坚为朱泚军制造梯冲，以为攻城之具，昼夜围城攻打，浑瑊、韩游瓌等率军严密设防，战斗异常激烈。不久，代宗时幽州遣往关中防秋的兵士，在前往襄城途中，听到朱泚称帝的消息，突入潼关，到奉天加入朱泚围城部队中。在普润（今陕西凤翔北）戍守的神策军之一部也加入朱泚军队，使其兵力达数万之众。奉天更加危急。

朱泚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奉天，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朱泚再攻，将军高重捷与朱泚部将李日月战于奉天城北梁山，大败朱军，乘胜追杀，被朱军伏兵活捉，部下 10 余人拼死追夺，朱军乃斩其首弃尸而逃。回城后德宗亲自哭祭埋葬。此战，李日月也被唐军杀死，朱泚送回长安安葬，李日月母见尸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①

十一月，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留后杜希全、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刺史戴休颜，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刺史时常春会合渭北节度使李建徽之兵共万余人，入援奉天。德宗召集群臣商议该军进军道路，浑瑊认为漠谷道险狭，恐为敌军伏击，主张顺乾陵柏林而行，驻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犄角相应。宰相卢杞认为从乾陵而过，恐怕会惊扰先帝陵寝，主张从漠谷进军。德宗听从卢杞意见。当杜希全等率军经漠谷而过时，果然遭到敌军伏击，强弩巨石，击杀甚众，城中出兵接应也被击败，这支军队只好退往邠州（治今陕西彬县）。朱泚击败援军后，移帐于乾陵，城中动静，皆可窥见。又命环城掘堑，日夜围攻。奉天被围月余，资粮俱尽，连德宗所食只余粝米 2 斛。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十月。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本来在魏州（治今河北大名北）前线参与讨伐田悦的作战，听到奉天危急的消息，昼夜前进，经河中（治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有众5万，直趋泾阳（今属陕西）。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也从魏州退军，边走边收编零散士卒，原来只有4000人，到达东渭桥时已达万余人。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在襄阳参与讨伐李希烈的作战，此时自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入援，率军3000人，击败朱泚部将仇敬忠，攻下蓝田（今属陕西）。镇国军副使骆元光从潼关向华州（治今陕西华县）进攻，攻下华州后，招募得万人，自率2000人进军至昭应（今陕西临潼西），威胁长安。德宗任其为镇国军节度使。河东节度使马燧遣其子马汇与部将王权率兵5000人入援，屯于中渭桥。

李忠臣守长安，见唐军四集，屡次出兵皆为所败，求援于朱泚。朱泚欲救长安，于是急攻奉天。西明寺僧法坚所造云梯，高数丈，裹以皮革，下施巨轮，上可容士卒数百人，用以攻城。朱泚先攻城南，以吸引唐军，实攻城东北，“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①。浑瑊身中流矢，奋战不息，并激励士卒，拼死力战。云梯靠近城边时，一轮陷入唐军事先挖好的地道中，不能前进，唐军从地道放火，城上人投掷火炬、松脂、膏油，烧毁云梯，梯上士卒全部死亡，无一幸免。唐军乘势开门出击，太子亲自督战，敌军大败，杀伤数千人。

李怀光从泾阳向西疾速进军，为了使奉天军民及德宗宽心，遣使者混入奉天。奉天军民得知李怀光大军将至，欢声雷动，士气大增。第三日，李怀光击败朱泚布置在醴泉的军队。朱泚大惧，引兵退回长安，奉天之围遂解。“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城不守矣”②。

（二）李怀光反唐

在李怀光的朔方军和李晟的神策军入援之前，唐军处于劣势地位，两军到达后，不但解除了奉天之围，而且包围朱泚于长安，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唐纪四十五》，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

使形势发生变化，唐军由劣势转化为优势。

李怀光从河北增援关中时，常言天下之乱，是由宰相卢杞等人所酿成的，声言他如果见到德宗，一定要当面揭发卢杞等人罪恶。奉天之围既解，李怀光自以为立有大功，德宗必然以大礼相待。卢杞害怕李怀光见到德宗后于己不利，便对德宗说："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①。德宗以为然，下诏命李怀光直接率军屯渭水便桥，与李晟等共取长安。李怀光自以为数千里竭诚赴难，又建立大功，竟咫尺不得见天子，心中不满，说："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②遂屯兵咸阳不进，并数次上表揭发卢杞罪恶。舆论哗起，皆怨卢杞等人，德宗不得已，于十二月贬卢杞为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司马。宦官翟文秀，为德宗所宠信，李怀光又言其罪，迫使德宗诛杀之。

李怀光逼走卢杞，心中不安，遂生异志。又见李晟独当一面，心中不满，恐其成功，奏请与李晟合为一军，德宗同意。于是，两军会合于咸阳西的陈涛斜，筑垒未毕，朱泚军攻到。李晟认为是大举出击的好机会，主张全力出击歼灭敌军。李怀光认为军队长途行军，人马未食，不可马上出战。唐军闭垒拒守，朱泚进攻不利，乃退去。李怀光部军纪松弛，每出动多掠民间牛马财宝，李晟军秋毫不犯。李怀光军士恶其异己，分所掠物给李晟军士，李晟军士始终不敢接受。李怀光屯驻咸阳，月余不进兵，德宗屡次派使催促，怀光总是以士卒疲惫为由推辞。诸将数次进言，劝他进攻长安，均不从，反而秘密和朱泚联系，合谋叛乱。李晟恐为李怀光吞并，请求移军屯东渭桥，德宗仍寄希望于李怀光悔悟，不同意李晟所奏。李怀光还以诸军衣粮赏赐厚薄不一为由，煽动士卒的不满情绪，又阻止唐廷借吐蕃军收复长安的行动。陆贽认为李怀光心怀不轨，劝德宗以分叛军之势为由，允许李晟移军别屯。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唐纪四十五》，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

于是李晟一军移屯东渭桥，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仍与李怀光军联营驻扎。陆贽认为这两军也应该移营，德宗恐李怀光疑心，不许。德宗还打算亲率禁军到咸阳催促李怀光进军，有人对李怀光说这是汉高祖游云梦、擒韩信之策，于是李怀光大惧，反谋更甚。德宗加授其太尉，赐以铁券，李怀光掷铁券于地，并杀害反对他谋反的部将。夜袭李建徽、杨惠元二军，杀杨惠元，并致书韩遊瓌约为内应，欲袭取奉天，韩遊瓌告知德宗。德宗见其势大，遂向南逃至梁州（治今陕西汉中）。李怀光又派兵追赶，其领兵部将忠心未泯，纵兵向东剽掠而回，以追之不及为辞进行敷衍。

当时，韩遊瓌屯邠、宁（治今甘肃宁县），戴休颜屯兵奉天，骆元光屯兵昭应，尚可孤屯兵蓝田，德宗命皆受李晟节制，故李晟声势日强。

李怀光反叛后，其部下多叛离，势力日衰。在李怀光军力强盛时，朱泚与其书信往来，以兄相称，此时见其势衰，乃赐以诏书，以臣礼对待。“怀光惭怒，内忧麾下为变，外怒李晟袭之，遂烧营东走，掠泾阳等十二县，鸡犬无遗”①。行至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其大将孟涉、段威勇率数千人，投奔李晟。接着其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的大将赵贵先，在坊州（治今陕西黄陵东南）的大将符峤，也归顺朝廷。李怀光势力更加衰弱，遂逃入河中，以求自保。

（三）唐军收复长安

德宗兴元元年（784 年）四月，浑瑊率诸军出斜谷（谷口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是古代关中与汉中之间的通道之一），韩遊瓌遣兵 3000 往会，吐蕃也派兵参战。遂攻下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大败朱泚大将韩旻于武亭川（位于今陕西乾县西，武功西北），斩首万余级。浑瑊率兵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呼应，威逼长安。

长安城中士卒见朱泚势力日益衰弱，日夜有潜出城投降者，并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唐纪四十六》，德宗兴元元年三月。

报告城中军情。五月，李晟见时机已经成熟，乃通知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等，约期汇集于京城之下，准备大举进攻。

李晟召集诸将商议进攻长安计划，诸将“皆请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晟曰：‘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扰，策之上者也！’诸将皆曰‘善！’”① 诸军汇集后，李晟下令移军于光泰门（长安东门）外米仓村。朱泚派骁将张庭芝、李希倩领兵反攻。李晟对诸将说：“始吾忧贼潜匿不出，今来送死，此天赞我，不可失也！”②命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率兵出击。当时骆元光率领的华州兵较弱，叛军并力攻之。李晟急派部将李演率精兵营救，大败叛军，乘胜攻入光泰门，因天黑，李晟收军而回。当夜，城中传出叛军士卒恸哭声。李晟见敌军丧胆，遂不等浑瑊军赶到，命诸将全力进攻，屡次挫败敌军反击。然后命部将李演、王佖率骑兵，牙将史万顷率步兵，直抵苑北。在此之前，李晟已派人拆毁苑墙200余步，等到李演等率军赶到时，叛军已在缺口处设栅防御，官军不得入。李晟大怒，督诸将猛攻，唐军破栅而入，叛军大溃。姚令言犹力战不退，李晟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率步骑猛冲，战10余合，叛军溃散退走。朱泚与姚令言率万余人出城向西逃走，余众投降官军。李晟派部将田子奇率骑兵追击朱泚。浑瑊、韩遊瓌等在攻克咸阳后，得知朱泚逃走，也分兵截击。朱泚想逃往吐蕃，途中部众散逃，到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时，只剩下百余骑。后为其部下所杀，首级献于朝廷。

李晟入长安后，严肃军纪，处斩违纪军士，故“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③。并命京兆尹李齐运安抚居民，严惩附贼官员。朱泚屯在城外军队5000人，在其逃走后，由其部将张光晟率领全数投降李晟。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五月。

三、河中之战与李怀光的覆灭

（一）德宗讨伐李怀光的部署

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德宗自兴元（今陕西汉中）发车驾回京，七月回到长安。

李怀光的判官高郢劝他归顺朝廷，怀光遂遣其子李璀前往谢罪，请求允许束身归朝。德宗以给事中孔巢父为使，遣往河中宣慰，并恢复所免官爵。孔巢父到河中后，李怀光素服待罪，其左右见李怀光素服，误以为李怀光已被削夺官爵，宣诏未毕，即发怒喧噪，杀死孔巢父，李怀光也不加制止，后又整顿兵事准备抵御朝廷讨伐。

德宗见李怀光反复，心中忧愁。这时李泌已从杭州（今属浙江）刺史任上调回京师，充任散骑常侍，德宗召见问曰："河中密迩京城，朔方兵素称精锐，如达奚小俊等皆万人敌，朕昼夕忧之，奈何？"李泌回答说："天下事甚有可忧者，若惟河中，不足忧也。……怀光既解奉天之围，视朱泚垂亡之虏不能取，乃与之连和，使李晟得取以为功。今陛下已还宫阙，怀光不束身归罪，乃虐杀使臣、鼠伏河中，如梦魇之人耳！但恐不日为帐下所枭，使诸将无以藉手也。"① 德宗遂下诏讨伐李怀光，以浑瑊为河中、绛州（治今山西新绛）节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加马燧为奉诚军（今陕西大荔）、晋（治今山西临汾）、慈（治今山西吉县）、隰（治今山西隰县）节度使，充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与镇国（治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骆元光、鄜（治今陕西富县）坊（治今陕西黄陵东南）节度使唐朝臣等，共同出兵，进攻河中。

又命李晟兼凤翔（今属陕西）、陇右节度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负责关中西部军事，防止吐蕃侵扰，以保证讨伐李怀光后方基地的安全。十月，有司因李怀光所部将士数万与李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七月。

怀光同反，不发给冬衣。德宗说："朔方军累代忠义，今为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特地下诏："朔方及诸军在怀光所者，冬衣及赏钱皆当别贮，俟道路稍通，即时给之。"① 这是一种分化瓦解叛军的手段。后来李怀光部众相继归降唐军，除了军事因素外，唐德宗的这种政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李怀光的覆灭

李怀光遣部将阎晏进攻同州，唐军迎击于沙苑（今陕西大荔南的渭河与洛河之间），失利。德宗命邠州之军前往援助，韩游瓌亲率6000人驰援。马燧所率一军直趋绛州，一鼓而下，并分兵攻下周围数县，然后进屯宝鼎（今山西万荣西）。在陶城（今山西永济西北）大败李怀光军，斩首万余级，乘胜与浑瑊军直逼河中。

贞元元年（785年）四月，马燧、浑瑊军在长春宫（位于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南大败李怀光军，掘壕堑围宫城，李怀光部下诸将相继有来降者。

由于连年旱荒，资粮匮乏，朝臣多请求赦李怀光之罪。李晟认为不可，指出："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多兵则未为示信，少兵则不足堤防，忽惊东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怀光，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瑊既无所诣，康日知又应迁移，土宇不安，何以奖励，二也；陛下连兵一年，讨除小丑，兵力未穷，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有淮西，皆观我强弱，不谓陛下施德泽，爱黎元，乃谓兵屈于人而自罢耳，必竞起窥觎之心，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叙勋行赏，今府库方虚，赏不满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即解河中，罢诸道兵，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甚众。且军中大将杀戮略尽，陛下但敕诸道围守旬时，彼必有内溃之变，何必养腹心之疾为他日之悔哉！"② 请求发兵2万，自备资粮，独讨李怀光。不久，马燧入朝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六月。

也奏称不可赦免李怀光，指出如果能补充一月的粮草，就一定能扫平叛乱。德宗深恨李怀光，也同意不予赦免。

八月，马燧返回行营，与诸将商议说："长春宫不下，则怀光不可得。长春宫守备甚严，攻之旷日持久，我当身往谕之。"① 遂直至城下，呼守将徐庭光名，劝其不要与朝廷作对，徐庭光表示愿意归顺朝廷。于是，马燧与浑瑊、韩遊瓌等移军直攻河中。到焦离堡（今山西永济北）时，守将尉珪率众归降。是夕，李怀光举火，诸营不应。河中夹黄河分东西城，城中军士自相惊扰，西城军士说东城整队欲归降，东城人说西城已降，于是，军士皆自动易其号为"太平"二字。李怀光见军心如此，知道大势已去，遂自缢而死，其将牛名俊断李怀光首出降。此时，河中降兵共计 1.7 万人，马燧只斩李怀光部将阎晏等 7 人，余皆不问。马燧自长安辞德宗赴行营，到攻下河中，共计 27 天时间，其间并无大的战斗，就扫平了李怀光叛乱。

四、德宗平叛战争的经验教训

代宗时对强横藩镇一味姑息，留下了很坏的历史影响。德宗继位之初，欲革前弊，在李惟岳袭位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欲维护朝廷威信，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他在对待藩镇问题上，缺乏充分的军事与政治准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和政治策略，因而施政无一定之规，朝三暮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又听不进正确的意见，固执己见，使得这一时期削平叛镇的战争，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反而危机四起，使唐朝的统治几乎崩溃，其教训非常深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不设战场主将，讨伐军缺乏统一指挥。如在河北战场上，对马燧与李抱真二人都无明确谁是主将，二人又有宿怨，致使田悦战败后，二人都顿兵不追，使其从容退回魏州，作好防御准备。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元年八月。

当时田悦部将李长春有归降之意，田悦败回魏州时，李长春闭门不纳，“以俟官军”①，如果唐军紧追不舍，田悦肯定覆灭无疑。后来，德宗发现二人不合，仍不采取措施，只派中使为之和解，实则无济于事。最后幸而李晟面责马燧，使之感悟，马、李二人才和好共事。

2、不信任前线将领，多有“縻军”② 之误。河南战场本来由李勉全面负责，为救襄城，李勉制定了围魏救赵的方略，派唐汉臣、刘德信率兵袭取许州，以调动李希烈军回救。德宗却派中使责二将违诏，迫使其回军，结果中了埋伏，死伤大半，襄城之围遂不可解。不信任军事将领，却轻信不懂军事的文臣意见。在灵武，盐夏军队入援奉天时，不听浑瑊建议，走乾陵道，却听卢杞意见走漠谷道，致使援军中伏大败，奉天几乎陷落。

3、言而无信，赏罚不明。德宗在平定李惟岳时，宣布得李惟岳首者，即以其官爵授予。但王武俊、朱滔灭李惟岳后，德宗不兑现前言，致使二将怨恨而生反叛之心。李怀光千里率军解奉天之围，功勋卓著。德宗本应亲自接见，厚加封赏，却听信卢杞谗言，命他直接攻取长安，不必来奉天朝见。使李怀光认为自己为奸臣排挤，遂与唐廷离心离德，造成了“旧寇未平，新患方起”③的混乱局面。

4、未将军事打击和政治手段密切结合起来。王夫之说：“唐自安史以后，称乱者相继而起，至于德宗之世，而人亦厌之矣。故田悦、李惟岳、朱滔、李怀光之叛，将吏士卒皆有不愿从逆之情，抗凶竖而思受王命。”④唐廷本应利用这种趋势，采取灵活的手段，将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结合起来，以达到彻底平叛、长治久安的目的。然而，唐廷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不重视对叛镇的分化工作，对可以争取的力量也未能积极争取；甚至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致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三年正月。

② 《孙子兵法·谋攻篇》。

③④ 《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德宗十五》。

使一叛未平，一叛又起；不善标本兼治，从政治上凝聚人心，巩固军事胜利成果，堵塞乱源，求得久安。古人云："兵之胜败，本在于政。"① 德宗朝叛事屡兴，战争频仍，不惟军事不力，更在其"德"不足。

后来，德宗吸取了一些教训，马燧讨李怀光时，德宗力主朔方军的冬衣赏赐仍然按额发给，暂且贮存，待事平后予以颁领。就收到很好的效果，使李怀光部众纷纷归顺，无经大战就彻底扫平河中。在专任大将问题上，陆贽建议说："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兵势无常，遥为规画，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羁碍，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则将帅感悦，智勇得伸"②。德宗鉴于以前教训，听取了这个建议，以李晟为主将，负责收复长安，兵虽不多，但却获得较大的战果。

第七节　反击吐蕃侵扰的作战

唐德宗继位之初，为削平藩镇之叛，对吐蕃采取和平政策，遣还俘获的吐蕃之人，派使者与其约和。吐蕃也遣使入唐，并贡献方物。建中四年（783 年）正月，双方结盟于清水（今甘肃平凉西北）。二月，又会盟于长安之西。兴元元年（784 年）四月，吐蕃出兵助唐讨朱泚之叛，与浑瑊所率唐军共同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之北的武亭川，大败韩旻所率的朱泚军队，斩首万余级。然吐蕃在帮助唐朝的同时，又接受朱泚所赠金帛，击败韩旻后，便大掠而去。此后，吐蕃多次侵扰唐朝边境，破坏生产，抢掠人口财物。唐朝采用联合南诏、回鹘，孤立吐蕃的策略，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

① 《淮南子·兵略训》。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五月。

一、吐蕃侵扰河陇与唐朝组织反击

（一）摧沙堡、合水之战

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八月，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大军大举入寇，攻略泾（治今甘肃泾川西北）、陇（治今陕西陇县）、邠（治今陕西彬县）、宁（治今甘肃宁县）等州，抢掠人畜，割取禾稼，州县各自为城守。德宗遣浑瑊率万人，河中节度使骆元光率8000人，会同左金吾将军张献甫，神策军将李升云、苏清沔等统兵屯于咸阳，以防御吐蕃。九月，吐蕃前锋进至好畤（今陕西乾县东），京师震动，全城戒严，德宗甚至做好再次出京避难的准备。

凤翔节度使李晟见京城危急，遣其将王佖率精兵3000埋伏于汧城（今陕西千阳西），并说："虏过城下，勿击其首，首虽败，彼全军而至，汝弗能当也。不若俟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①王佖依计袭击吐蕃中军，大败之，由于唐军军士不识尚结赞，才使他侥幸逃脱。吐蕃整军重战，攻至凤翔（今属陕西）城下，李晟出兵迎击，吐蕃退去。此次吐蕃军到凤翔，不抢掠俘获，只在城下大喊："李令公（指李晟）召我来，何不出犒我？"②当唐军出城迎战，吐蕃军却不战而退，其主要目的在于离间唐朝君臣关系，使德宗怀疑李晟而不重用他。因为尚结赞在汧城大败后，认为"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③。这次行动是其离间计的内容之一。

十月，李晟乘胜遣兵5000，命王佖与野诗良辅率领，袭击吐蕃摧沙堡（今宁夏固原西北）。这里是吐蕃的军需供应基地，巨堑长壕，重复环绕，守备甚严。唐军在途中与吐蕃军相遇，经过奋力拼杀，以少胜多，大败吐蕃军，乘胜追击，直至摧沙堡下。由于吐蕃军屡次败于李晟之军，胆气尽丧，唐军乘吐蕃军惊魂未定、士气低落之机，一鼓作气，向摧沙堡发动猛攻。攻占该堡后，尽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二年九月。

焚吐蕃蓄积物资，然后胜利回师。此役斩吐蕃大将扈屈律悉蒙等7人，传首京师。

吐蕃尚结赞战败后，自宁、庆（治今甘肃庆阳）2州，向北退去，屯驻于合水（今甘肃庆阳东北）。邠宁节度使韩遊瓌遣部将史履程率军乘夜偷袭吐蕃大营，杀数百人。吐蕃军依仗人多，追击唐军。韩遊瓌率军列阵于平原之地，暗中派人于西面山上击鼓，吐蕃军以为遭到夹击，不敢恋战，抛弃所掠物资，狼狈逃窜而去。

（二）盐州之战

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吐蕃攻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刺史杜彦光不敢抵抗，派人以牛酒犒劳，并率众让出州城，逃往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十二月，吐蕃攻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刺史拓跋乾晖率众逃走，州城陷落。接着吐蕃军又攻占银州（治今陕西榆林南）、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

十二月，韩遊瓌奏请出兵收复盐州，如吐蕃发兵救援，则使河东马燧出兵攻击其背。德宗遂命骆元光、韩全义率步骑1.2万，会同韩遊瓌的邠宁军，直趋盐州。马燧率河东军队到达石州（治今山西离石）黄河河曲六胡州（唐称宥州，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乌海至鄂托克一带）诸部族皆归降，唐廷下令将其迁往云（治今山西大同）、朔（今属山西）2州安置。

吐蕃占据盐、夏等州后，各留千人防守，尚结赞率大军退屯鸣沙（今宁夏吴忠西南）。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尚结赞得知马燧等部唐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又见李晟攻下摧沙堡，加之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心中恐惧，屡次遣使求和，德宗皆不许。吐蕃无奈，转而遣使带厚礼卑辞求和于马燧，表示愿意重修清水之盟，归还所占之地。马燧信其言，不再进军，亲自入京朝见德宗，为吐蕃求和之事当面陈请。马燧入京后，唐军其他诸部皆按兵不动，闭垒不战。尚结赞见唐军未发动攻势，急忙率军自鸣沙退回本国。由于战马多死，军中多步行者。唐朝丧失了一次很好的战机，遂使对吐蕃的战争旷日持久，劳民伤财，边境长期不得安宁。

六月，吐蕃在盐、夏等州的军队，因粮运不继，且多病疫，人心思归，尚结赞遣 3000 骑兵接应，遂焚毁庐舍、城池，驱赶当地人民一同退回本国。吐蕃军退后，唐军分兵前往戍守。

（三）吐蕃诈和与唐军失利

对于吐蕃的此次求和，李晟、韩游瓌的看法和马燧不同，他们认为吐蕃素不讲信义，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不如出兵进击。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说："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复也。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① 马燧与宰相张延赏和李晟不睦，争言会盟的好处，德宗因恨回鹘，想和吐蕃联合，共击回鹘，于是会盟之事便这样确定下来。

德宗命崔澣为使，出使吐蕃与尚结赞商谈会盟事宜。尚结赞提出由浑瑊、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三人参预主盟，实际目的在于劫持杜希全、李观二帅，以夺取泾、灵两地。德宗不同意杜、李二人参加盟会，只派浑瑊为清水会盟使，并令吐蕃先归还盐、夏 2 州。吐蕃答应待定盟后即归还。五月，浑瑊率兵 2 万赴盟会。在浑瑊离开长安时，李晟告诫他在盟所要严加防备。张延赏对德宗说："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德宗召见浑瑊，"切戒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②。

双方确定以平凉川（今甘肃平凉西北）为会盟之所。为了防备万一，德宗命骆元光率军屯潘原（今甘肃平凉东），韩游瓌率兵屯洛口（今甘肃静宁东北），为浑瑊后援。骆元光认为潘原距会盟之所 70 里，一旦有事，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无法赴援，要求与浑瑊同往。浑瑊以德宗诏旨阻止，骆元光不从，与浑瑊连营而行，在距盟所 30 余里处扎营。骆元光营壕深栅固，浑瑊营壕浅栅低。骆元光还伏兵于营寨之西，韩游瓌也遣 500 骑兵伏于其侧，共同策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闰四月。

应浑瑊。

浑瑊与尚结赞相约，双方各以兵3000人分列于盟坛东西。将盟之时，又相约各增加游动骑兵交错互相监察，吐蕃游骑穿过唐军阵地时，唐军依约没有阻拦。而唐军的60名游骑刚到吐蕃军阵地时，即被扣留，因为尚结赞埋伏数万精锐骑兵于坛西，恐怕为唐军所侦知，故扣留唐游骑。这一切浑瑊全然没有觉察。尚结赞又遣人对浑瑊说："请侍中（指浑瑊）以下服衣冠剑珮以俟命。"①想诱浑瑊下马，以便劫持。浑瑊与监军宋凤朝等人刚下马进入幕帐，吐蕃军击鼓三下为号，呼噪而至，欲捉拿浑瑊等。浑瑊急出幕后，抢到一匹马，急驰奔回，"时，马不加衔，瑊伏于鬣而手加之，凡驰十余里，衔方及口，故追骑之矢，过而不伤焉"②。唐军大乱，向东逃跑，吐蕃军追击不舍，杀数百人，俘获千余人。重要官员及中使被擒者达60余人，宋凤朝等人被杀。吐蕃追兵见骆元光军严阵以待，惊愕不已，又见韩游瓌所伏之军向西急驰，前来增援，不敢恋战，乃退。浑瑊入骆元光营，在其帮助下，收拾溃散兵卒而返，退至奉天屯驻。

吐蕃此次诈和带有一定的战略目的。"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三人，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③。李晟在此之前已被罢去兵权，留居长安。马燧此次主和，误中吐蕃之计，德宗"由是恶马燧"④。不久，被罢节度使之职，以其部将李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四）北庭、安西的失陷

自从安史之乱河、陇地区失陷于吐蕃后，北庭、安西因通往内地的道路被切断而与唐朝失去联系，此后当地守将虽多次遣使奉表，皆没有能够到达长安。贞元二年（786年），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遣使借道于回鹘，终于抵达长安，与朝廷取得了联系。

---

①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六月。

德宗大喜，任命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安西四镇节度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①。同年五月，又改任杨袭古为北庭大都护，以接替李元忠，李元忠于当月病死②。尽管安西、北庭经过回鹘取得了与唐廷的联系，然“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③，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当时有沙陀别部6000余帐，与北庭相依，又有葛逻禄三部、白服突厥等皆依附于回鹘，回鹘对这些部族大肆搜刮勒索，极尽欺压侵掠之事，引起了北庭及诸部族人对回鹘的忿怨。

吐蕃早欲吞并北庭、安西，此时见有机可乘，“厚赂见诱”之④，葛逻禄、白服突厥遂归附吐蕃。贞元五年（789年）十月，吐蕃联合葛逻禄三部及白服突厥，向北庭发动大规模进攻。杨袭古一面率军抵御，一面向回鹘求救，回鹘大相颉干迦斯亲率大军赴援。唐、回鹘联军与吐蕃等军战至次年五月，由于北庭诸族人愤恨回鹘诛求无厌，纷纷降于吐蕃，沙陀酋长朱邪尽忠也率众降附，故唐、回鹘联军屡战皆败，杨袭古率残兵2000人逃奔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颉干迦斯退归本国。这年秋天，经过休整后，杨袭古与颉干迦斯率兵数万，反攻吐蕃军，欲想收复北庭，又为吐蕃军击败，伤亡大半。杨袭古仅率余众数百人，欲返回西州，“颉干迦斯绐之曰：‘第与我同至牙帐，当送君归本朝。’既及牙帐，留而不遣，竟杀之”⑤。“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⑥。北庭失陷后，安西孤立无援，随后也陷落了。葛逻禄乘胜夺取回鹘的浮图川，回鹘新败不敢相争，遂把其西北部落迁往牙帐以南以避之。

吐蕃攻取北庭、安西，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路后，虽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但也把自己置于与大食帝国直接对峙

---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

② 《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

③④⑤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⑥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六年秋。

的地位。《旧唐书》卷一九八《大食传》载："贞元中，（大食）与吐蕃为勍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当时如果没有吐蕃军队的抗击，大食人可能会越过葱岭大沙碛而东进①。吐蕃军事重心一度西移，客观上减轻了唐朝边境的军事压力，使其此后有余力对付国内的叛乱藩镇。

二、唐军联合回鹘、南诏再战吐蕃

（一）吐蕃人占陇州与李泌设谋抗击

德宗贞元三年（787 年）七月，德宗将振武镇的绥（治今陕西绥德）、银（治今陕西榆林南）2 州划出，以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率神策军一部 5000 人，另调朔方、河东两镇军队 3000 人，共 8000 人，镇守夏州，以加强这一段的防务。

八月，吐蕃率羌、浑之众侵入唐境，屯潘口、青石岭（今甘肃平凉东、镇原西南之间），分兵 3 路，直趋陇州（治今陕西陇县）、汧阳（今陕西千阳西）之间，连营数十里，声势浩大。汧阳一路的吐蕃军，只距凤翔 40 里，京师震恐，士庶奔窜。其中羌、浑等众穿汉族服装，伪称唐军邢君牙部，窜至吴山（今陕西千阳南）至宝鸡（今属陕西）之间，"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②。九月，德宗遣神策军将石季章率兵防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派唐良臣防守百里城（今甘肃灵台西南）。吐蕃军驱赶所掠丁壮万余人西去，并放火焚烧李晟用以堵塞安化峡（在今甘肃清水境内）通道的树木，百姓大哭，自投崖谷死伤者千余人。不久，吐蕃军再次围攻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军将苏太平率兵夜出，袭击敌营，吐蕃军退去。吐蕃军又围攻华亭（今属甘肃）、连

---

①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第 65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云堡（今甘肃泾川西）。围攻华亭时，先切断取水之道，城中共有守军及百姓 3000 余人，人心恐慌，急派人向陇州求救。韩清沔命苏太平率 1500 人救援，途中，其游骑百余人被吐蕃军歼灭，苏太平大惧，引兵退回。自此，吐蕃每天派骑兵在陇州城外巡逻，唐军不敢出城。4 天后，华亭城中断水，援军又无消息，守将遂出城投降。吐蕃军焚毁庐舍、城堡，俘获丁壮人口后撤去。连云堡被围攻数日，飞巨石击城，堡中水井皆满。连云堡三面皆陡峭断崖，唯北面地势平坦，掘有深壕以护堡墙。吐蕃军架飞梁越过深壕，直抵城下猛攻。守军力竭，向东痛哭而降。“泾州恃连云为斥候，连云既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虏境，樵采路绝。每收获，必陈兵以扞之，多失时，得空穗而已。由是泾州常苦乏食”①。

贞元四年（788 年）五月，吐蕃军 3 万余骑攻泾、邠、宁、庆、鄜等州，大掠而去。以前吐蕃入寇，常选秋冬季出动，到春夏畏病疫而退。至此，由于掠得大批汉人，于是以其妻子为人质，给以产业，遣吐蕃将领统率，盛夏也敢入唐境攻掠。而唐朝诸州皆闭城自守，无有敢于出战者，使吐蕃能轻易地掠夺到大批人畜。

面对吐蕃屡次侵扰，唐军接连失利的局面，宰相李泌利用回纥可汗向唐朝求婚的机会，向德宗提出建议说：“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②德宗同意和大食（古阿拉伯帝国）、天竺（古印度的别称）、南诏 3 国联合，唯不许与回纥和亲。德宗之所以如此对待回纥，是因为早年他为太子时，其可汗率兵助唐讨伐安史叛军，在陕州（治今河南陕县）时受到可汗的侮辱，故深恨之。此后，李泌 15 次进谏，力劝德宗联合回纥，终于使德宗改变了主意。于是，回纥上表称臣并再次请求和亲。德宗许以其女咸安公主为可汗妻，并于贞元四年（788 年）同意改回纥为回鹘。

唐朝与回鹘和亲，在政治、军事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使吐蕃不敢轻易出兵侵扰唐朝边境，牵制了吐蕃的军事力量。贞元四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年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遣人入南诏，劝其王与吐蕃断交，遣使入唐朝贡。四月，南诏王遣使入长安，受到德宗热情接待，赏赐甚厚。经过双方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南诏本来臣属于唐朝，唐玄宗时地方大吏贪暴不法，征求无度，引起南诏忿怒，发兵攻击。此后，双方多次发生战争，南诏相对弱小，为对抗唐朝只好依附吐蕃，并联兵侵扰唐朝四川一带边境。但是吐蕃对南诏征赋颇重，又夺其险要立营，还要其每年出兵助战，使南诏不堪忍受。唐与南诏和好，使南诏可以摆脱吐蕃的压榨；对唐来说，则斩掉了吐蕃的右臂，为唐军以后抗击吐蕃的侵扰创造了条件。

（二）唐军清溪关大破吐蕃军

贞元四年（788年）十月，吐蕃准备发兵10万进攻西川，同时也命南诏出兵相助。当时南诏虽然暗中与唐朝通好，但在表面上仍未与吐蕃断交，故发兵数万屯泸水（指今四川雅砻江下游及金沙江会合雅砻江后的一段）之北。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知南诏还未下定决心，写信给南诏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①。吐蕃始怀疑南诏有背叛趋向，遣兵2万屯会川（今云南会理西），以阻断南诏通往西川之路。南诏大怒，将屯驻在泸水之北的军队召回国。吐蕃与南诏的互相猜疑，促使南诏决心背弃吐蕃，通好唐朝。吐蕃失去南诏的协助，兵力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尽管吐蕃失去了南诏的协助，由于军队已经出动，势不可遏，“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②。韦皋遣黎州（治今四川汉源西北）刺史韦晋与东蛮合兵抗击，大破吐蕃军于清溪关（今四川甘洛西北）外。

十一月，吐蕃军2万再攻清溪关，1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守要冲城（今四川汉源东南），督诸军抗击来攻的吐蕃，命巂州（治今四川西昌）经略使刘朝彩守清溪关。刘朝彩率军出关迎战，经数日激烈的战斗，再次大败吐蕃军。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四年十月。

（三）唐军联兵回鹘、南诏破吐蕃

贞元五年（789年）十月，韦皋遣大将王有道率兵与东蛮、两林蛮深入吐蕃境，与吐蕃的青海、腊城二节度使所率之军大战于台登（今四川喜德西）北谷，吐蕃军大败，被杀2000余人，投崖及落水溺死者不可胜数，杀死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此人为吐蕃骁将，他的死削弱了吐蕃军的力量，其后，韦皋攻城夺栅，无不顺利，“数年之内，终复巂州”①。

贞元八年（792年），吐蕃军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破坏了屯田的灌溉渠道。唐廷调河东（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振武（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南）、神策军等迎击，击退了吐蕃军。吐蕃军转而侵扰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俘获屯田的唐军千余人，唐朝臣率兵抵御，被击败。由于盐州城池被毁，“塞防无以障遏，而灵武单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骄，数入为边患”②。德宗下令筑城，命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剑南（治今四川成都）、山南（治兴元，今陕西汉中）等道军，深入吐蕃境讨伐，牵制吐蕃兵力，不使其向东运动。“诏朔方、河中、晋绛邠宁兵马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右神策军行营节度使邢君牙，夏绥银节度使韩潭，鄜坊丹延节度使王栖曜，振武、麟胜节度使范希朝合兵3万，以左神策将军胡坚，右神策将军张昌为盐州行营节度使，板筑之，役者六千人，余皆阵城下”③。历2旬城筑成，以杜彦光为盐州节度使镇守城池，“由是灵、夏、河西获安”④。

贞元十三年（797年），德宗因方渠（今甘肃环县）、合道（今甘肃环县西南）、木波（今甘肃环县东南）3地皆为防御吐蕃侵扰的要道，欲筑城驻兵防守，命邠宁节度使杨朝晟率兵筑城。杨朝晟分兵3路，同时筑城，月余城成。吐蕃知道后出兵骚扰，杨朝

---

① 《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

②③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纪五十》，德宗贞元九年二月。

晟在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与其相持数日，击退敌军，于是又在马岭筑城设防。唐军此举共扩地300里，至德宗朝终，西北无大的战事，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吐蕃的侵扰。

同时，回鹘对吐蕃牵制与打击，也削弱了吐蕃的力量，使其无力在西北发动大的攻势。如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北庭（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回鹘引兵救援，尽管吃了败仗，但吐蕃"死伤甚众"①，消耗不少实力。贞元七年（791年），吐蕃攻灵州，被回鹘击败，并将俘获之人献于唐朝。

在西南方面，唐朝对吐蕃的战争获得很大的胜利。贞元九年（793年），南诏王正式上表，请弃吐蕃归唐朝。剑南诸羌部汤立志、董卧庭、罗陀葱、董辟和、薛莫庭、汤悉赞、苏唐磨、董邈蓬等8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②。这样就逐步改变了西南方面吐蕃与唐朝的力量对比。

不久，吐蕃因与回鹘在北庭大战，损失巨大，遣使向南诏借兵。南诏王答应出兵5000人，命其前行，自率数万大军跟其后，昼夜兼程，袭击吐蕃，攻下铁桥（今云南维西东北）等16城，虏其5王，得人口10余万。同年，西北方面筑盐州城时，命韦皋出兵牵制吐蕃。韦皋命大将董勔、张芬出兵攻吐蕃，连下两城，击败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杀数千人，攻陷堡栅50余所。贞元十一年（795年），南诏又攻取吐蕃的昆明城（今四川盐源），这里有盐池之利，对吐蕃的经济有一定影响。

贞元十三年（797年），韦皋击败吐蕃，收复嶲州。十六年，又击败吐蕃于黎（治今四川汉源西北）、嶲2州。吐蕃军多次出兵反击，均为韦皋挫败。"是岁，其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率其部落来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诸将行兵，皆禀其谋策，常乘驿计事，至是以兵数不利，恐获罪，遂来奔"③。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纪五十》，德宗贞元十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纪五十》，德宗贞元九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六年十月。

（四）韦皋分兵九道击吐蕃的胜利

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吐蕃因其部众屡次叛降唐朝，非常恼怒，发兵进攻灵、盐、鄜等州，并攻陷麟州。德宗命韦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减轻西北方面的压力。韦皋出兵2万，分九道攻入吐蕃。其中命镇静军使陈泊率军万人出三奇路，威戎军使崔尧臣率兵千人出龙溪（今四川汶川西北）石门路南，维保2州兵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率兵2000直趋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兵马使邢泚率兵4000人攻吐蕃栖鸡（位今四川茂县境内）、老翁城，都将高倜、王英俊将兵2000趋松州（治今四川松潘），陇东兵马使元膺率兵8000出南道雅（治今四川雅安）、邛（治今四川邛崃）、黎、嶲路。又令镇南军使韦良金率兵1500人继进，雅州经略使路惟明率兵3000趋吐蕃逋租、偏松（今四川康定西北）等城，黎州经略使王有道率兵2000人过大渡河，深入吐蕃境，嶲州经略使陈孝阳、兵马使何大海等与磨些蛮、东蛮二部落主率兵4000攻昆明城、诺济城（今四川西昌西北）。南诏也出兵相助。“自八月出军齐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拔城七，军镇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斩首万余级，遂进攻维州。救军再至，转战千里”①。南诏军斩获吐蕃军颇多，德宗遣中使（宦官）前往慰抚。唐军在西南方面的胜利，迫使吐蕃从西北的灵、盐等州前线调兵南下增援。

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吐蕃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使论莽热率兵10万前往解维州之围。唐军万人据险设伏以待，以千人挑战。吐蕃军见唐军人数少，出动全军追击，进入伏击区后，唐军“鼓噪雷骇”，四面掩击，吐蕃军溃散，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②。

唐军的胜利，迫使吐蕃不得不改变其国策，派使者入长安朝贡，唐朝也遣使还报。贞元二十年，吐蕃赞普死，唐遣使吊祭；德宗死后，吐蕃派使臣入唐，“助德宗山陵金银、衣服、牛马等”③。

---

①② 《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唐蕃之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

三、唐军作战的主要特点

德宗统治时期，唐朝与吐蕃的战争互有胜负，在西北方面唐朝胜少负多，在西南方面胜多负少。总的来看，尤其是德宗后期，唐朝基本遏制了吐蕃的攻势，在西南方面还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给吐蕃以重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总结唐军在这一时期对吐蕃的作战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战略指导上，唐朝在德宗前期是孤军作战，不善利用联盟战略，因而兵力分散，在西北方面，不能形成局部优势，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后来采纳了李泌的建议，联合了回鹘、南诏等国共同抗击吐蕃，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使吐蕃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有效地阻止了吐蕃的攻势，削弱了吐蕃的军事实力。

2、在作战指挥上，唐廷注意各战场互相配合。如使西南与西北两个战场互相策应。贞元九年（793年），唐军在西北方面重筑盐州城时，德宗命剑南、山南西道出兵牵制吐蕃军。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在西北进攻灵、盐、麟等州时，德宗又一次命剑南节度使韦皋在西南对吐蕃发动攻势，不仅收复了大批失地，还迫使吐蕃从西北抽调军队增援西南。吐蕃军两面作战，疲于奔命，陷于被动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失。

3、在战法上，唐军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一是以攻为守、速战速决、打敌要害。摧沙堡之战，较好地体现了这些特色。为达到防御目的，唐军主动出击，长途奔袭吐蕃军要害之处后方供应基地。为实现速战速决，唐军途中击败拦截敌军后，不过多纠缠，而是直趋目的地，使敌措手不及，很快就攻下摧沙堡，焚毁了吐蕃积贮的军需物资。此役后，吐蕃由于缺乏充足的军需给养，不得不从前线撤兵。如贞元三年（787年），“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

不继"①，不得不放弃2州，撤回国内。二是扬长避短，筑城防守。吐蕃军以骑兵为主，长于旷野驰骋，机动作战；唐军步兵较多，利于据险阻，守城池。故吐蕃军每次侵扰，大都摧毁村落、堡栅、城池，虏掠人口、牲畜，不使唐军有所利用。针对吐蕃军的这种特点，唐军发挥自己的长处，击敌之短处，这就是筑城防守。从贞元八年（792年）起，唐朝采取积极措施，修复被毁城堡，先后重筑了盐州、方渠城、合道城、木波城及马岭城等，不仅使战线向前推进了数百里，还比较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吐蕃军长处的发挥。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六月。

第十四章　宪宗时期平定藩镇割据的战争

唐宪宗统治时期，各地藩镇的割据环境和内部矛盾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唐宪宗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削藩战略，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削平藩镇割据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史称这一时期为“元和中兴”。

第一节　削平藩镇割据的条件和战略

唐宪宗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即位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为改变藩镇割据局面，敢于正视和改变不利因素，积极利用有利条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了扫平藩镇割据的战争，揭开了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一、永贞革新与宪宗即位

宪宗李纯，是顺宗的长子。贞元二十一年（805 年）正月，唐德宗病逝，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改元永贞。当时顺宗因患中风病，口不能言，卧床不起，国家政事由原东宫亲信王伾、王叔文为首的一派人控制，其成员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陈谏、吕温、韦执宜、陆质、李景俭、韩晔等，这些人多为名流士子，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王伾任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韦执宜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宰相），其余人员也都充任要职。这个集团执政初期，针对德宗时期的弊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1、废除宫市，贬谪了无恶不作的京兆尹李实。2、大赦天下，罢去诸道额外上供，规定除两

税正税之外，免除一切杂税。3、掌握财权。解除了李锜的盐铁转运使职务，以当时的理财家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执掌实权。4、谋取宦官军权。当时禁军为宦官集团所控制，王伾、王叔文任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控制神策军。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认识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①，命令神策军诸将莫以兵权属人。当范希朝、韩泰赶到左右神策行营所在地奉天（今陕西乾县）时，神策军诸将竟无一人赴命，二人无奈，只好怏怏返京。二王对此也无可奈何，在关键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这就决定了这个集团必然失败的命运。由于这次革新发生在永贞年间，所以叫"永贞革新"，又由于王叔文为革新的实际领导人物，因此也叫"王叔文改革"。

应当指出，这次改革的一些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个集团中的王伾，是个胸无大志、贪图小利的人物，他在"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上"②。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而且愈演愈烈。韦执宜由于王叔文的引用，才得出任宰相，但他见反对派力量颇强，想脚踩两只船，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和王叔文意见分歧，甚至各行其事，以致于闹得王叔文发誓要杀死韦执宜。另外，这个集团社会基础薄弱，主要依靠一个有病的皇帝支持。史载，顺宗病居深宫，只有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在左右侍候，"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形成一个"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③的体制。王叔文在翰林院裁定可否，再传到中书省，由韦执宜宣示下达，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等人承办。这样一个体制和传达政令的渠道，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顺宗永贞元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附王伾传》。

③ 《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

由于顺宗久病不愈，朝廷内外皆欲早立太子，而“叔文默不发议”①。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联合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等，力主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企图取得拥立太子之功，以便为日后飞黄腾达创造条件。顺宗宠姬牛昭容等知李纯聪明精练，恐日后不易控制，从中阻挠。郑絪等人入宫，并手书“立嫡以长”四字呈给顺宗，顺宗点头同意。这年四月，册立李纯为皇太子。

由于王叔文集团在册立太子问题上态度不明朗，并予以拖延，引起太子对他们的不满。同时，许多藩镇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都对这个集团不满，上表痛斥他们危乱朝廷，请求让皇太子主持国政。牛昭容见形势不妙，也转变了态度，与王叔文集团疏远。王叔文集团在外藩内宦的进攻下，束手无策。他本人因母丧归第，王伾在彷徨之中，中风不起，这个集团的领导核心已名存实亡，顺宗完全掌握在反对派手中。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诏，令皇太子监国。八月四日，顺宗逊位，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他即位后，就下令严惩王叔文集团，贬王伾为开州（治今重庆开县）司马，王叔文为渝州（治今重庆）司户，韩泰为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司马，陈谏为台州（治今属浙江）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凌准为连州（今属广东）司马，程异为郴州（今属湖南）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司马，韩晔为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司马，韦执宜为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二、宪宗削藩的经济条件

唐廷要削平藩镇割据，中兴大唐帝国，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

---

① 韩愈：《顺宗实录》卷五。

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战争的巨大消耗。在这方面宪宗的祖父德宗皇帝已经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德宗在贞元时期，不遗余力地敛聚钱财，无论是朝廷官员献媚的上供，还是名目繁多的藩镇进奉，都一概收纳积贮。这样，德宗20年的贮财所得，为其孙宪宗皇帝实现中兴愿望提供了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对于德宗这方面的贡献，《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八章评论说："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人宪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宪宗继位之初，继承了其祖父遗志，为平定藩镇割据继续积贮财力。

宪宗除继承德宗朝全部积贮财货之外，他还广收诸道进奉，如元和五年（810年）十一月，接收河东节度使王锷进奉30万缗；八年八月，汴州节度使韩弘进绢500匹；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献马300匹；十四年五月，泾原节度使王潜进奉银3000两，绢帛5000匹；七月，韩弘进绢帛2.5万匹、絁3万匹、银器270件。在平定叛镇后，他还没收其财物和产业收入入内库，如对四川刘辟、浙西李锜等，都是如此。对于宪宗热衷于聚财，朝臣中不少人颇有异议，如李绛就曾对他提出过劝谏。宪宗听后感慨地说："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① 从宪宗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聚积资财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平藩镇割据，收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即湟水，今青海东北）失地，恢复大唐的统一和繁荣昌盛的局面。除了以上聚财办法外，其主要措施还有：

（一）加强税收，广开财源

唐朝两税的征收，采取的是一分为三的办法，即上供、送使、留州。诸道往往想方设法多留赋税，减少上供部分。元和六年（811年），宰相裴垍"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五年十二月。

在观察使，仍以其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许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①。这样，就把诸藩镇所管支郡送使钱物变为上供，削减了地方收入，使更多的财力成为国家的削藩之资。原先赋税的征收，全都由地方州郡征收。元和六年（811年）以后，设立了江淮以南两税使、荆衡汉沔东界彭蠡以南两税使、三川两税使、山南西道两税使等机构，统辖于度支，具体负责各地两税的征收，使朝廷牢牢地掌握住了主要税种的征收权。

唐朝自大历末年经刘晏整顿财政后，“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②。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后，收入增至“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③。则除盐税外，税收增加在一倍以上。到宪宗统治初期，收入还有所增加，“元和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④。从而使朝廷掌握了大量财富，具备了讨伐叛镇的经济实力。

（二）重视兴修水利，鼓励植桑种田，发展农业生产

宪宗元和时期，鼓励各地官吏大抓水利兴修，劝课农桑，如常州（今属江苏）刺史孟简奏请挖浚古孟渎，宪宗准奏，结果开渠41里，得沃田4000余顷，百姓富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郑滑观察使薛平奏请开挖古河，结果挖掘古河南北长14里，东西宽60步，深1.7丈，根除了自天宝以来当地的黄河水患，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灵武节度使李听上奏疏通境内古河道，扩大溉田千余顷。宪宗还下诏鼓励植桑，规定各州县没有种植桑树者，每亩地植桑两棵，地方官员必须亲临督促察看，并且禁止砍伐桑林，年终上表奏闻。宪宗重视发展生产，虽然是为了增加财力，以图中兴，然在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却起了较积极的

---

① 《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② 《唐会要》卷八十七《转运盐铁总叙》。

③ 《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注。

影响。

（三）提倡节俭，严惩贪官

宪宗统治前期，非常节俭，宫中用度大大压缩，并退还四方进献的歌舞妓乐。如元和四年（809 年），江南饥旱，宪宗命使南下赈济饥民说："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① 他还对其他朝臣强调："俭约之事，是我诚心，……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② 同时，他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元和四年十月，讨伐王承宗时，于皋谟、董溪为行营粮料使，两人贪污各数千贯钱，宪宗下令免官流放，后处死，其部下主要僚属也受到惩处。其后，宪宗还多次惩处贪官，维护国家法纪，整肃了官吏作风。

（四）重视转运渠道的畅通，牢牢控制东南财源

唐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安史之乱后，财赋收入主要依赖东南地区供给，因此，如何运输这一带的财赋极为重要。刘晏在代宗时对漕运工作进行了不少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以后韩洄、杜佑、韩滉等人做了不少工作。宪宗时曾有多人主管过转运使的工作，其中以李巽的成绩最为突出，他在刘晏的基础上，把转运效率提高了 3 倍。由于李巽能从东南运输更大量的财赋到关中，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力量，才使宪宗能制订和实施对叛镇的讨伐战略。

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所编的《元和国计簿》记载说："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③ 当时全国有军队 83 万人，大致两户人家要负担一个兵卒的费用，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所以，唐朝对东南财源地的控制非常重视，努力将这一地区牢牢地置于朝廷直接领导之下。对这些地区节度使、观察使的任命，皆以儒学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四年正月。

② 《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

道德之士充任，很少任命武人，以便保证这一地区长期稳定地听命于朝廷。

正由于宪宗元和前期的努力，长年的日积月累，为后来大规模的平叛战争准备了充足的财货。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回归朝廷，宪宗一次从内库调发财货150万贯赏赐军卒，并说："朕所以恶衣菲食，蓄积货财，正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① 以后大举讨伐淮西、镇冀诸镇，历次调发库藏财货，总数达5361万贯匹②，有力地支援了削藩战争。

三、宪宗削藩的政治条件

宪宗时期的政治状况，和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唐朝廷的政治状况有较大改观，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加之唐宪宗制定了比较稳妥正确的施政方针，为平叛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1、各地藩镇尤其是河朔诸镇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宗时期横行跋扈的节度使大多年老病弱而死去，其后代或为平庸无能之辈，或奢靡不理军务。此外，德宗时期虽无削平藩镇割据，但大多数叛镇在战争中受到削弱，有的节度使甚至因失败而家毁人亡，如李惟岳、李希烈、朱滔、朱泚、李怀光等。这些鉴戒对当时的藩镇震动很大，促使其对朝廷的态度发生变化。如河朔诸镇，他们一方面要内守自固，拥兵擅袭，以图自存；另一方面又不敢过分跋扈，得罪朝廷和邻近藩镇，以免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同时藩镇内部矛盾重重，兵骄将悍，藩镇将帅动辄为部下所杀，有时甚至兄弟相残，割据者内部日益不稳。所以不少割据者都想利用朝廷威望，以增加自己内部的稳定性，或者为避免杀身之祸，举族入朝，如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甚至连河北三镇中最凶残的魏

---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七年十月。

② 据《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经费》统计。

博镇田弘正也归顺朝廷，在割据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不少割据者感到自擅割据的危害，希望奉朝命以求自安，得个“自今但与诸公抱子弄孙”①的结局。这一时期藩镇势力的削弱和互相之间的矛盾，使割据者自顾不暇，增加了对朝廷的向心力，为宪宗削藩造成了有利的时机。

2、藩镇割据不得人心，要求统一、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德宗时期，河朔、中原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当地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社会萧条，生产凋敝，割据的藩镇为了对抗朝廷，应付战争的巨大消耗，势必加重人民的赋税和兵役负担。如魏博镇田承嗣，“重加税率，修缮甲兵，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②。淮西镇吴元济，“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③。分裂割据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对藩镇割据战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魏博镇在田悦时连兵数年，“士众死者十七八，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④。反映出人民对割据战争已难以忍受，迫切要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因此，宪宗的统一行动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意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宪宗广视听，善纳谏，组织了一个相对稳定、意志统一的领导中枢。宪宗时先后任用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李绛、裴度等人为宰相，广集谋略，审时度势，成为平叛的智囊集团。如杜黄裳劝宪宗对藩镇不要姑息纵容，而是要“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西川刘辟叛乱时，不少人“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主张姑息。“惟黄裳坚请讨除”⑤，并奏请不派宦官监军，放手让将帅指挥，结果很快取得胜利。在对镇海镇李锜的问题上，武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二月。

④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附田悦传》。

⑤ 以上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黄裳传》。

元衡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武元衡在元和十年（815年）被刺身亡，宪宗认识到这是割据藩镇为破坏削藩，故意制造混乱、动摇朝廷削藩的决心后，非常气愤。同时也使他看到削藩中枢对割据藩镇的巨大威胁，才使他们如此恐骇，从而得出坚强有力的领导中枢，“足以破此二贼（指王承宗、李师道）矣”① 的结论，决心重用裴度为相，继续削藩不动摇。裴度也临危受命，“亦以平贼为己任”②，亲临前线，督军讨伐，终于扫灭了吴元济。所以旧史评论说：“洎宪宗当朝，裴度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③。坚强的领导中枢，是削平叛镇的关键。宪宗在大批任用贤才的同时，又裁汰冗官，节省国家开支，提高办事效率。李吉甫为相时，指出国家养兵80多万，游商、僧道又不纳税，官吏冗杂，尸位素餐者随处可见，使天下十分之三劳筋苦骨之人供养十分之七待衣坐食之辈，造成国家财政日益紧张，百姓日益贫困。建议采取措施，裁汰冗官。宪宗接受这个建议，令给事中段仲平、中书舍人韦贯之、户部侍郎李绛等参与此项工作，结果削减冗官800余员，吏1400余员。李吉甫又建议没收京畿地区佛寺占有的土地，向皇亲官僚的碾硙征税，这样就增加了国家收入，不同程度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四、宪宗削藩的战略

宪宗平定割据藩镇的战略，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采取先近后远的战略，即先稳固邻近藩镇和东南财赋重地，而后进取河朔。宪宗在元和元年（806年）、二年（807年），连续削平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的叛乱。这样，就稳固了后方基地，并把西川、东南财赋重地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宪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获得削藩的初步胜利，用李绛的话说，是

①② 《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

③ 《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论》。

"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锜徒以货财啗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①。宪宗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大胆用兵，获得了成功。这次削藩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德宗中后期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使许多节镇一直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朝廷不敢轻易用兵，威望空前低落。此次胜利，一方面打击了割据藩镇的气焰，同时也增加了朝廷威望和宪宗讨平叛镇的决心，为进行更大规模的削藩平叛斗争奠定了基础。

2、采取先易后难、缓急相宜的用兵方略。宪宗时期河北诸镇是最大割据者，危害国家最烈。元和四年（809 年），成德镇王承宗在其父王士真死后自为留后，宪宗欲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不从王承宗的请求，兴兵征讨。但是，成德镇"南有魏博以为之障，北有幽、燕以为之援，东有淄青以为率然之首尾"，所以，"若当时之最宜缓而不可急攻者，莫恒、冀（即成德镇）若矣"②。宪宗听不进正确意见，遣兵讨伐成德，劳民费财，没有功效。后来，听取李绛等人意见，改变战略方针，确定了先攻取淮西、淄青，后攻取河北的方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③。淄青镇的情况，是"南接淮、海，而西与燕、魏相悬千里，势不足以相救"④。果然在唐军扫平吴元济后，诸镇震恐，成德镇王承宗派人带二子至魏博镇，通过魏博田弘正向朝廷说情，"求入侍，且请归德、棣二州，入租赋，待天子署吏"⑤。淄青李师道也请求遣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⑥。李师道后来反复无常，朝廷派军征讨，终于平定了割据 54 年之久的淄青镇。在这两镇平定不久，成德王承宗忧惧而死，卢龙镇刘总怕朝廷讨伐，削发为僧，魏博镇此前已经

---

①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四年七月。

②④ 《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宪宗八》。

⑤ 《新唐书》卷二一一《王士真传》。

⑥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三年正月。

归顺。至此，跋扈60余年的河北诸镇，皆告平定。

3、实行以藩灭藩，以群藩伐一藩的策略。安史之乱后，唐廷在中原大量设置藩镇，实行以藩御藩的策略。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所变化，即利用藩镇割据局势的变化，采取了以藩灭藩，各个击破的新方针。宪宗削藩主要利用的是各个藩镇的力量，如讨伐四川刘辟，令神策军将高崇文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出兵；讨镇海李锜，令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使，征宣武、义宁、宣歙、武昌、淮南等镇兵共同征伐；伐淮西吴元济时，出动了宣武、大宁、淮南、宣歙、山西东道、魏博、荆南、江西、剑南东川、武昌、东都、义成等十几镇兵马，同期进讨；伐淄青李师道，出动了义成、横海、宣武、魏博、武宁等镇兵马。

宪宗实施以藩灭藩策略，坚持令出朝廷、利用矛盾、周密策划的原则。当时的藩镇，尤其是河朔诸镇，虽然其势已衰，然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他们自相擅袭已久，互为依托，以求自固，一方面既奉朝旨，一方面又联合邻藩，各图两全之策。唐廷的削藩之策，一旦策划不周，则可能弄巧成拙，反被叛镇利用。所以，唐廷在吸取以往教训后，精心研究策划，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和对朝廷的畏惧心理，加以引导、利诱、威胁，促使他们互相监督，相互争功奋战。同时，朝廷严控指挥大权，行止之命必出朝廷，不使诸镇兵迁延观望，相互自保。比如元和十三年（818年），伐淄青李师道，魏博镇请求从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渡黄河。朝廷怕诸军进退不一，互相观望，命其军从扬刘（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渡河，待诸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共同进兵，因而击败了淄青兵。

4、实行重资收买、笼络分化的策略。跋扈藩镇之所以能拥兵自重，是因其拥有强大的武装，这些军士大都是世代为伍的职业兵，以军资为养家之费，故节帅们多采取倾财散施的办法，来争取军队的拥戴。唐廷在削藩过程中针对这个特点，不惜重资，优赏诸镇兵，换取他们的支持，使之听从朝廷的调遣，从而瓦解藩镇势力，加快削藩步伐。如为使魏博镇归顺，动用150万缗巨资赏赐，6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士受赐，欢声雷动”。成德、淄

青等镇人听说后，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① 对其他藩镇之人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为犒赏诸镇兵出征，朝廷也每每花费巨额财货，这类事例在记载中，屡见不鲜。

在武力征伐、金钱收买的同时，宪宗对某些节帅也利用姻亲、加官晋爵或赐以姓氏等办法，进行分化拉拢。如以普宁公主下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之子，赐魏博田兴之名为田弘正，授宣武节度使韩弘为司徒、平章事等，都收到很好效果。使田弘正忠心奉国，在平定淮西、淄青之乱中建立功勋；韩弘为使相后，没有协助吴元济叛乱，反而出兵协助朝廷扫平叛镇。

第二节　平定西川、夏绥

（参见附图 16）

永贞元年（805 年）八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突然病故，他治蜀长达 21 年，曾多次击败吐蕃进犯，与南诏修和言好，"绥宁遐夷，兵休边陲，人获富庶"②，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由于韦皋突然死亡，唐廷未及安排西川人事，使野心家刘辟得以擅权自专，占据蜀地。宪宗在宰相杜黄裳支持和辅佐下，毅然下诏讨伐，很快扫平叛乱，稳定了西川之地。

一、刘辟割据西川与唐军进讨部署

刘辟，为德宗贞元年间（785～805 年）的进士，韦皋坐镇西川时，以其为从事，逐渐升为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成为韦皋的主要部将和谋士。顺宗即位后，刘辟被派往京师打探情况，曾向王叔文请求让韦皋兼领三川，遭到拒绝。当年六月，他潜回成都（今属四川），八月韦皋死后，他不待朝廷任命，便自为留后，并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七年十一月。

② 《全唐文》卷四五三《宝历寺记》。

怂恿亲信联名上表，要求朝廷任命他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宪宗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派中书侍郎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安抚大使，前往蜀地抚慰。十月，下诏任命尚在途中的袁滋为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征召刘辟入朝任给事中。袁滋感到入川危险，逗留不进，宪宗大怒，贬其为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刺史。

由于宪宗即位不久，朝廷内部意见分歧，宪宗为稳妥起见，答应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刘辟得寸进尺，狂妄骄横，又提出兼领三川之事，宪宗拒绝后，竟公然领兵攻打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公开叛乱。

这时，多数朝臣认为蜀道艰险难取，反对唐军入川平叛，主张姑息了事，唯宰相杜黄裳力主出兵平叛。他对宪宗说："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① 于是，宪宗命高崇文率步骑5000为前军，命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2000为后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一起进攻刘辟。

时高崇文屯兵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训练士卒，接到诏命后，当天率兵出发，器械军资，一无所缺。正月二十九日，高崇文自斜谷（位今陕西眉县西，南北走向，为古代关中入川通道之一），李元奕自骆谷（位今陕西周至西，南北走向，为古代关中入川通道之一），两军齐进，直捣蜀地。严砺从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出发，直攻剑州（治今四川剑阁）。二月，攻下剑州，斩其刺史文德昭，为唐军入川打开了通道。

在高崇文出发前，宰相杜黄裳为使其全力征讨，对他说，如果讨伐无功，将派刘澭代替他指挥。刘澭在关内诸将中，治军严整，高崇文最怕刘澭，故不敢懈怠，全力以赴，疾速进军。三月初，高崇文从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出发，直趋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这时梓州已被刘辟军攻占，东川节度使李康被俘。刘辟派驻梓州的守将邢泚见唐军来势凶猛，望风逃遁，唐军占领梓州。此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元年正月。

时，刘辟见唐军3路进攻，气势甚猛，心中恐惧，遣人送回李康，以求朝廷能宽恕自己罪责。高崇文以战败失守罪斩杀李康。新任东川节度使韦丹这时已到兴元，上表请求任命高崇文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便尽快处理梓州事宜，稳定民心，筹措军需物资。宪宗阅表后表示同意。

二、平定西川

高崇文占据梓州，逼近川中，刘辟惊慌万状，在鹿头关（今四川德阳北）一带，据天险设置8处木栅，调军万人驻守，企图阻止唐军前进。六月初，高崇文遣勇将高霞寓进攻刘辟设置在鹿头关东万胜堆的木栅，唐军攀缘而上，山上箭石如雨，唐军虽死伤不少，仍力战不退，终于登上堆顶，放火烧栅，全歼守军。唐军攻下万胜堆，可以下瞰关城，城中动静尽在唐军眼底，刘辟军出兵争夺，唐军8战8胜。接着唐军在德阳（今属四川）大败刘辟军，后又在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击败其军。这时，严砺遣其将严秦在绵竹石碑谷（在今四川绵竹境内），击败刘辟军万余人。七月二十二日，高崇文在玄武（今四川中江）大败叛军万余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统一指挥军事，宪宗下诏命凡入川增援军队，皆归高崇文指挥。

九月，高崇文再次于鹿头关击败叛军。严砺也在神泉（今四川安县南）大败叛军。这时，河东援军将领阿跌光颜率军约定时日与高崇文军会合于行营，因路途艰难延迟了一日。他畏惧高崇文军纪森严，害怕按军法治罪，率所部军队深入鹿头关之西，以图立功赎罪。河东军切断了成都通向鹿头关的粮食供应线，关城之中的叛军顿时人心慌乱，土崩瓦解。刘辟绵江栅守将李文悦，鹿头关守将仇良辅，都向唐军缴械投降，投降的士卒数以万计。刘辟的女婿苏强同时被俘获。

鹿头关攻下后，高崇文率军直趋成都。一路上叛军或降或逃，全线崩溃，唐军顺利抵达成都。刘辟见大势已去，不敢守城，带

亲信卢文若等数十人，弃城逃跑，欲向西投奔吐蕃。九月二十一日，唐军开进成都。高崇文命大将高霞寓率军追击，在羊灌田（今四川都江堰北）追上叛军。刘辟自投汶江（岷江），被唐军入水擒获。卢文若先杀妻子，然后系石投水自沉而死。

高崇文进入成都，“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毫不犯”①。把刘辟押送京城，宪宗在兴安楼上举行献俘仪式，诘问刘辟反状，然后斩于子城西南隅。命高崇文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留驻成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刘辟之乱遂平。

三、平定夏绥

宪宗在讨伐刘辟叛乱的同时，也发动了对夏绥镇（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讨伐战争。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上表请求归朝留驻，以其外甥杨惠琳为夏绥留后。元和元年（806年）三月，宪宗因韩全义守边无功，且骄横不逊，勒令致仕，另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拒不受命，策动所部军队叛乱。河东（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严绶请命出兵镇压。宪宗命河东、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兵联合进击，以严绶为招讨使，统一指挥。当月，杨惠琳部将夏州兵马使张承金发动兵变，斩杀杨惠琳，传首京师。

西川、夏绥二镇的平定，迅速提高了宪宗的威望，使一些藩镇表示愿意归顺朝廷。十月，易定（治定州，今属河北）节度使张茂昭上表入朝。十一月，武宁（治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张愔上表，请求朝廷派员替代，自愿入朝。朝廷声誉和地位进一步提高。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元年九月。

第三节　平定镇海李锜的作战

在一些藩镇归附朝廷的过程中，镇海（治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迫于形势，也上表请求入朝。当宪宗同意他的请求后，他却借故不归，并拥兵叛乱。于是，宪宗在即位后不久，被迫又发动了平定李锜的战争，以稳定东南财赋供给基地。

一、李锜雄据镇海起兵反唐

李锜是唐宗室淮安王李神通的后代，其父李国贞在德宗贞元年间死于国难，他以父荫走上仕途，在贞元时期历任湖州（今属浙江）、杭州（今属浙江）2州刺史。贞元十五年（799年），李锜以数十万缗巨资贿赂宦官李齐运，经其推荐，得任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他掌握天下财赋之权后，投德宗所好，大肆进奉巨额资财，颇得德宗信任。又以财物广贿权贵，以为后援，从此更加骄纵刻剥，无所忌惮。经常盗取国家资财，所属官吏，有不为其聚敛者，多方陷害打击，无辜受害者颇众。

李锜既富有财货，为求自全计，乃私选数百力士作为卫士，结为腹心，后被调任镇海节度使，失去财权，虽然心怀不满，但因又获节旄，可以专制一方，故异志未显露于外。宪宗即位后，拒受四方贡献，锐意整顿纲纪，李锜因镇海距长安较远，朝廷鞭长莫及，仍然骄横不法如故。此次李锜上表请求入朝，宪宗知其骄纵不法，故同意其请求，拜为左仆射。元和二年（807年）九月，遣中使至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抚慰。同时，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锜作出入朝的姿态，使其判官王澹为留后，暂时主持军务，然却无意动身，拖延不行。王澹已接掌留后事务，处事颇有章法，李锜更加不悦。他利用朝廷颁发冬衣之日，唆使亲兵数百人杀死王澹和大将赵琦，当乱兵以刃加于中使之颈时，李锜佯装不知，此时才出面阻止。中使虽幸免于难，但仍未逃脱囚

禁之苦。与此同时，李锜派心腹将领5人，分别率兵袭击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湖（今属浙江）、杭（今属浙江）、睦（治今浙江建德东北）等5州，谋图杀害各州刺史，占据州城。并以军变为由，请求暂缓入朝。

二、张子良倒戈与唐军收复镇海

宪宗接到李锜纵兵作乱的消息后，一面严词责令李锜入京，一面征求群臣意见。宰相郑絪主张接受李锜请求，暂缓进京。另一宰相武元衡认为不妥，说："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① 宪宗接受武元衡建议，下令削去李锜官爵。十月，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统宣武、义宁、武昌、淮南、宣歙等道兵出宣州（今属安徽），江西兵出信州（治今江西上饶），浙东兵出杭州，共同讨伐李锜。

李锜派出的5将，只有苏州、睦州刺史大意，被袭取州城外，其他各州刺史早有防备，挫败了李锜军袭击的谋图，并斩杀其将。

李锜以宣州富庶，欲先夺取，遣其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率兵3000人，前往袭取。在唐军强大的压力下，3将知李锜必败，与李锜之甥牙将裴行立商议，共同反戈。裴行立由于亲戚关系，尽知李锜密谋，4人商议好内外策应的办法后，分别开始行动。3将率军营于城外，临出发前，召集士卒宣谕说："仆射反逆，官军四集，常、湖二将继死，其势已蹙。今乃欲使吾辈远取宣城，吾辈何为随之族灭！岂若去逆效顺，转祸为福乎！"② 众悦，愿意讨伐叛贼。当夜，回兵直逼润州，裴行立率众举火鼓噪，于城内响应，开城门迎接3将入城，遂引兵直趋牙门，围李锜于军府。李锜得知裴行立起兵的消息后，痛哭说：我还有什么希望啊！赤脚逃跑，藏于楼下。李锜亲将李钧率300名卫士欲拒战，被裴行立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二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二年十月。

伏兵全部斩杀。众军围攻军府甚急，李锜全家皆哭，其左右为求自活，抓住李锜，用幕帐裹住，缒于牙城之下，唐军将其押送京师。李锜蓄谋已久的叛乱至此平息。十一月，宪宗在长安大明宫南面的兴安门，责问李锜为何造反，李锜反咬一口，说臣初不知反，是张子良等人教臣造反。宪宗又问，你为统帅，何不斩之，然后入朝？李锜哑口无言。宪宗下令将李锜与其子一同腰斩。

朝臣中有人主张同时诛杀李锜亲族，兵部郎中蒋乂认为淮安王李神通有佐命之功，其亲族皆淮安王之后，岂可因李锜一人连累他人？于是，只把李锜堂弟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刺史李铦等贬官流放，李锜兄弟及亲族皆不问罪。有人请毁李锜祖庙，御史中丞卢坦上言，认为毁之不妥，于是也得以保留。没收的李锜家财，数量巨大，有司准备运送到京师，宪宗听取了翰林学士裴垍、李绛的意见后，下令赐给浙西6州百姓，以代替今年租赋。宪宗以上作为，不仅获得百姓们的拥护，而且对广大朝臣及藩镇影响颇大，进一步提高了唐廷和宪宗的威望。

第四节　平定成德王承宗的作战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成德（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代领军务。宪宗不许，遂发兵征讨，但久战无功，只好罢兵。元和十年（815年），再次出兵讨伐，历时数年，劳民伤财，直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王承宗病死，此战才告平息。此战唐廷两度用兵，决策失误，屡次受挫，师困国乏，教训颇多，虽然成德最后降服，然不是此战的直接结果。两伐成德镇是唐宪宗削藩事业中最无光彩的一页。

一、唐军一讨王承宗

（一）酝酿讨伐王承宗

宪宗欲乘王士真之死，另换他人代任其职，以革除河北诸镇

世袭的弊端，在王承宗上表请求袭职时，坚不应允，并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宰相裴垍说："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王承宗的祖父）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李师道为李纳次子，李师古的异母弟，元和元年继师古袭位），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翰林学士李绛也认为："河北不尊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相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潜相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① 李绛这段议论非常精粹，对宪宗颇有触动。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宦官吐突承璀，迎合宪宗急于削藩的心理，以夺宰相裴垍之权，向宪宗请求，愿意率兵讨伐王承宗。宗正少卿李栻欲讨好宪宗，也上奏赞成吐突承璀率兵进讨。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因父丧卸职，谋图及早复职，通过吐突承璀转呈表章，请求调本镇军队讨伐王承宗。于是，宪宗恢复卢从史昭义节度使之职，并加授左金吾大将军。这说明宪宗是倾向于对王承宗用兵的。七月，为了稳妥起见，宪宗再次征求群臣意见，并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任命王承宗为成德留后，但必须割其所辖德（治今山东陵县）、棣（治今山东惠民东南）2 州，另立一镇，以削弱王承宗的实力。还要王承宗向朝廷缴纳赋税，所属官员的任命也收归朝廷。李绛主张暂不要分割其辖地，怕王承宗及其将士以此为借口反叛。同时，河北其他诸镇见朝廷分割成德镇，担心他日也要轮到自己头上，互相串连，共拒朝命，事情就不好处置了。至于缴税和任官权的问题，可在派使吊唁王士真的时候，请使臣劝王承宗自动上表，请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四年四月。

求朝廷允许成德纳税和交还任官权，认为这样处理，朝廷比较主动。宪宗认为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目前都在患疾，如果一旦死去，都像成德镇这样允许其子继承，天下何时可平！不如乘此交替之机，出兵讨伐。李绛劝谏说："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竞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锜徒以货财啗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季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① 这段话分析了西川、镇海2镇与成德镇的不同之处，很有道理。宪宗因被前两次削藩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实际上李绛等人并不是反对用武力削藩，而是因为河北诸镇的情况比较特殊，必须等待机会，创造条件，逐步削平。反对不分析情况的盲目蛮干。

当时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李绛上奏宪宗，主张用兵讨伐，他说："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②并再次请求宪宗，放弃对成德镇的讨伐，"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③。以后事情的发展，证明李绛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

王承宗因久久不见朝廷任命，多次上表向朝廷表示忠心。八月，宪宗派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镇宣慰。王承宗态度非常恭顺，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四年七月。

表示愿意献出德、棣两州，以证明自己对朝廷的忠诚。九月，唐廷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另外又任命原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管辖德、棣2州。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不愿王承宗开此先例，派使对王承宗说："昌朝阴与朝廷通，故受节钺。"① 王承宗大怒，以为自己被人出卖，急遣数百骑兵驰入德州，抓回薛昌朝，予以囚禁。朝廷派往德州给薛昌朝送节度使节钺的中使，路过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时，田季安佯装热情，款待数日，等中使到德州时，薛昌朝已被抓走多日了。宪宗派使命王承宗释放薛昌朝回德州，王承宗拒不奉命。

（二）吐突承璀率兵进讨

宪宗因王承宗不奉诏，于十月十一日下诏，削去其官爵，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招讨处置等使，率军讨伐王承宗。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说："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则承璀乃制将也。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则承璀乃都统也。臣恐四方闻之，必窥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刘济、茂昭及希朝，从史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② 谏官、御史及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给事中吕元膺、穆质等，皆极言不可，宪宗不得已，削去吐突承璀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使为宣慰使，仍然为诸道军队统帅。

二十七日，吐突承璀率神策军从长安出发，并命成德镇四周的藩镇各自出兵征讨。魏博镇田季安听到朝廷发兵征讨王承宗的消息后，认为如果成德镇被扫平，魏博镇将很难独存，决定出兵阻止讨伐之军过境。时卢龙镇牙将谭忠出使魏博，知道田季安的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四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四年十月。

打算后，向其建议说："如某之谋，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师越魏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专付中使，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指神策军），君知谁为之谋？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若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画长策，仗猛将练精兵，毕力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而伐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而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当魏而来也。"① 谭忠进而建议田季安，当唐军到达时，厚加犒劳，然后出兵直逼成德，密派人告诉王承宗，让他让出一城，使魏博能取信于天子，又使成德不受大的损失。这个使魏博镇两面讨好的计划，大受田季安的赞赏。双方商议后，王承宗让出堂阳（今河北新河西北）。田季安占据堂阳后，按兵不动。谭忠的计划表面上是为魏博设想，实际上是为朝廷出力。这个计划的实施，虽不能使魏博真心为国出力，但是起到了使其不公然站到叛镇一方的作用，这样就减轻了唐军攻伐叛镇难度，达到了削弱叛镇力量的目的。

谭忠回到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后，又用智谋劝卢龙节度使刘济进兵。元和五年（810 年）正月，刘济亲自率兵 7 万首先向成德镇发动攻势，连下饶阳（今属河北）、束鹿（今河北辛集）两城。河东、河中、振武、义武等军后会于定州（今属河北）。诸军将领以宦官吐突承璀为皇帝近臣，心中恐惧，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故不为其献一谋，也不积极进讨。唯河东将领王荣攻下洄湟镇（今河北行唐东北）外，其余皆无战绩。

吐突承璀率大军经过魏州，抵达邢州（治今河北邢台）行营，即向成德军发动攻势。由于吐突承璀不知兵法，也无指挥能力，故唐军屡次受挫，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士气非常低落，大军被阻于邢州，久久不能前进。翰林学士白居易上表，请求从河北撤兵，宪宗不听。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首先建议讨伐王承宗，但当朝廷出兵讨伐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四年十一月。

时，他又逗留不进，暗中与王承宗通谋，并抬高当地粮食、草料价格，增加唐军和籴费用，以获厚利。他还乘机要求授予自己平章事，诬奏说诸道与王承宗暗中勾结，不可贸然进兵。宪宗对此非常恼怒。这时，卢从史的牙将王翊元被遣入京奏事，宰相裴垍召见时，谕以君臣大义，劝他效忠朝廷。王翊元也不满意卢从史的作为，遂把其阴谋全盘托出。裴垍命他返回本军，串连军中其他将领，共同对付卢从史。王翊元第二次入京时，带来了其军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人愿意归附朝廷的消息。裴垍了解卢从史军中的情况后，向宪宗建议以计擒捉卢从史。宪宗熟思后，表示同意，命吐突承璀相机行事。吐突承璀知道卢从史贪图小利，利用向其赠送珍奇之物的办法，讨得卢从史的欢心，使他放松了戒备之心。然后诱卢从史到吐突承璀营中博戏，伏壮士于幕后擒获，押往京师。卢从史的军队见其帅被捉，大哗，被甲持械出营，乌重胤叱之曰："天子有诏，从者赏，敢违者斩！"① 于是，士卒皆敛兵返回部伍。宪宗任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以原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以代替卢从史。把卢从史贬为驩州（治今越南荣市）司马。

元和五年（810 年）四月，河东节度使范希朝、易定节度使张茂昭所率的唐军大败成德镇军于木刀沟（在今河北新乐境内）。五月，刘济攻下安平（今属河北）。唐军虽取得以上胜利，然皆为小胜，军事上仍无大的进展，双方处于僵持态势。于是，白居易再次上书，请求罢兵。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自陈以前为卢从史所离间，愿意输纳贡赋，请朝廷任免官吏，要求给予自新的机会。淄青李师道等也上表请求赦免王承宗。宪宗因唐军久战无功，军费开支浩大，于是同意王承宗的请求，正式任命其为成德节度使。罢去吐突承璀神策中尉之职，降为军器使。各道唐军罢归本道，朝廷共出 28 万匹布帛，用于赏赐诸道军士。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五年四月。

二、唐军二讨王承宗

（一）王承宗再次叛唐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刺客杀死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宪宗以为此事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派人干的，下诏历数王承宗罪恶，并不许其朝贡，因当时正对淮西用兵，顾虑到两面作战，故未对王承宗出兵讨伐。当时，魏博镇屯驻成德镇境上的军队，屡次为王承宗所击败，其节度使田弘正大怒，前后10次上表，请求讨伐王承宗，皆不许，但允许他进军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作好随时出击的准备。十月，又命易定、振武2镇出兵，开赴河北，准备讨伐王承宗。

十二月，“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①。宰相张弘靖认为两面作战，国力不支，应在讨平淮西后，再讨成德。宪宗不听。张弘靖因此请求罢相，于是，宪宗调他出任河东节度使。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宪宗下诏，再次削去王承宗官爵，命诸道进兵讨伐。

（二）唐军六道进讨

这次讨伐，宪宗无出动神策军，命河东、卢龙、易定、沧景、魏博、昭义等6道，共同出兵，四面围攻。由于上次以宦官为统帅受到指责，宪宗这次出兵没有再置统帅，致使6军各自为战，互相观望，缺乏统一指挥，虽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但不能动摇成德镇的根本，予以致命打击。

二月，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击败成德军，斩首千余级。卢龙节度使刘总也败其军，斩杀千余人，并包围了乐寿（今河北献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败成德兵，攻下固城、鵶城（皆在今河北南宫境内）。四月，刘总又败成德兵于深州（治今河北深州西南），斩首2500级。易定节度使浑镐破成德兵于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年十二月。

杀千余人。七月，田弘正在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击败成德军，斩 2000 余人。八月，郗士美引精兵大破成德军于柏乡（今属河北），杀千余人，降千余人。由于诸军无全力推进，互相观望，使郗士美一军过于突出，易受攻击。

十二月，沧景节度使程执恭败成德兵于长河（今山东德州东）。易定节度使浑镐屡战屡胜，遂引军深入敌境，驻扎于恒州（治今河北正定，为成德镇治所所在）北 30 里处。王承宗见诸军没有齐进，浑镐军过于突出，遂派兵进入易定境内，焚掠城邑，易定军人心动摇，欲想回军。宪宗派中使催促出战，浑镐不得已率军直趋恒州城下，与王承宗决战，由于士气低落，唐军大败，逃回定州（今属河北）。宪宗因浑镐大败，遂以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刺史陈楚为节度使以代替浑镐。浑镐军败后，郗士美军更加显得突出，形势极为不利，郗士美请求退军，唐廷不许。元和十二年（817 年）三月，王承宗率军反攻，在柏乡大败郗士美之军，杀千余人，郗士美只好退回本道。接着，王承宗遣大军 2 万东进，攻到东光（今属河北），切断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与景州（治今河北景县东北）的联系，景沧节度使程执恭（后改名程权）不能抵御，率众退回沧州。

王承宗采用先打突出之敌，各个击破的战法，接连击败浑镐、郗士美、程执恭等三镇军队，实际上已击破唐军的这次围攻。唐军六道围攻，“兵十余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壹，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刘总既得武强，引兵出境才五里，留屯不进，月给度支钱十五万缗”①。于是，朝臣中反对用兵者又再次上书，要求宪宗罢兵，专力对付淮西镇。五月，宪宗下诏，罢 6 道之兵，使各自回镇。讨伐王承宗再次失败。

（三）成德镇归降

元和十二年（817 年）十月，唐军攻下蔡州（治今河南汝南），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五月。

活捉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淮西镇平。

次年二月，宰相裴度遣柏耆往恒州，对王承宗谕以利害，劝其归降朝廷。王承宗见淮西已平，心中恐惧，派人向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恳求，愿意以二子为质，献德、棣2州，贡献赋税，请朝廷任命官吏，以求自新。田弘正见其出于真心，为其奏请，宪宗不许。田弘正多次上表请求，宪宗不愿违田弘正之意，乃许之。四月，王承宗经田弘正送来二子和德、棣2州图印，宪宗赦免其罪，恢复其官爵。

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王承宗病死，其部下秘不发丧，立王承宗之弟王承元为留后。王承元以吴元济、李师道为鉴戒，坚决不受，诸将固请，不得已暂领军务，然后密表上奏朝廷，请朝廷选授成德镇节帅。这时，宪宗已死，穆宗即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并派使赴成德镇宣慰，出钱100万贯赏赐将士。成德镇始归顺朝廷。

第五节　唐廷收降魏博镇

魏博镇为河北诸镇中最为跋扈、凶残的藩镇，自田承嗣割据以来，拥兵自重，多次叛乱，对抗朝廷。元和七年（812年）八月，节度使田季安病死，幼子田怀谏继任。唐宪宗听取朝臣的意见，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把握时机，兵不血刃，促使魏博镇归顺朝廷。

一、李绛献策谋取魏博镇

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遂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其军中政务，大抵任徇情意，宾僚将校，言皆不从"①。晚年患风疾，杀戮无度，军政废乱。其夫人为洺州刺史元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季安传》。

谊之女，生子田怀谏。元和七年（812年）八月，田怀谏11岁，元氏见田季安病重，诸将离心，于是把田季安迁于别居，召诸将立田怀谏为节度副大使、知军事。月余，田季安病死。由于田怀谏年幼，又以牙内兵马使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协助处理军务。田兴"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①，曾多次规谏田季安，不要滥杀胡为，在军中颇有威望。

如何对待魏博镇，是姑息，还是讨伐？由于元和四年（809年）讨伐王承宗失利的余悸，宪宗一时犹豫不决。宰相李吉甫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出兵讨伐。李绛认为，"酌量事势，必不劳兴师，魏博当须归国"②。他向宪宗分析了魏博镇的情况，说："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则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彼自列将起代主帅，邻道所恶，莫甚于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齑粉矣。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练士马以须后敕，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矣。至时，惟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闻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赏，必皆恐惧，争为恭顺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③宪宗认为李绛的论述颇有道理。

面对魏博镇出现的情况以及李吉甫、李绛两人截然不同的主张，宪宗权衡利弊，慎重处置，派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

---

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七年八月。

②《李相国论事集》卷四。

度使，集中兵力，训练士卒，严阵以待，以便随时对魏博发生情况作出反应，对其构成一定的军事压力；同时，在朝廷内部制造舆论，静观局势变化，以掌握主动权。

二、田兴率镇归顺朝廷

就在宪宗对魏博事件作出正确对策的同时，魏博镇的局势果然如李绛所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田怀谏年幼，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蒋士则多次以个人爱憎调换诸将，引起众将的普遍不满。更由于田怀谏自为节度副大使后，朝廷的正式任命久而不至，军中人心惶恐。这时，军将士卒把希望寄托于步射都知兵马使田兴身上。一天早晨，田兴入军府议事，数千士卒环绕大噪，跪拜于田兴前，恳请他出任节度留后。田兴大惊，坚决不同意，士卒围困不散，久之，田兴自度不免，乃与众相约，"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①。然后，田兴杀死蒋士则等10余人，迁田怀谏于军府外，上奏朝廷，请求处置。

宪宗接到奏报，派使赴魏州宣慰。不等使者返回，即用李绛之策，授田兴为节度使，并赐名弘正。"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②。在是否以重金赏赐的问题上，李绛力主重赏魏博士卒，使他们真正感受到朝廷的恢弘大度及浩荡皇恩。他劝宪宗出内库钱150万缗，派专使赴魏博抚慰、赏赐。宦官们认为赏赐太多，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朝廷必然还要拿出同样多的钱财行赏，将会严重削弱国家财力。李绛说："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而已乎！"③ 宪宗权衡得失，采纳了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七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七年十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七年十一月。

李绛的建议。

十一月，宪宗派知制诰裴度前往魏州宣慰。裴度率朝廷使团到达魏州后，当地百姓多年未看到朝廷威仪，万人空巷前去观看，如临百戏竞场。裴度晓谕魏博将士严守朝廷法度，维持地方治安。随后把所带的150万缗钱物拿出赏赐，免除魏博所辖6州百姓一年赋税。这样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仅魏博军士“欢声雷动”，而且使成德、淄青等镇在魏博的使者，也都相顾失色，叹息说：“倔强者果何益乎！”①裴度还对田弘正讲解了君臣上下之义，田弘正耐心倾听，终夕不倦，并请裴度遍至所辖州县，宣示朝廷恩命。田弘正还请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及本镇所缺的90名官员，“行朝廷法令，输赋税”②。宪宗任命户部郎中胡证为魏博节度副使，其他奏请一一照准。从此，魏博镇归附朝廷。

在朝廷使臣到达魏博的同时，淮西、淄青、成德等镇派遣的使者也到了，他们劝说田弘正遵奉河朔旧例，不要归附朝廷。田弘正一概不听。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又遣使游说宣武节度使韩弘，劝他与淄青、成德联合攻打魏博。韩弘非但不听，而且威胁说，如果你敢渡河北上，攻打魏博，我则出兵攻取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隶淄青镇）。李师道惧，始终不敢动。

三、魏博镇归顺后的影响

魏博镇归附唐朝廷，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夫之说：“河朔自薛嵩、田承嗣以来，世怙其逆，非但其帅之稔恶相仍也，下而偏裨，又下而士卒，皆利于负固阻兵，甘心携贰于天子。故帅死兵乱，杀夺其子，拥戴偏裨者不一，而终无有恃朝廷为奥援者。”③魏博镇的归附，打破了自代宗以来形成的河朔诸镇的割据联盟，为唐朝廷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初步改变了割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七年十一月。

③ 《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宪宗十一》。

据藩镇父死子继，不由朝廷任命的恶习。

其次，卢龙、成德、淄青诸镇，看到朝廷对魏博的优厚待遇，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他们内部的矛盾，起到了分化瓦解割据藩镇内部人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朝廷的向心力。

再次，魏博镇的优越地理位置，上控冀赵，东拒淄青，南扼宣武。该镇归附后，使朝廷在这一带力量有所增强，起到了一定的军事威慑作用。以后，在唐廷讨伐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成德王承宗的战争中，魏博镇都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有力地支持了朝廷的军事行动。宪宗以后取得平定淮西、淄青等叛镇的胜利，都和魏博镇的归附朝廷不无关系。

最后，从元和七年（812 年）起，魏博镇每年定期向朝廷输纳赋税，不但在一定程度增强了朝廷的财力，也坚定了宪宗的平藩决心，使他在淮西数年不克的情况下，保持必胜的信念，调整部署，最终夺取了胜利。可见，魏博归附对宪宗朝中兴局面的出现有积极的作用。

第六节　平定淮西吴元济的作战

淮西镇，地处中原腹心，扼江淮至长安的漕运之道，控御颍、汝入淮口岸，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唐廷必须巩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宰相李吉甫指出：“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① 经过数年的激战，唐军劳师无功，后赖裴度督师，李光颜奋战，李愬雪夜入蔡州，终于平定了淮西之乱。

一、淮西吴氏割据的形成

淮西镇（又名彰义军）自李希烈之乱被平定后，由陈仙奇为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九年九月。

节度使。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陈仙奇又被其部将吴少诚所杀，德宗不能讨伐，即以吴少诚为淮西节度留后。唐朝廷对骄兵悍将的废主自专，无力制止，只好听之任之。吴少诚见唐廷软弱无能，更加跋扈，“日事完聚，不奉朝廷”①。贞元十五年（799 年），陈许节度使曲环死，吴少诚乘机出兵攻临颍（今属河南），并进围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唐廷下令削去吴少诚官爵，分遣 16 道兵马征讨，以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为招讨使。吴少诚出兵抗拒，大败唐军。德宗无奈，只得复其官爵，并加检校仆射。顺宗即位，又加同平章事。

元和四年（809 年），吴少诚病死。吴少阳勾结吴少诚家僮鲜于熊儿，在吴少诚弥留之际，伪造其遗命，以吴少阳为节度副使，知军事。吴少阳，本是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人，早年在魏博军中时与吴少诚父吴翔关系密切。及吴少诚为淮西节度留后时，召其到淮西，署为军职，授予官爵，并认作堂弟。吴少阳阴谋得逞后，秘密害死吴少诚的儿子吴元庆。待吴少诚一死，马上自立为节度留后。由于当时唐廷正忙于讨伐成德王承宗，不欲两面作战，于是授吴少阳为淮西节度留后，不久升为节度使。吴少阳据淮西 5 年，从不朝觐皇帝。“汝南多广野大泽，得豢马畜，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内则数匿亡命，以富实其军”②。元和九年（814 年）九月，吴少阳病死。

吴少阳长子吴元济，在其父死后，秘不发丧，以吴少阳的名义上奏朝廷，请以吴元济主军务。宪宗为摸清淮西的情况，派宫中御医前往视病。吴元济又伪称病愈，不让见吴少阳，御医只得悻悻而还。宪宗得知吴少阳死讯后，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为使，前往蔡州吊祭。吴元济不迎朝廷使节，发兵四出，攻掠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鲁山（今属河南）、襄城（今属河南）等地，“汝州、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关东大

---

① 《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

② 《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附吴少阳吴元济传》。

恐”①。李君何不得入，只好返回京师。

二、唐廷遣兵一讨吴元济

面对吴元济的横暴肆虐，宪宗决计出兵讨伐。十月，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申（治今河南信阳）、光（治今河南潢川）、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伐吴元济。设置淮颍水运使，运江淮之米自淮阴（今属江苏）泝淮入颍水，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入溵水，输于郾城（今属河南），以供讨伐淮西诸军之用。

次年正月，宪宗下诏削去吴元济一切官爵，诏书指出：“吴元济逆绝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丧，擅领军事。……骚扰闾阎，恣行夺攘，无所畏忌。……穷凶稔恶，纵暴挺灾，覆载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弃，良非获已，致此兴戎”②。命宣武、忠武、河东、武宁、淮南、宣歙、魏博、剑南东川、山南东道、江西等16道军队，从东、西、南、北四面围攻淮西。

同月，招抚使严绶挫败淮西兵，大意不加戒备，淮西兵乘夜暗偷袭，严绶军败退。二月，严绶退入唐州（治今河南泌阳）防守。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团练使令狐通进击，也为淮西兵所败，退保寿州。宪宗遂命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任其职，贬令狐通为昭州（治今广西平乐西北）司户参军。唐廷命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兵5000人授与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刺史李听,使其率领以讨吴元济。柳公绰请命于朝廷,愿亲率军队出征,宪宗允许。柳公绰到达安州,任李听为鄂岳都知兵马使,选精锐士卒6000人,交由李听统率,李听感恩听命,如出麾下。柳公绰号令严整,诸将畏服,每战皆胜。三月,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破淮西军于临颍。四月,又大破淮西军于南顿(今河南项城南)。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派其子田布率兵

---

① 《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附吴少阳吴元济传》。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讨吴元济敕》。

3000归属严绶指挥。尽管唐军初战有过受挫记录，但十几万大军，四面进击，也使吴元济惊恐万分，他接受大将董重质（吴少阳之婿）的建议，派使向成德王承宗、淄青李师道求援。王承宗与李师道上表朝廷，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不许。李师道遂遣大将率兵3000人赴寿州，声言助朝廷讨吴元济，实欲援助吴元济。

五月，宪宗因诸军讨叛无功，遣御史中丞裴度赴战地宣慰，调查用兵情况。裴度返回京师后，向宪宗汇报了前线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并言淮西可取之状。他说："臣观李光颜见义能勇，终有所成"①，又指出前线统帅严绶缺乏将帅才略，不能担此重任。当时，知制诰韩愈也随裴度到过淮西前线，上书指出："（淮西）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建议招募陈（治今河南淮阳）、许、安、唐、汝（治今河南临汝）、寿等州与淮西濒邻的百姓，他们"悉有兵器，……习于战斗，识贼深浅"②，如果供给一定的军需，习谙战阵，将会是一支勇敢善战的部队，在讨伐叛镇的战争中发挥较大作用。同时，韩愈还建议对淮西士卒，在势穷力竭后，不要过分杀戮。

五月十四日，淮西兵紧逼李光颜在时曲（今河南项城西）的营寨列阵，忠武军不能出营接战。李光颜遂自毁其栅，亲率骑兵冲击敌阵，敌矢射中其甲页如猬毛，仍力战不退，唐军见主帅如此，人人奋勇争先，杀得淮西兵大败，斩杀数千人。

三、成德、淄青破坏讨吴

李师道在淄青厚资豢养刺客数十人。当其得知宪宗不同意他们请求赦免吴元济的奏请后，便与这些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朝廷讨伐藩镇最急需的是粮储，现在河阴（今河南郑州西北）仓储积贮着大量江淮租赋，如果派人前去焚烧，必然会造成朝廷思想

---

① 《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

② 《全唐文》卷五五〇《论淮西事宜状》。

混乱；另外，可募壮士在东都焚烧宫阙，抢劫市肆。他们还认为“上虽志讨蔡，谋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愿为袁盎事，后宰相恐惧，请罢兵，是不用师，蔡围解矣”①。李师道采纳他们的计策，派人袭击河阴仓，杀死守卫兵卒 10 余人，放火烧毁钱帛 20 万匹贯，米 24800 石，仓房 55 间。东都留守吕元膺大怒，斩杀了玩忽职守的守仓院的将领。河阴被焚，两京部分官员惊恐不安，纷纷请求宪宗罢兵，宪宗不许。

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遣牙将尹少卿入朝奏事，并为吴元济游说。尹少卿在中书省，出言不逊，宰相武元衡大怒，将其叱出。王承宗遂上书诋毁武元衡。六月三日，天未亮，武元衡照例带两个家人骑马上朝。武元衡的住宅位于长安靖安坊，当武元衡 3 人走出坊东门不远，突然从水沟边的树后阴影处窜出数名刺客，用箭射走从人，用大棒猛击武元衡左大腿，并追赶 10 余步后，把武元衡掀下马来，割下其头颅而去。众人听到武元衡家人呼救声，纷纷赶来，四下持火寻找，发现武元衡倒在其宅东北角坊墙之外的血泊之中。同日，极力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上朝时，刚出通化坊坊门，也遭到刺客袭击，幸赖仆人冒死救护，加之裴度头戴的毡帽较厚，被击倒后滚到路旁水沟中才幸免于难。消息传开后，京师大骇，宪宗下诏搜捉刺客。贼人又遣人书于金吾卫及府县官衙，威胁说：“毋急捕我，我先杀汝。”② 故捕者不敢搜捕太急。兵部侍郎许孟容上奏说：“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③并请任裴度为宰相，大索贼党，追查指使者。于是，宪宗下诏中外急捕刺客，捉获者赏钱万缗，给五品官；敢藏匿者，诛杀全族。结果，从成德镇驻京进奏院中，捉获其镇军卒数人，行止无状。神策将军王士则（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之叔）告发王承宗遣何宴等人杀武士衡。于是，捕获何宴等人审问，全都服罪，斩杀之。而李师道所派的刺客，潜匿而去。

---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三《李师道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年六月。

李师道曾在东都设置留后院，为淄青镇往来京师者的歇宿之所，杂人往来，吏不能诘。由于淮西兵进犯洛阳东畿，东都驻兵调往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屯防，城中空虚。李师道暗中派兵潜伏在院中，至数十百人，“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已烹牛飨士，明日，将发。其小卒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亟追伊阙兵围之”①。贼众突围而出，唐军跟其后，不敢逼近，致使贼众逃往伊阙山谷之中。后当地射猎的山棚(土人)，由于其猎物被贼众抢夺，召集同类并引唐军围贼于谷中，全部捉获。审理后得知其为首者乃中岳庙和尚圆净。此人曾为史思明部将，勇悍过人，年已80余岁，为李师道出谋，多买田地于伊阙、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之间，分给山棚耕种，以收买人心，结党作乱。计划由圆净举火为号，召集伊阙、陆浑2县山棚袭击东都，城中贼众在内策应，以血洗全城。事败后，其同党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两名驻守东都的唐军将领。吕元膺审理此案时，始查知杀武元衡者，乃李师道所指使。由于宪宗正在讨伐吴元济、王承宗，虽欲讨李师道，然力所不能及，只好暂且作罢。李师道还多次出兵进攻徐州(今属江苏)。十二月，武宁节度使李愿出动步骑还击，大败淄青兵，斩首2000余级。

李师道、王承宗对唐廷讨伐吴元济的破坏，虽然造成许多混乱和损失，然并未动摇宪宗扫平吴元济的决心。在武元衡被杀后，有人迫于淄青、成德的威吓，建议宪宗免去裴度官职，以讨好两镇，罢兵言和。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② 20多天后，裴度伤势好转，宪宗就任他为宰相，主持削藩大计。

四、唐军调整部署再讨吴元济

严绶为招抚使督率诸军讨吴元济，但其无将帅之才，只知倾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年八月。

② 《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

府库之财以赐士卒。又厚赂宦官以为后援，拥数万之众，数月无尺寸之功。元和十年（815年）九月，宪宗改以宣武节度使韩弘为讨淮西诸军都统，委以统帅重任。然“弘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①。十月，宪宗见韩弘进讨无功，乃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治今湖北襄樊）、复（治今湖北仙桃西南）、郢（治今湖北京山）、均（治今湖北十堰东北）、房（治今湖北房县）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治今河南泌阳）、随（今湖北随州）、邓（今河南邓州）节度使。命高霞寓专事攻战，李逊调5州之赋供给军队之需。

十一月，唐军获得几次小胜。寿州刺史李文通击败淮西兵的进攻，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兵于小溵水（今河南沙河），李文通再败淮西兵于固始（今属河南）。但是，作为都统的韩弘，“虽居统帅，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②。所以唐军人数虽占绝对优势，但战场形势并无大的改观。十一年三月，李文通又一次击败淮西兵，攻下锨山（今河南沈丘东）。高霞寓败敌军于朗山（今河南确山），斩首千余级。四月，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在陵云栅（今河南郾城东北）大败淮西兵，斩首3000级。五月，李光颜、乌重胤在陵云栅再次击败淮西兵，斩首2000级。

六月，唐随邓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遇伏大败，全军覆没，高本人只身脱逃。消息传来，朝议哗然，宰相李逢吉等纷纷入见，劝宪宗罢兵休战。宪宗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③ 要求罢兵的议论再次受挫。七月，宪宗贬高霞寓为归州（今湖北秭归）刺史，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申（治今河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年九月。

② 《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六月。

南信阳)、光（治今河南潢川)、蔡、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为军府所在地，指挥南线讨伐事务。这次前线临时换帅，由于用人不当，反倒造成前线军事局势的混乱。袁滋本人就不主张讨伐，他到前线后，试图讨好吴元济，命去掉斥候，不许军队进犯吴元济境。吴元济乘机派兵包围了新兴栅（今河南泌阳东北）的唐军，袁滋不出兵拒战，竟向吴元济卑辞陈请，屈膝求和。宪宗闻听袁滋的丑恶行径后，即以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贬袁滋为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刺史。李愬为名将李晟之子，以父荫入仕，累官卫尉少尉、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旧唐书》卷一三三本传说他："有筹略，善骑射"。高霞寓战败后，李愬在长安上表宪宗，请缨出征，宰相李逢吉也认为李愬才可大用，向宪宗推荐以代替袁滋。另外，在此之前，宪宗还命知枢密梁守谦赴前线宣慰督察，授以空名告身500通及金帛数万，以褒奖忠勇为国之士，并使其宣慰完毕后，即留前线监军。几天后，敕加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检校官，同时又对其久无大功表示不满，暗示若再无显著功勋，将严加惩处，以激励其奋勇杀敌。

元和十二年（817年）正月，李愬到达唐州采取示弱蓄势的方略，亲自抚问伤病士卒，对军政之事并不作大的调整，当有人向他提醒时，李愬说："吾非不知也。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贼易之，闻吾至，必增备，吾故示之以不肃。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然后可图也。"吴元济自以曾败高、袁二帅，果然"轻愬名位素微，遂不为备"①。为了增强李愬之军的战斗力，宪宗又调昭义、河中、鄜坊等镇步骑兵2000人，归其指挥。不久，李愬的巡逻骑兵捉获吴元济的部将丁士良，此人为吴元济骁将，多次进扰唐军，将士非常痛恨，请求把其处死。李愬知其可用，遂释放并署为捉生将。丁士良感李愬大恩，献计说："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好自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正月。

出战，请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① 几天后，丁士良设法擒获陈光洽，吴秀琳果然以文城栅（今河南汝南西南）降于李愬。于是，西线唐军士气大振，人人有欲战之志。敌军中投降者相继于道，父母健在者，还发给粟帛以养家，降众感泣。由是，李愬军连续攻下淮西城镇数个，吴元济大惧。

李光颜率领的北线唐军在宪宗严诏督促下，也积极向前推进，与淮西军夹溵水（今河南沙河）而对峙。诸军相互观望，无敢先渡溵水者。陈（治今河南淮阳）、许（治今河南许昌）兵马使王沛，忠勇无二，率先领兵 5000 渡过溵水，占据要地。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相继渡水，进逼郾城（今属河南）。李光颜率军进击，大败淮西军 3 万人于郾城，其士卒被杀者十之二三。郾城令董昌龄与守将邓怀金率众投降，郾城遂被唐军攻占。

由于李愬采取了示弱的策略，使吴元济放松了对西线的警惕。当他得知郾城被攻破后，就把在蔡州的其亲信部队及守城士卒调往洄曲（今河南漯河东南），归其将董重质指挥，以加强那里的防务。洄曲是蔡州西北的军事屏障，吴元济的精锐军队——骡军，就在那里驻守。吴元济此举虽加强了洄曲防务，但却使蔡州兵力空虚，给西线唐军以可乘之机。

五、李愬奇袭蔡州活捉吴元济

李愬为了扫平淮西叛镇，日夜操劳，精心谋划，每得淮西降卒，必亲自了解敌方情况，因此对淮西军情变化、地理形势等了如指掌。降将吴秀琳向他建议说，欲想夺取蔡州，非得李祐相助不可。当时李祐驻守兴桥栅（今河南上蔡西南），多次击败唐军，是吴元济部下勇将之一。李愬设计活捉了李祐，众将一致要求杀掉李祐以平众愤，李愬不听，为他松绑，待以客礼。为了防备众将把此事上奏皇帝，皇帝若下诏处死，自己将不好解救，李愬主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二月。

动将李祐押送京师，密奏宪宗说，如杀李祐，平蔡之事将不能成功。宪宗于是下诏释放李祐，并送回前线归李愬调遣。李祐返回后，李愬对他更加信任，令佩刀巡警，自由出入军帐，有时二人同宿，密语通宵达旦。李愬有精锐牙军 3000 人，号六院兵马，命李祐为六院兵马使，统率这支部队。李祐感恩戴德，忠心报效朝廷。李愬还招募敢死之士 3000 人，号曰突将，朝夕操练，准备突袭蔡州。由于连降大雨，到处是积水，只好延期，等待时机。

七月，讨蔡诸军虽有捷报不断传来，但距最终胜利还相差甚远。宪宗为此十分焦虑。裴度向宪宗表示愿意前往前线督战，他对宪宗分析形势说："（元济）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壹，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① 并表示自己誓不与此贼同生死。他还推荐户部侍郎、右庶子韩愈等人与己同行。行前，裴度对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② 宪宗闻听感动得流泪不止。

八月，裴度到达郾城。当时，诸道军中皆有中使为监军，进退不由主将，这些监军胜则抢先报捷，败则百般凌辱诸将。裴度上奏宪宗，把监军全部罢去，使诸将得以掌握指挥权。裴度还针对前线军事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协调各军行动，加强统一指挥；惩弊奖功；筹集各地粮饷，保证前线需要等。裴度对李光颜有知遇之恩，这次裴度到前线督师，李光颜尽心竭力，保护裴度安全，挫败了淮西军企图袭击裴度的计划。又协同诸军向淮西正面发动猛烈进攻。"是月，贼知光颜勇冠诸将，乃悉其众出当光颜之师"③。这样，使守卫蔡州的士卒皆为老弱不堪一战者，李愬才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出奇兵雪夜袭取蔡州。

九月，李愬率兵进攻吴房（今河南遂平）。临行时，军吏说：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七月。

② 《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

③ 《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颜传》。

“‘往亡日，请避之’。愬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①利用敌军麻痹大意，出其不意，攻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余敌退守子城，不敢出战。李愬伪作退兵，诱敌来追，又斩杀追兵将领孙献忠。众将劝李愬乘胜进攻敌军子城，李愬为了袭取蔡州，不愿贪图一城而引起吴元济的注意，遂引兵退回。

李祐向李愬建议说：“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② 十月，李愬派人到郾城，向裴度密报了这个计划，得到裴度的赞赏和批准。

十月十五日夜，冷风如刀，雪花飞扬，天黑如墨。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守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命李祐、李忠义率突将3000人为前锋，自率3000人为中军，命田进诚率3000人为后军，冒大风雪趁夜出发。军队出发后，不知行动的目的，只得到向东前进的命令。走了60里后，到达张柴村（今河南遂平东南），占据敌栅，尽杀守卒及烽子③。命士卒稍作休息，食干粮，整行装，然后，留500人镇守，并负责拆断通往洄曲的所有桥梁，引军继续前进。众将请示前进方向，李愬回答说，入蔡州活捉吴元济。众将皆大惊失色，监军更是痛哭流涕说，果然中了李祐奸计。李愬毫不动摇，严令诸军前进。当时，风雪更加猛烈，旌旗撕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自张柴村向东的道路，唐军从未走过，人人皆以为此行必死，由于李愬军纪严厉，无有敢于违抗者，只好抱定一死的态度继续前进。半夜时分，经过70里急行军到达蔡州城下，近城之处有鹅鸭池，李愬命军士击打鹅鸭，以混淆部队行进发出的声响。

---

①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附李愬传》。往亡日，又称天门日。旧历每月都有，或在寅日，或在巳日。古时迷信，凡是日诸多禁忌，如忌出军等。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十月。

③ 烽子，指古代观察敌情，传递消息，燃放烽火的军卒。

自从吴少诚割据以来，唐军不到蔡州城已30余年，加之风雪夜，守城军卒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唐军攻城，丝毫无有防备，唐军兵临城下，竟无一人觉察。李祐、李忠义掘城为坎，先登而上，其余军卒紧跟其后，攀上城墙。守门军卒熟睡未醒，被唐军全部处死，只留下打更者，让其依旧打更报时。先入城的唐军打开城门，迎接后续部队全部入城，城中之人仍无觉察。

天明，风雪停止，李愬率军占据吴元济外宅。当有人报告官军已入城时，吴元济笑着说："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人报告说：城已陷落！他仍不以为然地说："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① 说着爬起来穿衣，当他走出卧室，步入庭院时，听到唐军号令之声甚为严整雄壮，才感到大事不妙，赶紧率左右登牙城拒战，企图等待援军解救。

当时，吴元济的大将董重质率领精兵万人镇守洄曲。李愬命查访董重质家住址，厚待其家属，并遣其子往洄曲持李愬书信劝降。董重质见大势已去，又感李愬厚待其家，遂单骑赴蔡州向李愬投降。其军队被李光颜收编。李愬命李进诚率军进攻牙城，摧毁外门，找到兵器库，唐军用缴获的兵器，重新攻城，放火焚烧牙城南门。当时，附近百姓见唐军作战勇敢，平日又深受吴元济欺压，争先恐后抱柴草助唐军进攻。吴元济见牙城南门已毁，所盼望董重质的援军已无希望，于城上请罪，李进诚令吴元济沿梯走下牙城，束手被擒。

不久，淮西所辖的申、光2州及其余2万多人马相继投降，平定淮西的战争至此胜利结束。十一月一日，押送吴元济的槛车到达长安，大明宫兴安门前人海如潮，宪宗在群臣簇拥下驾临兴安门城楼上受俘，百姓欢声雷动。吴元济被押至楼前示众，随后宪宗下令将其"斩之于独柳"②，时年35岁。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十月。

② 《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附元济传》。

第七节　平定淄青李师道的作战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助吴元济对抗朝廷，刺杀宰相武元衡，烧毁河阴仓的钱帛、粟米，在东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出兵进攻徐州等，早已为唐廷所不容。但当时宪宗正忙于平定成德、淮西叛乱，无力讨伐，故隐忍未发，反而加李师道为检校司空以安其心。淮西平定后，唐廷腾出手来，着手解决淄青的问题，终于扫平了这一割据54年之久的藩镇。

一、李师道反叛与唐军五路进讨

淮西吴元济被平定后，李师道自知罪恶深重，忧惧不知所为。其谋士李公度及牙将李英昙乘机进言，劝他以子为质，献地于朝廷以赎罪。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李师道遣使奉表，请求朝廷允许以长子入京为人质，并献出沂（治今山东临沂）、密（治今山东诸城）、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3州。宪宗允许其请求，遣左常侍李逊前往郓州（治今山东东平西北）宣慰。

然李师道暗弱，军政大事独与其妻魏氏、家奴胡惟堪、杨自温、宠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等人商议，大将与幕僚反而不能参预。由于其妻魏氏不愿自己的儿子作人质，联合蒲氏、袁氏共同向李师道进言，说："自先司徒（指李纳）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无故割而献之！今计境内之兵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不过以兵相加。若力战不胜，献之未晚。"① 李师道本无主见，觉得此话颇有道理，又反悔欲杀李公度，经人劝解，乃将其囚于牢狱。缢杀了李英昙。朝廷使者李逊到达郓州时，李师道列兵相迎，李逊正气凛然，谴责李师道不应自食前言，并说要把目前情况汇报给皇帝知道。李师道又与其部下商议，众人劝他不妨先答应不反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三年四月。

悔，避过这个风头后，再上表朝廷说明不便献地纳子的理由。“师道乃谢曰：‘向以父子之私，且迫于将士之情，故迁延未遣。今重烦朝使，岂敢复有二三！’”① 李逊察觉到李师道此话并非出于诚心，返回长安后，向宪宗建议说，李师道愚顽反复，恐怕必须用兵讨伐才能解决问题。果然不久，李师道上表借故不割地纳子。幕僚贾直言冒死3次进谏，劝李师道不要反悔，其中一次抬着棺材，一次自缚其妻子载于槛车进谏。李师道大怒，把贾直言囚禁起来。宪宗见李师道顽固不化，决计出兵讨伐。

宪宗为讨伐李师道，在人事上作了较大调整，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治陈州，今河南淮阳）、陈、许、蔡等州观察使，取消了淮西镇，以李愬为武宁（治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七月，宪宗下诏命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等5路军队，共同出兵讨伐李师道。命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全面负责军需物资的供给。

宣武节度使韩弘因讨伐吴元济时作战不力，心中恐惧，急欲立功赎罪，九月，率先出兵围攻淄青镇所属的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十一月，宪宗用裴度策，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军从杨刘（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渡过黄河，直攻郓州，距州城40里筑垒下寨，淄青大震。其他各路军队分别从本镇出发，围攻淄青。李师道见各路唐军大集，命其将出兵迎击，全都大败而归，伤亡惨重。到十二月底，仅魏博、义成两军就俘获了以淄青都知兵马使为首的将领47人。宪宗命全部赦免不杀，分别送回所俘获的军队中效命出力，说：“若有父母欲归者，优给遣之。朕所诛者，师道而已。”② 消息传到淄青以后，投降者相继于道。宪宗这个政策起到了分化瓦解敌军的作用，淄青镇之所以比较迅速地平定，和这个政策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三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

吴元济的大将董重质归降后，由于先前协助吴元济对抗朝廷，出力甚多，危害较大，故宪宗虽不便诛杀，也不愿重用，贬到偏远地区做小官。这次讨伐李师道，李愬乘机上奏宪宗，请求允许董重质赴前线立功。于是，以其为试太子詹事，到李愬的武宁军中效力。由于李愬善于收罗将才，军中人才济济，与淄青军大小战 11 次，每战皆胜。十二月三十日，攻下金乡（今属山东）。李师道生性残忍然又胆小怯懦，自朝廷讨伐以来，听到小败或者城邑失守的消息，忧郁成疾，因此凡有作战失利的消息，其左右都隐瞒不报。金乡、兖州（今属山东）等战略要地的失守，守将虽派人报告，然其贴身左右从不转告，直到李师道失败而死，也不知这种实际情况。

元和十四年（819 年）正月，宣武节度使韩弘攻克考城（今河南兰考东北堌阳），杀敌 2000 余人。李师道的沭阳（今属江苏）县令以城降于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刺史李听。十三日，李愬又攻下鱼台（今山东鱼台西）。十七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大败淄青兵于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斩杀万余人。接着，又在阳谷（今山东阳谷西南）击败淄青兵。二月，楚州刺史李听进攻海州，连克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怀仁（今江苏赣榆西北）等县。李愬击败淄青兵于沂州，并攻克丞县（今山东枣庄东南）。李师道见唐军步步紧逼，形势日益危急，征发民众整修郓州城堑，由于人力不足，于是以妇女充役，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怨。

二、刘悟倒戈与李师道的覆灭

宪宗命 5 道兵马征讨李师道时，为了防备魏博军队从河北渡黄河进攻淄青，李师道命都知兵马使刘悟率军镇守阳谷。当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从杨刘渡过黄河时，刘悟没有料到唐军会从这里渡河，因而没有在那里布防，使唐军轻易地渡河南下，防守部队又多次被田弘正的军队击败，致使其军逼近郓州，直接威胁到李师道使府的安全，引起他对刘悟的强烈不满。加之刘悟治军不严，对待士卒比较宽惠，军中号为刘父，更引起李师道的猜忌。有人对

李师道说："刘悟不修军法，专收众心，恐有他志，宜早图之。"①李师道本来就对刘悟不满，一听此言，就打算在召见他议事时，除掉刘悟。其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官军四合，悟无逆状，用一人言杀之，诸将谁肯为用，是自脱其爪牙也。"②李师道又犹豫不定，留刘悟在郓州居住了10天左右，终于还是放其回到前线军中。临行时赏以金帛，以安其心。刘悟觉察到李师道对自己有所怀疑，回到军中后，暗中做好了应变准备。刘悟的儿子刘从谏，当时在李师道的府中为别奏，时常和李师道家奴们在一起游戏，对府中密谋颇有了解，向其父秘密提供了不少情报。

刘悟回到军中后，又有人向李师道建议，刘悟终究是大患，不如早早除掉为好。缺乏主见的李师道再次改变主意，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八日，派使者二人携带密令去找刘悟的助手行营兵马副使张暹，令他斩杀刘悟并献上首级，然后暂时代替刘悟职务，统领前线军队。张暹与刘悟私交颇好，接到命令后，对使者说刘悟从郓州回来后，一直有所戒备，此事不能太匆忙，可假借节帅派人来军中犒师赏赐，诱刘悟来一同受赐，然后下手除去。稳住使者后，张暹直奔刘悟驻地把此事告诉了他。于是刘悟派人先杀死两个使者，然后召集诸将来其帐中议事，杀掉了动摇不定的将校30余人，公开举兵还袭郓州。

为了鼓励士气，刘悟宣布："入郓，人赏钱百缗，惟不得近军帑，其使宅（指李师道府）及逆党家财，任自掠取，有仇者报之。"③士卒饱食后，于当天半夜，悄悄向郓州进发。在途中凡遇到行人，全部予以扣留，故这次行动李师道丝毫没有觉察。距州城数里时，天还未明，刘悟派10人前行，骗开城门后，大军一拥而入，接连闯入罗城、子城④，唯牙城有牙兵拒守未入。刘悟命士卒火烧、斧劈牙城城门，由于牙兵只有数百，人数太少，故刘悟军很快就攻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

④ 唐朝节度使所在的州城，通常有三重城墙，最外一重称罗城，中间一重称子城，最里一重用以防护节度使府第，称牙城。

入牙城，牙兵自知不敌，皆放下兵器投降。李师道见势不妙，慌忙与其二子躲入厕床之下，被搜出后仍有求生之意，其子李弘方说，事已至此，还是速死为幸，于是，刘悟下令处死了李师道父子，并把首级献给田弘正，由田弘正转送朝廷。

刘悟从阳谷举兵袭取郓州时，曾派人把自己的计划转告给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约定如果偷袭成功，举烽火为号；如果城中有备，偷袭不成，请田弘正出兵相助，共同攻城，事情成功后，则归功于田弘正。故斩杀李师道父子后，把其首级转送田弘正营中。

淄青李师道灭亡后，宪宗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宣抚使，负责处理善后事务。杨於陵为断绝此方割据势力，把淄青镇一分为三，以郓、曹、濮（治今山东鄄城北）3 州为一道，淄（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今属山东）、齐（治今山东济南）、登（治今山东蓬莱）、莱（今属山东）5 州为一道，兖（今属山东）、海、沂、密（治今山东诸城）4 州为一道。宪宗同意，分别任命华州刺史马总、义成节度使薛平、行营供军使王遂等为上述 3 道节度使或观察使。命刘悟为义成节度使。

第八节　宪宗削藩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及军事原因

一、宪宗削藩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

宪宗元和时期的削藩战争，历时 14 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唐廷的威望有所提高，出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清代学者翟蒍评论说："宪宗立，平夏、平蜀、平吴、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刘总归命，恢然中兴之美也。"① 现代史学家岑仲勉说："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

① 翟蒍：《九畹史论》。

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① 他们对宪宗朝削藩战争的胜利，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宪宗元和时期一系列削藩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朝廷的威望和地位，使朝廷政令一时通达全国，人们梦寐以求的荡平藩乱、恢复一统的愿望初步实现。元和十四年（819 年）三月，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说："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② 此议得宪宗的赞同。次月，下诏令诸道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马，并归本州刺史统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州刺史的地位和权力，减少叛乱割据的因素。这个措施也只有在扫平藩镇叛乱后才有可能推行。

在胜利的形势下，各地藩镇纷纷遣使进贡，有所谓"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不少强镇的节帅要求留居京师，如宣武节度使韩弘、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卢龙节度使刘总，"亦见河南、北皆从化"③，心中恐惧，上表乞求允许弃官为僧。在宪宗末至穆宗初年，国家政令基本畅通，即使在河北地区也是如此。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但是，也要看到"元和中兴"的局限性。宪宗在削弱藩镇割据的基础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仅限于提高刺史的地位和权力。而节帅们专擅财赋的情况并无改变，仍然掌握有本道的财、政、军大权，这样他们仍具有募养职业兵的可能，节帅的兵、财、政三权不去，藩镇割据叛乱的基础就仍然存在。另外，削藩战争中实行的优赏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国家财力培养了割据势力，一旦行赏不及时，容易造成节帅的不满，激起兵变，如

①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 336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 5 月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宪宗元和十四年三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穆宗长庆元年正月。

后来卢龙朱克融发动的幽州兵变就是如此。

宪宗在削平李师道后，自以为大功告成，天下从此太平，产生了骄傲奢侈情绪，解散平藩中枢，贬贤任佞，信任宦官，使朝中朋党大盛。致使宪宗一旦身亡，朝廷在对待藩镇问题上又陷入混乱，割据势力再次抬头。此外，宪宗削藩战争的胜利，是在耗费了巨额资财的基础上取得的，国家开支的增加，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战后，本应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使国家的经济力量有所增强。可是，宪宗却不顾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困难，肆意娱乐，热衷于欢宴，大兴土木，崇尚奢华，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因此，对于宪宗削藩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要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宪宗削藩战争胜利的军事原因

宪宗时期削藩战争之所以取得很大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国家战略（详见第一节）。此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大胆启用具有军事才干而又忠于朝廷的军事新人担负重任。如平定西川刘辟时，启用并无资望影响的高崇文为统帅，“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①。然事实证明高崇文的确具有比较突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圆满地完成了宪宗交给的平叛任务。再如平定淮西吴元济时，重用李光颜与李愬。李光颜也非宿将，虽为节度使，然受都统韩弘的制约，因而不能发挥其军事才干。裴度到前线督师后，重用李光颜、乌重胤等人，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指挥才能，屡立战功，力克郾城，多次大败淮西兵，“贼知光颜勇寇诸将，乃悉其众出当光颜之师，时李愬乘其无备，急引兵袭蔡州，拔之，获元济”②。说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元年正月。

② 《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进传附光颜传》。

明李光颜等为首的北路军在平定淮西之叛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李愬出任随邓唐节度使前，为太子詹事，未经战阵，连敌方都“轻愬名位素微，遂不为备”①。在宰相李逢吉的推荐下，宪宗大胆启用，终于建立不世之功勋。

2、不用或少用宦官监军，给将帅更多的指挥之权。唐代以宦官为监军，控制前线的军事指挥权，束缚了将帅的手脚，留下了很坏的历史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反对用宦官为监军，宪宗虽不能全部采纳，但在一些重大作战中却不用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监军的权力，给将帅更多的指挥权，允许他们根据前线军事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在征讨西川刘辟时，宰相杜黄裳主张不用监军，宪宗虽无采纳，但却授予高崇文更多的指挥权，使其能放手指挥，不受监军约束。在讨伐淮西吴元济时，开始置有监军，裴度赴前线督师后，发现宦官监军的种种弊端，奏请罢除诸道监军，此后，“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②。

3、采取正确对策，促使魏博镇归顺朝廷。魏博镇的归顺，是宪宗削藩事业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其意义远远高于平定西川刘辟、镇海李锜。因为魏博镇是河朔三镇之一，长期割据，父死子继，它的归顺打破了河朔诸镇数十年联合对抗朝廷的局面，等于朝廷在割据最严重的地区安上一颗钉子，为宪宗统一事业创造了条件。而西川、镇海两镇一直为朝廷直接统治的地区，割据势力无坚实基础，且孤立无援，比较容易讨平。魏博镇的归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意义，它上控冀赵，东临淄青，南扼宣武，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后在讨伐淮西、成德、淄青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尤其是在讨伐淄青李师道的战争中，魏博军直捣其老巢郓州，大败淄青兵，促使刘悟发动兵变，活捉了李师道。如果没有魏博军威胁，淄青镇内部可能不会发生分化；没有魏博军支持与配合，刘悟也不敢断然回军袭击郓州。因此，在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八月。

一定意义上说魏博军在讨伐李师道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在当初魏博镇内部发生变化时，唐廷没有采取正确对策，像以往一样用兵讨伐，河朔其他节镇势必出兵支援，那么，将很难取得成功。这样，在河朔诸镇仍是铁板一块的情况下，宪宗欲想取得后来那样辉煌战果，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因此，魏博镇的归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至少也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4、作战指挥得当。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果断决策，快速进兵。刘辟叛乱时，唐廷派高崇文、李元奕、严砺率兵，分3路疾速进兵，在刘辟还未完全部署妥当时，迅速攻下剑州、梓州，抢先占据险要之地，很快进入西川腹地，平定了叛乱。李锜叛乱时，宪宗以王锷为统帅，从宣州、信州、杭州3个方向，同时进兵，在李锜派出5将袭取苏、常、湖、杭、睦等五州的计划还未完全得逞的情况下，唐军已先声夺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在唐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镇海军内部发生变化，李锜部将张子良等反戈，擒获了李锜，使这次叛乱仅月余时间就迅速平定。

集中优势兵力和财力。这个时期的削藩战争，唐廷大都能调动数量较多的部队，形成优势兵力，如进攻成德王承宗时，出动20余万军队；进攻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等，均出动了10余万军队。在财力的使用上，也采取措施调运粮赋，保证前线将士的衣食和战争消耗所需物资。宪宗还多次调拨内库钱绢，供应前线，如元和十年（815年）十一月，拨内库缯绢55万匹，十一年二月、十月，两次调拨绢4万匹、钱50万贯。十二年二月，拨绢布69万匹、银5000两，九月，又拨内库罗绮、犀玉、金带器玩以及宫中后妃部分首饰金银给前线。十三年二月、六月、九月3次共拨绢40万匹、钱30万贯、玳瑁琉400双、犀带具500付，估价折值，供应军队。这仅是宪宗在一个时期内调拨的内库钱物，并非从内库调出的全部钱财，至于度支调拨的国家财赋，更是无法统计，数额巨大。这样，就从财力上基本满足了前线所需，有力地支援了

战争。兵力和财力的优势，是唐军削藩战争获胜的基本保证。

两面夹击，乘虚突袭。在围攻淮西吴元济时，以李光颜为首的北路军和以李愬为首的西路军，配合默契。李光颜在北线发动猛烈攻势，攻城夺栅，迫使吴元济不得不把精锐主力调往北线，使蔡州后方极为空虚。西线李愬抓住时机，果断突袭，一举擒获吴元济。驻防洄曲的董重质见大势已去，返回蔡州投降了李愬。李光颜乘势出动，收降了董重质的全部军队。这次战斗唐军正奇并用，两面夹击，配合得当，迅速取得了胜利。

在宪宗削藩诸作战中，打得最精彩的是李愬袭蔡州之战。李愬在作战指挥方面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善于麻痹敌人。李愬初到唐州时，面临三易主将、军队数败、士气沮丧的局面。他首先注意的不是严军纪、整队伍，而是抚恤慰问，推诚待士，极力安定军心。同时利用敌方轻视李愬名位素低，缺乏戒备的心理，采取了示弱蓄势的方略，不事声张地积极备战。朗山（今河南确山）一战，唐军失利，李愬反而大喜，对诸将说这样可以使吴元济更加轻视我方，遂不为备。吴房获胜而不取其城，则是为了不使其抽调兵力固守蔡州，存之以分散其兵力。这样就很好地起到了麻痹敌人，为奇袭蔡州创造条件的作用。

2、深入了解敌情。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作到知彼知己，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对敌方的了解更为重要。李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利用敌方降将、降卒了解了许多情况。还尽力争取敌方谍报人员为己所用，于是“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①。他根据了解的敌情和降将提供的合理建议，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3、善于使用降将。李愬非常注意劝降之策的使用，变阻力为助力，同时又分化瓦解了敌军力量。他对丁士良、陈光洽、吴秀琳、李祐的收降，使他们在攻蔡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对董

---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二年五月。

重质的招降，起到了减少战争伤亡，迅速结束战争的作用。

4、严肃军队纪律。李愬军队经过整顿，军纪严明，在他雪夜奇袭蔡州途中，将士得知要赴蔡州的情况后，惊慌失色，然畏于李愬军纪严明，不敢违背。到达蔡州后，城中竟无一人知道。攻下蔡州后，也不杀一人。这种优良军纪，是李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李愬的这些特点，充分表现出一个优秀将帅所应具备的良好素质。本来李愬之军处于次要作战方向，由于他积极主动的努力，使助攻方向起到了带决定性的作用。成功地运用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策略，李愬雪夜奇袭蔡州，遂成为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之一。

但唐军在作战指导方面也有失误，主要是：1、主帅选用多次失误，宦官统军有害无益。讨淮西之初，宪宗以严绶为帅，此人懦弱无能，耗费资财，屡战屡败。后以韩弘为都统，他竟“欲倚贼自重”①。以这样的人为统帅，战争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在进攻成德王承宗时，竟以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诸将耻于受他节制，作战不力，吐突承璀本人又不懂军事，指挥不当，无统一的战略、战术布署，致使大将郦定进战死，唐军士气低落，屡次受挫。朝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却不能取得胜利，只好无功而返。2、两役并兴，久战无功。在成德镇和淮西镇的问题上，宪宗不听劝告，先攻成德、后攻淮西，继而又两面同时作战，结果两次攻成德失利，也拖长了平定淮西的时间。成德镇是割据数十年的强镇，又与魏博、淄青等镇联合，根深蒂固，力量强大。淮西镇虽强，却是仅占蔡、光、申等州的小镇，四周又系朝廷控制的州县，无党援相助，比较容易攻取。从唐廷的兵力、财力来看，也不允许两面作战。从战争结局看，最后也是罢征成德，集中兵力进攻淮西才收到较好的效果。宪宗急于求成，先攻强镇，后又两役并兴，结果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欲速则不达，这是战略运用上的过错和作战指导的失误。

---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年九月。

第十五章　文宗至懿宗时期的军事斗争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暴卒，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穆宗性奢侈，好嬉游，赏赐无度，政治混乱，后得中风病，于长庆四年（824年）正月死去。太子李湛即位，史称敬宗。敬宗时年16岁，好击球，喜宴乐，狎昵群小，不理朝政，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被击球军将苏佐明等杀死，年仅18岁。宦官王守澄、杨承和、梁守谦等拥立穆宗第三子李涵即位，更名昂，是为文宗。文宗时期，朝臣中党争激烈，宦官专政，文宗任用李训、郑注，谋图翦除宦官势力，反为宦官所制，郁郁寡欢，于开成五年（840年）正月病死。宦官们拥立穆宗第五子李炎为皇帝，史称武宗。武宗时期唐朝外御回鹘侵扰，内平昭义刘稹之叛，灭佛崇道，颇有作为。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病死，宪宗子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生活俭仆，限制宦官势力，重视吏治建设，收复河湟失地，国家粗安，人称小太宗。其晚年服食丹砂、金石之药，药性猛烈，以致疽发于背，于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病死。接着懿宗继立。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唐朝统治每况愈下，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基础严重动摇，国家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

第一节　唐朝国内军政形势

唐朝在文宗至懿宗时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穆宗“销兵”政策的失败，藩镇割据再度加剧。在朝官中发生以牛僧孺与李德裕为首的朋党斗争，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也异常激化，爆发

了甘露之变。诸种矛盾的交织斗争，使唐朝的统治更加不稳。

一、长庆销兵与藩镇割据的加剧

（一）穆宗长庆销兵

穆宗即位之初，承宪宗平藩胜利之余绪，朝廷与地方藩镇的矛盾暂时有所缓和，采纳了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了“销兵”政策。史载：“穆宗乘章武（指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萧）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①。即以每年8%的比例，逐步减少兵员，以达到削兵减费，缓和财政开支紧张的目的。穆宗时“销兵”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主要是想利用当时统一和平时机，通过“销兵”逐步减少藩镇军队的数量，从而达到削弱藩镇实力，减少军费支出，加强朝廷集权的目的。这种政策的提出，所设想的目的，和宪宗时的用兵政策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因此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宪宗时用兵政策的继续。从每年削减兵员的8%的比例看，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行性。虽然如此，“销兵”的结果却大出主谋者之意料，非但没有削弱藩镇，反倒引起藩镇的叛乱，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唐朝中后期藩镇的军队多由破产农民构成，他们以当兵为职业，养家糊口。一旦从他们手中夺去饭碗，又不能给一条比当兵更好的出路，立刻会引起他们的反对，以至铤而走险②。既然当兵与生业息息相关，统治阶级企图以一纸诏书将其从军队中裁去，谈何容易！杜牧说：“雄健敢勇之士，百战千功之劳，坐食租赋，其来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编户，纷纷诸镇，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闻之，无不忿恨，至长庆元年七月，幽镇乘此首唱为

---

①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

② 胡如雷：《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

乱。"①这段分析比较精湛，也是当时藩镇军队实际情况的反映。由于节度使们很清楚其军队的士兵情况，知道当兵和他们的生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常以此为借口，煽动军士的不满情绪，反对"销兵"，以对抗朝廷。

其次，当时唐朝的社会情况也不具备安置削减下来的士兵的条件。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士兵退伍只能从事农业生产。然自从均田制破坏以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形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② 的局面，既然藩镇军队多由破产农民构成，其家中自然无土地可耕，裁减下来后国家手中又没有土地授予，让士兵归农，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样就必然导致裁减下来的兵士，或"合而为盗，伏于山林"③，或铤而走险，首倡为乱，"销兵"的失败便不可避免了。

（二）藩镇割据的加剧

由于穆宗沉溺于奢侈游乐的生活，不关心朝政，致使宪宗辛苦经营的统一局面，迅速逆转。元和十五年（820 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权知留后，上表朝廷请求另行委任节帅。当时穆宗和宰相并不了解河北诸镇的习俗，轻率地派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移镇成德，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田弘正在宪宗时两次奉命围攻成德镇，与当地人结怨颇深，赴任时自带魏博兵 2000 人以自卫，但度支不肯拨给粮饷，田弘正不得已只好遣回魏博兵。加之朝廷原先答应赏赐成德镇的 100 万缗钱，又无及时送来，致使成德士卒非常不满。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利用兵士的不满情绪，出动牙兵杀死田弘正及其全家，自立为节度留后。

魏博自田弘正调任后，以李愬为节度使，不久李愬因病离任，唐廷即以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田布不愿去魏博，固辞不成，乃与妻子相别，不张旌节及导从，前往魏博赴任。到任

---

①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② 陆贽：《翰苑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③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

后，不敢整肃军伍，唯知以钱财赏赐士卒，以讨取军士欢心。由于田布威略不振，纲纪不申，将士骄横不法，长庆二年（822年），其部将史宪诚发动兵变，迫使田布自杀，自立为留后。唐廷不能讨伐，只好承认现实，下诏任命史宪诚为节度使。

卢龙节度使刘总出家后，唐廷调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幽州发生兵变，推举朱克融为节度使。唐廷派兵讨伐，王庭凑、朱克融利用士卒对销兵的不满，"一呼而遗卒皆至"。所谓"遗卒"即先前被裁减下来的士卒。"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①。

在河北三镇相继叛乱时，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也驱逐了节度使崔群，掠埇桥（今安徽宿州北）盐铁院钱帛和诸道在汴河运输途中的进奉朝廷的财赋，贯通南北的动脉受到很大的威胁。昭义（即泽潞）节度使刘悟，看到朝廷纲纪不振，也开始仿效河北诸镇，逐渐不听朝廷的指挥。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谏继任节度使，也开始父死子袭了。

这样，宪宗开创的统一局面完全被破坏，唐朝藩镇割据再度兴起，并且愈来愈严重，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唐朝的统治更加衰弱。

二、文宗求治与武宗革新

（一）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指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开始，历经敬宗、文宗、武宗，到宣宗末年（859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官僚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持续了近40年。

党争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的考案。这年宪宗诏

①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

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伊阙（今河南伊川西南）尉牛僧孺、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尉皇甫湜及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参军李宗闵等，在策试中指陈当时政治的弊端，并指斥宰相李吉甫。主持考试的吏部侍郎杨於陵及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将3人策文判为上等，宪宗阅过策文后，即令中书省以优等嘉奖授予官职。不料李吉甫心中不平，泣诉于宪宗，宦官刘光琦等也向宪宗哭诉。宪宗又改变主意，把杨於陵等考官和许多参预制科的官员都予以贬斥，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因此长期被压抑不用。牛李之间的嫌隙也由此形成，无法消除了。后来牛僧孺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做到宰相，各自拥有一批官员为骨干，互相排斥，残酷打击，形成势不两立的朋党之争①。

牛党首领为牛僧孺、李宗闵，主要成员有李逢吉、李钰、李训、郑注、白敏中、杨嗣复等人。李党首领为李德裕，主要成员有郑覃、李绅、刘轲、陈夷行等。两党斗争的焦点，通常认为表现在以下问题上：第一，在选官制度上，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第二，在对藩镇的态度上，牛党迁就姑息，李党主张讨伐。第三，在对待吐蕃侵扰问题上，牛党主张“守信为上，应敌次之”；李党主张以用兵为主，出其不意，“捣戎之腹心”②，以政治诱降为辅。第四，对待宦官态度上，牛党与宦官关系较密切，李党则相对较疏远。

然再进一步分析，两党在以上大多数问题上的分野似乎并不清楚。如在选官制度上，李党并不一味轻视科举，李党中有许多也是科举出身。在对待宦官问题上，李党实际上也有许多牵连，如李德裕开成五年（840年）的入相，就是由大宦官仇士良推荐的。即使在对待吐蕃侵扰的问题上，牛党也并非一直主张退让，他们

---

① 在学术界还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牛李党争始于元和十年（815年）对淮西镇战和问题的争论；其二认为起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复试案。

② 《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

中有一些人也主张对吐蕃侵扰要严加防范，用兵抵御。只有在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上，两党主张的分野比较明显，李党主张的积极成分要更多一些。

两党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当一派中人任宰相，执掌大权时，便极力排挤打击另一派人，反之亦然。朝臣中许多人都卷入这种朋党之争中去，搞得政治空气异常紧张，文宗曾叹息说："去河北贼（指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① 武宗时期用李德裕为相，唐朝政治颇有振作气氛。宣宗时，一反武宗所为，把李德裕 4 次贬官，最后贬至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当司户参军，大中十三年（859年），李德裕死于贬所，牛党分子白敏中、令狐绹等为宰相，大肆贬黜李党人物，重用牛党之人。从此，李德裕一派彻底失败，两党斗争也就从此结束。

（二）文宗求治

唐文宗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对穆宗、敬宗两朝的种种弊端颇有了解，想有所改革。即位以后，"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有司供宫禁年支物，并准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②。敬宗时，每月上朝不过一二次，文宗即位后，恢复旧制，每逢单日上朝。经常召见宰相群臣，讨论国家政事，久久方罢。"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③。

自从代宗大历以来，节度使多从禁军大将中选任，这些人为了获取节帅之位，皆以高息向富室贷钱，以贿赂护军中尉（宦官），数额巨大，动辄逾亿万，人称债帅。获得节帅之任后，则重敛老百姓以偿还所借债务。节度使的任命从来不由宰相过问。文宗即位后，欲削宦官之权，依重宰相裴度、韦处厚。太和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六十一》，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敬宗宝历二年十二月。

(827年）四月，忠武节度使王沛死，裴度、韦处厚始奏请文宗，以太仆卿高瑀继任，“中外相贺曰：‘自今债帅鲜矣！’”①

对于宦官专权情况，文宗深恶痛绝，欲谋铲除。他对当时朝廷上两个大派阀李德裕和李宗闵都不相信，相继贬逐。把翰林学士宋申锡提为宰相，同他密商诛杀弑宪宗、敬宗的宦官。宋申锡引荐吏部侍郎王璠任京兆尹，并把文宗密旨透露给他。不料王璠竟向宦官王守澄告密，王守澄先发制人，命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李凑（文宗弟）为帝。文宗不辨真伪，把漳王贬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治今重庆开县）司马，宋申锡后死于贬所。文宗欲除宦官，由于不能明辨是非，反为宦官愚弄，将自己的心腹大臣贬死，自翦羽翼。

文宗贬逐宋申锡后，认为李训、郑注二人可靠，于是又把诛杀宦官之事委托给他们。

李训是李逢吉从子，进士出身。敬宗时因事流放岭表，遇赦得还，由郑注介绍给王守澄，再由王守澄推荐给文宗，累迁翰林侍讲学士。

郑注，绛州翼城（今属山西）人。初以游医活动于长安权贵之门，李愬为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时，以其为节度衙推，深得信任，并把他介绍给王守澄。王守澄设谋诬陷宋申锡，就是郑注出的主意，因此为王守澄所重用，累迁御史大夫、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

李、郑两人相结，共同排挤李德裕、李宗闵。太和九年（835年）九月，李训升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郑注于同年八月，也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节度使。十一月，大理卿郭行余出任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任河东节度使。李、郑密谋内外合势，翦除宦官。

（三）甘露之变

李训为相以后，按照文宗的旨意，因宪宗被杀，王守澄预知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文宗太和元年四月。

其事，免去他的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之职，任命他为六军十二卫军容使，尊以虚名，实夺其权。不久，又派人以毒酒鸩杀王守澄，然后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大宦官也先后遭贬逐，后又处死。传说宪宗之死，是宦官陈弘志下的毒手，当时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文宗下令召他入京，在途中杖杀。这样，参预谋杀宪宗的逆党基本被铲除干净了。

文宗、李训在除掉以上宦官以后，与郑注等人合谋企图一举彻底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视朝，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奏称其衙署厅后石榴树夜有甘露下降。文宗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前去察看。李训等回来说非真甘露，未可马上宣布。文宗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前往察看。宦官走后，李训急召郭行余、王璠的邠宁、河东兵入宫。当时二人之兵数百，事先已执兵器立于丹凤门外，接到入宫的命令后，独河东兵入宫，邠宁兵观望不前。

仇士良等人至左金吾厅察看甘露，发现有伏兵，急忙走出，奔还含元殿。李训见此情况，急呼金吾卫士上殿护卫文宗，宦官们抢先一步扶文宗上舆，劫夺还宫。李训攀住乘舆不放手，宦官郗志荣以拳击其胸，李训倒地，文宗乘舆入宣政门，门遂即关上。这时京兆少尹罗立言率士卒300余人，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200余，皆已入宫登上含元殿，但已来不及了，只击死击伤宦官10余人。李训见宦官已劫夺文宗入宫，知大事已去，换上从吏衣衫，走马而逃。百官皆惊骇散走。

仇士良逃出险境后，命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各率禁军500人，露刃出阁门，逢人便杀。宰相王涯、贾餗等事先没有参预此次密谋，事情发生后，退回政事堂，静候消息，见禁兵冲入乱杀，狼狈逃出。两省及金吾吏卒600余人被杀死。仇士良等又分兵掩闭宫门，搜索诸司，诸司吏卒及酤贩小民被杀又千余人。仇士良等还遣骑兵出城追捕逃亡者。李训在逃往凤翔（今属陕西）途中被捉，送往长安途中被斩首。又派兵在长安城中大肆

搜索，王涯、贾餗、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皆被捉获，斩首示众，其亲属不问亲疏全部处死，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奴婢。

事变发生之际，郑注从凤翔带兵500人奔赴长安，走到扶风（今属陕西），得到政变失败的消息，又折回凤翔。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其监军张仲清所杀，郑注幕僚及亲兵被杀者达千人以上。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也在长安城中被捕杀。“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①。

甘露之变，虽由文宗与李训、郑注、郭行余、王璠、罗立言、韩约等密谋策划，但当时北司（唐朝宦官机构多设在皇宫之北，故称北司）和南衙（唐朝三省及所属机构设在皇宫之南，故称南衙）之争，由来已久，宦官们只杀李训、郑注等人，并不能夺取南衙之权，故利用这次事变大开杀戒，杀死了宰相王涯、贾餗及大批朝官。“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②。文宗参预密谋也为仇士良等所知，只是因文宗登基已久，不敢轻易废黜，才得以保全帝位，但已形同幽禁。文宗无奈，终日寡欢，自称受制于家奴，连周赧王、汉献帝都不如。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文宗病死，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借口太子年幼，且有疾病，另立穆宗第五子李炎为帝，即唐武宗。并杀死文宗的杨贤妃及成王李溶、太子李成美。

（四）武宗革新

武宗即位不久，经宦官杨钦义的帮助，李德裕从淮南节度使任上再次内调为宰相。当时牛僧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德裕借口汉水泛滥，冲淹襄阳（今湖北襄樊）民居，归罪于牛僧孺，免去了他的节度使职务，调任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唐廷出兵进攻泽潞镇（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李德裕又借口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李宗闵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以前有书札往来，不宜留在东都，武宗遂将李宗闵贬为湖州（今属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六十一》，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

浙江）刺史。后又诬陷牛僧孺同情泽潞刘稹，贬其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东北）长史，李宗闵又被流放到封州（治今广东封开东南封川镇）。这时李德裕因辅佐武宗有功，升为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顶峰，牛党受到沉重打击。

不过，李德裕在宰相任上，辅佐武宗的确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使当时政治出现了新气象。在对待回鹘问题上，由于回鹘国内长期战乱，连岁大疫、大雪，畜牧业损失严重，国力有所削弱。加之回鹘西北方的黠戛斯部逐渐强大，不断进攻回鹘，焚其牙帐，回鹘部众溃散，一支由嗢没斯率领，南下抵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一支由乌希特勤率领，也向南移动。唐朝一面运粮赈济其部众，一面派军严守边境，有效地防止了回鹘进入内地，骚扰塞上人民的平静生活。会昌三年（843 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子刘稹自立，武宗和李德裕决定出兵讨伐，经过一年多的围攻，终于平定了昭义之叛。

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八月，下令灭佛，共毁寺院 4600 余所，毁招提（私造寺院）、兰若（山台野邑为兰若）4 万余所，勒令还俗僧尼 26.05 万人，收良田数千顷，释放奴婢 15 万人。这次灭佛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为社会增加了大批劳动力，使大量奴婢获得解放，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李德裕和武宗还想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军军权，但是失败了，禁军指挥权始终控制在宦官手中。

第二节　唐廷继续进行削藩战争

穆宗、敬宗两朝的腐朽统治，致使政治混乱，藩镇割据加剧。文宗、武宗时期又相继发动了多次旨在削平叛乱藩镇的战争。

一、平定横海李同捷

（一）李同捷拒命叛乱与文宗下诏进讨

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三月，横海节度使李全略死，“其子（李）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①。他不待朝廷任命，便自立为节度留后。不久，敬宗被弑，文宗即位，唐廷忙于内部事务，无暇顾及横海之事。李同捷也寄希望于天子易代，朝廷加恩赦宥天下，或许能承认横海擅自立帅的既成事实。文宗太和元年（827年）三月，李同捷遣掌书记崔从长奉表与其弟李同志、李同巽一同赴长安，请求朝廷予以任命。横海镇治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辖沧、景（治今河北东光西北）、德（治今山东陵县）、棣（治今山东惠民东南）4州，属河朔诸镇之一。文宗虽不欲这一地区出现类此事件，但因即位不久，国库空虚，不想大动干戈，又不想使河朔诸镇相互仿效，重现父子相袭的局面。于是在当年五月，下令移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又顾虑到河朔诸镇可能会支持李同捷抗拒朝命，下令给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平卢节度使康志睦、成德节度使王廷凑等人，晋升官爵，以固结其心。

李同捷接到朝廷诏令后，借口将士挽留，拒不受诏赴任。八月，唐廷下令削去李同捷官爵，命乌重胤、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及义成（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李听、义武（治定州，今属河北）节度使张璠等，各率本军进讨。武宁（治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王智兴上表请求自率本军3万人，自备5个月的粮食，讨伐李同捷，文宗遂命武宁军也参加讨叛。

（二）王廷凑出兵助叛与唐军四面进攻

王廷凑是杀田弘正后自立为成德节度留后的，当时穆宗下令诸道出兵讨伐，王廷凑联合卢龙朱克融共同抗击唐军。由于唐朝自宪宗削藩以来，帑藏虚竭，穆宗又赏赐过当，诸道军缺乏粮饷，互相观望，进攻不力，唐廷只好赦王廷凑之罪，任命其为成德节度使。王廷凑得逞后，气焰更加嚣张。李同捷自立为横海留后，王廷凑曾出面上奏唐廷为其求节钺，没有得到批准，心中对朝廷非常不满。

---

① 《旧唐书》卷一四二《王廷凑传》。

李同捷见朝廷下诏出兵讨伐，遣其子弟携带大批珍玩、女妓赠送河北诸镇，妄图分化瓦解唐廷攻势。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因为刚刚取代朱克融获得节钺，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心，扣押李同捷之使连同所赠礼物全部献于唐廷。而王廷凑得到李同捷所赠物品后，乃出兵相助，进攻魏博北境以牵制唐军攻势。同时，还派使厚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谋图与之连兵，解救李同捷，遭到朱邪执宜的拒绝。

天平、横海节度使乌重胤自出兵以来，屡次获胜，不久，乌重胤死，唐廷遂以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后又以左金吾大将军李祐为横海节度使，率兵继续进攻。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本来打算助李同捷拒命，其子史唐泣谏，并请遵朝命发兵讨伐，史宪诚只好遣史唐与都知兵马使亓志绍率兵 2.5 万人围攻李同捷下辖的德州。太和二年（828 年）十月，魏博军攻下平原（今属山东）。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战果最大，攻下棣州。李同捷大惧。诸道兵见王智兴建功，遂向前推进，积极进取。十一月，易定节度使柳公济攻下沧州西面坚固寨，并在寨东击败叛军。十二月，王智兴的部将李君谋率兵渡过黄河，攻下无棣（今属山东）。当时，诸军“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①。

（三）亓志绍叛乱及其覆灭

王廷凑不仅以兵援助李同捷，还以盐粮支助。文宗大怒，欲下诏讨伐，召百官商议出兵之事。宰相以下没有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唯有卫尉卿殷侑反对用兵，说：“廷凑虽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专讨同捷。”②殷侑认为王廷凑助叛之事未甚露是托词，其本意是反对两役并兴，主张集中力量专讨李同捷之叛。文宗听取了这个意见，命令与成德镇相邻诸道严兵守备，“听其自新”③。王廷凑不思悔过，依然与朝廷对抗，文宗只好下诏削去其官爵，并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文宗太和二年十一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文宗太和二年七月。

命诸军四面进讨。

由于李同捷之军屡次大败，棣州、平原、无棣等城相继被攻破，已呈败亡之势。王廷凑也遭到唐军围攻，无力解救，于是遣人游说魏博大将亓志绍，劝他率领在前线的魏博军队回戈攻击史宪诚，以夺取魏博之地，“许以代为魏博节度”①，以破坏唐廷讨叛大计。亓志绍为王廷凑所诱，率所部军队2万人回兵向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进逼。文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急派谏议大夫柏耆往魏博宣慰，同时命义成、河阳两道军队讨伐亓志绍叛军。太和二年（828年）十二月，亓志绍军进至永济（今山东冠县北），逼进魏州。史宪诚告急求救，唐廷命义成节度使率沧州行营诸军疾速驰援。太和三年（829年）正月，亓志绍军与王廷凑派来支援的军队合兵，攻掠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义成镇先前屯驻在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的3000名军人，接到讨伐亓志绍的命令，向禹城（今属山东）进发途中，不愿作战，叛逃溃散。横海节度使李祐出兵讨平。

李听率军到达永济前线，与史宪诚之子史唐所率之军会合后，随即向亓志绍军发动攻击，大败其军。亓志绍率败军5000人逃向镇州（治今河北正定），投奔王廷凑，其余1.5万人向魏博镇投降，被唐廷安置于洛州（治今河南洛阳东）。亓志绍投靠王廷凑仅5个月，随着唐廷平定李同捷的胜利，王廷凑心中恐惧，上表归顺朝廷，亓志绍失去庇护，于太和三年（829年）六月自缢而死。

（四）唐军歼灭李同捷

亓志绍叛军被讨平后，李同捷更加危急。太和三年（829年）二月，李祐率诸道兵大败李同捷军，围攻德州（治今山东陵县）。四月，李祐攻破德州，城中残余将率3000余人逃出城后，投奔王廷凑。同月，卢龙节度使李载义率军围攻李同捷所在的沧州，并攻破其罗城（即外城）。李同捷见大势已去，不得已遣人向李祐接洽投降。李祐一面派人上奏此事，一面派部下大将万洪入沧州，接

---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三《李全略传附同捷传》。

替李同捷代守州城。当时，谏议大夫柏耆奉诏在前线宣慰，得知李同捷投降的消息，怀疑他诈降，自率骑兵数百驰入沧州，借故杀死万洪，取李同捷及其家属送往长安。走至将陵（今山东德州东）时，传说王廷凑派兵于半途欲夺李同捷，柏耆乃斩杀李同捷，传其首于长安。

柏耆宣慰前线诸军时，自作威势，压制诸将，故人人厌恶。诸道兵讨伐李同捷，苦战3年，才得以平定，而柏耆擅入沧州取李同捷以为己功，又无故杀死李祐爱将万洪，引起前线诸将愤怒，争上表论列其罪。文宗不得已，贬柏耆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东）司户参军，不久赐死。

李同捷平定后，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恐惧，遣其子史唐入朝，表示愿意服从朝廷命令。文宗即调史宪诚任河中节度使，以义成节度使李听兼任魏博节度使。王廷凑此时也上表请罪，愿意归还所占的景州，听命于朝廷。文宗赦其罪，恢复其官爵，仍任成德节度使。

七月，魏博牙将何进滔发动兵变，杀死史宪诚，自立为留后。李听率军到达魏州后，不能入城，被何进滔袭击，大败溃走，辎重兵械丧失殆尽。唐廷因连年用兵，财政困难，馈运不给，无力再继续讨伐，只好承认现状，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河北藩镇跋扈割据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二、平定山南西道杨叔元

（一）李绛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李绛在宪宗时一度出任宰相，辅佐宪宗作出过许多正确的决策，为削平藩镇割据耗尽心力。后以足疾自请罢相，几起几落，敬宗时任左仆射，在对待昭义刘从谏问题上，李绛主张朝廷应另行任命节帅，不能容许刘从谏擅自袭位；宰相李逢吉、宦官王守澄接受刘从谏贿赂，力主任其为留后。这样，李绛便与李逢吉交恶，被排挤出朝，以太子少师，分司于东都。史载：“绛以直道进退，闻望倾于一时。然刚肠嫉恶，贤不肖太分，以此为非正之徒所

忌”①。后来李绛被害，与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文宗即位后，李绛再度被召入京师，任太常卿。仍不为宦官、佞臣所容，太和二年（828年），出任兴元（治今陕西汉中）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次年冬，南诏进攻西川，占据了成都，文宗令山南西道出兵援救。李绛因本道兵少，新招募千余人与诸军一同赴援。四年（830年）正月，南诏退兵，山南西道的军队随即退回本道。由于山南西道的兵数有常额限制，“诏新募兵悉罢之”②。二月，李绛接到诏旨后，召集新募军队，宣布诏旨，发给饷粮后，皆予以遣散。被遣之兵心中不满，怏怏而退。

（二）监军杨叔元谋杀李绛叛乱

山南西道监军杨叔元平素恃宠骄横，贪财不法，李绛为人正直，不附权贵，引起杨叔元的强烈不满。在被遣散兵卒向他辞行时，以赐物之薄激之，煽动这些士卒的不满情绪，“欲其为乱，以逞私憾”③。士卒们本来就对这次遣散有怨气，听到杨叔元的煽动后，群情激忿，大噪，聚集起来打开武器库，哄抢兵器，冲向节度使府衙。

当时，李绛正与宾客、幕僚会宴，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风声，因而没有丝毫防备。牙将王景延率少数卫士拼死力战，终因寡不敌众，在卫士伤亡殆尽，矢穷力竭的情况下，被乱兵所杀。李绛在王景延的掩护下，逃出使府，登上北城，其左右亲信请他缒城而下，以避乱兵。李绛不愿独自缒城逃生，被乱兵赶来杀害，终年67岁。与他同时被害的还有使府从事赵存约、薛齐等人以及李绛家属。

杨叔元怂恿乱兵杀害李绛后，上奏文宗反咬一口，说李绛因收回发给遣散之卒的赏物，导致兵乱。文宗任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绛被杀，朝臣们非常愤怒，中书、门下、尚书等省官员共同上疏为李绛鸣冤，谏议大夫孔敏行写出呈状，指出

---

①③《旧唐书》卷一六四《李绛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文宗太和四年正月。

是杨叔元操纵乱兵，杀死李绛。温造到任时，也上奏文宗反映兵变情况，文宗始悟杨叔元为罪魁祸首。

（三）温造设计平定兵变

文宗了解到兵变的实际情况后，授以温造便宜行事之权。但又担心用兵镇压，劳师费财，温造说："臣计诸道征蛮之兵已回，俟臣行程至褒县，望赐臣密诏，使受约束。比臣及兴元，诸军相续而至，臣用此足矣。"① 温造的计划是在诸道派往西川抵御南诏的军队返回时，接受他的指挥，以平定兵变，朝廷不必另行调兵，可以节省军费开支。文宗认为这个计划可行，下令命神策行营将董重质、河中大将温德彝、郃阳大将刘士和等人所率的军队，皆受温造指挥。

温造行至褒城（今陕西汉中西北），和从西川返回的山南西道抵御南诏的军队相遇，即令其将卫志忠率领这支军队充作卫队，并和卫志忠商议好平定兵变的具体计划。然后温造召见卫志忠的副将张丕、李少直等，作了具体部署，命以 800 人为衙队，500 人为前队，进入节帅府后，即分兵把守诸门，不许乱兵一人逃出。温造从褒城到达兴元后，就下令设宴，慰劳士卒。原准备在节帅府正厅设宴，温造认为地方狭隘，不能容纳士卒，命移到牙门设宴。士卒们坐定后，卫志忠的军队马上在四周包围。由于当时还有少数士卒未至，温造持酒巡行，向士卒们劝酒，巡行一遍后，未到士卒齐集。温造又以要亲自询问新募兵士去留之意为由，让这些人向前坐，旧军向后不得和他们交错杂处。这时有人发觉情况不妙，欲想有所动作，温造厉色斥责，皆不敢动。温造问明了杀害李绛情况后，卫志忠、张丕等拔剑上前，率军齐出，把兵变首领教练使丘铸为首千余士卒全部杀死，血流四注。监军杨叔元当时也在座，见此情况，万分恐惧，抱住温造的靴子，恳求饶命。温造命卫兵扣押了杨叔元，请示文宗如何处理。不久，文宗下诏把杨叔元流放到康州（治今广东德庆）。"其亲刃绛者斩一百断，号

① 《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

令者斩三断，余并斩首。内一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王景延、赵存约等，并投尸于江”①。

温造平定此次兵变，由于计划周密，没有劳师费财，迅速处理了问题，是应该肯定的。然杀人过多，手段残忍，有唐以来也是不多见的。唐廷杀戮如此之多，却不能立斩宦官杨叔元，难服众人之心，文宗处事不明，优柔寡断于此可见一斑。

三、平定昭义刘稹

（参见附图17）

（一）刘稹谋叛与武宗平叛方略

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昭义军治所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领泽（治今山西晋城）、邢（治今河北邢台）、洺（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磁（治今河北磁县）等5州。长期以来一直听命朝廷，宪宗平定李师道之叛时，刘悟杀李师道，立有大功，宪宗任命为义成节度使。穆宗时改任昭义节度使。刘悟临死时，上表请求以其子刘从谏继任，敬宗昏庸，听从宰相李逢吉、宦官王守澄的建议，任以留后，不久升为节度使。

昭义在刘悟治理时，赋税苛重，扰民颇甚。刘从谏宽厚，故人多归附。刘从谏当时方值壮年，思立功，甘露之变时，朝臣与宰相多被杀死，刘从谏心中不平，曾3次上书，要求公布宰相王涯等罪状，并攻击宦官弄权。宦官们对他既怕又恨，双方仇怨颇深。刘从谏有一匹骏马，高9尺，献于武宗，武宗不受，退回，刘从谏认为是大宦官仇士良从中作梗，心中不平，怒杀其马，与朝廷猜忌更深，于是招纳亡命，制造兵器，修缮城邑。刘从谏“性奢侈，饰居室、舆马。无远略，善贸易之算。徙长子道入潞，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贾人子献口马金币，即

① 《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

署牙将，使行贾州县，所在暴横沓贪，责子贷钱，吏不应命，即诉于从谏。欲论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①。刘从谏患病时，对其妻说："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则吾家无炊火矣！"② 欲效河北诸镇，世袭其位。以其弟刘从素之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以其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以亲信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等分领牙兵，作好应变的准备。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逼监军崔士康奏称刘从谏病重，请求以刘稹为留后。武宗遣使者及医生前往视探，都被以借口拒绝。武宗了解到真实情况后，与朝臣商议对策，大都主张姑息安抚，反对用兵征讨。唯宰相李德裕认为应该出兵讨伐，他对武宗分析了昭义（又称泽潞）局势，指出："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③而泽潞靠近关中，守军素称忠义，曾多次出兵讨伐叛镇，朝廷也多用文臣为其帅。贞元十年（794 年）六月，当时的昭义节度使李抱贞死，其子李缄欲想继袭，德宗不许，命其护丧归东都。只是由于敬宗不理朝政，当时的宰相缺乏远略，才允许刘悟死后刘从谏承袭。如果现在允许刘稹再次袭位，"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④武宗同意李德裕的分析，并征询用兵方略。李德裕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⑤李德裕这个计划的中心，就是设法破坏河北诸镇与昭义联合，以孤立昭义镇，减少朝廷军事讨伐的难度。同时以昭义在河北的邢、洺、磁 3 州为诱饵，促使成德、魏博 2 镇出兵讨伐昭义，

---

①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悟传附从谏传》。

②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四月。

以期早日平定昭义刘稹之叛。

武宗采纳了李德裕的计划，下诏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明确告诉他们："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① 王元逵、何弘敬两人，表示愿意听从朝命。

武宗遂下诏命刘稹护丧归东都，召见刘稹父刘从素，命他写信劝谕刘稹服从朝命。刘稹俱不从。五月，武宗下诏讨伐刘稹。"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开谕，上即命下诏讨之"②。武宗这个决策非常英明，不给昭义镇以充分的准备时间，攻其不备，在军事上有先声夺人的效应。

在出兵讨伐前，黄州（治今湖北新洲）刺史杜牧上书李德裕，提出军事讨伐的具体用兵方略，说："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今山西晋城南）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今属山东）五千精甲，宣（今属安徽）、润（治今江苏镇江）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③李德裕在作军事部署时，颇采纳杜牧的建议。命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 3000 守万善（今河南沁阳北）；河东节度使刘沔以步骑 2000 人守芒车关（今山西武乡东北），以步兵 1500 人守榆社（今属山西）；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 3000 人守临洺（今河北永年），攻尧山（今河北隆尧西）；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 1000 人守翼城（今属山西），攻掠冀氏（今山西安泽东南）。这种部署旨在防止刘稹向外扩张骚扰，将其势力束缚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便于四面聚歼。以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不久，又命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负责西面军事。

---

①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五月。

（二）唐军分兵五路进击泽潞

六月，河阳节度使王茂元遣部将马继率步骑 2000 人驻于天井关（今山西晋城西南）南面的科斗店，刘稹派牙将薛茂卿率亲军 2000 人抵御。由于其他诸道军队尚未出动，武宗下诏命成德、武宁、河东、河阳、魏博等镇，必须在七月中旬 5 道齐进，如果刘稹求降皆不许接受。七月，诸道军队出发之际，李德裕又向武宗建议说："臣见向日河朔用兵，诸道利于出境仰给度支。或阴与贼通，借一县一栅据之，自以为功，坐食转输，延引岁时。今请赐诸军诏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毋得取县。"① 武宗同意，命诸军分路攻取以上诸州。

晋绛行营节度招讨使李彦佐从徐州（今属江苏）出发，行动迟缓，又请求于绛州（治今山西新绛）休整。李德裕知李彦佐故意逗留观望，请武宗下诏严责，并命天德防御使石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以便到任后代替李彦佐，指挥西面征伐之事。

王元逵之军进入邢州境已月余，并攻下尧山东北的宣务栅，击败刘稹援救尧山的军队，而何弘敬仍未出师。李德裕又向朝廷建议派忠武节度使王宰率军经魏博境进攻磁州，认为忠武军英勇善战，何弘敬素来惧怕，不愿忠武军入魏博境，听到诏书后，必然出师击贼。唐廷采纳李德裕的意见，何弘敬果然于八月率全军渡过漳水，进逼磁州。

河阳镇驻守在天井关南面科斗店的唐军，被刘稹部将薛茂卿攻破，擒守将马继，焚毁唐军小寨 17 座，叛军进至怀州（治今河南沁阳）10 余里处。此战失利，朝廷中主和言论再度兴起。武宗犹豫不决，征求李德裕的意见。李德裕认为"小小进退，兵家之常"②，劝武宗不必担心。李德裕知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不懂军事，且身患重病，命忠武节度使王宰不赴磁州，转而增援河阳，任河阳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八月。

行营攻讨使，负责这个方面的军事。不久，王茂元病死，诏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使，负责粮饷供给，王宰专主征战。

九月，何弘敬的魏博军连下肥乡（今属河北）、平恩（今河北曲周东南），杀伤昭义军颇众。以石雄取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令其屯兵冀氏、冀城，以图攻取潞州。数日后，石雄进兵，攻破昭义军 5 个营寨，斩杀千余人。十月，以刘沔为义成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

刘稹大将薛茂卿攻取科斗店，大败河阳兵后，自认功大，希望能得到厚赐。有人却对刘稹说："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节益不可至。"①刘稹颇以为然。这样薛茂卿不但无功，反而有过，赏赐自然无望，乃与王宰通谋，引导唐军进攻。十二月，王宰军攻天井关，薛茂卿稍作抵抗，引兵退走，唐军遂克天井关。周围的昭义军营寨见天井关失守，纷纷退走。薛茂卿退入泽州后，遣人告知王宰愿为内应，请他迅速进兵。王宰迟疑，不敢进兵，刘稹得知此情后，诱薛茂卿至潞州杀之，另派部将刘公直代替薛茂卿。王宰进攻泽州，与刘公直交战受挫，刘公直乘胜进兵，攻下天井关。王宰整军再战，大破刘公直军，攻下陵川（今属山西）。与此同时，河东镇唐军攻下石会关（今山西榆社西）。

（三）唐军平定太原兵变

新任河东节度使李石到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后，刘稹遣其将贾群携带李石堂兄洺州刺史李恬的书信，到太原谒见李石。李恬在书信中说刘稹愿举族向李石投降，护送刘从谏灵柩归葬于东都。李石把这封书信转送长安，请武宗决断。李德裕认为这是缓兵之计，建议武宗严令诸道乘刘稹内部上下离心，迅速进兵攻讨。武宗于是下诏催促诸道进兵。右拾遗崔碣上疏请接受刘稹之降，被武宗贬官。

正当唐军向昭义叛军全面推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河东镇使府却发生了兵变，牵制了唐军的推进，延缓了昭义灭亡的时日。

---

①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悟传附刘稹传》。

会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屯驻榆杜（今属山西）的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向节度使李石请求增加兵力。当时河东已无兵可派，连守仓库者和工匠都被遣从军，李石只好从北部防御回鹘的军队中抽调1500人，派都将杨弁率领赴榆社。先前，军队出征，每人赐绢2匹。当这支部队经过太原时，由于府库空竭，李石把自己私人的绢帛拿出来赏赐，每人才得绢一匹。这时已到年终，军士要求过了年再出发，监军吕义忠不同意，屡次催促。杨弁心怀不轨，乘军士人心愤怒，太原城中兵力空虚之机，发动兵变，剽掠街市，杀人抢掠。李石无兵可御，只好逃往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次年正月，杨弁占据太原，派人和刘稹联系，约为兄弟，刘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闻知太原兵乱，遂以关投降刘稹。

当朝廷得知太原兵变的消息后，主和罢兵的言论再度兴起，忠武节度使王宰这时也上表请求允许刘稹归附。宰相李德裕认为太原兵变，实不足忧，杨弁只有1500人的兵力，成不了气候，主张令李石速赴太原行营，调近旁之兵讨平叛乱。其他诸道军队继续推进，务必使刘稹与其部下诸将举族自缚，入唐军营寨面降，方可受纳。

这时李石已逃至晋州（治今山西临汾），接到诏命后又返回太原行营。武宗下诏调义武1000骑兵，宣武等镇3000步兵，讨伐杨弁。忻州（今属山西）刺史李丕主动切断杨弁北逃之路，防止他与回鹘部众联合，杨弁实际已呈四面楚歌之势。武宗在积极准备武力讨伐的同时，并无放弃政治解决的努力，派中使（宦官）马元实入太原，晓谕乱兵，促其归顺。马元实在太原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到长安后大肆鼓吹杨弁兵力雄厚，装备齐全，劝朝廷妥协、授给杨弁节度使职务。李德裕驳斥了马元实的谎言，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贼，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① 李德裕此言，并非意在赦免刘稹，而是刺激武宗，以表明杨弁决不可饶恕。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四年正月。

屯驻在榆社的河东军队，得知朝廷调其他诸道军队讨伐杨弁，恐怕他们入太原后屠杀自己的妻室儿女，主动请战，拥监军吕义忠直趋太原，抢在义武、宣武等道军队到达之前，猛攻太原。由于士气激昂，进军神速，很快就攻下太原，杨弁兵少力单，被活捉，叛卒全部被杀。李石由于平叛不力，率先逃窜，被免职安置于东都。诏以河中节度使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

（四）河北三州归降与刘稹覆灭

忠武节度使王宰负责南面军事，进军迟缓，朝廷几次催促；由于其亲生子王晏实为刘稹所属的磁州刺史，担心其安危，故观望不进。武宗命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率精兵直抵万善（今河南博爱西北），"处宰肘腋之下"①，监视王宰之军。王宰见状，不敢迟疑，于会昌四年（844年）四月，向泽州发起进攻。河东都知兵马使王逢从北面也发起进攻，击败刘稹部将康良佺，攻占了石会关（在今山西榆社西），康良佺退守鼓腰岭（位在石会关南）。

刘稹心腹部将高文端见唐军四面围攻，知刘稹必亡，乃归降朝廷，并向李德裕献策说："官军今直攻泽州，恐多杀士卒，城未易得。泽州兵约万五千人，贼常分兵大半，潜伏山谷，伺官军攻城疲弊，则四集救之，官军必失利。今请令陈许军过乾河立寨，自寨城连延筑为夹城，环绕泽州，日遣大军布阵于外以扞救兵。贼见围城将合，必出大战，待其败北，然后乘势可取"，又对北面的军事提出建议，说："固镇寨四崖悬绝，势不可攻。然寨中无水，皆饮涧水，在寨东约一里许。宜令王逢进兵逼之，绝其水道，不过三日，贼必弃寨遁去，官军即可追蹑。前十五里至青龙寨，亦四崖悬绝，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②。李德裕分别把这些情况转达给王宰和王逢，使唐军得以顺利推进。

刘稹懦弱无能，其心腹王协、李士贵专权用事，"专聚货财，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四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十四》，武宗会昌四年闰七月。

府库充溢，而将士有功无赏，由是人心离怨”①。王协还在每州置军将一人，专门负责向商贾征税。为了多收赋税，竟把普通民户的家产估价折算，征以20%的税，甚至高估其值，致使大量民户竭浮财和粮食以交税，仍不能足额，搞得人心愤怨。

刘稹妻裴氏之弟裴问统兵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驻防，其军中多富商子弟。王协派军将刘溪到邢州主持征商税时，把裴问军中富商子弟的父兄拘禁起来，追讨税钱，引起军士们的极大不满。裴问为安军心，请刘溪放人，刘溪非但不允，反而恶语相加。裴问大怒，与刺史崔嘏密谋，杀刘溪归国。闰七月，2人联合，闭城斩杀大将4人，举城降于成德节度使王元逵。

刘稹的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守将王钊，在刘稹诛杀薛茂卿等人后，心中疑惧，刘稹召其回潞州（治今山西长治），王钊托以他事而不往。李德裕得知这个情况后，命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派人与王钊联系，劝其归顺朝廷，王钊遂决计献城投降。先前，刘稹在起兵对抗朝廷时，曾赐洺州军士每人布一端，后又以此顶替冬赐（每逢冬季，例赐军士以钱物，称之冬赐），引起人心不满。不久，主持商税征收的军将到达洺州，人心更加惶恐。王钊乘此机会，对军士们说："留后（指刘稹）年少，政非己出。今仓库充实，足支十年，岂可不少散之，以慰劳苦之士！"②于是，大开仓库，发给士卒每人绢一匹，谷12石，士卒大喜，王钊遂以洺州降于何弘敬。刘稹在磁州的守将安玉，闻知2州皆降，也以城降于何弘敬。驻守尧山的昭义军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见3州已降，亦投降于王元逵。

河北3州归顺的消息传到潞州后，人心慌恐，大将郭谊、王协密谋杀刘稹以自救，派刘稹亲信董可武劝告其束身投降，把留后让于郭谊，等郭谊正式得到朝廷任命后，"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归之东都，不亦善乎？"③ 刘稹素无主见，听信董可武说辞，素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十四》，武宗会昌四年闰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十四》，武宗会昌四年八月。

服出节帅府门，以郭谊为都知兵马使，总摄军权。次日，董可武又以请刘稹议事的名义，骗刘稹至别宅，置酒作乐，于席间斩杀刘稹，遣使奉表，降于王宰。镇守泽州的刘公直见刘稹已死，也举城投降于王宰。至此，昭义刘稹之叛便以唐廷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在邢、洺、磁 3 州投降时，李德裕担心成德、魏博 2 镇出面要求 3 州归其所属，唐廷将难于可否。于是向武宗建议派卢弘止为 3 州留后，在 2 镇请示的表章到达之前颁下诏旨，则 2 镇将不便于再次提出要求。武宗同意。刘稹死后，李德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又提出不再设置邢、洺、磁 3 州留后，由卢钧专任昭义节度使，罢去原任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之职。为了防止昭义再次发生问题，又把泽州改隶河阳镇，使昭义失去太行山之险，更加便于唐廷控制。河阳由于得到泽州也成为重镇，使得东都的安全得以保障。

（五）唐廷指导作战的成功经验

武宗平定昭义刘稹，是唐朝中晚期讨伐跋扈藩镇最成功的一次战例，唐廷在作战指导方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采用分化瓦解的方略，孤立昭义镇以减少讨伐的阻力和难度。武宗采用李德裕的建议，明确宣谕魏博、成德两镇，“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即昭义）不同”①，不使他们站到昭义一边，支持叛镇。同时，又以在河北的昭义所属的邢、洺、磁 3 州为诱饵，促使魏博、成德出兵参加讨叛。这样，既孤立了昭义，又增加了讨伐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对昭义四面包围的态势。

其二，迅速出兵，攻其不备，不给昭义充足的准备时间。以前藩镇有自立者，唐廷多先派吊祭使吊唁死去的节帅，再派册赠使给故帅赠官，然后派宣慰使劝谕自立者听从朝命，如果不听，还要另授官职，劝其离镇赴任。这样往返数次，至少半年时间就过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四月。

去了，使其得以有较充足的时间修缮城堡，整顿军队，作好防御准备。这一次却不同，刘从谏于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死，次月武宗就果断下诏讨伐，决策之迅速前所未有，起到了先声夺人的军事效应。

其三，革除弊端，统一军令，限制监军之权，放手让将帅指挥。李德裕认为德宗以来，讨伐叛镇每每失败，原因有三：一是诏令过多，日有三四，直接干预前线军事，且宰相多不预闻。二是监军过多干预军事指挥，将帅不能有效行使指挥权。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为监使，他们都选择骁勇者为牙队，阵前作战的军士多怯弱无勇。战斗时，监使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见到稍有不利，率先逃走，扰乱军队斗志，引起全线溃败。“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霑赏。二枢密使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①。这是平叛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四，利用诸军矛盾，巧妙指挥，促其立功杀敌。以往唐廷调动诸道军队讨伐叛镇，时常有按兵不动或坐观玩寇之事发生。遇到这类情况，唐廷或一味严诏催促，或束手无策，致使战争旷日持久，劳师费财。此次作战，成德王元逵之军已出动月余，魏博何弘敬尚未出师。李德裕知忠武军勇敢善战，何弘敬素来畏惧，便命忠武节度使王宰经魏博攻磁州。何弘敬恐忠武军入魏博境对己不利，急忙率军渡漳水，攻磁州。后来王宰负责南面军事时，进军迟缓，唐廷便派河阳节度使刘沔率精兵万人，“处宰肘腋之下”②，迫使王宰向泽州发起进攻。太原兵变发生后，唐廷没有就近调河东军队平叛，而是作出另调其他诸道军队讨伐的姿态。河东军怕他们入太原后杀掳自己的妻室儿女，主动请战，从而迅速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十四》，武宗会昌四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四年二月。

平定了兵变。唐廷的这些灵活措施，对保证讨伐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节　唐廷巩固边疆的作战

在文宗至懿宗时期，唐朝为巩固西南、西北边疆，与南诏、回鹘、吐蕃等发生了多次战争。由于唐朝策略正确，措施得当，挫败了南诏、回鹘的侵扰，巩固了边疆。同时，利用吐蕃内乱、力量衰弱的时机，收复了河陇地区，取得了对吐蕃战争的空前胜利。

一、反击南诏侵扰、巩固西南边疆

（一）西南边防的松弛

南诏王异牟寻在德宗时期，为摆脱吐蕃的役属，表示愿意归附唐朝。双方和好后，南诏配合唐军，连破吐蕃军，生擒其大相论莽热。此后，南诏连年朝贡。宪宗元和三年（808 年）十二月，异牟寻死。次年正月唐朝遣使吊祭，并册其子寻阁劝为南诏王，赐“元和册南诏印”。双方关系一直比较正常。

穆宗长庆三年（823 年），寻阁劝的孙子丰祐被其大容嵯颠所立，丰祐勇悍，为其众所畏服，羡慕唐朝文化和财富，“不肯连父名”①。敬宗统治的数年中，唐朝政治腐败，边备逐渐松弛，南诏始有轻唐之心。文宗太和三年（829 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②，“障候弛沓相蒙”③。杜元颖还随意削减士卒衣粮，专务聚积，致使西南戍边士卒，衣食不足，皆入南诏境抢掠以自给。南诏权臣嵯颠早就谋图攻略唐朝边境，掠夺人口、财富，指示凡唐朝士卒入境者，以衣食资送，这样就从这些士卒口中获得大量情报，川中虚实动静皆在南诏掌握之中。

---

①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中》。

②《旧唐书》卷一九七《西南蛮传》。

（二）南诏乘虚攻入西川

对于南诏入侵的企图，唐沿边州县有所觉察，多次向杜元颖报告，然其全然不信，丝毫也没有防御的准备。当年十一月，南诏嵯颠派兵向唐发动进攻，他以蜀兵卒为向导，深入唐境，攻陷巂州（治今四川西昌）、戎州（治今四川宜宾）。这时，杜元颖才急忙遣兵截击，双方大战于邛州（治今四川邛崃）之南，唐军大败，邛州随之也被攻破。南诏军乘胜从邛州直攻成都（今属四川），并攻陷其外廓城。杜元颖率军据牙城坚守待援。

文宗接到南诏入侵的报告后，紧急调发东川、荆南、山南西道、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入川援救。接着又调河东、凤翔兵入川，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指挥入川的各路军队对南诏作战。由于杜元颖黩职误国，被贬为邵州（治今湖南邵阳）刺史，后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东北）司马，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

南诏军一度攻至东川的梓州（治今四川三台）附近，由于援军未到，东川兵少，难于力战，郭钊与其修好，南诏兵退去。南诏军在成都外廓留驻 10 日，慰抚蜀人，“市肆安堵”①。唐朝救援西川的军队陆续入川，嵯颠见唐军势大，不敢力战，决定退兵。临行之时，大掠子女、工匠数万人及珍货，蜀人恐惧，投江而死者颇众，流尸塞江而下。过大渡河时，嵯颠对蜀人说：“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②。众人皆哭，投河而死者达千人以上。南诏军此次掠去的大批工匠，对南诏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③。

南诏军退去后，董重质及诸道兵没有对南诏发动攻击，奉诏相继退回本道。

（三）李德裕治蜀固边

文宗太和四年（830 年）九月，西川节度使郭钊因病上表朝廷，请求择人替代。十月，诏以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文宗太和三年十二月。

西川经南诏入侵后，边防设施残破，郭钊因身体多病，无暇整治。李德裕到达后，建筹边楼，画蜀地地形，“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餫远迩，曲折咸具”①。他经常召见习于边事者，包括走卒、蛮夷，“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踰月，皆若身尝涉历”②。经过李德裕的深入调查，“凡虏之情伪尽知之”③。在此基础上，李德裕制定了治理西川、巩固边防的方案，其要点如下：

第一，整顿军队，简练士卒。文宗命李德裕修治清溪关（今四川石棉东南），以塞断南诏入寇之路。李德裕认为仅清溪关旁就有大路三条，小路无数，塞不胜塞，只有以重兵镇守，方可保证无虞。蜀兵本来不足，又经南诏此次打击，更加脆弱，必须重新整顿，增加兵力。在奏请文宗批准后，李德裕遣散军中老弱不堪战者4400多人，保留精壮，又从州兵中抽调善战者充实军队，留下郑滑、陈许援蜀的部分军队，整编后将其分为11军，严加训练，战斗力大大提高。《新唐书》本传说：“其精兵曰南燕保义、保惠、两河慕义、左右连弩；骑士曰飞星、鸷击、奇峰、流电、霆声、突骑。”④李德裕认为只有正规军队还不足有效制敌，必须有民兵相配合。他命每200户抽强壮者一人，加以训练，平时生产，战时作战，称为“雄边子弟”⑤。对于兵器、装备的质量，李德裕也要求颇严，分别从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浙西（治杭州，今属浙江）请来甲胄、弓矢、弩箭的制造工匠，精心制造，“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锐”⑥。

第二，增筑城邑，占据险要。李德裕认为，西川沿边原有关塞城邑已不足以防御南诏、吐蕃，必须在险要之处增筑城邑，屯驻大兵，才能有效防御异族入寇。在大渡河以北修筑了杖义城，与清溪关呈呼应之势，以增强大渡河一线的防御；修御侮城，和荣经（今四川荥经）成犄角之势，加强防御纵深；修筑柔远城，以

①③④⑤⑥ 《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文宗太和四年十月。

防御西山（今四川马尔康一带）吐蕃；恢复邛崃关（今四川汉源北），移嶲州（治今四川西昌）治所于台登（今四川喜德西），以控制险要。

第三，采取措施，保证边防军需的供给。以前西川沿边戍兵的供给要从内地嘉（治今四川乐山）、眉（治今四川眉山）等州调运，“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辇夫多死”①。李德裕改从邛（治今四川邛崃）、雅（治今四川雅安）等州，每年十月开始转运粟粮，在盛夏之前完成调运，嘉、眉等州也必须在盛暑天到来前完成漕运转输。这样既减少了运粮役夫的死亡，使嘉、眉等州负担减轻，各州负担均匀，又可以保证沿边戍兵供应及时，储备充足，从而加强了沿边的防御力量，巩固了边防。

这期间，李德裕还下令毁去私建佛寺、佛堂数千所，还地归农。蜀人多卖女于人为妾，李德裕规定13岁以上者，执役3年，13岁以下5年，到期必须归还原父母。对民出家为僧，仍娶妻生子者，严加禁止。于是“蜀风大变”②，“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③。

太和五年(831年)，李德裕遣使入南诏索要以前俘获之人。由于西川在李德裕治理下，生产发展，军力强盛，南诏有所恐惧，遣还了所俘工匠、僧道及其他丁口4000余人。

（四）抗击南诏进攻安南的作战

唐宣宗时，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买当地人牛马，一头只给盐一斗，又杀害其酋长杜存诚，当地群众愤怒，遂于大中十二年（858年）导引南诏侵扰安南（治所交州，今越南河内）。次年，南诏主丰祐死，其子酋龙继位，唐廷因其不遣使告丧，其名又近唐玄宗（李隆基）讳，故不行册礼。酋龙遂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礼，建年号建极，并派兵攻陷播州（治今贵州遵义）。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率兵收复播州。播州属黔

①② 《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

③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中道，不归安南管辖，李鄠为求边功，擅自率军越境作战，致安南空虚无备。十二月，安南群蛮会合南诏兵计3万余人，攻交州，李鄠闻讯急忙奔向武州（位今广西宜山境内），征集土反攻安南。次年六月，李鄠击败群蛮与南诏兵，收复交州。唐责其失守之罪，贬官流放，另以盐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月，南诏攻陷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大掠20余日而去。咸通年（862年）二月，南诏军再次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次遣使急。唐廷命前湖南观察使蔡袭接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调发（治今河南许昌）、滑（治今河南滑县东）、徐（今属江苏）、（治今河南开封）、荆（治今湖北荆州）、襄（治今湖北襄樊）、（治今湖南长沙）等地军队3万人，由蔡袭率领援救安南。南诏见唐军势大，不敢力战，遂退去。五月，唐廷分岭南道为东、2道，东道治所广州（今属广东），西道治邕州。以左庶子蔡京岭南西道节度使，原岭南节度使韦宙为东道节度使，以加强防务。

蔡京见安南经略使蔡袭手握重兵，恐其立功，上表奏称：蛮远遁，边徼无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盖以路远，难于覆验，故得肆其奸诈。请罢戍兵，各还本道。"①认为南诏窥视安南日久，不可无备，请求留戍兵5000人，唐许。不久，蔡京因统治残暴，为部下军士驱逐，被唐廷赐死以桂管观察使郑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十一月，南诏出兵5安南，蔡袭兵少，遣使告急，唐廷调荆南、湖南、桂管等道兵人，开往邕州，归郑愚指挥，援救安南。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奏朝廷，认为如急于出兵安南，南诏将乘虚袭取邕州，断绝粮道，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唐廷命郑愚分兵防御本道，不交州增援，命蔡袭移兵屯守海门镇（今越南海防西北）。由于被围于交州，无法向海门转移，兵力寡少，难以持久固守。四年正月，南诏攻陷交州，蔡袭徒步力战，身中10箭，"谷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三年五月。

军船，船已离岸，遂溺海死"①。荆南虞候元惟德等率残兵400余人逃到城东，无船渡水，陷入绝境，元惟德等对其众说："吾辈无船，入水则死，不若还向城与蛮斗，人以一身易二蛮，亦为有利。"②遂从交州东门进入罗城，纵兵大杀，南诏兵无备，被杀者2000余人，惟德等后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南诏两度攻陷安南，杀掳15万余人，"谿洞夷獠无远近皆降之"③，留兵2万，命其将杨思缙率领据守交州。

唐廷见安南已失，遂命后至的诸道援兵分守岭南西道各地。三月，南诏兵进攻邕州，郑愚畏惧不敢战，自请离任，唐廷以义武节度使康承训代其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调荆、襄、洪（治今江西南昌）、鄂（治今湖北武汉武昌）等地军队4万人，随同前往。由于交州已陷，唐廷置行交州于海门镇，命右监门将军宋戎为安南经略使，调兵万人镇守。咸通五年正月，调集于海门的唐军已达2.5万人，唐廷命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勾当交州事，令其进取交州。然张茵缺乏武略，迟迟不敢发动攻势。

三月，南诏出动6万大军进攻邕州，康承训自以为兵多势强，不设斥候。在南诏兵入境后，轻率地出动军队万余人，由獠人为向导，前往迎敌。唐军骄傲轻敌，没有准备，一战即溃，损失8000余人。康承训闻知败讯，慌恐不知所为，节度副使李行素率众整治壕栅，准备器械，做好迎战准备。南诏围城后，诸将主张乘敌立足未稳之机，夜间分道出击袭击敌营，康承训不许。"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乃许之。小校将勇士三百，夜，缒城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级。蛮大惊，间一日，解围去"④。康承训这才出兵数千追击，杀获不足300人而归。康承训奏称获得大捷，唐廷加其为检校右仆射，其余立功受赏者，皆其子弟、亲信，夜袭敌营的将校却无一人受赏。军中怨声大起，愤愤不平。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颇知康承训所为，据实报告了朝廷，康承训疑惧不安，称疾辞职，唐廷遂以张茵为岭南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四年正月。

④《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五年三月。

西道节度使。不久，由于张茵怯战，又以高崇文之孙、骁卫将军高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代替张茵负责收复安南的军事。

咸通六年（865 年）七月，高骈从海门向交州进击，自率 5000 人先进，使监军李维周领兵继进。李维周与高骈不和，有意拥兵不进，欲置高骈于死地。九月，高骈军进至高定（今越南河内东北），峰州（今越南河内西北）蛮近 5 万人正在田间收获，高骈纵兵掩击，大胜，夺其粮以充军食，并占据峰州。七年六月，南诏添将增兵，加强交州防务。唐廷派监阵敕使韦仲宰率兵 7000 人也到达峰州，高骈兵力得到加强后，屡次向南诏军发动攻势，均获胜。捷报送达海门后，李维周皆匿而不奏。懿宗数月无闻安南音讯，遣使询问李维周，李维周上奏说高骈屯军峰州，玩寇不进。懿宗大怒，命右武卫将军王晏权往安南代替高骈，召高骈返回京师。是月，高骈在交州城郊大破南诏军，杀获甚多，并包围了交州。十月，交州被围多日，南诏军屡战皆败，城池几乎不守。正在这时，高骈收到王晏权牒文，其已与李维周率大军从海门出发来交州，高骈遂把兵权交韦仲宰暂管，自率亲兵百余人北归。王晏权无勇无谋，处处听命于李维周，而李维周为人凶残，将士不肯用命，戒备松懈，城中军民逃出大半。先前，监阵敕使韦仲宰和高骈也曾派人携表章入京上奏安南战况，他们避开李维周，间道驰往京师，懿宗得奏，大喜，加高骈检校工部尚书，并恢复原职。高骈到达海门时，接到朝廷诏命，遂又返回交州前线，督率将士奋力进攻，很快克城，杀其安南节度使段酋迁，斩首 3 万余级。唐军收复交州后，高骈又击败归附南诏的当地武装，斩其酋长，降附甚众，重新平定了安南。

十一月，唐廷“诏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域，勿复进攻南诏，委刘潼晓谕，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①。“自李涿侵扰群蛮，为安南患殆将十年，至是始平”②。同月，唐廷置静海军于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七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七年十一月。原文为“侵扰安南”，据校勘记改为“侵扰群蛮”。

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

二、反击回鹘侵扰以固西北

（一）黠戛斯的崛起与回鹘的分裂

黠戛斯，汉代称坚昆，魏晋时称结骨，主要生活在今叶尼塞河（今俄罗斯境内）上游流域，从事畜牧，兼营农业和狩猎。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归附，唐朝在其地设坚昆都督府，隶燕然都护府。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后，相继受东突厥和回鹘的统治。黠戛斯人自称汉代李陵的后裔。肃宗乾元（758～760年）中，为回纥所破，回纥封其君主阿热为毗伽顿颉斤。后回鹘与吐蕃争夺西域，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回鹘势力逐渐有所削弱，阿热遂自称可汗，不再顺从于回鹘的统治。回鹘派兵征讨，双方战斗20余年，回鹘始终不能取胜。阿热更加骄横，公开对回鹘宣示说："尔运尽矣！我将收尔金帐，于尔帐前驰我马，植我旗。尔能抗，亟来；即不能，当疾去。"① 回鹘无力讨伐，只好听之任之。

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发生内乱，其相掘罗勿勾结沙陀兵共攻其可汗萨特勤，可汗势穷自杀。国人立䝘馺特勤为可汗。是岁，回鹘发生大疫，又天寒大雪，羊马多死，势力更加衰弱。武宗即位，回鹘大将句錄莫贺恨掘罗勿，引黠戛斯10万骑攻回鹘，大破其众，杀䝘馺特勤可汗与掘罗勿，焚其牙帐，回鹘诸部逃散。回鹘相馺职与特勤厖等15部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所占的甘州（治今甘肃张掖），称甘州回鹘；一支奔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称安西回鹘；一支由可汗之弟唱没斯、大相赤心、仆固、特勤那颉啜等率领，抵达唐朝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请求内附。会昌元年（841年）二月，在塞北靠近可汗牙帐的13部回鹘人拥立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同唐朝贸易以获取谷物、食品。

---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

（二）唐廷反击回鹘的方略

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见回鹘势穷，欲想立功，奏请联合吐谷浑、沙陀、党项等出兵攻击。武宗向朝臣征求用兵方略，宰相李德裕认为："回鹘于国尝有功，以穷来归，未辄扰边，遽伐之，非汉宣帝待呼韩之义。不如与之食，以待其变。"又说："沙陀，退浑（即吐谷浑），不可恃也。夫见利则进，遇敌则走，杂虏之常态，孰肯为国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与劲虏确，无不败。请诏牟无听诸戎计。"①当时天德军只有军队千余人，回鹘虽然分裂，诸部人共数十万，唐军如贸然出击，必然要吃败仗，即使有必要出兵，也须调动诸道大军征伐。故李德裕的建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主张。

武宗同意李德裕的主张，一面下诏令河东、振武两节度使，严兵防御，以备回鹘骚扰；一面遣使慰抚回鹘，赐粮2万斛。有人反对资助回鹘。李德裕说："今征兵未集，天德孤危，傥不以此粮噉饥虏，且使安静，万一天德陷没，咎将谁归？"② 反对者不敢再坚持其意见，使得这个方略得以顺利执行。

武宗见回鹘诸部屯于塞北，早晚不免一战，于是，派兵部郎中李栻为巡边使，名为巡察边防情况，实则了解沿边将帅才能。会昌二年（842年）三月，李栻巡边回朝后，奏称振武节度使刘沔有威略，可任大事。于是，武宗调刘沔任河东节度使，以金吾上将军刘忠顺任振武节度使。

（三）唐军出击大败那颉啜部

黠戛斯大败回鹘，焚毁其牙帐时，获得唐朝嫁给回鹘可汗的太和公主，在派人送公主归唐途中，遭乌介可汗截击，护送公主的黠戛斯人被杀。回鹘以太和公主为人质，多次要求借振武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以供公主、可汗暂住，唐廷不许，回鹘因此屡次侵扰唐朝边境。

---

① 《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武宗会昌元年九月。

唱没斯一心归唐，而赤心、仆固等部却屡次侵扰唐边境，唱没斯见二人难制，于是设计杀死二人，率特勤、大相等2200余人投降唐朝。武宗遣使安抚唱没斯，赏赐其部众大量的粮食、绢帛，封唱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赐姓名曰李思忠，以其部众置归义军。

赤心等死后，其部溃散，回鹘贵族那颉啜招收其残部7000余帐向东退去。会昌二年（842年）五月，那颉啜率其众从振武、大同（今山西朔州东北），向东占据室韦、黑沙，再向东南进入幽州（治今北京西南）、雄武军（今河北兴隆西南）西北境。卢龙节度使张仲武遣其弟张仲至率兵3万迎击，大破其众，收降7000帐，杀戮和俘获老少人口近9万人。那颉啜本人中箭，潜逃而回，被回鹘乌介可汗捉获杀死。

（四）杀胡山之战与回鹘衰亡

回鹘自赤心等被杀，唱没斯归降，那颉啜部覆灭后，力量更加衰弱。乌介可汗自以为仍有众10万，建牙帐于大同军以北的闾门山，以与唐朝相抗衡。他上表于唐廷，请求给予粮食、牛羊，并请送还唱没斯。唐廷分析了回鹘情况，认为其力量今非昔比，严辞拒绝了其请求，回答说："粮食听自以马价于振武籴三千石。牛，稼穑之资，中国禁人屠宰；羊，中国所鲜，出于北边杂虏，国家未尝料调。唱没斯自本国初破，先投塞下，不随可汗已及二年，虑彼猜嫌，穷迫归命。前可汗正以猜虐无亲，致内离外叛。今可汗失地远客，尤宜深矫前非。若复骨肉相残，则可汗左右信臣谁敢自保！朕务在兼爱，已受其降。于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亏信义，岂不两全事体，深叶良图！"① 唐朝还屡次遣使劝回鹘返归漠南，乌介可汗不听。八月，乌介可汗率众突入大同川，虏掠河东牛马数万头，攻至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城下。云州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当地的吐谷浑、党项等部族，皆携家口入深山躲避。

由于回鹘在早年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于唐朝，此次又以太和

---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武宗会昌二年五月。

公主为人质，唐廷为了仁至义尽，再次遣使告谕回鹘，劝其送还公主，早日离开塞下，明确指出："自彼国为纥吃斯（即黠戛斯）所破，来投边境，抚纳无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议还蕃，或侵掠云、朔等州，或钞击羌、浑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观踪由，实怀驰突之计。中外将相咸请诛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灾。可汗宜速择良图，无贻后悔！"① 李德裕还以河东节度使刘沔的名义，致书回鹘相颉干迦斯，奉劝其不要侵扰唐朝边境，送还公主，否则将遭夷灭之祸。回鹘不听，仍不断骚扰边境，抢掠人口、财物，给边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失。

面对回鹘的不断侵扰，唐廷决定以武力驱逐，于是调发陈（治今河南淮阳）、许（治今河南许昌）、徐（今属江苏）、汝（治今河南临汝）、襄阳（治今湖北襄樊）等处军队，屯驻于太原、振武、天德，等第二年春天出击回鹘。宰相李德裕认为来年春天进兵的好处是官军可以免受严寒之苦，那时也是回鹘人人困马羸之时，占天时之利。但是，如果回鹘利用冬季马力强健、河水冰封，南下驰突，则国家将要遭受更大的损失。建议在天时未寒之时，集中优势兵力，疾速出击，在两月之内结束战事。并推荐勇将石雄率唐军及党项、吐谷浑劲兵，"衔枚夜击之，势必得"②。此议取得武宗的赞同。

九月，诏以河东节度使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全面负责对回鹘的军事行动，以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指挥本道兵马及奚、契丹、室韦等部族军队；以归义军使李思忠（即嗢没斯）为西南面招讨使，指挥本部军队及党项等族军队。诸路军队限期会于太原，准备出击。

奚、契丹原先隶属于回鹘，回鹘各派有监使，督其每年输纳贡赋。这时，卢龙节度使刘仲武派牙将石公绪率兵会合奚、契丹兵，尽杀回鹘监使等800余人。又诱使室韦杀死回鹘监使。三族彻底摆脱了回鹘控制，置于唐朝的监护之下。

---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武宗会昌二年八月。

②《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

唐朝诸道军队会齐后，武宗下诏命河东、幽州（卢龙节度使治所，今北京西南）、振武、天德各出大军，移营向前，向回鹘推进。十二月，由于刘沔、张仲武欲来春出击，故行动迟缓，直到此时才移军屯于云州。李思忠却积极行动，请求出击回鹘。武宗于是命银州（治今陕西榆林南）刺史何清朝，蔚州（治今山西灵丘）刺史契苾通分率河东蕃兵，前往振武，接受李思忠的指挥。李思忠和李忠顺出击回鹘，击破其一部。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回鹘可汗乌介率众逼近振武城，刘沔命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沙陀及党项等部3000骑兵，袭击回鹘牙帐，刘沔自率大军继后。石雄率军到达振武，登城瞭望，见毡车数十乘，从人服装类似唐人，遣谍者侦察，得知是太和公主所居之帐。石雄又派谍者转告公主，在唐军出击时，请公主与侍从潜伏起来，不要乱动。石雄为不惊动回鹘，出其不意，不从振武城门出击，当夜在城墙凿十余孔，引兵而出，直攻可汗牙帐。到达其帐下时，回鹘才发觉，乌介可汗大惊，不知所为，弃辎重而逃。石雄乘胜追击，在杀胡山(位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大破回鹘，乌介可汗受伤，率数百骑兵逃去。此役斩首万余级，收降其部落人口2万余人。石雄迎接太和公主以归。

乌介可汗逃至黑车子族①，其余溃兵多往幽州投降。二月，下诏废去归义军，把其下所属的回鹘士卒分隶诸道为骑兵。回鹘士卒不愿分离，“皆大呼，连营据滹沱河，不肯从命”②，被河东节度使刘沔尽数诛杀，共杀死士卒3000余人，酋长43人。归降幽州的回鹘人3万余，也被遣散分隶于诸道。

三、驱逐吐蕃收复河陇

（一）河陇所处的战略地位

① 黑车子族为室韦之一部，北去唐境1000余里。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三月。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被迫把河西、陇右及安西等地精兵东调平叛，吐蕃乘虚蚕食河陇，先后占据了鄯（治今青海乐都）、武（治今甘肃武都东南）、叠（治今甘肃迭部）、宕（治今甘肃舟曲西）、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渭（治今甘肃陇西东南）、成（治今甘肃礼县东南）、洮（治今甘肃临潭）、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兰（治今甘肃兰州）、岷（治今甘肃岷县）、廓（治今青海化隆西南）、原（治今宁夏固原）、伊（治今新疆哈密）、凉（治今甘肃武威）、甘（治今甘肃张掖）、肃（治今甘肃酒泉）、瓜（治今甘肃安西东南）等州。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占据了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贞元七年（791年）最后占据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这一广大地区的失去，对唐朝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这一广大地区是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由之地，它的失去截断了唐朝与中亚、欧洲的陆路联系，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一度中断。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唐王朝与西域的安西、北庭等地的交通线，失陷以后唐朝与西域的联系必须取道于回纥，路途非常艰难，且不时被阻断，致使北庭、安西与唐朝廷的联系逐渐断绝，并为吐蕃所攻陷。军事上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吐蕃以这一地区为基地，对唐朝的统治腹心关中构成很大威胁。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还未尽占河陇，就对唐朝统治构成很大威胁。这年十月，其攻破泾（治今甘肃泾川北）、邠（治今陕西彬县）2州，直逼长安，代宗仓皇逃往陕州（治今河南陕县），吐蕃一度占据长安。此后吐蕃对唐朝的侵扰，莫不以这一地区为基地，迫使唐朝不得不每年调动大量兵力“防秋”，耗费了巨额资财，给唐朝带来了很大的军事压力和经济负担。

（二）吐蕃夺占河陇后的残暴统治

吐蕃贵族对被占领区人民实施暴虐统治与奴役，使河西、陇右地区的汉族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太常少卿韦伦奉命出使吐蕃，返回时路过河陇地区，亲眼看到当地人民的痛苦生活。“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

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及见（韦）伦归国，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捶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①。说明吐蕃把占领区的汉族人民视若贱民，予以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故当地人民时刻盼望着摆脱其统治。数十年后，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唐朝派刘元鼎与吐蕃会盟，行至龙支城（今青海乐都南）时，"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人也"②。可见当地人民一直怀念唐朝，不忘故国之情。敦煌曲子词中的"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③，也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吐蕃贵族把汉人的子孙生下来就以奴婢对待，种田放牧，或聚居城邑中，或散处荒野间。对待被俘的汉人，无专长的面上刻字，由赞普发落，或给赞普做家奴，或给贵族为奴，承担各种劳役。刘元鼎会见赞普时，设酒宴款待，"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④。这些为乐工、伎人的汉人，当是被吐蕃虏掠的有专长的俘虏。不论有无专长，都被在身体上刻字，以防止其逃跑，显然被视作贱民。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时刻折磨着当地人民。

广大陷蕃人民为了争得生存权利，不断地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敦煌遗书S·1438号卷子背面有《书仪》残稿，记载了吐蕃占领沙州不久，驿户氾国忠等领导的一次起义。起义者夺取战马铠甲，迫使吐蕃贵族纵火烧舍，"伏剑自裁，投身火中，化为灰烬"。起义者在3夜之间，就越过了从酒泉到敦煌之间的重重城隘关塞，使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四月《考异》引《建中实录》。

②④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③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望江南》。

得“东道烽铺，烟尘莫知”，“蕃官慢防，不虞祸至，人力散乱，难与力争”。与此同时，沙州玉关驿户张清也发动起义，与汜国忠领导的起义相呼应①，给吐蕃的残暴统治以沉重打击。

（三）吐蕃内乱与唐廷议复失地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达磨赞普死去，达磨无子，其佞臣立达磨妃綝氏侄乞离胡为赞普，元老重臣皆不能参预国政，大相结都那出面反对立异姓子，被杀死，国人愤怒。另一派大臣立赞普支属俄松为赞普，吐蕃至此分裂。吐蕃洛门川（今甘肃武山东）讨击使王族论恐热联合其青海节度使共同举兵，进攻渭州，击败大相尚思罗，尚思罗逃至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论恐热又追至松州，杀尚思罗。论恐热自称大相，出兵20万进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尚婢婢世为吐蕃相，宽厚沉勇，有谋略。“论恐热虽名义兵，实谋篡国，忌婢婢，恐袭其后，欲先灭之”②。两军混战，互有胜负。吐蕃贵族的内战，加深了河西人民的苦难。论恐热大掠鄯、廓等8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③。这些暴虐行径，不仅激起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恨，连其部下也怨望不平，“麾下内怨，皆欲图之”④。

吐蕃的内乱，严重削弱了其力量，也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唐王朝乘此机会，决心收复河陇失地。会昌四年（844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糗粮及诇吐蕃守兵众寡”⑤。大中元年（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与吐蕃论恐热战于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大败吐蕃军，攻下清水（今属甘肃）。三年二月，

---

① 刘进宝：《归义军及其政权始末述论》，《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六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四年九月。

④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⑤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四年三月。

“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①。六月，以上诸镇兵接收了3州7关。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奉命屯驻于宁州（治今甘肃宁县）以接应河西来降之众。八月，宣宗在长安延喜门楼接见了河陇老幼千余人。下诏募百姓开垦3州7关土地，5年不缴租税。并令山南、剑南等道军队，收复其边境陷蕃州县。十二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收复扶州（治今四川南坪东北）。唐王朝对吐蕃的这一系列军事胜利，给河陇人民以很大的希望，同时也鼓舞了他们反抗吐蕃残暴统治的斗志。

（四）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河陇

张议潮是沙州人，少习文史，颇通韬略。他痛恨吐蕃的残暴统治，秘密团结当地反对吐蕃统治的各界人士，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起兵。张议潮的骨干力量主要是：(1)沙州名门望族，如张氏、李氏、索氏等，都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佛教首领及僧徒。沙州是中西交通要冲，佛教兴盛，僧徒众多，佛教首领和僧徒在人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3)豪杰义士。正是在这些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张议潮广泛地组织、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在条件成熟时，他断然“募兵”集众，发动起义。

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②。唐廷遂以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当时，张议潮率众与吐蕃守军经过浴血奋战，“白刃交锋，横尸遍野，残烬星散，雾卷南奔”③。彻底击败吐蕃军，一举收复沙州。由于这时河西其他州县仍在吐蕃统治下，张议潮为了确保向唐朝报捷的表文安全送到长安，派遣了10队使者，携带同样的表文，分10路奔赴长安。其中只有走东北道的一路使者，历经千辛万苦，才在天德军防御使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十四》，宣宗大中三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五年正月。

③ 敦煌遗书S·3329《张氏修功德记》。

李丕的协助下，于大中五年（851年）正月抵达长安。在这期间，张议潮以沙州为基地，发展生产，训练军队，继续同吐蕃进行殊死斗争。到大中五年时，相继收复了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10州，连同先前收复的沙州，共11州。于这年八月，遣其兄张议泽奉11州图籍入京告捷。十一月，唐朝在沙州建立归义军，统辖瓜、沙等11州，以张议潮为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支度、营田等使。

张议潮收复河西，并非就意味着唐王朝有效地控制了这一地区。当时，南面的吐蕃还在伺机卷土重来，北面的回鹘也在觊觎着这块土地，散处在各州的吐蕃残余势力逐渐纠合在一起，烧杀抢掠，河西地区的形势还十分复杂。大中十年（856年）至十一年，张议潮领导河西军民三次同来犯之敌进行殊死决战，先后战胜吐谷浑、回鹘、吐蕃等对河西的侵扰。懿宗咸通二年（861年）九月，张议潮亲率蕃汉军7000人，收复凉州，遣使向唐朝告捷。咸通四年（863年），唐朝置凉州节度使，领凉、洮、西、鄯、河、临6州，由张议潮兼任节度使①。咸通七年（866年）十月，唐将“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②，河陇肃清，这一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所谓“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③。河西走廊再次畅通无阻，对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咸通八年（867年）八月，张议潮入京，任右神武军统军，赐田宅，命其侄张淮深代守归义军。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张议潮在长安私第逝世，终年74岁，赠太保，葬于浐水南原。其收

---

① 姜亮夫：《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七年十月。

③ 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敦煌学论文选》上集，兰州大学编。

复河西失地，重振大唐声威，坚持国家统一的英雄业绩，千百年来得到人们的传颂与赞誉。

第十六章　唐末农民起义战争（上）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在宝应、永泰（762～766年）间先后爆发过袁晁、方清、陈庄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此后尽管赋税徭役繁重，农民不断逃亡，却还没有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穆宗之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文宗、武宗时期不断有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发生，所谓"官乱人贫，盗贼并起"①。宣宗时，剑南"蓬、果群盗依阻鸡山，寇掠三川"②。湖南衡州（治今湖南衡阳）爆发了邓裴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分散的小规模起义，到懿宗时发展为裘甫、庞勋领导的地区性起义，可以说这是唐末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规模起义的序幕，其意义不可低估。

第一节　唐代末期的社会危机

唐朝后期，尤其懿宗以来，由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糜烂，战争频繁，官吏众多，费用日增，官府便不断地向人民加税，逼得广大人民衣食无着，破产逃亡，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与此同时，朝政也日趋腐败，危机重重。继吐蕃之后，南诏成为唐朝最大的边患，连年侵扰，使唐朝统治更加动荡不稳。

一、经济严重破坏，封建剥削残酷

唐朝后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究其根源，主要有3个方

---

① 《新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五年十月。

面的因素：

1、封建剥削残酷，导致农民破产逃亡。唐后期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盐、茶、酒、竹木、漆、房屋等，都要收税，规定以上物资市场交易每千钱抽50文。特别是食盐，官府垄断经营、任意抬高盐价，使盐价从唐中期以来增加了十几倍。此外，徭役和科差也越来越沉重，本来两税法规定租庸杂徭悉省，由于藩镇连兵，战争频繁，转输任务繁重，农民仍然是“力役不息”。科差在唐后期指色役，即以户为征发单位的杂徭，由各级官吏根据需要随时征发，征发的时间和服役的期限都没有限制①。官吏征发色役“动踰数月”②，妨碍农时颇甚，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

2、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唐前期禁止占田过限，对土地买卖和转移有各种限制。两税法实行后，占田数额和土地买卖的限制被全部取消，遂使地主、官僚更加肆无忌惮地兼并农民的土地。懿宗时，宰相们也承认当时的情况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③。如岭南节度使韦宙，在江陵（今属湖北）有大量“良田美产”，其庄园屯积的稻谷就有7000堆，被称为“足谷翁”④。关中的良田不是被宦官们兼并，就是被拥有神策军籍的地主所占有，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甚至一个退职的县令严部，在长葛（今属河南）就有“良田万顷”⑤，其他贵族官僚兼并土地，可想而知。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浮户，或变为地主客奴，身份大大下降，还要承担地主沉重的地租和杂役，生活更加穷困，更加痛苦。

3、战争的直接破坏。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统计，从安史

---

① 吴宗国：《唐末阶级矛盾激化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② 《全唐文》卷八十二《大中改元赦文》。

③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记》。

④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韦宙》。

⑤ 皇甫枚：《三水小牍》卷下。

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763 年）起，至乾符元年（874 年）止，这 110 余年中共发生藩镇动乱 170 余起，平均每年发生 1.5 起。其中与朝廷发生冲突的共 20 余起，平均每 5.5 年发生一起。战争如此频繁，必然对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所谓“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①。战争还迫使农民逃离家园，大片土地无人耕种，“人户逃亡，田地荒废”②。至于战争耗费的巨额资财和大量人力，更是无法统计。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朝后期经济残破，生产衰退，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除了武装暴动以反抗朝廷的残酷统治，别无选择，农民起义不可避免了。

二、朝政日益腐败，政权动荡不稳

唐朝后期，朝政日渐混乱，政治非常黑暗，朋党倾轧，宦官专权，官吏贪污，藩镇跋扈，使得唐政权动荡不稳。

唐代宦官自玄宗时干政以来，到后期由于其掌握了禁军权，进而控制政权，在朝中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无恶不做。他们残酷地打击政敌，迫害朝臣，利用“甘露之变”，大杀朝官，死者六七百人，朝堂几乎为之一空。又残害百姓，搜刮财物。宦官们借宫市之名，公开抢劫人民财物，五坊小使以捕捉鸟雀禽兽为名，到处敲榨勒索，稍不如意就张网于农户家门及水井，不许出入和取水，凶残无赖之极。甚至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唐后期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及哀帝共 11 个皇帝，其中宪宗、敬宗两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文、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肃宗乾元元年十二月。

②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③ 《全唐文》卷八〇四《直谏书》。

武、宣、懿、僖、昭宗6个皇帝为宦官所立。可见宦官权势膨胀到何种程度。由于宦官们的贪婪、残忍、专横和无知，对唐朝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了阶级矛盾。

唐后期，政治之黑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旧唐书》卷一九〇下《刘蕡传》说："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这段话深刻揭露了唐朝君臣的丑恶嘴脸和凶残本性，节帅、刺史、县令无不刻意聚敛钱财，盘剥百姓。地主阶级利用特权转移赋役负担，赋税和徭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破产者甚众。而统治阶级却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丝毫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如唐懿宗信佛，咸通十四年（873年）至法门寺迎佛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①。僖宗喜欢"蹴鞠斗鸡"，"赌鹅"，尤善"击球"，强迫百姓广修球场供其游乐。他曾夸口："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②

唐代的朋党斗争也是很激烈的。"牛李党争"就持续了40年之久，卷入朋党斗争中的朝臣不计其数，他们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斗争异常激烈。对于宦官专权，朝臣们痛心疾首，力图翦除阉宦的大有人在。"甘露之变"时朝臣遭到惨痛的失败，此后"朋党"分子往往又和不同派系的宦官相勾结，依为后援。懿宗、僖宗时期，朝臣之间斗争更烈，他们不问是非，全凭意气用事，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到无休止的攻讦之中，致使朝政更加混乱。在唐末，不少朝臣甚至勾结强藩，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相互之间展开斗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是唐王朝瓦解的三个重要原因。在这些矛盾的交织发展中，唐王朝政治黑暗，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二月。

经济困难，政权极度不稳，最后垮台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战争频繁不已，灾荒连年不断

唐朝后期战争频繁，自文宗以来先后发生了横海李同捷、山南西道杨叔元、昭义刘稹等藩镇叛乱，唐廷调动诸道大军，耗费了巨额资财，虽最终平定了叛乱，但也使当时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这一时期边患也比较严重，吐蕃虽已衰落，南诏、回鹘、党项、契丹等军却不时骚扰边境，威胁着周边地区社会安宁和正常生产，其中南诏已成为唐朝后期最大的边患根源。

南诏自酋龙称帝以来，“兵出无宁岁”①，频繁地侵扰西川、岭南、安南等地，杀掳人民，破坏生产，对唐王朝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自懿宗咸通七年（866年）高骈收复安南，击败南诏军后，南诏遂把进攻的主要方向移到西川，集中物力、军力欲与唐军一决雌雄。咸通十年（869年）至十一年，南诏起倾国之兵，凡男子15岁以上都要应征入伍，“妇耕以饷军”②，连续攻陷嶲（治今四川西昌）、黎（治今四川汉源西北）、嘉（治今四川乐山）、雅（治今四川雅安）等州，进驻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围攻成都（今属四川）。懿宗命东川节度使颜庆复为大渡河制置、剑南应接使，率大军援救成都。大将曾元裕、宋威等连败南诏军，斩杀甚多，成都城中夜出勇士，火烧南诏军营，南诏军大败，退回国去。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军再次攻蜀，渡过大渡河，击败唐守军，攻陷黎州，进逼雅州，成都震动。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南诏又一次破黎州，入邛崃关（今四川荥经西南），围成都3日退去。

次年，唐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简阅精锐，连败南诏，收复邛崃、黎州，把南诏势力驱逐过大渡河。南诏恐惧，遣使求和。自酋龙以来，南诏为唐边患近20年，使唐朝疲于奔命，穷以应付，国力虚耗。南诏因连年战争，国力衰弱，也难于支持，双方讲和

---

①②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下》。

后，直至唐末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争。《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中评论说："懿宗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可见南诏之患，也是促成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唐朝后期，天灾严重，连年不断。《新唐书·食货志二》载："懿宗时，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齑。"咸通十四年（873年），关东、河南大旱，"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百姓饥饿，"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官府不加赈济，照旧催逼赋税，"督趣甚急，动加捶挞"①，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之连年自然灾害，百姓无法生活下去，"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②，农民起义的大风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

第二节　浙东裘甫起义

唐朝后期，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南8道，因此，这一地区的人民负担也就格外沉重。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就是对这种沉重的封建剥削的反抗，尽管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最后失败了，但仍沉重地打击了唐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基础，奏响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

一、起义的爆发

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裘甫率众在浙东起义，攻下象山县（今属浙江）。两浙州县，久无战事，甲兵朽钝，仅有军队不满300人，故官军屡战屡败。明州（治今浙江宁波东南）城门白

①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

日紧闭，人心慌恐。裘甫组成百余人的队伍，向剡县（今浙江嵊州）进逼。浙东观察使郑祇德急遣讨击副使刘勍，副将范居植率兵300人，会合台州（治今浙江临海）军队共同讨伐。

懿宗咸通元年（860年）正月，裘甫率领的起义军与官军战于桐柏观（位于今浙江天台境内）前，唐将范居植被杀，刘勍只身逃窜，起义军壮大至千余人。很快攻下剡县，开府库招募壮士，队伍发展到数千人。

郑祇德见唐军失利，下令重新招募兵卒，组织军队，由于军吏受贿，所招募者皆衰弱不堪一战。郑祇德派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珪率新招募的500人进攻起义军。二月，双方在剡县以西遭遇。裘甫设伏于三溪（今浙江嵊州西南）南面，列阵于三溪之北，堵塞溪水上流，使水浅可涉。交战后，义军佯作不敌，退往溪南，官军追击，义军乘其涉溪半渡之际，决开上流堵塞处，溪水汹涌而下，官军不是冲淹而死，就是被义军俘获，3员唐将皆死，官军几乎全军覆没。

此战的胜利，使义军声威大振，各地起义或暴动的小股农民队伍，纷纷归附裘甫，起义军发展到3万人。裘甫进行整编，把全军分为32队，各有小帅统领。裘甫部下也涌现了一批人才，“其小帅有谋略者推刘暀，勇力推刘庆、刘从简”①。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称罗平，铸印曰天平，表达了农民要求平均的愿望。“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②。

郑祇德见义军势大，不敢再战，他一面上表向朝廷告急，一面遣使者向邻道求援。浙西遣兵400人，宣歙遣兵300人，到达越州（治今浙江绍兴）。郑祇德最初把邻道支援部队部署于州城郭门和东小江（今浙江绍兴东南），后又感到自身安全无保障，于是抽调回观察使府以自卫，对这些部队供应13倍于平时，他们仍感不满，不愿作战。当起义军逼近时，这些部队要求当地部队为前锋，与义军作战。尽管如此，其领兵将有的称病，有的佯装坠马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元年二月。

受伤，不愿出战。义军前锋进至平水（今浙江绍兴东南），越州城中惊恐不安，士民携粮备舟，“夜坐待旦，各谋逃溃”①。

二、唐军围剿部署与义军对策

唐廷见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郑祗德懦怯难以承担讨伐重任，商议选派武将代替他镇压起义。宰相夏侯孜说：“浙东山海幽阻，可以计取，难以力攻。西班中无可语者，前安南都护王式，虽儒家子，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可任也。”②诸相皆以为然。于是任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召回京师。“懿宗问方略。对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众则馈多，当惜天下费。’式奏：‘盗若猖狂，天诛不亟决，东南征赋阙矣，宁得以亿万计之乎？兵多则功速费寡。二者孰利？’帝顾左右曰：‘宜与兵。’”③王式的战略原则是以重兵速战速决，不使义军继续发展势力。唐廷调动忠武、义成、昭义、淮南等道军队归王式指挥。听说义军中拥有骑兵部队，王式从其所部军中挑选出吐蕃、回鹘人数百，调龙陂监牧马配发，组成一支剽悍的骑兵部队。又以土团军熟悉地理者为向导，导引唐军向义军发动围攻。

这期间，裘甫分兵进攻衢（今属浙江）、婺（治今浙江金华）、明、台等州，相继攻下唐兴（今浙江天台）、上虞（今浙江余姚西南）、余姚（今属浙江）、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南）、奉化（今属浙江）、宁海（今属浙江）等县，并围攻象山，唐朝官吏或死或逃。

当裘甫得知王式率大军前来攻讨时，心中忧惧，大将刘暀认为像以前那样没有明确战略目标的攻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向裘甫提出新的对策，建议“兵马使（指裘甫）宜急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元年二月。

③ 《新唐书》卷一六七《王播传附王式传》。

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①。这个战略计划是以越州为根据地，进而占据扬州（今属江苏）、福建，壮大义军力量，割据一方，以便和唐朝廷长期抗衡。裘甫未能采纳。加入义军的进士王辂主张“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②。这个所谓万全之策，并无战略目标，只是苟延岁月而已。裘甫由于畏惧王式，对以上两种战略主张没有作出明确选择，在军事行动中，也无什么实际的准备和行动。

四月，王式率军到达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北），裘甫遣使请降。王式认为“是必无降心，直欲窥吾所为，且欲使吾骄怠耳”。对义军派来的使者说：“甫面缚以来，当免而死”③。裘甫此举不管真实目的如何，在客观上造成了动摇义军斗志、瓦解人心的不良作用，尤其是他不作具体部署，坐等官军前来讨伐的消极态度，使得义军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三、唐军围剿与义军失败

王式进驻越州后，整顿军政，命令各县开仓赈济贫民，以争夺人心。以前，义军谍者入越州，军吏匿而不报，并以饮食款待。城中文武官吏往往暗中与义军联系，以便城破之日能保全自己与妻子的性命；有的诈引义军将士来降，以探查城中虚实，故城中密谋屏语，义军皆了如指掌。王式到任后，暗中访查，把与义军有联系的将吏全部捕获斩首。“严门禁，无验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贼始不知我所为矣”④。

由于裘甫的动摇，致使义军内部人心严重不稳，一些投机分子纷纷自谋出路，其部将洪师简、许会能率所部投降官军。王式命他们率所部为前锋，讨伐义军。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元年三月。

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元年四月。

王式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率军会合韩宗政率领的土团军，以骑兵为先锋，组成东路军，自上虞直趋奉化，以解象山之围；命义成将白宗建、忠武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各率本军，会合台州刺史李师望所率的当地军队①，组成南路军，进攻唐兴。南路军进展顺利，连拔义军营寨，击败义军将领毛应天，攻下唐兴。五月，南路军在唐兴县南谷大败刘暀、毛应天所率义军，斩毛应天。东路官军在宁海大败义军孙马骑部。

王式又调整部署，命忠武将张茵率300人屯唐兴，以切断义军向南突围之道；命义成将高罗锐率300人，会合台州土军，直趋宁海，攻义军腹心所在（裘甫驻守地）；又命昭义将跌跌戣率领400人，会合东路军，断义军入明州之道。不久，南路官军在海游镇（今浙江三门）大败义军，义军退入甬溪洞，官军屯于洞口，义军出洞力战，又败。义成将高罗锐率官军偷袭义军刘平天部的营寨，击败义军，攻下宁海，收集逃散民众7000余人。王式又估计到义军如败，将可能退入海岛躲避，命高罗锐移军驻于海口，以堵截义军，又命部将云思益、王克容率水军沿海岸巡逻策应。云思益等在宁海东与义军相遇，义军没有料到官军水军这么快参加战斗，措手不及，仓皇弃船而逃，退入山谷之中，损失了百分之七十的战船，退入海岛的计划实际上已无法实现。

裘甫失去宁海后，率领残余万人转移到南陈馆（今浙江宁海西南）。东路官军在上畈村（今浙江宁海西北）大败义军孙马骑部，另一义军将领王皋投降官军。上畈村战斗的失利，使在南陈馆的裘甫陷入孤立境地，失去了策应部队。数日后，东路军进攻南陈馆，裘甫大败，义军被杀达数千人之多。裘甫下令沿路抛弃缯帛，诱使官军捡拾，“以缓追者”②，经黄罕岭退入剡县。

裘甫退入剡县之后，诸路官军一时不知裘甫去向，失去作战目标。义成将张茵威胁俘获的义军将士，迫使他们说出裘甫的去

---

① 《嘉定赤城志》卷四十《辨误门》。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元年五月。

向，然后令他们为向导，直扑剡县。六月，王式命东、南两路官军合围剡县，日夜攻打。义军守卫严密，官军攻打不下，商议断绝向城中供水的溪流，以困义军。义军侦知官军计划，出城作战，3日内，大小83战，“贼虽败，官军亦疲。贼请降，诸将出白式，式曰：‘贼欲少休耳，益谨备之，功垂成矣。’贼果复出，又三战。庚子夜，裘甫、刘晊、刘庆从百余人出降，遥与诸将语。离城数十步，官军疾趋，断其后，遂擒之”①。王式在越州斩杀刘晊、刘庆等义军将领20余人，押送裘甫去长安。八月，裘甫在长安东市遇害。

在裘甫被捕后，城中残余义军500余人乘官军防备松懈之机，在刘从简的率领下突围而出，退入大兰山，据险防守。官军围攻月余，义军寡不敌众，刘从简被杀，起义终于彻底失败了。

裘甫领导的浙东起义的失败，固然有力量对比上众寡悬殊的因素，然义军自身也存在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从而导致起义最后失败。首先，主要领导者裘甫意志薄弱，立场动摇，妄想投降朝廷，换取一官半职。最终不仅葬送了起义事业，也葬送了自己本人。其次，义军四处攻掠，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刘晊提出的主张不被重视，丧失了扩大地盘、壮大队伍的时机。因而不能给唐廷的财赋重地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有力量来围攻义军。再次，在官军数面进攻时，义军缺乏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数面迎击，力量分散，易被各个击破。假如义军能集中兵力，采取先歼灭官军一路，然后再对付另一路的作战方法，则有可能打破围剿，跳出官军重围，向外线发展。由于义军存在以上种种问题，故其最终被镇压是难以避免的了。

第三节　桂林庞勋起义

庞勋起义最初是兵变性质，后来转化为农民起义。起义规模，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元年六月。

参加人数均大于裘甫起义。由于起义军主要活动于两淮地区，阻断了唐朝漕运线路，对唐朝的统治威胁很大，故唐廷调发诸道大兵20万，出动沙陀兵全力围剿义军。这次起义历时一年又3个月，虽然最终被镇压而失败，但是也沉重地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预示着唐朝社会总危机即将来临。

一、桂林戍卒起义

懿宗初年，南诏攻陷安南，唐廷令徐（今属江苏）、泗（治今江苏盱眙北）2州募兵2000人赴援，分其中800人戍守桂州（治今广西桂林），规定3年轮换替代。至咸通九年（868年）桂州戍卒已经戍守6年，屡次要求更代，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因府库空虚，发兵替代所需费用颇多，决定戍兵再留一年，戍卒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

这年七月，桂管观察使李丛调任湖南，新任观察使未到任，军务无人掌管。桂州戍兵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原为徐州“群盗”，被官府招安署为军职。他们利用兵卒的不满情绪，发动兵变，杀死都将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主，打开仓库，抢出兵器，向北进发，欲返回家园。所过州县莫能抵御。唐廷闻知此事后，八月，派张敬思为使，宣布赦免戍卒兵变之罪，送归徐州。

九月，庞勋等到达湖南。监军以计诱使他们交出兵甲。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又派兵严守险要关口，戍卒们不敢入境，乘舟沿长江东下。许佶等看出朝廷不怀好意，商议说：“吾辈罪大于银刀，朝廷所以赦之者，虑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菹醢矣。”① “银刀”是指王智兴镇守徐州时，招募的2000壮士，称为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用来宿卫牙城。王式镇压裘甫时，统率忠武、义成两道军经徐州开往前线，银刀等军平素骄纵，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九月。

见朝廷派两道军队赴徐州，心中疑惧，迟疑3日才去迎谒。王式埋伏甲士，尽诛骄卒。许佶等认为自己此举，性质大大严重于以前的银刀等军，唐廷肯定不会真心赦免。于是各出私财，制造甲兵旗帜，然后率队经浙西进入淮南。

淮南节度使令狐绹遣使慰劳，供给草料、粮米。淮南都押牙李湘认为徐州戍卒擅归，势必为乱，虽无敕令讨诛，然外藩重臣可以便宜行事。劝令狐绹利用高邮（今属江苏）附近运河岸狭水深的有利地形，埋伏大兵于两岸，点燃草船以堵塞其前，以精兵断其后，谋图歼灭这支队伍。令狐绹素来怯懦，认为只要不在淮南为乱，便听任其通过，故拒绝了李湘的建议。庞勋等顺利地渡过了淮河，到达徐城（今江苏泗洪东南）。

二、义军打破唐军三面围剿

在北上途中，庞勋等为迷惑唐廷，对派来的使者“辞礼甚恭”。到达徐城后，庞勋与许佶对其众说：“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自投网罗，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岂徒脱祸，兼富贵可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① 众皆欢呼称善。

庞勋率众继续向徐州进发。消息传来，徐州全城惊慌恐惧，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命都虞候元密率兵3000人出城讨伐庞勋，又命宿州（今属安徽）出兵符离（今安徽宿州北），泗州出兵虹县（今安徽泗县），共同截击，企图乘庞勋部卒长途跋涉、身疲体困之际，一举歼灭。庞勋发现官军企图，虚设旗帜迷惑官军，引军潜行北上，抵达符离。宿州派来的500名守兵不敢接战，望风溃散。庞勋率众抵达宿州，城中无兵可战，故很快攻下城池。入城后庞勋聚积府库财货令百姓任意取用，民心大悦，投奔者相继于道，一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九月。

日之内招募数千人。于是庞勋自称兵马留后，派兵守城。第二日，官军前来攻城，城中防守已非常严密，难以攻取了。庞勋命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大火烧及官军营寨，乘其慌乱之机，义军出城急攻，斩杀官军300余人。元密以为义军要固守此城，遂只作攻城部署，疏于防守。当夜，庞勋命妇女打更，自率义军分乘大船300多艘，装载资粮，顺水突围而走。天亮后，官军知义军已退走，急忙追赶，士卒皆未食，等到追上义军，士卒已饥乏不堪。义军伏千人于舟中，主力伏于河堤之外，等官军进入伏击圈后，两面伏兵齐出，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元密等将吏及敕使皆死，士卒死亡千余人，其余皆降于义军，无一人漏网。庞勋询问降卒，得知徐州无备，遂产生攻取徐州的想法。

庞勋引兵北渡濉水，直趋徐州。崔彦曾一面派人向邻道求救，一面动员城中丁壮上城防守。数日后，义军抵达徐州城下，众至六七千人，“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不移时，克罗城”①。崔彦曾退保子城，徐州民众深受其盘剥之苦，皆协助义军攻城，推草车塞于城门而焚烧之，门毁，子城遂下，擒观察使徐彦曾，诛杀残暴官吏。当日，城中愿意归附的民众达万余人。

庞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奕使，又派旧将刘行及率1500人取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李圆率2000人取泗州，梁丕率千人屯宿州，其余要害县、镇，皆派兵戍守。同时，请人起草表章，请求唐廷授予节度使之职。当时，“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盗，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②。

刘行及奉庞勋命，率兵赴濠州，行至涡口（涡水入淮口，今安徽怀远东)，沿路归附者倍增。濠州守兵才数百，刺史卢望回素不设防准备，此时更不知所为，遂开门迎接刘行及入城。刘行及入城后，囚禁卢望回，自领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慆守备甚严，李圆引兵攻打，死伤众多，不能攻下。庞勋认为泗州地处江、淮要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十月。

冲，位置重要，增兵助李圆攻城，人数陆续达到万余，但仍不能攻下。

周围诸镇得知庞勋占据徐州，各自遣兵屯守要害，防止其向四周扩展势力。由于官军人数不多，不能有效地阻止义军行动，鱼台（今山东鱼台西）等10县相继被攻下。义军势力发展很快，人民群众争相投军，“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①。不久，朝廷使者到达徐州，庞勋以为此次一定会赐予自己节度使旌节，迎接入城。诏旨只谴责原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张道谨，贬其官，丝毫未提授庞勋旌节之事。庞勋失望，遂囚禁使者。

唐廷以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全面负责讨伐庞勋军事；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军队20万隶三帅，分三路进攻。

庞勋以为泗州为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在唐朝大军未集之前攻占泗州，派部将吴迥代替李圆指挥进攻泗州，昼夜不息。唐将郭厚本率淮南兵1500人援救泗州，至洪泽（今江苏洪泽西北）畏惧义军强大，不敢前进。义军的猛烈进攻，使泗州守军伤亡惨重，城池几乎不守，刺史杜慆遣人两次向郭厚本求救，郭厚本不得已遣500人前去救援。援军到达后，与城中官军内外夹攻，义军大败，退去。

庞勋又遣部将刘佶率精兵数千助吴迥再攻泗州，刘行及也从濠州遣其将王弘立领兵助攻。这时，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来援救泗州的4000名军队到达泗州城对面的淮水南岸，被义军阻截，全部歼灭。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派其将李湘率兵数千人援救泗州，与郭厚本等军会合后，屯于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南），也被义军包围，与泗州隔淮水相望，互相不能救。十二月，义军攻入都梁城，歼灭这支官军，活捉李湘与郭厚本。义军占据淮口后，唐朝漕运线路再次断绝。

康承训率军进驻新兴（今安徽涡阳北），义军大将姚周驻于柳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十一月。

子镇（今安徽濉溪柳孜镇），与之相对峙。当时诸道兵未集，康承训只有万余人，不敢进兵，退驻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庞勋乘机分遣诸将，南攻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北攻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先后攻克了滁州（今属安徽）、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及沭阳（今属江苏）、下蔡（今安徽凤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镇）、巢县（今安徽巢湖）等地。

南路唐军3万在戴可师率领下，渡过淮水，向前推进。戴可师欲先夺下淮口，然后解救泗州。于是，包围都梁城，城中义军人数少，无法御敌，以假降之计使官军退后5里，于当夜撤走，使官军只得到一座空城。戴可师自以为强大，轻视义军，不设防准备。濠州义军将领王弘立率兵数万，利用大雾掩护，袭击官军。戴可师军不及成列，义军就发起攻击，斩杀戴可师与监军，获得器械、资粮、车马无数，脱逃者仅数百人。

此次大捷，鼓舞了义军士气，江淮大震，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怕义军进攻，遣使讨好庞勋，许以为其奏请节钺，庞勋遂不进攻淮南，使其得以收拾散卒，修缮城邑，作好防御准备。“时汴路既绝，江、淮往来皆出寿州，贼既破戴可师，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及商人货，其路复绝”①，庞勋因此也日渐骄傲，专事游宴。

三、唐廷借沙陀兵镇压起义

咸通九年（868年）十二月底，唐诸道军队基本都汇集到前线，兵力比义军已占优势地位。同时，唐廷在军事部署上也作了一些调整，由于王晏权屡吃败仗，改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替为徐州北面招讨使，其军进至滕县（今山东滕州）、沛县（今属江苏）一线，从北面对徐州形成进逼之势；魏博节度使何全皞派大将薛尤率军1.3万人，进至丰县（今属江苏）、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一线，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十二月。

从西面威逼徐州；康承训统兵7万进至柳子镇（今安徽濉溪柳孜集）以西，从新兴至鹿塘（今安徽永城南）30里，“壁垒相属”①，从西南对徐州形成进逼之势。徐州军队多分属诸将，防守各地，城中兵力不到数千，庞勋派人募兵，应募者甚寡。

庞勋部将孟敬文奉命驻守丰县，兵力雄厚，谋图背叛。咸通十年（869年）正月，魏博军进攻丰县，庞勋遣心腹将领率兵3000人，声言助孟敬文防守丰县，孟敬文与其相约共击魏博军，并命其为前锋。交战中孟敬文引军退走，致使前锋全军覆灭。庞勋闻知后，不动声色，以令孟敬文负责镇守徐州，自己将往淮南指挥军事的办法，诱使孟敬文返回徐州，于途中遣兵擒获，处死。

进攻海州、寿州的义军都相继失利，损失惨重。浙西官军自楚州（治今江苏淮安）乘船逆水而上，解救泗州之围，其势甚锐，在城中官军的策应下，进入城内。泗州得到兵力和给养补充，防守更加严密，难以攻下。

去年十一月，唐廷任康承训为徐州行营都招讨使时，康承训曾奏请调沙陀、吐谷浑、鞑靼等部族军队协助作战。二月，沙陀军抵达前线，康承训命其首领朱邪赤心率领3000骑兵为前锋，冲锋陷阵，屡败义军。义军大将王弘立自淮口之战歼灭戴可师率领的南路官军后，颇自矜，向庞勋请求率所部3万人进击康承训，庞勋即命其率军渡过濉水，夜袭鹿塘寨。黎明，义军包围官军营寨。“弘立与诸将临望，自谓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弘立单骑走免”②。庞勋赦其罪，命其攻取泗州以补过。

三月，康承训击败王弘立后，进逼柳子镇，与义军守将姚周一月之内数十战。义军不利，官军遂包围柳子镇，“会大风，四面纵火，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城，死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十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十年二月。

者相枕”①。四月，庞勋杀在押的崔彦曾、张道谨、郭厚本、李湘等被俘唐朝官员、将领。许佶等共推庞勋为天册将军，另造旗帜，选境内丁壮，得3万余人，发给兵器，决心与官军决战。

当时，魏博军围攻丰县正急，庞勋决定先解除丰县之围。义军从徐州出发，利用夜暗潜入丰县城，官军没有觉察。魏博军分5寨屯驻，近城营寨约数千人。庞勋一面派兵包围近城官军营寨，一面伏兵于要路，准备截击援救的官军。官军果然中计，其他诸寨得知近城营寨被围，急忙出兵援救，被埋伏的义军击败，斩杀2000余人。魏博军闻听庞勋亲自来战，“诸寨皆自溃”②。曹翔正在围攻滕县，听到魏博军失败的消息，引兵退保兖州（今属山东）。

庞勋在丰县休军数日，引兵向柳子镇进发，西击康承训。同时，还调其他营寨义军共五六万人，约定四月二十九日黎明共同进攻柳子官军。庞勋的这个进军计划被义军中俘获的原淮南士卒得知，遂逃往官军营寨，向康承训告了密。康承训调整部署，设伏以待义军。义军前锋部队到达柳子，被埋伏的官军击败，庞勋急率后队接应，赶到柳子后，庞勋所部士卒见前锋已败，官军势大，军中市井之徒率先逃走，引起全军溃败。康承训指挥步军在后追击，又命骑兵迂回在前截击，义军“自相蹈藉，僵尸数十里，死者数万人”③。庞勋收拾散卒3000人，退回徐州。

当月，唐将马举率精兵3万援救泗州，义军寡不敌众，大将王弘立战死，败军退保徐城，泗州之围遂解。六月，马举从泗州引兵攻濠州，连下数县城。濠州守将刘行及在城外设营寨拒守，马举在正面以少数军队挑战，引诱义军出寨，自率大军数万袭击寨后，焚毁寨营，刘行及退守城中。庞勋命吴迴率军助守濠州。吴迴隔淮水设寨，与濠州相呼应。马举派兵渡过淮水，击杀义军数千，摧毁营寨。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十年三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十年四月。

唐廷闻听魏博军败，命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讨使，率兵 3 万屯于丰县、萧县之间，曹翔也从兖州率军前来会合。

七月，康承训攻下临涣（今安徽濉溪西南），杀获义军万余人。曹翔攻下滕县，进击丰、沛。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土豪李衮杀义军守将，举城投降康承训。沛县守将李直赴徐州议事时，其部下裨将朱玫举城降于曹翔。康承训乘胜长驱直进，进抵宿州之西，筑城驻守，威逼徐州。局势对庞勋义军极为不利。

四、庞勋引兵西进及最后失败

庞勋以徐州旧将张玄稔掌宿州政事，以部将张儒、张实掌宿州军事，率数万军队防守城池。张儒等于城外列寨数重，周围引水环绕，以抵御官军。张实向庞勋献策，劝其率兵西出，乘官军围攻宿、徐 2 州，后方空虚之机，攻掠宋、亳（治今安徽亳州）一带，调动官军回救，然后设伏以待，张儒、张实等率军追击，前后夹攻，可破官军。庞勋认为可行，留其父庞举直、许佶守徐州，自率大军向西进击。

八月，康承训焚毁宿州城外义军营寨，张儒等退守罗城，官军进攻，死伤数千人，不能攻下。康承训见强攻不下，派能言善辩的人在城下招谕义军。张玄稔在子城防守，见到官军招谕，乃遣心腹当夜潜出城，约期杀害义军将领，献城投降。九月，张玄稔以饮酒为名，伏兵诛杀张儒等义军将领数十人，开城投降康承训。为讨康承训欢心，张玄稔献计说："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苻离及徐州，贼党不疑，可尽擒也！"① 康承训遣数百骑归张玄稔率领。命其率宿州本部军队依计行事。张玄稔重又入城，像往常一样燃放平安火。次日清晨，张玄稔命堆积柴草数千束，纵火焚烧，作出城陷军溃之状，引军直趋符离（今安徽宿州北）。符离守军不知其已降敌，开城接入，张玄稔斩杀守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十年九月。

将，夺取城池，然后向北直趋徐州。

庞举直、许佶遣兵上城拒守，张玄稔引兵围城，没有急于发动攻击，派人招谕守城义军，诱其归降。城中原观察使崔彦曾部下故吏路审中开门迎接官军入城，庞举直、许佶率众退守子城，太阳偏西时分，庞举直等开北门突围而出，官军随后急追，斩杀庞举直、许佶等，"余党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徐州遂平"①。

庞勋闻知徐州失陷，率众2万自石山（今江苏铜山西）向西进发。九月六日，康承训才获知消息，即引兵8万向西追击，命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数千骑兵为前锋。庞勋欲袭取宋州，已攻下南城，刺史郑处冲率众防守北城，庞勋见官军有备，不愿恋战，遂率军渡汴河，向南攻掠亳州。这时沙陀军追上，庞勋引兵沿涣水（今浍河，东南流向，入淮河）向东，欲返徐州。一路上沙陀追赶颇急，义军无暇饮食，到蕲县，准备渡水，李衮率兵拆断桥面，义军无法通过，行至县西，官军追来，义军被斩杀万余人，"余皆溺死"②。庞勋也战死，官军不识，数日才获其尸。宿迁（今属江苏）等地的义军营寨士卒皆杀守将投降官军。宋威攻下萧县，独吴迥防守濠州不降。

马举围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③，城中粮尽，官军深堑重围企图困死义军。十月中旬，吴迥率兵突围，马举紧追不舍，吴迥战死于招义（今安徽明光东北），士卒死亡略尽。庞勋起义至此彻底失败。

五、庞勋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

庞勋起义转战南北，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唐朝廷动员10道数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十年九月。

② 《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承训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十年十月。

十万大军，又调沙陀、吐谷浑等部族军队，历时一年又3个月才镇压下去。这次起义大大地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中》评论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其立论正是基于这次起义动摇了唐朝统治基础和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两点上。因此起义尽管失败了，其历史意义却是深远的。从军事角度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其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唐以来，军事布局历来是北方强，南方弱，北方尤以河朔、中原地区最为特殊，藩镇密集，兵力雄厚；而江淮以南为唐朝财赋来源地，政治控制虽比较严密，由于没有强藩存在，军事力量反倒相对薄弱。故裘甫、庞勋起义在这一地区爆发，都能迅速地由小到大，发展为相当规模的起义大军。另外，这里由于封建剥削沉重，阶级矛盾尖锐，具备动员民众发动起义的群众基础。庞勋以徐州为中心，发展起义事业，是因为这里是桂州戍卒的故乡，所谓"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①。可占人和之利。但是，当朝廷调发诸道大军，数面围攻之时，形势对己已明显不利，义军首领却不能放宽眼界，率领军队跳出重围，到外线作战。江淮以南唐军薄弱，如向这里发展，不仅可以摆脱困境，还可以使起义事业有更大的发展。但庞勋却轻信令狐绹代为奏请节钺的谎言，放弃向淮南进军，囿于徐、泗狭小地区，丧失了大好时机。

2、当官军逼近徐州、宿州时，张实向庞勋建议向西出击，调动官军回救，然后前后夹击，歼灭官军。这个计划在一般情况下是可行的。在当时徐州、宿州留守兵力较弱，加之有叛将的破坏，不足以牵制官军主力时，则无可行性。后来的事实也是宿、徐二城在叛将协助下很快被攻陷，官军腾出兵力紧随庞勋，穷追不舍，根本没有形成内外呼应、前后夹击的态势。在这关键时候，庞勋没有继续向西，或者向北出击，以摆脱官军追击，反而向东欲返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九月。

回已经失陷的徐州，这无疑是自找死路，向官军重围中钻，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退一步讲，庞勋到达蕲县后，如果放弃原来计划，南下濠州（当时濠州仍由吴迴固守），在当地义军接应下，渡淮向南发展，也许有所转机。总之，庞勋西出围攻宋州后，又向东返回徐州，是其军事指挥上的一大失误。

3、义军迅速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后期军纪败坏，掳掠成性。庞勋义军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因为他们前期军纪森严，秋毫无犯，开仓赈济；民心拥戴，“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①，积极参加义军，并主动协助作战。起义事业有所发展后，庞勋产生骄傲情绪，军纪松懈，“驱人为兵”，抢掠商旅，“又与勋同举兵桂州者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自制，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②。这样不仅得不到民众主动的支持，当兵力不足招募时，“应募者益少”③。与以前情况形成显明对照。义军的战斗力也明显下降，在后期与官军的多次战斗中，义军士卒厌战、怯战，甚至自行溃散的现象，屡见不鲜。民心向背，是起义事业成败的关键，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十一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十二月。

第十七章　唐末农民起义战争（下）

继裘甫、庞勋起义之后，王仙芝、黄巢又举起义旗，领导农民展开了反对唐朝腐败统治的斗争。王仙芝牺牲后，黄巢成为唐末农民军的领导者，起义军纵横南北，坚持斗争整10年，建立了农民政权。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也彻底地摧垮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其政权从此分崩离析，终究趋于覆亡。

第一节　王仙芝、黄巢大起义的爆发及其转战中原

（参见附图18）

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起义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王仙芝战败牺牲，为唐末农民起义战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军在王仙芝、黄巢的领导下，转战于中原大地，陆续攻下许多唐朝州县，乾符三年（876年），王仙芝欲接受唐朝招安，因黄巢反对未遂，二人分道扬镳。黄巢率一部分义军进攻今山东、河南一带，由于唐王朝集重兵围追堵截，黄巢便挥兵南下了。王仙芝率领一部分义军转战于今湖北一带。由于其入朝为官之心未死，于乾符四年（877年）派大将尚君长接洽招安事宜，被唐廷处死，王仙芝本人也在次年的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决战失败后，被杀害。起义事业暂时处于低潮。

一、僖宗即位后的唐朝社会情况

咸通十四年（873年），唐懿宗死，宦官立李儇为皇帝，即唐

僖宗。僖宗即位时年仅12岁，不理朝政，只知嬉戏游乐，国家大政落入宦官之手。神策中尉田令孜尤其专横，僖宗呼其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每见，常自备果食两盘，与上相对饮啗，从容良久而退。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①。这一时期宦官与朝臣的斗争更加激烈，“南牙、北司互相矛盾”②，互相排斥，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僖宗即位初期，灾荒颇多，“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③。乾符二年（875年）七月，飞蝗自东而西，所过食草木叶及五谷皆尽，而京兆尹杨知至却妄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僖宗居然相信，以为真有其事，“宰相皆贺”④。唐朝大臣不管百姓死活，只知逢迎皇帝，保其禄位，可见已堕落到何种程度。《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说：“巢贼之乱，本因饥岁，人以利合，乃至实繁”。又说“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之暴”。说明严重的水旱蝗灾，已经逼得广大农民走投无路，除了揭竿而起别无他途。

庞勋起义虽然失败，但部下仍保存部分实力，散处山东一带，“徐贼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⑤。直到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这些庞勋义军的余部仍在顽强地与官军作斗争。“感化军奏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胡三省注：“感化军治徐州。群盗，庞勋余党也。”⑥足见庞勋余部的确散布山东各地，直到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仍然存在，而且还保持一定的规模，这就非常有利于唐末农民大起义的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二年二月。
②③⑥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二年七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懿宗咸通十一年四月。

爆发。

唐朝与南诏之间的连年战争，也是引起人民起义的间接原因。《新唐书·南蛮传》说："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税不纳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双方的战争，耗虚了唐朝国力，使得社会动荡，人民死亡，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人民不得不起来斗争。

山东一带盐利颇大，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曾在郓（治今山东东平西北）、青（今属山东）、兖（今属山东）3州，设置榷盐院，使唐廷获得巨额利润。史载："如闻淄青兖郓三道，往年粜盐价钱，近受七十万贯。军资给费，优赡有余"①。其后榷盐院虽废，但盐税仍然非常苛重，并且对私盐禁止很严，贩者往往遭到残酷的屠杀。黄巢与王仙芝共同贩过私盐，把这一情况和唐朝苛重残酷的盐法联系起来分析，从中就可以知道起义之所以在这一带爆发，并且由这两人领导的一些缘故了。

二、王仙芝举义旗，黄巢积极响应

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长垣（今属河南）举行起义。次年正月初三日，王仙芝传檄诸道，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檄文声讨唐廷任用贪官、赋税苛重、赏罚不均等罪行。不久，攻下濮州、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王仙芝分派部将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李重霸等十余人，率兵四出攻掠。天平节度使（治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薛崇出兵讨伐，为王仙芝所击败。

六月，曹州冤句（今山东定陶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

---

① 《唐会要》卷八十八《盐铁》。

王仙芝起义。黄巢曾和王仙芝一同贩私盐，因此相识，“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①。可见黄巢兼有士人和豪侠的身份。在其起义前，民间有谣说：“金色蝦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起义爆发后，“时议畏之”②。在舆论上具有先声夺人的效应。黄巢起义后，“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③。他与王仙芝协同作战，攻略州县，横行山东。当时小股的农民起义队伍随处可见，北自濮、曹，南至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到处打击唐朝军队和官吏。唐廷密诏宣武（治汴州，今河南开封）、感化（治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北）防御使，选精兵于境内巡察，防护漕船，可见农民起义军已严重威胁到唐朝漕运的畅通，迫使唐廷不得不调动诸道军队加强运河沿线防务。

三、义军转战中原与唐廷对策

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大军，唐廷急诏淮南（治扬州，今属江苏）、忠武（治陈州，今河南淮阳）、宣武、义成（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天平等5道节度使、监军，出兵讨伐或招怀。乾符二年（875年）十月，唐廷任命平卢（治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河南诸镇所遣讨伐义军的军队皆受宋威指挥。次年正月，唐廷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使、刺史，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都要置办弓刀、鼓板以防备义军。

由于中原各地皆有起义民众活动，诸道唐军多被牵制在本道境内，宋威实际统率的行营步骑兵总数不过5000人，王仙芝、黄巢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掌握着主动权，唐廷的对策和措施并不能制约起义军的发展。乾符二年（875年）十二月，王仙芝率兵进攻沂州（治今山东临沂），为宋威所率的诸道军击败，遂退去。宋威

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二年六月。

②《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

安奏王仙芝已死，遣回诸道军队，自己返回青州。不久，州县官员上奏说王仙芝尚在，攻掠如故。唐廷又下诏征调诸道军队，士兵愤怒，人心思乱。王仙芝从沂州撤退后，于乾符三年八月，挥兵西向，乘虚袭击东都洛阳外围地区，接连攻下阳翟（今河南禹州）、郏城（今河南郏县）。唐廷震动，下诏命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出兵进攻，命昭义（治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曹翔率步骑5000人及义成兵守卫东都宫苑，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命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节度使李福遣步骑2000防守汝（治今河南临汝）、邓（治今河南邓州）要道，命邠宁（治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李侃、凤翔（治凤翔，今属陕西）节度使令狐绹选派步骑1500人守卫陕州（治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

王仙芝见洛阳、陕州、潼关一线唐军力量增强，遂转而南下，进攻汝州。九月，攻克汝州，活捉刺史王镣，东都大震，士民携家争相出城逃亡。王仙芝接着又攻破阳武（今河南原阳），攻郑州（今属河南）受挫，南向转攻唐（治今河南泌阳）、邓等州。十一月，连下郢（治今湖北京山）、复（治今湖北仙桃西南）2州，转战于申（治今河南信阳）、光（治今河南潢川）、庐（治今安徽合肥）、寿（治今安徽寿县）、舒（治今安徽潜山）、蕲（治今湖北蕲春北）等州。由于扬州唐军兵力集中，所以王仙芝不再向东推进，暂时驻军于蕲州郊外。

蕲州刺史裴偓是唐朝宰相王铎的门生，被王仙芝所俘的汝州刺史王镣是王铎的堂弟。王镣为王仙芝写信给裴偓，表示愿意接受朝廷招安。裴偓据以上奏唐廷，王铎在朝中力主招安，唐廷便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带告身往蕲州除授。王仙芝有意接受，黄巢因为未给自己授官，大怒，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① 并击伤王仙芝头部。王仙芝怕激起部众怨怒，被迫放弃唐政府授予的官职，大掠蕲州，刺史裴偓逃往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武昌），中使逃向襄州。黄巢和王仙芝遂分道扬镳，一部分义军约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三年十二月。

3000余人由王仙芝、尚君长统率，另一部分义军2000余人由黄巢率领回兵北上。

四、王仙芝兵败黄梅

王仙芝和黄巢分手后，率军攻破鄂州。乾符四年（877年）七月，又率军北上与黄巢合攻宋州。失败后，遂再次南下，于八月攻破安州（治今湖北安陆）、随州（今属湖北），俘获随州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率兵救随州，战败被杀。李福求救，唐廷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率兵500骑赴救，又派忠武大将军张贯率4000人与宣武军增援襄州，以防王仙芝西进。张贯等率军行至申（治今河南信阳）、蔡（治今河南汝南）之间，怯战退归。唐廷严令忠武、宣武二节度使遣人使其返回，进驻襄州。王仙芝遂向南攻略郢（治今湖北京山）、复（治今湖北仙桃西南）二州。

这个期间王仙芝曾7次上书请求招安，被宋威搁置，不转奏朝廷。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欲立大功，遣人劝王仙芝投降，王仙芝派尚君长等去邓州见杨复光，接洽招安事宜，途中被招讨使宋威派兵截获。十二月，宋威上奏称与尚君长战于颍州（治今安徽阜阳）西南，生擒以献；杨复光奏尚君长等是归降，并非宋威所擒。唐廷派侍御史归仁绍审讯无结果，把尚君长斩首于长安狗脊岭①。

王仙芝大怒，率军进攻荆南，时汉水浅狭，义军从贾堑（今湖北钟祥东南旧口）渡过汉水，直扑荆州（治今湖北）。荆南节度使杨知温为文学之士，不懂军事，“或告贼至，知温以为妄，不设备”②。乾符五年（878年）正月初一，大雪，杨知温正在受贺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四年二月，胡三省注：“按宋白《续通典》，狗脊岭在京城东市”。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乾符四年十二月。

(接受拜年)，义军已进至城下，并攻下罗城（外城），官军急上子城防守。杨知温遣使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救，李福亲率本道军队并请在襄州的500沙陀骑兵一同前往救援。行至荆门（今属湖北），与义军相遇，沙陀兵纵骑奋击，义军不敌，溃败。王仙芝在荆州闻知败讯，遂焚烧江陵而退，渡汉水向东北撤去。正月六日，在申州东，为曾元裕所率官军击败，斩杀万余人，招降万余人。这时唐廷因宋威老且病，罢去其招讨使之职，令还青州。以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副使，贬杨知温为郴州（治今湖南郴县）司马，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二月，曾元裕追王仙芝至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大败义军，杀5万余人，追斩王仙芝，传首长安，余众散去。

王仙芝战死后，在北方的余部归附黄巢，另一部将王重隐，攻破洪州（治今江西南昌），转略湖南。王重隐别将曹师雄率军向东进攻宣州（今属安徽）、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宣、润是江淮重镇，江南漕运粮食多在此集中，唐廷急派曾元裕、杨复光引兵防守2州。曹师雄转攻湖州（今属浙江），被镇海（治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裴璩击败。洪州方面，王重隐战死，另一义军将领徐唐莒继续驻守洪州。唐廷为了加强浙西方面的军事，又调高骈任镇海节度使。王仙芝余部在江南的活动，牵制了唐军力量，策应了黄巢南下进军。

五、黄巢引兵回攻山东

乾符四年（877年）正月，黄巢攻破郓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又攻破沂州。王仙芝部将尚让（尚君长之弟）屯查岈山（河南遂平西），黄巢在山东势孤，率众来会，与尚让合力守山。六月，王仙芝部将柳彦璋攻下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俘获刺史陶祥。黄巢遂引兵与王仙芝再次会合，围攻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唐军与战大败，招讨使宋威只好退守宋州城，并向唐廷求救。七月，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忠武镇军队7000人来救宋州，义军腹背受

敌，战败退走。王仙芝与黄巢再度分手，渡过汉水，南下进攻荆南。黄巢率众进攻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未能得手。

乾符五年（878年）二月，黄巢率军转攻亳州（今属安徽）。此时，由于王仙芝于上月战死，尚让率其在江北的余部归黄巢，共推他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吏。于是，黄巢率军攻取沂州、濮州。唐廷调集大军进攻，黄巢屡战不胜，被迫通过新任天平节度使张裼，向唐廷请求招安。唐廷授黄巢右卫将军之职，令其在郓州解散军队。黄巢深知解散军队的严重后果，拒绝了唐廷的诏令。

第二节　黄巢乘虚进军南方

黄巢率军南下实施战略转移，为唐末农民战争的第二阶段。其目的在于摆脱北方优势官军的围追堵截，到官军力量比较薄弱的南方寻求发展，壮大起义队伍。江淮地区是唐朝的财赋供应基地，起义军向这里发展，对唐朝统治的打击将是非常沉重的。义军自乾符五年（878年）三月渡江南下，至六年十月发布檄文，宣布即将北上入关，历时仅一年半，活动范围达皖、浙、闽、粤等地，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为后来北上对唐廷发动战略进攻，积蓄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一、进攻洛阳受挫

乾符五年（878年）三月，黄巢由于在山东屡次受挫，率众进入河南，自滑州向汴、宋等州进攻，并进逼阳翟（今河南禹州）、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唐廷急调宣武、昭义、河阳三镇军队防守东都洛阳，由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统一指挥；调义成军队3000人防守轘辕（今河南偃师南）、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一线；又从荆（治今湖北荆州江陵）、襄调招讨使曾元裕军急返洛阳。一时大军云集，

形势对义军非常不利。义军当时还不很强大，兵力多时不过数万，通常只有数千人，如果强行进攻东都洛阳，势必要和官军主力决战，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北方藩镇割据历时已久，他们通常都拥有较强的兵力，掌握境内的财政、民政和军政，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必然要竭尽全力阻截和进攻义军。加之唐廷此时仍能得到江淮财赋的供应，使其能够用来养兵，保护北方州县。起义军在北方攻破州县城并不很容易，在乡村又不能满足军需所求。在这种形势下，开辟新的活动地区，实有必要。江淮是唐朝军备最薄弱的地区，由于唐廷对这里沉重的赋税盘剥，迫使农民也开始起来进行反抗，所谓“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①。王仙芝余部王重隐、曹师雄等，早就在这一地区活动，攻城夺地，给当地官军以沉重打击。这一切都为黄巢南下江淮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当月，黄巢率领大军渡江南下，向江淮进军，以寻求发展。

二、渡江进攻皖、浙

二月，黄巢与尚让率众10万，“大掠淮南，其锋甚锐”②。三月，自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渡过长江，向西南进攻南陵（今属安徽），击败官军，杀死都将王涓。四月，围攻宣州，月余不下，于是撤兵，向东南进攻润州③。由于唐廷不久调高骈任镇海节度使，义军不愿恋战，八月，转而攻下杭州。④ 九月，又攻占越州（治今浙江绍兴）。高骈遣大将张璘、梁缵率军进攻义军，黄巢战败。由浙东开山路700里（由衢州至建州建瓯共705里，路线是从今浙江衢州至今福建浦城、建瓯，不经过仙霞岭），进入福建。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二年十一月。

②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③ 见方积六:《黄巢起义考》第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 见方积六:《黄巢起义考》第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三、进军闽、粤

十二月，黄巢义军围攻福州（今属福建），观察使韦岫战败，于当月十三日弃城逃走。黄巢分兵攻略福建各地。唐廷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追击黄巢。乾符六年（879）正月，高骈遣张璘、梁缵分道追击黄巢，屡次击败义军，义军将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人投降朝廷。黄巢遂引兵趋广东，包围广州（今属广东）。

三月，唐廷以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不久，王铎奏授泰宁（治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李系（名将李晟之后）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其率精兵5万和土团军屯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①。此举的目的是想把黄巢义军阻截于岭南地区，就地歼灭。

五月，黄巢通过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治今广州）节度使李迢，奏请授与天平节度使之职，唐廷不同意。黄巢又再次请求唐廷授与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僖宗命大臣商议对策。左仆射于琮认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②不同意黄巢所求，另议授与别官。六月，唐廷决定授给黄巢太子率府率之职。九月，黄巢得到率府率告身（委任书），大怒，率兵急攻广州，当日攻陷，活捉节度使李迢，并分兵攻略岭南州县。黄巢命李迢再次草表，请求唐廷考虑自己所求，李迢拒绝，黄巢遂将其斩杀。

十月，唐廷为了防止起义军北上，再次调整部署，调高骈任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升任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本道节度使。王铎先前已在荆南，李系驻守潭州。这样唐廷就完成了沿长江一线的军事部署，从西到东构成一道军事防线，企图把黄巢义军阻于岭南地区。

由于义军中多北方之人，不服水土，士卒患瘴疫死者十分之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乾符六年五月。

三四，于是有人劝黄巢北还以图大事，得到允许。黄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①。揭露了唐王朝黑暗统治的种种弊政，公开宣布要攻入关中，推翻唐朝腐败统治。

第三节　黄巢北上夺取两京

黄巢义军在南方发展壮大后，农民战争进入第三阶段——战略进攻阶段。黄巢决定北上入关，推翻唐朝黑暗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敦促统治阶级“傥便归降，必有升奖”②。然后经两湖、赣浙，击败顽抗的官军，进入中原，占据洛阳、潼关，最后夺取长安，终于建立了“大齐”农民政权。唐僖宗仓皇逃入四川，起义事业发展到顶峰。

一、北 进 两 湖

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义军从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出发，编大筏数千，利用湘江涨水，水流急速的机会，乘筏而下。接连攻下永州（今属湖南）、衡州（治今湖南衡阳），“频陷湖南、江西属郡”③，直抵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城下。当时王铎命李系驻守潭州，李系拥有精兵5万，连同土团军号称10万，怯懦不敢出战。二十七日，黄巢义军发起攻击，当日攻克城池④，李系逃奔朗州。此战官军伤亡惨重，“流尸蔽江而下”⑤。闰十月，义

---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② 《北梦琐言》卷三《王中令铎拒黄巢》。

③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④ 见岑仲勉：《隋唐史》下册第493页，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乾符六年十月。

军又攻占澧州（治今湖南澧县东南）①。

义军大将尚让乘胜进逼江陵（治今湖北荆州），众号50万。当时诸道军队尚未到达江陵，城中军队不满万人，王铎闻知李系败讯，留部将刘汉宏防守，自己退往襄阳。刘汉宏见义军势大，难以力敌，主帅王铎也已逃走，遂大掠江陵之民而撤，“剽剥不胜其酷，士民亡窜山谷，江陵焚剽殆尽”②。义军不动刀兵，顺利地占据江陵。

义军攻占江陵后，继续北上欲攻取襄阳。当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率兵屯于团林（今湖北荆门南），义军占据江陵后，遂退往荆门（今属湖北），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共拒义军。两军接战后，曹全晸以轻骑迎战，刘巨容伏兵于密林中，曹全晸佯作不敌，率兵退走，引诱义军追击至埋伏区，伏兵齐出，前后夹击，义军大败。官军乘胜追击，直至江陵。此战义军损失惨重，士卒十损七八。黄巢与尚让收拾残部，乘舟沿长江向东退走。诸将欲追击义军，刘巨容制止说：“朝廷多负人，有危难，不爱惜官赏，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③ 曹全晸欲率军追击，正好唐廷派泰宁都将段彦谟代其为招讨使，曹全晸也就不再追击。“由是贼势复振”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客观上有利于义军恢复与再度发展壮大。

二、再入赣、浙

荆门之战失利后，黄巢义军泛舟沿长江东下，攻破鄂州外城，“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⑤。王铎因潭州、江陵之败，被免去都统之职，宰相卢携推荐高骈为诸道行营

---

① 方积六：《黄巢起义考》第1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③ 《新唐书》卷一八六《刘巨容传》。

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

兵马都统。高骈接任后，以镇压农民军为己任，征召天下兵共得7万，“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①。

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四月，高骈遣大将张璘渡过长江击败义军将领王重霸，王重霸势穷投降官军。接着又与黄巢战于大云仓②，黄巢战败，退保饶州（治今江西波阳），义军另一将领常宏章率众数万投降官军。十九日，张璘进攻饶州，黄巢再败，饶州失陷，义军退往信州（治今江西上饶）。

五月，义军在信州遇疾疫，士卒多死，加之在湖北、江西几次作战的失利，战斗力大大削弱，不能和官军硬拼。张璘乘机率军急攻，黄巢以重金贿赂张璘，并致书高骈请降，请其代为保奏官职。高骈欲诱歼义军，许愿为黄巢保奏节度使之职。这时，昭义、感化、义武等道军队皆已抵达淮南，高骈恐他们分其功劳，乃上奏说不日当扫平义军，不需诸道之军，全部遣还淮北。黄巢得知诸道军队已退，“与骈绝，请战”③。高骈大怒，命张璘整军进击，义军将其击败，并杀死张璘。

信州之战胜利后，农民军势力迅速发展，六月，黄巢遣将攻占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北）、婺州（治今浙江金华），黄巢亲自率军攻占宣州。七月，黄巢率军15万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横渡长江，围攻天长（今属安徽）、六合（今属江苏），兵势甚盛。“淮南将毕师铎言于高骈曰：‘朝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必为中原大患。’骈以诸道兵已散，张璘复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④。同时高骈上表唐廷，夸大义军兵力，推卸责任。唐廷接到奏表，“上下失望，人情大骇”⑤，下诏谴责高骈遣散诸道军队，致使义军乘虚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三月。

② 《永乐大典》卷三五八七《屯》。

③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七月。

渡江。高骈又上表抗争，“遂称风痹，不复出战”①。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上下不和，矛盾冲突，有利于农民军的发展和继续北上，攻取两京。

唐廷见农民军渡过长江，进入淮南，知道农民军必然要渡淮北上，争夺中原。诏令河南诸镇发兵屯驻溵水，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又令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刺史曹全晸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以防御黄巢义军。九月，黄巢义军与曹全晸军交战，官军只有6000人，众寡悬殊，不敌义军，退守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北）。高骈坐视不救，曹全晸势孤，被义军击破，义军全军遂从泗州渡过淮水，进入淮北。这时唐军内部发生兵变，导致溵水无人防守。奉唐廷命令，徐州（今属江苏）派兵3000人奔赴溵水，路过许州（治今河南许昌）时，忠武节度使薛能安置于城内毬场，徐卒大噪，薛能登子城楼询问，回答说供给不足，百般慰劳后方才平静。这时忠武镇也派大将周岌率军赴溵水，出发不久，闻知此事，连夜返回，天明时入城，袭击徐州士卒，全部斩杀。周岌乘乱驱逐节度使薛能，薛能逃往襄阳，途中被乱兵追上杀死。周岌遂自称忠武留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怕周岌袭击，遂从溵水引兵返回兖州，其他诸道屯驻溵水军队见局势如此，也纷纷退回本道，致使唐廷精心策划的溵水防线化为乌有，东都洛阳暴露在义军面前。

三、夺取两京

（一）迫降洛阳

黄巢义军渡过淮河后，军纪严明，“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②，队伍发展很快。广明元年（880年）十月，黄巢分兵攻陷申州，主力进入颍、宋、徐、兖等州境内。十一月唐廷命河东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九月。

（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郑从谠以本道兵交给夏绥（治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节度使诸葛爽和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刺史朱玫统率，以增援洛阳。又以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治今河南孟州东南）节度使，以拱卫洛阳。十一月十日，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并牒告河南诸藩镇："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① 唐僖宗惊慌失措，召宰相们商议对策，决定一面派兵坚守潼关，一面做好逃亡四川的准备。

数日后，黄巢率军攻入汝州，逼近洛阳。齐克让率残兵退守潼关，驻扎于关外。唐军"久乏资储，州县残破，人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王人，冻馁交逼，兵械刓弊，各思乡闾"②。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根本无力阻止义军进攻洛阳。在义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东都留守刘允章被迫投降黄巢，十七日，刘允章率领百官迎谒黄巢进入洛阳。义军入城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③。当日，义军还分兵攻占了虢州(治今河南灵宝)，打开了进攻潼关的通道。

（二）攻克潼关

在义军逼近东都之时，唐廷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任命左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右神策军步军将军王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左神策军兵马使赵珂为勾当寨栅使，负责防守潼关。数日后，张承范等率神策弩手2800人，从长安出发赴潼关防守。神策军士多长安富室子弟，通过贿赂宦官而获得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④。十一月二十七日，张承范率军到达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由于刺史裴虔余调任宣歙观察使，州事无人主持，军民皆逃入华山，城中萧条，府库唯尘埃鼠迹，只有米千余斛，军士才得带三日粮而行。十二月一日，到达潼关，搜得村民百余人，使运

---

①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广明元年十一月。

石汲水，为守御之备。由于齐克让、张承范两军已绝粮，士卒饥饿，皆无斗志。

当日，义军前锋抵达关下，白旗遍野，不见边际，齐克让率军力战，义军稍退。“俄而巢至，举军大呼，声振河、华”①。齐克让不得已退入关中。潼关左面有山谷，平时禁止行人往来，以榷征税，谓之“禁谷”。义军进展迅速，官军仓促防御，慌乱之中忘记派兵防守，溃兵从谷中而入，谷中茂密丛生的灌木藤草，竟被践踏如坦途。张承范尽散辎重以给溃卒，以稳定人心。同时，上表告急，辞气悲切，表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②

次日，义军再攻潼关，张承范等全力拒守，关上箭矢已尽，则投石击之。关外有天堑一道，被义军填平，纵火焚烧关楼，当夜又派一支军队从禁谷入关。张承范分800人，命王师会守禁谷，等其赶到，义军已经通过禁谷，进入关后。十月三日清晨，义军发动总攻，前后夹击，关上官军皆溃，王师会自杀，张承范变换服装逃走。逃至野狐泉，与奉天（今陕西乾县）援兵2000人相遇，遂一同退至渭桥，见新募神策军士卒衣装鲜亮温暖，奉天军士大怒，说：“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③遂抢掠新军之物，为义军作向导，直趋长安。

（三）夺占长安

黄巢占领潼关后，令大将成令瓌率步骑数万驻守④，自率大军向华州进发。占据华州后，又留部将乔钤镇守，然后直趋长安。在义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留后王

---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

④ 《桂苑笔耕集》卷五《奏诱降黄巢下贼将成令瓌状》。

重荣请降于黄巢。十二月四日，唐廷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妄想安抚黄巢，阻止农民军向长安进军。

五日，百官退朝时，闻知乱兵入城，遂分道逃窜。田令孜率神策军500人保护唐僖宗自长安金光门逃出，只有少数王公、妃嫔从行，百官皆莫知皇帝行踪。僖宗逃出后，经兴元（今陕西汉中），躲避于西川成都（今属四川）。当日，黄巢义军前锋部队在大将柴存率领下开进长安。唐朝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员迎接黄巢于霸上（在今陕西西安东霸水西高原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①。长安百姓夹道聚观，尚让慰谕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②义军士卒见贫苦百姓，往往予以施舍、救济，“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③。爱憎非常鲜明。

十二月十一日，黄巢大杀在长安的唐朝宗室。十二日，黄巢始入宫。次日，黄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唐朝官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留任如故。以妻曹氏为皇后，任命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璆、杨希古为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皮日休为翰林学士，朱温、张言、彭攒、季逵等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又下令唐朝官员凡到赵璋处投报名衔者，可恢复其官职。唐夏绥节度使诸葛爽投降义军，黄巢授予河阳节度使之职。唐宰相豆卢瑑、崔沆等公卿大臣，藏匿民间，被搜出后斩杀。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投降义军，暗中却招纳亡命，藏匿公卿，被黄巢处死。

第四节　黄巢困守长安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夺取长安，建立政权。唐廷不甘心失败，纠集诸道军队三面围攻，双方以长安为中心长期对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

峙，互相攻战，唐末农民战争进入第四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军逐渐丧失主动权，陷入被动的局面；官军由弱变强，由分散到集中，逐步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一、义军夺占长安后的形势

农民军占据长安后，并没有分兵攻取长安周围各州县，却按兵不动，忙于称帝封官，立国号、改正朔，陈文物，易服色，向黄巢上"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尊号。只向各地唐朝官员下了一道赦书，以为一纸空文就可以使各地官员、军队归顺，统一全国了。农民军始终局限于长安附近的狭小区域，控制地区西面不到盩厔（今陕西周至），北面仅至于同州（治今陕西大荔），东至华州，南至蓝田。关中地区本来粮食就供应不足，主要依赖江淮漕运接济，黄巢义军入关中后，在如此狭小地区聚集着数十万大军，粮食供应更加困难，对农民军非常不利。

黄巢还犯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即纵使僖宗从容入蜀，使各地唐军得借以号召，给唐朝死灰复燃之机。十二月五日，唐僖宗偕田令孜率500名神策军逃出长安，当日驻于咸阳（今属陕西咸阳东北），九日，至骆谷婿水驿。十八日，到达兴元。按此速度计算，五日到咸阳，只行走了40里，盩厔距长安130里，骆谷关又距盩厔120里，从五日到九日，平均每日只行50里。此时，神策军不仅人数少，而且皆疲乏不能战。假如农民军入京后立遣骑兵万余，以急行军速度追赶（农民军由潼关入长安，日行约百余里），则僖宗君臣必然被一网打尽，何来日后之患①？由于黄巢入京，急于称帝，缺乏远见卓识，丧失了彻底推翻唐朝统治的大好时机。

官军方面的基本情况是：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凤翔节度使郑畋伪降黄巢，然后乘机修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伐义军。当时，神策军驻于关中各地者尚有数万，闻僖宗入蜀，

---

① 以上见岑仲勉《隋唐史》下册第495页，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

无所归依。郑畋派人招徕，皆聚集于凤翔。郑畋分财犒赏军士，军势大振。义武(治今河北定州)节度使王处存，闻长安失守，不等诏命，举军入关，屯于渭北。又另遣2000人至兴元保卫僖宗。河中留后王重荣投降后，黄巢多次遣使调发当地人力、物力，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遂驱杀黄巢使者，叛归唐朝。黄巢遣大将朱温自同州，其弟黄邺自华州，合兵进击河中，被王重荣击败，缴获粮食、器械40余船。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引兵屯于渭水之北。

中和元年（881年）二、三月间，诸葛爽再次叛归唐朝，被任为河阳节度使。宥州（治今陕西定边东北）刺史拓拔思恭（党项人），纠合诸部族兵，会合鄜（治今陕西富县）、延（治今陕西延安）李孝昌进军至奉天（今陕西乾县）。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人进击长安。行至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刺史瞿稹认为义军势大，不可轻进，劝其暂返代北募兵。于是陈景思等又返回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募兵得3万人，全为北方杂胡，犷悍暴横，难于统率，李友金建议起用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为将，统率这支军队镇压义军。唐廷诏许，于是，李克用率鞑靼诸部人万余赴崞西（今山西原平西北）与陈景思、李友金等会合后，准备向关中进发。

唐廷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以淮南节度使高骈为东面都统（高骈抗拒诏令，未派援兵）、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为行营招讨使，以拓跋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四月，官军已基本完成对长安的包围，唐弘夫率军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今陕西大荔洛、渭之间），王处存军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郑畋军屯盩厔，逐渐完成了对义军的合围，形势对农民军极为不利。

二、唐军反扑与义军分兵出击

中和元年（881年）二月，黄巢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

率兵攻邓州。三月，攻下邓州，俘获刺史赵戎，即屯兵邓州以控扼荆、襄之地。同月，黄巢因郑畋降而复叛，并号召诸镇出兵讨伐义军，决定首先扫平凤翔，命尚让、王播率兵5万进攻。郑畋命唐弘夫伏兵于要路，自率数千军队，多张旗帜，列阵于高岗之上。尚让等自以为强盛，行军不列队伍，轻率向前，中伏，大败于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南），被斩首2万余级，伏尸数十里，逃回长安。有人题诗于长安尚书省大门，嘲讽尚让大败，尚让大怒，把在省官员及门卒全部挖眼倒挂，并搜索城中能作诗者，共杀3000余人。这种过分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损害了义军的声誉。

这时，关中诸镇及川蜀、中原诸镇军队陆续聚集长安周围，原先请降于黄巢的各地藩镇，也纷纷倒戈参加到镇压义军的行列中去。黄巢派其将王玫为邠宁（治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被邠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斩杀，而后朱玫率军开往前线讨伐义军。

四月五日，王处存亲率精兵5000人，从渭北向长安进攻①，黄巢以为官军大队人马来攻，率众仓皇逃出长安，程宗楚、王处存、唐弘夫等率军入城，城中之民争出迎接官军，有的甚至以瓦砾袭击义军士卒。程宗楚等怕诸将分功，不向凤翔郑畋报告军情，又轻敌大意，不作防御部署，士卒争入民舍、府库抢掠金帛、妓妾。黄巢率军当夜露宿霸上，侦知官军人数不多，又疏于防备，无后续部队接应，遂引兵还击，从长安诸门而入，与官军大战，程宗楚、唐弘夫战死，士卒们由于抢掠物品过多，负重难行，被义军击败，死者十之八九。王处存率残兵逃出长安，退回渭北驻地。十日，黄巢返回长安，怨城中之民协助官军，纵兵屠杀，据说杀人达八九万之多②。

义军攻占长安时，忠武节度使周岌也投降了黄巢，此时在监军杨复光劝说下，杀了黄巢派来的使者，出兵3000人由杨复光率领进攻义军。杨复光又说服占据了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的秦宗权，秦宗权派其将王淑率兵万人，跟随杨复光进攻邓州。王淑畏

---

①② 《旧唐书》卷一八二《王处存传》。

惧义军，逗留不进，杨复光杀死王淑，兼并其军。又将所率的军队，分为八都，命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8人分别统率①。与朱温大战于邓州，朱温战败，向北经蓝桥（今陕西蓝田东南）退回关中，邓州失陷。

华州是长安东面的屏障，成为官军与义军争夺的重要据点，双方在这里反复争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黄巢入关中之初，曾留乔钤镇守华州，以扼守关中东大门。王重荣从沙苑进军，五月，攻陷华州。六月，黄巢部将王播进攻屯驻兴平的朱玫，大败官军；攻下兴平，朱玫被迫退守奉天及龙尾陂。不久，西川黄头军使李铤率万人，巩咸率5000人赶到兴平，与义军战，屡胜，遂屯驻于兴平。八月，黄巢命大将李详进攻石桥（今陕西泾阳西北），与王重荣部将高浔大战，高浔战败，退回河中。李详乘胜夺取华州，黄巢任其为华州刺史。

三、义军反攻与朱温叛变

唐廷急于镇压义军，但苦于兵力不足，遣使催促高骈派兵入关。高骈调发境内军队8万，舟舰2000艘，甲兵甚盛，出屯于东塘（今江苏扬州东），借口风涛太大，或说时日不利，不愿出发。唐廷无奈，罢去高骈都统与盐铁转使之职，从此淮南与唐廷决裂，不相往来。

为了鼓励诸将向农民军进攻，唐廷不惜官爵，升任朱玫为邠宁节度使，河南都统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京城西面都统，李孝昌、拓拔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又命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与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以上7人名单据《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元年五月条记载。

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此举既给诸将提升了官职，又调整和统一了军事指挥系统，便于统一行动，向农民军围攻。

中和元年（881 年）下半年至二年上半年，官军与义军在关中展开了一系列战斗，义军胜多负少。基本情况是：朱温与尚让在东渭桥击败了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和权夏州节度使拓拔思恭。不久又在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朱温与孟楷袭击鄜、夏二军，二军大败，逃回本道。义军还在中和元年十月，击败天平军，杀死节度使曹全晸。由于朱温屡立战功，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令其自取同州。中和二年（882 年）二月，朱温进击同州，刺史米诚逃奔河中，朱温率军一举占领同州。农民军势力范围跨过渭水，在渭北占有了一个重要据点，朱温因此也被推上与大量敌军对阵的第一线。为了进一步牵制和打击渭北敌军，减轻对长安的军事压力，尚让曾率军进攻宜君（今属陕西）寨，天降大雪，深尺余，义军士卒冻死者十之二三，损失惨重。尽管如此，义军仍不能打破僵局，三面被困的形势仍然很严峻。

中和二年（882 年）四月的形势是："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泾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宁、凤翔屯兴平，保大、定难屯渭桥，忠武屯武功，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①。这年"关中大饥"②，自然灾害使关中本来紧缺的粮食更加匮乏，发生了严重的粮荒，长安城中斗米已卖到 30 缗钱，最后以至于出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的紧张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在关中要继续坚持下去，已完全不可能了。此外，义军内部开始分化，潼关守将成令瓌率步兵 4 万，骑兵 7000，向南奔逃，投向高骈③。

在此严峻时刻，又发生了大将朱温叛变投降官军的事件，使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二年四月。

② 《新唐书》卷九《僖宗纪》。

③ 参见岑仲勉《隋唐史》下册第 498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 5 月版。

义军的处境更加困难。朱温，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排行第三，早年丧父，随母寄居于刘崇家。黄巢起义爆发后，参加义军，因功补为队长，后随黄巢入关，此时任同州防御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州是义军在渭北的唯一重要据点，与王重荣毗邻，双方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斗争，朱温兵力不足，被王重荣包围于同州。朱温多次向黄巢求救，被右军使孟楷阻挠，军情不能上达，又不派兵增援，使同州陷于非常艰难的境地。这时，朱温手下亲将谢瞳等人乘机进言说："黄家以数十万之师，值唐朝久安，人不习战，因利乘便，遂下两京。然始窃伪号，任用已失其所。今将军勇冠三军，力战于外，而孟楷专务壅蔽，奏章不达，下为庸才所制，无独断之明，破亡之兆必矣。况土德未厌，外兵四集，漕运波注，日以收复为名，惟将军察之。"① 朱温早有降意，见诸将如此，遂决定投降唐朝。中和二年（882年）九月，朱温杀死监军严实、大将马恭，投降了王重荣。唐廷先后授予朱温同华节度使、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等职，并赐名朱全忠。

这个事件发生于义军与官军双方力量对比转折之际，增强了唐朝的兵力，削弱了义军的实力，而且朱温一旦反目，便成了义军最主要的敌手。在这个事件的影响下，镇守华州的义军大将李详也想投降唐朝，被监军发觉，后为黄巢所杀。十月，平卢（治青州，今属山东）留后王敬武，原已归顺黄巢义军，此时也背叛义军，并发兵赴关中参加镇压起义军。

第五节　四川阡能起义

在黄巢义军与唐军浴血奋战之时，四川爆发了以阡能为首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官军，有力地配合了黄巢在关中的斗争。

---

① 《旧五代史》卷二十《谢瞳传》。

一、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三月，唐廷任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许州人，是大宦官田令孜之兄①，因田令孜推荐得入神策军，数年之间，升为大将军。田令孜见黄巢义军势力日强，唐军屡败，“阴为幸蜀之计，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镇三川，上令四人击球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②。

僖宗到达成都后，给当地军队每人赏赐钱3缗。以后四方贡献渐多，就只赏从驾诸军而不再赏当地军队，蜀军颇有怨言。西川黄头军使郭琪劝田令孜对诸军不要厚此薄彼，以免激起事变，田令孜不但不从，反而欲杀郭琪。致使郭琪率所部军队作乱，焚掠坊市，田令孜和僖宗逃到成都东城，令诸军围攻郭琪所部。郭琪率部突围，军队溃散，只身逃往扬州投奔高骈。僖宗在成都只与宦官商议军国大事，只有陈敬瑄等少数人可以参预，朝臣自宰相以下皆不能预闻。左拾遗孟昭图上疏劝谏，奏章中对宦官多有指责，指出：“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复之期，尚劳圣虑，尸禄之士，得以宴安。”③ 田令孜大怒，贬孟昭图为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司户参军，于途中谋害而死。这样，不仅使蜀人与僖宗为首的小朝廷严重对立，而且也使朝臣与其离心离德，唐朝危机进一步加深。

此外，僖宗等的入蜀还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西川在崔安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三月条胡注：“田令孜本姓陈，咸通中，随义父入内侍省为宦者，遂冒田姓。”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三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元年七月。

潜任节度使时，治安情况较好，社会比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陈敬瑄继任节度使后，肆意妄为，残酷地剥削和欺压人民，尤其是僖宗率大批官吏和军队入蜀后，蜀人的负担更加沉重，蜀地也日益多事。由于蜀人日益不满唐朝统治，陈敬瑄便多遣人到县镇刺探情况，谓之“寻事人”。这些人所到之处，搜刮财物，无恶不作。中和二年（882 年）三月，有两个“寻事人”过资阳（今属四川）镇，无所要求，镇将谢弘让特意邀请，也不赴会，谢弘让自疑有罪，遂逃入深山，加入群盗之列。捕盗使杨迁诱谢弘让出首，然后押送陈敬瑄处，诡称讨伐擒获以求功。陈敬瑄不加讯问，杖谢弘让脊二十，钉于城西 14 日，“煎油泼之，又以膠麻掣其疮，备极惨酷，见者冤之”①。又有邛州（治今四川邛崃）牙官阡能，因公事误期，怕受杖刑，亡命而逃。杨迁又一次诱其自首，阡能正要出首，闻听谢弘让受冤之事，大骂杨迁，决心聚众起义。

二、起义的经过及其发展

中和二年（882 年）三月，阡能揭竿而起，月余，有众万人，横行于邛、雅（治今四川雅安）2 州间，攻城夺地，官军不敢挡。陈敬瑄急遣牙将杨行迁率兵 3000 人，胡洪略、莫匡时各率 2000 人，围攻阡能。

六月，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杨行迁等与义军大战，屡次失利，只好向陈敬瑄请求增兵。由于蜀军多赴关中与黄巢义军作战，无兵可调，陈敬瑄搜罗把守仓库、门庭之卒，尽数开往前线，支援杨行迁。双方大战于乾溪（位于今四川大邑境内），官军再次大败。杨行迁屡次大败，怕受罪谴，抓获大批村民送往成都，每日送数十百人，冒充俘获的义军。陈敬瑄不加讯问，全部斩杀。其中有不少老弱及妇女，观者询问，皆说：“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俘虏以来，竟不知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二年三月。

何罪。”①

七月，蜀人韩求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十月，蜀人韩秀升、屈行从又起兵，“侵轶巴渝”②，切断峡江路。陈敬瑄遣押牙庄梦蝶率军2000人，押牙胡弘略率兵千人，共同讨伐。

十一月，阡能义军发展至数万，攻入蜀州（治今四川崇庆）境内。陈敬瑄见杨行迁等屡屡失败，以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代替杨行迁指挥讨伐军事。高仁厚率兵500人，到达双流（今属四川），把截使白文现出迎。高仁厚巡视堑栅，见堑栅重复坚固，知官军畏惧义军，只求自保不敢出战，命令平毁堑栅，只留500人防守，其余兵卒跟随自己作战。又命诸寨官军向双流集结，准备与义军决战。

高仁厚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抓获义军士卒不杀，放归原队，并扬言所欲诛者，只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等人，其余人员绝不罪及。阡能闻听高仁厚将至，遣罗浑擎立5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准备袭击官军。高仁厚侦知义军布置情况，率兵包围了埋伏的义军，下令勿杀，缴械后放回，让他们到义军营寨散布只杀阡能等义军首领，不杀普通士卒的言辞，以瓦解义军队伍。这些义军士卒回寨后，诱使更多的人出降，罗浑擎无奈，只好只身逃走，被其部下捉获送给高仁厚。高仁厚焚毁5寨及兵器甲杖，唯留旗帜。次日，高仁厚把归降的4000多士卒每50人编为一队，取缴获的旗帜倒系于旗杆上，命他们擎旗去招降穿口（位于今四川新津境内）的义军。这些人到穿口后，扬旗大呼说：“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③句胡僧在穿口置11寨，寨中人争相出降，句胡僧出面阻止，被众人擒获献给高仁厚，其部众5000余人全部投降。

第三天，高仁厚如法招降了韩求在新津（今属四川）的13寨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二年六月。

② 《金石续编》卷十二《韦君靖建永昌寨记》。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二年十一月。

士卒，韩求自杀。罗夫子在延贡（位于今四川崇庆西南）置9寨，预先已知新津士卒投降之事。第四天，当新津士卒刚到延贡，罗夫子就只身弃寨逃奔阡能处，其众皆降。罗夫子到邛州阡能寨后，商议与官军决战，计未定，延贡士卒已来招降，阡能、罗夫子走马巡寨，鼓动士卒出寨作战，无人响应。高仁厚连夜引兵逼近阡能营寨，在官军军事压力下，义军士卒人心涣散，无心作战，次日早晨，诸寨士卒呼噪争出，投降官军。阡能见大势已去，投井自杀不死，为其部下捉获，罗夫子自杀，士卒割其首以献高仁厚。义军在其他地方的营寨，也一一被高仁厚招降。高仁厚出兵共计六日，就镇压了这支起义军。阡能、罗浑擎送到成都后，被陈敬瑄钉于城西，示众七日，然后处死。

中和三年（883年）二月，庄梦蝶屡为韩秀升、屈行从所败，退保忠州（治今重庆忠县）。胡弘略也多次为义军击败。陈敬瑄无奈，只好再次请高仁厚出征，许以成功后授以东川节度使。高仁厚率兵3000人，前往渝州（治今重庆）讨伐①。三月，庄梦蝶不甘失败，再次出兵讨伐，被韩秀升、屈行从击败。败兵纷纷溃走，所在地方官员慰谕，不能阻遏，途中与高仁厚相遇，斩其都虞候一人，乱兵畏惧才停止溃逃。高仁厚下令重新整编部伍，又召见当地耆老，询问山川道路及义军营寨所据之地，得知义军精兵皆在江中舟舰之上，辎重粮草皆在营寨中，使老弱者守寨。高仁厚大喜，认为义军重战轻防，必然要失败。高仁厚派兵作出欲在江上与义军决战的姿态，诱使义军日夜防御。义军遣兵挑战，官军却不出战，暗中派精兵千人由小路袭击义军营寨，焚毁营寨及资粮。义军分兵去救，已经来不及了，辎重粮草损失殆尽，于是人

---

① 史籍未明确记载高仁厚与韩秀升在何处交战。《新唐书·高仁厚传》:“乃以锐兵濒江，伐木颓水碍舟道，负岸而阵。”《金石萃编》卷十一《丰君靖建永昌寨记》:“韩秀升勃乱黔峡，侵轶巴渝，……围逼郡城，公乃详度机宜，上下拦截，依山排阵，背水布兵，两面夹攻，齐心翦扑，贼势大败。……渝牧田公，备录奏闻。”可知双方交战在渝州（今重庆）附近。

心不稳，士气低落。高仁厚乘机募善游者，潜水凿沉义军舟船，义军溃乱。高仁厚又派兵于要路截击，义军士卒大部投降。韩秀升、屈行从见士卒溃散，欲加阻止，挥剑乱砍，众怒，共擒二人献给高仁厚。高仁厚责问为何造反？韩秀升回答说："自大中皇帝（指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① 辞气凛然，高仁厚不觉肃然起敬，命以膳食款待，送二人于成都。二人遂被杀害。

三、起义失败的教训及其作用

（一）起义失败的教训

阡能、韩秀升起义失败的教训，总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在屡次战胜官军讨伐的大好形势下，陶醉于胜利之中，缺乏对付官军阴谋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没有培养和建立起一支立场坚定的骨干队伍，在义军中形成中坚力量。当高仁厚采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对付起义军时，不仅罗浑擎、韩求、罗夫子所率的部队迅速瓦解，即使阡能亲率的部队也在顷刻间崩溃投降，阡能等义军首领根本无能力阻止，只好束手就擒。数万大军在数日之内，不用敌方一刀一枪，就被迅速地用分化的办法瓦解投降了，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这支起义军曾多次击败杨行迁、胡洪略等统率的正规官军的讨伐，说明还是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并非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可见他们还是缺乏对付瓦解的政治攻势的有效办法，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监督防范机制，阻止蛊惑人心的宣传在军中流传。相对稳定的精锐的中坚力量的建立，在战时可以起到保卫统帅安全、发挥突击冲锋的尖刀作用。如果阡能有这样一支部队，断不至于束手被擒。

其二，在军事部署上犯了错误。用高仁厚的话来说就是犯了"重战轻防"的错误。把辎重粮草置于陆寨之中，由老弱者防守，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三年三月。

却把精锐集中于舟船之上，一旦辎重粮草被毁，军心必然动摇。这种部署的出现，说明起义军将领军事素质较差，缺乏战争经验。

（二）起义的历史作用

其一，军事上牵制和削弱了唐王朝的力量：阡能、韩秀升起义爆发在今四川、重庆地区，这一地区当时是唐朝廷临时所在地，起义军曾一度逼近成都（到达成都附近的双流），故对唐王朝统治威胁较大。为了镇压起义，陈敬瑄动员全川的所有兵力，甚至把守卫仓库、门庭的士卒以及支援关中的2000名黄头军抽调回来，这样就使这一地区不再有可能继续抽调军队到关中参战，牵制了唐王朝的部分兵力，客观上起到支援和策应黄巢在关中作战的作用。

其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尤其是韩秀升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渝州、涪州（治今重庆涪陵）一带①，阻断了峡江运输线，所谓"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云安、淯井路不通，民间乏盐"②。江淮贡赋是唐王朝得以维持的经济命脉，井盐是四川主要税收对象，这些都是关系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故韩秀升起义引起了唐朝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第六节　沙陀出兵助唐与黄巢起义最后失败

尽管唐王朝调动各地藩镇军队在关中与黄巢起义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但"黄巢兵势尚强"③，唐朝还看不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端倪。中和二年（882年）十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忧虑地对行营都监杨复光说："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④可见此时唐朝力量还不足，不具备镇压黄巢义军的军事条件。沙陀首领李克用的出兵大大增强了唐朝的兵力，使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农民

① 《新唐书》卷二二四下《陈敬瑄传》："涪州叛校韩秀升。"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三年二月。

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二年十月。

起义军的方向发展。中和三年（883 年）四月，黄巢义军撤出关中，到河南地区继续坚持战斗，唐朝再度动用沙陀兵，击败义军主力，次年六月，黄巢退至山东莱芜狼虎谷，自杀牺牲。长达 10 年的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战争最后以悲剧结局而告终。中和二年（882 年）十一月，李克用率沙陀兵参战，至四年（884 年）六月黄巢牺牲，为唐末农民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

一、李克用出兵助唐

（一）唐朝召李克用出兵

李克用是沙陀人。沙陀属西突厥别部处月种，《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处月居金娑山（今阿尔泰山）之阳，蒲类（今新疆巴里坤湖）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唐懿宗时，其首领朱邪赤心领兵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被授予大同节度使，赐名李国昌。王仙芝在荆襄一带活动时，沙陀兵曾镇压过起义军。李克用为李国昌之子，任唐朝的云中守捉使。李氏父子对唐朝时叛时服，经常进扰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属山西）、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对河东威胁很大。广明元年（880 年），李氏父子再次与唐朝发生冲突，被唐军击败，率宗族逃入代北鞑靼部。当黄巢大军攻取两京之际，李氏父子正亡命于鞑靼，寄人篱下，处于困难时期。但是李氏父子并不甘心丧尽地盘，仍想再次借镇压农民军的机会，重新占据地盘，割据自立。李克用曾对其部众说："今黄巢北寇，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愿与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终老沙碛哉！"①

中和元年（881 年）三月，陈景思、李友金奏请唐廷同意，请李氏父子出兵助战，李克用率鞑靼诸部万余人与陈、李等人会合，准备进军关中。五月，李克用通告河东，声称奉诏率兵 5 万讨伐黄巢，要求准备粮草酒食以供军需。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派兵防守

① 《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石岭关（今山西榆社西），李克用不能前进，间道到达太原。在城下屯驻5日，要求郑从谠补充粮草，郑从谠只给钱千缗、米千斛，李克用大怒，纵兵大掠。郑从谠求救于振武（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南）节度使契苾璋，契苾璋率突厥、吐谷浑等部军队赴援，连破沙陀2寨，进入太原城。李克用见太原兵力加强，遂大掠阳曲（今山西阳曲西南）、榆次（今属山西）后，返回代州。

中和二年（882年）二月，李克用攻掠蔚州（治今山西灵丘）。次月，唐廷命振武节度使契苾璋与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大同军（今山西朔州东北），共同讨伐李克用，命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接应。唐军战败，蔚州失陷。不久，李克用又击败大同节度使赫连铎和幽州（治今北京西南）节度使李可举的联合进攻，并不断骚扰太原、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楼烦监（位于今山西岚县东南）一带。

此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关中与农民军殊死决战，苦于兵力不足，又要防御李克用的不断侵扰，因此急于消除与李氏父子的矛盾，把这支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军的战场上来。对李克用一方来说，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实力，长期和朝廷对立将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李克用一方面屡次进扰河东，想要扩大自己的地盘；一方面"累表请降"①，欲想取得合法地位。中和二年（882年）十月，唐廷通过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王处存与李克用家族为姻亲）转告李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若暴横如故，当与河东、大同军共讨之"②。王重荣和杨复光也极力主张召李克用出兵关中，于是诸道行营都都统王铎以墨敕召李克用，并要求郑从谠不得阻挠进军。于是，唐廷与李克用在镇压农民起义军上达成一致。十一月，李克用率步骑3.5万经岚州（治今山西岚县东北）、石州（治今山西离石）直趋河中③。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二年十月。

③ 李克用率军人数，见方积六《黄巢起义考》第2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8月版。

（二）梁田陂之战

唐廷任命李克用为雁门（治今山西代县）节度使、忻代观察使。十二月，李克用到达河中，遣其将李克修率兵 500 人渡过黄河向农民军作试探性攻击，自己亲统大军从夏阳（今陕西合阳东南，黄河西岸）渡河，驻于同州。中和三年（883 年）正月，李克用部将李存贞与义军大将黄揆（黄巢之弟）战于沙苑，义军战败，李克用遂进驻沙苑。王铎承制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二月，李克用进军乾坑（位于沙苑西南），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

沙陀军到来之前，在关中的唐朝诸军皆畏惧农民军，莫敢先进。李克用的沙陀军身穿黑衣，谓之鸦军，战斗力较强，义军士卒皆有所忌，说："鸦军至矣，当避其锋。"① 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十六日，沙陀军会同其他诸军进至梁田陂（今陕西渭南西）。黄巢为阻止沙陀军向长安进军，命王璠、林言、赵璋、尚让等率军 15 万，屯于梁田陂，阻截其向长安推进。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殊死决战，结果，农民军大败，损失数万之众。此战使农民军元气大伤，在关中实际上已无法立足了。

（三）华州、零口之战

中和二年（882 年）十一月，驻守华州的农民军李详旧部发动兵变，逐走刺史黄邺，推黄邺部将王遇为主，投降了王重荣，唐朝任命王遇为华州刺史。华州之失使在长安的黄巢义军失去了东方屏障，影响很大。梁田陂之战失败后，王璠、黄揆为了牵制唐军向长安推进，率军袭击华州，赶走了王遇，重新占领了华州。

李克用见华州失守，派军包围了华州，掘堑环绕州城，日夜攻打。三月，黄巢见华州危急，命尚让率兵援救，李克用、王重荣引兵于零口（今陕西临潼东）阻截。六日，双方大战，尚让战败，退回长安。黄揆等见援军已败，知华州已无法继续防守，于二十七日弃城突围而走，华州再次被唐军占领。这样，农民军在关中除长安外，已再无大的据点了，经华州、潼关东撤的路线彻底被切断。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二年十二月。

二、黄巢撤离关中退入河南

零口之战后，李克用进军至渭桥，把骑兵布置于渭北，每夜令部将薛志勤、康君立等率步卒潜入长安城，放火杀人。四月八日，沙陀军与忠武、义成、义武等军，向长安发动大规模攻势，农民军拒战于东渭桥（位于霸水与渭水交汇处），一日三战，农民军皆败，溃散逃走。十日，李克用率军自长安光泰门入城，农民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且战且退。官军入城后到处烧杀抢掠，旧史载："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①。黄巢退出长安后，经蓝田（今属陕西）入商山进入河南，沿途命多撒珍宝于路，官军争相捡取，农民军得以顺利撤去。

农民军撤到河南时，"众犹十五万"②，仍具有相当的实力。五月，黄巢命孟楷为前锋，率万余人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与农民军连兵。秦宗权，许州人。初为本州牙将，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被调至蔡州，恰值黄巢别部攻打州城；他率部拒守，保住城池。此后，他投靠监军杨复光，得其欢心，保荐为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的此次投降，并不意味着参加农民起义，他只不过借投降之名，行保全个人实力之实，利用与黄巢的联兵，乘机在河南发展势力。尽管如此，秦宗权之降，毕竟是农民军东撤途中的一次胜利，减弱了农民军在河南的敌对力量。

唐朝在农民军撤出关中后，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农民军所剩无几，不用多大气力，就可取得最后的胜利，因而任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让他率兵回到山西。任命朱温为宣武（治汴州，今河南开封）节度使。七月，朱温率数百人到达汴州，"时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外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三年四月。

②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危惧”①，朱温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农民军仍在活动，唐朝委任朱温为东北面都招讨使，继续镇压农民军。在河南参加镇压农民军的唐军，还有感化（治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时溥率领的军队，忠武（治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周岌的军队。

三、黄巢起义的失败

（一）顿兵陈州

早在黄巢从关中东撤之前，唐朝的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刺史赵犨就估计到如果义军不在关中覆灭，必然东撤。陈州地处要冲，且忠武军（陈州隶属于忠武节度使管辖）长期参预讨伐农民军，双方仇怨已深，不可不为之备。他大肆修筑城堑，缮治甲兵，储积粮草，广募士卒，并把州城周围60里以内拥有资粮的民户，全部迁移入城。赵犨还以其弟赵昶、赵珝，长子赵麓、次子赵霖，“分领锐兵”②，准备和黄巢义军周旋到底。

农民军前锋将领孟楷击败蔡州的秦宗权后，移军进攻陈州，驻扎于项城（今河南沈丘）。赵犨故意作出力弱不敌的姿态，诱使孟楷放松戒备，然后引兵突袭，义军溃散，损失惨重，生擒孟楷，斩首。黄巢闻听孟楷死讯，非常震怒，亲率大军东进，屯于溵水，与秦宗权的军队会合后，进攻陈州，兵势甚盛，陈州人十分恐惧。为了鼓舞士气，赵犨扬言说：“忠武素称义勇，淮阳亦为劲兵，是宜戮力同心，捍御群寇，建功立节，去危就安，诸君宜图之。况吾家食陈禄久矣，今贼众围逼，众寡不均，男子当于死中求生，又何惧也！且死于为国，不犹愈于生而为贼之伍耶！汝但观吾之破贼，敢有异议者斩之！”③这就充分说明赵犨为首的赵氏宗族是农民军最凶恶的敌人。

赵犨一面开城不断出击，拼死抵抗，一面继续做好防御准备，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三年七月。

②③ 《旧五代史》卷十四《赵犨传》。

打算长期固守城池。黄巢见陈州非一朝一夕可以攻取，乃于城外三四里处建八仙营，如宫室之状，又修建百司廨署，在城四周掘堑五重，屯积粮储，从蔡州抽调甲胄兵仗，准备长期围攻陈州。由于作战旷日持久，双方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从义军方面看，中原一带“仍岁大饥，民无积聚”①，久屯坚城之下，积储用尽，军粮难以为继。为了解决供给问题，黄巢不得不扩大战区范围，派兵向许、汝（治今河南临汝）、唐（治今河南泌阳）、邓（今属河南）、孟（今属河南孟州东南）、郑、汴、曹、濮（治今山东鄄城北）、徐、兖（今属山东）等数十州攻掠。农民军四处分兵出击，范围又是如此广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供给方面的困难，但也分散了兵力，使陈州久攻不克。从官军方面看，长期被围，陈州城中粮储日渐减少，“兵食将尽”②，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由于双方都存在很大困难，农民军不能速战速决，攻克陈州，唐军亦不能打破重围，“犨小大数百战，胜负相当”③。

十二月，赵犨派人向邻道求救，于是宣武节度使朱温、感化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等引兵赴援。朱温在鹿邑（今属河南）和农民军大战，斩杀农民军2000余人，遂引兵占据亳州（今属安徽）。这时农民军兵力尚比较强，朱温等诸道唐军还难于对抗，于是在中和四年（884年）正月，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5万出天井关（今山西晋城西南），准备经河阳（今河南孟州东南）渡过黄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借口黄河渡桥尚未修缮完毕，拒绝其经过。不得已李克用只好回军从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陕州（治今河南陕县）渡过黄河。三月，进入河南。朱温与黄巢义军在瓦子寨（今地不详）大战，攻破寨墙，黄巢部将李唐宾、王虔裕投降。

李克用与朱温、时溥、周岌等军汇合后，向陈州推进。四月，

---

①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② 《旧五代史》卷十四《赵犨传》。

③ 《新唐书》卷一八九《赵犨传》。

诸道官军围攻太康（今属河南），尚让战败，太康失陷。接着又进攻黄邺驻守的西华（今属河南），黄邺不敌退走，西华遂即失陷。黄巢在陈州得知周围这两个重要据点失守，官军逼近陈州，只好解围撤走。陈州之战前后历时300余日，至此结束。经过此战的长期消耗，农民军的主力几乎耗尽，不再具备发动大规模作战的条件。

（二）王满渡之战

陈州解围后，朱温一度入城①，当他听到黄巢撤至故阳里（今河南淮阳北）的消息，恐农民军继续北进，袭击汴州，慌忙引兵回到汴州。五月初，大雨平地3尺，黄巢营寨为水所冲淹，又听说李克用的军队即将到来，遂引兵直趋汴州，攻下尉氏县（今属河南）。命尚让率精兵进攻汴州，驻于繁台（位于开封南6里）②。朱温命部将朱珍、庞师古、齐奉国率军出击，击退了农民军。

朱温虽获取一些胜利，并不能改变他与黄巢义军兵力对比上的劣势，农民军大军紧逼汴州的形势仍很严峻。于是，朱温只好又向李克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使田从异率军从许州出发，直扑汴州。黄巢见李克用率军来援，急忙引兵退走，李克用挥军紧追不舍。八日，李克用军在王满渡（位于今河南中牟北，为古汴河津渡）追上农民军，乘其半渡之机，发动攻击，斩杀万余人，残余的义军士卒溃散逃亡。农民军大将尚让率其部下投降时溥，其他将领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皆率其众投降于朱温。

王满渡之战农民军损失惨重，野战部队不是被歼灭，就是由叛将率领投降了官军，黄巢仅率残余千余人向山东逃去，不再能对唐朝构成威胁。尤其是尚让的投降，影响最大，他是农民军中地位仅次于黄巢的重要人物，进入河南后，农民军的精锐也多由他率领，他的投降不仅增强了官军的力量，而且也使农民军从此

① 《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汴州》。

丧失了野战能力，使黄巢此后只能在诸路官军的追击下，东躲西藏，疲于奔命，无力作战。

（三）兵败莱芜

王满渡之战后，黄巢率余众逾汴而北，五月九日到达封丘（今属河南），被李克用军追上。十日，大雨，黄巢不敢拒战，继续向东撤退。过胙城（今河南延津东北）、匡城（今河南长垣西南）时，黄巢收溃散士卒千余人，向兖州奔去。十一日，李克用追至冤句，昼夜行 200 里，人困马乏，身边能跟上的仅骑兵数百人，所带粮食也用尽了，李克用只好暂回汴州，打算补充粮食后再继续追击。此行，李克用获得了黄巢幼子及乘舆、器服、符印等物。十四日，李克用回到汴州，朱温迎入上源驿款待，席间"克用乘酒使气，语颇侵之，全忠（即朱温）不平"①。当夜，朱温派军队围攻上源驿，欲杀死李克用。李克用在部下保护下，死战得脱，越城逃出。从此，朱李两家交恶，争斗不息。李克用十六日回到许州故寨，向周岌求粮，遭到拒绝，李克用遂率军从陕州渡过黄河返回太原。

李克用撤走后，时溥遣其将李师悦和尚让率军继续追击黄巢。六月十五日，二人率军追至莱芜（今山东莱芜东北）②，黄巢战败，部众损失殆尽，所余亲故数人随他逃到莱芜西南的狼虎谷。黄巢见大势已去，遂于十七日自杀，其甥林言断其首级，欲献之立功，途中为唐军所夺。由时溥献于唐廷。

历时 10 年之久的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战争随着黄巢的自杀牺牲，最终以悲剧结局而告结束。黄巢虽然牺牲了，但其仍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在他的领导下，农民军队伍发展到 60 万，转战南北各地，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清洗和打击，魏晋以来支配政治和社会的门阀士族，以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四年五月。

② 《桂苑笔耕集》卷一《贺杀黄巢表》，《新唐书》卷一八八《时溥传》。

及门第制度和观念基本被清除了，为其服务的谱系之学也不再为人所重视了①。

黄巢牺牲后，其弟（一说侄）黄浩率领7000义军继续斗争，转战于湖南，称浪荡军。直到昭宗光化四年（901年），由于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才最后失败。

第七节　唐末农民战争的军事特点与经验教训

唐末农民起义军奋战10年，足迹踏遍我国南北大地，起义队伍由小到大，长期流动作战，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其中既有成功的战例，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和我国历代农民起义战争相比较，确有其独特的军事特点，需要认真的总结。

一、军事特点

1、进行大规模游动作战，这是唐末农民战争最主要的军事特点之一。在起义前期，无论王仙芝还是黄巢，均采用了游动作战方式，避实击虚，消灭敌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其军事表现形式是：在北方不断打击各地官军后，向南方发展；再向北方冲击，然后再向更远的南方游动；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后，最后进击北方，攻克两京。无论在北方或者南方，农民军均不长期固守一地，不在乎州县城池的得失，以歼灭或消耗敌方的有生军事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

农民军的这一作战特点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是由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决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爆发越普遍，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越广泛，农民军越易于在固定地区作战，不进行大范围的游动，也不至于为官军所立即镇压。在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没有在全国引起燎原大火，

---

① 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序》。

虽然也有农民暴动“所在蜂起”的记载①，但其规模都比较小，多者千人，少者数百人，未能在全国造成一定的声势，很容易旋起旋灭。黄巢一支孤军奋战，如果不避实就虚，转战各地，就容易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其次，黄巢义军显然是接受了裘甫、庞勋起义失败的教训，不肯像庞勋那样苟安于一地，争取做一个节度使，或者像裘甫那样满足于“陆耕海渔”，以至于最后被优势官军歼灭。从裘甫起义、庞勋起义发展到黄巢大起义，农民军的军事斗争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再次，农民军中流民、盐贩、戍卒占了很大比例。他们习惯于流动性的生活，容易导致在作战过程中采用流动方式。此外，他们也熟悉山川险隘、交通道路，了解官军的分布虚实，有利于自己在战略上作大范围的机动，避开敌方强点，打击其薄弱之处。最后，从唐末客观情况看，北方藩镇林立，唐军密布，中原地区强镇尤多，且离唐朝统治中心较近；南方藩镇稀疏，唐军较少，离统治中心较远。同时，北方连年灾荒，战祸频繁，经济残破。向南方发展，不但可以切断唐朝的经济命脉，而且可使农民军壮大自己，积蓄力量。在起义前期，黄巢利用这种作战方式，纵横南北，使官军疲于奔命，惶恐不安，逐渐摆脱了被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2、利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弱点，孤立和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唐末，中央政权与藩镇之间，诸藩镇相互之间，各派政治集团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掣肘，号令不一，政治紊乱。有的藩镇为了私利，故意放纵义军，如宋威就说：“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② 在荆门击败过义军的刘巨容，大胜后不穷追猛打，说：“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③ 有的藩镇为保存实力，宁可得罪朝廷，也不出兵阻截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

②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十九》，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

义军，“欲贼纵横河洛，令朝廷耸振”①。这些矛盾和弱点，也为黄巢所认识，“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② 的记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就给义军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以可能性。当黄巢率大军北伐渡江后，抓住藩镇各求自保的弱点，发出“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③ 的警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孤立唐廷、减少阻力的目的，为顺利进军关中创造了有利条件。

3、善于麻痹敌人，松懈敌军斗志，寻机发展或歼敌。黄巢农民军在长期征战中，每当敌强己弱，军事形势非常不利时，善于利用一些节度使急于立功的心理，采用诈降战术，诱使官军停止或延缓军事进攻，然后相机行事，突破官军重围，或利用其戒备松懈之机，歼灭敌军。如乾符五年（878 年）二月，在王仙芝牺牲后，唐朝集中兵力围攻黄巢，义军屡战不胜，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黄巢通过天平节度使张裼，向唐朝请求招安。在官军松懈之机，率军突围从山东转战河南，威逼东都，迫使唐朝调集大军防守，然后挥军南下江淮，摆脱了围攻。再如广明元年（880 年）五月，义军在信州遭到高骈骁将张璘的围攻，由于士卒多染疾疫，此前几次作战失利，损失惨重，加之北方诸道唐军云集淮南，强弱悬殊。黄巢一面以重金贿赂张璘，使其缓攻；一面致书高骈请降，请其代为保奏官职。高骈欲独享大功，遣回诸道军队。黄巢见高骈中计，遂歼灭张璘的军队，进入淮南，渡江北上，攻取两京，获得了胜利。

二、失 败 教 训

1、忽视根据地建设。农民军在占领长安之前，由于敌强己弱，

---

① 《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

②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广明元年十一月。

采用流动作战方式，机动灵活地打击官军，扩大影响，壮大队伍，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当起义队伍得到一定的发展壮大，并以夺取两京，建立政权为目的时，仍然到处流动，不着手经营根据地，发展生产，便不可取了。农民军摧毁了唐王朝许多地方政权，却不去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甚至占领东都洛阳也不留兵驻守，致使起义军过后被藩镇势力重新占据。后来黄巢从关中撤出转战河南，便无立足之地，被中原藩镇围追堵截，穷追猛打，部队得不到休整和补充，加速了失败的进程。

2、贪图享受，坐失良机。农民军数十万大军麋集长安，没有及时攻占周围其他州县，仅以一纸诏书求得诸镇名义上的归附，便以为从此相安无事，忙于称帝改元，设置百官去了。对于散处关中的唐朝军队也没有采取措施召集，使得唐朝有机会召集整顿这些军队，与农民军为敌。据《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载："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贼巢汙京师后，众无所归，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农民军坐失时机，便使得唐朝得以重新部署力量，进行反攻。在长安陷入三面围攻，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黄巢为首的义军领导集团，仍迟迟不跳出重围，避实就虚，另谋出路，及至在沙陀军参战后，损兵折将，始仓皇而退。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是因为农民军领袖贪恋富贵荣华，沉湎于帝王将相生活，艰苦奋斗的雄心锐减，意志消沉的缘故。

3、缺乏稳定坚强的领导核心。唐末农民战争持续10年，转战大半个中国，队伍发展到数十万，如此大的事业，非少数人所能包办，必须选拔和培养一批立场坚定、富有才干的人才共同奋斗。从农民军斗争的各个阶段看，每到危难时刻，都有一些将领背叛，投降唐朝。最先有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人投降高骈，其次有朱温降王重荣，葛从周、李唐宾、张归厚、张归霸等又降于朱温，甚至连久共患难的尚让，在王满渡战败后倒戈投降时溥。狼虎谷对黄巢穷途相逼的恰是尚让部下。这么多的农民军将领相继投降，逐渐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促成了起义的最终失败。

4、攻打陈州的决策失误。黄巢退出关中后，本应向官军力量薄弱的地区进军，组织力量，等待时机，再度组织反攻。从当时的局势分析，中原地区藩镇林立，这些人虽未必为李唐王朝出力，但却会为扩大地盘、保护既得利益而死命相搏，因此北方地区不适合农民军继续发展。南方官军力量薄弱，且物产丰饶，如果黄巢迅速南下，逐渐恢复元气，壮大势力，重新发动大规模攻势是完全可能的。孟楷攻陈被杀，黄巢震怒，加之忠武军为农民军死对头，为了复仇雪恨，黄巢下令进攻陈州，完全不顾后果，围攻坚城 300 日，这样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使农民军从此一蹶不振。陈州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周围州县经济残破，生产凋敝，即使黄巢攻克该城，也无多大的战略意义。围攻陈州的结果，使农民军丧失了转移的大好时机，同时也使唐朝得以从容调集军队，击败农民军。黄巢感情用事，错误决策，只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忽视有生力量之消长，使农民军很快地走到了尽头。

陈州之战后，起义军如果不向兖州一带撤退，迅速转战江淮，仍能继续生存下去，不至于很快失败。黄巢之所以这样决定，完全是农民的乡土观念作怪，这种情况在黄巢领导义军的战斗经历中，曾多次出现。乡土观念是农民封建意识的一种反映，也是其政治狭隘性的表现。用这种观念去指导军事工作，轻则造成战斗失利，重则造成整个事业的失败，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第十八章　唐末藩镇兼并战争与唐王朝的灭亡

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唐王朝的统治已基本崩溃，朝廷号令所行，仅及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藩镇势力在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恶性膨胀，连过去一直平稳的江淮地区也出现了藩镇混战。在藩镇混战中逐渐强大的宣武（治汴州，今河南开封）节度使朱全忠（朱温），进入关中，迫使唐廷迁都洛阳，派兵入宫杀死唐昭宗，立李柷为帝，史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废去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唐朝亡。

第一节　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的国内形势

唐末农民战争期间，产生了一批新的藩镇，这些后起的藩镇势力发展很快，对原有的藩镇冲击很大，旧的平衡完全被打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随着农民起义的被镇压，外来威胁的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相对缓和的矛盾再度激化。宦官与朝臣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们各自以一些强镇为后盾，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使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唐政权危机加剧，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

一、统治集团内争激烈

唐僖宗回到长安时，长安已残破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

横”①。关中地区经过战乱后，人口逃散，田地荒芜，生产衰退，一片凄凉景象，预示着唐朝统治面临末日，即将走向全面崩溃。然而，唐朝宦官、朝臣之争，宦官内部斗争并不因此而有所缓和，反而更加激烈。宦官头子田令孜与杨复恭（杨复光之堂弟）争权夺利，一个依其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为靠山，一个靠拥有沙陀铁骑的河东（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李克用为后盾。宰相们为排斥异己，勾结藩镇者有之，依靠宦官者有之，都不择手段地对付自己的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将国家安危则置于脑后。到了唐昭宗时期，以宰相为首的朝臣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他们各以强镇为依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两败俱伤。宦官们几乎被诛杀殆尽，朝臣们也受到残酷的屠杀，唐王朝在这种无休止的斗争中终于寿终正寝了。

唐僖宗在成都时，田令孜曾招募新军54都，每都千人，分隶左右神策军。南衙、北司官员共万余人②，都需要朝廷供养。回到长安后，由于藩镇各专租税，不愿上供，江淮及河南、河北的赋税，三司又调运不来，当时唯收京畿、同（治今陕西大荔）、华（治今陕西华县）、凤翔（今属陕西）等地租税，不能赡养军队，赏赐不时，士卒有怨言。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两盐池原先隶属榷盐使管辖，盐利尽归朝廷。中和以来，僖宗入蜀，百司各失其职，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王重荣乘机擅有两盐池之利，每年仅献盐3000车。田令孜奏请僖宗，欲收两池盐利以供军，另调王重荣为泰宁（治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王重荣拒受朝命，上表斥责田令孜。田令孜联合邠宁（治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共讨王重荣。王重荣自感势孤力薄，便乞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共同联兵抗击朝廷。李克用所率沙陀兵强悍勇猛，所向无敌，长驱攻入关中，双方在沙苑（位于今陕西大荔南洛、渭之间）大战，朱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光启元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光启元年闰三月。

玫、李昌符大败，京城危急，田令孜与唐僖宗慌忙逃往凤翔，不久又经宝鸡（今属陕西）逃到兴元（今陕西汉中）。朱玫、李昌符见势不妙，转而联合王重荣、李克用反对田令孜。田令孜到兴元后，自知不为藩镇所容，自任西川监军，推说有病，到成都求医，投靠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去了。僖宗以杨复恭为枢密使兼任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唐廷的权力遂由田令孜转移到了杨复恭手中。

光启二年（886年）四月，朱玫在凤翔召集百官，拥立唐宗室襄王李熅为主，权监军国事。十月，李熅在长安即皇帝位。由于李熅终究是远房唐宗室，没有号召力，加之朱玫兵力有限，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李昌符知李熅难成气候，遂又重新归顺唐廷。李克用本来已回到河东，对此事大为不满，遂与王重荣共同举兵讨伐朱玫。朱玫兵败，被部将王行瑜所杀，王行瑜遂夺得邠宁节度使之位。李昌符也被新任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攻杀。长安大乱，李熅在百官簇拥下，逃奔河中，王重荣诈为迎奉，杀死了李熅，朝官被杀的几达半数。

僖宗于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由兴元回到凤翔，因长安此次遭战火破坏严重，宫室未完，临时驻于凤翔。次年二月，僖宗患病，从凤翔回到长安。三月，僖宗病危时，杨复恭请求立皇弟寿王李杰，僖宗下诏立其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病死后，寿王即皇帝位，更名晔，是为昭宗。

杨复恭自以为有册立之功，自称“定策国老”，视昭宗为“门生天子”，作威作福，专横跋扈。他豢养了几十名勇士为义子，让他们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数百名为义子，分派到诸道充任监军使。昭宗对此忿恨难平，忍无可忍。宰相孔纬、张濬等也不满杨复恭所为，暗中劝昭宗采取措施，翦除宦官。但是他们本身没有力量，便想依靠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由于杨复恭的哥哥杨复光对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有恩，杨复恭遂依靠李克用为后盾。张濬听从朱全忠的建议，力倡讨伐李克用，以动摇杨复恭的靠山，然后再铲除杨复恭。另外几位宰相杜让能、刘崇望和其他朝臣深知此举非但无功，只能招祸，纷纷劝阻，昭宗不听。大顺

元年（890 年），唐廷下诏，削去李克用的一切官爵，出兵讨伐，以张濬为统帅，孙揆为副统帅，命朱全忠、卢龙（治幽州，今北京西南）节度使李匡威同时出兵，三路共讨河东。结果张濬、孙揆大败，李克用攻破晋州（治今山西临汾东北）。朱全忠仅派偏师作试探性进攻，一旦受挫，立即撤回本境。唐廷无奈，下诏为李克用昭雪，恢复官爵，劝其退回本镇。主张用兵的张濬、孔纬都被贬谪。朝官受此挫败，从此无人敢言斥逐宦官。以杨复恭为首的宦官集团，气焰更加嚣张。

昭宗受此打击，仍不甘心，他对杨复恭义子杨守立，结以恩宠，委以重任，想以此法分化瓦解宦官势力，以达到最终铲除宦官的目的。把杨守立从一个普通将军破格提升为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姓名李顺节，倚其削夺杨复恭军政大权。大顺二年（891年），昭宗认为时机成熟，免去杨复恭的一切职务，迫令致仕。杨复恭不甘心失权，密谋发动军事叛乱，战败逃往兴元，招集义子杨守信、杨守亮等，以讨李顺节为名，联兵反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出兵讨叛，杨复恭大败，在逃亡途中被同华节度使韩建杀死。在长安，神策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设计杀死李顺节，夺得军政大权。

李茂贞战胜杨复恭，占据兴元，要求朝廷让他兼领山南西道，昭宗不愿李茂贞势力膨胀，拒绝了其要求。李茂贞上疏斥骂，昭宗怒不可遏，决计出兵讨伐凤翔。宰相杜让能认为风险太大，再三劝阻，昭宗不听，强令杜让能主持军务，以宗室李嗣周为招讨使，率禁军讨伐李茂贞。禁军未经训练，战斗力很弱，根本不是凤翔军队的敌手，一触即溃，李茂贞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直逼长安。强迫昭宗杀死杜让能、西门君遂等一批人。于是，李茂贞尽得凤翔、兴元、洋（治今陕西洋县）、陇（治今陕西陇县）、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北）等 15 州，成为关陇地区的霸主。李茂贞本非强镇，由于地近长安，便于干预朝政，致使唐廷多观其眼色行事。朝臣、宦官经此两战的打击，势力大为削弱，然毫无醒悟，相互倾轧仍然非常激烈。

二、藩镇林立攻战不休

唐廷依靠藩镇镇压农民军，农民军虽被镇压，但藩镇势力也恶性膨胀，出现了无地不藩、无时不战的混乱局面。光启元年（885年），僖宗从成都回到长安，当时的情况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①。

唐朝末年，北方诸镇势力最强者，莫过于河东李克用和宣武朱全忠，他们均是依靠镇压农民军起家的新起藩镇。其余如感化（治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时溥，天平（治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节度使朱瑄，泰宁（治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朱瑾，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治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王行瑜，镇国（治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韩建，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成德（治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镕等，虽号称强镇，但屡经打击，势力皆不能与李克用、朱全忠相比。至于昭义（治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孟方立，义武（治定州，今属河北）节度使王处存，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等，只不过依附强镇，以求自保而已。唯有蔡州（治今河南汝南）节度使秦宗权，兵员众多，军纪败坏，所至焚城杀戮，为害最烈。他在黄巢从长安东撤进入河南时，战败投降，后来黄巢北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失利，退入山东，他便倚仗兵力，独树一帜，自称皇帝。向周围地区大肆扩张，杀人如麻，残暴绝伦，行同豺狼。史载："（秦宗权）遣其将秦彦乱江淮，

---

①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秦贤乱江南，秦诰陷襄阳，孙儒陷孟、洛、陕、虢至于长安，张晊陷汝、郑，卢瑭攻汴州。贼首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城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关东郡邑多被攻陷。”① 秦宗权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到汴州的朱全忠。于是，朱全忠拉拢联合陈州的赵犨，山东的朱瑄、朱瑾兄弟，共同对付秦宗权。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少胜多，于文德元年（888年），彻底击败秦宗权。从此，朱全忠实力大增。

朱全忠在进行兼并战争期间，不但驱杀百姓，破坏生产，而且大量残杀兵卒，为害甚大。如徐、泗（治今江苏盱眙北）辖境之内，“自光启至大顺六七年间，汴军四集，徐、泗三郡，民无耕稼，频岁水灾，人丧十六七”②。以后又进攻天平镇，破坏更加严重，“全忠乃移兵攻郓，三四年间，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③。景福二年（893年），朱全忠击败朱瑄，俘获士卒3000余人。恰至这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朱全忠竟说：“此乃杀人未足耳！”④ 下令将所俘士卒3000名全部杀光。在进攻淄青镇（治青州，今属山东）时，朱全忠之侄朱友宁围攻博昌（今山东博兴）不下，“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⑤。真是兽性大发，惨绝人寰。

北方的另一强镇——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也是一个嗜杀成性，蛮横残暴的人物。他拥有凶悍轻剽、骁勇善战的沙陀铁骑，又选

---

① 《旧唐书》卷二〇〇下《秦宗权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二《时溥传》。
③ 《旧唐书》卷一八二《朱瑄传》。
④ 《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
⑤ 《旧五代史》卷十二《朱友宁传》。

勇敢善战的将校收为养子，作为军中骨干，如李存孝、李嗣昭、李嗣源、李存进等，皆为一时名将。由于实力雄厚，河东兵锋所向，无不披靡，河北、关中诸镇惶恐款服，朱全忠也屡遭败衄，李克用一时势压群藩，威震中原。但是，李克用自恃强盛，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御下无方，虽然制服了许多藩镇，却又往往叛离，所兼并的地区也难巩固，最终使他陷于东奔西走、手忙脚乱的被动地位。和朱全忠相比，明显不及，双方力量虽不断转化，但总的看，李克用逐渐处于下风。

在烧杀劫掠，破坏生产方面，李克用的军队与朱全忠并无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河东军纪之坏，举世闻名，李克用部下官兵蛮横强暴，恣行杀掠，无异悍盗。史载："（李克用）部下皆北边劲兵，及破贼迎銮，功居第一，由是稍优宠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① 平时如此，战时烧杀抢掠更为厉害，有时甚至靠食人肉度日。如景福元年（892 年），成德节度使王镕与李克用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叱日岭大战，河东军大胜，歼敌万余人，河东"军乏食，脯尸肉而食之"②。连李克用的长子李存勖都看不惯这种现象，要求整肃军纪。李克用却另有看法，说："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③ 这种姑息纵容的恶劣风气，使得河东兵的军纪越来越坏，为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

在南方，藩镇混战亦遍于各地，其中以淮南、两浙最为严重，对社会生产造成的破坏也最大。淮南（治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高骈，晚年宠信妖人吕用之，让其掌管盐铁，参决军政。吕用之又推荐诸葛殷、张守一，说他们会长生之术，高骈奉若神明，用为牙将。另建别院，饰以珠玑、金钿，高骈与吕用之等人深居院

---

① 《旧五代史》卷二十七《唐庄宗纪一》。

② 《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武皇纪下》。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纪七十九》昭宗天复二年三月。

中，讲法论道，不见部属。吕用之还怂恿高骈置“察子”百余人，深入民间、街巷，探查情况，防范军民，夺人妻女，掠人货财，无恶不作。高骈还听信吕用之之言，选募诸军骁勇2万人，号称左右莫邪都，用以胁制诸将，由是诸将怨忿，皆有离心。这样就使高骈陷于孤立境地，却不自知。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秦宗权部向南流窜，高骈命部将毕师铎驻守高邮（今属江苏），以事防御。毕师铎遂联络淮南将领张神剑、郑汉璋等，以除吕用之为名，举兵进攻广陵（今江苏扬州）。毕师铎屡战不利，遂向占据宣州（今属安徽）的秦宗权部将秦彦求援，二人合并，攻陷广陵，抓获高骈。高骈部将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刺史杨行密举兵讨伐毕、秦，二人战败，弃广陵逃走，临行前杀高骈及全家。此后杨行密与秦宗权余党孙儒展开争夺江淮的残酷战争，战火弥漫于江淮之间，杨行密虽最终击败孙儒，但江淮已残破不堪，非昔日可比了。史载：“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①

唐末以镇海（治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周宝管辖两浙。刘汉宏本黄巢部将，后投降唐朝，被任为浙东观察使，他不满意仅占有浙东，出兵进攻浙西，周宝遣部将董昌、钱镠率兵迎击，连破刘军，斩杀刘汉宏。董昌遂升任越州（治今浙江绍兴）观察使，据有浙东之地。周宝不久被叛乱的部下所逐，薛朗自称节度使。钱镠不服，兴兵讨伐，擒斩薛朗，又相继夺取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等州，成为与董昌、杨行密鼎足而立的强镇。两浙地区前后经战火摧残达10年之久，破坏程度虽远不如广陵，但也比较严重，其中以杭、越之州最甚。南方的福建、荆湖、岭南、剑南等地区，也都程度不同地遭到战火破坏，只是程度较江淮、两浙轻一些。

总的说来，南方各地战乱时间较短，战争规模较小，远远不能和北方相比，割据者们几经较量，强者逐渐消灭对手，建立了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元年七月。

几个割据一方的小政权。这些封建割据者大都实施保境安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政策，使南方经济比北方恢复得快，有些地区还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三、唐朝政权名存实亡

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李唐王朝尽管还苟延残喘了20多年，然而只有朝廷的名义，却没有行使朝廷集权的职能，唐朝政权已名存实亡了。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虽然一蹶不振，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朝廷仍然拥有巨大的财赋来源和相当的军事、政治力量，除河朔诸镇外，还可以基本上控制其他地区，地方军阀的势力还不足以控御朝廷，即使河朔诸镇在名义上也得尊奉唐廷。唐末农民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廷已完全失去了驾驭全国的能力，膨胀起来的藩镇势力，不再满足于割据一隅，他们互相攻伐，互相兼并，竭力扩大自己的地盘，视唐廷为无物。史载：“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① 可见唐廷已沦落到何等可悲的地位。不仅如此，唐末农民大起义前后的藩镇，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尤其是河朔诸镇，主要为争取节帅的继承权而同朝廷斗争，所谓“以土地传子孙”，“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②。他们单独抗命也好，或者“为合从以抗天子”③也好，目的都是争取或捍卫这种权力。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田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于是，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中和四年七月。

②③ 《新唐书》卷二一〇《田承嗣传》。

这些藩镇便“潜谋勒兵拒命”①。大量史实说明，这个问题是这一时期唐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所在。唐末农民起义后，藩镇中的强者不再满足于割据一地，已经萌发了兼并统一的念头，如淮南节度使高骈，在黄巢义军还未失败时，看到天下大乱，他就“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②。朱全忠和李克用也是这样的强镇，后梁、后唐两个王朝就是先后由朱李二姓建立的。正因为发生了这种变化，所以在光启元年（885年）唐僖宗从西川回到长安时，能服命者尚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等数十州③。然而不过短短数年时间，“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④。不仅如此，唐廷还要受制于关中强镇，史载：“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⑤唐廷已经沦落到听命于王行瑜、李茂贞的地步，连一个二等藩镇都不如，哪里还有丝毫朝廷的体面。

从经济角度看，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仍能继续统治一百几十年，主要依赖江淮财赋的供给，所谓“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⑥。当时人也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⑦，仅每年运往关中的粮食就达百余万斛⑧。这些财赋不仅供给了平时庞大的官员队伍和军队以及宫廷开支，而且也是唐廷同藩镇作斗争的经济支柱，一旦失去江淮财赋的支持，唐廷便摇摇欲坠，甚至连关中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好。自从淮南节度使高骈与唐廷对抗以来，拥兵自重，断绝江淮财赋，唐朝的财赋重地仅有剑南一处了。唐僖宗从西川回到长安，不到数年，王建入川，与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争夺地盘，遮断剑阁（今四川剑门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二年正月。

② 《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

③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二年七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二年十月。

⑥ 《韩昌黎集》卷十九《送陆歙州诗序》。

⑦ 《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

⑧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七月。

北），使得巴蜀的财赋又告断绝。唐王朝失去了这两支输血管，便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从军事角度看，中唐以来唐廷与藩镇、吐蕃作斗争，虽然主要依靠藩镇对付藩镇，以及从关东诸镇抽调防秋兵对付吐蕃侵扰，然神策军的力量不可忽视。这是唐廷直接控制的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人数最多时达15万余人，是唐王朝的重要军事支柱（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在唐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这支军队基本上全军覆灭。僖宗在成都时，宦官田令孜招募新军54都，每都千人，分隶左右神策军，算是又恢复了这支军队，但是，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不如往昔。后来在和李克用、王重荣的战争以及对李茂贞、王行瑜的讨伐中损失殆尽，从此，唐廷已经不再拥有真正意义的军队了。

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廷已基本丧失了朝廷的地位，既不能行使行政权，又没有经济、军事力量，尽管在僖宗以后，还经历了昭宗、哀帝两代皇帝，实际不过是朱全忠的一块遮羞布而已，随时都可以被抛进历史的垃圾箱，连封建史家都认为“唐亡于黄巢”①。

第二节　北方藩镇兼并战争

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北方藩镇重新陷入互相攻伐的混战之中，主要表现为河东李克用集团与宣武朱全忠集团的争霸战争。经过残酷的军阀混战，两个武装集团各自兼并了一批藩镇，剩余的藩镇虽未被兼并，也都分别依附于这两个集团，形成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长期征战的结果，相对强大的李克用集团逐渐由强转弱，相对弱小的朱全忠集团逐渐由弱转强，并逐步统一中原地区，为后来创建后梁王朝奠定了基础。

---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赞》。

一、朱全忠与秦宗权争夺河南

（一）秦宗权势力的膨胀

唐末，秦宗权走大宦官杨复光的门路，得以充任蔡州节度使。黄巢从长安撤出，转攻蔡州时归降义军，黄巢义军失败后，他利用河南诸镇兵力寡弱，无力与其抗衡的时机，大肆扩张，烧杀抢掠，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史载："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陈彦侵淮南，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唐、邓，孙儒陷东都、孟、陕、虢，张晊陷汝、郑，卢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① 僖宗光启元年（885年）二月，秦宗权称帝，设置百官。唐廷命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讨伐秦宗权，然时溥与秦宗权之境并不相接，还没有直接威胁到其安全，故时溥没有出兵讨伐。朱全忠的宣武镇（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地处河南，欲想生存或发展，首当其冲的敌人，便是秦宗权，两人必然要发生冲突。

光启元年（885年）春，秦宗权军攻掠亳（今属安徽）、颍（治今安徽阜阳）2州。朱全忠率军援救，在焦夷（今安徽亳州境）大败秦宗权军，斩杀其将殷铁林②。不久，秦宗权在汴州附近的八角镇大败朱全忠军。次年五月，秦宗权部将秦贤率军进攻宋（治今河南商丘南）、汴，被朱全忠在尉氏（今属河南）南击败。秦宗权见汴州不易攻下，遂移军进攻许州（治今河南许昌），节度使鹿晏弘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遣骁将葛从周率军赴援，还未抵达，许州已经失陷，鹿晏弘被杀。接着，秦宗权又攻陷郑州（今属河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中和四年十二月。另据《旧唐书》卷二〇〇《秦宗权传》载，文中"陈彦"应为"秦彦"之误。

② 《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一》。

南），刺史李璠单骑投奔朱全忠。

秦宗权连陷中原州县，势力强大，军队众多，中原诸镇多闭垒自守，无人敢与之为敌。朱全忠虽然多次出兵与其周旋，但由于实力有限，众寡悬殊，不能阻止秦宗权的扩张步伐。《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一》载："时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故（秦）宗权得以纵毒，……帝累出兵与之交战，然或胜或负，人甚危之。"朱全忠如果不能战胜秦宗权，不仅其霸业难成，而且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存。

（二）汴州之战

为了能够战胜秦宗权，朱全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壮大自己的实力，改变双方力量对比。首先，他极力设法扩大地盘。义成（治滑州，在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安师儒怠于军政，为部下所杀①，朱全忠乘机派部将朱珍、李唐宾率军袭击滑州。当时天平节度使朱瑄也想夺取滑州，朱珍、李唐宾率军冒大雪前进，一夜驰至城下，赶在朱瑄之前夺取了滑州。从此，义成镇归朱全忠所有。朱全忠获得义成镇，不仅增强了实力，更重要是保证了汴州侧后的安全，可无后顾之忧地专力对付秦宗权。其次，拉拢周围藩镇，增加抗击秦宗权的力量。陈州（治今河南淮阳）距蔡州仅二百余里，为汴州南面的屏障。秦宗权曾多次进犯陈州，由于朱全忠的援救，始终不能得手，节度使赵犨感其恩，与朱全忠结为婚姻，并常年以财赋军粮资助他，缓和了朱全忠钱粮紧张状况。另外，天平节度使朱瑄与泰宁节度使朱瑾也是朱全忠的拉拢对象，他卑词厚礼，讨取朱氏兄弟欢心，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朱氏兄弟也乐得朱全忠为之屏障，便与其联合。朱全忠得到周围藩镇支持，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秦宗权。史载："帝每与蔡人战于四郊，既以少击众，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师少，未快其旨。"②在朱全忠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后，仍感兵力不足。秦宗权也因为朱全忠数败其军，视之为劲敌，准备调集大军围攻汴州，一决雌雄。朱全忠

①② 《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一》。

通过抓获的蔡州谍者，得知秦宗权的计划，"遂谋济师焉"①，加快了扩军步伐。他派部将朱珍赴淄（治今山东淄博西南）、棣（治今山东惠民东南）2州，招募军队，10日之内，募得万余人。乘青州（今属山东）无备，偷袭获得战马千余匹及大批铠甲，增强了朱全忠的实力。

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自汴州发动大规模攻势，命大将张晊率军进至汴州城北的赤岗，秦贤率军屯于城西的板桥，各拥兵数万，"列三十六寨，连延二十余里"，声势浩大，威逼汴州。又命卢瑭进驻万胜（今河南中牟北），于汴水的两岸列寨，切断汴州运输通道。朱全忠对其部下众将说："彼蓄锐休兵，方来击我，未知朱珍之至，谓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击之。"②遂亲自领军攻城西秦贤寨，秦贤没有料到汴军会主动来攻，连失4寨，损兵万余人。朱全忠深知恶战还在后面，自己兵力仍然不足，于是，又派牙将郭言到河阳（今河南孟州东南）、陕（治今河南陕县）、虢（治今河南灵宝）等州招募万余人而归。

朱全忠兵力增强后，引兵进击在万胜的卢瑭军，利用大雾掩护，突袭其营寨。卢瑭军大败，赴汴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几乎全军覆灭，卢瑭投河自杀。秦宗权军连败，不敢再分散驻扎，诸军皆集于张晊营寨，屯于赤岗（在今河南开封东北）。朱全忠集中兵力进攻赤岗，大破张晊军，斩杀2万余人，追赶20余里才返归汴州。秦宗权闻知张晊大败，从郑州亲率精兵来会张晊，与朱全忠决战。

朱全忠见秦宗权亲来，自度兵力不足，向朱瑄、朱瑾求救。朱氏兄弟率大军列寨于汴州城外汴水之北，义成镇留后胡真也奉命引兵前来参加会战，4镇军队"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③。次日，诸军齐攻敌军营寨，大败秦宗权军，斩杀2万余人，缴获牛马辎重、器械无数。秦宗权、张晊当夜逃走，朱全忠等军追至阳武（今河南原阳）而还。秦宗权逃回郑州后，不敢停留，

---

①③ 《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一》。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十三》，僖宗光启三年四月。

“乃尽焚其庐舍，屠其郡人而去”①。洛阳、河阳、许、汝（治今河南临汝）、怀（治今河南沁阳）、陕、虢等州的秦宗权军队，得知其主大败逃走，“贼众恐惧，咸弃之而遁”②。朱全忠“乃慎选将佐，俾完葺壁垒，为战守之备。于是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③。招辑流亡，恢复生产等措施的实行，使朱全忠实力大增。而此战的失败，则使“（秦）宗权之势自是稍衰”④，在与朱全忠的斗争中由攻势转为守势。

（三）蔡州之战

先前秦宗权遣其弟秦宗衡率孙儒、张佶、刘建锋、马殷等将领，统兵万人渡过淮河，争夺淮南。由于汴州大败，担心朱全忠来攻，召秦宗衡回师增援蔡州（今河南汝南），孙儒见秦宗权势力衰落，知其必为朱全忠所灭，称病不行。秦宗衡再三催促，孙儒设计杀死秦宗衡，献首级于朱全忠。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留后赵德湮本秦宗权集团中人，见秦宗权屡败，也投降朱全忠，朱全忠以其为节度使，并奏改山南东道为忠义军。秦宗权众叛亲离，势力一蹶不振。

僖宗文德元年（888 年）正月，秦宗权部将石璠率兵万人攻掠陈、亳（今属安徽）2 州，被朱全忠部下大将朱珍、葛从周率军击败，并俘获石璠。于是，唐廷任命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取代时溥，这样朱全忠就取得了调遣诸镇军队的合法权力。

三月，朱全忠运粮于宋州，准备进攻蔡州，正好遇到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乐从训来求救⑤。朱全忠只好移军屯于滑州，遣朱珍率军去救乐从训，另以大将李唐宾率步骑 3 万进攻蔡州。不久，乐彦祯父子被罗弘信击败斩首，罗弘信自为魏博留后，赠送巨额

---

①②③《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一》。

④《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十三》，僖宗光启三年五月。

⑤ 文德元年（888 年）正月，魏博牙军发动兵变，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乐彦祯之子乐从训率军进攻，被罗弘信击败。四月，乐氏父子双双被杀。

钱财向朱全忠求和修好。朱全忠知事已无法挽回，只好召回军队，同意修好。五月，朱全忠亲统大军，会合李唐宾向蔡州大举进攻，在蔡州南面大败秦宗权军，攻下外城，秦宗权退守内城，汴军列28寨，把州城四面团团围住，日夜攻打。九月，由于汴军粮草缺乏，加之朱全忠认为秦宗权已衰弱不堪，不足为虑，遂退军。十二月，蔡州发生兵变，其部将申丛擒获秦宗权，折断其足后献于朱全忠，蔡州自此也为朱全忠所有。昭宗龙纪元年（889年）二月，朱全忠押送秦宗权至长安，斩首。

二、朱全忠与时溥、朱瑄、朱瑾争夺山东

（一）攻取徐、泗之战

光启三年（887年）闰十一月，唐廷命朱全忠兼淮南（治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朱全忠因忙于和秦宗权作战，遂以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率兵护送赴任。感化（治徐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时溥早就有意染指淮南，故对此事非常不满，当朱全忠致信时溥向其借道时，时溥不许。李璠等到达泗州后，遭到时溥军队的袭击，郭言率兵力战才得以脱逃，回到汴州。从此，两家结怨。

次年九月，朱全忠遣大将朱珍率兵5000人，送新任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刺史刘瓒赴任。时溥派兵截击，被朱珍等击败，连下沛（今属江苏）、滕（今山东滕州）2县，斩获万余人。时溥自统大军7万屯于吴康镇（今江苏丰县南），与汴军决战，被击败，并连失丰（今属江苏）、萧（今安徽萧县西北）2县。时溥退入徐州，不敢出战。朱全忠分兵进攻宿州（今属安徽），刺史张友不敢抵敌，携印投降，朱全忠命骁将庞师古率兵驻守，自回汴州。

龙纪元年（889年）正月，庞师古攻下宿迁（今江苏宿迁东南），进军吕梁镇（今江苏徐州东南），逼近徐州。时溥率军2万出战，逼庞师古军列阵，两军决战，汴军大胜，斩首2000余级，时溥退回徐州坚守不出。不久，萧县汴军发生内乱，朱全忠调庞

师古驻守萧县，以张绍光为刺史，守宿县（今安徽宿州）。次年，时溥求救于李克用，李克用遣其将石君和率500骑兵增援。四月，宿州裨将张筠发动兵变，赶走了刺史张绍光，投降了时溥。朱全忠率军讨伐，时溥出兵攻掠砀山（今属安徽），以牵制朱全忠军。朱全忠命其子朱友裕率军迎击，击败时溥军，杀3000余人，擒获河东援军将领石君和。

大顺二年（891年）八月，朱全忠命大将丁会急攻宿州，张筠坚守不出。丁会在城东筑堰，引沛水冲淹宿州城，张筠无法继续防守，只得开城投降。十一月，时溥部下骁将刘知俊率2000人，投降朱全忠，时溥势力更加衰弱。朱全忠连年进攻，使徐、泗、濠（治今安徽凤阳东北）等州人民不能正常生产，加之水灾频繁，时溥连吃败仗，难以支持，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说："必移镇乃可。"① 时溥同意。后又怕朱全忠有诈，遂反悔。时溥为了扩大生存空间，以便在徐州不能坚守的情况下，能在淮南有一个落脚地，遂出兵南下夺取楚州。杨行密遣其将张训、李德诚率军援救，击败时溥军，乘机夺取楚州，擒获朱全忠任命的刺史刘瓒。楚州地处淮南，而淮南是杨行密的势力范围，尽管杨行密与朱全忠不睦，但也决不允许他人染指淮南。故时溥此举受到了杨行密的抵制。

景福元年（892年）十一月，时溥所辖的濠州刺史张璲、泗州刺史张谏，皆以州降于朱全忠。时溥仅存徐州一地，危在旦夕，遂向泰宁节度使朱瑾求救。次年二月，朱瑾率军2万救援徐州，朱全忠派其将霍存与朱友裕合兵迎击，双方在徐州城南的石佛山会战，时溥、朱瑾大败，朱瑾率残兵退回兖州，霍存中流矢而死。朱全忠命庞师古代替朱友裕指挥进攻徐州，攻下徐州兵在石佛山的营寨，时溥固守城池不再敢出战。四月，朱全忠亲赴徐州督战，庞师古日夜攻城，徐州外援已绝，兵士疲惫，城池失陷，时溥率全家自焚而死。感化镇自此为朱全忠所有。

朱全忠攻取徐、泗，历时5年。以朱全忠之强，本不至于如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元年二月。

此耗费时日。但这个期间，朱全忠同时对朱瑄兄弟、李克用等强镇用兵，主要方向在于夺取天平、泰宁2镇，不能全力攻打时溥，故使这场战争拖延日久。时溥灭亡后，朱氏兄弟势孤，难以抵挡汴军的强大攻势，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攻取郓、兖之战

朱全忠依赖朱瑄、朱瑾兄弟的支援，在汴州大战中击败秦宗权。但此战刚刚结束，朱全忠就与这对朱氏兄弟翻了脸，找借口欲对他们用兵。史载："朱全忠欲兼兖、郓，而以朱瑄兄弟有功于己，攻之无名，乃诬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瑄复书不逊"。①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命朱珍、葛从周率军进攻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攻下后接着又进攻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双方在刘桥（今山东菏泽东北）会战，朱瑄、朱瑾战败，损失数万人，只身逃回郓州。朱珍遂围攻濮州，朱瑄遣其将朱罕率步骑万人前往救援，被朱全忠截击于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大败朱罕军。十月，朱珍攻克濮州，刺史朱裕逃到郓州。朱珍乘胜进攻郓州，朱瑄令朱裕诈降，约为内应，诱朱珍夜引兵入城，然后闭城聚杀，汴军被杀者数千人，大败溃逃。朱瑄乘势收复曹州。

昭宗大顺二年（891年）十二月，泰宁节度使朱瑾率军3万进攻单父（今山东单县），朱全忠命丁会领大军迎战，双方战于金乡（今属山东），朱瑾战败，损失2万余人。景福元年（892年）二月，朱全忠亲征郓州，先遣朱友裕率军屯于斗门（位于今河南濮阳境内）。朱瑄率步骑万余人袭击朱友裕，汴军败走。朱全忠不知朱友裕已败，领兵继续向斗门推进，至者皆为朱瑄军所杀。朱全忠急领兵后撤，到达瓠河镇（今山东鄄城东南）时，遭到朱瑄的袭击，汴军大败，其将张归霸在后面死战，朱全忠才得以逃走，节度副使李璠及都将数人皆被杀。

景福二年（893年）八月，朱全忠已消灭时溥，命庞师古移军进攻兖州，多次战败朱瑾。十二月，庞师古命葛从周攻齐州（治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十三》，僖宗光启三年八月。

今山东济南），朱瑄派兵增援，齐州兵力得到加强，防御严密，汴军不能得手。次年二月，朱全忠亲率大军进攻郓州，屯驻于鱼山（今山东东阿西南），朱瑄侦知，率军来战，朱瑾也来助战。两军列阵即将交战之际，东南风大起，汴军慌乱，忽然风向转为西北，朱全忠令顺风放火，当时遍地野草枯黄，风助火势，向兖、郓军阵地烧去，汴军乘势发动攻击，兖、郓军大败，被杀万余人，余众拥入清河，冲淹而死者不计其数。朱氏兄弟屡败，只好向河东李克用求救，李克用遣其将安福顺、安福庆、安福迁兄弟率精锐骑兵500名，渡过黄河增援兖、郓。乾宁二年（895年）正月，朱全忠遣其将朱友恭围攻兖州，朱瑄从郓州率军来援，朱友恭设伏以待，击败郓州兵，擒获河东将安福顺、安福庆。四月，杨行密攻陷濠、寿（治今安徽寿县）2州。李克用又遣大将史俨、李承嗣率骑兵万余，驰援郓州。朱友恭见兖、郓兵力加强，不敢再战，退回汴州。八月，朱全忠率亲军进攻郓州。事先设伏于梁山（今山东梁山南），命前军挑战，诱郓州兵追赶，前后夹攻，大败其军，朱瑄逃回郓州坚守不出。十月，齐州刺史朱琼遣使请降，朱全忠移军至兖州，接受了朱琼的投降。十一月，朱瑄遣大将贺瓌、柳存等率军万人，向曹州方向进击，欲调动汴军回救，以解兖州之围。朱全忠侦知后，领军先行到达钜野（今山东巨野）南，击败郓州军，生擒贺瓌等3000余人，除收降贺瓌外，其余全部斩杀，然后班师回汴。

昭宗乾宁三年（896年）闰正月，李克用见兖、郓危急，又遣大将李存信率军万余骑，借道魏博以救朱氏兄弟。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受朱全忠挑唆，发兵3万乘夜袭击河东军，李存信兵败，退回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这样，就使史俨、李承嗣等返回的道路断绝，后来朱氏兄弟败亡，他们便率军投奔淮南杨行密。淮南军善水战，不善骑射，得此精锐骑军后，军事力量大为增强。

李克用因魏博助朱全忠，大怒，率军进攻。朱全忠只留庞师古继续攻郓州，召葛从周回军救魏。李克用屡战不利，退回河东。葛从周遂渡过黄河，屯于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古黄河南岸杨

柳），再次进攻郓州，朱瑄出战，被击败，遂坚守不出。这时，朱氏兄弟除郓州、兖州外，所属城池丧失殆尽，李克用救兵又受阻于魏博，灭亡有日了。

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全忠大举进攻。朱瑄因兵少，不再出战，深挖壕堑引水以阻止汴军攻城。庞师古命搭浮桥进攻，桥成后庞师古亲率军先渡，直攻郓州。朱瑄知城已无法固守，遂携妻子弃城逃往中都（今山东汶上西）。葛从周领兵急追，擒获了朱瑄全家，送到汴州后斩杀。朱瑾因军粮缺乏，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等在徐州一带筹措粮食，留大将康怀贞守兖州城。朱全忠得知朱瑾不在兖州，遂命葛从周率军袭取。康怀贞得知郓州已失，知大势已去，开城投降汴军。朱瑾、史俨、李承嗣等遂率军投奔淮南杨行密。

天平、泰宁2镇覆灭后，淄、青节度使王师范势孤力单，被迫归附了朱全忠。至此，东方诸镇全被朱全忠所攻灭，今河南、山东之地尽归其所有。朱全忠势力大增，超过了河东李克用。

三、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河北

（一）朱、李矛盾的由来和河北的战略地位

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黄巢东撤至河南，朱全忠等难以抵挡，乞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克用击败黄巢后，朱全忠利用在汴州上源驿为他设宴庆功的机会，派兵想杀死李克用。在侍卫们的保护下，李克用仓皇逃出。从此，双方形成势不两立的水火之势。

上源驿事件并不是朱、李个人之间的恩怨问题。朱全忠是一个凶狠狡诈，野心很大的军阀，他要兼并土地，扩展势力，必然要想方设法消灭敌手，尤其是强大的敌手必须置于死地而后快。李克用的河东镇，在当时的诸镇中实力最强，所部“军势甚雄，诸侯之师皆畏之”①，是朱全忠将来争夺天下的强劲对手，当然要设

---

①《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武皇纪上》。

法铲除。李克用实力雄厚、英武善战，也极力扩张势力，兼并邻镇，争夺霸业，在农民军未镇压下去以前，他尚可以和其他藩镇联合，一旦形势有变，迟早要发生火并。清代学者王夫之说："朱温夜袭李克用，其凶狡固不待论，虽然克用、温之曲直，亦奚足论哉！盖克用、温自决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两立，犹之乎袁绍、曹操之争夺汉，沈攸之、萧道成之争夺宋也。故曰其曲直不足论也。"① 也认为上源驿事件的实质是两大强镇争霸的一次斗争。

李克用回到河东，本欲立即出兵复仇，其妻刘氏力谏，认为如此反倒理亏，主张奏请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上表唐廷申诉朱全忠之罪，请求下诏讨伐。唐廷因大乱始平，不愿大动干戈，凡事姑息，下诏为双方和解。朱全忠因要全力对付秦宗权，怕腹背受敌，也遣使以厚币卑词，向李克用谢罪。李克用因要与王重荣联兵入关中，对付朱玫、李昌符，只好暂置朱全忠于不顾。双方矛盾暂时缓和下去。

此后，双方势力均有较大发展，冲突不断加剧，争夺的焦点是河北地区，都以兼并或控制河北为目标，"河北归汴，则扼晋（指河东李克用）之吭；河北归晋，则压汴之脊"②，可见河北战略地位之重要。如朱全忠不占河北，直接入关中灭唐，"则克用会河东以牵河北，渡河以捣汴，而温（朱全忠）坐毙。克用入长安，则温率洛、蔡、山南以扣关，而燕、赵、魏、潞捣太原以拔其本根，而克用立亡"。所以双方"且畜力以求功于河北"③。

此外，河北的经济、军事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安史之乱前，河北就是唐王朝的重要财赋基地，无论人口、粮食生产、绢绵征收等，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史载："以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④ 可见其财富之丰足。安史之乱后，河北为藩镇所割据，赋税不入

---

① 《读通鉴论》卷二十七《僖宗七》。

②③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七《昭宗八》。

④ 《全唐文》卷三一六《安阳县令厅壁记》。

朝廷，割据者凭借这一物质力量，作为割据一方的经济基础。在军事上，河北民风强悍，果于耕战，连士人阶层也都“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①。“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②。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河北诸镇才能够连横以抗天下之兵，割据达一百几十年之久。朱、李双方如有一方能夺取或控制河北，则拥天下强兵，在战略上居优势地位，反之，则处于被动地位，不仅霸业难成，而且连生存也很难保证。

（二）争夺邢、洺之战

昭义镇原辖泽（治今山西晋城）、潞（治今山西长治）、邢（治今河北邢台）、洺（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磁（治今河北磁县）5州。中和四年（884年），李克用遣其弟李克修攻取潞州，唐廷即以泽、潞为一镇，以李克修为节度使，孟方立占据的河北邢、洺、磁3州，自为一镇，“昭义有两节，自此始”③。

邢、洺地处河北南部，西连河东泽、潞，南临相（治今河南安阳）、卫（治今河南卫辉），地理位置重要，为朱、李必争之地。李克用既得泽、潞，必然要攻取邢、洺。“（孟）方立倚朱全忠为助”④，拼死力拒。僖宗光启二年（886年）九月，李克修进攻邢州，大败孟方立军，斩获万人，擒其将吕臻，连下故镇（今河北武安境内）、武安（今属河北）、临洺（今河北永年）、邯郸（今属河北）、沙河（今河北沙河北）等城。孟方立向成德节度使王镕求救，王镕派兵3万驰援，李克修兵少，退回河东。

僖宗文德元年（888年）十月，孟方立派大将奚忠信率兵3万，袭击河东辽州（治今山西左权）。奚忠信分兵3路进击，李克修于险

---

① 《樊川文集》卷九《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

② 《樊川文集》卷五《战论》。

③④ 《新唐书》卷一八七《孟方立传》。

要之处伏兵以待，奚忠信前军全军覆没，李克修乘胜进击，大获全胜，活捉奚忠信，其所部3万军队逃脱者仅十分之二三。龙纪元年（889年）五月，李克用调动大军征讨孟方立，命大将李罕之、李存孝率领进攻磁、洺2州。六月，攻下2州。孟方立急派其将马溉、袁奉韬率军数万前去拒战，两军相会于琉璃陂（今河北邢台西南），孟方立军大败，二将皆被擒，晋军（李克用被封为晋王）乘胜围攻邢州。孟方立性猜忌，诸将怨忿，多不为所用，加之邢州被围、外援断绝，孟方立绝望，遂饮药自杀。其部下拥立其弟孟迁为留后，继续作战。孟迁向朱全忠求救，当时朱全忠正忙于征讨时溥，无全力救援，只派其将王虔裕率偏师协助守城。战至次年正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无法再守，孟迁只得扣押汴将王虔裕及其部下，向晋军投降。李克用命其将安金俊为邢、洺团练使，率军镇守，自己返回太原。

不久，安金俊奉命攻云州（治今山西大同），中流矢而死。李克用就以安知建为邢、洺节度使，统管3州。安知建暗中与朱全忠勾结，李克用侦知，即以骁将李存孝为邢、洺留后，代替安知建。李存孝和李存信均为李克用义子，李存孝为著名勇将，功勋卓著，李存信善于谄佞，嫉妒李存孝，常加谮陷，李存孝怨且惧。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十月，李存孝举3州降于朱全忠、王镕。李克用大怒，举大军围攻邢州。成德节度使王镕率3万人马援救，被李克用击败，损失万余人。李克用遂进攻镇州，王镕大惧，请以兵粮助攻邢州，李克用同意。邢州围急，城中食尽，李存孝出降，泥首谢罪。李克用回到太原后，把李存孝车裂处死。史载："存孝骁勇，克用军中皆莫及，常将骑兵为先锋，所向无敌，身被重铠，腰弓髀槊，独舞铁楇陷阵，万人辟易。每以二马自随，马稍乏，就阵中易之，出入如飞"①。李克用惜其才，临刑时以为众将一定会出面讨饶，然后顺水推舟，释放李存孝。哪知李存孝平素傲视同辈，诸将忌恨，竟无一人出面为其讨饶。李克用弄假成真，恼羞成怒，借题惩办了几个将领以泄忿，把与李存孝暗通的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乾宁元年三月。

另一勇将薛阿檀吓得也自杀了。“自是克用兵势浸弱，而朱全忠独盛矣”①。

此后，李克用在与魏博罗弘信、卢龙刘仁恭的作战中，由于朱全忠的相助，屡次失利。在争夺河北的战斗中，李克用明显处于下风，实力大为耗损。光化元年（898 年）四月，朱全忠联合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进攻李克用，在钜鹿（今河北巨鹿）击败晋军万余人。朱全忠命葛从周分兵攻洺州，斩刺史邢善益，攻下洺州。五月，葛从周攻下邢州，磁州刺史袁奉滔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磁州也为汴军占据。朱全忠遂命葛从周镇守 3 州，自己引兵返回汴州。

（三）争夺镇、冀之战

成德节度使王镕为王景崇之子，接替其父之位时，年仅 13 岁。当时天下诸镇以河东李克用最强，李克用与义武（治今河北定州）节度使王处存为姻亲。卢龙节度使李可举与王镕认为李克用必窥伺河北，义武那时必为己患，不如攻灭以分其地。于是，遂攻王处存。李克用派兵救援，击败成德军队，王镕以重赂结纳，以修好罢兵。晋军进攻邢、洺孟方立时，王镕常以刍粮相助。大顺二年（891 年）十月，孟方立灭亡后，李存孝因邢、洺与镇、冀（今属河北）、赵（治今河北赵县）等州相接，出兵进攻，在龙尾岗（今河北临城西北）大破王镕军，斩获万计，攻下临城（今属河北）。王镕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率军 3 万援救，李存孝退去。

景福元年（892 年），李存孝叛李克用，投靠朱全忠、王镕。王镕联合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共出兵 10 万，进攻尧山（今河北隆尧西南）。李克用遣其将李嗣勋率军迎击，大破幽、镇兵，斩获 3 万余人。李克用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合兵，乘胜进攻镇州，攻下天长镇（今河北井陉西南）。王镕出兵迎战于新市（今河北正定东北），击败晋与义武联军，李克用退屯栾城（今河北栾城西）。卢龙节度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乾宁元年三月。

使李匡威出兵攻云（治今山西大同）、代（治今山西代县）2州，李克用见河东危急，遂退回太原。次年李克用围攻邢州，击败王镕援军，进逼镇州，王镕遂又归附于河东。朱全忠由于正忙于攻并郓、兖，一时无力兼顾河北。

光化三年（900年），朱全忠已攻灭朱瑄、朱瑾兄弟，占据郓、兖之地，又击败晋军攻占了邢、洺、磁3州，实力雄厚，“兵强天下”，“乘胜北掠燕、赵”①，成德镇首当其冲。九月，汴军抵达镇州，攻其南门，焚毁关城。朱全忠本人也抵达元氏（今属河北），王镕大惧，遣使赴元氏见朱全忠请和，以其子王昭祚及大将子弟为人质，并赠缯20万匹。朱全忠许和，引军退走。

朱全忠征服成德后，遣大将张存敬率军继续北进，讨伐卢龙刘仁恭，连下数州，进攻幽州时，因道路泥泞不能前进，遂引兵向西进攻义武镇，攻下祁州（治今河北无极）。义武节度使王郜遣其将王处直率兵数万迎击，大败，死者过半。王郜见情况不妙，弃定州投奔河东李克用而去，军中拥王处直为留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派兵来救，遭汴军袭击，损失6万人。李克用派兵援救，受阻而回。王处直无奈，只得归附朱全忠，并以缯帛10万犒军。“由是河北诸镇皆服于全忠”②。

（四）争夺魏博之战

罗弘信自文德元年（888年）被拥立为魏博节度使以来，结好于河东李克用，对抗朱全忠。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十二月，汴将丁会、葛从周率军进攻魏博。渡过黄河后，连下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临河（今河南内黄西南），汴将庞师古、霍存攻下淇门镇（今河南滑县东南淇门）、卫县（今河南淇县东），朱全忠自统大军继后。次年正月，罗弘信屯军于内黄（今河南内黄西）以阻止汴军进攻。汴军五战五捷，斩首万余级。罗弘信知不可力敌，乃遣使请和，赠与厚币。朱全忠命停止攻掠，归还俘虏，退军。

---

① 《旧唐书》卷一四二《王镕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纪七十八》，昭宗光化三年十月。

“魏博自是服于汴”①。实际上罗弘信仍在汴、晋两边摇摆，曾多次允许晋军过境援助朱瑄兄弟和时溥。

乾宁三年（896年）闰正月，李克用遣其将李存信率军3万余骑，借道于魏博，去救援兖、郓的朱氏兄弟。军队驻于莘县（今属山东），军纪败坏，侵暴当地人民，魏人皆怨。朱全忠遣人对罗弘信说：“太原志吞河朔，回戈之日，贵道可忧。”②罗弘信遂发兵3万，夜袭晋军，李存信猝不及防，军队溃散，委弃资粮兵仗无数，退回洺州防守。“弘信自是与河东绝，专志于汴”③。李克用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四月，晋军攻洹水（今河北魏县西南），斩杀魏兵万余人，并乘胜进逼魏州（治今河北大名北）。朱全忠命葛从周率军救魏州，驻于洹水。六月，李克用发兵击葛从周军，葛从周命令于阵前多挖沟坎，战斗中李克用之子落落的坐骑遇坎失蹄，落落被擒，李克用亲往救助，马也失蹄，几乎为汴军所俘。李克用见子被擒，无心再战，请求修和，朱全忠不许，送落落给罗弘信，使其斩杀，这样就使晋、魏仇怨加深，而魏、汴之交更加巩固，朱全忠用心良苦，于此可见一斑。李克用遂退回河东。

九月，李克用再次派李存信率军进攻魏博，在宗城（河北威县东）北大败汴将葛从周，乘胜攻至魏州北门。十月，李克用亲自率军抵达魏州，大败魏军于白龙潭（位于今河北魏县境内），追至观音门（魏州西门）。朱全忠派葛从周率军援救，屯于洹水，自率大军继进。克用见汴军势大，遂率军退走。从此，罗弘信更加死心塌地追随朱全忠。光化元年（898年）九月，罗弘信死，其子罗绍威继位。次年，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攻魏州，罗绍威遣使与河东修好，并求救兵。李克用为在河北争得一立足地，急遣李嗣昭率军援救。在晋军未抵达以前，汴将葛从周已先出兵击败刘仁恭军，于是，罗绍威与河东再次断绝关系，李嗣昭只好引军退回。罗

---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纪七十四》，昭宗大顺二年正月。

②《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纪七十六》，昭宗乾宁三年闰正月。

绍威感朱全忠救助之恩，与其结为姻亲，依附更深。双方的这种关系，使朱全忠在战略上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他既可以以魏博为依托向北出击，又可以以魏博为屏障，使自己放心地向东、西发展，进守自如，左右逢源。

天祐二年（905年）七月，魏博牙军裨将李公佺率众谋叛，失败后逃往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罗绍威仅以身免。此次事件后，罗绍威深感牙军骄横，威胁太大，日夜忧虑，必欲除之而后安。魏博牙军骄横，由来已久。该军始置于田承嗣割据魏博时，已经一百余年，“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变易主帅，有同儿戏”①。罗绍威向朱全忠借兵，欲彻底铲除牙军。恰值罗绍威媳（朱全忠女）病死，朱全忠以会葬为名，选劲兵悍卒伪装成挑夫，暗藏兵器，前往魏州，大军随后继进。在罗绍威的配合下，把牙兵及其家属8000多户杀得“婴孺无遗”②。此事激起魏博境内军民的愤怒，纷纷起来抗击，历时半年才平定。

魏博牙兵是本镇的军事支柱，牙兵遭到屠戮，魏博军事力量空前衰弱，同时，此举也大失河朔人民之心。朱全忠在魏居住半年，“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罗绍威虽然摆脱了牙兵的威胁，却又落入朱全忠的控制之中，他后悔地说：“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③

（五）争夺幽、沧之战

光启元年（885年），卢龙（治幽州，今北京西南）节度使李可举与成德节度使王镕，商议瓜分义武镇，遣其将李全忠率军6万攻易州（治今河北易县）。李全忠战败，“恐获罪，收余众还袭幽州”④，李可举及全家自焚而死，李全忠遂为卢龙留后。李全忠死

① 《旧五代史》卷十四《罗绍威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三年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三年七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光启元年五月。

后，其子李匡威袭其位。景福二年（893 年），李克用攻镇州，王镕求救，李匡威率军赴援，其弟李匡筹自立为节度使。乾宁元年（894 年），李克用进攻卢龙，大败李匡筹军，李匡筹大惧，举族逃亡，途中被沧州节度使卢彦威击杀。李克用占据幽州，以李匡威部将刘仁恭为节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将十人典其机要，租赋供军之外，悉输晋阳”①。乾宁四年（897 年）七月，李克用欲进军关中，遣使征调卢龙军队，刘仁恭借故不派兵，李克用数次催促，刘仁恭不仅不发兵，还谩骂囚禁河东使者，并欲杀河东留在卢龙的戍将。李克用大怒，率军进攻幽州。两军在蔚州（治今山西灵丘）境内的木瓜涧交战，李克用骄傲轻敌，酒醉后胡乱指挥，导致晋军大败，损失大半。刘仁恭遂投靠朱全忠，对抗李克用。不过刘仁恭对晋、汴并不专一，对双方时降时叛，一切都以对己是否有利而采取行动，以保全自身，扩张势力。光化元年（898 年），刘仁恭派其子刘守文袭取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卢彦威逃走，刘仁恭据有沧、景、德 3 州，以刘守文为节度留后。刘氏父子势力一时膨胀。

昭宗光化二年（899 年）正月，刘仁恭调发幽、沧等州军 10 万，攻下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屠杀城中居民万余户。接着又进攻魏州，屯于城北。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求救于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将李思安、张存敬率军援救魏博，屯于内黄（今河南内黄西），朱全忠率中军驻于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刘仁恭遣其子刘守文和大将单可及率精兵 5 万进攻内黄。李思安派部将袁象先伏兵于内黄北的清水河边，自率精兵迎战于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引诱敌军追击，然后回兵猛击，伏兵攻其后，前后夹击，幽州兵大败，斩获 3 万人，并杀死单可及，刘守文仅以身免。单可及为幽州骁将，号“单无敌”，他的被杀，使幽州兵胆气尽丧。

刘仁恭不甘心失败，亲率大军进攻魏州北门，汴将葛从周率精锐骑兵 800 名事先已进入魏州，协助守城，遂与贺德伦出战。葛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纪七十七》，昭宗乾宁四年七月。

从周出城时，命令关上城门，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经过一场恶战，刘仁恭大败，其将薛突厥、王郃郎被擒。第二日，汴、魏合兵乘胜进击刘仁恭军，攻破其八寨，刘仁恭父子烧寨而逃。汴、魏军长驱直追，追至临清（今河北临西）时，永济渠拦住去路，幽州兵拥入渠中，淹死者不计其数。成德节度使王镕也出兵沿途截击，幽州兵伤亡惨重，“自魏至沧五百里间，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①。

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朱全忠遣葛从周率大军10万进攻刘仁恭。五月，攻下德州（治今山东陵县），杀刺史傅公和。包围刘守文于沧州。刘仁恭无奈只好遣使携厚礼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遣河东骁将周德威率5000骑，攻邢、洺以牵制汴军。刘仁恭亲率大军5万救沧州，驻于乾宁军（今河北青县）。葛从周留张存敬、氏叔琮继续围攻沧州，自领精兵迎战于老鸦堤（位今河北青县东南），大败刘仁恭军，斩首3万。刘仁恭退守瓦桥（今河北雄县东南）。七月，李克用见刘仁恭大败，又遣大将李嗣昭率兵5万，与周德威配合，猛攻邢、洺，并于内丘（今属河北）击败汴军。成德节度使王镕怕刘仁恭覆灭对己不利，遣使调解，朱全忠因沧州久雨，加之邢、洺危急，遂召回葛从周以救邢、洺。

八月，李嗣昭于沙门河② 大败汴军，乘胜进攻洺州。朱全忠急引兵援救，还未赶到，晋军已攻下洺州，擒刺史朱绍宗。九月，葛从周率军从邺县（今河北磁县东南）渡过漳河，朱全忠率中军3万渡过洺水，进逼洺州。李嗣昭见汴军势大，弃洺州而退，葛从周设伏于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口，截击晋军，大败李嗣昭军，晋军退回河东。

晋军败退后，朱全忠移兵攻成德，王镕屈服，归附于汴。朱全忠遂再次进攻刘仁恭。十月，连下景州（治今河北东光西北）、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纪七十七》，昭宗光化二年三月。

② 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纪七十八》，昭宗光化三年八月，胡三省注：“‘沙门河’疑当作‘沙河’，即邢州沙河县也。”

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北）。不到一月，汴军攻下20余城。由于从瓦桥到幽州的道路泥泞，不能前进，转攻义武。义武留后王处直战败，归顺朱全忠。

昭宣帝天祐三年（906年）八月，朱全忠因沧、幽对魏博威胁太大，决定先出兵进攻沧州。九月，朱全忠率军渡过黄河，抵达长芦（今河北沧州），刘守文坚守城池不出。刘仁恭率军援救沧州，屡次战败，下令境内男子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自备粮食、兵器充军，共收罗士卒10万，驻于瓦桥。刘仁恭虽屯兵瓦桥，然畏惧汴军，不敢进兵，沧州城中粮尽，人相食，朱全忠遣使劝刘守文投降，遭拒绝。刘仁恭见情况危急，遣使向河东李克用求救，前后往来者百余人。李克用恨刘仁恭反复无常，不愿发兵，其子李存勖劝道："此吾复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怀。且九分天下，朱氏今有六七，赵、魏、中山在他庑下，贼所惮者，惟我与仁恭尔，我之兴衰，系此一举，不可失也。"① 李克用遂出兵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并命刘仁恭也出兵会攻，刘仁恭遣部将李溥率军3万赴河东，会合周德威、李嗣昭所率晋军，共攻潞州。不久，昭义节度使丁会叛归晋军，潞州遂归河东所有。朱全忠闻潞州失守，烧毁辎重，引兵退走。刘仁恭父子再度转危为安。

纵观晋、汴对河北的争夺，朱全忠明显占了上风，河北在一个时期几乎全在其控制之下，李克用势力尽被驱逐，局限于河东一地。最后虽然刘仁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晋结好，但晋在河北的势力仍不能与汴相比。李克用争夺河北的失败，使其在战略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河东数面受敌，一度几乎为之不守。在唐末20余年的晋、汴斗争中，总的趋势是：李克用集团逐渐由强转弱，相对弱小的朱全忠集团，由于在河北的胜利，逐渐由弱变强，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直到朱全忠篡唐称帝后，倒行逆施，人心丧尽，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乘机发展势力，夺取河北，尤其是夺得魏博镇，情况才发生较大转机。

---

①《旧五代史》卷二十七《唐庄宗纪一》。

四、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河东

（一）河中之战

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正月，护国（即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王重盈死，军中推王重荣子王珂为节度留后。王重盈之子王珙、王瑶认为王珂非王重荣子（王珂为王重荣兄之子，过继给王重荣为子），厚结朱全忠、李茂贞、王行瑜等要求唐廷改派王珙为护国节度使。王珂为李克用女婿，有其支持，唐廷遂命王珂为河中留后。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等率兵入长安，“请以河中授珙、瑶，又连兵以攻河中”①。王珂求救于河东，李克用率军攻入绛州（治今山西新绛），斩王瑶。又移兵攻入关中，击败李茂贞、韩建，杀王行瑜，迫使昭宗正式任命王珂为护国节度使。

王珂与王珙争夺河中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乾宁四年（897年）三月，保义（治陕州，今河南陕县）节度使王珙率军攻王珂，王珂向李克用求救，王珙自知不敌，求援于朱全忠。朱全忠派大将杨师厚、张存敬率军援救，败河中兵于猗氏（今山西临猗）南。河东大将李嗣昭却在猗氏、张店连败陕州之兵，解了河中之围。光化元年（898年）十月，王珙与汴军合兵攻河中，王珂告急于李克用，李克用遣李嗣昭率军援救，在胡壁（今山西万荣西南）大败汴军，汴军退走。王珙与王珂之争，实际上成了晋、汴对河中的争夺。河中领蒲、绛（治今山西新绛）、慈（治今山西吉县）、隰（治今山西隰县）、晋（治今山西临汾）5州，地处今山西西南部，有池盐之利。控制河中，退可以保护河东腹心——太原，进可以控御关中，直捣陕州，威胁东都洛阳，故李克用势在必争。对朱全忠来说，河中也非常重要，在控制河北地区后，再夺取河中，则可以由南向北直捣河东腹心，和河北之兵配合，起到两面夹攻河

---

① 《旧五代史》卷十四《王珂传》。

东的作用，故他“欲先取河中以制河东”①。

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朱全忠决定出兵攻取河中。他认为河东、河中连衡沟通长安，像一条长蛇一样，攻取河中则如同斩断蛇之腰。朱全忠此举目的有二：一方面夺取河中，进而直捣河东，与李克用决战，这是军事目的；另一方面是想切断河东与长安的联系，达到自己独控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而建立帝业的政治目的。他命大将张存敬率兵3万渡过黄河，出含山路袭击河中②，自率大军随后进发。晋、绛2州缺乏防御准备，其刺史先后以城投降，朱全忠留兵2万守卫晋、绛，阻截河东援兵。王珂遣使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因晋绛已被汴军占领，无法进兵支援。王珂妻送书信给李克用，说“儿旦暮为俘虏，大人何忍不救！”李克用回答：“今贼兵塞晋、绛，众寡不敌，进则与汝两亡，不若与王郎举族归朝”③。王珂又向李茂贞求救，李茂贞按兵不动。二月，张存敬率军包围蒲州，王珂欲举族奔长安，由于黄河浮桥毁坏，人心离散，从者不应，王珂遂举城投降朱全忠。朱全忠以张存敬为护国节度留后，把王珂全族迁于汴州，后又迁往长安，途中遣人将其杀死于华州（治今陕西华县）。

（二）泽、潞之战

李克用占据泽州、潞州后，以其弟李克修为昭义节度使，治理颇有成效。李克用视察潞州，不问政绩，因供应不丰厚，大加谴责，打骂交加，李克修怨愤难平，竟然气死。李克用遂用李克恭为昭义留后，李克恭骄恣不法，不懂军事，搞得将士离心，军队不稳。大顺元年（890年）五月，李克用将进攻河朔地区，征兵于昭义。昭义原有精兵，号“后院将”，李克用命李克恭选其中最骁勇者500名，送到太原。李克恭命牙将李元审及军校冯霸率领，前往太原，行至铜鞮（今山西沁县西南），冯霸煽动兵变，击伤李元审。接着牙将安居受又在潞州发动兵变，杀死李克恭，冯霸回

---

①③《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纪七十八》，昭宗天复元年正月。

② 指从河阳至含口的道路，即从今河南孟州东南至今山西绛县西南。

兵又逐走安居受，以潞州归附于朱全忠。朱全忠命河阳节度留后朱崇节率军进入潞州，李克用遣大将康君立、李存孝率军包围潞州。

七月，朱全忠派葛从周增援潞州，利用夜色掩护冲破重围，进入潞州。又派李谠、李重胤、邓季筠率军攻泽州，遣张全义、朱友裕率军进至泽州北，为诸军后援。当时唐廷从宰相张濬议，讨伐河东，由孙揆出任昭义节度使，率兵讨伐。八月，孙揆被河东骁将李存孝在长子（今属山西）西谷活捉，押送太原处死。接着李存孝又受命率军救援泽州。九月，李存孝在泽州城外生擒汴将邓季筠，泽州刺史李罕之与李存孝前后夹击，汴军大败，斩获万余人，李谠、李重胤率残兵败逃，晋军追至怀州（治今河南沁阳）而返。李存孝引得胜之军进攻潞州，汴军不敢战，葛从周、朱友裕弃城逃走，晋军又收复潞州。

泽州刺史李罕之不满足一州之地，屡次请求李克用让其专掌一镇，李克用因此人是反复无常之徒，故婉言谢绝。李罕之心中不满，伺机而动。光化元年（898 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死，李罕之乘机引兵袭占潞州，请李克用予以确认。李克用大怒，遣使谴责，李罕之遂投降了朱全忠，并把当地的晋军将领押送汴州，请求增援。朱全忠表请唐廷任命李罕之为昭义节度使。

李克用命李嗣昭率军讨伐李罕之。李嗣昭袭取泽州，抓获李罕之家属，送往太原。次年，朱全忠命葛从周自河北攻入河东，氏叔琮出马岭（今山西太谷东南），进逼太原，以牵制晋军主力；命河阳节度使丁会出兵泽州，命大将张存敬率军救潞州。四月，葛从周攻下承天军（今山西阳泉东北），氏叔琮攻下乐平（今山西昔阳），进军榆次（今属山西），逼近太原。李克用急遣骁将周德威率军迎击。氏叔琮有骁将陈章，外号陈夜叉，为前锋将，自以为勇力无人可敌，对氏叔琮说："河东所恃者周杨五（周德威小名），请擒之，求一州为赏。"① 周德威微服挑战，先退以示弱，诱陈章

---

①《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纪七十七》，昭宗光化二年三月。

来追，奋起铁楇击陈章落马，生擒活捉，并乘胜进击，大败氏叔琮军，斩首3000级，氏叔琮弃营而退。周德威追出石会关（今山西太谷南昌源河上源东岸），又斩首千余级。葛从周见氏叔琮大败，遂引军退走。汴将丁会攻下泽州。五月，李克用命李君庆率兵围攻潞州，汴将张存敬、丁会合兵进击，大败晋军，解了潞州之围。

李克用深知泽、潞为河东门户，战略地位重要，又派李嗣昭率军攻取潞州。六月，李罕之病重，朱全忠命丁会前往代替，不久，又派葛从周代替丁会。七月，朱全忠召回葛从周，命贺德伦代守潞州。八月，李嗣昭军抵达潞州城下，并分兵夺取泽州，攻下天关井（位今山西晋城西南）。贺德伦闭城不战，李嗣昭日夜以铁骑环城巡逻，汴军不敢出城刍牧，城中粮尽。贺德伦利用夜色掩护，弃城逃往壶关（今属山西），被晋将李存审伏兵截杀，部队伤亡惨重。葛从周率军来援，见泽、潞已失，汴军大败，遂引兵退回河南。晋军夺回泽、潞后，李克用任命汾州刺史孟迁为昭义留后。

（三）**太原之战**（参见附图19）

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对河东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一举扫平李克用集团。他命氏叔琮率军5万入天井关，命魏博都将张文恭率军从磁州武安（今属河北）进军，葛从周会合成德镇军队从土门（即井陉口，位于今河北获鹿西南）进军，洺州刺史张归厚从马岭进军，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从飞狐（今河北涞源）进军，侯言率晋、绛、慈、隰等州兵从阴地关（在今山西霍州至灵石之间的汾河谷地）进军。数路大军齐进，声势颇大，河东诸将非降即逃。沁州刺史蔡训、都将盖璋投降，沁州为汴军所占，汾州刺史李瑭也以城投降。李存璋弃泽州逃走，氏叔琮占据泽州。接着又围攻潞州，节度使孟迁投降。河东戍将李审建、王周见形势不利，率步军万余，骑兵2000投降氏叔琮，使汴军顺利通过石会关，直趋太原。张归厚进攻辽州，刺史张鄂以城投降。成德军队自井陉进入河东，攻下承天军，与氏叔琮的军队烽火相应。

诸路汴军汇集太原城下，数次挑战，城中人心惶恐，李克用

亲自上城指挥，忙得竟顾不上饮食。当时，大雨连绵，城墙颓坏，晋军冒雨修补。李克用又命李嗣昭、李嗣源等将领，不时夜间出击，袭杀汴军。汴军人数众多，道路泥泞，粮草供给不足，士卒多患疾病，朱全忠见太原一时难以攻下，只好下令诸军撤退。五月，氏叔琮自石会关退军，周德威、李嗣昭率精锐骑兵追击，杀获颇多。晋将李存审攻下汾州，斩刺史李瑭。其余失地也陆续为晋军收复。

氏叔琮撤退经潞州时，奉命把孟迁全族迁往汴州，朱全忠即以丁会守潞州。不久，正式任其为昭义节度使。

次年二月，李克用命李嗣昭、周德威率军攻下慈、隰等州，进逼晋、绛，朱全忠遣朱友宁率军会同晋州刺史氏叔琮迎击。李嗣昭攻下绛州，又为汴将康怀贞夺去，李嗣昭率军退屯蒲县（今属山西），汴军10万余众进驻蒲县南，与晋军对垒。氏叔琮夜率军切断晋军归路，晋军慌乱，营垒被攻破，被斩杀万余人。三月，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发动攻势，列阵10里，拥军10万，而晋军不过数万，众寡悬殊，人心汹惧。周德威出战不胜，密令李嗣昭率后军先退，自率骑兵随后退去。汴军长驱直追，晋军溃散，兵仗辎重丢弃几尽，李克用之子廷鸾被生擒。李克用见李嗣昭、周德威等败，遣李存信率亲军迎击汴军，在清源（今山西清徐）与汴军相遇，李存信见汴军势大，知难以取胜，领军退回太原。汴军重又夺取慈、隰、汾3州。

数日后，汴军抵达太原，进攻西门，城中军队未集，人心浮动。氏叔琮攻城甚急，每次围攻，“褒衣博带，以示闲暇”①。李克用昼夜上城指挥防御，不得寝食。李克用见形势危急，召集众将商议战守之策。李嗣源、李嗣昭、周德威力主坚守，李存信却说：“关东、河北皆受制于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筑垒穿堑环之，以积久制我，我飞走无路，坐待困毙耳。今事势已急，不若且入北虏，徐图进取。”李克用夫人刘氏素有主见，劝李克用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纪七十九》，昭宗天复二年三月。

"存信，北川牧羊儿耳，安知远虑！王常笑王行瑜轻去其城，死于人手，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鞑靼，几不自免，赖朝廷多事，乃得复归。今一足出城，则祸变不测，塞外可得至邪！"① 李克用遂打消弃城念头。数日后，溃兵逐渐返归。李克用弟李克宁原赴忻州（今属山西）任刺史，知太原被围，亦率军返回，太原城中人心始稳。

朱全忠见太原一时不能攻下，返回河中，遣朱友宁率军西击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留氏叔琮等继续围攻太原。李克用见朱全忠离去，派李嗣昭、周德威等率敢死队，多次夜入汴军营寨，袭击骚扰，汴军惊扰，日夜备御，不得安宁。不久，汴军中流行大疫，士卒患病者甚众，氏叔琮只好引兵撤退。李嗣昭、周德威率兵追赶，又收复慈、隰、汾 3 州。

太原之围虽解，李克用因兵少力疲，数年之内不敢与朱全忠相争。其子李存勖建议说："物不极则不返，恶不极则不亡。朱氏恃其诈力，穷凶极暴，吞灭四邻，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舆，窥觎神器，此其极也，殆将毙矣！吾家世袭忠贞，势穷力屈，无所愧心。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②。劝李克用积蓄力量，冷眼旁观，等待有利时机，以图反攻。

果然，形势正像李存勖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天祐元年（904 年），朱全忠派人杀死昭宗，消息传到潞州，昭义节度使丁会率将士着孝服痛哭流涕，始有叛朱之心。天祐三年（906 年），朱全忠率军攻刘仁恭父子，包围沧州。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遂命周德威、李嗣昭率军攻潞州，丁会举全军归降晋军，潞州重新归于河东。丁会见李克用时说："会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会虽受其举拔之恩，诚不忍其所为，故来归命耳。"③ 朱全忠在沧州前线，闻知潞州失守，大惊，怕晋军进攻河南腹心之地，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纪七十九》，昭宗天复二年三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三年闰十二月。

狼狈烧营而退，损失颇为惨重，"威望大沮"①。而河东占有潞州，形势稳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五、朱全忠统一中原的军事特点

朱全忠最初实力并不强大，他出任宣武节度使，赴任时仅带领数百名军人，不仅不能与实力雄厚的秦宗权相比，就是当时中原任何一个藩镇的力量都比他强大。然而，经过20余年的争霸战争，他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仅兼并了一个又一个藩镇，还击败了势力强大的李克用集团，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除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外，从军事角度看，其特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朱全忠采取了联合一批、消灭一个、平定一方、再图他方的战略方针。黄巢从长安撤出到达河南后，他自知不敌，遂联合中原诸镇，尤其是联合了河东李克用，共同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对付秦宗权时，他联合了赵犨、朱瑄、朱瑾等镇。秦宗权灭亡后，他便把矛头指向原来的盟友朱氏兄弟，有步骤地兼并东方四镇，然后控制魏博，北上争锋，基本上做到平定一处，稳定一处，逐渐地扩充实力与地盘。

2、朱全忠从不四面出击，也不千里跋涉，借道远征，而是以河南为根本，先吞并邻道，然后再及其余。这样，胜则可扩充地盘，败则全师而返，不至于伤及元气，因而得多失少。比如，唐廷任命他兼任淮南节度使，他命李璠为淮南留后，代替自己南下赴任，当杨行密对此加以抵制时，朱全忠并不负气劳师远征淮南，与杨行密争一日之短长，而是就此罢手，把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山东方面。在这方面李克用正好相反，他自恃实力雄厚，拥有沙陀铁骑，往往四面出击，假道于人，劳师远征，致使李存信遭袭于魏州，史俨、李承嗣援郓失利后，投奔淮南，削弱了自身的力量。李克用恃强的结果，胜则不能收其土地财赋，败则损失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太祖开平元年正月。

巨大的兵员与物资，朱、李双方力量的转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朱全忠精于谋略，每战能集中优势兵力，确定一个攻击目标，不两面作战，分散兵力。如他进攻兖、郓时，顾虑到魏博罗弘信袭击其后方，“每岁时赂遗，必卑辞厚礼。弘信每有答贶，太祖（朱全忠）必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指罗弘信）比予有倍年之长，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故弘信以为厚已”①。遂不袭扰汴军后方，使汴军能专力进攻朱氏兄弟。再如朱全忠讨伐淄青王师范时，尽管此时他的势力正处于顶峰，实力完全能够应付两面作战，但他还竭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朱全忠上奏昭宗说：“克用于臣，本无大嫌，乞厚加宠泽，遣大臣抚慰，俾知臣意。”想通过唐中央来安抚李克用，暂时缓和朱、李双方的矛盾。李克用也深知朱全忠此举的真实意图，说：“贼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后耳！”② 尽管如此，李克用终究还是没有出兵牵制汴军，虽然可能有一些其他因素，朱全忠的这种策略不能不说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李克用在这方面则明显逊色得多，他经常恃强同时数面作战，故屡遭败衄。他在与汴军的争霸战争中，屡屡失利，不得已遣使送书求和，以求喘息，但在书信中却措词不恭，致使朱全忠拒绝和议，使晋军疲于奔命。

4、在作战部署上，朱全忠往往采用数路进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的打法，在许多情况下，都部署有预备部队，分梯队发动攻击，避免孤军深入或者兵力过分单薄。如景福二年（893年），进攻朱氏兄弟，朱全忠命庞师古攻兖州，葛从周攻齐州，自率大军攻郓州，使对方首尾不能相顾，获得大胜。天复元年（901年），进攻河东李克用，朱全忠命氏叔琮、张文恭、葛从周、张归厚、王处直、侯言等将，率军从数个方向进攻河东，仅从河北就出动3路大军（详见本章第二节第四项），分别进攻潞州、太原、蔚州，其

① 《旧五代史》卷十四《罗绍威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十》，昭宗天复三年二月。

他诸路从西北、北、东北方向，直趋太原，使河东各地军队相互不能策应，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朱全忠率部为总预备队，策应诸路大军。汴军声势浩大，兵力雄厚，势如破竹，河东诸将非逃即降，太原几乎为之不守。此战虽未彻底消灭河东镇，但也使李克用数年不敢与汴军争锋。

此外，朱全忠在河南采取了安抚流亡、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收到相当的效果。尤其是张全义，在洛阳推行这个政策最为坚决，使得当地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生产发展，故朱全忠军食充足，后方安定，有力量兼并他方。

第三节　南方藩镇兼并战争

唐末农民战争失败后，全国处于混乱之中，南方各地也逐渐摆脱了唐廷的控制，大小军阀盘踞一方，争城夺地，战无宁日，江淮、剑南、两浙、荆湖、福建、岭南等地都陷入战乱之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江淮残破尤甚。经过激烈的争夺，王建夺取了两川地区，王潮、王审知夺取福建，杨行密夺取江淮，钱镠夺取两浙，马殷夺取湖南，各自建立了割据一方的封建政权。

一、王建夺取两川之地

（一）两川之乱与王建入蜀

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派部将高仁厚镇压韩秀升起义时，许以事成后保奏为东川节度使。东川节度使杨师立本来就不十分满意陈敬瑄所为，闻此讯后更加忿怒。僖宗中和四年（884 年），杨师立被授为右仆射，免去节度使之职。杨师立大怒，杀死官告使和监军，举兵讨伐陈敬瑄。陈敬瑄派高仁厚率兵抗击。高仁厚很快攻下鹿头关（今四川绵竹东南），包围梓州（治今四川三台），采用分化的办法，促使杨师立部将郑君雄发动兵变，杀死杨师立，开城投降。高仁厚遂被任为东川节度使。

次年，僖宗率百官离开成都，返回长安。陈敬瑄又怀疑高仁厚有二心，借故攻杀。唐廷另委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两川从此互相猜忌，经常发生摩擦。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在朝中失势，自请为西川监军使，入蜀依靠陈敬瑄，大宦官杨复恭挤走田令孜，专擅朝政，欲排斥田令孜党羽，把其义子们，即神策军五都都将外任为诸州刺史，其中王建为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刺史。利州隶属于山南西道管辖，节度使杨守亮忌王建骁勇，恐其难制，屡次召见欲加以杀害。王建惧而不受命，遂招纳亡命，有众8000余人，进攻阆州（治今四川阆中），攻下后又转攻利州，刺史王珙不敢拒敌，弃城逃亡。王建占据2州，所至之处烧杀抢掠，杨守亮不能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本为神策军将，与王建相识，经常遣人慰问，并赠以军需钱帛，故王建不侵扰东川。陈敬瑄见王、顾交好，恐联合对付自己，非常忧虑。田令孜告陈敬瑄说，王建是自己义子，只要以书信召其到西川，定会从命。陈敬瑄大喜，遂遣使携田令孜书信召王建入西川。王建见信大喜，说："监军阿父（指田令孜）遣信见招，仆欲诣成都省阿父，因依陈太师（指陈敬瑄）得一大郡，是所愿也。"① 乃留家属于梓州，率3000精兵前往成都（今属四川）。行至鹿头关，有人对陈敬瑄说："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为公下乎？"② 陈敬瑄又反悔，遣使阻其入关，并且增修守备。王建大怒，纵兵破关而入，攻入西川境内，从此两川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王建，河南舞阳（今属河南）人，世为饼师，少年无赖，屠牛盗驴，贩卖私盐。唐末，应募从军，隶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率忠武军8000人与黄巢部将朱全忠战于襄（治今湖北襄樊）、邓（治今河南邓州），王建作为军校也曾参加。后杨复光将其军改编为8都，每都千人，王建、韩建、鹿晏宏等皆为都将。杨复光死后，鹿晏宏率8都兵攻略山南西道，赶走节度使牛丛，鹿晏宏得

---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建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十三》，僖宗光启三年十一月。

以继任其职。鹿晏宏忌王建、韩建，欲加以杀害，2 人遂率兵 3000 人奔赴成都。僖宗大喜，分其部为 5 都，王建等仍为都将，扈卫僖宗。田令孜为扩充个人势力，收王建等为义子，把其部号“扈驾五都”，黄巢义军失败后，遂随同僖宗回到长安。田令孜失势，王建等均被排斥出朝廷，充任外州刺史。

（二）王建攻占西川

王建攻入鹿头关，在绵竹（今属四川）击败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刺史张顼，攻破汉州，进军学射山（位今四川成都东北），又击败西川将句惟立，攻下德阳（今属四川）。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任其弟顾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王建攻成都。连攻 3 日，不能攻下，遂退兵于汉州。“月余，大剽蜀土，进逼彭州，百道攻之，敬瑄出兵来援，建解围，纵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①。

王建见成都一时难以攻下，上表朝廷请另派重臣为帅，明令讨伐陈敬瑄，欲倚天子之重，夺取西川。顾彦朗也惧王建强盛将来会攻略东川，上表请赦王建擅自攻略之罪，并请调走陈敬瑄，另命他人，以安两川。唐廷遂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代替陈敬瑄。陈敬瑄拒不受命，唐廷命韦昭度为招讨使，统率山南西道、东川军队讨伐陈敬瑄。又割西川的邛（治今四川邛崃）、蜀（治今四川崇庆）、黎（治今四川汉源西北）、雅（治今四川雅安）等州，另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并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随韦昭度讨伐陈敬瑄。

昭宗龙纪元年（889 年）正月，王建大破西川将山行章于新繁（今四川新都西北），杀获万人，山行章退屯濛阳（今四川广汉西），与王建军相持。次年五月，王建因邛州为永平军治所所在，仍由陈敬瑄军占据，于是移军转攻邛州。陈敬瑄急遣大将杨儒率兵 3000 助邛州刺史毛湘守城，毛湘出战，屡败。杨儒见王建军势大，遂率所部军出城投降，王建收为义子，更名王宗儒。王建留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建传》。

兵继续围攻邛州，自率大军回攻成都。毛湘为田令孜亲吏，见王建军攻势猛烈，救兵不至，知城不可守，又不愿亲降，遂命部将任可知斩其首出降，接着蜀州守将也向王建投降。陈敬瑄把其军队布置于成都外围的犀浦（今郫县东南）、郫县（今属四川）、导江（今四川都江堰东）等县，意在保护西北通道，以备万不得已时逃向吐蕃避难。又命成都城中每户抽一丁，“昼则穿重壕，采竹木，运砖石；夜则登城，击柝巡警，无休息”①。置征督院，专门搜刮民财，以供军用。韦昭度军驻于唐桥（位于今四川成都东南），王建军驻于成都东闾门外，攻打甚急。大顺二年（891年）四月，成都被困日久，粮尽，“饿殍狼藉，军民强弱相陵，将吏斩之不能禁，乃更为酷法，或断腰，或斜劈，死者相继而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惧。吏民日窘，多谋出降”②。

唐廷因三年用兵，“馈运不继”③，下令罢兵，恢复陈敬瑄官爵。王建认为大功垂成，不愿罢兵，上表唐廷请召韦昭度还朝，由自己率军独自攻城，意在夺西川为己有。韦昭度既不能制约王建，又无朝命召其还朝，犹豫未决。王建一方面劝韦昭度早回长安，一方面命人捉获韦昭度亲吏，诬以盗窃军粮之罪，在招讨使行府门前，“脔食之”④。韦昭度大惧，称病还朝，把印节授于王建，令其兼行招讨使之职。

王建赶走韦昭度，独掌军事大权，积极部署军事，加紧围攻成都。多次派人混入城中，散布谣言，动摇人心，了解军情，城中虚实尽知。这时，陈敬瑄所辖州县除成都外尽为王建所夺，出则战败。威戎军（治彭州，今四川彭县）节度使杨晟时常供给军粮，王建出兵攻占新都（今属四川），切断其粮道后，成都供给完全断绝，“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应”⑤，军心已乱，人无斗志。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纪七十四》，昭宗大顺元年正月。

②④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纪七十四》，昭宗大顺二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纪七十四》，昭宗大顺二年二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纪七十四》，昭宗大顺二年八月。

田令孜见局势如此，知城已无法再守，遂自携四川节度使印节出城，交给王建，陈敬瑄随后也开城投降。王建自立为西川节度留后。先前，王建为鼓励士卒攻城，许诺破城后金帛子女可以任意掠取，这时又对将士说："吾与汝曹三年百战，今始得城，汝曹不忧不富贵，慎勿焚掠坊市。"① 严明军纪，犯者斩首。对于原陈敬瑄部下将吏，有才干者皆妥善安置，人尽其才，故西川局势平稳，为其日后夺取东川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王建夺取东川

大顺二年（891 年）九月，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死，唐廷以其弟顾彦晖继任其职。王建早就觊觎东川，企图兼并，因与顾彦朗有旧交，没有马上实施。顾彦朗死后，王建与顾彦晖"交情稍息"②，遂加紧兼并东川的行动。是时，杨复恭失势，逃出长安，往兴元（治今陕西汉中）投靠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发动叛乱，调兵进攻东川。顾彦晖不敌，求援于王建。王建遣将率兵击退杨守亮军，密令他们在顾彦晖前来劳军时，扣押为人质，一举吞并东川。然事机不密，为顾彦晖所侦知，遂称病不去劳军，王建计谋落空。从此，两川形同水火。

顾彦晖受到杨、王两方威胁，力不能敌，转而求援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李茂贞本有扩张野心，趁机遣将入川与王建争夺蜀地。王建屡次挫败李茂贞部和杨守亮部，并迫使顾彦晖与李茂贞断绝关系，重新与西川修好。昭宗乾宁元年（894 年），王建攻克彭州，斩节度使杨晟，实力更加雄厚。

次年，唐廷讨伐李茂贞，王建以东川不勤王赴难为名，出兵讨伐，实则欲攻取东川。十二月，西川兵大破东川兵于楸林，斩获数万。通州（治今四川达县）刺史李彦昭率兵 3000 人，投降王建。三年正月，王建部将王宗夔攻下龙州（治今四川平武东南）。次月，果州（治今四川南充东北）刺史张雄投降王建。乾宁四年（897 年）二月，王建再次大举进攻东川，命其将华洪、王宗祐率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纪七十四》，昭宗大顺二年八月。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建传》。

兵5万进攻，在玄武（今四川中江）大败凤翔将李继徽部。李茂贞遣部将李继昭率兵救援梓州，留偏将守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为王建部将王宗播击败并擒获，凤翔兵归路遂断绝。

五月，王建增兵5万，亲自率领，进攻东川。六月，王建攻下梓州南寨，捉获守将李继宁。王建还采取分化之策，断绝梓州外援，使顾彦晖更加孤立。十月，遂州（治今四川遂宁）守将侯绍率军2万，合州（治今重庆合川）守将率千人，凤翔将李继溥率兵2000人，皆降于王建。顾彦晖势力更加衰弱，自知难以持久，遂自杀。王建攻下梓州后，命部将分兵攻昌（治今重庆大足）、普（治今四川安岳）等州，尽占东川之地。

王建占据两川后，利用李茂贞与朱全忠交战，势力大受削弱之机，分兵攻取兴元，并尽占山南西道各州。后又攻占李茂贞的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北）、凤（治今陕西凤县东北）、成（治今甘肃成县）、陇（治今陕西陇县）等州。李茂贞力弱，不能与之抗衡。有人劝王建乘机攻取凤翔，消灭李茂贞，王建不予采纳。他认为"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复增岐下。茂贞虽常才，然名望宿素，与朱公力争不足，守境有余。韩生所谓入为捍蔽，出为席藉是也。适宜援而固之，为吾盾卤耳"。① 其目的在于以李茂贞为自己屏障，免遭东方诸镇侵扰。至此，王建非但拥有两川，并且还夺得今汉中、陇南之地，使这一地区逐渐趋于社会安宁、平稳，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

二、王潮、王审知夺取闽地之战

（一）王潮、王审知率兵南下

僖宗光启元年（885年），秦宗权部将王绪率兵5000人闯入福建。王绪，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黄巢义军攻下两京时，其占据固始自称将军，后投靠秦宗权，被任为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刺史。秦宗权屡次征其赋租，王绪不堪诛求，甚为怨恨，不愿供给。秦宗权大

---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建传》。

怒，发兵攻击，王绪无力拒敌，乃率所部军队，驱吏民渡过长江，企图在南方寻求安身之地。他命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治今江西九江）、洪（治今江西南昌）、虔（治今江西赣州）等州，又折入福建，攻下汀（治今福建长汀）、漳（今属福建）2 州。王绪部对攻占之地，并不久留，往往洗劫一空而去。到漳州后，由于道险粮少，王绪下令军中不准再携带老弱者，违者斩首。部将王潮兄弟三人共奉老母董氏从军，不忍舍弃，苦求于王绪，王绪大怒，欲斩其母，将士哀求方免一死。王绪性残忍猜忌，有人对他说军中有王者之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逾己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连其妹夫刘行全也不能幸免，军中人人自危，说：“行全，亲也，且军锋之冠，犹不免，况吾属乎！”① 行至南安（今福建南安东），王潮与将士密谋，擒杀王绪，众推王潮为主，自称将军。

王潮，光州固始人，出身农家，唐末为本县县佐，王绪占据固始时，署为军正。王潮被推为主后，率军欲北返光州，与部属相约，所过秋毫无犯，得到沿途人民的拥护。当时泉州（今属福建）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人民怨忿，“闻潮略地至其境，而军行整肃，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②。王潮于是率军包围泉州，攻打一年有余，破城杀廖彦若。王潮知福建观察使陈岩素有威名，不敢轻犯福州（今属福建），请求归附，陈岩遂表王潮为泉州刺史，于是王氏兄弟在福建得到了比较优裕的安身地。王潮沉勇有智谋，在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③。不久，扫平狼山薛蕴，兵锋日盛。

（二）王潮、王审知攻取福州之战

昭宗大顺二年（891 年），福建观察使陈岩病危，遣使召王潮来福州，欲授以军政大权。未至，陈岩病死，其妻弟都将范晖自称留后，占据福州。范晖骄侈横暴，大失民心。景福元年（892 年）二月，王潮遣部将王彦复、王审知率军进攻福州，久攻不下，王审知请求撤兵，王潮不许。次年四月，范晖遣使向浙东的威胜

---

①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僖宗光启元年八月。

② 《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

节度使董昌求救，董昌调发温（今属浙江）、台（今属浙江）、婺（治今浙江金华）等州兵5000人，救援福州。王彦复、王审知见救兵即将临城，亲犯矢石，督率士卒加紧攻城。五月，城中食尽，范晖见无法继续防守，乘夜弃城逃走。浙东援军见城已失陷，也返回本境。王潮入福州，自称福建留后。不久，汀、漳（治今福建漳州）、建（治今福建建瓯）3州投降，岭海间的20余股农民军也归降了王潮，"由是尽有闽、岭五州之地"①。唐廷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以王审知为副使。"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②。

乾宁三年（896年），唐廷改福建为威武军，任王潮为节度使。次年，王潮病死，其弟王审知继任，继续其兄统治政策，"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③，故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王审知还礼贤下士，多方延揽人才，北方衣冠避乱移居福建者甚多。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④，故福建人才辈出，文化教育得到较快发展。

三、杨行密夺取江淮之战

（一）广陵之战

杨行密，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少时孤贫，有膂力，能日行300里，曾为盗被获，刺史奇其状貌雄伟，释而未问。秦宗权扰江淮时，行密应募为州兵，初为队长，后"乃自募百余人，皆𧇊勇无行者"⑤，以为骨干。都将忌其能，排挤外出戍守，临行前刺杀都将，举兵为乱，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刺史郎幼复不能制，以符印相转授，弃城而去，唐廷遂任杨

①③《旧五代史》卷一三四《王审知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昭宗乾宁元年十二月。

④《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

⑤《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杨行密传》。

行密为庐州刺史，隶属于淮南节度使高骈。

高骈昏庸，信任妖人吕用之，军政混乱，淮南牙将毕师铎惧为吕用之所害，联合秦宗权部将秦彦，攻陷广陵（今江苏扬州）。杨行密不服秦彦、毕师铎的作为，兴兵讨伐，攻入广陵，秦、毕战败逃走。杨行密自称淮南留后，得广陵，“城中遗民才数百家，饥羸非复人状”①。杨行密不等城外辎重运入城中，即以军粮赈济饥民。秦宗权遣其弟秦宗衡、部将孙儒率兵万人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广陵。光启三年（887 年）十一月，秦宗衡军抵达广陵城西杨行密旧寨，其辎重未运入城者全部失落。秦彦、毕师铎部也奉秦宗衡之命，齐聚广陵城下，形势对杨行密极为不利。不久，秦宗权召秦宗衡率兵回蔡州（治今河南汝南），以拒朱全忠。孙儒称病不愿返回，秦宗权多次催促，孙儒大怒，设计杀死秦宗衡，传首于朱全忠。孙儒分兵攻掠邻近州县，军队人数增加到数万人，由于缺乏军粮，遂与秦彦、毕师铎部联合，袭取高邮（今属江苏）。

孙儒攻下高邮，守将张神剑率残兵逃到广陵。杨行密恐孙儒进攻海陵（今江苏泰州），命镇将高霸率兵撤到广陵，于是海陵数万户民弃资产，焚庐舍迁入广陵，使广陵城内的人口、军队数量有所增长。由于张神剑、高霸等人反复无常，心怀两端，杨行密将其斩首，又族灭了吕用之、张守一等人。

由于广陵残破不堪，又为孙儒所必争，杨行密命延陵宗率 2000 人回守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命部将蔡俦率兵千人及大批辎重返归庐州，作好从广陵撤退的准备。文德元年（888 年）四月，这时孙儒已杀秦彦、毕师铎等人，独领其军，回攻扬州（即广陵），杨行密因众寡悬殊，遂弃城逃到庐州。庐州是杨行密旧治所在，他以此地为基地，另谋发展。

（二）宣州之战

杨行密回到庐州，与部下商议发展方向，打算向西攻入洪州（治今江西南昌），谋士袁袭说：“钟传新得江西，势未可图，而秦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十三》，僖宗光启三年十月。

彦之入广陵也，召池州刺史赵锽委以宣州。今彦且死，锽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为人非公敌，此可取也。”① 杨行密认为可行，派人携厚礼劝说占据和州的孙端和上元（今江苏南京）的张雄，从采石渡江，向宣州（今属安徽）进攻。自率大军从糁潭（在今安徽铜陵北，长江西岸）渡江，直取曷山（今安徽当涂西南）。命部将蔡俦驻守庐州。

文德元年（888年）八月，杨行密率军到达曷山，这时孙端、张雄已被击败，赵锽军斗志正旺，其将苏塘、漆朗领兵2万屯守曷山。袁袭又向杨行密建议：“坚壁自守，彼求战不得，谓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② 杨行密依计行事，乘其军戒备松懈之机，纵兵出击，大败宣州兵，进围宣州城。赵锽兄赵乾之从池州（治今安徽贵池）率军来援，杨行密派部将陶雅于九华山（在今安徽青阳南）截击，大败其军，并攻下池州。

次年六月，宣州被围已久，城中食尽，人相食，赵锽部将周进思举城投降，赵锽逃向广陵，中途被杨行密部将田頵擒获，后斩首。杨行密占据宣、池等州，不但有了立足之所，而且先后获得了一批人才，如安仁义，沙陀骑将，骁勇善战；原赵锽部将周本，勇冠三军；李德诚原为赵锽谋士，杨行密妻以宗女。这些人对杨氏创业都起了积极作用。唐廷任杨行密为宣州观察使。不久，杨行密遣田頵、安仁义、李神福等将，攻取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润（治今江苏镇江）等州。大顺元年（890年），又攻取滁（今属安徽）、和（治今安徽和县）2州③，积蓄力量，安定百姓，准备对付孙儒进攻。

孙儒遣将攻下庐、常、润等州。由于广陵残破，“亦不能守”④，乃举众渡江南下，从润州向南推进，田頵、安仁义屡屡战败，杨行密所占的城镇纷纷被攻下，士卒望风溃奔。孙儒部将李从立之军突至宣州东溪（今安徽宣州东南）。杨行密以疑兵之计，迫其退

---

①③④ 《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十三》，僖宗文德元年八月。

去。孙儒另一支军队进至溧水河（位今江苏溧水境），杨行密遣李神福率军抵御，李神福佯退，作出怯战之状，然后乘其不备，夜率精兵突袭，斩首千余。孙儒自率大军进至黄池（今安徽芜湖东北），杨行密遣其部将刘威、朱延寿率兵3万抵御，被孙儒击败，黄池陷落。大顺二年（891年）五月，宣州一带发生水灾，孙儒军的营寨皆被冲淹，孙儒派部将唐晔守和州，安景思守滁州，自回广陵。

杨行密乘孙儒主力撤退之机，连下和、滁2州。七月，孙儒焚烧广陵庐舍，杀死老弱，尽驱丁壮渡江南下。杨行密部将张训、李德诚率军潜入广陵，扑灭余火，赈济饥民。孙儒从苏州进至广德（今属安徽），杨行密亲率大军拒敌，被孙儒包围，幸得其部将李简力战救出。孙儒遂焚掠苏、常等州，引军直逼宣州。杨行密屡败，退守宣州不出，另派别将引兵攻取常、润等州。虽然如此，但孙儒主力仍很强大，杨行密不能敌，欲弃城逃往铜官（今安徽铜陵北）。其谋士戴友规献策说："儒来气锐而兵多，盖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部将刘威也认为："背城坚栅，可以不战疲之。"① 杨行密以为然，遂坚守不出。数日后，孙儒军中粮食逐渐耗尽，又流行大疫，杨行密派兵攻下广德的孙儒军营寨，派张训占据安吉（今浙江安吉北），切断其粮道。孙儒军中粮食更加匮乏，遂派其部将刘建锋、马殷等分兵攻掠诸县，宣州城下的兵力有所削弱。景福元年（892年）六月，孙儒本人也患上疟疾，杨行密认为出击的时机成熟，纵兵进击，大败孙儒军，勇将安仁义连破孙儒营寨50余处，田頵擒获孙儒，斩首。孙儒之众多归降于杨行密。刘建锋、马殷率残军7000人，向江西逃去。自是，杨行密尽得淮南诸州，并占据江南的常、润、升（治今江苏南京）等州。

（三）清口之战

朱全忠早就垂涎江淮，只是无力夺取。光启三年（887年），唐

① 《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

廷以其兼淮南节度使，由于当时朱全忠正忙于对付朱瑄、朱瑾、时溥，无力南下，只得表杨行密为副使，另以其部将李璠为淮南留后，派兵送赴广陵。阻于时溥，加之杨行密反对，朱全忠只得召回李璠，奏请唐廷授杨行密为淮南留后。杨行密消灭孙儒，稳定了江淮局势，朱全忠也消灭了时溥，双方境土毗邻，逐渐发生矛盾。泗州苦于汴军残暴，降于杨行密，引起朱全忠不满，遂将淮南派往汴宋卖茶的使者扣押，尽夺其茶，以为报复。乾宁四年（897 年），朱全忠兼并了兖（今属山东）、郓（治今山东东平西北），遂乘胜进攻江淮。

朱全忠攻下兖州时，朱瑾与李克用派来增援的大将史俨、李承嗣正率军在徐州（今属江苏）一带筹粮。失去兖州后，他们无所归依，遂渡淮投奔杨行密。史俨、李承嗣皆河东骁将，所率部队多为沙陀铁骑，勇悍善战，他们的南投对增强杨行密军队的战斗力、改变军队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载："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射，及得河东、兖、郓兵，军声大振。"① 在此后对汴军的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乾宁四年（897 年）九月，朱全忠遣大将庞师古率大军 7 万屯于清口（古泗水入淮口，在今江苏淮阴西），准备向广陵进军；命葛从周率兖、郓、曹（治今山东定陶西南）、濮（治今山东鄄城北）之兵，屯于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将攻寿州（治今安徽寿县）；朱全忠屯于宿州（今属安徽），策应两路军队。淮南震恐。

十月，杨行密与朱瑾率军 3 万进抵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命部将张训率军从涟水（今属江苏）向清口推进。汴军营寨所处地势低洼，有人提醒庞师古，庞师古不听，又恃众轻敌，平时耽于弈棋，不作军事部署。根据这种情况，杨行密制定了引淮水冲淹汴军营寨、两面夹攻的计划。他命朱瑾堵塞淮水上流，然后率 5000 骑兵偷渡淮水，张汴军旗帜，从北向南直攻庞师古中军，张训之军配合行动，杨行密自率大军渡淮由南向北从正面进攻汴军。十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纪七十七》，昭宗乾宁四年二月。

一月，淮南军部署完毕，有人告诉庞师古对方将要壅水冲淹，庞师古不信，以惑众之罪将其斩杀。大水淹至汴军营寨后，张训率军越过汴军营栅，攻入营寨，朱瑾骑兵横冲直撞，汴军大乱，杨行密大军突至，两面夹攻，斩杀以庞师古为首的汴军将吏士卒万余人，余众溃逃。

汴将葛从周在寿州西北被朱延寿击败，退驻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闻知庞师古大败，急忙撤退，淮南军乘胜追击，追至淠水，汴军半渡，淮南军乘机出击，"杀溺殆尽"①，赖其遏后都指挥使牛存节率兵弃马步斗，残余汴军才得以渡过淮河，匆忙奔逃，四日不得食，加之天降大雪，士卒沿途冻饿而死者甚众，逃回者不满千人。朱全忠得知庞、葛两军大败的消息，也急忙从宿州逃走。"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全忠不能与之争"②。清口之战的胜利，使江淮地区免受残暴的汴军及战火的再度摧残，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钱镠夺取两浙之战

（一）钱镠夺取浙西之战

两浙地区在唐末到处出现小股农民起义，唐廷为镇压起义，加强两浙兵力。但由于将贪兵骄，官军中屡次发生兵变，使两浙秩序越来越乱。乾符二年（875 年），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人有战功，得不到赏赐，愤而举兵，劫取武库，攻掠苏、常 2 州，泛江入海，转掠两浙各地。为了防范王郢骚扰，杭州所属诸县纷纷招募骁勇，建立土团军，后来发展为"杭州八都"。王郢时叛时降，历时数年，终于败灭，但杭州所募的地方武装却逐渐强大，成为地方割据的工具。

钱镠就是杭州土团出身而后发迹的。他是杭州临安（今浙江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纪七十七》，昭宗乾宁四年十一月。

临安北）人，年轻时是个“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①。后应募土团，被石镜镇将董昌提拔为偏将，以功升为都指挥使。当时管辖两浙的是镇海节度使周宝，与淮南节度使高骈怨隙甚深，双方形同水火，互挖墙角，磨擦不断。不久，刘汉宏也进入浙东，局势更加混乱。刘汉宏，本兖州小将，以功提拔为州将，奉命领兵抵御黄巢义军，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都统王铎部将。黄巢大军北上时，王铎命其防守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刘汉宏大掠江陵，焚烧殆尽，弃城逃走，四下攻掠。唐廷任其为宿州刺史，刘汉宏仍然不满，又改任浙东观察使，以示安慰。中和二年（882年），刘汉宏发兵侵扰浙西，周宝命杭州八都主将、杭州刺史董昌抵御。董昌命钱镠为杭州都知兵马使，率兵攻击，大败刘汉宏之弟刘汉宥的军队。钱镠乘胜追击，连下诸暨（今属浙江）、萧山（今属浙江）等地。刘汉宏亲自来战，再次大败，钱镠斩其将何肃、辛约。

中和四年（884年），刘汉宏以军屯驻望海（今浙江宁波镇海），进至曹娥埭（今浙江绍兴东）。钱镠率军出平水（今浙江绍兴东南），切断刘汉宏退路；董昌部将成及夜率奇兵突袭曹娥埭，大败刘汉宏军，进屯丰山（今浙江绍兴东，曹娥埭西），与钱镠军相呼应，对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形成包围之势。刘汉宏部将施坚实等投降，刘汉宏逃到台州（治今浙江临海），越州被攻下。不久，台州刺史擒获刘汉宏，送交钱镠，斩于越州。董昌遂占据越州，钱镠自居杭州。光启三年（887年）正月，唐廷任董昌为越州观察使，占据浙东，钱镠任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②。

同年三月，镇海节度使周宝部将刘浩发动兵变，赶走周宝，周宝逃往常州（今属江苏），众推薛朗为节度留后。五月，钱镠遣部将杜稜、阮结、成及等率兵讨伐。先围攻常州，攻下后救出周宝，送往杭州，后周宝病死。杜稜等接着又攻下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擒斩薛朗，不久，攻下苏州，杀守将徐约。这样，浙西便为钱镠所夺取。景福二年（893年），唐廷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治

---

①② 《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世家》。

所从润州移置于杭州；以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治所越州，占据浙东地区。于是，钱镠与董昌、杨行密便在江浙形成了鼎足之势。

（二）钱镠攻取浙东

董昌在浙东赋税苛重，勤于贡献，故唐廷授其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陇西郡王。他为人苛刻，性残暴，犯小过而杀人全族，“血流刑场，地为之赤”①。民诉讼，不进行审理，以投骰子决输赢，不胜者死刑。又自以为强盛，无人可治，嫌郡王位卑，常说：“朝廷负我，吾奉金帛不赀，何惜越王不吾与？吾当自取之！”②信任妖人王温、韩媪等，献鸟兽为符瑞。乾宁二年（895 年），董昌在越州自称皇帝，国号罗平，建元顺天，设置百官。敢于劝谏者，尽数斩杀。钱镠遣使送信，劝董昌放弃帝位，董昌不听，于是，钱镠将董昌反状上奏于唐廷，昭宗命钱镠出兵讨伐。

同年二月，钱镠率兵 3 万，直抵越州城下，再次劝告董昌说：“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镠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随大王族灭乎！”③ 董昌畏惧，送犒军钱 200 万，把首谋者吴瑶及妖人王温等送出城，交于钱镠，并待罪于天子。钱镠因董昌曾有恩于他，遂引兵退回。

唐廷认为董昌罪重，不能赦免，钱镠遂再次率军讨伐。董昌急向杨行密求救，杨行密派部将台濛进攻苏州，安仁义、田頵进攻杭州，以救董昌。乾宁三年（896 年）五月，台濛攻下苏州。钱镠急召围攻越州的部将顾全武率兵回救，顾全武认为越州不久将要攻克，不愿因一州之失而退兵，更加猛烈攻城，多次击败董昌军。董昌幻想像上次那样，以金帛换取钱镠退兵，屡次以金帛犒劳钱镠军队，还减少士卒的口粮，用以犒劳城外的钱镠军，士卒皆怒，举兵反叛，外城陷落，董昌退守子城。几天后，董昌部将骆团绐活捉董昌，交于钱镠，押到杭州后斩杀。

董昌消灭后，钱镠回兵击退淮南兵，占据两浙。十月，唐廷

---

①②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董昌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纪七十六》，昭宗乾宁二年二月。

改威胜军为镇东军，以钱镠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但是，钱镠此时并无占据两浙全部州镇，湖州（今属浙江）、苏州等地尚在杨行密的控制之下。十一月，唐廷应杨行密请求，置忠国军湖州，以刺史李师悦为节度使。未几，李师悦死，杨行密表其子李彦徽继任。杨行密还派兵围攻嘉兴（今浙江嘉兴西南），钱镠遣顾全武率军自海路援救，击败淮南兵，乘胜追击，连破淮南军18所营寨，俘获3000人。又大败田頵所率军队，斩杀千余人。乾宁四年（897年），湖州都指挥使沈攸发动兵变，赶走李彦徽，归降钱镠。光化元年（898年），顾全武攻取苏州，大败淮南将周本，招降秦裴。此后，钱镠、杨行密之间还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天复二年（902年）以后，双方讲和，不再有大的战争发生。同年唐廷封钱镠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改封为吴王，辖地13州，以杭州为军政中心。钱镠在境内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招徕商旅，使两浙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五、马殷夺取湖南之战

（一）刘建锋、马殷西入湖南

景福元年（892年）六月，孙儒败死，其部将刘建锋、马殷收拾残兵7000余人，向西撤退，打算占据江西。他们沿途招募士卒，到江西时兵力已达10余万人。江西节度使钟传兵力甚强，刘、马之军为其所败，无法存身，于是折向湖南。

唐末的湖南也是战乱纷纷，干戈四起。湖南各地土豪趁唐室微弱，无力控驭之机，招募兵卒，攻州夺县，各自割据一州。雷满占据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周岳占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杨师远占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唐世旻占永州（今属湖南），蔡结占道州（治今湖南道县西），陈彦谦占郴州，鲁景仁占连州（今属广东），皆自称刺史。景福二年（893年），邵州（治今湖南邵阳）刺史邓处讷与雷满联合，共攻潭州，击斩周岳，自称节度留后，所辖仅潭、邵二州。湖南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直到刘建锋、马殷

进入湖南后，混乱之局才开始改变。

乾宁元年（894 年）五月，刘建锋率军抵达醴陵（今属湖南），邓处讷遣部将蒋勋、邓继崇率步骑 3000 人守龙回关（今湖南隆回西北），阻截刘建锋军。马殷率前锋先至关下，蒋勋送牛酒犒师，马殷见其示弱，遂遣使劝降。蒋勋投降后，刘建锋命他们为向导，命自己的军队改着邓军服装，张其旗帜，奔袭潭州。邓处讷正在欢宴，被当场擒获斩首，刘建锋占据潭州，自称留后。乾宁二年（895 年），唐廷任刘建锋为武安军（治所潭州）节度使，刘建锋任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次年，蒋勋自以为倒戈有功，请任以邵州刺史，刘建锋拒绝，他遂与邓继崇联合，攻占邵州，刘建锋命马殷率军进讨。

这时，潭州军府发生变乱。刘建锋自得潭州，得意忘形，酗酒不亲政事，因奸污亲兵陈赡之妻，被陈赡以铁挝击死。诸将杀陈赡，推行军司马张佶为留后，张佶自以众望、才能不及马殷，坚辞不就。诸将乃从邵州前线请回马殷，拥其为留后。张佶自愿代马殷攻邵州，消灭蒋、邓。后果然攻取了邵州。马殷，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少为木工，秦宗权作乱河南时，投入其军。孙儒渡淮攻陷广陵时，马殷在其军中为裨将，后随孙儒与杨行密转战于江淮间，孙儒败死后，乃推刘建锋为帅，进军湖南。

（二）马殷攻取湖南

马殷虽为武安节度使留后，但湖南境内 7 州他仅占有潭、邵 2 州，其他诸州仍为他人所占据。光化元年（898 年）五月，马殷命李琼、秦彦晖率军攻衡州，斩刺史杨师远。接着又引得胜之军攻永州，围攻月余，刺史唐世旻弃城逃走，途中被杀。次年七月，马殷遣部将李唐率兵攻道州，刺史蔡结聚集群蛮，埋伏于隘路袭击李唐军，李唐大败。李唐根据群蛮聚啸于山林的特点，采用火攻，焚烧山林，击溃群蛮。然后进军道州，攻拔州城，斩蔡结。十一月，遣李琼攻郴州，活捉刺史陈彦谦，后斩首。进攻连州，刺史鲁景仁屡战不胜，城池陷落，遂自杀而死。至此湖南七州皆属马殷所有。

光化三年（900年），唐廷升桂管为静江军，以经略使刘士政为节度使。刘士政闻知马殷平定湖南七州，恐其南下，遣副使陈可璠率军屯于全义岭（位今广西兴安境内），以防其攻略。马殷遣使与刘士政修好，被陈可璠阻止不能入境，马殷大怒，遣秦彦晖、李琼率军7000人讨伐。刘士政急遣其将王建武屯驻秦城（今广西兴安西南），与陈可璠军相呼应，以抵御湖南军。由于陈可璠军纪败坏，抢夺民间耕牛以犒军，县民皆怨，自愿为湖南军向导，抄小路袭击秦城，擒王建武。秦、李乘胜进军，攻下全义岭，活捉陈可璠，秦城以南20余处营垒皆闻风奔溃，湖南军直趋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围攻数日，刘士政知力不能敌，遂开城投降。刘士政投降后，其所属宜（治今广西宜山）、严（治今广西来宾东南）、柳（今属广西）、象（今属广西）等州皆降。马殷以李琼为桂州刺史，不久，表为静江节度使。

天复三年（903年），杨行密派军进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昌），朱全忠命荆南节度使成汭、武贞节度使雷彦威（雷满之子）、马殷出兵援救。马殷与雷彦威联合，佯作应援，乘成汭率军援救鄂州，江陵空虚之机，袭取江陵，抢掠一空而去。然后乘成汭败死，马殷又夺取了岳州（治今湖南岳阳）。接着，又着手谋取澧（治今湖南澧县东南）、朗等州。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消灭雷彦威，夺取了澧、朗二州。这样，马殷就占据了相当于今湖南全省及广西、广东、贵州一部的广大区域，为其以后建立楚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朱全忠西攻凤翔与东取淄青之战

唐朝末年，尽管朝廷衰微，四方战乱不息，然朝官与宦官的斗争并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他们各自以一些强镇为后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宰相崔胤与朱全忠勾结，进兵关中谋诛宦官，神策军中尉韩全诲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勾结，遂劫持唐昭宗到凤翔。朱全忠包围凤翔，李茂贞妥协，宦官大量被杀，朝官也大批地遭到诛逐，使唐昭宗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灭亡有日

了。朱全忠解决了关中的问题，回兵东取淄青镇王师范，使整个北方地区除李克用、刘仁恭、李茂贞等少数藩镇外，皆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为其取代唐朝统治，建立后梁政权奠定了基础。

一、韩全诲劫持昭宗依附李茂贞

唐昭宗受制于宦官及关中强镇李茂贞、韩建、王行瑜等，后虽借用李克用兵力，诛灭了王行瑜，但又恐李克用势力太盛，遂又保留李茂贞、韩建，以互相牵制，故宦官与关中强镇挟制朝廷的问题仍未解决。昭宗认为帝室衰微，根本原因是直接控制的军队寡弱，禁军为宦官所掌握，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乾宁三年（896年），昭宗命在神策军之外，另募禁军数万人，命诸王率领。宗室嗣延王李戒丕、嗣覃王李嗣周又自募兵各数千人。宦官因兵权被削夺，大为不满，暗中伺机而动。李茂贞见朝廷扩军，以为将要讨伐凤翔，遂举兵进犯长安。禁军乃新募的市井之徒，一触即溃，昭宗惊慌失措，急派人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救，自己率百官逃到渭北，打算避往河东。华州（治今陕西华县）节度使韩建与李茂贞为同伙，派军把昭宗截住，送到华州。唐昭宗寄希望于李克用，但是，当时他正与朱全忠在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一带作战，无暇西顾，使居于华州的昭宗形同囚徒。

韩建对诸王掌握兵权非常忌惮，迫使昭宗下令解除他们的兵权，勒归十六宅（唐室诸王共居的第宅），全数遣散新募禁军2万余人，斩禁军捧日都都将李筠，“自是，天子之卫士尽矣”①。诸王被囚禁，韩建还不放心，又派兵包围十六宅，把他们尽数斩绝，“是日，通王、覃王以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为建兵所拥，至石堤谷，无长少皆杀之”②。昭宗还按韩建的意愿，把宰相崔胤免职，贬到湖南。崔胤素与朱全忠勾结，便乞援于他，并劝朱全忠营建洛阳宫室，

①② 《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

以便把昭宗接到洛阳，就近控制。朱全忠屡胜李克用，军力强盛，有余力西顾，乃上表称崔胤为忠臣，要求昭宗重新任命其为宰相。崔胤依靠朱全忠的力量，重登相位，与他勾结更加紧密了，暗中派人劝朱全忠出兵关中，制服李茂贞、韩建。两镇不是朱全忠的对手，听说他要发兵，忙于光化元年(898 年)将昭宗送回长安。

昭宗回到长安，与崔胤密谋诛杀宦官。另一宰相王抟劝其不必操之过急，稳妥行事，免生变故。崔胤不听，谮杀王抟，又恃朱全忠的支持，处死了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等大宦官。昭宗因受华州之行的刺激，心理反常，回长安后，喜怒无常，经常酗酒狂怒，左右人人自危。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密谋，打算废去昭宗，另立太子为皇帝，依李茂贞、韩建为援，控制朝政。光化三年（900 年）十一月，刘季述率禁兵千人闯入宫中，囚禁昭宗，请百官联名奉太子即位。以崔胤为首的百官惧死，被迫署名，昭宗被尊为太上皇，太子即皇帝位。刘季述本欲杀崔胤，惧朱全忠势大而止，便遣使者到汴州，向朱全忠奉献唐社稷，以讨好朱全忠。朱全忠听从谋士意见，囚禁来使，准备出兵关中，讨伐刘季述。朱全忠尚未出兵，崔胤已策动神策军军官，举兵诛杀刘季述等宦官数十人，拥昭宗复位。

昭宗复位后，更加痛恨宦官，急切要尽数铲除，命宰相崔胤、陆扆分掌左右神策军，尽夺宦官兵权。诏令遭到神策军将领的反对，无法施行，只好用宦官韩全诲为神策军中尉。崔胤认为宦官“终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①，请李茂贞遣兵 3000 人到长安，充作宿卫，实欲钳制宦官。结果事与愿违，韩全诲曾任凤翔监军，与李茂贞早有勾结，凤翔兵进驻长安，反倒助长了宦官们的气焰。当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朱全忠欲昭宗迁都洛阳，李茂贞欲劫持昭宗到凤翔。崔胤急欲铲除宦官，以书信召朱全忠进兵关中。天复元年（901 年）十月，朱全忠大军从汴州向关中进发。韩全诲闻听朱全忠大军将至长安，大惧，命神策军把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纪七十八》，昭宗天复元年正月。

守宫禁诸门，不准昭宗与群臣会面，准备将其劫往凤翔。韩全海命神策军都将李继筠率军抢掠内库宝货、帷帐，并遣人秘密把宗室诸王、宫人先行送往凤翔。十一月，朱全忠大军抵达同州（治今陕西大荔），韩全海见情况紧急，派兵于昭宗、妃嫔所居住的御院放火，迫使昭宗动身，与皇后、妃嫔一同迁往凤翔。

二、朱全忠围攻凤翔与李茂贞临危求和

朱全忠入关，韩建自知不敌，遣使投降，并献银 3 万两犒军。朱全忠遂从同州经故市（今陕西渭南固市镇）向南渡过渭水，到达零口（今陕西临潼东北），闻天子西去，又向东到达赤水（今陕西华县西南）。崔胤派人请朱全忠进军凤翔，接回昭宗，朱全忠遂经长安向西推进。李茂贞急遣部将符道昭屯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以阻截朱全忠西进，被朱全忠部将康怀贞击败，汴军顺利抵达凤翔（今属陕西）城下。接着汴军攻下邠州（治今陕西彬县）、盩厔（今陕西周至）等地，切断外援，包围凤翔，李茂贞闭城不战。凤翔被困日久，救援已绝，李茂贞十分惶恐，派兵夜袭奉天（今陕西乾县），捉获汴将倪章、邵棠，遂乘胜大开凤翔城门，与汴军决战，结果战败，汴军追击，险些冲入凤翔西门。

天复二年（902 年）九月，朱全忠因久雨，士卒多病，想撤兵回河中，诸将反对，遂决定用诈降之计取城。命骑士数人诈作逃亡，入城告诉李茂贞，说："全忠举军遁矣，独留伤病者近万人守营，今夕亦去矣，请速击之！"① 李茂贞信以为真，出动主力进攻汴军营寨，汴军大军齐出，纵兵猛击，又派数百骑兵占据通向城门之路，切断李茂贞军的归路，"凤翔军进退失据，自蹈藉，杀伤殆尽"②。此战后，李茂贞无力再战，士气低落，部下不断有人出城投降。夜晚，派兵袭击汴军，不少人反倒乘机投降，连出城樵采之人也多有不归的。十一月，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计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纪七十九》，昭宗天复二年九月。

其数，市场上人肉与狗肉同列，人肉每斤卖100钱，狗肉500钱。昭宗卖御衣及小皇子衣服以补所用，“削渍松柹以饲御马”①。十二月，李茂贞在关中的州镇皆为朱全忠所夺，坐守孤城，密谋诛杀宦官以赎罪，与朱全忠讲和。

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李茂贞诛杀以韩全诲为首的大宦官70余人，与朱全忠讲和。昭宗回到长安后，又与崔胤合谋，杀大小宦官数百人，颁诏天下诸镇，要他们尽杀所在监军的宦官，除河东、剑南与宦官关系密切，保留少数宦官外，其余各地宦官基本上被杀光了。唐中叶以来历时百余年的宦官专政之局，至此结束了。

朱全忠与崔胤合谋，贬逐跟随昭宗到凤翔的朝臣30余人，杀死一批崔胤所憎恶的朝臣，意在削除天子羽翼，剩下的都成了朱全忠的奴仆。左右神策军全部隶属于六军，以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统掌京师军事。朱全忠还不放心，留其侄朱友伦统率步骑万人屯驻长安，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街使，朱全忠心腹布满京师，把昭宗、宗室、百官都严密控制起来。

三、朱全忠回兵东取淄青与王师范投降

王师范，青州（今属山东）人。其父王敬武为平卢（治所青州）节度使，龙纪中（889年）死，众推王师范为留后，昭宗因其年少，命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平卢节度使，以代替王师范。王师范不从，命部将卢洪率兵攻崔安潜，卢洪回兵袭击青州，王师范不敌，遂以节帅之位相让为名，诱卢洪入城，伏兵斩杀，然后出兵击退崔安潜。昭宗无力制约，遂正式授王师范节度使节钺。朱全忠攻灭兖、郓朱瑄兄弟，遣朱友恭进攻淄（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王师范不敌，遂投降朱全忠。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纪七十九》，昭宗天复二年十一月。

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围困凤翔，宦官韩全诲矫诏诸镇起兵入援，王师范见诏书，泣曰："诸镇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诸镇反以兵自卫，吾虽力不足，当成败以之。"①遂联络杨行密、李克用等共同起兵，讨伐朱全忠。实际上除杨行密以偏师响应外，李克用方自顾不暇，并无出兵响应。

当时朱全忠之兵多随其入关中，中原诸州兵力空虚，王师范分遣诸将率兵伪作贡献或商贩，"包束兵仗，载以小车"②，分赴诸州，约定同日俱发。除兖州外，赴其他诸州的将士多事泄被擒。当时泰宁（治今兖州）节度使葛从周领兵屯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以防备河东李克用，兖州空虚。王师范的行军司马刘鄩先派人化装成油贩入城侦察，然后自率精兵500人潜入城中，一举攻占兖州。青州牙将张居厚率将士200人，伪装成搬运夫，装兵械于小车，"称师范使者聘梁，因欲劫杀太祖（指朱全忠）"③。行至华州东城，知州事娄敬思觉察有异，出面检查，被张居厚杀死，张居厚遂攻占东城。西城由于有崔胤率兵防御，不能攻克，张居厚逃至商州（今属陕西），被追获。

留守汴州（治今河南开封）的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见东方有变，率兵万人进攻兖、郓。又遣使通知在邢州的葛从周回兵，共攻王师范。朱全忠闻知王师范起事，分出一部分军队先返回汴州，归朱友宁统一指挥。三月，王师范遣其弟王师鲁攻齐州（治今山东济南），被朱友宁击退。王师范派兵增援兖州刘鄩，朱友宁击退其军，使兖州外援断绝，葛从周率军从邢州赶回，包围了兖州，朱友宁遂引兵向青州进攻。朱全忠返回汴州后，自引大军10万为诸军后援。

王师范见朱全忠大军压境，遂向淮南杨行密求救，杨行密遣部将王茂章率步骑7000人前往救援，另派兵数万围攻宿州（今属安徽），被汴将康怀英击退。淮南兵到达青州后，王师范命其弟王

---

①③《新五代史》卷四十二《王师范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纪七十九》，昭宗天复三年正月。

师诲率兵会同王茂章，进攻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克其城，杀刺史刘康乂。朱友宁率兵攻下博昌（今山东博兴）、临淄（今山东淄博东），进抵青州城下，分兵攻取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六月，王师范率登、莱（今属山东）兵在青州附近的石楼与朱友宁军会战。王师范分兵驻守两栅，登州兵与莱州兵各一栅，朱友宁率军先攻登州栅，王师范命淮南将王茂章出兵援救，王茂章按兵不动。朱友宁军攻破登州栅后，转攻莱州栅，王茂章见其兵力疲乏，乃与王师范合兵出击，大败汴军。朱友宁见其军大败，从山阜急驰而下，前往督战，因坐骑仆倒，被青州军斩杀。王师范、王茂章乘胜追击，俘虏、斩杀共万余人。

朱全忠闻知朱友宁战死，增兵至20万，昼夜兼程，赶往青州。七月，到达临朐（今属山东），命诸将直攻青州，王师范出战，大败而回。王茂章伪作怯敌，闭垒不战，待汴军松懈，毁栅而出，驱驰疾战，击退了汴军。王茂章自知众寡悬殊，难以取胜，乘汴军暂退之机，连夜引军退走，返回淮南。随王茂章同来赴援的淮南将张训，驻守密州，见王茂章已退回，遂率军也返回淮南，密州重为汴军夺去。

淮南军撤走后，王师范势力更加孤单，遂退守青州，临朐为汴将杨师厚夺取。九月，杨师厚声言赴密州，只留辎重在临朐，王师范不知是计，率兵直攻临朐，被杨师厚伏兵截杀，损失万余人，其弟王师克被俘虏。莱州（今属山东）兵5000人援救青州，也被杨师厚击破，死伤殆尽。汴军遂进抵青州城下。王师范见屡战失利，外援已绝，遂命人请降于杨师厚，并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闻听李茂贞等人将起兵进攻长安，恐其再次劫夺天子西去，也希望早日结束在东方的战争，以便全力西顾，故允许王师范投降，命其暂为淄青留后。

王师范部将刘鄩攻下兖州后，善待葛从周母亲及家属，在葛从周攻城正急时，引其母登城，葛从周至孝，故不敢全力进攻。他还将城中妇女及老弱放出城外，只留少壮者共同守城。刘鄩军纪严明，能与士卒青壮“同辛苦，分衣食，坚守以扞敌，号令整肃，

兵不为暴，民皆安堵”①，故葛从周久攻不下。王师范遣使者谕以投降之意后，刘鄩始开城投降汴军。

王师范投降后不久，朱全忠见局势平稳，遂任其为河阳节度使。后梁建立后，召为右金吾上将军，居于洛阳，实行软禁。一次，朱友宁妻向朱全忠哭诉，要求报仇，朱全忠立刻派人把王师范全族200余口全部杀死。

第五节　朱全忠谋篡与唐朝灭亡

朱全忠击败王师范后，河北诸镇皆归附于汴，河东李克用屡败，自保不暇，朱全忠认为废唐称帝的时机成熟，遂先将唐昭宗迁往洛阳，然后加以杀害，另立其子李祚为帝，史称昭宣帝。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废去昭宣帝，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一、劫持昭宗东迁洛阳

朱全忠从凤翔迎昭宗回长安后，由于王师范起兵，急忙东返，以平定淄、青，朝中尽布腹心加强控制。宰相崔胤不甘受制，欲想通过加强军事力量以相抗衡。史载："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诛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贞，并吞关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夺之志。胤惧，与全忠外虽亲厚，私心渐异。"② 他对朱全忠说，长安靠近凤翔，不能没有守御之备，六军十二卫，只有空名，应该招募士卒以加强凤翔防卫，这样可以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心知其意，但仍表示同意，暗中派部下兵士，假冒平民，前往应募。崔胤共招募6600人，分为六军，每军1100人，大部为朱全忠部下士卒，崔胤却无觉察。此举不但使崔胤的计划落空，还加强了朱全忠在长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十》，昭宗天复三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十》，昭宗天复三年十二月。

安的兵力。不久，留在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因击毬坠马而死，朱全忠怀疑是崔胤暗中捣鬼，更加痛恨崔胤。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上奏昭宗，说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①，请求诛杀。昭宗不敢不从，于是把崔胤贬为太子少傅分司，朱全忠密令新任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率兵包围崔胤私宅，杀死崔胤，遣散新募军队。另以兵部尚书崔远、左拾遗柳璨为宰相。

朱全忠早在入关中之时，就想把昭宗迁到洛阳，以便就近控制，进而篡夺唐室，故多次上表请求迁都，昭宗不许，朱全忠还是令东都留守张全义修缮宫室，以便日后时机成熟再行迁都。当初，朱全忠围攻凤翔时，曾派军攻下邠州，静难节度使杨崇本请求归附，以其妻为人质，送于河中，朱全忠见杨崇本妻美貌，遂与之私通。杨崇本大怒，与李茂贞联合，于天祐元年（904年）正月，出兵逼近长安。朱全忠以此为借口，强行逼迫昭宗东迁，长安士民，号哭满路，大骂说：“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②老幼相随，月余不绝于路。昭宗及百官离开长安后，朱全忠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衙署及民间房舍，把木材放入渭水使之漂流东下，用以营建洛阳，使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长安化为废墟。

昭宗车驾到达华州，百姓夹道呼“万岁”，昭宗哭着对百姓说：“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侍臣说：“鄙语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乐处！’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③由于洛阳宫室尚未修缮完毕，昭宗及百官暂驻陕州（治今河南陕县）。这期间昭宗曾暗中遣使携绢诏，告急于两川王建、淮南杨行密、河东李克用等，要他们纠合诸镇救驾，以图恢复，并说：“朕至洛阳，则为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复得通矣！”④ 除王建遣将率军会同凤翔兵进至兴平（今属陕西），遇汴军阻截，不能进而退回外，杨行密只顾扩张地盘，无意勤王，李克用实力削弱，自顾不

---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十》，昭宗天祐元年正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十》，昭宗天祐元年三月。

暇，都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四月，洛阳宫室落成，朱全忠上表要求昭宗上路，昭宗因皇后生产，请求到十月再动身，朱全忠大怒，命牙将寇彦卿至陕州，强迫昭宗东迁，不得迟延。闰四月，昭宗到达洛阳，跟随而来的仅“小黄门及打毬供奉、内园小儿二百余人”①。尽管如此，朱全忠仍不放过，“先是选二百余人，形貌大小一如内园人物之状，至是使二人擒一人，缢于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饰。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②。自从杀尽宦官以来，内廷职事皆由宫人充任，迁都洛阳后，迫于朱全忠压力，内诸司使仅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等九使，其余全部废去，也不许宫人充使，以上九使皆由朱全忠腹心蒋玄晖、王殷等充任。昭宗一举一动，皆在朱全忠掌握之中。

二、谋杀昭宗屠戮朝臣

当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等藩帅书信往来，皆以复兴唐室为辞，联合对付朱全忠。天祐元年（904年）八月，朱全忠欲率军西讨李茂贞、杨崇本，对昭宗在洛阳很不放心，恐生变故，遣判官李振赴洛阳，与蒋玄晖、氏叔琮、朱友恭等密谋杀害昭宗。蒋玄晖选派龙武军牙官史太率兵夜闯宫门，杀死昭宗，立辉王李祚（即位后改名李柷）为帝，史称昭宣帝，又称哀帝，当时年仅12岁。

朱全忠在长安时，见德王李裕眉目清秀，年纪已长，非常不高兴，因其早有谋篡之心，皇子年长，立之不利于己，而立幼君，“易谋禅代”③。他对崔胤说：“德王尝奸帝位（指为刘季述所立之事），岂可复留！公何不言之？”④崔胤把此意转告于昭宗，昭宗责

①② 《旧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纪二》。

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宗天祐元年七月。

问，朱全忠却不承认是自己的意思，把责任推给崔胤。次年，昭宗已死，时机成熟，朱全忠遂命蒋玄晖把昭宗九子全部缢杀，投尸池中，使唐朝宗室诸王覆灭无遗。

为了尽快篡夺唐朝社稷，朱全忠还大开杀戒，在全部铲除宦官之后，把屠刀又对准了公卿朝臣。早在杀崔胤时，朱全忠就同时杀死了与崔胤关系密切的一些朝臣，如京兆尹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连已经退休的宰相张濬也不放过，派张全义领兵杀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唐廷朝臣仍然结党相争。宰相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自以为名门宿望，看不起另一宰相柳璨。柳璨性轻佻，善于佞媚朱全忠及其心腹，进士及第不满 4 年，就很快登上相位，为朝廷宿望之臣所鄙视。双方意气相争，斗争激烈。柳璨多次向朱全忠谮毁 3 人，罢其相位。柳璨借朱全忠之势，在朝中自作威福，这时正好天象有变，有人说必须杀人才能上应天象，柳璨乘机把平素自己所忌恨的朝臣开出名单，交给朱全忠，怂恿把这批人全部杀死。朱全忠谋士李振也说："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① 于是，朱全忠把以裴枢为首的一批人全部贬逐，"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②。过了一月，朱全忠在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白马驿把裴枢为首被贬朝臣共 30 余人，全部杀死。朱全忠的主要谋士李振，出身寒微，屡次考进士不第，非常忌恨高门士族及科举出身的朝官，每次从汴至洛阳，朝廷中必有人被贬逐，"时人谓之鸱枭"。这次大杀朝官他仍不解恨，对朱全忠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③ 朱全忠大笑，即刻命人把 30 余具尸体投入黄河。朱全忠大杀朝臣，并非介入了朋党斗争，其目的在于扫除称帝道路上的障碍。随着大批朝臣的被杀逐，"朋党之争"至此结束。唐朝中期以来的"南衙（朝臣）北司（宦官）之争"，在宦官被诛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二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二年六月。

杀殆尽后，已经结束，似乎朝官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朱全忠看来，朝臣也好，宦官也好，只要对他篡唐称帝不利，都会毫不留情地消灭。实际上在他大肆诛杀宦官之时，朝臣必然被诛戮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了，然而这批昏聩腐朽的衣冠缙绅竟不知死之将至，依然结党营私，互相攻讦，因此他们遭到如此下场，不足以惜。

朱全忠如此凶残的行为，毕竟在士人中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很多人都隐居不官，史载："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①，即使命令州县督促，也多避而不仕。也有不少人纷纷投向别处，增添了朱全忠的敌对力量。

三、废除哀帝灭唐建梁

翦除朝官之后，朱全忠认为灭唐条件已经成熟，令蒋玄晖等商议禅代办法。蒋玄晖与柳璨认为，魏晋以来凡禅代者，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②，然后才可受禅。于是，先授朱全忠诸道元帅之职，以表示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朱全忠大怒，以为蒋玄晖、柳璨有意拖延时间，"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须变"③。蒋玄晖、柳璨大惧，加快了篡唐步伐。天祐二年(905年)十一月，以朱全忠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等21镇为魏国，封朱全忠为魏王，加九锡。朱全忠嫌禅让迟缓，拒不接受。十二月，朱全忠下令逮捕蒋玄晖、柳璨，处以死刑，柳璨临刑时大呼："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④

天祐三年（906年）十二月，朱全忠正在围攻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镇守潞州的汴将丁会不满意朱全忠弑君篡唐的行径，率军投降李克用，朱全忠闻讯大惊，烧营狼狈而还，"威望大沮，

---

①《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二年六月。

② 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即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𫓧钺、秬鬯，称九锡。

③《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二年十一月。

④《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二年十二月。

恐中外因此离心，欲速受禅以镇之"①。次年三月，朱全忠强迫唐帝禅让帝位。禅让前朱全忠还虚伪地再三推让，要众将、大臣、诸镇上劝进书，然后才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开平，国号梁，以汴州（今河南开封）为都城，以唐帝为济阴王，囚禁于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次年，派人杀死唐帝，李唐皇室的这个残余最后也消灭无遗了。

朱全忠西进关中，兵伐凤翔，挟持昭宗，其势力发展到了巅峰。在这个时期，其强敌李克用据守太原，积蓄力量，保全自己，待机反攻。李克用非常清楚，朱全忠挟持昭宗，必然要行篡唐之事，他冷眼旁观，静待这个变化的发生，然后号召天下诸镇，同申讨伐。尽管唐朝已名存实亡，然在名分上仍是天下之共主，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精明的军阀愿意挟天子以令诸侯，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却不急于篡位建国。三国时，孙权劝曹操早登帝位，曹操说孙权要把自己"踞于炉火之上"。朱全忠没有曹操那样的明智，主动把自己置于炉火之上烘烤，给天下共同讨伐以口实。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说："李茂贞之劫驾，温篡之资也；温挟主以东而篡之，克用之资也。"② 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关于这一点，朱全忠部下蒋玄晖也看到了，他劝朱全忠不要急于受禅时说："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但以今兹晋（指李克用）、燕（刘仁恭）、岐（李茂贞）、蜀（王建）皆吾勍敌，王遂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业耳。"③ 蒋玄晖的话是以下对上而言的，比较婉转，但其基本意思是非常清楚的。然朱全忠毕竟是地痞流氓出身，根本不懂这些，只知凭实力强取豪夺，却不知政治对军事的重要意义，不了解实力也会因政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他登上皇帝宝座之日，便是他的势力开始下降、逐步陷于困窘之时。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太祖开平元年正月。

② 《读通鉴论》卷二十七《昭宗九》。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二年十一月。

第十九章　唐代后期军事思想与兵学著述

唐代后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直到最后灭亡的时期。其间出现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唐末农民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唐代后期的军事思想，在这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在继承前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特殊的历史环境培育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兵学著述，同时也造就了诸如郭子仪、李光弼等杰出的军事将领。这些兵学著述及名将、名臣言行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从高宗到玄宗是唐代兵学的萧条时期。经过安史之乱后，兵学研究才渐趋兴盛，军事著作又逐渐多起来，士大夫的一些谏议奏章也多论及军事，一些非兵书中也包含了很多言兵内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存世兵书有：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王琚的《射经》、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等人的《注孙子》。另外还有一些兵书已经亡佚。郭子仪、李光弼虽无兵学著作传世，但从有关史料中仍可看出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从谏议奏章中的论兵内容看，李泌、陆贽见远识卓，成就斐然，其中陆贽的军事论述内容更为丰富、系统和具有理论特色；而李泌的言论则更具战略对策研究的特征。非兵书言兵者，如杜佑的《通典》，杜牧的《樊川文集》，题为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的《唐六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等，它们或侧重谈兵略基本原理，或着眼当时的现实对策研究，或专记兵制，或谈军事地理等，各有一定特色，也都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之所以趋于兴盛，一是由于当时的军事斗争迫切需要军事理论指导；二是长期、多样、激烈的军事实践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

唐后期的兵学著述和军事思想与前期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兵学著述的理论性增强。唐前期多是武人论兵，后期则有许多士大夫积极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理论水平较高，文笔也比较好，故其著述流传较为广泛和长久。二是兵家思想与其他思想进一步融合。如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及为《阴符经》所作注疏等，明显带有道兵家的色彩；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是一部儒、道、兵相糅合的战略性兵书。唐代有些兵书之所以具有较浓厚的道家色彩，当与李唐皇帝攀附为老子之后、道家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关。另外，杜牧学贯古今，慨然论兵，甚博而详；陆贽将儒、兵思想融为一体，谈兵内容切实而旨远。不同思想的碰撞，常常迸发出新的军事思想的火花，故这一时期的军事论述多有新见。三是一些兵学理论更具总结性和实用性。如《神机制敌太白阴经》、《通典》中的兵典内容等，都采取了对前人的军事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总结、归纳、注释、阐发的体例。有些兵书的内容着眼于实际运用，大至国家战略的制定，小至基本队形训练、兵器配备和使用，战马喂养、医药救护等，都有具体而详备的论述，其理论更加面向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四是唐前期占据国家统治地位的军事思想与积极防御的国防指导思想相适应，具有进取性、开拓性的特点；唐后期出现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其关注的重点偏重于维护国家统一，一些对策性研究多着眼于治理内乱，内向性多于外向性。

第一节　郭子仪、李光弼的军事思想

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中涌现出来的两位最著名的将领。他们受命于危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存世的有关文献资料中，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一、郭子仪的军事思想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初以武举高等补右卫长史，担任过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兵部尚书、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中书令等职，封汾阳郡王。历事玄、肃、代、德4朝。德宗时被尊为“尚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他指挥或参与指挥了攻克河北诸郡之战、收复两京之战、邺城之战等重大作战；安史之乱后，他计退吐蕃，二复长安；说服回纥，再败吐蕃；威服叛将，平定河东等。他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史书称他“再造王室，勋高一代”①，“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②。郭子仪不但武功厥伟，而且还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思考、处理问题，资兼文武，忠智俱备，故能在当时复杂的战场上立不世之功，在险恶的官场中得以全功保身。

从所见有关资料看，郭子仪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郭子仪东征西讨60余年，无论是在平定安史之乱及其他叛乱的战争中，还是在抗御少数民族政权侵扰的战争中，他都以维护唐王朝的统一为己任，出生入死，不避危难。“于国有患，劳其戡定；于边有寇，借其驱除”③。他长期领重兵在外，诚如代宗李豫所言，他最有条件颠覆李唐王朝，但他始终对之忠贞不二，即使在受到怀疑、打击，甚至被剥夺军权、受到委屈时，他仍能“无少望，乃心朝廷”④。甚至在有人挖了他的祖坟，激他起兵反对朝廷，“中外惧有变”的情况下，他仍能以大局为重。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对唐廷的命令坚决执行，“诏书至，即日就道，

①③《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②④《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无纤介顾望”①。为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和统一，他常能谦恭自牧，忍辱负重，“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故能“完名高节”，“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②。

另外，他善于从全局出发，提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建议，有的直接付诸行动。如，安禄山叛乱后，他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率军东出，欲克复河北，北图范阳，以牵制叛军西进，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和行动。在安禄山进攻潼关时，他主张实行战略防御的方针，建议潼关守军固守弊敌，反对其出关作战。另外，他将吐蕃逐出长安后，反对鱼朝恩提出的迁都意见等，都说明了他具有较为深远的战略眼光。

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他不但重视军事，而且关注国家政治及周边的关系。提出过削减冗官、选贤任能和轻徭薄赋等治国主张；强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修好，抚顺伐叛，反对四面树敌，主张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善待回纥，将吐蕃作为重点作战对象，从河南、河北、山南、江淮等镇抽调兵力赴关中，“勒步队，示金鼓”，以为“长久之策”等。

（二）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郭子仪治军，以宽厚为主，宽严相济，恩威并用。德宗说他“训师如子”，史书称他“御下恕，赏罚必信”，“与李光弼齐名，而宽厚得人过之”③。他原与李光弼具为朔方军牙将时，二人有些互不服气。后来他代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怕他报复，欲辞职离去。郭子仪说：“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与之“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④，并荐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二人共同携手平叛。但其对下也并非一味宽容迁就，在必要时，亦

① 《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②③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肃宗至德元载正月胡注引杜牧《张保皋传》。

敢用重刑。常山之战，唐军与敌战斗不分胜负，郭子仪令将一违令步将斩首示众，因此士殊死斗，一举破敌。宝应元年（762 年），太原士兵哗变，杀死河东节度使邓景山，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前锋将王元振杀死行营都统李国贞，翼城（今属山西）乱兵杀死节度使荔非元礼。河东大有叛乱再起之势，唐肃宗派郭子仪进驻绛州，他一举诛杀首恶王元振等 40 多人，太原亦效仿之，于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郭子仪收复长安后，射生将王抚自署京兆尹，扰乱京城，子仪将其斩首示众，可见其执法之严。另外，郭子仪在治军上，十分重视对将领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因此，其麾下有大将数十人后来晋封王侯，幕府官员 60 多人后来也多为显官要员。由于他治军以宽厚为基，恩威并用，所以他在朝野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即使一些敌对营垒的将官也对他非常畏服。

（三）上兵伐谋、先胜后战的战争指导思想

郭子仪用兵，十分重视伐谋屈敌，不战而胜；不得已而用兵，力求先胜后战，打则必胜。他在战争指导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正确料敌，因敌定策。郭子仪注重对敌将心理特点、兵力情况、战场形势的掌握，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嘉山（在今河北曲阳境）之战，安禄山派精兵支援史思明，来势甚猛，郭子仪针对敌情采取避其锋锐、先疲后打之策，“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贼人不及息”①，在其疲惫之后，郭子仪与敌决战，一战败之，斩敌 4 万，俘虏 5000。仆固怀恩反，郭子仪认为，“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②，根据他对仆固怀恩及其将士情况的了解，决定采取缓战以待其变的策略，取得成功。

二是伐谋屈敌，不战而胜。这是郭子仪用兵的一个重要军事原则，尤其在他后期，多用此法取胜。如，宝应元年（762 年），他不战而屈仆固怀恩反唐之兵；永泰元年（765 年），吐蕃军攻占长安，郭子仪采取盛张旗帜，用击鼓呐喊之法，惊扰敌人，派人入

---

①②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城宣传“郭令公来了”，夜鼓朱雀街，喊“王师至矣”等，使吐蕃军因昼夜惊恐不安而撤离长安。在仆固怀恩再次勾结吐蕃、回纥兵共30多万人向唐进攻时，他利用回纥与吐蕃的矛盾及自己在回纥军中的威望，“示以至诚”，单骑说服回纥首领倒戈，使之与唐联合，大败吐蕃军；大历元年（766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阴谋叛乱，郭子仪奉命征讨，临之以威，同、华将吏斩智光父子以降。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①，郭子仪深得其中精义。

三是专己分敌，灵活机动。与敌人交战，郭子仪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打敌虚弱之处。安禄山反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合兵，东出井陉，进军河北，即体现了这一思想。另外，郭子仪从广平王李俶二攻长安，请回纥兵前来助战，率蕃汉之师15万进战，采取的也是集中兵力的战法。同时他还注意分化敌人，如争取回纥打击吐蕃。在战术使用上，郭子仪强调灵活机动，据情定策。或坚壁挫敌；或借用外力；或前后夹击；或决水灌城；或伪败伏击等，均体现了根据形势决定战法的思想。

总之，郭子仪将维护国家统一放在首位，善从战略全局观察、思考和决定问题。实行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的治军方法。在战争指导上，主张正确料敌，因敌定策；伐谋屈敌，不战而胜；专己分敌，灵活机动等。这些军事思想和实践活动对当时及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二、李光弼的军事思想

李光弼（708～764），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初任左卫亲府左郎将，历官河东节度副使、朔方节度使、北都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中书令等职，封临淮郡王。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指挥或参与指挥了收复河北诸郡之战、太原保卫战、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河阳（今河南孟

---

① 《孙子兵法·谋攻篇》。

州南）之战、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北）之战、宋州（治今河南商丘）之战及镇压袁晁农民起义等重大作战，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①。后人亦认为，“以战功论，李光弼奋其智勇，克敌制胜之功，视郭为多”②。后因受朝廷猜疑，忧忿而死。史载他撰有《统军灵辖秘策》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将律》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李临淮兵法》二卷（《世善堂书目》著录）等，均亡佚。《郡斋读书志》载，《统军灵辖秘策》“凡五十章，末云：吕望智廓而远，孙武思幽而秘，黄石宽而重断，吴起严而贵勇，墨翟守而无攻，老聃胜而不美。今择其精要，杂以愚识，为一家之书。”③ 可知，李光弼对历代兵书颇有研究。从所见史料看，其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严明为主要特征的治军思想

李光弼以治军严明闻名于世。史书称他“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④。乱世之军，管理多失之于宽，而这样的军队常常以害民开始，以亡己告终。有识之士，在治军上必纠之以猛，只有如此，军队才会有战斗力，才可能打败敌人，保存自己。李光弼深明此道，因此，他治理军队，“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⑤。至德二年（757年），李光弼以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率兵5000守太原，在太原主持军事的御史崔众骄傲狂悖，不按诏书及时向李光弼交兵，李光弼立命将他收系，恰逢有使者带诏书至，拜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说：“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⑥终斩崔众以徇。因此威震三军，大大强化了军队的纪律，为后来能坚守太原打下了基础。乾元二年（759年），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檄召朔方兵

---

①⑥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唐肃宗》。

③ 《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兵家类》。

④ 《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二月。

马使张用济率军东出河上，张用济畏惧光弼持军严，教诸将逗留其兵，自己来见光弼，李光弼立将其斩首。史称李光弼至朔方军，“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①。河阳之战，他见一将英勇杀敌，另有不战而退者，立即下令斩退却者而重赏杀敌者，体现了“赏不逾时，罚不迁列”的治军思想，于是全军人人振奋，终于取得了此战的胜利。

李光弼治军严，能首先从自己严起，从亲近者严起。太原之战，他在城上设公幄止息，坚守50余日，“有急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决军事毕，始归府第”②。河阳之役，他说：“战，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③说罢西向拜舞，三军感动。此战中，他发现爱将郝廷玉军不能前，即“趣左右取其首来”；看到荔非元礼没有按时出战，就“使召元礼，欲按军法”。怀州之战，猛将仆固玚把降将安太清之妻“劫致于幕”，光弼命归之，仆固玚不从，光弼“以卒环守，复驰骑趋之，射杀七人，夺妻还太清”④。可见，他对违法乱纪的比较亲近的将领也决不手软。

李光弼治军严明的另一表现是重视选拔培养将才，明于知人，善于任用。因此，其手下猛将如云，如荔非元礼、郝廷玉、李国臣、白孝德、张伯仪、白元光、陈利贞、侯仲庄、柏良器、乌承玼等，都是当时战功卓著的将领。

李光弼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光弼死后，鱼朝恩观其部将郝廷玉布阵，见其“申号令，鸣鼓角，部伍坐作进退若一”，甚为赞叹。廷玉恻然曰：“此临淮王遗法也。王善御军，赏当功，罚适过，每校旗，不如令者辄斩。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心破胆裂。”⑤由此可见，李光弼训练军队之严明，成效之显著。

---

①③《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②《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

④《新唐书》卷二二四上《仆固怀恩传》。

⑤《新唐书》卷一三六《郝廷玉传》。

（二）洞观全局、庙略多算的战略决策思想

李光弼重视掌握战争全局的情况，在战略谋划上做到先胜。安史之乱前期，叛军力量处于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李光弼既反对盲目进攻，也反对消极保守，而是主张积极防御，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反攻。天宝十五载（756年），李光弼在取得河北战场上的胜利后，向唐玄宗建议："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① 唐玄宗不纳，强令哥舒翰出兵潼关，致遭惨败。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李光弼这一战略谋划的正确。乾元元年（759年），九节度围安庆绪于邺城，李光弼曾建言以军逼史思明，使之不敢轻出援邺，则安庆绪可擒。观军容使鱼朝恩不听。后史思明果然来援，唐军因遭惨败。二年九月，史思明率军攻入河南。李光弼分析形势后认为，洛阳难于固守；退守潼关则委地500里于敌，使敌势益强；只有固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南），北阻泽、潞，方可进守自如，如猿臂之势，钳制叛军，使之不得西进。遂移军2万守之，大败叛军，遏制了敌人西进之谋。这些都体现了李光弼洞观全局、庙略多算、不计眼前一城一地之得失，掌握主动，以争取战略性胜利的作战指导思想。

（三）践墨随敌、出奇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光弼指挥作战反对墨守成规，主张根据形势灵活决策，出奇计取胜。太原之战，起初众将听说史思明率10万大军来攻，都按照一般思维方式考虑对策，主张赶紧抢修城墙。李光弼认为："城环四十里，贼至治之，徒疲吾人。"② 于是亲率士卒及百姓在城外挖掘壕沟。这样，既可阻挡敌兵，使之不能靠近城墙，增大了防御纵深；又可把挖出的土运入城中做成数十万块土坯，战时可以随时修补被敌破坏的城墙；还可节省人力物力，可谓一举多得。这一决策无疑比众将的意见高出一筹。作战中，他不是消极防守，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②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而是在防守的同时，常出奇计进攻敌人，采取了以攻为守、攻守兼用的战术。如，他采用挖地道的战术打击和骚扰敌人，将前人用于攻城的手段用之于守城，给敌造成重大伤亡；他让人制成由200人操作的巨型礌石车，一发可毙敌20余人，敌人被砸死十之二三。河阳之战，史思明企图用马群引诱李光弼进入自己的埋伏圈以消灭之，李光弼将计就计，用“母马计”轻易获得史思明千匹好马良驹，亦是独出心裁。李光弼移军趋河阳，亲自以500骑殿后。敌人游骑先期占领石桥，诸将请示如何行进，光弼下令：“当石桥进。”时至夜晚，军队持火炬徐行，队伍严整，敌人见状，不知虚实，反而害怕有伏，未敢发起攻击，李光弼军得以顺利通过。这些都体现了他因势定策、出奇制胜的用兵思想。

李光弼在作战指导上，十分重视利用地形、城池等的辅助作用。他的老对手史思明说他“长于凭城”①，乃是知言。太原之战，他以1万克敌10万；河阳之战，他以2万胜敌5万。他能如此“以少败众”，“长于凭城”是一重要原因。另外，李光弼还注重激励士气，瓦解敌军。河阳之战，敌大军攻中潬（河阳三城之一），李光弼登陴远望后鼓励部下说：“彼军虽锐，然方阵而嚣，不足虞也，日中当破。”② 用以鼓舞士气。他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准确分析敌人心理，用计使史思明的“万人敌”将领高庭晖、李日越不战而降，则是分化瓦解敌人取得成功的例证。

总之，李光弼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他主张从严治军，赏信罚必；严于责己，正身率下；重视提拔培养年轻将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做到从全局出发，庙略多算；在作战指导上，他主张践墨随敌，出奇制胜；扬长避短，瓦解敌军；善用地物，以少败众等。这些思想在当时均不失为真知灼见，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示作用。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肃宗乾元二年十月。

②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

第二节　李筌的军事思想

李筌是唐代后期较有成就的兵学家，道号达观子，生平事迹不详，约为玄宗至代宗时人。《直斋书录解题》谓李筌撰《阃外春秋》，"天宝二年上之"。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进书表末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记时间相符。这说明李筌在天宝二年（743年）时还为布衣，并在今河南嵩山之少室山隐居。《集仙传》说他有将略，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后入山访道，不知所终。今传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前有李筌自序及进书表，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永泰无四年，永泰二年十一月即改元为大历。可知此序为后人伪托无疑。其主要兵学著作，现传世的有：《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李筌注孙子》、《阃外春秋》残本、《阴符经疏》等。见于史籍著录但已经佚失的有：《青囊括》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彭门玉帐歌》三卷，《军旅指归》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等。其中军事价值比较大的是《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名《太白阴经》。古人有太白主军戎杀伐之说，因以名之。此书《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存有明汲古阁抄本、清内阁抄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长恩书室丛书》本等各种刊本。其中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善。全书分为人谋、杂仪、战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遁甲、杂式等10卷，100篇。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人谋》和《杂仪》中。该书博采道、儒、兵家军事思想之长，形成了某些独到见解。《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此言不妄。

《李筌注孙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卷，《通志·艺

文略》、《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郡斋读书志》、《国史经籍志》则作三卷，此书单行本刊刻较多，但是目前都已不可见。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郡斋读书志》说，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循甲》注成三卷”。《李筌注孙子》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较早注意到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法》的思想，探讨十三篇各篇次序与其思想脉络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解词释字，为后人系统理解《孙子兵法》的思想开辟一新的思路。二是他的注解也有一些新的发明。如《虚实篇》“饱能饥之”句，曹注“绝粮道以饥之”，失之褊狭。李筌注“饥敌之术，非止绝粮道”，并举高颎所献平陈之策，司马景王讨诸葛诞之谋，李密疲弊宇文化及之事以证之，认为“但能饥之则是”，比曹注更符合《孙子兵法》本意，也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三是他较早注意运用更多的史例解释《孙子兵法》抽象的军事原则，对于人们理解《孙子兵法》精义很有帮助，对后来注解《孙子兵法》者有较大启发和影响。另外，用《遁甲》作注，是《李筌注孙子》的一个显著特点，为人们了解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兵阴阳家的情况保留了一些资料。

李筌另著有《阃外春秋》十卷，天宝二年问世。此书记从周武王胜殷到唐太宗擒窦建德期间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是一部史略性兵书。题为吕尚、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等人注，实际上很可能是在李筌一人所为的《阴符经解》一卷以及李筌撰《阴符经疏》三卷中，体现了他的一些唯物主义和军事辩证法思想。

从李筌的存世著述看，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一、道、兵、儒兼取的战争观

李筌属道兵家，他把《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今本作‘取’）天下”思想做为人主行动的最高原则，认为只有“主有道德”，才能成“帝王之兵”，而“帝王之兵前无敌”。他

解释说："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①。但他并不像老子那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只是反对"妄动杀机"，"烦兵黩武，阴谋屠害，苟求奢荣，倾夺于世"的不义战争；赞成"罚叛讨逆，顺天行诛，皆合天杀之机"、"诛暴定乱"，以达成"定基"目的的军事行动②。主张"以顺讨逆，不伐无罪之国"③。认为"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因此，人主"必须三反精思，深谋远略"，而不可"寡于谋虑，轻为进退"④，即要慎战多谋。他讲"主有道德"，但不排斥儒家的"仁义"和兵家的"诡谲"，而是主张把三者统一起来，"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⑤。"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⑥。提出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原则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兴仁义之师"，不得已才诉诸战争，"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认为若能如此，则"四夷不足吞，八蛮不足庭"⑦。

二、"致富强"的经国治军思想

李筌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首先要使国家富强。国家的强弱不是不可改变的，

---

①《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主有道德篇》。

②《黄帝阴符经疏》卷上。

③《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形篇》李筌注。

④《黄帝阴符经疏》卷下。

⑤《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篇》。

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善师篇》。

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贵和篇》。

只要能“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就可使国家富强①。强调重农兴商以富国，同时要施智以强兵。二者不可偏废。“谷者，人之天也。天所以兴，王务农。王不务农，是弃人也。人既弃之，将何有国哉”②；“国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于财者，商旅不备也”；“用智者可以强于内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内而强于外”，“伯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赡”③。要求使贤用能，善拔贤能于穷困，“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管夷吾束缚于鲁”，“百里奚自鬻于虞”，他们都因得遇明主而致君强盛，故“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④。要按照智勇兼备的原则慎重任将，“先察后任”，不要“先任后察”。尤其强调将有智谋，认为“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者也”。他不但强调将帅个人素质优秀，而且强调将领群体素质结构合理，“智均则不能相使，力均则不能相胜，权均则不能相悬”，“情异则理，情同则乱，故大将以智，裨将以勇，以智使能，则何得而不从哉？”⑤ 军中要有“智能之士”、“辩说之士”、“向导之士”、“猛毅之士”、“巨力之士”、“技术之士”等有不同特长的人组成，他们取长补短才能产生良好的整体效应。他既反对将从中御，又反对以二心事君，“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内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⑥。同时，他强调要爱护士卒，励士激气，严明刑赏。认为刑赏是强兵的重要手段，“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⑦；要“赏无私功，罚无私罪”；赞成老子“不善人者，善人之资”的说法，认为可通过诛“不善人”以“成三军之威”⑧。重视

---

①③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国有富强篇》。

② 《黄帝阴符经疏》卷中。

④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贤有遇时篇》。

⑤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阵将篇》。

⑥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授钺篇》。

⑦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人无勇怯篇》。

⑧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政有诛强篇》。

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和阵法训练等，《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对军队的编成，条令性法规的实施，武器的配备，马匹的喂养，城壕烽台的构筑，阵图及教练等，都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强调“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①。认为能做到以上各点，即可国富兵强。

三、重谋胜的战争指导思想

在战争指导上，李筌主张先胜而后求战。认为“上策”是“不战而胜”，“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中列举了多种“顺倾之术”，即用顺敌心志之法达倾其社稷之目的。如，“荧惑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觋，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禀；遗之美好，使荧其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恣，贤臣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行，人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深化和具体化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强调要善用“探心之术”，“用所长制物”。在战场指挥上，要力争主动，采取“攻其爱”、“捣其虚”、“多其方”、“疑其事”等手段，陷敌于被动而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认为“无备不意，攻之必胜，此兵之要秘”②；要善于抓住要害，以巧取胜，“五寸之键，能制阖开；方寸之心，能易成败”③；要善于乘机，以快制胜，“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

①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

②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计篇》李筌注。

③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篇》。

见利不失，遭时不疑”①；“弩不疾则不远，矢不近则不中，势尚疾，节务速”②。要重视地利，“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③，“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但又认为地理险阻不是最后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地之险易，因人而险”④。要“守则深壁，多具军食，善其教练；攻其城则尚橦棚云梯、土山地道；阵则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虚，从疑击间”，“犄角势连，首尾相应”，⑤ 成不可胜之势，以待敌之可胜。强调出奇制胜，认为“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⑥。

四、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李筌军事思想中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他将《阴符经》中的“五贼”解释为“五行之气”，即客观存在的物质。批评那种认为人的勇怯来自先天，性情强弱来自地域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提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国家的强弱，也不是注定不能改变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变弱为强；反之，也会倒强为弱。反对迷信天命鬼神，主张用“行人”（使者、间谍）侦知敌情；认为所谓“天时”不是指孤虚向背之天时，而是指敌国有水旱灾害、虫荒霜雹荒乱之天时等。在战争指导上，他看到了一些军事矛盾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关系，力主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处理这些矛盾，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对阴阳、险易、勇怯、强弱、顺倾、善恶、战和、奇正、攻守、形神、心迹等军事范畴，有较深刻的认识。如，他认为“形”（物质）与“神”（精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

①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作战篇》。

②⑥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李筌注。

③④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形篇》李筌注。

⑤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地无险阻篇》。

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①，较深刻地阐明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兵法》关于“形”的理论。再如，他从“兵者诡道”的观点出发，对“心”与“迹”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阐发，提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② 的观点等。

李筌的军事思想中也有主张实行愚兵政策的糟粕，宣扬“智者之使愚也，聋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如驱群羊”③的思想。其关于风角杂占、奇门遁甲等的记述多为不科学的内容。

李筌的军事著述比较丰富，他在总结、继承前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发挥，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第三节　李泌、陆贽的军事思想

一、李泌的军事思想

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少年时即以“神童”名闻天下；“及长，博学，善治《易》，常游嵩、华、终南间”④，言神道之术，与皇帝、太子作布衣交，历 4 朝（玄、肃、代、德），事 3 君（肃、代、德）。先后 4 次被排挤出朝，每次又都被重新起用。曾任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江西判官、澧州刺史、杭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陕虢都防御水运使、陕虢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封邺县侯。“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⑤，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鸿谋丕猷，颇多建树，体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

①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兵形篇》。
②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篇》。
③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队将篇》。
④⑤ 《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国家战略思想。

（一）“务万全，图久安”的平叛靖乱思想

安禄山攻克两京后，唐肃宗向李泌询问平叛之计。李泌从“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的战略思想出发，分析了叛军的情况，认为“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不会成就大事，不出二年，即可平息；叛将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死心塌地地为其所用，“余皆胁制偷合”。据此，他提出了以迂为直、先疲后歼的平叛战略：命李光弼军从太原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郭子仪自冯翊（治今陕西大荔）入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如此，叛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治今北京城西南）、常山（治今河北正定），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这就是“以两军絷其四将”。肃宗之兵屯于扶风（治今陕西凤翔），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来春时，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李光弼成南北犄角之势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①。这个战略体现的基本原则，一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分散疲惫敌人兵力，我则以逸待劳，伺机出击，通过疲敌扰敌，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二是立足长远，以迂求直，即不取长安，而是直捣敌人巢穴；三是集中兵力，四面围攻，一举克复范阳，全歼敌人。这无疑是很高明的战略，如果肃宗采纳，很可能会大大缩短平叛时间，取得较为彻底的平叛战果。

但在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史思明围攻太原失败后，肃宗改变了主意，认为先取范阳过于迂缓，要求直取两京。李泌又指出：“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② 唐肃宗不听。在肃宗作出收复两京的决策后，李泌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二载二月。

又积极为之筹划，故当时就有“两京复，泌谋居多”① 之说。唐军以重大代价克复两京后，果然不久又陷入了“贼必再强，我必又困”的境地，证明了李泌意见的正确。

（二）稳定中枢、协调君臣关系以安军定国的思想

中央是否稳定有力，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因此，李泌十分重视唐廷内部矛盾的协调和处理，防止出现不安定因素。如，肃宗在灵武即位后，曾想任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率兵东出平叛，而不用其兄广平王李俶。李泌指出：“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②。肃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而避免了“玄武门之变”的再次可能发生。

收复两京后，肃宗想迎回已为上皇的玄宗，自请回东宫，触犯玄宗之忌。玄宗因此提出据剑南自奉，不再东归。父子之间出现危机。李泌对玄宗说，肃宗只是想请上皇还京“以就孝养”，才使玄宗同意回京，从而化解了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宦官李辅国和肃宗宠妃张良娣相勾结，谋害了李倓，又想谋害太子李俶。皇室内部出现危机。李泌以武则天故事劝说肃宗，指出“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③，使肃宗感悟，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宫廷之乱。贞元三年（757 年），德宗以太子李诵妻母有罪，欲废太子。李泌又坚决反对，使太子转危为安。李泌的这些做法，对于稳定皇室，进而稳定全国，起了重要作用。

如何处理朝廷与藩臣、皇帝与将帅之间的关系，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李泌十分重视这些关系的处理。其基本主张是区别忠奸，严明赏罚，反对猜疑功臣。如德宗怀疑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修石头城是有“异志”。李泌认为韩滉

---

① 《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肃宗至德二载九月。

公忠清俭，刚直不附权贵，故招来毁谤，其修石头城是出于“忠笃之虑”，并愿以全家百口保滉。韩滉因此得以效忠唐廷，迅即向朝廷“发米百万斛”，诸道听说后，“争相入贡”。德宗事后对李泌说：“滉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①]另外，李泌当着德宗、李晟、马燧的面强调德宗不要忌二将功大，二将也不要因位高自疑，从而保护了李晟、马燧等功臣，使之在平叛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对功臣赏赐上，他主张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反对以官赏功。认为这样做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李泌对奸人或叛臣坚决予以揭露或打击，如对卢杞、李怀光即是如此。

另外，李泌针对张延赏减官暴露出的弊端，主张只罢“冗员”，不去“常员”，恢复部分被减不当人员的官职；针对地方官的个人收入大大高于朝官、导致一些朝官人心不稳的情况，提出普遍增加朝官的俸禄，改变了“外太重、内太轻”的现象，“时以为宜”。这些措施对稳定唐廷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区别敌友、结友制敌的边防思想

安史之乱以来，吐蕃、回纥、南诏、党项等少数民族不断侵扰唐边境。李泌认为，其中主要威胁来自吐蕃。回纥在肃宗和代宗时期，曾两次助唐平叛，德宗因个人恩怨不愿与之和好，才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回纥有与唐修好的愿望，完全应该也可以争取。南诏“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但其“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即南诏）、西结大食、天竺”[②]，以困吐蕃的边防战略。德宗顽固地反对联合回纥，李泌犯颜直谏10余次，才说服他。由于唐廷采取了这一正确战略，使吐蕃陷于孤立，再加上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人民反抗等原因，其力量大为削弱，不能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九月。

再对唐边境构成威胁。唐得以积蓄力量为后来集中削藩平叛创造了条件。

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李泌十分重视维护唐朝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深谋远虑，反对只为眼前利益而不顾远祸大患。朱泚之乱时，吐蕃出兵助唐收复长安，德宗竟答应赂以安西、北庭之地为条件。打败朱泚后，吐蕃追击不力，反而在武功大掠而归，事后要求德宗如约。德宗想将两镇割与吐蕃。李泌极力谏阻道："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① 从而阻止了这一害己益敌、祸伏久远的错误决定。王夫之认为，李泌的这一抉择，使"吐蕃不能为中国之大患"②，可见其战略意义之大。

李泌所事都是昏君，他善于针对昏君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进言，使他们不得不听从自己的意见，从而少办些误国害民的蠢事。另外，他善于自处，言神仙怪异，不争权位，以避祸全身，取张良"欲从赤松游之故智"，达到能对国家扶危定倾之目的。其自处及进言方法，较陆贽更为灵活和有效。

总之，李泌是唐代后期杰出的战略家，他提出的建议多为国家战略。这些战略所体现的"务万全，图久安"的平叛靖乱思想，稳定中枢、协调君臣关系以安军定国的思想以及区别敌友、结友制敌的边防思想等，大都高瞻远瞩，极有见地，对稳定和巩固唐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有些观点和主张也有不妥或错误之处，如认为"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就失之片面；建议"疏爵土以赏功臣"，"食实封"③ 等，也有其弊端。

---

① 《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② 《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二载正月。

二、陆贽的军事思想

陆贽（754～805）是唐朝后期杰出的政论家，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年18登进士第，调郑尉，罢归后，补渭南尉。德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参与朝廷决策。曾预测“关中有急”并提出对策，但德宗未纳。后果如贽言。建中四年（783年），德宗避朱泚之乱至奉天，陆贽屡次进谏，指陈得失，出谋划策，并负责起草诏书，对克平寇乱，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贞元八年（792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主张改革弊政、积谷边境、完善防务等。后因被裴延龄所谗，于十年冬罢相，次年贬为忠州别驾，居10年而死。陆贽进言，“剀拂帝短，恳到深切”①。苏轼认为，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其论“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②。但由于主上昏聩，小人构陷，“帝所用才十一”③。陆贽谏言奏议中，有些论及军事，论由事发，而词旨高远，既是致用之对策，又多哲理之论述，《旧唐书》本传称他“练达兵机”，非为虚誉。

（一）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固国安边思想

陆贽十分重视民心向背对国家安危的重大作用，强调“人者，邦之本也”④，“与众同欲靡不兴，违众自用靡不废”⑤，因此，人君要“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⑥。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审察群情”，做到“欲恶与天下同”，“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

---

①③ 《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② 苏轼等《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

④ 《陆宣公奏议》卷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⑤ 《陆宣公奏议》卷二《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

⑥ 《陆宣公奏议》卷六《收河中后请罢兵状》。

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①。认为国家安危的根本在于京师的巩固，"备边御戎"亦是"国家之重事"。朝廷处理"京"与"边"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居重驭轻"，即在兵力部署上，以京师为重，边疆为轻。认为"居重驭轻，天子之大权也"，"弃重取轻"，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启祸之门也"②。但轻与重只是相对而言的，决不是说边防就不重要；相反，必须把边防作为国家防务的重点予以高度重视。陆贽认为，"边之大事，在食与兵"，"理兵足食"乃安边"备御之大经"，"兵不理，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敛导有方"，"安边之策，要在积谷，积谷之策，先务屯田"③，还须在丰年谷贱之时加贮军粮。为了提高边兵的战斗力，主张罢轮番防秋制，实行募兵戍边。为加强对边兵的管理，强调要因"人情"施治，而不可只靠行政手段驱逼，"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则乐生，顾家业则忘死"，因此，对"镇守之兵"(边防部队)"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欲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恩，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能如此，就会"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性而已矣"④。认为治军用兵，"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至于察安危之大情，计成败之大数，百代不变易者，盖有之矣，其要在于：失人肆欲则必蹶，任人从众则必全。此乃古今所同，物理之所壹也"⑤。

(二) 以诚信为主要特点的驭将理兵思想

陆贽认为，"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

---

① 《陆宣公奏议》卷二《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

② 《陆宣公奏议》卷一《论关中事宜状》。

③ 《陆宣公奏议》卷九《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④⑤ 《陆宣公奏议》卷十《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其柄"①。他针对唐德宗疑忌能将的心理特点，十分强调以诚信待将，反对对部下玩弄权术，认为"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对下"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领览万机，必先虚其心，鉴镜群情，必先诚其意。"君臣之间必须思想感情不断沟通，"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命。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②。提出录用人才的原则是"求才贵广，考课贵精"③，要劳神于选拔，端拱于委任，即对将帅经过精细考课后，一旦委任，就信而不疑，给将帅以"机便"之权，反对将从中御，认为君"定计于千里之外"，"将违令则失顺，从令则失宜"，"用舍相碍，否臧皆凶"。这里的关键是君不自用，"惟不自用，乃能用人"④。认为吐蕃之所以能攻有余，而唐守不足，就在于"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我之部分离析"。同时，反对对悍将行姑息之政，认为"唯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对已露叛逆之兆者要及早采取措施，"太上消匿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但在处理上要慎重，如对李怀光即是如此。他认为："制军驭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用人的要契在"顺于物情"，"通于时变"⑤。在理兵方面同样强调因情而治，顺势利导，对"攻讨之兵"（野战部队）可不拘常制，为实施奇诡之谋，强调"进退死生，唯将所命"；对"镇守之兵"，则应以"理术驭"，而不可只以法制驱⑥。十分重视赏罚的作用，认为"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

---

① 《陆宣公奏议》卷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② 《陆宣公奏议》卷三《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

③ 《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④⑤ 《陆宣公奏议》卷五《兴元奏靖许浑瑊李晟等诸军兵马自取机便状》。

⑥ 《陆宣公奏议》卷十《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衡之于轻重，輗軏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①。反对滥赏官爵，不施刑罚，主张赏必当其功，罚必合其罪。"理戎之要，最在均齐"②。对唐德宗要封进瓜果者为官、封所有随皇帝逃难的中官及朝官为"定难功臣"等做法予以坚决反对。强调"行罚先贵近"，"行赏先卑远"，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令不犯"，"功不遗"③。柔远人、服强暴的"要术"是惠威兼施："宣惠以养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养则不挫，惠而见尊则有恩。是以惠与威交相蓄也，威与惠互相行也"④。必须要克服官多兵少、"一国三公"、"十羊九牧"的现象，建牙拥节者过多，兵力分散，是军队缺少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在驭将理兵方面，要坚决革除"措置乖方，课责亏度，则匿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等"六失"⑤。强调"将贵专谋，军尚气势，训齐由乎纪律，制胜在于机权"⑥，认为这才是制胜之军应有的特征。

（三）分别轻重、以长克短的作战指导思想

陆贽认为，在敌人甚众的情况下，应"察其缓急，审其重轻"，而不可四面出击，平均用力。"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后先。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泾原兵变前，他提出，对藩镇应区别对待，以利分化瓦解，打击最为凶顽之敌。"幽、燕、恒、魏之寇，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急者应备之以严，抽调可缓地区的部分兵力以支援之，以图"化危为安，息费从省，举一而兼数利"⑦。主张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以己之易克敌之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

---

①②⑤《陆宣公奏议》卷十《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③《陆宣公奏议》卷三《奉天论拟与翰林学士改转状》。

④《陆宣公奏议》卷六《收河中后请罢兵状》。

⑥《陆宣公奏议》卷九《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⑦《陆宣公奏议》卷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不匮而事速就”①，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原与边远少数民族军队之短长。认为“戎狄”之所长是“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犹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据此，中原不应与敌“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而应扬我之长以克敌之短。中国之长是“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完守御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②。强调用兵既要熟悉军事，又要善于乘时而动，因势定策，“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③等。

陆贽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儒家与兵家思想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善于从政治上思考问题，以抚御治理见长。他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限制土地兼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尖锐的矛盾等，其军事主张与之相适应。这些都有其进步的一面，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但他毕竟又是李唐王朝的忠实支持者，从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出发，有其难免的阶级局限性。

第四节　杜佑、杜牧的军事思想

一、杜佑与《通典·兵典》

《通典》200卷，唐杜佑编撰。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高门望族，“以荫入仕”，事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历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岭南、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度支盐铁使、司徒、同平章事等职，封岐国公。多年

①②③《陆宣公奏议》卷十《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掌管国家财政，是唐朝后期重要的政治家和理财家。杜佑一生虽政务繁忙，但从未缀学。从大历元年（766 年）开始编撰《通典》，至贞元十七年（801 年）完成，历时 30 多年。《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内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 9 门。其中兵典门 15 卷。与他典不同的是，兵典谈典章制度的内容很少，只选择“可适于今之用者”。主要内容是围绕《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重要军事观点，阐述兵法谋略，将历代有关治军、作战等方面的事例和言论按照 15 个类别、136 个条目划分，分别对一些重要的军事原则进行例释和阐发。

《通典·兵典》中反映了杜佑在军事上的一些见解，有些是针对当时唐朝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其主要观点是：

主张强本弱枝，反对里轻外重。杜佑在《兵序》中称赞汉代的做法：“重点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也。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将军都“因事立称，毕事则省”，“身奉朝请，兵皆散归”。又说，唐初时，有事命将“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认为这样做，“实安边之良策，为国家之永固”。一旦出现“王纲解纽，主权外分”的状况，就必会发生变乱，“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①。

慎选将帅，先德后才。为防止出现外藩“强大而悖”的局面，除谋求之于权力制衡的“势”之外，还须重视对将帅个人素质的考察，二者不可偏废。选将的标准是“先之以中和，后之以材器。或未训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铦刀，委之专宰，利权一去，物情随之，噬脐之喻，不其然矣”②。不难看出，这是对安史之乱及后来藩镇割据时在用人方面经验教训所作的总结。

患在德薄，反对“穷武”。杜佑主张建立强大的“仁义”之师，

---

①②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但反对穷兵黩武，认为穷兵黩武的根源在于人主对土地的奢求，因而提出“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的论点，对秦皇、汉武用兵扩地颇有微词，对隋炀帝则进行了更为强烈的谴责。推崇《老子》“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的话，主张广修文德，不战屈人，辅之以兵。

重视法制，以治求胜。强调军队要有严明的法令制度，对士卒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列太公教武之法、吴起《教战法》、《魏武军令》、《卫公兵法》等关于治军教战的言论、所定法规及历史上以法从严治军故事等进行说明。认为临敌易将、军政不一、军无政令，赏宴不均、军将骄傲、士众悲恐等必败。强调将帅对下要“推诚”、“示信”、“示义”、“示惠”、“抚士”、“明赏罚”，使将士志坚，保持必胜的信心和高昂的士气。

以谋取胜，因情用兵。这是《兵典》中的主要内容，从第6卷到第15卷基本都是讲的这一问题。所讲谋略大致有这样几类：（1）示形欺敌，声东击西（第六卷），如“示弱”，“示怯”，“示缓”，“示彼而攻此”，“示无备设伏取之”，“示强”，“声言击东其实击西”等。（2）佯退败敌，兵机务速（第七卷），如“伪称败怠敌取之”，“引退设伏击之”，“敌退追奔”，“掩袭”等。（3）避锐击惰，出其不意（第八卷），如“坚壁持久候隙破之”，“敌饥以持久弊之”，“因敌三鼓气衰败之”，“攻其不整”，“击其不备”等。（4）以逸待劳，“取背破之”（第九卷），如“师不远袭”，“饵敌取胜”，“两军相对继遣军助攻”，“乘敌疲败之”等。（5）攻其必救，专己分敌（第十一卷），如“必攻其易”，“乘敌乱而取之”，“分敌势破之”，“力少分军必败”等。（6）利用地形，励士取胜（第十二卷），如“自战其地则败”，“据险隘”，“死地勿攻”，“激怒其众”等。（7）“围敌留缺”，绝敌粮道及水攻、火攻之法（第十三卷），如围敌留缺，绝敌粮道及辎重，使用火兵火兽火禽火盗火弩，水攻，敌半涉水而击等。（8）多方误之，攻心夺气（第十四卷），如“因机设权”，“先攻其心”，“夺敌心计”等。（9）因势取胜，先声后实，包括因敌无固志，因敌乱，因敌惧，乘胜，乘势等。每

一类中有若干小目，一小目大致为一个军事原则，引古代战例或治军故事进行论证和解释，以使人们掌握这些原则的精义。

《通典·兵典》中大量引用《孙子兵法》之言，并对有些引文加以训释。后人将这些训释辑入《孙子十家注》中。书中还引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等兵书言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杜牧的军事思想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之孙，唐代后期著名诗人，在兵学理论研究上也颇有造诣。历官监察御史、宣州团练判官、殿中待御史内供奉、中书舍人等职。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慨然最喜论兵”。著有《注孙子》。其外甥裴延翰编辑的杜牧诗文集《樊川文集》中有论兵多篇，其中《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周相公书》、《注孙子序》等，均为很有见地的军事文论。

杜牧论兵的主要军事观点有：

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同以刑律惩处罪人一样，“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活善人”①。从当时实际出发，他强调以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诸藩割据。提出统治者必须高度重视军事，对士大夫耻言兵的现象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轻视军事会使国家“亡失根本”。他认为平藩的上策是朝廷“自治”以图强。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根治军队中“不蒐练”、“不责实料食”、“赏厚”、“轻罚”、“不专任责成”等“五败”②。反对实行“姑息之政”，认为姑息政策乃是“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③。在治军上，杜牧强调将领的作用，

---

① 《樊川文集·注孙子序》。

② 《樊川文集·论兵》。

③ 《樊川文集·守论》。

"民之性命，国之安危，皆由于将也"，优良将帅的基本素质应该是"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①，主张以"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主兵，反对任用"壮健击刺不学之徒"为帅②。这是针对安史之乱以来在任将方面的教训提出的观点。强调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注意平时养成，"居常无事之时，须恩信威令先著于人，然后对敌之时，行令立法，人人信伏"③。在战争指导上，主张"计画"应"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④。为达到平藩的目的，朝廷要控制河北，如此，则可北御寇，南却敌，"出则胜，处则饶"，从而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在武宗平刘稹时，他提出了扼险、"捣虚"、"速擒"等谋略，为宰相李德裕所采纳，史称"泽潞平，略如牧策"⑤。在防御回纥、吐蕃扰边方面，杜牧主张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在敌人自恃天寒地远，认为唐军不会进攻他们时发兵进攻，"击其空虚，袭其懈怠"。这一主张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思想。《樊川文集》论兵，多着眼于现实对策研究，体现了经邦致用的精神。

杜牧关于军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在他的《注孙子》一书中。此书大约在大中三年（849年）四月前完成。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讲到，自己曾将所注孙武十三篇献给周墀。周墀为相在大中二年五月至三年四月，可知其《注孙子》问世时间当在此间。《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皆著录为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通志·艺文略》则作一卷。此注后被收入《五家注孙子》、《孙子十家注》中。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看，杜牧之注不但数量多，且质量亦较高，故后人有称其为曹操之后第二大注家者。杜牧对《孙子兵法》这部古代兵学圣典从总体上认识比较全面准确，认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⑥，较

①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计篇》杜牧注。

②④⑥ 《樊川文集·注孙子序》。

③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行军篇》杜牧注。

⑤ 《新唐书》卷一六六《杜牧传》。

有些学者只见《孙子兵法》其诈不见其仁为有见。他注意从现实出发，总结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进行注解，多有发明。注中大量征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阐发《孙子兵法》本旨，弥补了曹注过于简略的不足。如《作战篇》“杀敌者，怒也”句，曹注只有“威怒以致敌”5个字，杜牧注：“万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势使然也。田单守即墨，使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坟墓之类是也。”不但较曹注具体，且对如何实现《孙子》提出的军事原则做了进一步阐发，对人有启智益慧之效。欧阳修《孙子后序》称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但杜注也有不足，有的不够准确，陈皞认为其注“阔疏”，在己注中间或攻中其短。

第五节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是一部以《老子》各章首句为题，儒、道、兵思想杂糅，着重论述如何不战而胜、不争而取、戢兵去战的战略性兵书，共4卷，81章。作者王真，唐宪宗时人，“少习儒业”，后“久从戎府”，由朝议郎出任汉州刺史兼掌军事。此书原为上下两卷，后析为四卷，于元和四年（809年）七月上于唐宪宗。《道藏》、《宛委别藏》、《指海》等均有收录。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不止，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王真上此“述”的目的，似想为改变这种现状开一剂以文止战的药方。李唐皇帝自认为是老子的后裔，唐太宗诏称“朕之本系出于柱史”，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上元元年（674年），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置玄学博士，规定习老庄之学的士人可以应科举考试。老子先后被加封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等，帽子大得吓人。可见，老子在唐代具有很高的地位。作者欲借老子之名以动宇内，宣扬自己的观点，劝唐廷与藩镇都遵照这位“太上玄元皇帝”的意旨，修明政治，戢兵去战，从而达到作者想消弭战乱的目的。当时唐宪宗在平定了

西川、夏绥、镇海之后，有些不够清醒，正准备多路出击，再伐成德。作者选在此时上此述，似含有劝阻之意。

一、“去争”、“遏乱”的战争观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战争。该书认为，战争起源于“争”，“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①。引起“争”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乱逆必争，刚强必争，暴慢必争，忿至必争，奢泰必争，矜发必争，胜尚必争，违愎必争，进取必争，勇猛必争，爱恶必争，专恣必争，宠嬖必争”。王者、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有一于此”，就会引发争战②。要去战，就须绝本塞源，用老子“无为”、“不争”的思想根除之。这就要求统治者戒贪、不奢、绝矜，“无为兵战之事”，“不争”奢侈之物，力戒“满溢”之志。“无为者，戢兵之源；不争者，息战之本”③，“既绝矜尚，遂无斗争”④。严厉批评那种“取不足之人，奉有余之室”，聚敛百姓的“盗贼”行为，提出上之人能知止足，则天下之人常足，兵战之事就会自去。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认为兵者是凶器，但亦不可废。提出文与武的关系是“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备也”⑤，二者都不可废坠。认为“圣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愠怒也，不以其争夺也，不以其贪爱也，不以其报怨也”，整军理兵，“蓄而藏之以谨无良，以威不谌。非用之于战阵，非用之于杀伐，非用之于田猎，非用之于强梁，此圣人用兵之深旨也”⑥，即理兵的目的在于使不良者谨，不谌者顺。迫不得已而用兵，目的是为了“遏乱”，“自轩辕黄帝以兵遏乱，少昊以降，无代无之”，故兵不可忘，亦不可好，“忘战则危，好战则亡”⑦。

---

①⑤⑥⑦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

②③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一《上善若水章》。

④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一《不尚贤章》。

强调对战争要有准备。注重为止战而备兵，“用其所不用”；反对好战于外而无备于内和麻痹轻敌，认为“好战于外，犹有胜负；无备于内，必致灭亡”①；对战争的到来要有预见性，以“戢兵于未动之际，息战于不争之前”②。

二、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的治国理军思想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强调治国理军要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道、德、仁、义、礼，王者当兼而用之，亦犹五材相资，阙一不可也”③。力图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作为治理国家和军队的理论武器。五者之中，道居首位，德、仁、义、礼都要符合道。将《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改释为：“绝有迹之圣，弃矜诈之智”，“绝矫妄之仁，弃诡谲之义”④，将“礼者，乱之首”改释为“乱矣，非礼则无以理之”⑤，故礼是“理乱之首”，完全改变了《老子》的本意，以宣传作者自己的主张。认为“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德者，人不归也”⑥。强调统治者正身以率下，所谓“经也五千，理必归于自正”，用儒家经典《论语》解释《老子》“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今本‘正’作‘定’）”为：“子率以正，孰敢不正？”⑦“自正”并非根绝一切欲望，考虑到“思虑嗜欲者，人之大性存焉，可节也，不可绝也。故劝王侯令少之、寡之，则国延其祚，人受其赐也”⑧。强调统治者对人民要“慈”；要谦柔用晦，“以道化天下”，“以百

---

①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四《用兵有言章》。

②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二《善行无辙迹章》。

③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三《上德不德章》。

④⑧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二《绝圣弃智章》。

⑤⑥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

⑦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二《道常无为章》。

姓心为心"，如此，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干戈就会自息。"若夫人君克己复礼，使天下归仁，既得亿兆欢心，蛮夷稽桑，自然干戈止息"①。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胜利，所谓"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②。

三、以不为求为的战争指导思想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在战争指导上主张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损求益，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以无私成其大私。认为"无为"是取得并长享"美利"的唯一正确途径。"至公无私即王道自著……自然能长且久"③。强调君主不自大，以成其大，"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主张战胜后要以丧礼处之，反对以欺诈邀功。主张正奇并用，权与道合，"奇者权也，权与道合，庸何伤乎？"④ 用兵反对轻躁，主张重静。认为求胜非难，持胜难；要持胜，就要善于自为卑小，常示寡弱，而不可为强梁于天下。"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气任力"⑤，就可常处于有利地位。重地利，尚谋虑，不失时，"兵动息必当择利而处之"，"兵者所尚谋虑精微"，"兴兵整众，应敌救灾，必当其期"⑥。指挥员要"果敢"而不要"勇猛"，因为后者好"残杀其人"。"果而勿强"之义是"不伐其功，不乐杀人，恬淡为上，虽胜不美"⑦。

作者把《老子》"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解释为"使众庶之徒多智即尽能为国之贼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

---

①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四《用兵有言章》。

②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二《善行无辙迹章》。

③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一《致虚极章》。

④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三《以政治国章》。

⑤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四《含德之厚章》。

⑥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一《上善若水章》。

⑦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二《以道佐人主章》。

其率直朴素者乃所以为国之福禄也"①，借以宣扬愚民政策；看到了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现象，但忽略了其转化的条件，如认为"兵强则不胜"，因此，盲目反对强兵；过分夸大"无为"、"不争"的作用；反对置之死地而后生，认为"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②。《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不仅仅是兵书。王真认为《老子》"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因此，有些解释过于牵强或失之褊狭。如将《老子》的"无为"仅解释为"无为兵战之事"，将"有名"解释为"军国之务"③ 等即是。另外，作者以儒家经典解释《老子》，有的也不尽准确。

但《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毕竟是一本战略性的富有哲理的兵书，对于我们在当前条件下，研究不战而胜、不争而取、戢兵去战之策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六节　其他兵学著作

一、《射　经》

《射经》，又称《教射经》，属"兵技巧"类兵书。作者王琚，怀州（今河南沁阳县）人，明天文象纬，曾参预过平太平公主之乱，进户部尚书，封赵国公，时号内宰相，为李林甫所忌，被诬自杀。《通典·兵典》中收录了《射经》中的《总诀》部分，名为《教射经》，很可能是当时军队中教习射箭用的教科书。明陶宗仪编《说郛》收录《射经》全文。全书分总诀、步射总法、步射病色、前后手法、马射总法、持弓审固、举把按弦、抹羽取箭、当心入筈、铺膊牵弦、钦身开弓、极力遣箭、卷弦入鞘、弓有六善等14节。中心内容讲射箭的程序、要领和注意事项。如引弓时，

①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四《古之善为道章》。

②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三《出生入死章》。

③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一《视之不见章》。

要做到“端身如干，直臂如枝”，“引弓不得急”，“不得缓”，“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学射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始于一丈，百发百中”后，逐寸增加，至于百步，亦能百发百中，然后练射活动靶，“或升其的于高山，或致其的于深谷，或曳之，或掷之，使其的纵横前却”。发射时，要“目以注之，手以驻之，心以趣之”①等。此书对射箭技巧做了较系统的总结，多为后世教射者所遵奉。

二、《贾林注孙子》、《陈皞注孙子》

唐人注《孙子兵法》，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5家（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另外还有纪燮注、孙镐注（《纪燮注孙子》又称《孙子集注》，《郡斋读书志》著录；孙镐注孙子，收在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存《十家注孙子》中，见《官板书籍解题略》）等。这些注释大都注意总结新的经验，在有些方面充实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及曹注的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在此，我们分别简要介绍一下《贾林注孙子》和《陈皞注孙子》。

《贾林注孙子》，《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著录为一卷，《国史经籍志》则作三卷。《郡斋读书志》有“唐纪燮集唐孟氏、贾林、杜佑三家所解”，是其注曾收入纪燮集注本中。此书与单行本俱亡。贾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注者贾林，新旧《唐书》中无传。据《资治通鉴》载，他曾为李抱真参谋，于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多次奉李抱真命游说王武俊，使王武俊与李抱真、马燧相结盟，并去伪号。从其游说王武俊的说词看，此人很有见识，且能言善辩。其注孙子在《十家注孙子》中保留较少，但亦时有所见。如，他率先提出，《用间篇》之“因间”应为“乡间”，张预、刘寅均赞同此说，樱田本

① 《教射经》，《说郛》本。

《孙子兵法》即作“乡间”。他在讲《计篇》将帅条件时说：“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看到了5个条件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关系，甚为精辟严谨。他注《九地篇》“是故散地则无战”句说：“地无关阏，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地形之说，一家之理。若号令严明，士卒爱服，死且不顾，何散之有？”不拘成说，有利于防止读者理解此句时产生片面性和绝对化。

《陈皞注孙子》，《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一卷；《郡斋读书志》、《国史经籍志》则作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家注孙子》中有陈皞注。此书已不见，单行本亦佚。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陈皞，事迹不详，约与杜牧为同时代人或略晚于杜牧。《郡斋读书志》说陈皞“以曹公注隐微，牧注阔疏，重为之注”，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中将其注与曹操、杜牧注并称为“三家注”。其注虽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若曹、杜，但也有一些纠谬补阙的新见。如《军争篇》“饵兵勿食”句，李筌、杜牧都将“食”解为敌人造设的毒水、毒食、毒酒等，要求军队对此不要饮食。显为谬误。陈皞指出，“饵兵非止谓置毒也”，谓“敌若悬利，不可贪也”，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再如，《火攻篇》“行火必有因”句，曹操、李筌皆谓“因奸人”为内应，失之褊狭。陈皞注：“须得其便，不独奸人”，可使人广开思路。其注《行军篇》“兵非多益，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句说：“言我兵力不多于敌，又无利便可进，不必他国乞师，但可厮养中并力、取人，亦可破敌也。”似是对唐借吐蕃、回纥之兵平叛教训的一种总结。

三、军事地理图书

军事地理学在唐代有了重大发展。《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书的出现，对战争指挥及军事地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太宗子魏王李泰组织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等人所撰

《括地志》,《新唐书·艺文志》载《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三年十道图》,《旧唐书·贾耽》载贾耽绘《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当均有一定的军事价值。《新唐书·郑虔》载:郑虔学长于地理,山川险易,方隅物产,兵戍众寡无不详,尝为《天宝军防录》。此书当是一部军事地理专著。

《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服务于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地方总志,李吉甫撰,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曾任忠州、郴州、饶州刺史、淮南节度使,两度出任宰相,有丰富的阅历和地理知识及图书资料条件。他主张把"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作为编写地理图书之本,目的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其军事目的十分明确。全书原有图和志共40卷,又目录2卷,总42卷。以贞观十三年(639年)《大簿》规划的10道为纲,结合当时的47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道里、贡赋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图在北宋时亡佚,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34卷。此书对后来的《太平寰宇记》等地理图书的编纂有较大的影响。

军事地图已成为当时进行军事决策的重要依据。《新唐书·李吉甫传》云,宪宗将河北形势图张于浴堂门壁,"每议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图,信如卿料矣'。"又《新唐书·安禄山传》中说,安禄山反前三天,"合大将置酒,观绘图",此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人人赐金帛,并授图",可见,当时的军用地图已较详备,成为战略决策和战场指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七节　名将事略

一、忠烈善战的张巡

张巡(709~757)是唐后期抗击安史之乱的著名将领,邓州

南阳（今属河南）人，自幼博览群书，通晓阵法，气志高迈，重节尚义。开元末擢进士第，由太子舍人出为清河令，治绩卓然。秩满还都，有人劝他拜见杨国忠，以求显用。张巡回答："是方为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后改任真源令，县内多豪强，仗势不法。张巡下车伊始，以法诛首恶，赦余党。真源（治今河南鹿邑东）称治。

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叛将张通晤陷宋（治今河南商丘南）、曹（治今山东定陶南）等州，谯郡太守杨万石逼张巡投降叛军，张巡率县吏哭祭于玄元皇帝（老子）祠前，遂起兵抗击叛军，从者1000多人。与单父尉贾贲合众3000余人，进驻雍丘（今河南杞县）。当时雍丘令令狐潮举兵叛，外出归来，攻雍丘，贾贲战死。张巡驰骑决战，身受伤而不顾。众人推举他主持军事，吴王李祗将兖州（今属山东）以东地区委任张巡经略。

三月，令狐潮率4万余众逼近雍丘。张巡利用其恃众轻敌心理，亲自率军出城，对敌发起突然攻击，令狐潮果因缺乏戒备，被迫退军。第二天，叛军又来攻城，张巡命于城上立木栅拒敌，并用火把焚烧敌人，使叛军不敢攻城，张巡则伺机出击，不断予敌以重创。两军相持60余日，大小300余战，令狐潮终败走，张巡乘胜追击，俘其2000余人。五月，令狐潮又引兵来攻。劝张巡投降，张巡怒斥其反叛，令狐潮赧然而去。城中有大将6人劝张巡投降，张巡率众军士拜皇帝像，引6将至，责以大义，斩之。将士因此互相勉励，誓死守城。坚守40余日，城中矢尽，张巡令作草人千余，披黑衣，夜缒城下，叛军争射，因此得箭数十万枝，其后再夜缒人，叛军不设备，张巡乃以死士500斫叛军营，追杀10余里。后又多次主动出击，屡败叛军，令狐潮被迫退还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张巡又夜袭白沙涡（今河南宁陵北）叛军，大破之。八月，率兵3000夜袭叛将张庭望部。十月，再败令狐潮军于雍丘北。十二月，令狐潮在雍丘北置杞州，以绝张巡粮道，叛将杨朝宗率马步2万袭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张巡率3000余众东守宁陵，与睢阳太守许远会合，大败杨朝宗，斩万余人。诏拜

张巡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

至德二载（757年），安庆绪派尹子奇率同罗、突厥、奚兵与杨朝宗合兵凡13万，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张巡应许远之邀，率众入援睢阳，与其合兵6800人。张巡励士固守，有时一天打20仗，士气不衰。昼夜苦战60日，擒敌将60余人，杀士卒2万多，尹子奇败退。许远自以为材不及张巡，请其专掌军事而自己居其下。诏拜张巡御史中丞，许远侍御史。三月，尹子奇二次围城，张巡率全军出战，大败叛军，追奔数十里，斩3000余人。相持至五月，张巡采取疲敌扰敌之法，命士民常于夜间突然击鼓，使叛军通宵备战，当其松懈时，率南霁云等10余将突袭敌营，杀5000余人，并用计射伤尹子奇左目，迫敌军退走。七月，尹子奇率军数万三攻睢阳。此时，睢阳久战无援，仅剩士卒1600人，粮食将尽，士卒每日仅分米一勺，与树皮、茶纸掺杂而食。叛军用云梯、钩车、木驴等器械攻城，张巡随机应变，一一破之。叛军遂掘壕立栅企图长期围困。到八月时，城中仅存士卒600人，张巡与许远分别把守城池，并派南霁云突围到临淮（治今江苏洪泽西）、彭城等地求援，诸守将均拥兵不救。叛军知外援绝，攻城愈急。十月初九，城被攻陷，张巡等被俘。尹子奇问张巡："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不屈而死。

张巡不独忠烈，而且多谋善战。其作战指挥的主要特点，一是善于利用城池，实施积极防御，以攻为守，攻守兼施。因此能以少胜多，多次打败敌人。二是善因情灵活用兵，虚实结合，有无相生，由缒草人到缒真人，从击鼓扰敌到奇兵突袭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三是在治军上，主张以忠义励士，诚信待下，"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上下相习，人自为战"，"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下争致死力，故能以少击众"①。这是其在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坚守孤城的主要原因所在。

---

①《新唐书》卷一九二《张巡传》。

二、"器伟材雄"、"长于应变"的李晟

李晟（727～793）是唐代后期著名平叛守边将领，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性雄烈有才，善骑射。年18从军，随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击吐蕃，引弓一箭毙其骁将，被誉为"万人敌"。后被凤翔节度使高升召补为列将，因击叠州羌于高当川、岩州连狂羌于罕山有功，累迁左羽林大将军。广德初年，击党项有功，授特进、试太常卿。

大历三年（768年）九月，李晟奉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之命，以右军将率兵千人疾出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袭占吐蕃定秦堡（在今甘肃临潭境内），虏其堡帅，迫使吐蕃军撤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之围。迁开府仪同三司，以右金吾大将军为泾原、四镇、北庭兵马使。八年，率游兵救出被吐蕃军围困的泾原节度使马璘，封合川郡王，归朝后，为右神策都将。德宗即位后，吐蕃寇剑南，诏李晟率神策兵救援，克飞越等3城，追杀至大渡河，斩敌千人。

建中二年（781年），魏博田悦反。李晟任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等合兵大破田悦于临洺（今河北永年）。三年，又大败田悦于洹水。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魏府左司马。朱滔、王武俊围赵州（今河北赵县），李晟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兵北趋定州（今属河北），与义武节度使张孝忠合兵以图范阳，迫王武俊解赵州之围而去，后与张孝忠子升云围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郑景济于清苑（今河北保定），朱滔、王武俊来援，李晟内攻郑景济，外抗朱滔等，自四年正月至五月不解。李晟因患重病，众将共计，率军退保定州。

建中四年十月，发生泾原兵变，朱泚据长安称帝，德宗出逃奉天。李晟闻讯后，率军经飞狐道（即灵丘道，由今河北定州经灵丘至山西大同东北）至代州（今山西代县），诏迎拜神策行营节度使，进驻东渭桥（在今陕西西安东北），以图收复长安。当时朔

方节度使李怀光率5万兵马屯咸阳，因与唐廷矛盾激化而生反叛之意。他暗中与朱泚通谋，并奏请德宗允许与李晟合军，企图将其吞并。诏准后，李晟军在咸阳西的陈涛斜与之会合。后李晟发现李怀光有异志，请求德宗同意后，又移驻东渭桥，被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李晟提孤军处朱泚与李怀光之间，又缺粮草，处境险恶，他一方面卑词厚币伪致诚于李怀光；一方面任张彧为假京兆尹，积极筹备粮草。同时用忠义激励士卒，取得了骆元光、尚可孤、戴休颜、韩游瓌等各部的支持与配合，使李怀光畏为所袭，奔往河中。

兴元元年（784年），李晟进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会集诸军，进逼长安。当时，李晟家属在长安城中被朱泚当作人质。左右有言者，李晟涕泣数行说："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派其故人游说，李晟怒斥其叛并立斩之。他与士卒同甘苦，将卒受其感发，士气甚高。为攻克长安，李晟采取了以苑北为主攻方向、直捣腹心的方略，于五月二十五日引兵至光泰门外筑垒待战，次日，乘朱泚派将来战之机攻入城中，朱泚弃城西逃，唐军一举收复长安。进城后，李晟禁令军队扰民，别将高明曜取敌妓一，司马伷取敌马二，李晟命令将他们立即斩首示众。因此部队纪律甚严，以至有些居民当天不知王师入城者。李晟因功拜司徒，兼中书令，实封千户。

不久，李晟为凤翔、陇右、泾原节度使，兼行营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将乱将王斌、田希鉴等绳之以法。唐德宗欲赦李怀光罪，李晟上言有五不可，请以精兵5000破敌。促使唐最后作出了以武力平灭李怀光的决策。

贞元二年（786年），李晟于汧阳（今陕西千阳北）以伏兵击败吐蕃相尚结赞，又于摧沙堡（今宁夏固原西北）袭败吐蕃军2万。吐蕃君臣大惧，用离间计破坏其与唐廷的关系，李晟因此被解除兵权，进拜太尉，中书令。死后册赠太师，谥曰忠武。

李晟性疾恶，临下明，善知部下之长；敢犯言直谏，尽大臣之节；治军严明，赏罚必信。在作战指挥上，不畏强敌，善激励

士气，团结友军，谋定后战，身先士卒，临敌应变，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并用，因而能克复长安，立不世之功。史书称他“器伟材雄”，“长于应变”，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雄强有力”、“沉勇多算”的马燧

马燧（726～795）是唐朝后期著名将领，字洵美，祖籍右扶风（治今陕西西安西北），后徙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自幼好兵书战策，史书称他“雄强有力”、“沉勇多算”①。安禄山反唐，使贾循守范阳。马燧往说贾循反戈，贾循犹豫不决，后被安禄山处死，马燧逃脱。代宗宝应时，被泽潞节度使李抱玉任为赵城尉，回纥军因参与平乱有功，骄纵不可一世，在回国途中，动辄杀人。马燧自请代李抱玉前往馈劳。他赂其酋长，又让一些死囚扮成身边差役，这些死囚有一点违令之处，马燧就当回纥兵之面将他们处死。回纥兵因此惧其威严，此后再没有敢肆虐者。他曾向李抱玉进言，仆固怀恩树党自重，其子必窥太原，应做好准备。后果如所料。被授左武卫兵曹参军。后历任郑、怀、陇州刺史，均有政绩。唐代宗雅闻其才，授商州刺史兼水陆转运使。

大历十年（775 年），马燧任河阳三城使。十一年，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合兵征讨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叛将李灵耀，李灵耀以锐卒“饿狼军”8000 与战，马燧独战破之。田悦率众 2 万来援，李忠臣合战不利，马燧出奇兵击败田军，田悦单骑逃遁。汴州平定后，马燧让功于李忠臣，出屯板桥，后还河阳（今河南孟州南）。

大历十四年（779 年），马燧进迁河东节度使。当时太原兵力孤弱，马燧募得数千人，补骑士不足之数，数月后，将其训练成精锐士卒。命按大、中、小三种型号制造铠甲，以期使战士穿上

---

① 分见《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

合身，便于战斗。制造战车，行以载兵，止则为阵。由于他严格抓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因此，其军兵器完锐，威震北方。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迁检校兵部尚书，封豳国公。

田悦继任魏博节度使，马燧曾预言田悦必反。后田悦果然起兵围邢州（今河北邢台）、临洺（今河北永年）。马燧奉诏率步骑2万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兵马使李晟合兵前往援救。马燧在行军路上让人给田悦送信表示友好，使田悦放松戒备；至邯郸后，斩田悦来使，破其支军，大败田悦派来阻击唐军的大将杨朝光，斩5000人，俘800人。然后进军临洺，与田悦军展开殊死决斗，凡百余返，大破叛军，斩首万级，俘虏千余。邢州、临洺之围遂解，马燧因功迁尚书右仆射，进兼魏博招讨使。

三年正月，马燧率军与田悦夹洹水（今河南安阳河）对峙，他采取攻其必救之策，令诸军沿洹水夜趋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诱田悦尾追，然后以逸待劳，于魏州城西又大败田悦军，斩获2.3万余人，围田悦于魏州。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长史。朱滔、王武俊联兵5万救魏州，田悦决水灌唐军，马燧退保魏县，后逢朱泚之乱，回军太原。遣军司马王权率5000兵赴奉天，派子汇与诸将子屯中渭桥，同时加强晋阳防御，以备不测。

李怀光反河中，诏马燧为河东、保宁、奉诚军行营副元帅，与浑瑊等合兵攻讨，晋、隰、慈州降，因拜马燧为晋、绛、慈、隰节度使。兴元元年（784年）十月，率步骑3万攻拔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分兵夺取闻喜（今山西闻喜西北）、万泉（今山西万荣南）等地。贞元元年（785年）三月，败李怀光军于陶城（今山西永济北），四月与浑瑊破李怀光军于长春城南，掘堑围宫城，怀光诸将相继来降。当时蝗灾严重，军队缺少资粮，朝臣多主张宽容李怀光以求罢兵。七月，马燧舍军入朝，奏称“怀光逆计久，反复不可信”，愿得30日粮，足平河中。德宗同意。马燧与浑瑊等军合，继续围攻李怀光军。八月，马燧于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城下说叛将徐廷光降服。然后率兵8万渡河进逼河

中，李怀光计穷无路，自缢而死。河中遂平。马燧迁光禄大夫，兼侍中。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尚结赞破盐、夏二州。诏马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率军反击。三年，尚结赞求和，马燧进言，宜许以盟。诏命浑瑊与盟平凉（今属甘肃），为吐蕃所劫，浑瑊仅以身免。马燧因此被剥夺兵权，仍为司徒兼侍中。死后赠太傅，谥庄武。

马燧为唐后期“名盖一时”的将领，其功也彰，其过也显。在作战指导上，他常能先计后战，善于调动敌人，争取主动，注重攻心，因敌情而灵活用兵，多能取胜。如败田悦于洹水，平李怀光于河中等。治军上，注重整饬武备，训练士卒，与士卒同甘苦，能“亲令于众，无不感慨用命，斗必决死”①。但他在“知彼”“料敌”上有所失误，致使国家受损，“大臣奔辱”。但这与其功比起来，应属微瑕。

四、“忠谨”、“功高”的浑瑊

浑瑊（736～800）是唐朝后期少数民族名将，原名日进，本铁勒部九姓之浑部，皋兰州（今宁夏青铜峡西南）人。十几岁时就善骑射，随其父释之防秋，参加了破贺鲁部、拔石堡城（在今青海西宁西南）、龙驹岛（在青海湖中）之战等，勇常冠三军，署折冲果毅。节度使安思顺命他率偏师入葛禄部，破突厥阿布思，迁中郎将。

安禄山反唐，浑瑊从李光弼转战河北，射死叛军骁将李立节，授右骁卫将军。肃宗即位，他率兵赴行在，从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收复两京，在新乡（今属河南）胜安庆绪，擢武锋军使。从仆固怀恩平史朝义，经大小数十战，功最多，改封太常卿，加开府仪同三司。仆固怀恩反唐，浑瑊率所部归郭子仪，会其父与吐

---

① 《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

蕃军交战中阵亡，丧后起复为朔方行营兵马使，从郭子仪反击吐蕃于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并留屯此地，永泰元年（765 年），与讨击使白元光拒吐蕃于奉天，有功，迁太子宾客，屯奉天。大历二年（767 年）从郭子仪讨周智光，以步骑万人克同州（治今陕西大荔）。此后屯驻宜禄（今陕西长武）。

大历七年（772 年），吐蕃军入侵，浑瑊会同泾原节度使马璘征讨之，初战失利，后引军趋秦原（今甘肃清水东），乘吐蕃军引去之机，邀击破之，尽夺其所掠而还。从此每年于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防秋。十一年，领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今甘肃环县）、怀安（今甘肃华池西北），均被浑瑊击败。十三年，回纥侵太原，浑瑊被授都知兵马使，率军自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以南布防成犄角之势，迫回纥军退去。进兼单于副都护、振武军使。十四年，兼单于大都护，振武、东受降城、镇北大都护府、绥银麟胜州节度副大使。不久，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建中四年（783 年），泾原兵变，浑瑊随唐德宗出奔奉天，授行在都虞侯、京畿渭北节度使。以数千兵力抗击朱泚数万军队的进攻，在兵力悬殊、缺少粮草、甲弊兵坏的情况下，他以忠义激励将士，并身先士卒，保卫奉天。自己中箭，拔去后挥血而战，塞城门，挖地道，烧云梯，随机应变，舍身杀敌，终保奉天未破。进行在都知兵马使。

兴元元年（784 年）二月，李怀光反唐，浑瑊护卫唐德宗由奉天出逃，在谷口（在今陕西礼泉东北）击退李怀光骑兵，护德宗逃入梁州（治今陕西汉中东）。三月，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盐丰夏定远西城天德军节度、朔方邠宁振武道永平军奉天行营副元帅。四月，浑瑊率吐蕃兵破朱泚将韩旻于武亭川（今陕西武功西北漆水河），斩首万级，进屯奉天，与屯驻东渭桥的李晟军相呼应，共取长安。五月，李晟攻克长安，同日，浑瑊收复咸阳（在今陕西咸阳东北），以功兼侍中，授河中绛慈隰节度使、河中同陕虢行营副元帅，封咸宁郡王，不久，又加朔方行营副元帅，与马燧同讨李怀光。贞元元年（785 年）四月，与马燧

败李怀光军于长春宫（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南，八月，河中（治今山西永济西南）平，因功加检校司空，出镇河中。

贞元三年（787年），浑瑊奉命为会盟使，与吐蕃相尚结赞会盟于平凉（今属甘肃），被尚结赞所劫持，浑瑊只身逃回，副使崔汉衡以下60余人皆陷。浑瑊入朝请罪。会吐蕃复入，使浑瑊镇奉天，敌退，还河中。四年，授邠宁庆副元帅，进检校司徒，兼中书令。死后赠太师，谥忠武。

浑瑊好读书，性忠谨，功高而益谦卑，世人比之汉金日磾，故始终能得皇帝信任，治蒲16年，猜间不能入。守奉天，平河中，御外敌，其功甚伟。史称“咸宁（浑瑊王号）蹈义，感慨匡君，再隆基构，克殄昏氛”①，被德宗赐名为“奉天定难功臣”。但他亲与结赞会盟，不能料其诈，致遭失利，是其忠谨有余而智略有所未逮欤！

---

①《旧唐书》卷一三四《浑瑊传》。

后　记

《唐代军事史》是由地方专家和军队学者密切合作、集体劳动的结晶。全书初始框架由军事科学院张文才同志拟定。上册主要由西北大学杨希义同志撰写，下册主要由渭南师专杜文玉同志撰写。杨希义对全书进行了初审。军事科学院于汝波同志负责对全书进行统审，并撰写两册中的军事思想部分。西北大学周伟洲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教授对书稿进行了审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另外，书稿吸取了近年来唐史研究的一些新的成果，原作者姓名不能一一列出。在此，谨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可能有不当之处，诚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6年11月11日